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 著　董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 著 董璐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49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德)罗萨(Rosa,H.)著;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301－26518－5

Ⅰ.①加…　Ⅱ.①罗…　②董…　Ⅲ.①时间—管理—研究　Ⅳ.①C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387 号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by and controlled through Suhrkamp Verlag Berlin.

书　　名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Jiasu：Xiandai Shehui zhong Shijian Jiegou de Gaibian
著作责任者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　著　董　璐　译
责任编辑	武　岳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518－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mm×1300mm　16 开本　27.5 印张　449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译 序

“什么是时间？在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一旦要我对这个问题加以回答，我却不知道时间究竟是什么了。”古代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汀留下过这样一段关于时间的隽语。的确，“时间”这个概念，很难给它下一个简明清晰、不会引起争议的定义，在哲学、社会学层面的学术研究领域里，它至今仍然是混沌模糊的语义存在，远没有能够达成一种基本概念上的共识。

从超验世界回到经验世界，情况似乎可以变得简单一些。一般来说，时间可以是指一种有明确单一指向、不可逆的序列过程；也可以是充当衡量世间万物循环、各种变化的基本等价物、计量单位；最为普遍的情况则是，它被当做一种不言自明的变量，广泛地用于日常生活当中。

在古代社会、人类文明的早期，日晷和沙漏已经成为经典的时间测量工具，通过漏斗中一定数量的沙子，或者指针影子移动的一段距离，所对应、指代的实际上是被分割、区隔化了的万物、世事变化，其起衡量作用的目标范围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从日晷、沙漏到今天的钟表、日历和各种电子数据，测量的工具、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功能、原理基础一如既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出生、成长、衰老、死亡……万物生命无休无止的循环往复，带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性的不同过程，这些过程连接成有明确固定的先后顺序的、不可逆的动态发展链条，而用来指代、描述这种先后顺序、发展链条的基本工具，仍然是“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和“变化”是相伴相生的，变化赋予时间存在的意义，时间则成为变化的影子。而在时间的映射下，变化又是可以按照一定标准进一步分类并加以比较的，于是就有了“速度”的产生，而“速度”作为“时间”附属的一个次级概念，忠实地服务于“时间”和“变化”……

无论时间的内涵世界接下来怎样繁衍、扩张,可以说,它都是人类意识的产物,是人类思想活动的投射、结晶。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万物灵长,人类始终是运用自己遥遥领先于其他物种的脑力活动,对所处的世界加以观察、认识、判断和定义。时间不同于其他很多概念下的所指,因为它本身并不是独立有形的客观实体,它是人类历经长期实践发现并定义的一种动态变化的逻辑关系集成,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飘忽于主观、客观之间的存在。

人类创造出时间这一工具,服务于自己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和认知。时间的概念内涵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并且在经由历史传承下来的精神、知识领域里,逐渐形成强大的动态的观念力量,反作用于外在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

现当代西方学术界有关时间哲学、时间社会学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丰富多彩。从中稍加搜寻采择所得,相信就应该远胜上述几点肤浅的个人体会。《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这本书,就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切入角度,展现了颇为系统深入的且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

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喋喋不休地抱怨时间不够用,或者换一种说法,对于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所带来的诸多压力啧有烦言。无数这样的现象经过严谨系统的观察、测量和总结概括,其蕴含的意义内容已经足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证明人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加速的社会、加速的时代。

当然,这里所谓的加速,表面上最终仍然是基于自主选择背景下人们的个体感觉。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单位时间的使用效率,但是并没有因此通过时间的节省而释放、缓解人们的压力。因为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丰富了人们单位时间的选择机会。日新月异的生活标准和活动规范,刺激、迫使人们或主动或被动,持续、持久地加入到对周围各种资源的追求与攫取过程。对加速—时间匮乏的恐惧,恰恰来源于人们时间观念的改变,来源于改变的时间观念下日益增长的选择压力。

无奈之中憧憬"慢生活"的人们,经常会把海边那个贫穷的渔民和成功企业家的故事挂在嘴边。故事当中,看不惯渔夫的懒散和不求上进,企业家好心为渔夫制定、描绘了科学的奋斗计划和美好的生活愿景——最终事业发达后的渔夫将可以整日在沙滩上晒着太阳悠闲地垂钓。而渔夫的回答是,他现在已经在那样(整日在沙滩上晒着太阳悠闲

地垂钓)做了,不需要再经历企业家所建议的那么复杂、辛苦的过程去争取。

这个经典的"励志"故事,在《加速》一书的作者笔下,却有另外一种有趣而又完全不同的意味深长的释义。他借此邀请读者们进入到他所精心构建的一个激荡、自由的充满创造性的思维世界里。

当然,读者也可以选择拒绝这一邀请——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去思考时间的话。

董 璐

2014 年 5 月于美国 Marietta

序　言

以前，也就是各种技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时代，来自好时机市（*Kairos*）的宽容先生（*Langmut*）要向他住在时期市（*Chronos*）——这个地方正好在乌泰姆普斯帝国（*Utempus*）里（当时正值人们还无法明确辨析希腊语词素和拉丁语词素的时期）——的朋友消遣先生（*Kurzweil*）传递一条讯息的话，他必须要辛辛苦苦地走到朋友那里去，这大概需要六个小时，或者他也可以骑着毛驴去，那么这段路也至少要花上三个小时。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他彻彻底底地陷入时间紧张当中去，因为如果他不能在午饭前往回返的话，或者说午饭前才动身、因而不得不在时期市过夜的话，他不仅不可避免地会与他老婆吵架，而且也损失了一个工作日。但是，在今天的话，宽容先生只要笑眯眯地拿起电话，把消息告诉消遣先生就可以了，并且他们还可以聊会儿天气；之后，他可以优哉游哉地吹着口哨，把猫喂了；接着再工作半个小时；接下来就可以和他的老婆一起准备午饭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使用微波炉。

当然了，在这个时候的工作也与之前的完全不同了。在科技没有被使用之前，宽容先生作为市政府抄写员，整天整天地忙于将书籍复写的工作。如果一本书很厚的话，有时他晚上也要继续抄写。但是，今天却完全不一样了，他只要在早上安安心心地打开复印机，然后喝上一杯咖啡，等复印机预热好了，就将模本完全根据好时机市的需要复印上 10 份或 20 份就可以了，而这些连 20 分钟的时间都用不了。之后，宽容先生可以去海边游泳。至于下午，他根本就不需要去工作。

于是，宽容先生应该终于有时间，坐在庭院里和他的老婆闲聊了，或者弹奏乐器，或是进行哲学思考，要么还可以读一读复印好的书籍，一切全凭他的兴趣。因为完全不用过时间紧张或有期限压力的生活而带来的喜悦简直是妙极了。宽容先生想要有一张他老婆的，或者他的猫的，或是海上日落的图片，于是他的曾孙子一听到这个愿望，就立即从房间

里拿来了他的数码相机,悠闲地按下了快门,之后,一眨眼的工夫,非常
9 逼真的图片从打印机里印出来了;而不需要宽容先生再像以前那样去雇请他那个画家朋友永远先生,花上一个小时用画笔来做画了,那个时候,因为永远先生忙于作画,宽容先生还要花时间或是用各种手段讨好小猫或是用武力威胁小猫而让它保持静止不动。但是,现在,宽容先生却很少感觉到让什么东西定格为画面、从而之后可以慢慢欣赏或者传给后世的愿望了。

现在,如果夜晚时分户外有些寒凉、想让室内舒适温暖的话,宽容先生并不需要再跑到树林里去捡拾树枝,然后回到家中费劲地将它们点燃、感受到有限时间的温暖了。他只要简简单单地拧开暖气,这个装置是与海边的风车联系在一起的,完全是反掌之间就能让房间里变得像初夏的午后一样暖洋洋的。宽容先生很快乐,同时他觉得自己是富有的——因为他赢得了时间,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间,而且,不同寻常的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总被无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折磨着了。正如前人说的那样,宽容先生终于找到了闲情逸致。充沛富裕的时间、无尽的时间财富使宽容先生脱胎换骨成一个新人了,乌泰姆普斯帝国也成了另一个社会。

这就是或者类似于我们所设想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直到20世纪都一直是有关科学的预言所梦想的一个能够变成现实的美梦;在这个世界里,所有时间紧缺所带来的束缚和忙乱都不再存在;这个世界从时间中解放出来,并且因此可资利用的财富从短缺转而变为充裕。

现代科学的和经济的效率恰好可以产生出一个"乌泰姆普斯式"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一种从不被经济—技术进步的倡导者所怀疑的信仰,比如我们在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身上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信念。[1] "我们一直期待着(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本书作者注)经济上的富裕,并由此获得有益的结果,即让人们过上宁静而和谐

---

* 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1977),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1949—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劳动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总理。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人之一,他与威廉·勒普克等经济部副部长,对联邦德国在二战后的经济政策的影响非常大。但艾哈德本人始终反对将当时德国经济的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奇迹,联邦德国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市场经济政策的结果。艾哈德1957年出版了《大众的福利》(*Wohlstand für alle*),根据联邦德国战后经济改革的经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奠基人瓦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译者注

〔1〕 参照Erhard 1997年。

的生活,如同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瑞典经济学家斯戴芬·伯伦斯坦·林德(Staffan B. Linder)*因此中肯地作出了这样的评论。[2] 而且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在他1932年所著的《悠闲颂》(*Lob des Müßiggangs*)中表达了对这样的观点的支持,即世外桃源——乌泰姆普斯式的社会基本上已经变成现实了;只是一种不明智的("新教徒式的")职业伦理以及对工作的错误的分配而使其没有被完全实现。[3] 包括1964年美国的《生活》杂志(*Life*)也请人们对现代社会中将要出现的大量的时间富裕加以警惕,因为这会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因而在这一年2月21日出版的那期杂志的大标题就是:《美国人现在面临着过多的休闲:当务之急是如何过安逸的生活》。[4] 10

从很多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社会都与乌泰姆普斯式的城市好时机市有相同的地方——当然,另一方面,当今的社会与那时相比也有根本不同之处。为什么呢?"生活节奏已经大大加快",并且由此带来了紧张、忙乱和时间紧张,因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的抱怨:尽管正如生活在好时机市那里的人一样,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都在技术的辅助下,通过提高速度而赢得了大量时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哪怕我们赢得了时间的富足。这本书正是用以解释现代社会的这个巨大的佯谬,并且探明当代社会的隐秘的线索的。

为此,这项工作的关键就是解码社会加速中的逻辑。首先,从前文的开场故事中,人们很容易有这样的猜想,宽容先生正是通过他赢得时间的方法,又失去了时间:的确在复印机、照相机和暖气的帮助下,他节省了很多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必须先被生产出来并且赚钱买回来。由此可以想到,即便生活在好时机市也需要参加到分工明确的生产劳动中去,因此宽容先生在复印技术被"发明"了之后,相应地要复制比之前更

---

* 斯戴芬·林德(1931—2000),瑞典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忙碌的休闲阶层》《论贸易和转化》等。——译者注

〔2〕 Linder,1970年,第1页。

** 伯特兰·罗素(1872—1970),是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也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他与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罗素的著作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等。——译者注

〔3〕 Russell,1935年。

〔4〕 引自Putnam, 1997年,第Ⅷ页。

多的书籍(当然,其前提是在乌泰姆普斯帝国的人们对书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了)。在这种方式下,时间预算与技术带来的新希望之间所展开的是一个零和游戏(甚至是一场负和游戏):乌泰姆普斯帝国的居民需要与他们所节省的时间一样多的——甚至是更多的——时间,去生产并使自己买得起那些能够节省时间的机器。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了在许多
11 地方流传的、版本各有不同的那个有关一位贫穷的渔夫和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的故事。[5]

在南部欧洲一个偏远的海边渔村,一位渔民坐在平坦的沙滩上,正用一副老旧的传统的鱼竿在钓鱼。一位富有的企业家在海边享受着他的孤寂的假期,此时正好散步走到渔夫身边,他观察了渔夫一会儿,然后摇着头,开始与渔夫攀谈。富翁问渔夫为什么在这里钓鱼,如果他去岩石陡峭的外海域去钓鱼,那会有双倍的收获。渔夫奇怪地看了富翁一眼,然后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这样可以将多钓到的鱼拿到附近城市的市场上去卖,然后就可以用卖鱼的收入去买一副新的玻璃纤维的钓鱼竿,而且也可以买得起对鱼更有吸引力的特殊的鱼饵。这样的话,每天所捕获的鱼的数量轻轻松松地就可以翻番。"

"那么,然后呢?"渔夫更加不解地问道。变得有些不耐烦的企业家回答说,之后渔夫很快就可以买一艘小船了,他可以开着船去深海域,在那里可以捕获超出现在十倍的鱼;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可以富起来,于是他便买得起远洋拖网的渔船啦!企业家说到这里又变得神采奕奕,因他所描述的愿景而感到兴奋。"没错,"渔夫说,"那么之后我干什么呢?"企业家立即沉醉地描述道,那之后,渔夫就可以控制这里的整个海岸的捕捞了,因为会有整整一支捕捞船队为他工作。"啊哈,"渔夫回答说,"那么当他们为我工作时,我又该做什么呢?"那个时候,渔夫就可以整日里坐在平坦的沙滩上,享受着阳光,悠闲地垂钓了。"是啊,"渔夫说:"我现在就已经在这样做了。"

当然,这个故事其实相当幼稚。因为这个故事所展现的是一个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奋斗历史后最不可能的一个结局——企业家竭力使渔夫感兴趣的竟是与他现在的状况一样的奋斗结果;因此,对于渔夫来说,如果按照企业家描绘的那样去做,尽管他应该能够获得成功,但是却什

---

〔5〕 这个故事最有名的版本应该是出现在海恩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1963年)的《工作伦理堕落轶事》(*Anekdote zur Senkung der Arbeitsmoral*)一书中的版本。

么也没有得到。所以这里的企业家显然正是罗素所诟病的“新教工作伦理的”牺牲品:工作本身对于这位企业家来说就是目的,从出发的起点到达最终结果之间的道路正是一场零和游戏——这还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但是,现实中的这类故事当然不是一场循环:开端和终点只是看起来一样,而事实上却大相径庭。那位渔民必须打鱼,因为他借此来 12
维持生计,并且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而那位富裕的企业家可以垂钓,同时他也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事情可以去做。因此,可能性范围的扩大正是“加速所带来的希望”的重要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沙滩边钓鱼的性质也因而发生了改变。企业家知道,因为钓鱼,他错过了在这个时间可以去做的许多其他事情,比如乘船出海、高尔夫球场的开张、驾车去下一个风景名胜……企业家可能因为这些选项的存在,而使得他的垂钓的闲情雅致被打扰,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似曾相识的,当然这也是愚蠢至极的——因为害怕错过什么,而使得人们无法投身于切切实实地“在那个世界存在”,也就是在那里可以做一名(理想状态下的)渔夫。

但是,企业家的这种对于害怕错过什么的恐惧并不只是出于享乐主义的根源,也有相当多的来自商业经营方面的原因。

当企业家在沙滩上垂钓时,他的竞争对手正在开发着新的、性能更好的船只;购得更广泛的捕鱼权利;使得企业家在海岸上的垄断变得有争议,因而使他不再能安心地坐在沙滩边钓鱼了。同时,他的公司的医疗保险、电话通讯和电力能源等费用,以及他的家庭的花费也都发生着变化,同样,他的资产管理所处的投资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因此,也许他在最好的时刻都为这些而操心,而不是忘情地投入于垂钓中去——否则的话,明天他可能就不能钓鱼了。他也迫切地需要一身新衣服,因为他穿在身上的衣服是两年前流行的;而且,他戴的太阳镜也已经不符合最新的防护紫外线的标准了,因而是不利于健康的。他的朋友们总是不断地搬家,因此也许他最好应该开车回家,在与他们失去联系之前,打电话给他们。总之,现在休假中的他总算有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了。另外,他的妻子近来总是很晚才回家,也许她正打算着离开他。不,当他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候,他绝不应该继续坐在沙滩上钓鱼(该死的,与此同时,他的电脑也太旧了,因而无法安装最新的软件,他也就无法在这些软件的帮助下来管理地址。不断地一项一项逐条记录邮政地址、电话、手机和传真号码以及电子邮件地址的变化实在是太辛苦了。地址簿也因为不断地被涂改,变得面目不清而无法阅读,而 13

且都快被翻烂了)。

当这位企业家坐在沙滩边,打算享受垂钓的乐趣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正处在一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条,迅速下滑的斜坡上,或者是正站在向下开动的自动扶梯上,因此,他最好应该参加到竞赛当中,从而保证自己的位置,保证始终能了解最新情况。这不仅是"加速所带来的希望"驱使着他不断地加快着他的生活节奏,而且也由于他所处的技术、社会和文化环境的高度动态性、这些环境的复杂性和随机性的不断增强,这些都迫使这位企业家处于不断的升级换代之中。因此,在这里也体现出渔夫寓言故事中的第二个回答的幼稚之处:富裕的企业家是不能像贫穷的渔夫那样只是必须去钓鱼的:尽管他可以有意识地拿出一些"额外的时间",利用两三天到一周的时间在沙滩上(关掉手机、不接收电子邮件、不看电视地)"享受",但是他会将这种驻留在"放慢速度的绿洲"——在这里他的所作所为和贫穷的渔夫一样——当做是非常罕见的奢侈,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因而当他回去之后,他必须追赶上去,或者是接受被落下来的状态。这样的意识明确表明,不仅是故事开头时的社会环境到了结尾时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就连这位垂钓的企业家本人的特性也发生了改变。他将"在那时的"发展的终点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出发的起点。他对未来、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位企业家的未来的世界与他的过去的世界截然不同,而对于渔夫来说(与第一个故事中的宽容先生相似),他会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打算他的未来。因此渔夫的期望范畴与经验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合的;但对于企业家来说,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差异。企业家对时间的流逝有着不同的感受,对于时间的价值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的主人公表现得和传统的企业家的形象(也包括企业家的各种算计考虑)一样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感到时间非常紧缺。他会努力保持对自己的生活和企业(以及对他来说重要的社会变化)的控
14 制,而且会对未来的发展进行精心的计划。他的周围环境越是动态多变,他的事务链和可能性的范畴越是复杂和随机,他对未来的设计就越不能实现。因此,我们的这位企业家可能会继续发生转变:他放弃了对控制和操纵的要求,而转变为"赌徒",跟随事件随波逐流。如果后天竞争对手将我的船只弄得一钱不值,那我可能就会去开个赌场,或者写本书,也许远赴印度去寻找我的精神领袖,也可能我将开始读大学。谁知道呢。这些都不需要我今天来做决定,到底做什么要看我

后天的感觉和那个时候我有哪些机会。在这个世界中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可能性。

这样的话,这位企业家有时又和那位渔夫一样了,也就是不用尝试着有计划地、长远地改变未来了。也许,他甚至又可以赢回一些休闲的时间了。但是,赌徒的周围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期望范畴与经验领域是分离的。因此,(后现代社会的)赌徒从另一种方式上来说,在那时和在那地就不仅是(前现代社会的)渔夫,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企业家。

我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描述我们在此地此景的存在的方式和途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时间结构的。关于"我们想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与"我们如何打发我们的时间"这一问题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的"时间的质量、它的范畴和结构、它的速度和节奏都不归——或者只在非常小的程度上归我们支配。时间结构具有集合属性、社会性特征;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时间结构总是与行动中的个体对着干。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就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过程和事件的加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正如前面所讲述的两则故事所阐明的,这个基本原则的原因和作用方式是极其多元化而复杂的,间或相互矛盾。可以看到,故事中的主角事实上并不是面对着一种类型的加速,而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加速:他们首先要应对技术上 15
的加速,但是正如在好时机市的故事中所描绘的,从抽象逻辑的角度来观察,技术上的加速所带来的后果是生活节奏的减速。事实上,生活节奏的加速展示了由于技术上的加速所带来的社会的加速的似是而非的形式,这种矛盾在上文中对那位企业家的困境所做的思索中有所体现;并且这种似是而非很可能与第三种也可以独立分析的加速联系在一起:社会的加速和文化的变化速度,尽管可以对它们从表现形式上做单独的分析。我在本书中将展示,这几种加速的形式复杂的共同作用机制,是要为人们梦寐以求的乌泰姆普斯式的时间富足的状态,却被现实中的西方社会的极大的且不断加剧的时间紧缺的状态所代替负责的;时间危机,正在挑战传统的形式、个体所拥有的机会以及政治家的构建社会的能力,并且正不断让人们对全社会的危机时代的感知扩散,这种感觉是以一种相互矛盾的方式蔓延的,也就是在"加速的社会中",在社会结构、物质结构和文化结构持续地不断发生着变化的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却是结构上和文化上的深层次的静止,即历史的根本的凝滞,在这样的历史当中,没有任何重要的元素再有任何改变,迅速变化的一直只是表

面现象。因而与新的、变化了的时间结构相适应的定位模式和社会政治安排都是值得思索的,在这本书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理论就是,这一切都是以现代社会的最深层的伦理和政治的信念为代价的,也是以(因此破产了的)"现代社会的项目"为代价的。

而为了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而撰写论文,以及之后将它完善成书稿,在很多方面也恰恰都是一个与时间、与钟表做斗争的过程。最终,如我所愿,这本书的能够令人接受的终稿完成了,为此我有许多朋友、建议提供者、商讨对象和陪伴者值得去感谢,他们在这些年里为我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对这本书的优点作出了不凡的贡献——而对于这本书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当然应该由我全部负责。我首先想要提到的是身为专家的汉斯·约阿希姆·吉戈尔(Hans-Joachim Giegel)*、克劳斯·迪克
16 (Klaus Dicke)**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同时他们也是我可以与之讨论的伙伴、批判家,他们从三个完全不同的学科角度帮助我不断清晰我的论点,并且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不断地给予我鼓励、在错误面前给予我提醒。同样地也要感谢赫尔弗里德·默克勒(Herfried Münkler)****,他尤其是在这项工作的早期阶段对于框架的建立和梳理有着不可低估的帮助,并且在他主持召开的研讨会上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坛。

我从太多的同事那里获得了有教益的建议和启发,而我恐怕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不得不提及纽约新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Graduate Faculty* der New School University in New York),由于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所慷慨资助的佛欧多尔·吕南科研奖学金(Feodor-Lynen-Forschungsstipendium),我得以从2001年9月到2002年8月在那里(与国际政治事件隔绝开来而)不

---

* 汉斯·约阿希姆·吉戈尔,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理论或社会技术理论》《工业劳动与自作主张》等。——译者注

** 克劳斯·迪克(1953—),德国政治学家,曾任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校长。主要著作有《人权与欧洲一体化》《国际组织的效率与效用》《人权与发展》等。——译者注

*** 阿克塞尔·霍耐特(1949—)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嫡传弟子;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关键人物。主要著作有《权力的批判》《支离破碎的社会》《不确定性的痛苦——读斯宾诺莎》《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等。——译者注

**** 赫尔弗里德·默克勒(1951—),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公正的概念》《帝国:从古罗马到美国的世界统治的逻辑》和《关于战争》等。——译者注

受打扰地完成这部作品。安德鲁·阿洛托(Andrew Arato)、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南茜·弗瑞泽(Nancy Fraser)都是我要特别感谢的人。威廉姆·E.绍伊尔曼(William Scheuerman)*由于与我有相近的研究主题,因而成为我的非常重要的谈话对象,并且也是好朋友。这番感谢同样适用于曼弗雷德·伽哈玛(Manfred Garhammer)**。我也从汉斯-乔治·布鲁斯(Hanns-Georg Brose)***、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和马丁·科利(Martin Kohli)*那里得到了关键的专业上的帮助。我还想感谢我在耶拿(Jena)的同事米歇尔·比兹(Michael Beetz)、米歇尔·贝尔(Michael Behr)、罗宾·凯利凯茨(Robin Celikates)、克劳兹-M.科达尔(Klaus-M. Kodalle)、约恩·拉姆拉(Jörn Lamla)、卢兹·尼塔玛(Lutz Niethammer)、迈克·山德勃斯(Mike Sandbothe)、瑞恩·崔泼托(Rainer Treptow),还有罗尔夫·施拉德(Ralph Schrader)和安德烈·考特曼(Andrea Kottmann)。在所有专业领域的决定中,对我来说不可或缺的一位咨询者就是安卓·凯撒(Andre Kaiser)。除了洪堡基金之外,我也要感谢克尔伯基金会(*Körber-Stiftung*)为我的作品提供了支持和不凡的合作。

在与斯蒂芬·阿曼(Stefan Amann)、约克·阿奈克(Jörn Arnecke)、伊丽莎贝特·赫尔曼(Elisabeth Herrmann)、詹姆斯·英格拉姆(James Ingram)、克里斯汀·克劳斯(Christian Kraus)、卡罗拉·拉什(Carola Lasch)、保鲁斯·里宁(Paulus Liening)、斯特芬·茨姆曼(Stephan Zimmermann)和弗瑞德·魏茨(Frieder Weis)非常愉快的谈话中,我深受启发而获得了决定性的想法;也有一些见解是在与 TC Grafenhausen 的对手网球场(Gegners Tennisplätzen)上的年轻人共同度过的许多个星期天中所获得的;还有来自于从 1998 年到 2003 年在与布伦瑞克(Braun-

---

* 威廉姆·E.绍伊尔曼(Wiliam E. Scheuerman)(1965—),英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围困中的法律规则》《法律的终结》《加速的社会》(与本书作者合著)等。——译者注

** 曼弗雷德·伽哈玛,德国社会学者、社会工作教授。主要著作有《远程工作与远程通讯》《欧洲人如何使用他们的时间》《平衡时间:弹性工作制对日常生活、休闲和家庭的影响》。——译者注

*** 汉斯·乔治·布鲁斯(1945—),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工作体验》《个体的终结到没有尽头的个人化》《不同性的文化》等。——译者注

**** 芭芭拉·亚当,英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有《时间》(*Time*)等。——译者注

* 马丁·科利(1942—),瑞士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欧洲社会的融入与排斥》《欧洲还在运转吗:整合、雇佣和社会秩序》《制度化的生命历程》等。——译者注

schweig)的德国学生学会(Deutsche Schüler Akademie)热情的成员的激烈讨论中。大学生助理海克·斯泰尼格(Heiko Steiniger)孜孜不倦地致
17 力于相关文献的查阅。乌苏拉·麦恩乌西(Ursula Maynvshi)女士对整部书稿进行了极其细致的阅读,并且明察秋毫般地发现了一些错误并作出修正,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伯恩德·斯蒂格勒(Bernd Stiegler)也是如此,对于两位我必须表达自己浓浓的谢意。

我希望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兄弟姐妹:阿明(Armin)和克里斯汀
18 (Christine)。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1
1. 社会中的时间结构　1
2. 两个当代的时间诊断　18
3. 对社会加速理论的初步思考　28

第一部分　社会加速系统理论范畴上的基本轮廓

第二章　从热爱变动到加速法则——对现代性的观察　43
1. 加速和现代文化　43
2. 现代化、加速和社会理论　59

第三章　什么是社会加速　77
1. 初步思考：加速和增长　77
2. 社会加速的三个维度　86
3. 停滞的五种类型　96
4. 有关现代社会中的运动和停滞之间的关系　107

第二部分　影响方式和显现形式：社会加速的现象学

第四章　技术加速和空间—时间—制度的革命　115

第五章　滑动的斜坡：社会变化的加速和偶然性的增加　127

第六章　“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141
1. 客观的参数：行动速度的提高　144
2. 主观的参数：时间压力和时间疾驰而去的体验　155
3. 时间结构和自我关系　173

第三部分 原 因

第七章 社会加速作为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加速的循环 179

第八章 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189
1. 时间就是金钱:经济引擎 191
2. 加速的预言:文化引擎 207
3. 复杂性的时间化:社会结构引擎 219

第九章 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231

第四部分 结 果

第十章 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249

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263
1. 现代的自我的动态化 263
2. 从先验的实质身份到后验的稳固身份:生命的时间化 266
3. 从长期稳定的身份到情境化的身份:时间的时间化 271

第十二章 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时间地平线 295
1. 政治中的时间:时间中的政治 295
2. 在现代性中的历史的时间化 300
3. 似是而非的时间地平线:在晚期现代历史的去时间化 305

第十三章 加速和停滞:尝试对现代性的重新定义 326

第十四章 结语:疾驰的停滞状态? 历史的终结 350

图表目录 372

参考文献 373

关键词和人名索引 406

第一章　导论

从社会理论自身所推导出来的思考如同放大镜所产生的聚焦作用。而当社会科学不再引发新思考的时候，社会理论就山穷水尽了。——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81年，第二卷，第563页。）

1. 社会中的时间结构

有关社会环境中所有的事件、物体和形式都具有动态性或过程性这样的特质以及时间因此而体现为所有合理的分析的关键要素的信念，在社会科学中已几乎成为陈词滥调。到目前为止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各个学科仿佛都不太知道如何利用这样的认知展开研究。不过，总会有这样令人惊讶的断言，那就是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在时间上重构”，也就是对社会现象以时间为视角进行重新描述——无论是统治技术、阶级差别，还是跨文化方面的问题，或是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两性关

*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是批判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中坚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致力于重建“启蒙”传统，将现代性视为“尚未完成之工程”，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代表作品有《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人类旨趣》等。——译者注

系、福利制度,直至医院、监狱或毒品的体验。[1] 这些论断都无一例外地没有下文和进一步的结论。从时间社会学式的重新改写中,甚至没有得出对所研究的问题领域有理论或实践价值的新认识;从中所获得的相
19 互之间毫无联系的发现看上去几乎无法与系统的时间社会学联系起来。

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发表的时间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性文章总是以模式化的论断开始的——这些论文首先要谈到时间是社会发挥作用的根本范畴,就毫不奇怪了;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些文章直到发表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其作者对于时间社会学有哪些有别于其他论文作者的观点。[2] 罗伯特·劳尔(Robert Lauer)和维纳·贝尔格曼(Werner Bergmann)*早在80年代初就在非常有价值而且十分详细的文献综述中指明,即便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堆积如山的与上述被固执地坚持的信念相对的关于时间社会学的研究了。[3] 尽管相关研究在不断增多,但是严谨细致,并且无论从理论上到实证上都言之有物的有关时间的社会科学的分析仍然一如既往的匮乏。

根据贝尔格曼的观点,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的对时间分析这个领域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缺乏与社会学的理论构建过程之间基础的且系统的联系。社会科学式的对时间的研究往往是预言式的并且武断的;大部分半遮半掩的有关时间的概念迷失在哲学或人类学,甚至是日常概念中。正因为此,大量的时间社会学的文献都是互不关联的,并不是累进的,而且也缺乏与社会理论相关研究的对接,因而变成了"唯我论的"研究。[4] 这种状况即便到了今天也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尽管,当今的论文几乎不再有前文所提到的那种论调,但是,这些发表出来的作品不是时间社会学,取而代之的大部分作品往往是以时间为顺序的或者以分支学科为

---

〔1〕 有关统治技术请参照 Levine, 1999年,第145页及其后页;Lauer, 1981年;Virilio, 1980年;以及 Bourdieu, 1997年。关于阶级差别的概述请参考 Lauer, 1981年;Bergmann, 1983年,第466页及其后页;有关时间和文化多元化请见 Levine, 1999年;Marschall, 1997年。Lauer, 1981年,第135页及其后页,讨论了时间结构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关于两性关系可以参考 Hufton 和 Kravaritou, 1996年;Shaw, 1997年,或 Tronto, 2006年。Garhammer, 1999年,分析了时间模式和福利制度之间的联系。有关最后三个题目请分别参考 Zerubavel, 1979年;Brown, 1998年; Flaherty, 1999年,第63页及其后页,以及152页及其后页。

〔2〕 Zerubavel, 1981年的第Ⅸ页及其后页可以作为这类文章的代表。

* 维纳·贝尔格曼(195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公开冲突中的反犹主义》《反犹主义的历史》《排斥的暴力》。——译者注

〔3〕 Lauer, 1981年;Bergmann, 1983年;并可以进一步参照 Adam, 1990年,第13页,和 Nowotny, 1993年,第8页。

〔4〕 引自 Bergmann, 1983年,第462页;参照 Adam, 1990年,第5页及其后页。

依据进行整理的对那些非常重要,却相互没有关联的时间社会学或时间哲学的研究的概览,这些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所概述的研究成果与其他研究无关联以及自身的不尽如人意,但是随之而来的通常也是另一篇"唯我论的"论文,大部分也只是有选择地与那些能支撑该论文的论述过程 20
的作者或理论联系起来。[5]

因此,目前有关时间这个主题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有数量惊人的研究是属于第一类的,即最终进行概览式的尝试,将到目前为止有关时间社会学的思考收录下来,并且(根据不同的观点)将其系统化。这些论文的最高成就几乎都体现在这样的理论中,即研究资料足以证明,时间结构在社会环境中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千姿百态,因此,对时间结构倾注更多的关注是很迫切的。[6]

与此同时,第二类研究也集中了数量不断增加得非常详细的有关时间和时间结构的研究,这些研究是以社会科学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单一学科或分支学科为基础的。但是,第二类研究中的绝大多数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因为这些分析是在较低的理论层次上、通过毫无原则的方法直接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观测得出的,并且"时间"在这些研究中被当做不言自明的变量来对待。[7]

第三类研究与前面两类相反,终于囊括了一些理论导向的时间分析,从而致力于系统地解释社会科学的或社会哲学的时间概念,因而达到了理论固有的较高的抽象度,但是对于这些非常有实证价值的现象的研究,不仅没有获得一个总体性的概览,而且也走向不切实际[8]——总体上来看,这一类以理论为基础的概念化的尝试到目前为止也完全是"唯我论式的"操作,而没有任何能够创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科学的时间概念的希望。因而,正如芭芭拉·亚当所评论的:"这些作者之间没 21
有共同的关注点。每个人都提出不同的问题。关于将时间作为社会理论的中心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两条理论能够达成共识……在这个概念

---

〔5〕 参照 Lauer, 1981 年;Garhammer, 1999 年;Nassehi, 1993 年;Adam, 1990 年;Giddens, 1987 年 a;Nowotny, 1993 年;以及 Elias, 1988 年。有关这个研究领域的更新一些的综述可以参见 Maurer, 1992 年。

〔6〕 已经提到的 Bergmann, 1983 年; Maurer, 1992 年和 Lauer, 1981 年的作品可以在此作为例证。

〔7〕 例如 Geißler, 1999 年; Levine, 1999 年;Reheis, 1998 年; Gronemeyer, 1996 年;Eberling, 1996 年;Backhaus 和 Bonus, 1998 年;Sennett, 1988 年 a; Klein/Kiem 和 Ette, 2000 年。

〔8〕 Nassehi, 1993 年;Luhmann, 1990 年 a; Rammstedt, 1975 年; Sandbothe, 1998 年。

上的混乱的迷宫里没有指示方向的路标。"[9]时间社会学与有丰富的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过程之间系统化的连接存在于,正如吉登斯*和卢曼**所承诺的那样,使时间成为时间社会学的理论构建过程中
22 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10]——当然,这始终都还是没有被实现的愿望。

亚当和其他人提出将通过时间哲学的路径作为研究时间的整体性的基础,他们以此作为摆脱上述困境的建议;但是,仔细考虑这个建议,很快就会发现这依然是没有前途的:哲学性的时间概念,是由诸如奥古

---

〔9〕 引自 Adam, 1990 年,第 14 页及其后页。亚当自己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图不仅将社会科学中的时间理论,而且也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有关时间的理论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大理论,并且以此为基础创建新的社会理论,但遗憾的是,她的这些努力也并未对她所批判的状况作出大的改变。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她所堆积的大量的来自于不同学科和流派的理论,与将 Holismus a la Bohm、Sheldrake 或 Capra 等人深奥而富有异国情调的理论晦涩地拼接在一起有什么区别,亚当的著作让读者感到一头雾水。社会科学中意义重大的概念与量子物理的考量混同起来(正如很多"流行的"作品通常所做的),就是将假设与论证混为一谈。

* 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1938—),英国社会学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以他的结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与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Holistic View)而闻名。吉登斯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对当代社会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作品有《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气候变化的政治》等。——译者注

**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德国当代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社会系统论。卢曼也是一个"宏大理论"的推崇者,主张把社会上纷繁复杂的现象全部纳入一种理论框架去解释。主要作品有《社会系统》《社会的社会》《社会的法律》《社会制度的科学》等。——译者注

〔10〕 吉登斯(Giddens, 1987 年 a;1995 年 a,第 17 页及其后页)解释了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厄运在于它被分裂为历时的、历史的和同时的不同的学科,也就是将时间搁置一旁进行结构性的分析的学科。因此,这些学科无法辨析这样的事实,即所有的社会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横截面中扩张的,并且在其中进行再造[时空分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尽管吉登斯认同 Bergson 和 Schütz,及 Heidegger 和 Braudel 对于社会生活的同时出现的三种时间形式(期限时间、当下时间和延续时间,参照 Giddens, 1987 年 a,第 144 页及其后页)的较为模糊的区分,但是时间在吉登斯的结构理论中最终还只是作为一个给定的物理条件,或者是社会所存在于的一个特定的量纲;因此,吉登斯的关于社会的概念最终就又变成静止的了(请参考 Berman, 1983 年,第 495 页,以及 Hans Joas, 1992 年,第 214 页及其后页,对吉登斯的时间的概念的批判)。

卢曼也认为时间是社会体现的组成部分。在他的最早期的有关系统理论的上下文中,毫无疑问已经出现了有关时间的详细的社会科学方面的阐述(Rammstedt, 1975 年;Bergmann, 1981 年;以及特别是 Nassehi, 1993 年)。Nassehi 的著作所描述的内容最大限度地符合时间社会学中的第三类研究:它从一条(由卢曼所启发的)通路开始,经过时间哲学,最终以一个抽象的系统理论式深奥的时间概念结束;通过这样的研究过程所得出的这个有关时间的概念,只是在非常狭小的领域里能够被有效地运用。我将在第二章"2"和第八章"3"中,对这个系统理论的前景进行详细的探讨。

斯汀*、康德**、柏格森***、麦克塔格特****、海德格尔*或米德**等人所提出的假设，之后由他们的继承者加以讨论的，但是这些概念相互间异质性强、缺乏相互比较的公度，并且相互不兼容；在有关时间的现实成分这样最基本的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在关于时间应该属于自然界，还是观念性的或可理解的，或是社会结构的范畴这类问题也是各有分说。[11] 时间哲学的研究路径与理论导向的时间社会学的研究一样，至少都倾向于时间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任由时间表现为深不可测的谜团，因此在贴近现象的经验分析中，时间往往就只能无法令人满意地被当做不言自明的变量了。塔布尼（Tabboni）指明了这个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对时间的分析不是“不言自明的情况”，就是“一团迷雾的情形”[12]，这两重情况看上去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讨论时间的特性时，奥古斯汀那句精辟的话总是人们最喜欢引用的就不足为奇了：“什么是时间？当没有人问起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当我要解

---

* 奥勒留·奥古斯汀（Aurelius Augustine）（354—430），早期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曾任北非城市希波的主教，故史称希波的奥古斯汀。他的著作《忏悔录》被称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自传，至今仍被传诵。此外，主要作品还有《论意志的自由》《三位一体论》和《上帝之城》等。——译者注

**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古典美学和星云说的创立者。康德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康德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认为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没有先天的范畴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他的代表作品有《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等。——译者注

***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曾获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论意识材料的直接来源》《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等。——译者注

**** 约翰·麦克塔格特（John McTaggart）（1866—1925），英国著名哲学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派，是黑格尔哲学的继承者。主要著作有《黑格尔辩证法研究》《黑格尔宇宙观研究》等。——译者注

*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教育家，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存在与时间》《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对哲学的贡献》《理性的原则》《通向语言的道路》和《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等。——译者注

**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哲学家，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他的经典性著作《心灵、自我和社会》是由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讲稿汇编而成，并于1934年他去世后出版。——译者注

〔11〕 请参考围绕着麦克塔格特（McTaggarts，1908年）非常有影响力的时间的非现实性的理论的争论（关于这方面的文献综述请见Zimmerli和Sandbothe，1993年，第304页及其后页；此外还有Browning和Myers，1998年）。

〔12〕 引自Tabboni，2001年，第6页。

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却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了。"[13] 这句话简明有力地表现了奥古斯汀对于时间的认知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的状态。

时间社会学的这种薄弱的状态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不仅其在成为社会科学专业名单中的一门分支学科方面相当困难,而且首先就很难将目前的社会理论、现代性分析和时间诊断组合起来。由于时间社会学方面的认知到目前为止较低的普遍化程度,以及这些知识很难与系统的社会
23 科学和社会哲学的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因此只能继续被迫在时间视角之外进行研究,正如布迪厄*的那句名言:社会理论式的实践(完全不顾来自元理论的完全不同的竭力地申明和强调)是"去时间化的",因此甚至连将时间排除在外的想法都没有想到,而且一直如此。[14]

在这样的悲剧下,前面所提到的作品就不能被理解为有关时间社会学之类的研究了,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并不是在探究时间是什么,以及时间不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并作用于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这些研究知识将当前的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放在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并且通过讨论恰当地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在("传统")现代和晚期现代、后现代或第二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从而将它们在政治上和伦理上的后果进行系统化的分析整理。在这其中,主导的假设是这样的猜想:现代化进程不仅在那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尤其重要的是现代化进程表现为时间结构和时间维度本身最重大的在结构上和文化上的变革,能够表示其改变的方向的最恰当的概念应该是社会性的加速。如果不将时间维度放在明确而中心的位置进行考虑的话,那么就无法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理解西方社会中在社会实践、机构以及个体的自身关系当中所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既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某某社会学("加速社会学"),也不是为了使已有的社会学分支(时间社会学)合法化,而是为了将当前的社会理论进行再概念化。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将在我认为从体系上来看合适的地方,不断地去追溯时间哲学和时间社会学的概念。

---

〔13〕 参考 Augustinus, 1982 年,XI,第 14 页。

*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布迪厄提出了许多术语,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场域等概念,以揭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主要作品有《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语言与符号权利》《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等,其中国际社会学协会将《区隔》评定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译者注

〔14〕 Bourdieu, 1977 年,第 9 页。

用时间分析的进入方式提出社会理论的问题的决定性的优势是，时 24
间结构和时间维度表现为行为者的角度和系统的角度的连接点——尽管并非系统化的连接。众所周知，对社会变化的分析不仅要分析“宏观社会的”变化，也就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的结构或系统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而且也有“微观社会的”变化，即从以主题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行为逻辑和自身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从帕森斯*开始就细致地寻找社会理论的近乎所有的变量，以克服结构上或行为者的分离；但是尽管如此，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使得系统性—结构化的逻辑或者说要求能够与行为者的导向相互适应或者说相互妥协，这个问题可能一直是社会环境中最令人迷惑、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了。

因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进程是不能没有相应的主体自我关系的构建的，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化进程身份定位的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变化是必须携手共同进行的。[15] 但是，仍旧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搞清楚的是，行为者在自由的社会中，也就是以不仅要尊重个体的伦理自治，也要积极地对此进行培养为原则的社会，是通过什么方式出于系统性的原因确实形成了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导向。[16] 因而，能够确保成功地分析这个奇妙的系统逻辑和行为逻辑之间的相互适应的途径，应该是要考虑到时间层面的：时间的地平线和时间结构对行为导向和自我关系是建设性的；与此同时，时间又远远地摆脱了个体对它的支配，因而无论是时间的社会结构，还是时间的体系化的产物，都使得时间对于行为者来说等同于“自然给定的事实”。由于时间的稳固的真实性和它在另一方面所具有 25
的社会性，两者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时间结构就成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系统的”要求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中心地点，并且“我们打算如何度过我们的时间”这个问题就因此成为伦理的和政治的核

---

*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整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帕森斯早期的主要理论倾向是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后期开始探讨从宏观转向较微观层面的理论方向。主要作品有《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系统》《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和《现代社会的系统》。——译者注

〔15〕 请参照 Willems 和 Hahn，1999 年；或者 Keupp，1999 年；此外还有 Rosa，2002 年 a，第 267 页及其后页。

〔16〕 以增长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大部分行动在其中的行为者将自己看做是具有不断提升的能力和意愿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所谓的自给自足的人、离群寡居脱离世界的苦行僧或者是艺术家以及政客或战士）。尽管他们当然允许拥有各种政治的、法律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要与他人协调一致（详细内容参照 Rosa，1999 年 a）。

心问题了;[17]从而,时间结构也是社会科学的结构分析与伦理—政治问题的视角能够而且也是必须结合在一起的地方。

时间社会学和时间人种学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一致性的发现,这其中包括两点重要的认识:首先,不仅是对时间的测量,而且也包括对时间的感知和时间的地平线,都在最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并且随着不同社会的不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奥特海恩·海姆斯泰特(Otthein Rammstedt)*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这个假设:对时间的意识和对时间的体验的形式的演变是以社会结构为基础的[18],伴随着演变的过程,随之出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时间的地平线,并且因此带来了有巨大差异的行为的导向和自我关系。简言之,未分化的社会通常被"临时性的"时间意识所支配,在这样的社会中,对时间的体验大多数情况下只分为"现在的"和"非现在的",因而"过去"和"未来"被作为与"现在"不同的(被理解为神话的)事物而不做进一步的区分。关于人类一直以来就已具有对过去和未来的具体的概念的看法,一直都在争议之中。

在早期的以不同的阶级进行区隔的社会里,由于这种社会结构,循环式的时间意识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时间被体验为
26 一直循环往复的过程和状态。因此,这种时间体验的原始形式就是只能区分在此之前的和在此之后的,而过去和未来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即对过去的记忆等同于对未来的预言,经验领域和期望的视野是相互叠合的。[19] 在极端的形态下,对时间的体验看上去就是"同样事物的永恒重复"(尼采),在这样的状态中,记忆一直延伸到未来。与之相反,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随着一条从过去、经由现在抵达未来的不可逆的线条的出现,线性的时间意识逐渐代替了时间循环。因此,以区分过去、现

---

〔17〕 请参考 Habermas, 2001 年,第 19 页及其后页。"我想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不折不扣的是伦理问题的经典的表述;另一种措辞方式也可以完全表达这个问题的实质"我打算如何度过我的时间"。而且,在这里也恰恰指出了,这并不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伦理的问题:"我的时间"一定是社会的时间;它的节拍、它的节奏、角度和地平线都脱离于我的支配。有关时间的问题也因此一直是一个政治问题;时间结构决定了我们如何共同生活,它有着不可避免的规范特性(请参照 Lauer, 1981 年,第 86 页及其后页)。

* 奥特海恩·海姆斯泰特(1938—),德国社会学家。主要作品有《对时间的日常意识》《齐美尔社会学文选》等。——译者注

〔18〕 Rammstedt, 1975 年。

〔19〕 有关经验领域和期望的范围的概念以及在现代两者逐渐分离开来的内容,请参考 Koselleck, 1989 年,第 349 及其后页。

在和未来为导向的时间体验占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在那些未来的含义被设定或确定为历史的终极的地方（例如在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中）更是表现得如此。[20]

在高度现代性的功能各异的社会中，最终伴随着开放式未来的线性的时间意识占据优势：历史的发展不再是奔向某个特定的目标，它的出口是不确定的。根据海姆斯泰特的观点，对时间的体验也应该是连续的运动或者持续的加速的。当然，这种概括性的类别化简化了现象，因而在经验上也是值得质疑的。海姆斯泰特自己也强调，时间意识的四种形式之间有相互重合的地方，而且没有形成一个历史性的明确统一的结论，而实证研究恰恰从多个角度证明了这个猜想：循环式和线性的时间观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相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社会中有着不同的重要性和表现形式。[21] 但是，时间经验和时间意识是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理想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核心理论并没有因为上述研究缺陷而受到质疑。[22] 27

其次，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的时间结构同时也是与认知和规范有关的特性，并且能够深深地将社会的习性根植于个体的人格结构中。因此，诺伯特·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一方面强调时间概念的功能性特征，他认为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进程的协调和同步化上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程的发展和改善，正如不断增强的社会的复杂性和

---

〔20〕 历史的终极既可以是在一个全新时代（例如神的国度；或较为缓和的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时代）来临前的实现的“时间的时代”，也可以是在历史的时代自身中实现的。参照本书第七章“2”。

〔21〕 请参照 Zerubavel，1981 年，第 112 页；Adam，1990 年，第 133 页及其后页。“临时性的”时间意识在高度现代化的文化中也会在毒品的作用下或极端的特殊情境下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伴的是感觉到静止状态或时间流动的停滞。因而，2001 年 9 月 11 日世贸中心双子塔受到恐怖袭击事件中的一位幸存者在讲述飞机直接飞向大楼、建筑开始晃动时他的经历时，说道：“大楼可能没有晃动很长时间，可能就是 15 秒或 20 秒，但是这个时间却像是永远”；而在讲到他在 70 楼从（一直很拥堵的）楼梯间向下逃生时对时间的感知时，他说：“我说不清我们在那里待了多久。时间消失了。没有时间存在。只有向下。只有数（台阶的——本书作者注）数，然后等待，然后数数，不断地转来转去。”（Charles，2002 年，第 31 页及其后页）

〔22〕 涂尔干（Durkheim）早在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Elementare Formen des religiösen Lebens*）（1981 年，第 27 页及其后页）一书的导论中的第二部分就阐述了这个理论，同样的阐述见 Sorokin 和 Merton，1937 年；Gurvitch，1963 年；Bergmann，1983 年，第 471 页及其后页；Elias，1988 年；以及当代的诸如 Giddens，1987 年 a；Luhmann，1980 年，第 260 页及其后页；Nassehi，1993 年，第 249 页及其后页。对于不同的时间意识的实证性的例子请见 Evas-Pritchard，1969 年，第 94 页及其后页；Dux，1989 年；Bourdieu，1977 年。

* 诺伯特·伊里亚斯（1897—199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文明的进程》《社会变迁》《论时间》《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译者注

相互依赖链条的不断加长,都使得详细的时间计划、规制和秩序成为必需;但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所产生的个体的时间意识成为社会的习性,并且与此同时也是人格结构无法摆脱的组成部分——"第二特性",因此,"生活在有严格的时间规划里的人们对时间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就是其人格结构的例证,而人格结构与其说是生物方面的特性,不
28 如说是从社会中获得的。"[23]

有意思的是,伊里亚斯将系统的结构和个体心理结构的交叉本身就已经看做是对现代社会(高)速度的生活的解释了。

> 一方面是相互之间的关系网络的规模及其内部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个体的精神状态,都尤其清晰地体现了我们所谓我们的时间的"速度"的概念。"速度"事实上正是相互关系的链条的数量,而关系链条起到对任何一种社会功能的连接作用……速度是行为内容的体现,后者与关系链条的长度和厚度互为关联,关系链条将单独的行为联合起来……并且决定着竞争和选拔比赛的强度,而正是竞争使得整个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保持在运动状态……为了使连接点发挥作用,就需要在大量的行为链条当中非常仔细地分配生命时间;生命时间已经习惯于将短时间的兴趣爱好服从于保持广泛的相互依赖的必要性;生命时间的联系消除了行为态度上的波动,并且达到持久的自我强制。[24]

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讨论伊里亚斯所提出的社会结构与生活节奏之间相互关联的假设。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的时间结构是通过什么方式化成为规范性的特征,并与此同时在行为者背后发展起来的,这样的构造过程又是如何使得一方面的高度的社会规范性和另一方面的低度的道德自主法规——也就是个体的道德自我决定的最大化程

---

〔23〕 Elias, 1988 年,第 122 页;并参考 Nowotny, 1993 年,第 9 页:"就像用于证明某种特定物质的存在和它在身体里流动的路径的测试试剂……社会的时间也流淌在有显著的个性特征和由个体设置的生活中。因为时间有深深的集合性特征,它也是人类合作和对意义的认知的象征产物,因此当人们之间发生联系时,时间会对个体的感知产生重要的影响。"类似的,涂尔干(Durkheim, 1981 年,第 27 页及其后页)在社会构造的、依赖于社会结构的时间概念中也看到本质,时间概念对于个体来说是不可丢弃的理解范畴或者必要的想法,它与其说形成了意识中的认知内容或是康德所说的世界观的先验的形式,不如说是形成了性格的结构,尽管性格也是在社会历史中发生变化的。

〔24〕 Elias, 1976 年,第二卷,第 337 页及其后页。引用文字中强调部分由作者添加。

度——之间做到兼容的。[25] 伊里亚斯与福柯*的研究因此都指出了,现 29
代性的"纪律社会"将它的惩戒性力量和支配力量非常强有力地作用于时间结构的形成和内化,因而事实上,它展现了纪律化过程的关键情境,大量详细的研究都证明了,诸如监狱、学校、军营、医院和工厂等地方都尤其体现了纪律社会的严格的时间的规制。[26]

出于社会结构的需要和个体的支配要求而出现的系统的时间理解和模式,与个体的时间理解和模式之间的相互适应及调和的过程,不仅局限于特殊的机构化的环境中,而且也在所有的生活和社会领域不断出现。彼特·阿尔海特(Peter Ahlheit)**和安东尼·吉登斯都从行为者的角度将时间的协调过程分为三个层面。[27] 根据这三个层面,行为者通常也同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时间视角和时间范围,他们需要不断重新思考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安排他们的时间实践。首先,行为者面对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这主要是不断重复的工作和休闲时间之间的例程和节奏,比如什么时候起床和睡觉等,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不同行为的同步进行、速度、持续时间和前后顺序等问题。(我怎么样才能既完成办公室的工作,又能按时去幼儿园接我的女儿?我是应该先去游泳,还是先去购物?)在这个层面中,时间在多大程度上会出现问题,有赖于程序化和习惯化的程度,而这个程度在晚期现代化中出现了下降的 30
趋势。不过,直到今天,日常时间仍然是具有高度的重复性或循环性特

---

〔25〕 请参照 Foucault, 1977 年。Tabboni(2001 年,第 18 页)因此将时间性的规范作为"出类拔萃的"集体规范;而 Lauer(1981 年,第 72 页及其后页)猜测,没有表述出来的时间规范的作用难以衡量,它们导致不适应这些规范的个体形成心理上和创伤性的障碍,甚至是完全失去时空方向。

*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历史学、科学史和知识社会学等领域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主要著作有《古典时期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等。——译者注

〔26〕 监狱是通过剥夺时间来对其自身进行定义的机构;关押在那里的人反复问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还有多长时间?"(Brown, 1998 年)有关医院的严格的时间管理可以参考 Zerubavel(1979 年)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大量有关学校的研究证明,时间纪律在学校所有关心的事物中尤其重要:孩子从很早开始就通过被要求按时起床、准时出席、安静地坐在课堂被管理,并且将自己的需要放置在事先安排好的学校之下,还要承受考试所带来的时间压力。在本书的第八章"1"将讨论工业革命中的时间纪律化。

** 彼特·阿尔海特(1946—),德国教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日常生活》《文化与社会》《市民文化》等。——译者注

〔27〕 参照 Ahlheit, 1988 年; Giddens, 1987 年 a,第 144 页及其后页。

征的,并且如同吉登斯所强调的,日常时间是社会结构再造的组成部分。[28]

在第二个层面,行为者通常发展出将其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时间视角,通过这个时间视角他们思考自己的"生命时间"。关于"我打算如何度过我的时间"这个问题就不仅要考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要将我们的一生作为整体来考虑,因此,吉登斯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想到了用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存在"(Dasein)的概念。在这里也同样存在着事件之间的同步化、持续时间和前后顺序等问题。(我打算/可以上多少年大学?在大学学业结束前,我想/能生个孩子吗?我真的愿意一辈子做法学家吗?我什么时候退休?)

在第三个层面,行为者最终体会到他们的日常时间和什么时间都是镶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代际和年代统领的时间中的[吉登斯根据布罗代尔*的措辞提出了持续长久(Longue duree)]。"我们的时间"因此通常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时代的时间,确切地说,就是年长的人在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另一番模样",或者"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那些传统不再适用了",或者是"歌德(Goethe)和他的时代"时所谈到的。

这三个时间层面和与之相联系的时间地平线,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中首先决定了每个行为者的"存在于时间中"[29],而且他们必须不断地与
31 新的变化相协调。例如,一位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的安排往往是,到了中午才起床,然后去咖啡馆,最后再去革命性的大学生俱乐部;而或迟或早他都会想到这些问题:已有成就的大学教授的生活安排是什么样的,是

---

〔28〕 吉登斯根据 Bergson 和 Schütz 的研究,将时间表示为"期限",并将它理解为可逆的时间。亚当争论说,不是时间自身是可重复的,而是行为;(事件的)可重复性和(时间的)可逆性是不能混为一谈的(Adam, 1990 年,第 24 页及其后页)。

*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法国经济社会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论丛》等。——译者注

〔29〕 当我在这里再次谈到行为者"存在于时间中",绝对不是将时间假设为与主体无关的、似乎是本体论的时间。正如在此之前已经指明的,这项研究传递的是这个观点:时间在历史中和文化中是高度可变的,并且时间的由自身质量所决定的可体验性首先是在社会的环境中形成的。因此,正如我尝试着指明的,时间对于行动中的主体而言就是坚实的实际情况和自然事实。因此,从(个体的和集体的)行为者的视角来看,人类一直是被"安置在时间中"的。

否打算在退休后到舒适的托斯卡纳(Toskana)*安度晚年;是不是在"我们的时代"里,如果不想被中长期地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的话,就得支持这种经济生活中的日常生活方式。正如这些问题所提出来的,人们的人生规划究竟是否是合乎时势的,以及长期的人生计划是否是合乎时代地进行规划的。

概括而言,这意味着所有的时间资源的分配通常是要将这三个层面都加以权衡的:每个人将多少时间用于工作、家庭、休闲活动和养生,取决于他的日常安排、他的生活期望和他对"时势潮流"(也就是时代的和未来的要求)的估计。这些层面上一直存在的差异迫使人们采取适合的战略:要么是改变日常的生活实践,要么是重新定义长时期的人生目标。(战略性地改变某个时代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远景的可能,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被行动者想到)所有这三个层面首先都有它们自己的时间模式(节奏、顺序、速度、同步化的要求)和对时间的看法(也就是它们各自的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或范围,以及这些对于相应的行为的重要影响)[30];其次它们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结构。我们的行为和实践的节奏、速度、期限和顺序其实并不是由作为个体行为者 32
的我们所决定的,而是几乎完全由社会中的集体性的时间模式和同步化要求所预先确定的(例如开放时间、交通时刻表、运行时间表、机构的程序和规定时间安排的合同、有效期等)。[31]

现代社会的时间模式特别适合用来解释由社会结构所构造的时间实践。在文化批判的学术文章中总是被批评,而在时间管理手册中一直被作为成就加以庆祝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社会中的个体严格地计划他

---

* 托斯卡纳是意大利一个大区,拉齐奥位于其南,翁布里亚位于其东,艾米利亚-罗马涅和利古里亚在其北,西濒第勒尼安海。它经常被评价为意大利的最美丽的部分。其首府为佛罗伦萨。托斯卡纳以其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艺术遗产而著称。——译者注

〔30〕 Robert Lauer 建议在分析社会现象的时间结构时可以区分五个变量(1981 年,第 28 页及其后页):1. 事件的周期,也就是事件的节奏;2. 过程和变化的速度;3. 事件或行为的同步化(内部的和"外部的",也就是与其他事件或行为相关时);4. 事件、行为或状态的持续时间;5. 事件、行为或状态的次序。在分析时要考虑到从行为者的角度看到的时间的取向或者说对时间的看法,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性和定义。不同的定义和权重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力:两个行为者或群体可能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面向未来而作出的,但是一方所认为的未来是即将来临的最近几天,而另一方所指的未来是计算机技术高度全面发展的时代,因此,两者对于时间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异。我认为 Lauer 的这种分类非常有启迪作用,因此我将在下文中不时地对此表示支持。类似的区分可以在以下作品中看到:Adam, 1990 年,第 106 页;Zerubavel, 1981 年,第 1 页及其后页;Gurvitch, 1963 年,第 174 页及其后页。

〔31〕 具体内容请参照 Garhammer, 1999 年,第 28 页及其后页。

们的时间、安排顺序,也就是说,各项事件持续的时间和行为的结构都被抽象地确定下来,行为本身要依照外部的时间计划。因此,这样的时间实践已经不是个体决定或人生计划的后果了,而是几乎完全被迫服从于起到分化功能的结构性原则的结果,根据这样的结构性原则,每个社会领域服从它自身的时间逻辑,并且将工作、家庭、联合会、教堂、政党、政府等各个领域的个体部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正如齐美尔*和帕森斯曾经指出的、所罗巴伯(Zerubavel)详细分析的[32],个体为了不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在小时计划、日计划、周计划、月计划和年计划的帮助下,被迫在每个社会领域精确地按序确定他们的行为,并且与每个领域特有的模
33 式保持同步。经常被提到的在现代社会超越了"事件时间"的抽象时间,即一个事件,诸如讨论会、研讨课或工作日,并不是以有待完成的任务被完成后作为结束的,而是结束于在经过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之后,因此抽象时间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文化上的特别现象,而是社会结构的必要之处。因此,抽象时间在当今社会看上去似乎有利于"时间的(再度)时间化"的撤回,对于此我们需要进行细致的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分析——如同我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所做的那样。

那些具体的时间模式的集合性特征因此特别产生了同步化的需要。我们比较我们的行为,不断地要使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合作伙伴相应的行为和时间模式保持协调,或者至少保证暂时性的同步,因此在功能分化的社会中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的或较短或较长的等待时间,而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则是导致时间压力的出现。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我们的人生远景。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清晰地展示了,无论是对人生计划的设想,还是在人生规划将人生分成受教育阶段、工作阶段和退休阶段的理想的三部分,或是(在原生家庭的)儿童期、(与自己的核心家庭的)成年期和(在孩子搬走后的)老年期,实际上都是社会文化结构,而这种三分法从来就无法做到普遍通用,而且在当今的社会显现出受到侵蚀的倾向。是否、如何和在多大范围内对未来进行规划,在很大程度

---

* 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形式社会学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个人与社会》等。

〔32〕"在众多不同的行为中每项行为都分配有相应的时间……这样才能不相互干扰。事实上,一个像我们所在的社会这样复杂的社会,如果没有相对严格的时间安排就无法运转了",帕森斯这样写道(Parsons, 1951 年,第 302 页)。参照 Zerubavel, 1981 年,特别是第 31 页及其后页。

上依赖于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稳定和可预测性。第三个时间层面,即历史性的时间或"时代",最终几乎完全夺走了个体的塑造未来的可能性,个体的行动者在这里只剩下了对那些"需要他的时间的要求"作出同意或者反对的答复这样的机会了。因此,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存在于此时此刻"的类型和方式的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远景)的意义和我们的行为的时间模式,一直是结构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复杂的产物,只是二次折射在每个行动主体的期望中。 34

三个时间层面在行为者的期望中的结合往往会产生叙述性的模式。这是文化的和个体的记录,在其中日常时间、生平时间和历史性的时间相互联系起来,并且互相批判,最终实现合法化。在这样的记叙式的设计中,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权重和意义也同时被确定下来了,并且因此关于传统和变革的重要性和价值也得以确定。每个当下看上去都是建立在一个过去当中的,并且与未来有关。通过确定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生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这种记叙性的关系,变化和不变的文化形式和机构形式也合法化,而且也有可能在动态性力量和稳定性力量的平衡或在行动和坚守之间的平衡中出现历史性的自然而然的变化时而遭到批判。

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哲学家在不久前所强调的,在个体的生活故事中所发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了一起,往往是以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框架故事"或一个被传诵的"世界故事"为背景的。[33] 有关每个个体的存在的有限性的认识,导致有限的生命时间和前景无限的世界时间[34]之间的矛盾成了书面记录的和生命实践的问题。在所有成熟的文化中,用来化解这个矛盾的办法几乎都是通过引入第四个时间层面,即通过所谓神圣时

---

* 查尔斯·泰勒(1931—),加拿大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自我的根源》《世俗年代》等。——译者注

** 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1929—)苏格兰哲学家,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哲学史和神学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著作有《论无意识》《世俗化与道德变迁》《依赖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何需要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学》和《生活的伦理学》等。——译者注

〔33〕 参照 MacIntyre, 1987 年,第 279 页;Taylor, 1994 年,第 615 页;详细的阐释请见 Rosa, 1998 年,第 166 页及其后页。当一位来自前民主德国(DDR)的较为年长的受访者在双重政权更迭的背景下讲述他们的生活的故事时,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人生故事和"历史"交织在一起。同时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 1989 年的剧变之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接是以与此前不同的方式发生的,而且必须发生。

〔34〕 请参照 Blumenberg, 1986 年;Gronemeyer, 1996 年;也可以参看本书的第八章"2"。

间这个概念来解决的。[35] 这个所谓的"圣洁的时间"凌驾于生活的和历
35 史的线性时间之上,建构着线性时间的起点和终点,并且将生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都提升到一个共同的、更高等的、仿佛是"永恒的时间"中去。

例如,在基督教文化中,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就是这样相互靠近的,两者共同向着(如同想象中即将来临的)上帝所判定的世界尽头前进。神圣的时间因而与线性的、数量化的、属于这个世界和非星期日的平日("工作日")的世俗的时间不一样,神圣时间是永恒的循环、是质量化的,具有另一个或更高级的世界的特性。[36] 神圣时间将日常生活之外的"节点"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将特殊的时间、仪式和庆典(例如基督教文化圈里的礼拜日、圣诞节、复活节)与世俗的时间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方式,神圣时间同样将普通的日子明显地分成若干个"暂停",也因此对日常日子的按序的流程进行结构化。[37]

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通过神圣时间与文化导向及行为导向的意义完整性联系在了一起,在文化模式和结构化的必要性中,系统化的要求和行为者的期望达成了相互间的一致。这种时间上的协调一致并不一直都会得到保障,而是必须从政治的和社会的争论中才能产生。因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社会的时间层面的建立和相互协调是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问题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谁来确定事件和行为的节奏、持续时间、速度、顺序和同步化的问题,构成了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的核心领域。年代政策因此是各种统治形式中的中心组成部分,尤其是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在这方面孜孜不倦地作出假设和阐释,他指出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加快的控制一直都占据着
36 统治地位。[38]

---

[35] 在社会学领域,尤其是涂尔干和他的继承者,如 Hubert 和 Mauss 等人致力于神圣时间的意义和在社会建构中的角色的研究(Watts Miller, 2000 年)。进一步也可以阅读 Achtner/Kunz/Walter, 1989 年;以及 Zerubavel, 1981 年。

[36] Zerubavel, 1981 年,第 101 页及其后页;Eliade, 1991 年。

[37] 所罗巴伯赞同涂尔干和伊里亚斯的观点,他将犹太教的安息日作为"文化上的支撑",或是世俗时间连续流淌的静止状态(Zerubavel, 1981 年,第 112 页及其后页)。对此,他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例如通过不同类型的服装、不同的流程、禁止的行为、规定的行为、大大延长吃饭的时间等方式),一段时间中或某个制度下的节日能够显著地实现"减速",有目的地使工作日的急促的速度降下来。

* 保罗·维希留(1932—),法国哲学家、城市理论家、文化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与电影》《消失的向度》《消失的审美学》等。——译者注

[38] Virilio, 1980 年;参照 Wallis, 1970 年;以及 Rifkin, 1987 年,Rifkin 将争夺时间的战争看做人类历史的最基本的冲突。

在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的背景下，诸如被迫等待、滞后、提前、延迟、变换节奏、改变期限等，都出现在社会性争议的中心之中；[39] 与此同时出现在时间层面中间层的“争夺生命时间的战斗”，也就是说围绕着受教育的时间和退休时间、对休假和休息日的要求、周末工作和夜间工作、在生病和失业情况下的期限规定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常比对工资的要求会更强烈地决定着经济上的，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争论。[40] 这种争论的形式也会自然而然地蔓延到第三个层面——有着文化和政治的决定意义的时代时间，正如能够很容易地从有关礼拜日和节日的争论中可以看到的，在教会与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历史性的权力斗争，同样权力斗争也因此出现在神圣时间和世俗时间之间。

因而，当出现政治巨变后，总会出现有关确定历法的斗争[在确立格里高利历（*Gregorianisch Kalender*）*的历史中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就不是偶然了，很多新的掌权者会通过努力引入新的历法，从而使自己的位置稳固下来，例如1793年开始的革命历（*Revolutionär Kalender*）或者斯大林（Stalin）在历法改革方面的努力。[41] 这两项变革尝试最后都失败了，这也再一次深刻地指明了，广泛流传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远景同时也是行动者的“第二天性”，因此被修改的历法对行动者来说是“反自然的”，尽管这些历法——至少就革命历法而言——尽力做到紧紧地贴近自然。[42] 时间模式被高度的内在化也导致行为者的时间意向往往只有在长时间的并且是剧烈的变革过程中才可能适应新的结构性条件，正如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阐明的，在早 37
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人的时间意向被“重新部署”。[43]

当时间模式和时间期望因此成为居中协调结构与文化、系统视角和行为者视角，以及系统化必要性和规范化期望的实实在在的地方时，同时也意味着，它们也开启了针对某个时代的文化和结构的整体形式进行社会科学的分析的拥有特权的入口。打算从系统化的必要性和文化的导向中研究社会文化布局的人，即尝试从我们所称之为“现代性”的动

---

〔39〕 布迪厄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时间策略的宝库（Bourdieu，1977年，第7页）。

〔40〕 参照Zoll，1988年b，或者Rinderspacher，2000年。

* 即现在世界通用的阳历或西历。——译者注

〔41〕 具体内容请见Zerubavel，1981年和1985年。

〔42〕 Zerubavel，1981年，第70页及其后页；1985年，第130页及其后页。

** 爱德华·汤普森（1924—1993），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民众的习惯》等。——译者注

〔43〕 参照Thompson，1967年；详细内容请参照本书第八章“1”。

态性和稳定性、内在的张力和发展趋势中,发现那些结构复杂体和意义复杂体的特性的人,只要将他的工作从时间结构的特性、逻辑和发展入手就可以了,因为就像通过放大镜一样在这当中能够认识到决定这些布局的原则和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项研究是以这样的观念为基础的,即恰当的社会科学的时间诊断应该确实就是字面意义的时间诊断。在这样的诊断原则中明显存在的问题是,不再能发现共同的焦点,并且因此看上去武断地选出单个的结构体现或文化表现,使它们成为整体社会分析的落脚点,这样做会导致不断增多地、混乱地将现代社会同时鉴定为工作社会、休闲社会、体验社会、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多选择社会,以及形形色色的后—社会(例如后习俗社会、后工业社会、后历史社会、后现代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传统社会等)[44],因此同时进行的"双重"时间诊断是脱离这样的困境的有效途径。而本书的目的和任务
38 就是验证这个假设。

2. 两个当代的时间诊断

人们总会感觉到,自己所在的时代仿佛是"四分五裂的",因而当观察者用批判的目光看待他所处的时代时,几乎无可避免地会认定他的时代具有"危机时代"的症状,这种感觉一点都不新鲜,而它几乎是在文化历史中所有对确定位置或确定时代的努力的组成部分。作为在现代社会的地平线上的新的体验,正如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在他的大量作品中所详细描述的,这种"时间自身就是四分五裂"的感觉[45],实际上是一种明确的信念,即持续的危机时代正是时间危机的结构。[46]

---

〔44〕 Beniger(1986年,第4页及其后页)至少列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对当下社会进行判断的22条建议。关于有现实意义的时间诊断的研究概览请参见Schimank和Volkmann出版的合集(2000年)。

* 莱因哈特·科泽勒克(1923—2006),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有《批判和危机》《未来的过去》等。——译者注

〔45〕 "时间已经脱离了相互之间的关联",哈姆雷特(Hamlet)早就这样抱怨(Shakespeare,1991年,第一部分,第五幕,第188行),高度敏锐的作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已经根据时间结构正开始发生着变化预料到了后代们对时间的不同体验(请参照Harvey,1990年,第247页)。

〔46〕 参见诸如Koselleck,1989年,第321页和336页及其后页;进一步的也包括Koselleck,2000年,和Achtner/Kunz/Walter,1998年,第5页。

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的观察者在对时间的变化类型的诊断上达成了一致，尽管对它的评价并不完全相同：自从大约 1750 年开始[被《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的编辑们定义为"马鞍时期"的时代[47]]，即在工业化革命开始之前，类似的法国大革命也没有开始之际，有大量的关于感觉到时间和历史的急剧加速的报道迅速增多。[48] 这样的感觉在火车被引入后变得尤其强烈，并且伴随着工业革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也出现了"体验饱和"的感觉。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如同我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要指出的，波浪式地出现了总是新颖的(生活的、世界的、历史的，或者就是时间本身的)速度加快的症状，因此彼得·康纳德(Peter Conrad)*在 1999 年所出版的有关文化历史的长篇巨著《现代性时间，现代性地方》(*Modern Times, Modern Places*)提纲挈领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就是时间的 39
加速。"[49]

有关加速的体验毫无疑问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它的足迹几乎留在了所有的大众的和科学的时间诊断中。事实上，随着 1989 年的政治革命和大约与之同时的发生在通讯科技领域的"数字化革命"，面对因为这两个革命而得以可能和加强的全球性相互联网的进程，出现了更新的有关加速的讨论；贡多尔夫·费赖尔穆特(Gundolf S. Freyermuth)**代表着一大批散文作家、专栏作家、政治家和经济专家，清醒地意识到有关加速的诊断是历史性的事业，他在 2000 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处在加速推力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工业化可能是在它之后出现的。"[50] 诸如斯蒂芬·布罗伊尔

---

[47]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1972 页及其后页。

[48] 相关证据请参考本书第二章"1"。

* 彼得·康纳德(1948—)，英语文学专家。主要著作有《现代时间，现代地方》《爱与死亡之歌：歌剧的含义》《创造：艺术、上帝和起源》等。——译者注

[49] Conrad, 1999 年，第 9 页；Thomas H. Eriksen 也一针见血地提出"现代化就是速度"(2001 年，第 159 页，楷体强调出自原文)。

** 贡多尔夫·费赖尔穆特(1955—)，德国和美国著名的媒体、公关专家和作家。主要著作有《出路》《终局比赛》《赛博世界》等。——译者注

[50] Freyermuth, 2000 年，第 75 页。美国人詹姆斯·克莱克(James Gleick)在他的畅销书《更快：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在加速》(*Faster: The Acceleration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中用同样的角度观察了我们从工作到休闲、直到爱情的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加速现象；与之相应的是，德国联邦政府将加速列在未来社会重要趋势中的首位[参照 Joschka Fischer 和 Gerhard Schröder 共同签署的声明《构建变化》(*Den Wandel Gestalten*)，发表在《明镜周刊》(*Spiegel*)，2000 年 1 月 17 日，第 47—49 页]。

(Stefan Breuer)*("毫无疑问,速度是今天的女神")[51]这样的哲学家和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时间在今天是速度的功能,并且显然可以察觉到的只是它的速率或速度")[52]等社会学家,都从学院派的瞭望塔证明了这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感知。

"一切都越来越快"在现代化各个阶段都被作为基本体验,即一切都在不断地流动中,因此未来是开放的、未知的、不再能从过去和现在推导出来,而有意思的是,这个特点只是确定了当今所盛行的批判式时间诊断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截然不同的社会性的自我观察,与第一个方面相互矛盾地相伴左右;这个侧面尽管都已经由科耶夫***和韦
40 伯****所指出,并且仿佛从一开始就共同表现为是现代性的"潜台词",但是直到现代化的成熟阶段,尤其是在20世纪末期左右,才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与已有的大量的时间诊断的体验真实相遇。在这里所谈到的是所处的时代在文化上和结构上的构造"结晶"的体验,对它们的感觉像是没有变化的"钢铁般坚固的房子",在那其中任何重要的事物不再发生变化,也不再有任何新的事物产生。用这样的视角看待当下社会,现在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正是所有的运动走向终结:它耗尽了梦想的能量,因为精神的和理想的可能性看上去都已经用尽了,因此不再有任何重大事件发生的无聊正不断扩散。这条理论最重大的发现在于对后历史的论述,并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中也得到了阐述;[53]但是,这条理论所表现的是并非随之而来就可以将我们的时代确定为"后

---

* 斯蒂芬·布罗伊尔(194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美学原教旨主义》《解剖习俗的革命》《消失的社会》等。——译者注

〔51〕 Breuer, 1988年,第309页。

**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1934—),美国著名左翼批评家。擅长以马克思理论作文化评论,研究资本主义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主要作品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间的种子》《文化转向》《全球化的文化》等。

〔52〕 Jameson, 1998年,第50页。

*** 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俄国出生,法国哲学家,后现代思想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法权现象学纲要》《权威的概念》等。——译者注

****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一般经济史》和《国家社会学》等。——译者注

*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强国论》《信任:社会德行与繁荣的创造》《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译者注

〔53〕 参照Fukuyama, 1992年,或Gehlen, 1994年。

时代”和“终极时代”,或是处于理智、主体、价值、教育、叙述、政治、历史等的终结的“后”时期。对时代的变迁的第二个诊断只是在与前一个表现为不对称的或者说“二等分的”突破性的定义相比时,才可以说是历史中立的:第二个诊断是对于没有与“文化的新开端”愿景相一致的时代转折的观察,这个时代的转折同时也不具备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新的充满意义的联合[54]。

这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时间诊断——社会加速的和社会停滞的时间症状,其实只是草草看上去是相反的。“快速的静止”这个极具表现力的比喻来自对保罗·维希留所提出的“极端惰性(L'inertie Polaire)”的富有想象力的翻译[55],它显而易见地与后历史诊断结合在了一起,在后历史的诊断中,大型事件历史的草坪上只能寒酸地遮掩理想动态的和“深度结构的”发展的停滞。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试图阐明,这些批判性的时间体验之间的互补不只是学院式——不谙世事的构 41
造,而是在社会的文化的自我表达中也能够发现它们显著的矛盾。

在现代化被改写为相互矛盾的时间的基本结构,以及在晚期现代化更加似是而非的时间结构里,即加速的体验总是不断转向它的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不仅出现在历史时代这个层面,也同样可以在生命时间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看到。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同时出现,与这个矛盾的“双重症状”相同的是,在现代化的历史中,可以发现不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抱怨,有关于生活节奏提高的、关于生活变得越来越匆忙、关于导致各种病状出现的特性——尤其是归咎于过度刺激和过度要求;[56]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与这些抱怨相伴的也是“潜台词”与之相反的抱怨——对于现代生活没有大事件发生的无聊的抱怨,“厌倦”正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而在这个令人倦怠的时代里,工业革命将“人类经验

〔54〕 参照 Rosa, 1999 年 c 和 1999 年 d,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55〕 参照 Virilio, 1998 年 a。

〔56〕 在 20 世纪刚刚开始时,Joachim Radkau 对神经紧张的时代进行了精彩的研究(1998 年),他发现,不断增多的“神经紧张”症状是过度刺激的生活节奏所造成的结果(Simmel, 1903 年,也有相关的有意思的研究),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在美国就发现了非常类似的“急忙病”,其病因应该是类似的(Levine, 1999 年,第 152 页及其后页;参考有关“雅痞流行性感冒”是病态性紧张的反映的内容,Harvey, 1990 年,第 287 页)。

的各个领域的速度"都翻了番——彼得·康纳德这样评论。[57] 因此,与之相伴地出现了生命越来越快地"飞逝"的感觉,尽管在西方社会中的平均寿命是不断增加的。对静止的时间的体验变成了病态的临床抑郁
42 症,为数不少的心理学家因此猜测,这是对无法满足的加速的苛求的反应。根据大量的调查,抑郁疾病患者在当今社会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58]

社会境况、机构和相互联系的加速变化,即社会变革的加速,为个体带来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必须为生活做长期的规划,以便获得一些经得起时间变迁的稳定性,但是由于社会状况的偶然性的增强,就无法理性地进行规划。正如在这本书的很多地方将会指明的那样,这个在晚期现代化时代恶化了的困难不仅是个体行为者所要面对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和子系统的控制以及偶然性管理的问题——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基本问题。

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视角中最终所展现出来的是,正如每个人从自己的经验中所获知的,由于几乎在所有的生活实践活动中,我们都可以通过采用越来越精细的时髦的技术和组织者的计划,越来越多地省下来时间,但是时间的紧缺的特性却没有办法去改变,因此时间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我们省下越多的时间,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就越少",在米歇尔·恩德(Michael Ende)*的《毛毛》(*Momo*)中说明了这条广为流传的民间智慧。[59] 尽管数量巨大的"业余时间"应该意味着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源,也就是说不必占用它去从事必须是生产性或再生产性的活动,但是从斯戴芬·林德极富影响力的研究《忙碌的休闲阶层》(*The*

---

〔57〕 Conrad, 1999 年,第 16 页及其后页;进一步参照 Lepenies, 1981 年。在 Douglas Coupland 的小说《X 一代》(*Generation X*)——其副标题非常出色:"关于加速文化的轶事"中,这种被在文中清晰地称之为"在历史的终点之后"(德语版本,第 212 页)的没有大事件的无聊也是主人公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在"时间线"(Texlahoma)这个发生了书中的大部分故事的地方,时间永远"冻结"在 1974 年。

〔58〕 参照本书第四章"3"。

* 米歇尔·恩德(1929—1995),德国当代重要的奇幻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家。主要作品有《镜中镜子》《说不完的故事》《吉姆波坦的火车头大冒险》和《毛毛》等。——译者注

〔59〕 Ende, 1973 年;在《寻找所赢得的时间》(*Auf der Suche nach der gewonnenen Zeit*)这一图书的题目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个伴谬(Auer/Geißler/Schauer, 1990 年)。不断增强的"疯狂的"时间的感受与瘫痪的静止状态的日常体验之间的联系有多密切,可能能够从 Michel Quoist 下面这段话中有清楚的认识——Staffan B. Linder(1970 年,参照下面两条注释)用这段话开启了他的作品:"再见,先生,请原谅,我没有时间/我将会回来,我不能等待,我没有时间/我必须结束这封信了——我没有时间/我愿意去帮助你,但是我没有时间/我不能接受我没有时间/我不能思考,我不能阅读,我被淹没了,我没有时间/我想祷告,但我没有时间。"

Harried Leisure Class)开始,社会科学家就诊断出当代社会患有急性"时间—饥荒",并且出现在所有的三个时间层面上。[60] "现在,美国社会是 43
饥饿的,不是像索马里(Somali)或其他土著文化的那种饥馑,那里的人匮乏的是食物,但是后现代社会最终缺乏的是时间",时间预算研究者约翰·罗宾逊(John P. Robinson)*和杰弗里·戈德(Geoffrey Godbey)这样写道;他们接着说:"时间饥饿带来的后果并不是死亡,但是,正如古雅典先哲所看到的,是生活从来就没有开始过。"[61]

要评判加速本身究竟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时间的变化,自然还是依赖于加速所产生的后果。由于人的生命时间从根本上来说是有期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的流程(例如,产品的生产、形式的形成、运输路程的跨越、信息的传递)的加快,基本上被认为是得偿所愿的。但是,明显的危险存在于过程、系统和前景中潜在的不同步而带来的单方面的加速。在社会的某个领域的加速,只有当它所带来的相应的速度提高在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接处能够没有摩擦耗损地"转换"过去,才可能是社会可以忍受的。[62]

在数量不断增多的时间诊断中,或是含蓄或是直率地提出了这个理论:正是因为在社会的许多领域的这种"转换"和"再同步化"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当人们尝试着系统分析这种不同步症状时,就会看到 44
它可以分解为三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如同已经明确了的,第一种不同步的症状自然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即一边是系统—制度化或者结构化所强制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另一边是行为者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两者各自发展,因而由于迁徙式的或者快速的系统变迁,所带来的结果是瓦解,并且因此导致这两个时间结构的不同步。正如乔治·齐美尔已经明智地观察到的,制度的和结构的所强制的速度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太快了,或者相反,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感觉

---

〔60〕 林德(Linder, 1970年)假设了一条"公理",根据这条公理,由于要合理地安排时间,因此必须将时间富裕和物品富裕之间的比例关系完全调换过来,因此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将时间富裕社会变成了时间紧张社会(参照英语版本,第22页)。

* 约翰·罗宾逊(1965—),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译者注

〔61〕 Robinson/Godbey, 1999年,第33页。

〔62〕 有加速所催生的转换问题,或者说是同步化问题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从一方面来说,通常几乎每个平民老百姓,例如作为(在火车站、咖啡馆、医院、电信局的)顾客或客户,都希望尽可能快地得到服务;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当他们作为工作者(也就是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或生产者)时,又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较小的压力。这样的想法,即一切都要尽可能快地进展,这样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从集合层面来看,自然不可避免地是矛盾的。

仿佛是停滞和迟钝的。[63] 结构性的发展与文化的变迁一样,出于(内源性的)原因,也会形成这样的时间的分裂。[64] 再同步化过程可能向有利于一方或另一方发展:或者像爱德华·汤普森所描写的进程那样,行为者接受并内化新的时间方向;或者是出现系统变迁,这种情况,例如在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接受系统变迁,并用更迅速的和灵活的布局代替了以前的缺乏弹性的结构(也可能是相反的情况)。

与这样的时间诊断相应的模式目前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所赞同,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系统化的流程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来说太快了。[65]
45 与之相反的指责,即行为者过于懒散、舒适和不灵活,换言之也就是他们对于"时间的要求"来说太慢了,也并不少见地出自于当雇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解释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缺陷或系统的错误的配置(例如,失业状况)时。

相反,彼特·阿尔海特所假设提出的不同步的第二种形式,会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行动者所主导的三个时间地平线之间出现不断增大的不一致性(也就是说,日常时间、生平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层面的分裂),而它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的原因在于,个体对"他的"(在所有三个层面的)时间感觉是"疏离的"。这会导致将自己的生活记叙式地嵌入可供推荐的过去和富有意义的未来的能力的丧失,并且也因此失去了获得至少是中期不受时间变化影响的行为方向的能力。[66] 正如通过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思考变得清晰的,这个与行为者有关

---

〔63〕 Simmel, 1897 年,第 228 页;Lauer, 1981 年,第 70 页及其后页。

〔64〕 Gurvitch 清晰地认识了这种各自发展,他将社会的时间形式分为"时间落在它自己后面""时间轮流超前或落后于自身"或"时间超在自己前面"几种形式(Gurvitch, 1963 年,第 176 页及其后页),但是他没有对它们的结构化基础进行充分的解释。在社会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观点中,"时间形式"里所出现的所谓的清晰的分裂,往往会导致革命性的巨变,而后变革所带来的"爆炸性时代"(同上书,第 178 页)使得时间结构的再次协调成为可能。

〔65〕 Richard Sennett(1988 年)尤其支持这个理论;类似的还有 Fritz Reheis(1998 年),以及在 Backhaus 和 Bonus(1998)所编辑的书中的诸多作者。Robinson 和 Godbey 也猜想了在"内部的",即涉及行动者的,和"外部的",即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的,两者的时间观念之间的分裂(1999 年,第 304 页)。

〔66〕 Ahlheit, 1998 年;参照 Sennett, 1998 年;以及 Achtner/Kunz/Walter, 1998 年;Lübbe, 1998 年;Rosa, 1999 年 c。

* 理查德·桑内特(1943—),美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公共人的衰落》《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译者注

的不同步的形式，是第一种类型的不同步过程的结果。[67]

而第三种类型的不同步出现在社会的子系统或功能系统之间。从社会学到政治小品文到日常政策，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时间诊断，例如由经济、科学和技术所引发的发展，其速度对于社会变化中的政治控制和法律规范来说过快了。经济、科学和技术站在一边，法律和政治站在另一边，它们相互之间出现了“步调不一致”，即不同步了。[68] 我将在这本书后面的内容中回到这三种不同步的形式上来，并且尝试着弄清楚 46
它们与那些现代化所固有的加速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社会系统的“(时间)结构的耦合”而导致的只是一个社会局部系统(持续不断的)加速，会从中产生同步的需求，这种需求为其他所有系统和在其中活动的行为者带来了时间方面的问题，在这里确实这一点就足够了。

现在尝试着从总体上来了解当下的时间症状和时间诊断，从中可以发现它们似乎汇集到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在相互间有很大差异的对当代社会的解释中，有一种观点很常见，它认为在现代化的发展中有或多或少的清晰的断裂出现，因此这个观点要求将当下的时代重新定义为第二现代性[69]、反射的现代性[70]、延伸的自由的现代性[71]、晚期现代性[72]或后现代性[73]。在社会科学中，经常引起争论的是，这个假设中的断裂与什么相关(它属于结构的类别还是文化的类别?)；这个断裂什么时候、在哪儿发挥历史性的作用(是否开创了现代？如果是，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影响有多深远：这是一个现代化中的断裂，还是伴随着现代化的断裂？这些备受争论的概念已经逐渐清晰了，一面赞同先前的诊断，一面也看到现代性的原则变得激进化的许多解释者认为，

---

〔67〕 当行动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相互分离的文化圈子时，往往就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这些行为者的时间实践和时间方向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个同时代中的不同时性毫无疑问是“多元文化主义”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参照 Marschall, 1997 年)。

〔68〕 请见诸如 Eberling, 1996 年；Scheuerman, 2001 年 a；本书第十二章“3”。这个系统性的不同步症状的另一个变种可以从对生态运动的研究中得以确认，在那些研究中所支持的理论是，“社会系统”或者说“经济体系”对于大自然生态系统来说速度太快了。这个不一致性假设涉及这个命题——没有留给大自然社会足够的时间一方面使得原料再生，另一面使得有毒物质和垃圾被分解(参照 Reheis, 1998 年，第 34 页及其后页)。

〔69〕 有关这个概念参照 Beck, 1997 年，第 25 页。

〔70〕 Beck/Giddens/Lash, 1996 年。

〔71〕 Wagner, 1995 年。

〔72〕 例如 Hörning/Ahrens 和 Gerhard, 1997 年。

〔73〕 Lyotard, 1986 年；参照 Jameson, 1998 年；Harvey, 1990 年；Welsch, 1994 年。

存在疑问的是,这个真正地被重新定义的历史时代走向哪里。[74]

47 我将在后面的内容里指出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路径,这条路径是在了解已经讨论过的时间诊断的基础上开启的,那些时间诊断指出,加速现象和不同步现象处于几乎所有的"现代性"的命运的中心。这一点对于那些关于新的社会构造是与"全球化"这个关键词所包揽的现象密切相连的假设尤其有效。正如我将在第十章中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新的当代全球化不是出现在放在这个关键词之下所讨论的过程本身,而是出现在速度之中,全球化伴随着速度前进。

加速的进程毫无疑问会带来一系列的结构上和文化上的后果,它们导致与"经典的现代"的社会形式的显著不同的特点的出现。[75] 这首先自然可以从史无前例的全球的同步化过程中看到。"全球化时代"的象征性的加强者是无处不在的、"乌托邦式的"互联网,在那里全球的所有事件都同时发生。作为对似乎在不同社会和洲际发生的同步化的补充,几乎所有之前所讨论过的全球—内部社会之间的不同步的表现变得更加显著了: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瞬息万变的信息市场和金融市场上,根据绝大多数时代的观察者的理解,几乎不可能再有行为者层面和系统层面之间的再同步化发生,因而在那里尤其不再可能进行政治的,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法律的控制了。个体和民族国家对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的变化速度来说过于缓慢了;教育、政治和法律不再能够跟上"时间的发展"的脚步。同时,生活在已经完全工业化的但却是所谓的"第三世
48 界的"、数量巨大却被边缘化的群体,正被"不同步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重要的结构发展和文化发展排除在外。与全球化症状相一致的不同时间里的同时性正在快速地增强,"石器时代"和"赛博时代"突然同时存在。

事实上,"后现代性"的辩护者们所欢庆的以及与他们的反对者斗争的共同的核心在于,对已被证实的不同步化过程的接受。以对经济、技术或社会的发展过程的政治控制为代价("政治的终结")——甚至可以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以发展本身为代价的;放弃对人生的和集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意义的、叙述式的一体化("记叙的终结");以及因

---

〔74〕 参照 Berger, 1986 年。

〔75〕 正如我接下来要说明的,由于事实上我是从重要的、只是由符合加速理论而确定的现代结构和文化上的断裂为出发点的,因此我将在下文中首先确定"经典的现代"和"晚期现代"这些概念的定义,之后在本项研究中将精确地把这些概念用于某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参照后文)。

此对将日常时间、人生时间和历史时间整合为个人身份的设计的放弃("主题/身份暴政的终结");对社会的不同系统之间的不同步和非整合的诉求的接受("社会的终结"),这些和直到最后将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步和非整合的发展当做后现代性哲学意识形态和后现代社会学的时间诊断的核心而接受下来是一样的。我在这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中将努力阐明,只有采用时间的视角才能将对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断层"的各种各样的观察集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得出对这个断层的有理论深度、可经验证明、时间诊断界限分明的,也就是说规范的定义。我的有启发性的主体假设是这样的猜想: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加速在"晚期现代"[76]中要翻越一个关键点,而到了那边就不再继续有对于社会的同步性和社会整合的要求了。 49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结果就是在社会控制的方式和个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上发生根本性的、定性的变革,这意味着付出个体和集体自治的代价,并且因此放弃对现代性的(规范化的)规划。在这个突变点,(人生的和历史的)时间本身的质量也同时发生了变化:个体的和集体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点将在时间的流淌中变得情境化和依赖于环境,而被不断地重新确定("时间化"),因而导向了"情境化身份"和"情境化政治"这样的历史性的新形式。在这样的思考的指引下,最终也同时发现了所有社会关系"完全"不同步和与此同时的所有(历史的和生活历史的)发展的完全停止这样两种相互矛盾的症状,在"后现代—诊断"中所显露出来的两种现象的亲和性[77],可以通过分析加以确定,并形成理论。

---

〔76〕 为了避免在这里有时会完全任意地使用某些概念,我建议,晚期现代是指结构方面的特征,而后现代则指文化方面的。这样做有两点原因:首先有关后现代的讨论大部分在文化学—哲学领域,主要是从美学风格、对世界的可解释性和可塑造性的角度出发的;而晚期现代的概念更多是在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变化分析的环境中用到。其次,后现代显然表明了比晚期现代在现代社会中或在现代社会之后更为强烈的断裂。后现代所讲的是进入一个实质上的现代;而晚期现代主要是指是时代(即现代自身)的新的造型。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接下来要指出的,根据我自己的诊断,文化的,即个体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质量性的突变,恰恰是建立在不变的结构化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77〕 参照 Jameson, 1998 年,尤其是第 51 页及其后页;Jameson, 1994 年;Welsch, 1994 年,第 1 页及其后页。

3. 对社会加速理论的初步思考

正如我尝试着指出的,将速度的结构自身作为社会科学的时间诊断和确定现代化的对象的要求,产生于现代化似乎是"自发的"自我观察,以及越来越敏感的社会研究者的强行加入。这个要求使得所假设的和
50 所诊断的(全球化、非整合化、个体化、信息社会)发展是有"说服力"这一期望变得合理,并且将这种期望看做一个整体的发展逻辑中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对目前已有的对现代化的时间方面的自我观察,就其系统化的内容进行详细调查,以形成我自己的*加速理论*。为此首先要阐释对这个理论起到支撑作用的方法上和理论上的前提条件。

现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这是本项研究的最根本的假设。关于哪些分析范畴对于理解和解释现代的结构性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动力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个问题,只能由社会科学的分析自身来回答。*加速*是速度结构变化的中心特征,并且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的结构形成和文化塑造的力量,有关这个假设的说服力和解释潜力,还需要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行证明。最近,有几位作者提出了与之相反的异议,他们认为在晚期现代性显著的时间体验不再是加速的体验,而是高度异质的事件和过程之间的同时性,从而形成扩张的[布鲁斯(Brose)]或延展的[诺沃特尼(Nowotny)]"当下"这样的时间视野。[78] 我将继续发展这个诊断,尝试指明,在这里所观察到的时间意识和时间地平线的变化展现了社会加速过程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是社会加速过程的新的阶段,而并非意味着有一个新的时间原理代替了原有的原理。这里所谈到的是*在加速过程中的*,之前已经解释过的"时间的时间化"的结果。

另外一个反对加速诊断的异议是,加速过程几乎一直伴随着延迟、放缓的互补趋势,因此时间结构的变化通常应该被理解为交互关系的复
51 杂的表现形式。根据这样的观点,*加速*和*减速*是平等的和普遍的时间基本趋势。每条假设理论都应该按照系统化的要求关注相应的放缓过程,在这个范围内我是赞同上述异议的,但我也能够很有说服力地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加速和减速的理论不是平衡的,而是高度倒向一边的:被识别出来的停滞趋势应该被理解为或是加速过程的后遗的或是对加速

---

〔78〕 Brose, 2000 年,第 130 页;Nowotny, 1993 年。

过程的反应(只是偶尔对加速过程发挥作用),因而停滞趋势在任何时候对于加速力量都是从属的。尽管如此,停滞的趋势仍然是作为研究的中心进行观察的,现代性的加速力量带来了时间质量的内在改变,从而导致了"停滞"这种副作用现象的产生。

对现代性在社会理论上的定义是将加速范畴作为出发点的,在简单地作出回答之前首先面对着两个明显的问题:社会加速意味着什么和在现代化过程中究竟什么在加速。事实上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上存在着大量的困惑和争议——究竟如何就社会加速这个事实达成一致。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定义清晰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加速概念,因而也没有相应的加速理论。[79] 非常普遍的做法是不可饶恕地忽视"速度"这个概念的物理和逻辑类别,而只是简单地将它用做"加速"的同义词,也就是说将对加速的观察和对过程的高速度的观察被混作一谈。速度这个概念即便没有表示它的物理意义,也已经是不能再清晰的了,正如斯蒂芬·布罗伊尔在研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s)* 的"速度学"(Dromologie)(不幸的是这恰恰是拒绝了出自原理的概念定义)时所评论的:

52

> 我们对于速度知道得如此之少!社会学关心意义、经济学是财富(或是贫穷)、政治学是统治,在这些现象中没有或者很少涉及速度……是否 $v = \Delta s/\Delta t$ 这个公式可以表示一切,因此当我们谈论某个现象时,主要取决于这些星球的运行状态?[80]

然而尚不清楚的不仅是人们如何理解社会加速,而且也包括社会加速到底与什么有关。在目前为止已有的社会科学的、日常的和上层文化的时间诊断中,至少没有进一步的理由将所有的候选对象都罗列出来:

---

〔79〕 "加速这个概念最开始是用来形容运动中的物质实体的状态,后来逐渐地、未加授权地迁移到了社会关系领域,而现在用来表明对历史自身的控制。"Jean Chesneaux 的抱怨是有道理的(2000 年,第 147 页)。

* 保罗·维希留(1932—),法国哲学家、建筑家和影评家。主要著作有《速度的政治》《纯粹战争》《消失美学》等。——译者注

〔80〕 Breuer, 1988 年,第 309 页。但是在这里与布罗伊尔所提出的按学科分工的建议相矛盾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关于财富、意义和统治的这些领域应该和加速的后果的根源密切结合起来。

历史加速[81]、文化加速[82]、社会加速、生活节奏加速[83]或者甚至时间自身的加速[84],因而在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从一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就是将这些诊断任意地组合起来,而且这些不同的概念往往用来表示同样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几乎只是作为符号来使用,而没有任何分析上的区别力量。因此,在无数的(而且不只是在二流的),即便是社会科学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没有进一步加工的、原始的陈述——在现代或当代社会中几乎一切都在加速,[85],这就似乎不令人惊奇了。

53 可是这是错误的,这一点几乎已经不需要提及。只要看一下日常生活,就已经可以看到有大量的过程在变慢(特别是最令人不快的交通状况和改革状况),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事情在执拗地与每一个加速的尝试作对(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与自身身体有关的事情上,例如感冒或者怀孕)。只有当首先经过确切分析而得到对假设现象的明确的定义(本书的第三章"2",以及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在这个定义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明确的是所确定的加速现象作为总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描述社会的加速,并且通过这个定义还要提出一个有关在这个社会中的中心发展的加速理论,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有关社会加速的系统化的理论。只有当对加速过程的定义与一个同样明确的关于放缓和延迟的重要社会现象的确定(本书的第三章"3")相向而对的时候,才可以确定加速过程。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对加速力量和放缓力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运动和停滞之间的关系(本书的第三章"4")的精确的理解,是起决定作用的。

在本项研究的第二部分,我将在明确的定义中确定社会加速的三个子领域:技术领域的加速(第四章)、社会变化的加速(第五章)和生活节奏的加速(第六章),首先是这些加速的"现象学"分析,也就是说,集中分析这些加速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在我转向第三部分的存在于每条加速理论的基本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所定义的加速过程之间的相互

---

〔81〕 参照 Koselleck, 1989 年和 2000 年,书中有大量的证明历史加速的判断的证据(这些证据同时也表明,这些类别的名称是很容易被相互替换的),但是与此同时在那里却只做了相当少的努力,去对历史的加速这个想法通过分析而有更清晰的把握。

〔82〕 例如 Coupland, 1991 年。

〔83〕 例如 Simmel, 1897 年或者最新的 Levine 的研究,1999 年。

〔84〕 Gurvitch, 1963 年或者 Schmied, 1985 年,第 86 页及其后页。

〔85〕 有代表性的作品:Altvater, 2002 年,第 285 页,对照第 281 页;Heylighen, 2001 年;Garhammer, 1999 年,第 114 页;Gross, 1994 年,第 155 页;Gleick, 1999 年;Eriksen, 2001 年,第 50 页。

联系和它们的驱动力是什么。只有当能够阐明,加速现象不能完完全全地简化为现代化过程中其他基本趋势(例如功能性差异的趋势或个体化趋势)的后果时所提出的假设,即加速是现代性的独立的基本原则,才能拥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在研究中所发现的,新近出现的加速动力实际上可以被定义为自我驱动的循环过程(*加速的循环*),而它可以被 54
分解为由三个不同的"外在的"发动机所驱动的经济特性、文化特性和社会结构特性,加速过程与这三个发动机处于动态的相互作用中,从而开始运转,并且也额外地被推动(第七章和第八章)。与之相应,在历史上效果显著的加速器——国家和军队,在晚期现代化也继续作为处于背景当中的加速因子;但是它们在今天对社会的发展进程相对于推动作用而言更多的是起到制动作用(第九章)。

在第四部分,即最后部分,我将转向分析社会加速过程的后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社会时间结构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方面去理解结构和系统的发展,同时在另一方面去把握行为方面和主体方面的变化并且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机会。如同我已经阐明的,处于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过渡中的当今社会的加速力量,事实上无论是对个体的自我关系还是集体的自我关系都起到改变和重新定义的作用,也就是说,主导的身份形式以及政治的自我影响的形式或者说是社会的控制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和重新定义(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这样的安排是以这条假设为基础的,即现代的加速进程不只是简单的线性过程。社会进程和发展的加速是建立在之前已经解释过的复杂的、多层次的时间模式和范围之上的。正如加速翻动连环画,速度仿佛一下子为图片"唤起了活力",使得连环画从一张张单独的照片变成了"动画",也就是成了影片,或者如同处于物质的聚集态(冻结的、流动的、气体状的)中的分子的加速运动会在关键的突变点上发生变化,社会过程的加速有时也会引起过程自身的蜕变。在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所开发出来的理论是说,社会的时间结构的动力,从近现代开始就产生了 55
与过渡到 21 世纪的过程中根本不同的后果,它带来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文化和身份确定形式上的变革式的断裂,也就是说事实上它导致了另一个社会的出现。

为了实现在现代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相互交织的体系中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确定并阐明加速动力的目标,就应该将已经完成的研究作为对形成具有充分的实证价值的体系化的社会理论和通过社会理论重新确定现代社会的贡献。尽管这项研究与每一条应该被严肃对待的社会理论

一样,都尝试着通过对经验现象的整理和理解,从而对结构的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加以假设——所假设的相互关系当然应该能够而且也必须能够经受得住检验,但是这项研究不会要求自身是一项经验研究。虽然只要这项研究对社会发展进行诊断和假设,那么它就自然不会放弃经验检验和批判的可能性,然而,这本书对合理性的基础性的探索并不是用整体性和完整的方法设计进行检验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不存在能够理解相互交织的结构理论、行为理论和主体理论方面的相应的观察并同时也能够理解交织在一起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点的复杂性的实证的社会研究方法。

如同我在下面的章节里将指出的,对可控的和整体性的方法设计的要求其实是将视线束缚在被大大局限的现象的表面,而无法去把握深层次结构和进一步延伸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已经加以解释的结构化的必要性和文化上的愿景之间的时间上的关联,是处在实证验证的研究(例如在时间预算分析的研究中,或者对组织的时间需求和时间模式的研究)视野之外的。我的研究与实证的关系是双重的:首先,在所有涉及可实证验证的假设的论证过程中,作为必要的折中,我会追溯对已有的
56 数据资料的大量的时间社会学和时间心理学方面的分析。这属于从马克斯·韦伯就开始要求的"知识分子的诚实",这里不是按照选择性的包含逻辑来进行的,即只关注能够证明加速的调查,而是用独立于假设的方式整理那些发现。[86]

从很多角度来看,时间预算分析是富有启发性的,有大量的这方面研究可供使用。[87] 对"生活节奏的提高"的检验是不能放弃的,尽管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检验更多的是作为对经典现代的高度时间差异的布局的分析,而不是用来对晚期现代的去差异化的时间结构的研究,也不是为了调查研究行为中断和经历中断的不断增多,而将重要的概念性的和方法论的欠缺在这里被证明为决定性的关键指标。因此同样也不能放弃的是定性研究,这些研究探索了个体的时间体验和时间感觉,并研究了个体的时间实践活动和时间观念的变化的原因。[88] 如果不关注定性的结果,就不能解释将系统命令转化为个体的行为脉冲的

---

〔86〕 Weber, 1988 年;对有关这个题目的新近的实证研究可以参照我的文献综述(Rosa, 2001a)。

〔87〕 我认为尤其有价值的是 Garhammer, 1999 年;Robinson 和 Godbey, 1999 年;Benthaus-Apel, 1995 年;Gershuny, 1999 年和 2003 年;以及 Holz, 2000 年。

〔88〕 在这里特别要参考 Hörning/Ahrens 和 Gerhard, 1997 年;以及 Sennett, 1998 年。

逻辑。

为了研究身份确定模式在时间方面的变化，并将身份模式与时间相互联系起来，我将要追溯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身份确定研究。而为了解码系统的时间模式，我将利用在政治、法律和经济领域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范围的研究。对所谓的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和时间地理的研究能够解释当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变化。[89] 57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困难的是对所假设的社会变革中的加速进行实证检验。在这里所存在的困难不仅在于历史同期数据的严重缺乏，而且由于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哪些指标是有说服力的社会变革指标尚无定论，因而这就使得情况更加复杂；此外，如何定义变革的加速也尚不清晰。容易想到的假设就是将加速定义为革新的速度，但是实证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失败了，因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科学、经济、艺术等领域）究竟哪些是基础革新是不清楚的。因此，我首先会在哲学家赫尔曼·吕伯（Hermann Lübbe）*所提出的“当代的萎缩”的概念基础上开发社会变革的加速的方向性的定义，从而探寻变化速度的相应变化的证据和反证。对教育结构、职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的分析能够提供决定性的证明。

作为一项有关社会理论的研究，必须满足为未来的研究开启新的问题视野，并且能够提供新的引导性的问题的要求，从而它才能够将有关社会生活的“普遍加速”的分散到无所不在的理论转换为能够精确地进行实证研究的问题[90]，而这些都已经说明了我的这项研究的实证性的第二种形式。在这个章节之首引用尤尔根·哈贝马斯对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其目的在于，使“放大镜的聚焦作用”同样为新的研究范式作出贡献，在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上的加速是这个范式的焦点。

在我最终开始研究之前，我想就三个可以预见的方法论的争议发表看法。第一个难题是通过实证发现系统重要性。时间诊断的研究的根 58

---

〔89〕 特别参考 Gastells，1996 年；Harvey，1990 年，以及 Held 等人，1999 年。

* 赫尔曼·吕伯（1926—），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德国的政治哲学》《在趋势和传统之间：现代对我们的要求过高了？》《时间关系：有关前进中的文化哲学》等。——译者注

〔90〕 通过将有关加速的诊断重新改写为可验证的假设，从而形成的有关加速诊断的“实证饱和”，对此尽管以莱因哈特·科泽勒克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直到今天根据他们的估计也没有达到这种状态（科泽勒克在 2001 年 11 月 26 日写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这样提到，同时也请参见 Koselleck，2000 年）。

本问题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每个可以确定的趋势中都可以发现相应的反趋势,针对所有的证据都有相应的反证。这样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确定性,全球化诊断和个体化诊断的重要性中到处弥漫着这种不确定性。加速理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正如已经阐明的,减速现象的系统价值只有在将去减速现象作为占首要地位的加速过程的后遗的反应或是作为加速的副作用,才能实证式地确定。第二个难题是,要从定量的角度回答系统重要性的问题。但这项研究的主体假设是,假想加速现象处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发展的基础,因此这条假设就不能通过"好几个大群体的老百姓被排除在所定义的加速过程之外"这样的证据来反驳,因为这些人可能因失业、生病、没有权利等各种原因而被边缘化。如果这项研究排除了对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领域,那么这项研究对于社会的结构变化和文化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在质量上都是有缺陷的。[91] 被迫加速中的"现代化的牺牲品"的庞大数量使得加速是现代化中决定性的特征这条理论不会受到反驳。

考虑到在对时间的体验和建构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科学的时间研究中就出现了围绕着时间的"性别"的持续的讨论,也就是说,关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在时间态度和时间体验方面的差异,以及这其中的文化上和结构上的根源。在我的这项研究中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并不多,
59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不过,从用系统性加速理论分析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只是拥有次级的重要性:加速强迫力对男性和女性产生同样的作用,尽管有假设指出,特别是有孩子的职业女性,她们比起男性要在更大的程度上遭受到加速的压迫力,因为她们一直承担着家庭—协作中主要的负担。[92]

有谁在要求对现代化过程从时间分析角度进行重新定义时,没有不可原谅地忽视空间质量的互补性变化?谁在谈及时间的时候,也必须谈到空间,这就是在这里要讨论的第二个方法论的争议。这个争议涉及康

---

〔91〕 参照 Castells, 1996 年,第 476 页及其后页。Zygmunt Bauman(1998 年,第 324 页和第 326 页)和追随他的 Ulrich Beck(1997 年,第 102 页及其后页)也都谈到"数量上无情增加的""结构上多余的"群体。

〔92〕 参照 Elchardus/Glorieux, 1992 年; Hufton/kravaritou, 1996 年; Leccardi, 1996 年; Shaw, 1997 年。

德和涂尔干*的富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的信条，时间和地点必须是作为观念和理解的平等的、基础的、不可欺骗的形式的。因此，为我的这项研究所做的大量在当下社会科学路径中的中心开发都是包含着空间维度的，因而可以描述为“时间—空间—分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93]、“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94]，也就是通过时间而消灭了空间[95]，或者甚至是在空间视角优先的情况下描述为空间液化为水流和流动的风景[96]。

对空间与时间的感觉和空间与时间的控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对于康德而言，他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先验的，而在涂尔干看来它们是随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但是个体结构服从于社会的结构。[97] 我的理论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间和空间不是平等的。空间体验相比时间体验无论在系统发育还是在个体发育上都拥有不争的优势。[98] 前者看上去像康德式的先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社会历史的变异性的特征。个体发育上的优先性毫无疑问是成 60
立的，儿童的空间感和空间的方向感比时间感发育得要早很多。由于地心力的作用，以及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物理构成，使得上与下的区别、前与后的区别对于人类而言都形象化了（相反，由于身体构造是对称的，因此对左与右的区分是人为的综合能力，儿童要在很晚的时候才能通过学习掌握，有时只是不完全的掌握）。时间的方向，也就是说能够估计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和事件的持续时间，与首要的空间区分相比要复杂得多和更加抽象，儿童要很迟之后才能发展这种感知。时间感的完全开发要直到青春期才完成。[99] 系统发育上的优先性体现在，时间感知和时间概念是在空间质量的改变中发展起来的：地区性可观察到的白天和黑夜的区别、四季的区别，和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的和社会的

---

* 爱弥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社会学年鉴》创刊人，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涂尔干的主要的思想集中于四部巨著：《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译者注

〔93〕 Giddens，1995 年 b；1987 年，第 148 页及其后页。

〔94〕 Harvey，1990 年。

〔95〕 在 Harvey 之外，参考 Schivelbusch，2000 年；Waters，1995 年；Robertson，1992 年。

〔96〕 Appadurai，1990 年；Castelles，1996 年，第 376 页及其后页；类似的 Bauman，2000 年，特别是第 1 页及其后页。

〔97〕 参照 Kant，1981 年；Durkheim，1981 年，导论的第二部分。

〔98〕 参照 Schaltenbrand，1988 年，第 46 页及其后页。

〔99〕 全面参照 Piaget，1980 年。

节律通常共同构建了时间定义和时间词汇的发展的起点。[100] 因此,在文化的发展中时间首先一定是本地时间,它是根据某个特定地点的太阳的位置和四季的自然变化来确定的。

与空间感觉相反,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只有非常有限的人类学的关系,其原因是时间感是社会历史的变量。时间结构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而空间结构却不能。因此,在一个社会中的"空间—时间—制度"的变化常常是造成时间结构的改变,而不是空间的变化。现代的具体的出生时间,可以有一定可信性地论证为,就是时间从空间中解放的
61 时候,这个时间处在加速过程的起点:通过机械钟表的使用和晚些时候的标准时间的引入,时间从地点中解放出来了——因为它可以不再依赖后者的性质而确定下来。康德在对时间的解放所进行的哲学思考中指出,相对空间,时间因为构建了内在的意义而赢得了一定的优势;通过霍布斯*(以及在现代物理学中)运动(作为自由)的原则最终赢得了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静止原则的优先地位。[101] 因而,在有关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感觉和空间结构的变化的讨论中,对于这些变化是时间结构的变化的后果这一点最终已经没有争议了[102]:常常可以看到自从引入火车和蒸汽船之后而不断增强的空间的萎缩,它是越来越快地跨越距离的结果;从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假设的空间的压缩可以明确地提出,由于时间的加速进程而导致的"通过时间造成的空间的

---

[100] 参照 Elias, 1988 年;Dux, 1989 年;Evans-Pritchard, 1969 年; Giddens, 1995 年 b,第 28 页及其后页。同时我们的时间的顺序概念通常是按照空间的语义的(例如之前和之后等,参照 Schaltenbrand, 1988 年,第 47 页)。

*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于 1651 年所出版的《利维坦》一书,为之后所有的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奠定了根基。主要著作有《利维坦》《法、自然和政治的元素》《人类特性,或政治的基本要素》,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奥德赛》《伊利亚特》翻译为英文。——译者注

[101] 有关现代运动的观点相对于停滞的观点赢得了优势,并且从而时间相对于空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考,请参见 Harvey, 1990 年,第 205 页。同时,从霍布斯之后,如 Otthein Rammstedt 注意到(1975 年,第 47 页及其后页),停滞是有必要的,这样的观点要求对运动进行解释,即找到它的根据。

[102] Zygmunt Bauman(2000 年,第 9 页)是这样表述的:"在当代时间与空间之间的斗争中,空间是固执的、感觉迟钝的、笨重的、惰性的一方,只能发动抵御战和沟壕战,从而阻碍时间的勇敢向前。时间是战斗中主动的、活跃的一方,是不断进攻的一方:是入侵、征服和殖民的力量。"

** 大卫·哈维(1935—),人类学家、地理学家,他是世界上被引用频次最多的地理学者,著有大量专著和论文,推动了现代地理学的学科化发展。他的成果拓宽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讨论。主要著作有《资本的限度》《后现代性的条件》和《希望的空间》等。——译者注

消失"[103],从地理空间的稳定的固定性所脱离出来的全球化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流动的状态,所带来的结果不是别的,而正是在全球同时性的节点上所出现的信息浪潮的不断提高的循环速度。因而,我的理论就是:*在现代,没有与加速类似的、独立的空间变化的特征;时空结构的变革首先是通过它们的时间的变化动力所驱动的。*

这个假设了时间的社会学上的优先性(相对于空间的人类学上的优先性)的命题肯定会引起反对意见,并且在这里可能只是被理解为引 62
起讨论的节点。但是主体假设的承载力和这里的这项研究的设计并不依赖这个假设的正确性:对时间结构的变化、原因、作用和结构的分析是独立于"空间结构在同一时间是如何变化"这一问题的,但是这完全不意味着,在这里不存在非常重要的实证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政治统治组织。因而,空间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扮演着完全重要的角色,相对于时间,空间主要是作为因变量出场的。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在这里要讨论的缺陷,是有关以加速理论为基础的时间的概念这个问题。聚焦于过程和变化的加速的焦点难道不是意味着某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时间概念吗?也就是说,一个与在西方现代社会所形成的线性的、抽象的、可商品化的时间概念一样,它却不是对所有的文化和历史的时间都可以普遍应用的?尝试着以这种方式开发"加速理论"的人,难道不是必须要广泛地研究欧洲国民和文化之外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吗?对于这些批评我的回答是,我的这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书写时间的全部历史或开发社会的时间的非历史学概念,而是尝试着去理解现代性背景下的西方模式的特性和发展动力。这项研究是对西方—现代化社会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的讨论。在足够的实证证据下,我们可以假想,凡是被现代化进程所覆盖的地方,都会发生相应的时间概念的变化。[104] 对于前现代或欧洲之外的文化——即在那里还要发生现代化进程——的系统分析,对于这项探索是不必要的。因此,只有当相应的人种学的和历史的时间研究能够在对比中说明*在现代* 63
社会中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的变化时,我才会用到它们。

我也会以类似的方式使用在自然科学中而形成的"新"的时间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关于时间的文献令人眼花缭乱,有指出牛顿的"绝对

---

[103] Harvey, 1990 年,第 240 页,参考第 270 页及其后页,以及第 293 页。

[104] 关于对这个理论的系统的说明和有力的实证证明请见 Linder, 1970 年;Levine, 1999 年;以及 Lauer, 1981 年。

数学时间”线性—抽象的概念中的相对性和可修正之处的,也有指出量子物理理论中重要的认识,特别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还有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以及大量的生物学方面的对原时*的发现。在这里要重复一下已经有些陈词滥调的声明,即这些认识为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们也对社会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也改变了社会科学中的时间的概念。[105]

这些非常深奥的、历史的思想结晶往往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的被承认程度并不是无可争议的,在这个基础上,将产生全新的时间概念,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概念不仅对于社会科学,而且也会引起现代社会中的生活的总体变革:“一幅不同的画卷出现了……我们把牛顿的和笛卡儿**的理解放在一边,而集中精力于广阔无边的联系和关系。随着焦点和重点的转移,已有的假设和分类就开始变得无意义了”,芭芭拉·亚当这样向我们保证;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时间的、时刻的、过去与现在以及将来之间区分的、加速的终结,著名的时间研究者卡尔海因茨·盖斯勒(Karlheinz Geißler)***论证说:“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中证明,时间在运动的系统中是以不同的速度前进的——如果这个系统自身有着不同的速度的话……通过这个开创性的认识,时间被相对化了……爱因斯坦在他
64 1955 年写的一封信中指出,时间……‘的重要性只是人们固执的错觉’。现在这个错觉也不再那么顽固了。之前非常坚定的关于时间是万能的信念已经消失了。”[106]

---

* 伊利亚·普里高津(1917—2003),比利时化学家、物理学家,1977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是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奠基人。——译者注

* 原时是在相对论中与事件在同一个地方的时钟所测量的唯一时间,它不仅取决于事件,时钟也在事件的行动之中。对同一个事件,一个加速中的时钟所测得的原时会比在非加速(惯性)中时钟的原时为短。原时是与协调时相对的概念。——译者注

[105] 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Adam, 1990 年,第 89 页及其后页;或者 Nowotny, 1993 年,第 157 页及其后页。

** 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也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译者注

*** 卡尔海因茨·盖斯勒(1944—),德国著名的经济教育家,时间生态学发起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关于世界的速度,和人们如何幸存》《所有人都有时间,只有我没有》《休息的褒奖》等。——译者注

[106] Adam, 1990 年,第 154 页;Geißler, 1999 年,第 152 页及其后页;对此 Rosa 也有详细的论述,2001 年 a,第 341 页及其后页。

我现在绝没有打算争论,这些知识,尤其是物理方面的,对于我们从理论上和哲学上理解时间都格外有帮助,以及从长远来看也许会对我们的社会实践发挥影响。[107] 但是这些认识的贡献在现在至多在于强化了时间的谜一般的特性。因此,我将刚才所引用的这两个说法看做是误判——时间的相对性在自然科学中并不能引起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我们的时间方向及时间范围中的时间结构的解体。在所有的三个层次(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历史时间)中,时间的相对性都不会对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产生影响,"相对的时间"对于一些行为者来说,至多是具有帮助理解世界功能的要素,从而——尤其是在与深奥的思想产物结合在一起时——把它当做新的神圣时间来接受,但是却不会产生直接的行为实践上的后果,因为,尤其是物理学中的重要的现象,都不是能直接通过经验感知的。

如果存在着亚当和盖斯勒对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经验和时间实践活动的变化的假设的证据,那就必须根据他们的解释在社会的和文化的实践活动的背景中去寻找。半生半熟的深奥的—历史的、伪自然科学的时间概念对于社会科学的探索和社会哲学的解释不能作出什么贡献。

欧洲大陆之外的、深奥的—神秘的并且或是量子物理或是天文物理的时间概念的流行是拜这样的期望所赐,即希望能够从晚期现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待时间的方式开发出对它们的规范性批判的新的切入点。如果所面对的问题是有关成功的生活这样的道德的基本问题的话, 65
即人们打算或应该如何渡过"他们的"时间,那么这样的意图是合理的,因为时间结构——如我尝试着去指出的——随身带来了基本的、规范的含义,在这里将通常是社会特性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放在了道德的中心。[108] 因此,丝毫不用惊讶,即便是实证导向的时间研究也倾向于去讨

---

[107] 我们对时间的理论上的解释与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实践活动之间是以相对复杂的方式发挥着相互作用的,对此参见 Rosa, 2004 年 b。

[108] 最深层次地挖掘这种相关性的哲学原因毫无疑问非马丁·海德格尔的研究莫属(Heidegger, 1927 年,1995 年)。

论有关好生活的问题和不同的生活设计。[109]

这里的这项研究完全不同于这个社会批判的基本意向;这项研究尝试着获得用于诊断似乎是社会内部的"病理性"发展的标准,为此一方面要对非同步化现象和非整合现象加以关注,这些现象是社会加速所产生的结构,另一方面要把握与结构所迫使的时间结构相反的对行为和文化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观念。当个体的时间体验的三个层面(或者如果算上神圣的时间,就是四个)之间不再相互协调一致,并且与系统的时间模式也不和谐时,就会对主体——或是个体的或是集体的——产生不可避免的重大的后果。而再同步化只是在付出(时间)文化的或(时间)结构的"革命"这样的代价后才可能。鉴于此,我将以下的想法也理解
66 为对有待书写的"好生活社会学"的贡献,这个想法与发展对生活方式的抽象的伦理批判的"好生活哲学"不同,它是将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隐含的和明确的*成功生活的设想*批判性地与*结构性条件*对立起
67 来,从中得到相应的概念。[110]

---

[109] 例如,已经有 Robinson 和 Godbey(1999 年)的主题为美国时间预算数据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生活的时间》(*Time for Life*),这几乎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为基础的,即在用于(再)生产和消费的时间之外,还能够和应该有用于"真正的生活"的时间。进一步可以参考 Gershuny, 2003 年,第 242 页及其后页; Sennett, 1998 年; Gronemeyer, 1996 年;Reheis, 1998 年或者 Nowotny 1993 年,特别是 135 页及其后页。事实上,找到完全没有关注道德层面的研究,或者完全与之相反的研究,是比较困难的。

[110] 在《自我解释的四个层面》(*Four Levels of Self-Interpretation*)(Rosa,2004 年 b)中,我尝试着,以系统伦理的一致性模式为基础,探索在什么样的社会的和社会心理学的前提条件下,按照所涉及的主体自身的标准可能过上"成功的生活"。成功生活的概念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明确阐述了,并且是在自反信念系统中发挥作用,它更多是含蓄地构成了我们的感觉、价值观和行为决定的基础,并且会反映在我们个体的和集体的叙述、符号和学说中。

第一部分

社会加速系统理论范畴上的基本轮廓

第二章　从热爱变动到加速法则——对现代性的观察

1. 加速和现代文化

自从文艺复兴后出现了有关“现代”的可以追溯的讨论开始，现代性的维护者和对现代性的蔑视者在一点上就一直是一致的：人们的结构性的基本体验就是世界和生活的巨大的加速，以及因此带来的个体经验流的加速。正如这种包括了直到当下的今天的完整的现代文化历史已被阐明的基本体验，最近共同聚焦于这种基本体验的大量的文化历史研究也指出，现代文化中不言自明的现象正是可以理解为对时间和空间体验的变化的反应。[1]

对于彼得·康纳德而言，现代性完全就是时间的加速（并且因此与之相联系的是牢固的空间的瓦解）[2]，与康纳德类似，来自纽约的政治学家和城市学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 支持这样的理论，即现代性描述了永不停止的动态状态，他的最生动的表述来自《共产党宣言》（*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中被广泛引用的一段话：一切固体都融为空气，所有社会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伯曼以此为标题的书中（副标题是“对现代性的体验”），他写道：

> 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体验的模式，即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

〔1〕 Conrad，1999 年；Berman，1988 年；Borscheid，2004 年；Gronemeyer，1996 年；Kern，1983 年；Harvey，1990 年。

〔2〕 Conrad，1999 年，第 9 页。

* 马歇尔·伯曼（1940—），美国哲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本真性政治学：激进政治学与现代社会的出现》。——译者注

> 对自身和他人的体验、对生活中的机会和冒险的体验,这个模式被今天全世界的男男女女共同分享。我将把这个体验的实体称为"现代性"……现代的环境和体验打破了所有的地理和种族的、阶
> 71 级和民族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线;它将我们都倾倒入永恒的解体和复兴、斗争和矛盾、暧昧和痛苦当中。要变得时髦就要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固体都融为空气"的宇宙的一部分。[3]

伯曼之后描述了,对伴随着现代化的所有的过程而来的动态性、变化和持续的不安全感的体验,以及又经过了文化领域的现代性的加工的这些体验(伯曼在这里讨论的通常是"现代性主义",是对"现代化"的反应),是如何被阐明的,并尽可能好地加以控制的。

伯曼对这样的现代性的理解是从卢梭*在《爱弥尔》(*Emile*)中对"漩涡社会"的观察开始的,而从歌德的《浮士德》(*Faust*)中找到了完美的艺术的表述。[4]腓利门书(Philemons)和鲍西思(Baucis)的命运象征着固执者的老旧的、衰落的世界,在最后一幕,他们成为浮士德的让地球运转起来的行为的牺牲品,歌德同时也明确指明,"社会的漩涡"将内在的变化和外在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此,正如弗里德里希·安西隆(Friedrich Ancillon)**早在1823年就已经注意到的,变动和静止之间的平等义务已经转变为文化问题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动的,或者被导致动起来,一切或是有目的的或是在托词下要趋于完美,这使得一切都被卷入疑问或怀疑中,因此通常就会导致变化。对变动本身的喜欢,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目的或确定的目标,产生并发展了时间的运动。在时间运动当中,并且只是在那其中,人们寻找着真正的生活。"[5]不再是变化者承担寻找理由的负担了,而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政治或艺术中保持在原地不动的事物。正如伯曼所引用的纽约城市规划师罗伯

---

〔3〕 Berman,1988年,第15页。

*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作曲家。他的《社会契约论》的人民主权及民主政治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哲学和教育思想。主要著作有《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和《忏悔录》。——译者注

〔4〕 Marianne Gronemeyer(1996年,第121页及其后页)也从《浮士德》中对如同被诅咒般的烦躁和不安的容忍发现了对当代生活理想的范式式的表达。

** 弗里德里希·安西隆(1767—1837),普鲁士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5〕 引自 Koselleck,1989年,第328页。

特·摩斯(Robert Moses)*的话所阐明的,像浮士德一般有力的推土机是在20世纪中期纽约的一部分,尤其是布朗克斯(Bronx)区**的改建(与一百年前在巴黎的奥斯曼***的建筑大型机器非常相似):那些"喜欢事物原本样子"的人们在现代"没有希望了"。[6] 对变动本身的喜 72
欢——借用安西隆的措辞,看来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

可是这个基本原则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它的矛盾:它一方面作为通往真正生活的道理和保证进步的途径,而另一方面又是无限的深渊和吞噬一切的漩涡。这个矛盾也是整体文化和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歌德被这种矛盾所撕扯着,一方面是对社会和技术的成就感到惊叹和振奋,另一方面也因为现代的不知祸福的急速和魔鬼般的速度所导致的深层次的本质的破坏而担忧;[7]尼采****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充满动力和能量的超人蒙上了对新的野蛮的恐惧的阴影:"随着生活的巨大加速,精神和眼睛只能习惯不完整的或者是错误的所见和判断……由于缺乏宁静,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新的原始野蛮。越来越多的活动没有时间去做,也就是说永不停歇。这其中包括必要的修正,这些修正必须针对人们的特性来进行,也就是说在很大范围内加强内省的成分。"[8]在《不合时宜的考察》(*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中尼采毫不怀疑地指出,现有的关系和信念的加速、消失和瓦解,"所有基础通过现代人——宇宙网络节点上的巨大的十字蜘蛛——迅速而草率地分裂和被破碎,它们瓦解

---

* 罗伯特·摩斯(1888—1981),20世纪纽约和其市郊的建筑大师。1927年至1929年时曾任纽约州的州务卿。——译者注

** 布朗克斯是美国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之一。——译者注

*** 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因获拿破仑三世重用,主持了1852年至1870年的巴黎城市规划而闻名。当今巴黎的辐射状街道网络的形态即是其代表作。——译者注

[6] Berman,1988年,第294页及其后页。

[7] 有关担忧部分可以特别参考Osten,2003年、2006年。歌德在1825年的一封信中用"Veloziferisch"(不知祸福的急速)这个新词语来形容现代,并且评论说:"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最悲惨的是,它还没有成熟到——因此我必须阻止,人们在下一秒钟将前面的东西吞掉,日复一日地挥霍,因而只能永远勉强糊口度日,没有任何提前的打算。"(Goethe,1825年,第37页;详细内容参照Osten,2006年,特别是第2页及其后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他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偶像的黄昏》等。——译者注

[8] Nietzsche,1988年a(I,5《上层和下层文化的表现》*Anzeichen höherer und niederer Kultur*,第282节和第285节),第231页及其后页;也可以参照Osten,2003年和2006年。

成流动的和流散的东西,被不知疲倦地打碎并将一切变成历史"[9],这
73 些都是现代文化的基本原则。

尼采相信,在这样的发展中,能够识别出衰落和衰减的起因。当他在"思考普遍的匆忙和不断加快的衰落速度、所有的安宁和单纯的结束"的时候,他几乎"仿佛感觉到了文化的完全毁灭和连根拔起的症状"[10]。波德莱尔*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将这种矛盾性解释为现代性所具有的富有影响力的特征所产生的后果。波德莱尔在散文《现代生活的艺术家》(*Der Maler des Modernen Lebens*)中确认(并庆祝)现代是已经完结了的,并且通常已经消失了,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偶然的,只是艺术的一半,而艺术的另一半是永久和不变"[11]。由于现代的瞬间稍纵即逝,因此也同时产生了对永恒和永远,以及更新为新的方式的渴望;根据波德莱尔的看法,(技术)进步的结构性的观念除了间或为现代带来仇恨和蔑视之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当他大致确定自我毁灭的意愿是内置在关于进步的思想当中时,艺术的另一半就是自杀式的,并且走向了永远的绝望。[12]

因而,在这里所讨论的不再是到处出现的动态化的体验的评价这个问题,而是有关动态化体验在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明。这将从文化产品的所有的缺陷中得到确定,从建筑到绘画,再到雕塑,直至文学和
74 音乐。[13]

在立体派艺术家和未来派艺术家的作品中,诸如在弗尔南多·莱热

---

〔9〕 Nietzsche,1988 年 b[《有关历史对生活的益处和弊端》(*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第 9 节],第 313 页。参照 Frisby,1988,第 28 页及其后页。

〔10〕 Nietzsche,1988 年 b[《叔本华作为教育家》(*Schopenhauer als Erzieher*),第 4 节],第 366 页。

*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伟大诗人,象征派诗歌之先驱,现代派的奠基者。主要作品包括诗集《恶之花》、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美学品论集《美学珍玩》、文学评论集《浪漫派的艺术》等。——译者注

〔11〕 Baudelaire,1989 年,第 226 页。Walter Benjamin(1980 年)也重拾波德莱尔的观点,将现代确定为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和偶然的,同时也可以参考 David Frisby(1988 年)的现代的基本特征。

〔12〕 参照 Baudelaire,1976 年,第 575—583 页;《批判的方法:有关现代的进步对精美艺术的影响的想法》(*Methode de critique. De l' idee modern du progress appliqué aux beaux-arts*);Berman,1988 年,第 138 页及其后页和 142 页;Frisby,1988 年,第 14—20 页。

〔13〕 对于 Stephen Kern 而言,对时间和空间体验的多维度的变化完完全全地体现在了现代文化上,因而在他的文化历史的研究的中心位置,即在他的有关改变了的时间体验的调查和对空间感觉的分析之间,有一章是关于(提高的)速度的,不是个偶然。通过这一章 Kern 明确指出,速度是在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之间的决定性的接口和联系(1983 年,第 3 页和第 189 页,及其后页)。

(Fernand Léger)*、让·梅青格尔(Jean Metzinger)**、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或翁贝特·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s)****的作品中,当然还有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的画作[14],或是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在1912年所创作的画作《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在其中杜尚尝试着将爱因斯坦的观点、空间和时间通过抽象展现的运动表达出来、转化为艺术的形式[15],这些努力将空间体验和对世界的体验的动态性和碎片化清晰地翻译为新的形式语言。大卫·哈维指出了其中的核心关系:从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在1911年所完成的有关埃菲尔铁塔的立体主义画作,多少表达了通过空间的分隔而再现时间的想法,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s)****通过流水线而使得工业生产的速度的加速成为可能。[16]

在音乐领域,如果人们将对古典作品每隔十年的平均演奏时间进行

---

* 弗尔南多·莱热(1881—1955),法国画家、雕塑家和电影制片人。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创造了立体派,他被视为波普艺术的先行者。——译者注

** 让·梅青格尔(1883—1956),法国画家、理论家、作家、评论家和诗人。——译者注

*** 贾科莫·巴拉(1871—1958),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和工艺设计师,未来派的最杰出人物。——译者注

**** 翁贝特·波丘尼(1882—1916),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未来主义画派的核心人物。他不仅是未来主义运动的推动者,也是这个运动的杰出理论家。——译者注

* 威廉·透纳(1775—1851),英国最为著名、技艺最为精湛的艺术家之一,19世纪上半叶英国学院派画家的代表,是西方艺术史上最杰出的风景画家之一。——译者注

[14] 特别是在他于1844年所创作的著名的画作《雨、蒸汽、速度:西部大铁路》(*Regen, Dampf und Geschwindigkeit. Die Great Western Railway*),参照Braun,2001年,第87页及其后页。

** 马塞尔·杜尚(1887—1968),法国出生的美国画家,纽约达达主义的团体的核心人物。杜尚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行进的。——译者注

[15] 参照Conrad,1999年,第82页及其后页。

*** 罗伯特·德劳内(1885—1941),法国画家。他尝试抽象形式和色彩,是最早创作纯抽象作品的画家之一。——译者注

**** 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将装配线概念实际应用而获得巨大成功者,并且以这种方式让汽车在美国真正变得普及。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为一种大众产品,它不但革命了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对现代社会和文化起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有一些社会理论学家将这一段经济和社会历史称为"福特主义"。——译者注

[16] "福特……将工作分解,并且将它们分散在不同的空间……他有效地使用了空间组织的某种形式以加速资本转化为产品的时间。通过组织和分隔生产过程的空间顺序从而形成了控制,通过这些控制所带来的好处是时间因而能够被加速(加快)"(Harvey,1990年,第266页及其后页)。也请参照让·梅青格尔的名言:"立体主义者……允许他们围绕着客体活动,从而在智力的控制下,通过几个连续的侧面的组合给予这个客体集中的再现。以往图片拥有空间位置,而现在它也在时间中统治"(Kern,1983年,第145页)。

比较的话,也总是能够看到,自从19世纪以来对这些作品的演奏速度多少是加快的了,因此无论如何,一些目的在于"减速"的反对运动事实上已经确立了明显的"萎缩的趋势"。[17] 有的时候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鉴于当今生活的更快的速度,贝多芬(Beethoven)的交响乐应该演奏得更快一些,从而唤起可以与以往相提并论的效果。[18] 而且在作曲技术
75 本身也是如此,从巴洛克音乐(Barock)开始,至少到浪漫主义音乐(Romantik),速度对比和因此的动态化效果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舒曼(Schumann)的钢琴奏鸣曲令人惊讶地开始遵守"尽可能快"的节奏规矩,以便更快地遵循"速度要求"。[19] 因而最明显地体验到动态化效果的可能是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例如他的《波莱罗舞曲》(*Bolero*)通过对乐器的改变而实现了魔幻般的加速效果。达律斯·米约(Darius Milhaud)**在他的三部《歌剧分钟》(Operas Minutes)(1927年)里通过将三部希腊悲剧的素材加工为短短几分钟内的表演,而最终将音乐的加速的概念发挥到荒谬的地步。

爵士(Jazz)这种音乐形式以及很多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的风格方向也不断地可以被理解为速度的反照和现代城市生活的气喘吁吁的状态。"爵士"这个词本身就像是速度(*speed*)的俚语式的表达。[20] 因此从中得出的猜想也并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即新的流行音乐的风格方向展示了在时间方面越来越快的趋势,直到达到(可演奏和可接收的)临界点——之后必须发现新的表达形式或者会遭到失去声望的威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朋克音乐大概也是如此,但是对于朋克音乐中的重金属音乐(Heavy Metal)却一定是这种情况的,尤其是在80年代后半期从

---

〔17〕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剧院的对话速度上,例如,Eriksen(2001年,第49页)指出,易卜生(Ibsen)的《罗斯莫庄园》(*Rosmersholm*)的表演时间在不到一个世纪里从四个小时减少到不到两个小时。

〔18〕 这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并不少见,由于贝多芬的节拍器显示节拍的速度总是较快的,因此就有人猜测这是因为贝多芬的节拍器出现故障了,也就是说它本身太慢了,或者将两拍计作一拍(参照Hagmann,2003年);类似的还有对《英雄交响曲》(*Eroica*)革命性—动态活力的世俗化,并且通过这样的世俗化而带来了"撕裂的时间"的新体验,也请参照Brinkmann,2000年。

〔19〕 参照Lübbe,1998年,第283页及其后页。

* 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和钢琴家,是与克劳德·德彪西齐名的印象乐派作曲家,被认为是20世纪的主要作曲家之一。代表作品有《Miroirs》《加斯巴之夜》《达夫尼与克罗埃》《波莱罗》等。——译者注

** 达律斯·米约(1892—1974),法国作曲家,六人团成员之一,是20世纪产量最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风格深受爵士乐以及六人团成员普遍偏爱的新古典主义乐派的影响。——译者注

〔20〕 参照Kern,1983年,第124页。

中衍生出来的令人窒息般快速的“速度金属”(Speed Metal),其表演风格更使之达到并超过了重金属音乐的如日中天的人气;而在90年代的铁克诺音乐(Technomusik)*则是一场为了达到最多的“每分钟节拍”数而进行的赛跑。[21] 这样的音乐在听众那里所产生的效果应该是完全矛盾的:例如,唐娜·盖恩斯(Donna Gaines)**在她的著作《青少年荒地》(*Teenage Wasteland*)中写道:“废墟(一个与快速金属有近亲关系的变体——本书作者注)如此快地让你的确冷静下来;它像利他林一样令人放松”;而芭芭拉·福克崴恩(Barbara Volkwein)通过研究证实,从飞速 76
的时间的体验“转变”为对时间的静止状态和凝固状态的感觉,会对高科技情境下的时间感知有重要的影响。[22] 另一些人认为迪斯科像大部分铁克诺音乐那样受欢迎,其重要的原因显然是它们的基本节拍正好与正常人的心跳的节奏相吻合,因此能够带来刺激的兴奋效果和加速效果。但是,很少有人将变化的时间体验和空间体验看做艺术加工,更多地将它看做是工业化再生产。工业化再生产的足迹也可以在流行文化世界和媒体格局的其他表现中看到,例如,在20世纪随着时间的前进,电影和电视中的镜头进度和图片进度变得越来越快了,直到最后用碎片连接的和千变万化的叠化技术代替了线性—记叙的连接原则,就像在电视台所播放的音乐电视节目(MTV),通过它的广告和音乐的视频剪辑而在全世界流行起来。[23]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最终无处不在的正是对那些“社会旋风”的体验、已有事物的不断的且加速的巨变、通过技术化而改变的生活世界中的伤痛的、给人以冲击的经历。我们不仅在歌德和卢梭的小说中可以找到这些,而且在浪漫的诗歌中也能看到;在沙米索***的《蒸汽骏马》(*Das*

---

* 又译高科技舞曲。——译者注

〔21〕 Volkwein,2000年。

** 唐娜·盖恩斯,美国社会学者、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译者注

〔22〕 Gaines,1998年,第203页,和Volkwein,2000年,第403页及其后页,尤其是407页。

〔23〕 参照 Kemper,1995年;Schneider/Geißler,1999年;Gleick,1999年;Großklaus,1997年,特别是第11页及其后页。

*** 阿德尔伯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诗人和植物学家。主要作品有童话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和组诗《女性的爱情和生活》。——译者注

Dampfroß)中,"流逝的时间"落在了"迅速的榜样"之后;[24]在海涅*的作品中半讽刺地观察了火车的出现而导致我们的空间和时间的基本概
77 念的毁灭[25];或者在表现主义流派如海姆**或特拉克尔***的证词中,对于"着了魔的"城市来说,它们的变化和运动都在暴力的速度和动力的掌握之中。

连20世纪的伟大的小说都可以理解为对现代的加速的过分要求的反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将这种加速的苛求加以改变并在意识流之中再现,这一切都表现的是现在;而与此同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则是从过去当中探寻,在与他的主人公有着直接和确切的关系的"速度的时代"中,一切总是表现为无可挽回的失败和文物化;[26]托马斯·曼(Thomas Mann)**则是将他的《魔山》(*Zauberberg*)作为"时间小说"来写作的,这部小说不仅折射了时间体验的矛盾,而且加速同时也是他在叙事结构上的原则:时间随着小说的发展流逝得越来越快,因而在书的开始时,在若干页里只讲了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而之后同样的页数却对应着几天,最后是几个星期,到了书的最后将

---

〔24〕 引自 Koselleck,2000年,第150页及其后页。

* 克里斯蒂安·约翰·海因里希·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1797—1856),19世纪最重要的德国诗人、新闻工作者、随笔作家、讽刺性杂文作家。主要作品有《乘着歌声的翅膀》《悲剧·抒情插曲》《论浪漫派》《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与女人》《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和《罗曼采罗》等。——译者注

〔25〕 "这些变化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信仰和观念当中了!甚至连有关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概念都被变得摇摇晃晃了。火车消灭了空间,而只剩下时间",海涅在1843年写道(Heine,1974年,第449页);在另一处,他写道:"世界历史开始了新的段落……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所有人都在新的轨道上被带着向前走、被抛出,新的关系、新的朋友和新的折磨在等待着我们,而且不明之物发出令人惊讶的刺激,既吸引人又令人不寒而栗。"(同上出处,第448页及其后页。)

** 乔治·海姆(George Heym)(1887—1912),德国表现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前唯一出版的作品为《永恒的一天》。——译者注

***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20世纪奥地利著名诗人。主要作品有《塞巴斯蒂安在梦中》《孤独的秋天》等。——译者注

**** 詹姆斯·奥古斯汀·阿洛伊修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和诗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以及《芬尼根的苏醒》等。——译者注

*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意识流作家。代表作品《追忆似水年华》。——译者注

〔26〕 关于普鲁斯特有关社会变革中的不断加快的速度以及通过新的向前发展的技术而导致的"空间的萎缩"的讨论,也可以参考 Conrad,1999年,第91页及其后页。

**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著名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魔山》《约瑟夫和他的兄弟》《浮士德博士》《通往坟墓之路》《威尼斯之死》等。——译者注

经年累月压缩在寥寥几页里。[27]　78

大卫·哈维从这些观察中得出了结论：现代文化从整体上可以理解为只是对危机重重的变化着的空间和时间体验的反应，它是一波紧随一波的“时间—空间—压缩”浪潮的结果，同时也必然是生活节奏加速和空间在时间的攻击下被歼灭的后果。[28]

因此，加速浪潮是且尤其是通过技术革新和将其运用到工业中所导致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工厂中蒸汽机的引入并且之后铁路的建造、自行车和后来的汽车以及再后来的飞机的大面积推广、通过电报和之后的电话以及最终的因特网而带来的通讯的加速、晶体管收音机和“活动的”图片的制造，所有这些运输、通讯和生产的技术上的加速的形式，以令人吃惊和令人感到伤痛的方式改变了生活的世界和日常文化，并且也导致了对“*存在在这个时间中*”和“*存在在这个世界中*”的感觉的变化，正如斯蒂芬·布罗伊尔在谈到维希留时所评论到的，自从工业革命看上去“伴随着事故的暴力无法停止地”向主体逼近以来[29]，休克（Choc）和创伤（*Traumas*）等完整的一类医学概念适时地出现了。简言之，这导致了哈维所说的时间—空间—压缩的出现。[30]

现代性所特有的在对这种变化的评价上的矛盾，揭示了关于每一个革新的文化上的争论，对于新事物往往大多数时候如同海涅的评价一样，是“有吸引力的，并与此同时也是令人恐惧的”，这在时代的证据中是一致的。W. G. 格雷格（W. G. Greg）早在 1877 年就指出：“毫无疑问，

---

〔27〕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s）的《没有个性的人》（*Mann ohne Eigenschaften*）也值得关注，小说特别介绍了主角手上拿着一只（码）表，他用它来计数行人和车辆，“……他迅速地将眼睛看过去、固定住、放开，估计在面前活动的人群的速度、角度、力量……如果能够测量注意力的跳跃，那么从眼部肌肉的绩效、灵魂的钟摆运动以及人们为了能够在街道上的人流中保持站立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中估计能够得到……一个数值，与之相比，第一节颈椎所需要的用来抬起世界的力量是微小的；人们可以测出，今天一个人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时候，已经付出巨大的努力了。”（Musil，1978 年，第 12 页）。有意思的是这种“点数”强迫行为被当做快速病的症状（Levine，1999 年，第 52 页及其后页），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人们会分分钟钟追踪他们的血压计上数值的微小变化，与此同时，另一些人计算运动员之间的几百分之一或几千分之一秒的差别，还有一些人在因特网、电视和日报的帮助下对股市的最微小的曲线变化作出反应，从中获得一些直觉上的合理性。

〔28〕 Harvey，1990 年，第 240 页及其后页、第 267 页、第 284 页及其后页、第 305 页及其后页。

〔29〕 Breuer，1988 年，第 323 页；维希留有关“事故”（accident）的意义请参照 Crogan，2000 年，以及 Virilio，1998 年 c，第 183 页及其后页。

〔30〕 也请参照 Kern，1983 年，第 109 页及其后页；Conrad，1999 年，第 91 页及其后页。关于休克和创伤请参照 Schivellbusch 的有意思的思考（2000 年，第 142 页及其后页）。

79 在19世纪后半叶,生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快速——社会所达到的迅速、我们的活动所伴随的速度、我们工作在其中的高压力,因此这里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高速度是否是有益的;而第二个问题是,是否我们为高速度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这个代价我们现在只能估计而很难稳妥地确定。"[31]

每个速度得以提高的新事物都在它们的引入过程中引起了某种形式的文化战斗。在这其中,一边是新技术的热烈支持者,他们到处宣传新技术所带来的机会和预兆;与之相对的是坚决的反对者,他们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的尺度和可控的生活世界的丧失,同样也警告新技术带来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有害后果:这些警告,从由于大的风阻所带来的"自行车脸",到由于铁路旅行和之后的汽车旅行所导致的大脑被腐化和消化方面的疾病[32],直至大量的电视消费所导致的完全的文化丧失的世界末日的景象[33],或者普遍使用的电子邮件通讯方式和过多的因特网的使用所带来的不可治愈的抑郁的隔离。在这些看法中,最广为流传的警告是移动通讯设备所带来的伤害大脑的后果——如那种似曾相识的体验(Déjà-vu-Erlebnis)*。

现在,从围绕着加速技术展开的文化斗争的历史中可以得出三条结论:第一,技术的加速过程并不是匀速、线性发展的,而是阵发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常常会遇到障碍、阻力和反向运动,这会使得加速过程放缓、
80 中断以及甚至是暂时地转向相反方向。[34]

第二,技术的加速推力带来了几乎不可避免的加速讨论和减速讨论,对减速的呼唤和对失去的"缓慢的世界"怀旧的渴望——在缓慢的

---

〔31〕 引自 Levine,1999年,第206页。

〔32〕 关于自行车脸请参照,Kern,1983年,第111页;有关围绕着铁路的斗争主要可以参见 Schivelbusch,2000年,第35页及其后页和106页及其后页;进一步的参考见 Levine,1999年,第111页及其后页。

〔33〕 关于电视,这样的看法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科学领域所坚持的。因此,诸如 Robert Putman(1995年)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流失归结于电视的有害影响。

* Déjà-vu 体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大脑和认知加工短暂功能失调的产物,往往在大脑疲倦时更容易出现 Déjà-vu 体验。——译者注

〔34〕 因此诸如神经医生 Willy Hellpach 在20世纪伊始就指出"精神活动过程"不仅有"压倒性的速度提高",而且同时也有大量与之平行运行的(Elias 所提出的)放缓现象:"我们需要多得多的时间被抚养成人……几乎所有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比起大部分'自然'的老百姓吃饭都要更慢、更拖泥带水;在19世纪,伴随着所有的交通工具的加速,所有的职业生涯变得缓慢了,职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蹒跚"(引自 Radkau,1998年,第25页;参照 Kern,1983年,第126页)。

世界中的慢悠悠一下子让人想起完全不同的特质，这一切通常都超越了对赢得速度的兴奋。[35] 但是诸如未来主义这样的文化运动，尤其是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aso Marinetti）* 的作品和宣言——例如被多次引用的 1909 年的《未来主义宣言》（*Gründungsmanifest des Futurismus*），欢欣鼓舞地创造着新的沉醉和胜利，庆祝着（从那之后就）"永恒的、无处不在的速度"，并且展望了从最开始将诞生新的美学，之后则是新的宗教和道德展现出来，当然也可能存在例外。[36] 与之相反的慎重的减速的支持者并没有因为给予了速度的支持者追本溯源的措辞而感到尴尬，这是来自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一篇关于都市漫步者所观察到的 1840 年巴黎时尚的文章，在那里的人行道上有一只乌龟在散步，还有在彼得·海恩特尔（Peter Heintel）*** 所描述的克拉根福尔特（Klagenfurter）那个时代的约定延迟时间。[37]

第三，与减速支持者在上层文化讨论中的霸权地位相反，到目前为止每一场"文化战斗"最终都是以减速支持者的胜利而告终，也就是说， 81
伴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使用。站立在加速技术的胜利的两边的是节奏热情的流行文化——它在广告、运动和日常生活中承诺并且庆祝时赢得了时间，它的范式化的表达富有魅力，并带来了快餐和闪电战、一级方程式赛车手和赛事选手或电台的成功，电台在整点前的两分钟将新闻发布出去，并且以"通过收音机你永远会提前两分钟知道消息"的口号来做

---

〔35〕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加速的讨论"中所产生对动态过程不断增强的感觉，其实完全也可以推移到相应的物质可观测的加速过程；这种推移和部分的自治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但是，讨论和"物质的"实际之间存在着的强烈的相互依赖关系，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因而认为加速是一个纯粹的讨论中的现象，而没有物质体验的基础的加速是荒谬的，而且可以被实证证据驳倒。

*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1867—1944），意大利诗人，作家，意大利剧作家，编辑。20 世纪初未来主义运动带头人。1909 年发表《未来主义宣言》。他总结了未来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对陈旧思想的憎恶，尤其是对陈旧的政治与艺术传统的憎恶。马里内蒂和他的追随者们表达了对速度、科技和暴力等元素的狂热喜爱。汽车、飞机、工业化的城镇等在未来主义者的眼中充满魅力，因为这些象征着人类依靠技术的进步征服了自然。——译者注

〔36〕 "每一位像马里内蒂这样的速度热爱者都面对着成千上万的更喜欢河流缓缓流淌、驳船漂流在之上的人。直到在他（指马里内蒂——本书作者注）建议使多瑙河快起来之前，多瑙河从来没有显得这般优雅的缓慢"（Kern，1983 年，第 129 页及其后页；有关马里内蒂参见 Marinetti，1909 年，第 26 页，及 1916 年）。

**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年），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单行街》《经验与贫乏》和《德国悲剧的起源》等。——译者注

*** 彼得·海恩特尔（1940— ），奥地利哲学家。——译者注

〔37〕 Benjamin，1982 年，第 532 页；Heintel，1999 年，第 231 页及其后页。

广告。

尽管如此,去争论究竟什么时间可以确定为最强烈的加速阵发的时间,其实是无意义的,因为一方面,在现代单项的技术和组织的创新会随时出现,并且围绕着生活的动态化的讨论不会在任何时间停止;另一方面是因为革新阵发在运输、生产或通讯等不同的领域并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在研究文献中,对于两个重大的加速波达成了较大程度的共识:第一个无可厚非的是在1900之前和之后的十年,随着工业革命和它所带来的影响广泛的技术创新,几乎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里都出现了速度革命。[38] 因而,维尔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都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间段(1886年和1904年)假想了文化发展的"加速法则",并不是一个偶然。"可以清晰识别的发展是我们现代的文化发展,是不断加速的"[39],西门子解释说,而亚当斯则给我们带来了他的自传体作品《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这是一部有关文化体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观念范例,在其中生活世界里的突然且大规模的变化表现为爆炸性的、暴力的、不可
82 避免的,且受到非个人的力量所左右(亚当斯有些神秘莫测地写道,加速进程往往是受"武力"和"势力"所驱使的)。有一段出自亚当斯的题目为《加速的法则》(*A Law of Acceleration*)章节的较长节选很有说服力,它是关于亚当斯所观察到的19世纪80年代的变化,这里摘录如下:

> 300年以来没发生过如此革命性的变化。尽管人们不止一次地被烦扰,但是在这样的极大的力量的背景下,从来没有被卡住或眩晕。力量从每个原子中踊跃而出,并足以为展示着自己在每个毛细孔浪费物质的星际宇宙提供能量。人们不再能抗拒。武力抓起他的手腕并肆意挥动,仿佛他已经把握住了生命的操纵绳或狂奔的汽车;这是几近精确的真实情况……不可能性不再存在。人们的生活因为不可能性而得以滋养。在那个男孩六岁之前,他看到四件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事实:越洋蒸汽轮船、铁路、电子电报和银版照相

---

〔38〕 Stephen Kern将他的分析集中在1880年到1918年,而哈维跟随其后,因此他将这段时间假设为新一轮的时间—空间—压缩;马歇尔·伯曼支持1900年左右的现代化进程是新的、更高的阶段(Berman,1988年,第17页)。

* 维尔纳·西门子(1816—1892),德国发明家、企业家、西门子公司创始人。——译者注

** 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记者、小说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其著作《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39〕 引自Koselleck,2000年,第178页。

> 技术；他还不知道这四个当中哪一个又最快地催生了其他革新的出现……每天，大自然都会狂暴地造反，引起了极大地摧毁财产和生命的所谓的灾难，显然在嘲笑那些无助地呻吟、尖叫、颤抖却不能让灾难停下片刻的人们。铁路自身就实现了战争的大屠杀，汽车和武器蹂躏着社会，直到一场地震几乎成为神经质的放松。[40]

如同约阿西姆·哈得考（Joachim Radkau）*所阐述的，当新的医学—病理方面的加速讨论出现时，或者说将影响广泛的对速度所诱发的新的病因的诊断，被当做无处不在的加速阵发的可能是最显著的症状时，就产生了（在亚当斯那里可以找到共鸣的）泛滥成灾的对神经衰弱症的讨论，这是紧随乔治·比尔得（George M. Beard）**在1881年所引入的这个诊断类别之后出现的，哈得考因此将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称为“神经紧张的时代”，这些讨论是1900年前后的变化的特色所在。跟随这些迹象[41]，人们也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过渡过程中发现了关于新近大规模的加速阵发的有力线索：从“急忙病”到“雅皮士感冒”直至最 83
近的无处不在地出现在孩子和年轻人身上的注意力缺失症和临床抑郁症[42]，都是对全球化社会中加速的过分要求的反应，对速度所诱发的疾病的诊断在今天不断增加。[43]

因此，有关加速和减速的讨论都一致性地扩大成为对从1989年到世纪之交时候的数字和政治革命而导致的速度提高的反应：时间紧张和加速成为科学普及类媒体和大型日报的小品文中的持久性话题，用以改善时间管理的“时间顾问”和“生活助手”变得非常抢手[44]，与之对立的

---

〔40〕 Adams，1904年，第411页及其后页。

* 约阿西姆·哈得考（1943—），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 乔治·比尔得，美国神经科医生，在1881年最先提出了神经衰弱症这个说法。——译者注

〔41〕 Radkau，1998年；参照Kern，1983年，第124页及其后页。

〔42〕 对于新的加速浪潮的诊断也在社会科学中到处可见，在那里关于它的开始与前面提到的一样是非常模糊的，例如Castells（1996年，第5页）识别了信息技术革命，将它归结为工业革命的一个阶段，认为它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Thomas H. Eriksen（2001年，第2页）与Castells一样也将这同样一次革命理解为加速革命，但是他认为这场革命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段才开始。大卫·哈维（Harvey，1990年，第VII页）非常精确地将新一轮的时间—空间—压缩的日期确定为1972年。也请参照本书第十章。

〔43〕 Harvey，1990年，第287页；Levine，1999年，第52页及其后页；Ulmer/Schwarzburd，1996年，Ehrenberg，2000年。

〔44〕 参照诸如Lothar J. Seiwerts（2000年）已经出版了第五版的畅销书《如果你匆匆忙忙，那么慢下来：在加速的世界里的新的时间管理》。

减速者的诫勉的论调变得更加有力:那些开出自觉地放慢的药方的书籍和运动,例如弗里茨·瑞海斯(Fritz Reheis)*的《慢的创造性》(*Kreativität der Langsamkeit*)或斯腾·纳多尼(Sten Nadolny)**的《发现缓慢》(*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或者还应该提到的《延迟时间协会》(*Verein zur Verzögerung der Zeit*),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以至于彼得·格罗茨(Peter Glotz)***认为从中观察到了新的、显著的对立意识形态的产生。[45]

同时,"后现代"的新文化的辩护士与其批判者一样,都一致认为,社会进程中的新近出现的速度的提高属于独特的特性和驱动性
84 因素。[46]

数字革命和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之下所讨论的变化速度的提高,是否在历史上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或者它们是否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体验变化不同,最终也不会褪色(并且因此只会如同科泽勒克所猜想的那样,加速体验本身成了习惯)[47],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回答的,而且也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尽管可以直接观察到以加速为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有关运输、通讯和生产速度的提高的现象,但是每个加速过程都有累积的效果:相应的过程将变得越来越快。

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加速过程自身的加速,是否恰恰证明了如同西门子和亚当斯所假设的"加速法则"[48],不同的生活领域的加速浪潮出现得越来越稠密,因而变化频率本身也在提高,直到最后变化成为永恒。虽然并不能将这样的变化过程本身理解为技术加速的形式,但是可以当做是社会变革的加速的症状。

对于现代的加速动力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的分析,其必要性在于用以

---

* 弗里茨·瑞海斯(1949—),德国社会学家、非小说类作家。主要著作有《竞争和公平是社会的基础》《慢的创造性》《放慢:告别旋涡式资本主义》。——译者注

** 斯腾·纳多尼(1942—),德国小说家。主要著作有《发现缓慢》《他或我》和《淘气之王》等。——译者注

*** 彼得·格罗茨(1939—2005),德国政治家、社会学家。——译者注

[45] Reheis,1998 年;Nadolny,1987 年;Heintel,1999 年;Glotz,1998 年。

[46] Kay Kirchmann 就媒体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加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与有时念于未来主义而对内在加速持支持论调的保罗·维希留和 Peter Weibel 不同,他针对新的速度发出了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的警告(Kirchmann, 1998 年,第 16 页及其后页)。

[47] Koselleck,2000 年,第 152 页及其后页。

[48] 大卫·哈维清晰地提出了对"地缘政治的危害"的警告,他认为这种危险是时间—空间—压缩所带来的不断提高的速度所导致的,同时如同我们看到的,他将这种压缩本身就定义为加速,因此他假设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加速的加速(Harvey,1990 年,第 305 页)。

说明两个有必要解释清楚的现象。第一个涉及这样的事实，即在现代化进程的中心点上所产生的对于加速和时间紧张的体验，绝对只是技术加速的结果。但是，看上去却完全相反，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前提条件：正如 85
汉斯·布鲁姆贝格（Hans Blumenberg）*、莱因哈特·科泽勒克、海尔格·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或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Marianne Gronemeyer）***等作家所阐述的，从历史的经验领域和期望的地平线相互交织中所生发出来的是对启蒙的不耐烦和与之相联系的“姗姗来迟的理性”的、有关进步的、可加速的历史的观念，是跟随其后的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的胜利的建设性的前提条件。[49]

科泽勒克因而令人印象深刻地追踪了自 1750 年左右，在新的、“时间化”的历史理解形成过程中，对（世俗）社会的和历史的加速（它们的根源无疑是古老的末世论的期待中的一部分）的感知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个基础上历史的“经验领域”和对未来的“期望的地平线”会逐渐分离。虽然是完全独立于以上的思考，但是却与之达成一致的是马歇尔·伯曼和大卫·哈维的研究，他们将现代性的动态化的起点或者说时间—空间—压缩的起点放在文艺复兴时期。[50] 因而，动态化和加速的原则看来从一开始就是现代文化的本质，这要早于它们体现在物质的结构中。

同样的时间方面的相互关系很有趣地揭示了已经很突出了的加速的“对立面”，这正是有必要进行解释的第二个现象，即与加速相伴的广泛存在的对凝固过程的体验。这不仅在理论导向的概述和时间诊断中可以找到，而且也似乎作为随着现代性的推进而不断被加强的潜台词，包含在文化方面的证明和自我观察中。对静止状态的体验看上去不仅 86
与不断加快的变化速度和行为速度的感觉同时出现，而且也正是它的对立面的补充。因此大概在工业革命开始前很久，这种体验就出现了，而

---

* 汉斯·布鲁姆贝格（1920—1996），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世界的可读性》《一生时间和世界时间》《现代的合法性》等。——译者注

** 海尔格·诺沃特尼（1937—），社会学家，曾任欧洲研究委员会（ERC）主席。——译者注

*** 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1941—），德国教育学家、作家。主要著作有《需求的力量》《简单的真相：你为什么不相信》《生命作为最后的机会》。——译者注

〔49〕 Blumenberg，1986 年；Nowotny，1993 年，第 47 页及其后页；Gronemeyer，1996 年。参照 Koselleck，2000 年，第 157 页：“在蒸汽机、机械织机、电报、使纺织生产业和信息传递加速的交通工具被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整个生活领域的速度加快，这一点也是属于……我们对于时代界限的发现”（楷体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添加）。

〔50〕 Berman，1988 年，第 17 页；Harvey，1990 年，第 242 页及其后页。

且明白无误地出现在现代的地平线、有关感伤主义的文化和讨论中,齐美尔正是将感伤主义看做是"紧张的生活"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增多"所导致的加速症状,在这种("黯淡的")愁绪中出现的明显的反症状,在它的侵袭下(应该更确切地定义为"过度紧张的感伤者")就会进入失去了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真空的麻痹和静止的状态。[51] 这种体验在19世纪后半叶换了一种表达方式又更强烈地回来了,因而导致了风气颓废的*19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出现,以及尤其是在文艺圈子里广泛蔓延的*无聊的*(*L'ennui*,*Langeweile*,*boredom*)感觉,而与此同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却的确发生了飞快的变化。"在制造业和工程中力量仿佛被肆意消耗……这是世界历史上最繁忙的世纪,但是也同时忍受着衰弱的痛苦、遭受着失眠的病痛。"[52]

*无聊的*不仅对波德莱尔来说正是那种要求全心全意委身于稍纵即逝的时刻当中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对于尼采来说,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急速变革的背后总是能够看到同样的事情永远在重复,并且他将现代社会文化上的加速趋势理解为对在这个社会中不断蔓延的无聊的逃避。[53] 在20世纪初期,同样的症状成了加速疾病*神经衰弱*(*Neurasthenie*)的特殊的表现形式;早在1836年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就将这种症状定义为"厌世病"[54],而哈得考用了
87 新的名称来表示20世纪初期的病症(或主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停滞的或静止的时间的体验、作为对"飞速时间"感觉反面的、对充满含义的过去范围和将来范围的瓦解的体验,都在通往21世纪的过渡过程中的所有层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病理症状的临床性抑郁,在后历史讨论中以哲学推理形式表现出来,最清晰的可能是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在《X一代》(*Generation X*)中用文学的语言所做的阐述——这本书被《法兰克福汇报》(*FAZ*)归为"晚期现代的教义问答书"和"讲述世纪末真相的书",同时也创造了用以描述整整一代人的

---

〔51〕 参照诸如Schings,1977年;也请参看本书第十一章"3"。

〔52〕 Conrad,1999年,第17页;有关对愁绪的社会的—哲学推理的和历史的陈述也请见Lepenies,1981年。

〔53〕 有关辩证地涵盖了从急速的变化到简单的静止状态的内容也请参照Frisby,1988年,第11—37页。

*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法国剧作家、诗人、小说作家。主要作品有《罗拉》《四夜》《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故事》等。——译者注

〔54〕 参照, Conrad, 1999年,第17页; Rad kan, 1998年。

** 道格拉斯·库普兰(1961—),加拿大小说家。主要著作有《X一代》等。——译者注

社会学特征的关键词[55]；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理论似乎证明了变革和停滞这对矛盾即将同时出现，他为我们提供了（晚期现代的）“历史中毒”的不同症状的定义：“历史性的剂量不足：生活在一个似乎什么都没发生的时代。主要的症状是：对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报道节目上瘾。历史性的剂量过量：生活在一个似乎发生了太多的时代。主要的症状是：对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报道节目上瘾。”[56]

这一切都已经足够清晰地指明了，加速和现代化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而且错综复杂，而速度提高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并且相互矛盾。因此，我将在下面两个小节中转向这个问题，即能够为现在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传统提供什么样的概念化的建议和切入方式，以便能够在现代的背景下系统地理解和确定可以看得到的动态化的过程。 88

2. 现代化、加速和社会理论

（1）古典社会理论和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加速

社会学学科的出现和确立是对社会关系的流动化和动态化的基本体验、对社会关系的速度结构所发生的革命的非常重要的反应，并且，被称为这个学科的“创建之父”的韦伯、涂尔干、齐美尔以及人们也愿意纳入其中的滕尼斯*所进行的社会学的分析，正好产生于那个时期，即在前面的章节里证明可能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加速阶段，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些分析是对现代性的分析，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57] 现在在这里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社会学“经典”中的那些构思，对系统且明确的现代性加速过程，它的原因、表现形式和结构的分析有哪些贡献。在古典社会学的思考中，体现了将对现代的详细的文化方面的基本体验放置到现代化的结构化变化过程中去的尝试。这其中有意思的是，我们首先从学科创建人那一代退后一步，回到有关现代性的社会理论的另一位祖先——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那里。

马克思对于在19世纪在所有的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出现的完全

---

〔55〕 详细内容请参照 Rosa，1999年c；也请见 Rushkoff，1994年。

〔56〕 Coupland，1991年，第17页。

* 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共同体与社会》《现代精神》《所有制》、和《社会学的研究与批评》等。——译者注

〔57〕 参照诸如 Frisby，1988年，第2页。

是令人震惊的变动化和动态化的体验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这一点在马歇尔·伯曼从《共产党宣言》中所引用的一段话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根据这段话,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的现代,一切社会等级和常设的机构都已经消失和变化了、已经"蒸发了"。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
89 看到其中的原因,似乎必然要将持续的生产工具的革命,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常设结构及所制造出来的东西的灭绝写进这样的生产形式中。在这当中,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找到了所有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原则,并且通过这些原则找到了社会加速的历史性的新形式,因为所有更老旧一些的社会经济结构趋向于反对资本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将变革优先于停滞是建设性的,而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将一次性创建的生产关系确定为静态不变的、将其归顺而且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不变:

> 如果没有生产结构以及生产关系,还有整个社会关系持续地变革的话,资产阶级不可能存在。相反,旧有的生产方式的保持不变是所有更早前的工业阶级的首要存在条件。生产过程的持续变化、所有社会状态的不断震荡、永恒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是资产阶级时代的首要标志。所有固定的、生了锈的关系和由这样的关系所产生的古老且受尊敬的观点和直觉都将消解,所有新成立的事物都在它们僵化之前变得过时了。一切社会阶级和常设机构都蒸发了,一切圣洁的都被玷污了……[58]

因此,事实上在马克思对历史及资本主义的分析中,现代化进程表现为加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区分为两种可以单独分析的加速原则。对于第一种,众所周知,马克思支持动态地理解历史,根据这个观点,历史的发展是以一直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和与之相应地发生着变化的(也就是说,时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时而阻碍,然后对其进行革命)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展开的。资本主义从其自身当中——而不需要超越自身,动态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并且使之加
90 速,最终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使历史的进程加速:"资产阶级在他们的不到一个世纪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所有世代总和还要更多、更庞大的生产力。对自然力量的征服、机械化,在工业和农业中使用化学技术、蒸汽船、铁路、电子电报,对世界所有地方的开垦、所有河流的通航,

---

〔58〕 Marx/Engels,1986 年,第 37 页及其后页。

从土地上轰轰烈烈走出来的大量人口——难道几百年前，这些生产力正在社交活动的怀抱里昏昏欲睡吗？”[59] 因此，马克思的估计对于科泽勒克所观察到的“时间化”的历史概念的发展来说正是典范式的例证，在这样的发展中，历史自身具有方向，并且似乎成了集合性主体——而这正是历史能够（并且使自己）加速这个观点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形象建立在线性的历史时间的观念基础上，这样的时间观或多或少是“闭合的”，即朝着可以预测的未来前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独一无二的变化动力的观察因而是与认为存在着历史的终极目的的假设无关的。

完全独立于历史的维度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时间作为一种资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因素，并且因此也是紧缺品：因为时间的赢得可以全部直接转换为生存必需的（特别的）收益，因而时间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中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变为金钱和（发展过程、生产过程和周转过程的）加速，因此也就成为卓越的竞争因素。[60] 由此在很大程度上 91
解释了技术—工具上的（在运输、通讯、生产和组织领域的）速度加快和为实现现代社会的加速要求而导致的资本周转速度的提高，以及因此产生的对待时间的方式的变化。在这里完全可以确定，马克思的预测事实上提供了解释三种加速形式的出发基点，即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主要是永久的生存不确定性、经济上的竞争和归顺于在机器的时间要求下的工作所导致的）生活节奏的加速；尽管加速在马克思的以社会阶级对立的基本矛盾为中心的理论构成中只是次要的和未经充分发展的一个侧面。因此，有关加速的系统性的理论，无疑有助于认真对待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分析中的认识，并且对其加以运用。

正如我将在第八章中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设立的增长和加速的提高原则，完全会对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产生文化方面和结构建立方面的影响。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的论文集的前

---

〔59〕 Marx/Engels，1986 年，第 39 页。有趣的是，将 Elmar Altvater 的诊断与马克思的观察进行比较。Altvater（2002 年，第 285 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首先注意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伴随着高速度并因此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发生的剧烈的变化”是在“此前的人类的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中从来不曾有过的”。在他的时间诊断中，他从无阶级的未来看到了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丧失，这不再是加速着的历史自身的产物，而是（无目的的）社会变化的结果。

〔60〕 参照 Marx，1972 年，特别是第 1（第 1 节）、10、15（第 3 节）、17、19—21 章；Postone，1996 年；Giddens，1987 年 a，第 149 页及其后页，以及 1995 年 a，第 129 页及其后页。

言中也思考了这个问题,在他的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的研究背景下,他将资本主义确定为"我们的现代生活的最能够决定命运的力量"[61],同时他也阐明,应该在分析现代的速度结构时提防鲁莽的经济简化论。众所周知,韦伯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行为动机,并且证明了在我的这项研究的导论中所提出的理论,即在韦伯的有关资本主义伦理的研究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指
92 出,一个社会的速度结构——在其中系统—结构的要求和行为者的导向结合在一起,是与经济形式相匹配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行为,是马克思所定义的随着时间导向的变化而变化的结构逻辑,它不能被简化为只是经济方面的。

对于韦伯来说,被看做是紧缺品的时间也是这种伦理道德最重要的核心特征。在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一开头就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那句非常有名的祈使句:"记住时间就是金钱。"新教伦理的无条件的命令与资本主义伦理的一样,将"尽可能有效地利用时间"作为义务,要系统地杜绝时间浪费和闲散懒惰,应该仔细地计划将度过的时间。因而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的这种以没有休息和不停息的基本体验,与通过系统地消除暂停和缺勤而实现的生活节奏的加速,以及在生活方式中将时间无条件的经济化,是原始(加尔文教—清教)新教的和后来世俗化了的心理状态所产生的后果,将某一次失去了一秒钟当做失去了永远,并且,损失时间是"所有罪恶中最致命的",因而,将生活方式通过类似时间禁欲主义加以系统化和纪律化,是现代生活安排的核心要素。[62] 时间纪律更多的是从文化的前提条件这样广泛的背景中显现出来,因而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后果。我将详细地

---

〔61〕 Weber,1991 年,第 12 页。

*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外交家、发明家,同时也是出版商、印刷商、记者、作家、慈善家;富兰克林曾经进行多项关于电的实验,并且发明了避雷针。他还发明了双焦点眼镜,蛙鞋等等。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共济会的成员,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也是美国首位邮政局长。——译者注

〔62〕 韦伯(Weber,1991 年,第 167 页及其后页)试图指出,苦行僧主义的时间方向是如何在清教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他引用了长老会信徒 Richard Baxter 的教义,教义将"浪费时间……"当做"首要的和原则上最严重的罪恶"。一生的时间"对于确立自身的(恩赐的——本书作者注)使命来说是极其短暂和珍贵的。通过交际、'东扯西拉地聊天'、享受,甚至也包括睡了多于健康所需要的觉——六个小时、最多八个小时就足够了——而导致的时间浪费,绝对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讨论现代加速过程的驱动源泉的文化维度。 93

在社会学的古典部分的背景下探寻社会加速理论的起点是特别有趣的，对于韦伯来说，新教—资本主义的对时间的高度重视也是一个广泛的（并且是加速的）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即西方的根本的合理化进程。[63] 这个进程的本质是通过对目标—工具—关系的缩短和提高有效性从而实现占主导地位的目标合理化，因而韦伯将它完全作为加速过程来理解，即通过将必需的步骤最少化，或通过所使用的工具的效果等级的提高以达到加速目标实现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合理化意味着，在更短的时间里（并且用更少的投入）能够做到更多。因而我将指出，时间单位的数量的增多是加速的最抽象的、通用化的定义。根据韦伯的看法，效率和速度的提高，是合理的西方社会的官僚[64]、法治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组织机构形式和统治形式的突出特色，也是它们在历史上优于所有其他社会形式的原因。因而，对于韦伯而言，加速原则也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心，当然尽管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发展了社会加速理论。

韦伯对现代性的分析认为，社会过程的集中合理化与社会分工的发展，或者说社会的功能和价值领域的分化的发展——这是爱弥尔·涂尔干对现代性理解的核心，有着固有的联系。涂尔干的研究第一眼看上去几乎没有为加速理论和现代化进程的新的确认提供切入点，但是进一步仔细了解会看到，他集中探寻了社会整合的新形式、社会团结，还有激励了其他经典研究的社会理论的基本体验，即对由于社会联系[65]变得稠 94
密而带来的令人震惊的动态化的、破碎的和“加速的”社会的体验。在涂尔干对匿名的分工的分析中，他将分工看做是现代性的分化过程的重大危害，并将社会匿名定义为过快的社会变革所产生的一个后果——由于过高的变化速度，社会的相互依赖的意识和规则都被侵蚀了，却没有能够及时地建立起社会整合的新形式。因此，社会的问题不是在于社会变革和不断增加的分化，而是它们（太）快的速度。[66]

---

〔63〕 Weber，1972 年；参照 Schluchter，1998 年。

〔64〕 参照 Weber，1972 年，第 129 页以及后页和第 570 页及其后页；此外还有 Segre，2000 年，第 154 页。

〔65〕 参照《社会分工论》（*Über soziale Arbeitssteilung*）第二部的第二章，在那里面涂尔干将社会大众各部分之间的不断增多的“交换活动”和他们之间“因此产生的积极的联系”，看做社会的“动态的或道德的”密度的增加，并且解释了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的主要原因和驱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原理（Durkheim，1988 年，第 314 页和 315 页）。

〔66〕 同上出处，第 421—425 页。

涂尔干所关注的是这个问题:鉴于持续的加速和社会关系的碎片化,如何使社会秩序和稳定性成为可能。但是,他的思考既没有给出关于加速体验的系统的文化理论方面的解释,也没有对加速体验的社会文化结果进行分析。因而,有涂尔干的印记的系统理论被遗留给了尼克拉斯·卢曼和涂尔干的支持者,系统理论分析了功能上的分化所带来的时间上的结果,并且指出了分化过程和加速过程之间的系统化的内在联系。根据卢曼的观点,系统结构和时间结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随着现代功能体现的分化,它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也区分了过去和未来。[67] 卢曼因而同意科泽勒克有关"时间化"或者说存在于现代的时间的动态性的见解,即时间化不仅是结构性分化的结果,也完全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出现,时间结构也迅速向着更高的时间复杂性的方向变
95 化……因此,我们必须从每个社会结构和每个概念都发生着结构重组出发"的根据。没有什么事物仍然保留着以前的含义。尽管在机构或专有名词上应该有形式上的连续性,但是在这其中只是隐藏着这样的事实:每一个形式都有着高度的偶然性和高度的选择性。[68]

根据卢曼的观点,通过能够反映功能分化的社会的特征的"综合性的时间化"——有关这一点我将在第八章的第 3 节谈到,它可以被理解为现代加速进程的第三个结构性"引擎",不仅导致时间地平线的不断缩短,并因此很可能导致"进化过程的加速,而这一点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发现有先例的"[69],而且也引入了那些在系统的时间结构中尚有争议的非同时性。卢曼强调,对这样的发展变化进行系统的分析对于理解现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指明,时间理论的概念体系对于这个任务来说是相当不发达的。

> 我们必须能够估计,在我们的社会的不同的次级系统中我们能够容忍时间结构的异质性的程度;缩小的家庭的时间地平线与经济有什么样的关联,以及我们如何逃脱增长的经济中的时间观念对于政治系统所产生的众所周知的负面影响,了解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在处理这些问题或者对它们的回答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是很难进行判断的。系统理论是看上去唯一一个有足够的复杂性的

---

〔67〕 Luhmann,第 119 页及其后页和第 139 页。

〔68〕 Luhmann,1990 年 a,第 122 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添加;相应地也请比较第 137 页,卢曼在那里将时间结构的变化理解为社会变迁的结果。

〔69〕 Luhmann 1990 年 a,第 143 页。

概念框架。直到现在，系统理论只是使用非常简单的有关时间和未来的按时间顺序的概念，而且未来只是被看做系统在某一个晚一些的时间点上的状态。[70]

遗憾的是，尽管卢曼重申了有关时间性对于理解社会系统的根本重 96
要性的判断，但是他没有开发出相应的时间理论。不是他，而是阿明·纳瑟黑（Armin Nassehi）*描述了“社会的时间”，在那里加速不再只作为一个关键词出现。与卢曼所希望的系统理论的时间概念相反，这个时间概念将时间构建为在系统运转中过去和未来的差异，并且只有通过观察才能从时间顺序上得以次级的把握[71]，它并不能胜任开发加速理论，因为它所用的区分方式使得对时间结构的历时变化的分析变得更困难，而不是更简单。在他们关于综合体的时间化的思考以及通过伴随着系统分化的时间短缺所产生的“迫切需要期限”的社会决定所产生的影响的思考[72]，使得系统理论向加速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此我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还会继续进行讨论。

社会分工和功能分化也在个体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必然的相应结果，这是现代化进程的非常清晰的特征，也是乔治·齐美尔的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和深受他的影响的社会学的中心所在。对于齐美尔来说，大城市被描述为现代性的典范性的地方，同时也是最极度个人化的地方和有着 97
最先进的分工的地方，并不是个偶然。[73] 齐美尔比韦伯、马克思或涂尔干更强烈地将这个过程回溯到现代性的文化经历，对于他而言，在对社会交换过程和所有的社会关系的永不停歇的动态过程方面的增长和加速的扣人心弦的感觉中，文化体验是占主导地位的。齐美尔在他的那篇

---

〔70〕 Luhmann 1990 年 a，第 137 页及其后页；参照 Luhmann，1980 年。

* 阿明·纳瑟黑（1960—），德国社会学家，是社会学杂志《社会世界》的共同出版人。主要著作有《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与 George Weber 合著）、《社会学导论十讲》《理解社会：社会学考察》等。——译者注

〔71〕 与之相联系的观念是，时间与其说发生在（抽象的或“绝对的”）时间里，不如说时间自身（和与之相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地平线）产生了时间，这个观点目前在不同的学科专业（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中趋于共识（参照 Adam，1990 年；Nowotny，1993 年，第 135 页及其后页；Bergmann，1983 年，第 496 页及其后页）。这个见解对于社会学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完全不清楚。在对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的历时性变化进行分析时，似乎从那当中无法得出系统的知识。我认为，它在现在的流行性更多地应该归功于晚期现代的“时间的时间化”的现象使个体生活和历史承担了去时间化的重负，正如我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所阐述的，这本身就可以理解为社会的超级加速的后果。

〔72〕 Luhmann，1968 年。

〔73〕 Simmel，1903 年；也请参照 Frisby，1988 年，第 77 页及其后页。

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论文的一开篇就用到“大城市的个体化”这个概念,他写道,大城市和精神生活以

> ……紧张的生活的增多为根本特点,这种生活是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印象的快速而连续的变化所导致的。人类是有区分能力的物种,也就是说他的意识会通过区分目前的和之前的印象而受到刺激;不变的印象、微不足道的差别、因循惯例的程序和它的对立面所需要的意识,可以说要少于包含着快速变化的图片所需要的,这些图画之间截然不同,抓住了人们的视线,它们的不可预期性为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大城市通过穿行于街道之间、经济、职业及社会生活节奏和形形色色而具备了以上那些心理条件,因此大城市决定了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意识的组成部分;由于我们作为具有分辨力的物种的组织结构,大城市对我们的要求与有着缓慢、熟悉、固定不变的节奏的心灵—精神生活的小城市和乡村生活完全相反。[74]

与上述鉴定一致,齐美尔在1897年出版的《论货币对生活节奏的影响》(*Vom Einfluß des Geldes für das Tempo des Lebens*)中——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在《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一书最后的中心章节[《关于生活的方式》(*Vom Stil des Lebens*)]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述,他将生活节奏定义为对每个时间单位的意识内容的变化的“总和和深度”[75],并且因此强调,现代社会的速度有了更强劲的而且不停歇的提高。

98

事实上,所有从齐美尔的作品中所引用的、似乎是体现了“心灵一致性”的元素——现代生活在这些要素中是与以前的时代不同的,通过它们的不断提高的动态性和活动性表明:根据齐美尔的观点,相对于在缓慢的乡村,在快速的城市中,占优势的是对静态的变化缓慢的情感生活的动态性的、灵活的理解,这意味着从固定和牢固的传统与联系中脱离出来的动态的个人主义与旧日的除了数量增加之外其他变化缓慢的集体组织之间的对比,而这些都表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且因此对某个联合体、价值观、行为“失去特有的忠诚”,并且与之相联系地产生了对变化多端的不同模式的速度的偏爱。[76] 齐美尔将所有这些趋势与现代

---

〔74〕 Simmel,1903年,第116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出自原文。

〔75〕 Simmel,1897年,第215页;Simmel,1900年,第696页。

〔76〕 参照Simmel,1900年,第675页。

的货币经济的普及密切联系起来，他认为现代货币经济同时表现为社会加速的原因和（栩栩如生地在毫无阻力的“滚动着的硬币”中的）[77]表现。现代的金钱往来方便、增加、加速了社会的和经济的交易与金融循环，并且因此也似乎是调度了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一切带来的结果就是，货币表现了多大程度的生活节奏的提高，就说明有多少数量上和种类上的影响和刺激被注入并且相互交替”，齐美尔总结了他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和生活节奏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并且继续写道：“货币汇流到一起并且……积累起来，个体的利息和利息本身……以它所表现的价值形式聚集起来……即最多种多样的形式集中在最小的范围内，因此货币的趋势和能力能带来心理上的成功、生活的多姿多彩和充实，货币的趋势是提高生活节奏。”[78]

齐美尔因而赞同波德莱尔将现代鉴定为暂时且易逝的体验，并且从功能性分化，尤其是货币的影响方式中对现代进行解释。[79] 但是，现代 99
化对于齐美尔而言，首先是个体的个性结构的重塑，个体在现代的加速的苛求下作出改变他们的情感收支和感觉结构、他们的“神经生活”和情绪与理性的关系的反应。这是齐美尔在一篇关于艺术家罗丹*的论文中对现代的本质特别掷地有声的判断的基础，他在那篇文章中写道：“现代的本质根本上是心理学至上论的，因为对世界的体验和释义实际上是根据我们内在的反应和完全是将固定的内容溶解为精神的流动元素的内心世界，从一切物质中提炼出来的，因此现代性的特征的表现形式就只能是运动的形式。”[80] 因而，齐美尔将现代化的进程理解为在运动和停滞[81]的普遍原则之间的不断切换着的、有利于前者的平衡，并且因此也是有利于永恒的变动而导致的固定节奏的消失，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齐美尔来说，货币是“世界变动的绝对特性”的象征性的宣言。[82] 个体一方面以自命不凡和漠不关心面对世界的内容从而对这种延伸作出反应，但是，另一方面，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也是以持续的过度敏感、对

---

〔77〕 Simmel，1900 年，第 708 页。

〔78〕 Simmel，1900 年，第 706 页及其后页。

〔79〕 参照 Frisby，1988 年，第 38 页及其后页。

* 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除雕塑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插图、铜版画和素描。他还写过几部著作，主要著作有《艺术论》，主要雕塑作品有《沉思者》《维克多·雨果像》《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像》等。——译者注

〔80〕 Simmel，1919 年，第 185 页。

〔81〕 Simmel，1897 年，第 230 页及其后页；1900 年，第 711 页及其后页。

〔82〕 Simmel，1900 年，第 714 页。

永远是新的且更为极端的体验和令人兴奋的刺激的渴望[83]——简言之就是各种"神经衰弱"的症状——作出反应,根据与齐美尔同时代的特洛尔奇*和阿特曼**的观点,齐美尔清楚地指出了人们的个性。[84] 因
100 此,齐美尔从所有社会学经典中最强有力地将加速的观点放在他对现代的鉴定的中心,但是没有为独立的理论加工作出贡献。他的有条理的研究客体领域补充了他的体系化的中心,而尚不完整的并且有时简直是"印象主义的"研究,更多地构造了变动中的个性结构或个体化的矛盾的过程。

通过从"经典"的解释建议中穿行所带来的结果是发现直到今天他们的将现代化看做个体化、合理化、分化、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导致的对大自然掌控的力量的加强的过程以及这一切的共同中心,都对社会生活中巨大的加速、变化和动态化的体验的观点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同时也提出了对每一个现代性的基本体验的答案和系统化解释的尝试。时间结构的变化本身尽管在所有的领域都被作为研究主题,而且似乎是作为动机发挥作用,但是却没有一位作者将时间结构的变化放在现代化理论的系统中心,而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可能发生的是,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中占优势的"去加速化"研究的继续发展的背景下,加速过程在与其他过程的对峙过程中会进一步失去价值,并在后来的现代化理论中实际上不再扮演任何角色。

因此,回顾同一时代的社会理论,可以看到,出乎意料地突然发现几乎可以看做是加速理论的彻头彻尾的错误。在围绕着现代化的其他基本趋势,围绕着对合理化过程、分化过程、个体化过程和(在工具理性的发展和制度化的意义上的)驯化过程的确定和解释,展开了或将要展开泛滥的历史角度的、实证的和分析导向的讨论过程中,仅是针对加速这个侧面,我就发现有大量以现象为导向的对动态化的表现形式

---

〔83〕 "精神中心的确定性的缺乏导致不断从新的刺激、轰动的事情、特别的行为中寻找短暂的满足;因而我们被卷入了混乱的事物和永无停息,这些很快就表现为大城市的喧嚣,旅游成瘾症,疯狂地追逐竞争者,在品味、风格、品质、关系等领域的现代特有的忠诚丧失"(Simmel,1900 年,第 675 页)。

* 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德国新教神学家,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神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基督教理论与现代》。——译者注

** 塞缪尔·保罗·阿特曼(Samuel Paul Altmann)(1878—1933)德国政治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19 世纪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发展》《金融学》等。——译者注

〔84〕 参照 Frisby,1988 年,第 75 页及其后页;Radkau,1998 年;Simmel,1903 年。

和影响方式的个案研究，这些个案来自于媒体[85]、劳务市场[86]、新的信息技术[87]、经济[88]的领域等，对它们进行了科普式的或文化历史角度 101
的观察[89]，这些研究在对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的和结构的分析中，并没有系统地指出和确定现代化的趋势。[90]

在这其中保罗·维希留、弗里茨·瑞海斯和凯·基尔希曼（Kay Kirchmann）*属于少数的例外，这三个人都将对社会加速的理论确定作为目标。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有选择地讨论他们的思考，不过这些思考对于系统地理论化出于不同原因的社会加速来说是不够的。维希留的将"速度学"创立为（不断提高的）速度的科学的要求和尝试，毫无疑问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最卓越的开端。对于维希留而言，不仅现代性，而且全部的世界历史都应该被重新理解为加速历史，速度似乎应该是历史的主体。他的历史性的重构因此是了不起的政治，因为他认为加速过程中重要的驱动契机通常能够导致*较快者的优势*[91]：由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力量主要是运动的力量*，这首先可以从围绕着统治权而进行的军队和军事技术的战斗就是围绕着达到更高的速度而不断进行的战斗中得以证明。这样的战斗其根本就在于"速度革命"[92]，维希留也是这样理解工业革命的，并且在工业革命的过程当中，（人体和动物体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将被新的、一直可以不断提高的"技术的"速度所替代。

通过运输革命、传输革命和刚刚开始的移植革命（也就是说通过基因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导致的身体和机器的机能上的融合而带来的速度提高）的前赴后继的加速浪潮，同时导致了时间对空间的胜出[93]：*空间* 102
时间的决定性被速度空间所代替，行为协调和社会的整合更多的是在时间当中并通过时间进行，而较少地通过空间进行，并且*编年政治将比地缘政治更重要*。维希留的思索有着很大的倡议潜力，尤其是在围绕着对

---

〔85〕 Schneider/Geißler，1999 年；Weibel，1987 年。

〔86〕 Sennett，1998 年；Garhammer，2001 年。

〔87〕 Myerson，2001 年；Eriksen，2001 年。

〔88〕 参照 Backhaus/Bonus 的研究，1998 年。

〔89〕 例如 Gleick，1999 年；Gronemeyer，1996 年。

〔90〕 批判性的文献综述请见 Rosa，2001 年 a。

* 凯·基尔希曼，德国传媒学专家。

〔91〕 请特别参照 Virilio，1980 年，也请参照 1998 年 b。

〔92〕 Virilio，1980 年，第 61 页及其后页。

〔93〕 请见 Virilio，1993 年，第 7 页及其后页和第 17 页及其后页；也请参照 Breuer，1988 年。

技术加速的结果和军事—政治驱动力的整合或者围绕着对互相补充的加速趋势和凝固趋势的解释,维希留的诊断指出,加速的逻辑上的消失点和终止点是在完全的凝固状态、在突然的静止状态。[94] 我将从这两个方面回到对他的理论的讨论上来。从维希留的著作中不能找到加速理论的系统的基础,因为他完全拒绝系统的理论构建,相反他的作品实际上是跳跃—联想式的,并且积聚了大量的新造词、捉摸不透的分析和让人感觉过分深奥的引述;但是另一方面,他与此同时也"无师自通地"有意识地放弃了与已有的社会理论的联系。对我来说,这其中最重大的异议在于,维希留的研究一直是概念式的缩略状态,因为他只从技术上的速度提高来把握加速,而没有为加速的另外两个、应独立分析的层面——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留下明确的位置。

弗里茨·瑞海斯的畅销书《慢的创造性》是在心理学和生态学的视角下,对现代社会的加速的过分要求提出了批判。瑞海斯在三个按顺序排列的基本体系的"系统理论式的"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对他的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结构走向功能失调的观点的分析。环境或者
103 说是自然体系是塑造所有社会进程的全面的系统,它们也是第二个层次——文化/社会体系——的基础,也就是说既确定了"个体的"生理体系,又是个体的心理"体系"的前提。在一个位置发生的变化往往会对其他两个系统产生影响,当然在那里变化的速度和系统的(相对论中的)原时是不一样的:个体比社会能够更快地变化和适应,而自然界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产或修复它的资源。因而,这本书里的这个与马克思的观点相联系的"生态—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95]强调了,被解除束缚的(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核心元素的)资本主义伴随着它的建立在利润法则基础上的所固有的加速强迫,忽视所有三个层面原本的节奏和它们的原时,并且对它们自身和相互的适应能力及自适应能力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且不再同步,因此在三个系统之内和它们之间出现了功能失调的表现。[96] 瑞海斯在他对加速动力本质的分析并不是按照马克思的思路的,因为他只将加速动力简单地看做是资本发展逻辑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对加速顺序和加速界限的理解也是非常有选择性而且单方面

---

〔94〕 Virilio,1998 年 a,维希留有关"第二宇宙速度"的思考请见 Virilio,1997 年,第 119 页及其后页。

〔95〕 Reheis,1998 年,第 35 页及其后页。

〔96〕 同上书,第 62 页和第 83 页。

的，他将这些统一称为“生病了的人们、衰退的社会和枯竭的自然”。[97]

基尔希曼在他对社会过程的加速和现代社会的媒体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系统的研究中，最终与诺伯特·伊里亚斯的研究联系起来了，基尔希曼将这两个方面理解为现代的文明进程中的两个互补的元素。[98]这项研究也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洞见，但是这项研究作为传媒学的研究，只是集中在对传媒加速这个方面的分析，目的是作为系统地理解社会加速的原因、表现形式和结构的基础。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探讨的尤其是，在媒体、文明进程的相互作用中，是什么作为密集过程和速度最终驱 104
动了增长机制。

我的这项研究的目标在于，能够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证充分地确定加速过程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的功能、影响范围和重要性，以及它的界限和结构；根据目前的理论的发展状况，以这一章所引用的社会学的有关现代化的经典理论为基础，从找到系统的起点入手，是最有前景的。

（2）加速和现代化：系统化的尝试

到目前为止，所有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难题产生于现代的变化过程及对其进行分析的视角所具有的异质的而且部分矛盾的多样性。只有对于范德罗（Hans van der Loo）与范雷京（Willem van Reijen）[99]显而易见地建立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著名的去时间化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上[100]的建议加以拒绝，我才有可能实现在社会文化的、文化的、以个性结构为导向的（或主体中心的）以及最后以社会里的自然的关系为导向的视角之间进行区分的系统化的目的。然后，才能从根本上从这四个层面研究社会的构成和发展。将这些视角与前面的段落概括地联系在一起就能看到，现代化进程从文化上来说可以或已经被理解为合理化过程、从（社会）结构来说是分化过程、从主体占主导的自我关系或个性类型的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个体化过程，而鉴于自然的关系则是工具化过程

〔97〕 对 Reheis 详细的批评请参照 Rosa（2001 年 a，第 350 页及其后页）。

〔98〕 Kirchmann，1998 年。

〔99〕 Van der Loo/van Reijen，1997 年，第 30 页及其后页。

〔100〕 参照 Parsons，1971 年，第 4—28 页；也可参照 Adriaansens 的解释，1980 年。

105 或驯化过程(参照图 2-1)。[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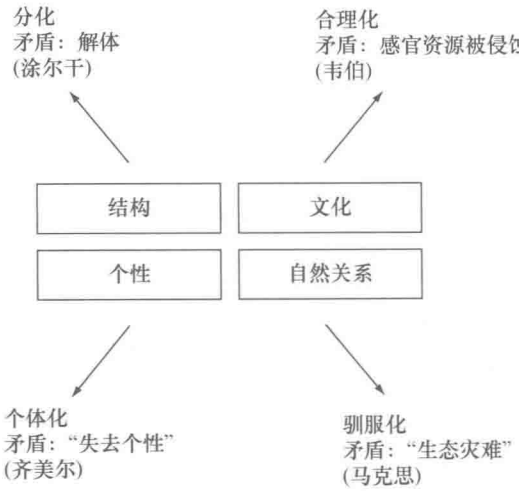


图 2-1 现代化进程 1

在社会学经典研究以及追随其后的同时代的研究中,至少有一个视角被作为处于中心位置的主导视角。例如,马克斯·韦伯首先将现代化理解为合理化的过程,并且合理化过程也构成了现代的规划的中心——尤尔根·哈贝马斯和他的支持者就是这样定义的。[102] 相反,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分工的过程和功能分化的过程不仅在涂尔干的研究中处于中心位置,而且也是同时代的系统理论的中心。而个体化作为社会的趋势,在今天的当代研究中,诸如在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或

---

[101] 另一种用于区分制度化的现代化维度的分析网格是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Giddens,1995 年 b,第 75 页及其后页,并参照 1996 年)。工业化、资本化、民族国家的监控机构的形成,以及武力垄断的军事组织的发展构成了现代的主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与他自己曾声明——时间结构是他的结构理论的基础(1995 年 a,第 90 页)——相反,也与他的关于增长的时间—空间—距离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脱离"的结果的观察相反,吉登斯在他的现代的基本结构类型中并没有关注时间结构。因而吉登斯的研究不足以作为在现代背景下的社会加速的系统理论的出发点。他所区分的资本主义维度和个人主义维度,在我的模式中都是作为驯化过程的要素(它们与自然共同确定了社会交换过程的形式);与此同时,我将在第九章讨论的民族国家和军队问题,尽管它们在释放现代的增强动力中扮演着"助产士"的角色,但是并不能当做是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

[102] 主要参照 Habermas,1981 年,也包括 1988 年。

* 乌尔里希·贝克(1944—),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风险社会》《反毒物》《生态启蒙》和《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译者注

格哈德·舒尔茨(Gerhard Schulze)**的时间诊断中占据中心地位——在此之前乔治·齐美尔就已经将它作为中心议题。对自然的加工方式和自然的变化形式,以及它们为社会的和个体的特性带来的影响,最终构成了卡尔·马克思的现代分析的出发点,并且启发了其他社会研究者。从这个思路出发,现代化首先表现为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趋势,它将(内 106
部的和外部的)自然工具化,并且因此将其驯服,也就是说使它能够服务于可统治的目标和人类的目标。可能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了这个趋势的矛盾之处。[103]

但是,有关现代化进程不仅显示出深刻的矛盾,而且同时也显现出这些矛盾的相互转移的现象,同时也在所有四个维度中发现四个维度中都令人吃惊地存在着矛盾的对立面。[104] 因此,对自然的统治所带来的并非人们所希望的副作用就是所面临的自然的毁灭或破坏,或者说是以生态灾难的形式骤然改变自然,从而摧毁人类的生存基础;根据文化批判者的观点,现代性不仅表现出发展个体的特性而且同时也表现出在同质化的大众文化中使人们"失去个性"的趋势,因此乔治·齐美尔猜测不仅出现了个体的"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同时也由于主观文化相对于客观文化的弱势地位而导致原有的"有质量的"个体的消失;[105] 对于韦伯而言,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过程的反面是持续发生的感官资源的被侵

** 格哈德·舒尔茨(1944—),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年轻人和政治变革》《幸福的背景》《罪恶:美好生活和它的敌人》等。——译者注

*** 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启蒙辩证法》(与阿多诺合写)、《工具理性批判》《批判理论》和《社会哲学研究》等。——译者注

**** 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Ludwig Adorno)(1903—1969),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该学派的其他成员还包括霍克海默、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主要著作有《多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启蒙的辩证法》(与霍克海默合著)、《新音乐哲学》、《否定的辩证法》《社会批判论集》和《美学理论》等。——译者注

[103] Horkheimer/Adorno,1947 年。

[104] 范德罗和范雷京也指出了基本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固有的矛盾的特性(van der Loo, van Reijen,1997 年,第 36 页及其后页)。但是他们没有确定四个主要的发展的相反的趋势,而是将它们看做是存在于内部的矛盾的:分化过程同时体现了尺度扩大和尺度缩小(第 130 页及其后页);合理化过程是以多元化和普通化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为特征的(第 176 页及其后页);个体化过程既导致了个体的更大的独立性,又带来了更强烈的依赖性(第 216 页及其后页);以及最后驯化过程同时意味着(身体的)去调节化和(社会和心理的)再调节化(第 60 页及其后页)。

[105] Simmel,1908 年,第 791 页及其后页;近期的类似的诊断请参考 Riesman/Denney/Glazer,1977 年。

蚀,其结果是外在束缚,这也是结构的能动性的无情的独立所导致的,最后可能就构成了一具空洞的像钢铁般坚硬的外壳,灵魂从中逃跑了,这
107 个外壳的冷酷无情的(诸如增长和加速的)逻辑因而也不能阻挡这一切,继续发展的结构就表现为高度的不合理。[106]

更为困难的是定义分化过程的矛盾的对立面。事实上,可以同时看到两个矛盾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伴随着平行增长的(今天全球的)相互依赖性和依赖链条的越来越精细的分化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在(社
108 会)整体的(越来越稳固的和越来越高效的)分化过程中其中的单元和内聚性的消失,因而正如卢曼所不厌其烦地强调的那样,现代社会将变成没有顶端、没有中心或没有"中心的视角"的样子[107]——分化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社会的解体。

根据图 *2-1* 所展示的迄今为止社会学中定义现代的主导性的分析网格,可以看到在社会加速视角下系统地确定社会再整合的位置或起点是困难的。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人们首先会产生仅凭引入另一个视角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正如现代化进程在涉及文化方面时作为合理化过程,而在考虑到个性类型的发展时则表现为个体化过程,当它涉及时间维度或时间结构时,就理解为加速过程。而且恰恰如同个体化过程和合理化过程不是均质地而是波浪状发展的,所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这其中伴随着加速的过程。如同与个体化阵发相伴的是"相关联的"担忧和相应的反向运动[108],以及面对合理化浪潮出现的"传统化的"警告和渴望,相对于每一轮新的加速都会出现拒绝和阻力,并且在所有三个层面上都会出现现代化进程的失败,但是尽管伴随着延迟和修正,最后仍然是不可阻挡地前进。与现代化的四个基本过程完全一样,社会加速也一直背负着它的矛盾的相反趋势,即社会的停滞。因而如何在文化和结构的层面思考社会加速和社会的结晶化,正是理解现代性的静态性和动态性的核心问题,而且只有当一条现代性理论能够解释这个问题,才能够满足恰当地分析历史性的整体研究的要求。

---

〔106〕 参照 Lübbe,1998 年,第 293 页。韦伯非常有意思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基础,即新教伦理,已经是非常不合理的世界观了,因为它[以(新教)基督教的否定世界的—主动的特征为基础]是财富的最大化的积累和与此同时放弃对成果的享受为目的的。因此,我们的现代生活中的"命中注定的力量"停留在了不合理的伦理基础上。

〔107〕 参照 Luhmann,1996 年,第 256 页及其后页。

〔108〕 详细内容请参照 Rosa,1998 年,第 305 页及其后页和第 417 页及其后页。

但是，我仍然是非常不胜任找出这个概念性问题的解决方案。[109] 时 109
间从概念上来看并不只是在文化、结构、自然关系和自我关系一旁而立，而它本身就是一个中心的和结构性的维度，而加速则表明是四个相互联系的发展的层面和元素；加速正是表现了其他的现代化趋势之间相互联系并且同时相互推动的原则，它既表现为其他加速趋势的原因，也表现为其结果。[110] 我将在本项研究的第四部分追寻相应的迹象，即加速相对于其他类别应该被证明是作为基础的，因而当分化过程、合理化过程或个体化过程对于进一步的社会加速功能失调的时候，它们就失败了或者完全转向了它们的对立面。从而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将与四个现代化进程中每一个过程的矛盾的趋势只是理解为社会加速的（无目的）副产品是不可信的：根据这样的观点，社会的解体应该是不断增大的社会的不同步性所带来的结果、环境的毁灭是对自然的再生时间的过高要求的结果、个体的“特性的”丢失是生活节奏提高的副产品以及理性的自治所付出的代价是“时间的世俗化”。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他的现代化趋势同时体现了加速的作用方式和表现方式。

当人们将社会的加速的不可简化的“横贯性”接受为“经典的”分析网格的支柱时，卢曼所建议的对事物维度、时间维度、社会维度的区分，看起来就为在现代化的类别化的基本井架中定位加速提供了第二个战略。这样的话，加速只是在现代的时间维度中的一条中心发展原则。可 110
是，这样的减小复杂性的方式一定会失败的：时间结构的特性上的变化将完全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客观实际的和社会的层面上，因而在这里值得赞同的理论就是，在事物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发展正是跟随着加速在时间上的变化逻辑的。在社会加速视角下的现代化进程的再整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比论述三个（感知）维度的区别要更全面的要求。

因而，后续的研究如果将加速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可绝缘的部分来分析是不够的。它们不能沿着所有四个维度（结构、文化、自我关系和自然关系）并且在关照到所有三个感知维度的情况下确定并分析加速过程。我们所强调的类别化的基本框架应该作为对研究视角的分析性区分的富有启发性的辅助工具，它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现代化进程的

---

〔109〕 我首先将这个看法归功于 Andrew Arato 和 Hanns-Georg Brose 针对我的前几次的概念化尝试的批判性争议。

〔110〕 无论是分化还是合理化，或是驯服和个性化，都一直可以理解为加速的战略。据我看来，在其他过程中的类似的跨类别的反常只是对合理化的抱怨。

复杂性和在所定义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多种多样的相互关系,从而能够解码它们的动态性。对于我的这项研究的构建,并不是遵循类别体系的"外部"默认值,而是按照社会加速自身的"内在的"抽象的和客观的逻辑。在这本书的最后,我将尝试着将研究结果放在这个模式中进行再整合,以便能够在所设定的目标的框架下,展现现代化背景中的加速的功
111 能和状态。

第三章　什么是社会加速

1. 初步思考：加速和增长

鉴于加速概念的众所周知的不清晰性，在目前的社会科学讨论中引入分析透彻和具有实证启发性的加速的定义，对于社会加速的理论来说是重要而且基本的必要研究基础。[1] 因而，这里自然就产生了这样的难题：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加速现象，这些现象很难归纳到同一的概念当中，并且一眼看上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完全是不清晰的。体育运动中的速度纪录（部分由于完善的技术、部分只是因为使用了对微小的时间差别的更精确的测量）经常地被打破，新的计算机类型每隔几个月就会提高运算速度、在现代西方社会平均的睡眠时间和用餐时间似乎是在不断地减少，与此同时，性伴侣、居住地、协会成员关系的变化却如同处于统计中心的流行周期和生产周期一样总是变得越来越快[2]，这些事实之间有什么共同的联系吗？

如果从所有这些现象中的一个当中寻找对加速的全面综合的定义，就会很快看到，我们会追溯到高中物理的常规定义中，在那里加速度的 112
确定取决于所经过的路程（$a = v/t$ 或者 $a = 2s/t^2$），而不能走得太远，事实上它只涵盖了刚才所摘引的第一种现象领域。在海尔格·诺沃特尼对加速的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狭义的物理学定义的不适当性："加

〔1〕 在上下文中所提到的令人沮丧的研究状况也反映在 Lothar Baier 的哲学散文《有关加速的 18 次尝试》（*18 Versuchen über die Beschleunigung*）（2000 年，第 12 页）中，文章用如同被缴械般的诚实中肯地表达了旧有的认识："对于如何探明社会的加速的价值，我并不清楚。尽管实际情况的确是，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不能停止的、几乎不能用关键词进行形容或定义的内在的变化之中，但是远不能说，它从总体上来看是向前运动的，虽然很快或者一直在加速。"

〔2〕 最后的几个趋势是有争议的；我将在有关相应的实证发现的可信性的问题上继续讨论这一点。

速意味着……不只是所有社会过程的速度的提高",诺沃特尼首先这样定义,之后她继续写道:"加速通过普遍提高的机动性决定了时间的标准,而机动性正是对物品、人员、能源和信息进行运输的技术及经济过程所带来的结果,是对空间的—时间的距离的克服"[3],在这样几句话里,她令人惊讶地将加速简化为更快地跨越路程的现象了。紧接着,诺沃特尼指出,加速或者说机动性是普遍的社会规则:"物品、人员、能源、货币和信息都应该更加频繁地改变位置,以便在广泛的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意义上进行流通。"[4]显然无法顺着和要经过的路途联系在一起的令人误解的关联通过物理公式来理解不断加速的地点变化,因为这里并不是关于要更快跨越的距离,而是这些距离被更频繁地设置,这才是决定性的差别。

诺沃特尼的思考清晰地展示了,对社会加速的经得住考验的定义的尝试,应该将加速的两个基本形式——它们在各种文献上几乎都被混淆在一起——有条理地严格区分开来:第一,大量的现象应该算做有目的的和目标导向的形式,并且因此应该进一步被描绘为某个单独的过程"技术的"加速(这涉及诸如在体育运动、运输或计算机技术中的成绩的提高)。第二,与这种技术的—目的论加速形式不同的是提高的社会的变革速率,也就是在时间单位里诸如工作、党派偏好或协会的更换,或者
113 是职业结构和家庭结构、艺术风格等的变迁,即并非有固有目标的社会变化的加速。[5]

当我们把加速现象的清单一直放在眼前的话,就很快能发现,加速概念的两种详细表述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现象:通过快餐、快速约会[6]和打个能量盹[7],或者通过同时执行多任务,即通过缩短或压缩行动间隔,来节省时间的努力,是对越来越紧缺的时间资源所作出的反应,而这既不属于加速的社会变迁的范畴,也不能归于技术的加速。时间变得紧

---

〔3〕 Nowotny,1993 年,第 97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4〕 Nowotny,1993 年,第 98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5〕 由于 Matthias Eberling(1996 年,第 41 页)在他有关加速对政治加速的影响的研究中,将"发展速度的加快"定义为"也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领域中每个时间单位里的重大的社会变化的增多",因此他是唯一的将这个加速的维度纳入考虑的。这个定义的根本问题显然是在于对重要概念的确定,也就是说在于有关区分基础革新和次级变化这个著名的难题上,在这个地方虽然只有对加速概念抽象的表述,但是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这一点。

〔6〕 快速地连续-筛选可能的性伴侣。

〔7〕 通过时间最合适的小睡来快速恢复的形式。

缺，不如说是由于多种多样的技术的加速自身所带来的需要加以解释的矛盾。因此，毫无疑问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时间资源的短缺和由此而产生的“时间匮乏”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提高每个时间单位里的行动速度和/或体验速度而对生活节奏的提高，应该算作现代社会的社会加速的第三个独立的类别。

几乎在所有关于加速的研究中，大多都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将社会加速的三种形式或三个领域中的一个放在中心位置，而将剩下的其他领域里的现象错误地从属于所谓主导的类别。例如，维希留的研究围绕着技术加速的现象，而吕伯和艾柏林*则集中于社会变迁的加速，齐美尔或者列维尼**所把握的是生活节奏的加速。显而易见，在这里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在这些加速分类中间的内在的相互联系。在我们能够对 114
这个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之前，首先要面对的是这个问题，即对加速的定义的确定，是否使它能够同时把握为可以分解成三个相互独立领域中的重要的现象，并且能够确定三个领域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且因此可以为探寻三个领域之间的实证关联指明道路。

对牛顿物理的追溯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在所给定的公式里用抽象的数量说明来代替所经过的路程。加速可以定义为时间单位内的数量增加（或者，也可以在逻辑上同等含义地定义为相对每份确定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量的减少）。在这里的数量可以作为经过的路途、通讯符号的数量、生产的产品（类别 1），也可以是在职业生涯中的职位的数量或者每年性伴侣的更换（类别 2），也完全可以是时间单位的行为数量（类别 3）（参照图 *3-1*）。为了理解技术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之间的关系， 115
关注数量增加和加速之间的确切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涉及“生产”增长的（也就是说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过程时，加速所带来的是指数级的数量增长（参照图 *3-2*）。一个有关这个增长曲线的典型范例是在过去的 300 年间世界人口的增多。[8] 类似的加速曲线我们可以在癌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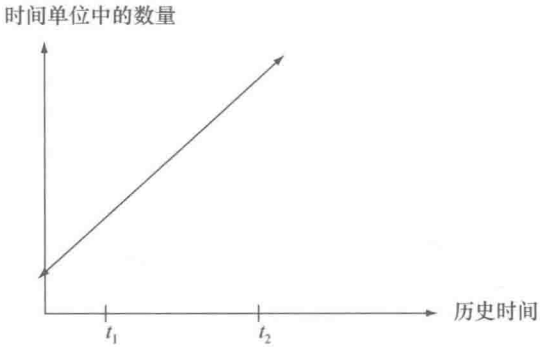
---

* 马提亚斯·艾伯林（Matthias Eberling）（1966—），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白色婚礼》《加速与政治》《地方性的时间政策》等。——译者注

** 罗伯特·列维尼（Robert Levine）（1949—），美国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的地图》《说服的力量》《追忆实验社会心理学 100 年》等。——译者注

〔8〕 “从 17 世纪的大约 5 亿人口到 2000 年左右的 60 亿左右的人口，世界人口的增长可以理解为加速定理：这涉及指数的时间曲线，也就是说人口数量在越来越短的时间期限里翻番”，莱因哈特·科泽勒克（Koselleck，2000 年，第 199 页）因而也作出了同样的猜测：自从大约 50 亿年前地壳稳固下来之后的“人类的发展”逐渐的分化过程和生物方面的发展，和那之后的文化历史及其中的上层文化的发展，都说明了类似的加速历史和相应的增长曲线。

胞的蔓生和有的时候商品及科技革新——例如科学研究的出版物的数量,或者一年里新增的因特网接口或发送的电子邮件的数量——(在很
116 短的时间段内)的不断普及当中看到。[9]



t_1 和 t_2 在这里可以代表 19 世纪和 20 世纪 50 年代,这时的曲线表示了交通工具每小时所运输的公里里程;如果 t_1 和 t_2 分别代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90 年代的话,这里的曲线则表示计算机的运行速度的变化。

图 3-1 表现为在单位时间中的数量增加的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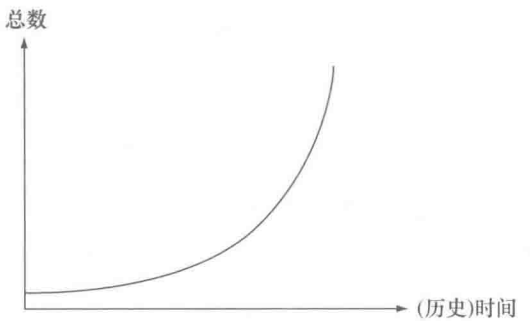


图 3-2 上升过程中的加速所带来的指数级的增长

对这里的这个令人感兴趣的相互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由运输、通讯和生产构成其重心的技术的加速过程完全不是连续的,因而不会出现内在固有的增长趋势。我们今天从 A 地点到达 B 地点可能花费比过去更短的时间,这个事实并不能从逻辑上或从因果关系上说明我们能够更频繁地走这段路程,或者我们(应该可以)走更长的路程;同样的,我

[9] 参照 Eriksen,2001 年,第 78 页及其后页,列举了大量这一类的增长曲线。

们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一定的距离里)传递一定数量的符号,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实现传播更多数量的符号或传播得更频繁这样的任务或者哪怕是趋势,是符合逻辑或因果关系的。能够更快地产出某一特定数量的商品的能力本身也同样是不依赖于生产的增加的。但是,当运输、通讯或生产数量保持不变时,作为技术加速的逻辑后果的"生活节奏"就降低了,或者说没有提高,这是因为完成某一特定的工作定额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从中产生的"空闲时间"意味着将被束缚的时间资源解放了(参照图 *3-3*)。时间紧张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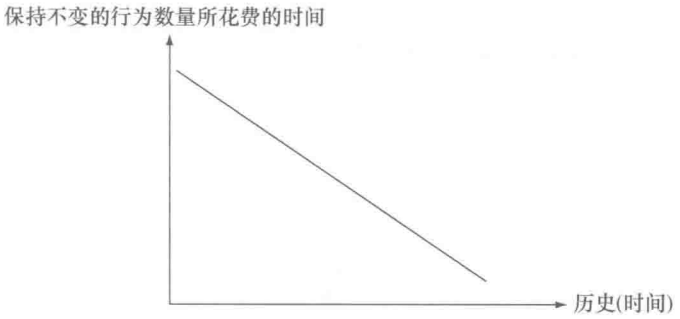


图 3-3　在技术加速的时代同等数量的行为所需要的时间(相对应于图 3-1):被解放的时间资源的数量相应地增加了[10]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张是:在现代"所有的一切"或多或少地都变快了,在大众科学式的讨论中一再一致性地将紧张、忙碌和时间紧缺等出现在主体的现象归结于大量过程的巨大的技术加速,技术加速一眼看上去应该是无处不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加速的最强有力的发条,因而作为这些观点的后果就是,众所周知的谬论被广泛传播。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当中,社会生活和心理生活的动态性和时间束缚,并不能从以技术为基础的加速的成果中推导出来,因为它们之间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生活节奏"的提高和现代的时间紧张的出现并不是因为,而是尽管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通过加速而体现出了巨大的时间受益。 117

从这个观点中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生活节奏的加快或者说时间的短缺一定是与技术加速进程在逻辑上不相关的数量的增多的后果:与之

---

〔10〕 在这个研究的开头所想象的"好时机市式"的社会只能是作为一个"空中楼阁的历史小说",在那里被释放的时间资源通过停滞相应的增长进程的方式而直接地转变为"空闲时间"。

前的社会时代相比,我们不仅更快地生产、传播和运输,而且更多。因而时间资源的越来越短缺通常只是在下面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即要么是在技术加速的环境下,要用更多的时间管理一定数量的任务定额的时候,要么就是当(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的,即所进行的通讯、所走过的路程、所完成的活动的数量)增长的速率超出了相关过程的加速的速率的时候。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会同时出现技术的加速和生活
118 节奏的加速。这种情况出现在,当相对于起点时间 t_1 所走完的路程(所生产的产品、所进行的传播),在时间点 t_2 所完成的是之前的三倍,而前进的速度却只提高了两倍的时候。加速的速率越是落后于增长的速率,那么时间紧张就越严重;前者越是能够超越后者,那么就会有越多的时间资源被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时间缺紧得就越不严重。如果这两者的提高速率是一致的,那么生活节奏或者时间的短缺情况(或者剩余情况)就不会发生变化,而无论技术加速的速率有多高或有
119 多低(图 3-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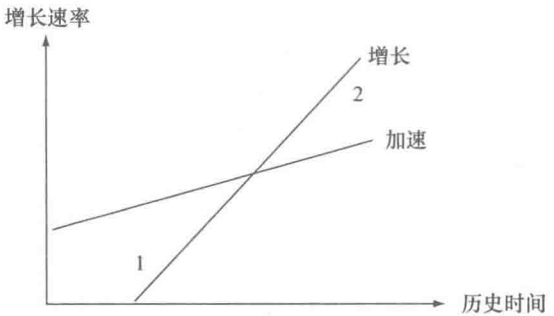


图 3-4 "空闲时间"和"时间紧张"是增长速率和加速速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所产生的结果。1 代表着生活节奏的降低;2 代表生活节奏的提高。当两者速率一样的时候,生活节奏不发生变化。

---

〔11〕 如果觉得这样的思考过于抽象的话,也可以很方便地用当代的直观的例子将其具体化:毫无疑问电子邮件系统的建立大大加快了通讯的速度。写好并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只需要完成传统的信件的一半的时间。在现在每天要完成的电子邮件比起在它出现前要写的信件多了好几倍,因而用于通信往来的净时间消耗增加了 100%。而这样的通信增长与通讯传输的快速的联系是无可争议的——当晚上已经收到了对早上的信件的回复,而在过去最早也要在 14 天之后才能收到的时候,从通讯链和行为链中似乎产生了推动加速前进的固有的动力。但是,这样的冲力既不能从逻辑上,也不能从因果关系上归因于技术加速自身,因为通讯数量的增多是通过技术成为可能的,但并不是技术所迫使的。因而,可以感知的增长迫力并不出自于技术自身,而是产生自通过技术而成为可能的现在的萎缩,也就是说是由于通讯环境和行为环境的加速的变化。用范例的形式描述加速圈的作用方式请见第七章。

我的这项研究的主要假设是，现代社会作为“加速社会”可以理解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加速形式的——技术的加速和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生活节奏提高——（以结构和文化为前提的）相互连接，并且因此也存在着增长和加速。这意味着，平均的增长速度（可以定义为生产、关联、通讯和经过的路程的总体数量的增加）超越了平均的加速速率。[12]

并且事实上，现在也有足够的实证证据可以证明，通过技术的加速可以从家务工作——例如，通过使用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吸尘器等等——或者从交通中可能“赢得”或释放的时间资源，通过相应的数量的增加又被束缚了。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研究表明，在家务劳动上所花费的时间，随着家用电器的数量的增多令人吃惊地出现了趋势性的上升，而非下降。1975 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对 2406 名受访者进行的有关时间使用的全面调查显示，拥有洗碗机的人比没有洗碗机的人平均每天要多花一分钟的时间用于家务，而洗衣机的拥有者则要平均多花四分钟的时间。即便是微波炉的引入也没有带来用于准备餐食的时间的显著的减少。[13] 从中罗宾逊和戈德柏得出了与本项研究一致的假设：“使用其他技术和使用微波炉所发生的事情是相似的：可能节省下来的时间又被用到提高产出或改善质量上面去了。”[14]

120

当考虑到汽车对时间资源的影响时，这种样板也得到了证明：私人小轿车的车主用在路上的时间没有变化，至少是没有在缩短时间这个方向上的变化。加速所导致的时间的赢得被用在更频繁或者更远的出行上了，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时间预算中，用于通勤的专门的时间相

〔12〕 我赞同 Luhmann（1968）、Bergmann（1983 年，第 484 页）和 Linder（1970 年）的观点，不同意 Moore（1963 年）和 Balla（1978 年）的观点，由此我得出，尽管生命时间的有限性，但时间的短缺并不是人类生活的恒定不变的现象，而是它的表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结构要素（这一点是前三位作者所强调的）和文化力量（这一点我将与 Blumenberg 和 Gronemeyer 的观点联系起来在第八章“2”中讨论）的影响的。

〔13〕 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258 页。

〔14〕 同上书，第 259 页。

对于移动的速度是固定不变的。[15]

罗宾逊和戈德柏从观察中得出了结论,在单独的活动领域当中——如家务劳动和运输——所花费的时间保持相对的稳定,也就是说面对技术的革新一直是以中立的态度,即增长速率和加速速率平行发展,所以通过技术所获得的时间收益与通过质量上和数量上的提高所带来的时间损失等量齐观。但是根据以上所开发的定义,增长速率和加速速率的一致性对于生活节奏的影响是中性的,尽管无论是罗宾逊和戈德柏,还是他们的调查对象都发觉了(这两位作者也解释不清楚的)生活节奏的加速。由于在这里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没有客观根据的而且是从失真变
121 形的主观感觉中所产生的现象[16],因此就提出了两种作为补充的可能的解释,而这在时间预算研究中是很难操作的:第一个是,贡献于某类特定活动中的时间资源的相对稳定性完全不能证明增长速率和加速速率是一样的。因为更高的增长速率可以通过浓缩行为间隔或者通过"多任务操作"来抵消。[17] 例如,当移动速度通过技术革新翻了两倍,而要走过的路程却翻了三番,那么如果要保持运输时间的恒定不变的一个解决途径就是缩短中间休息的时间。同样的,相对于技术的加速,超比例提高的家务工作量可以通过例如在吸尘的同时做饭——而在此之前这些家务劳动是先后进行的,从而使家务劳动时间保持不变。在这些情形下,增长速率超过了加速速率并且因此导致了生活节奏的提高,因为过去在用于某个活动领域的时间之中的空闲的"微小的—时间资源"现在

---

〔15〕 罗宾逊和戈德柏在这里假想,(最开始用于阐述组织中的时间分配的)工作中的"帕金森定律"[又称"官场病""组织麻痹病"或者"大企业病"。它是由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于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书中提出的。帕金森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这条定律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帕金森定律表明:只要还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扩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时间——译者注],根据帕金森定律,一项(工作)任务需要的时间就是它所能支配的时间,这项工作的任务量有多大也同样是由所分配给它的时间决定的。"根据帕金森定律,存在着有关应该用于某项特定的任务的时间量的某种'规则'或'头脑中的想象'。用在这个活动上的时间决定了能够在这个时间里完成什么。"(Robinson/Godbey, 1999年,第260页)

〔16〕 罗宾逊和戈德柏对生活节奏这个概念的使用尽管非常矛盾,但是他们的阐述显示,其在对技术的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的区分以及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准确的确定上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作者一方面(由于上述原因)能够将生活节奏加速看做矛盾的感知问题("缺乏时间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感知问题")(1999年,第25页,并参照第229页及其后页);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将生活节奏与技术加速混为一谈,作为现代化的一个构成要素:"从中世纪经过工业革命,生活的步伐开始了意想不到的加快的进程。"(同上书,第29页)

〔17〕 对此详细而准确的论述请参照本书第三章"2"(3)和第六章"1"。

都将它们利用起来了。[18] 事实上，这是生活节奏加速的最有可能出现的形式，因为工作量的扩张永远只能通过缩短在其他领域所用的时间才成为可能。

第二个对生活节奏提高的解释是从新的技术的特殊的“副作用”中发现的，新的技术打开了新的活动领域和活动类型，对于它们的使用需 122
要额外的时间资源（录像机的时间花费影响就在我们的眼前），因而这同样会导致空闲的时间资源的持续减少。有关这之间的关系我将在其他的地方继续探讨。我们因而可以假想，选择项和偶然性的增加是生活节奏加速的主要原因。[19] 但是，这绝不是技术革新的一个简单的后果，从中也根本不是不能推导出其他的进一步的猜想（例如，为什么对新的选项的充分利用或者对新的活动领域的开启显得很有吸引力），而是应该像将要展示的那样，只是在“社会变迁的加速”这个范畴的背景下，确切地去理解那些现象。

因此，这些初步思考澄清了，实际上是在一个统一的加速的概念之下去理解这些在所给定的上下文当中的有意思的现象的，并且在所提出的三个加速的领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或因果关系。因而，从新的研究所探寻的对象中所产生的问题是，是否可以找到社会加速的各个子领域——它们向前推动着或改善着加速过程，与在现代的定量的提高逻辑和加速能动性之中的结构和/或文化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复杂的实证的相互关联？在我尝试在本书的第三部分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精确地理解对三个加速维度的定义和它们之间的界限（第三章“2”），以便之后在第二部分能够去研究三个加速维度的实证的表现形式，以及分别探索它们所产生的结构上和文化上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会完成对那些不属于所定义的现代的加速趋势或与之相反的现象和社会领域在类别上的确定——也就是说，对社会减速的类别上的确定（第三章“3”），并且，由此完成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对现代社会中的加速趋 123
势和减速趋势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第三章“4”）。尽管可以指出，运动的力量系统地超过了停滞的力量，但是还是要对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这个判断加以证明。

---

〔18〕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业社会学将这种情况描写为通过填上工作日中的毛孔而使工作紧凑。参照下文和第八章“1”。

〔19〕 详细内容参照本书第八章“3”。

2. 社会加速的三个维度

在前面一个部分所开发出来的概念性的建议指出,对社会加速和它对现代性的决定性作用的系统研究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三个部分相互间并不能进行逻辑上的简化,并且要对以复杂而且部分矛盾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现象领域进行实证的类别区分。三个需要进行描述的加速形式分别是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现在应该对加速的这三种形式或者说维度进行精确的定义,并且将它们相互区分开来。

(1) 技术的加速

现代社会的加速,最显而易见和最有影响力的形态就是目标明确的、技术的,特别是工艺的(也就是说机械的)加速过程。运输、通讯和(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是这方面的典型。这种加速形式是(在所有问题中,在这里也要精确地探明平均速度的问题)最容易测量和证明的。

从前现代和前工业社会到当代的前进速度加快的历史,以及因此从徒步出行、经过在马背上和蒸汽船以及火车上直至汽车和最后的飞机及宇宙飞船的历史,让人信服而且完全可以证明,这样的历史不需要重复。
124 最快速度从每小时 15 公里到达每小时超过 1000 公里,或者当人们也把宇宙飞船算在内的话,则可以达到每小时好几千公里,这中间翻番的因子是指数级的。[20] 撇开绝对的最高时速不考虑,与此同时,每一类的移动工具自身的速度也在提高,汽车、轮船、火车、飞机、宇宙飞船甚至是自行车,在今天都比它们被刚刚引入时的速度快很多,尽管已经表现出了可能的(并且是有意义的)极限。

平均的行动速度的提高比起最高速度的提高,对于有关社会的普遍的移动性和动态性的理论更为重要。尽管毫无疑问,平均的行动速度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确切的数值却相当难以查明。由于社会加速与运输的加速存在着相互联系,因此那些社会加速的形式

---

[20] 参照 Geißler,1999 年,第 89 页。Heylighen(2001 年)指出在 200 年的科技发展史中,速度提高了"好几个数量级"。进一步参照 Beniger,1986 年,特别是第 208—214 页,以及有关完整的技术的加速历史的 Virilio,1980 年、1993 年和 1998 年 a 及 1998 年 b。

的确切的计量单位，产生于对每个时间单位所移动的物体或人员的数量和它们的平均运动速度的探查。[21] 正如我们在下一节中将会看到的，这两个值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在同样的时间里运送的人越多，这些人的平均速度就越低，这是由于基础设施的超负荷运转而带来的堵塞的后果。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交通方式（例如城市交通）中，平均速度看上去是在下降而非提高。

交通速度的提高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空间缩小”的感觉的根源。对空间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时间流失所产生的作用，因为穿越空间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这表现在时间表示距离的陈述方式上（“从柏林 125
到巴黎有多远？”——“驾车 *10* 个小时或者坐飞机一个小时”）。在 18 世纪，从欧洲到达美洲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今天人们只需要六个小时就足够了。因而，这个世界从工业革命以来，似乎大约缩小到它原来的尺寸的六分之一。因而，在运输方式上的提高速度的革新要为哈维和其他人所说的“空间通过时间被消灭”的现象负主要责任。[22]

然而，并不只是移动的速度的提高导致了已经证实的空间的优势向时间的优势的转变，至少信息传送的加速也同样要为此负责。从“跑马拉松的人”经过骑马的信使、烟雾信号和信鸽到电报及电话，最后再到简直是完全实现了乌托邦式的不存在空间的因特网——在那里数据失去了它的地点，并且能够以光速传送，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而且有详细的文献资料作为证明。与此同时，不仅是传送消息的速度加快了，包括每个时间单位（在某个特定的媒介中）所传送的信息的数量也增加了。这场“传输革命”从时间上来说要晚于“运输革命”的发生，并且从某个角度来看前者似乎正是表现为对后者的出现的回应。[23] 根据卡尔海因茨·盖斯勒的估计，通讯速度仅是在 20 世纪提高的因子就是 10^7；弗朗西斯·海林恩*计算出过去 200 年间的速度竟然提高了 10^{10}。[24] 但是，所传送的数据的数量可能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特性影响较小，而更

---

〔21〕 Heylighen（2001 年，第 2 页）和 Beniger（1986 年）放弃了相应的估计，而是完全通过计算，证实了这些数值的总额是提高的。

〔22〕 Harvey，1990 年，第 240 页及其后页；对此也请参照本书的第四章。

〔23〕 对 Beniger（1986 年）而言，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加速正是就重新赢回对不断加速的运输过程和生产过程的控制所作出的努力。有关通讯加速可以参考 Virilio，1993 年；Kirchmann，1998 年；Großklaus，1997 年；Meyerson，2001 年和 Eriksen，2001 年。

* 弗朗西斯·海林恩（Francis Heylighen）（1960—），比利时的控制论研究者。主要著作有《基本观念》《全球的大脑》和《控制论原理》（合著）等。——译者注

〔24〕 Geißler，1999 年，第 89 页；Heylighen，2001 年，第 2 页及其后页。

126 确切地说是由于在全世界都能使用具有光速的机器,因而使这样的事实成为可能:不同步的(例如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话答录机)和同步的交流互动在任何时间都与交谈双方所在的地点没有关系。

然而,技术的加速不仅表现为人员、货物、信息和(维希留所特别强调的)军事上的炮弹在地球上运输的速度变得更快了,而且也同样包括货物被更快地生产出来、材料和能源的迅速的变化以及——但是是在较小的程度上的——服务的加速。[25] "迄今为止,工业化所产生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提高了一个社会的整个物质处理系统的速度",詹姆斯·伯尼格(James Beniger)因而恰如其分地评论道。[26] 在这里所讲述的加速的故事描述了从蒸汽机、经由液压系统和内燃机的使用、到电气技术和工业化大生产和流水线的工艺流程,直至最后计算机时代的微技术的旅程。[27]

因此,从由维希留提出的"速度的"革命的角度所理解的工业革命首先也是生产速度的革命,这场革命在跨向21世纪的"数字革命"中继续进行着。"物理的过程被所期望的反应时间和进程时间向着虚拟实现实时的方向的加速所替代。当在模拟关系下通常需要几个星期才能识别和满足需求的变化时,通过将供应和发货的所有环节被完全地连接成网络——从生产和销售每个环节的供应商到最终的客户,现在这些就
127 能比以前快很多倍",贡多尔夫·费赖尔穆特对此这样写道。[28] 加速完全是通过将过去的物质过程(例如设计模板)直接的虚拟化和数字化而实现的,因而,在某些领域实际上可以实现达到光速的加速;也可以通过将数字化的信息传输途径镶嵌到"模拟"过程中,也就是同样也处在进一步的加速压力下物质的操作和工序环节来实现的。因此,事实上,在对流程和生产的虚拟化和数字化的过程中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与三个主要的技术加速形式相互渗透:对诸如录制了音频的媒介或图书这类物品的传统的运输方式通过数字化而被纯粹的信息传输的方式所替代;而

---

〔25〕 当一些服务通过专业分工和采用技术而得以加速的时候,还有很多领域(例如儿童养育和老年人照料,或者也包括皮鞋保养),在那里并没有实现显著的速度提高,因为它们看上去相对较贵并且因此——如同 Staffan Linder(1970年,第38页及其后页)所注意到的——可能推动了"一次性的社会"的趋势,在那样的社会中,诸如清洁、护理和维修工作都由于用过的产品不断地被新的所替换而变得最少化。

〔26〕 Beniger,1986年,第Ⅶ页,并参照第169页及其后页和第427页。

〔27〕 David S. Landes 在《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The Unbound Prometheus*)(1969年)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28〕 Freyermuth,2000年,第75页。

物质的生产流程(例如模型或建筑上的样板的开发)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通过虚拟化而变成信息处理的过程。信息处理的速度因而同样在20世纪提高的因子为10^6。[29]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盖斯勒所猜想的那样,光速确立了最终的极限,加速的进程由此就在那里到达终点:因为数据虽然能够以光速传输,但是不能普及;而且在物质的相互联系的界面上的加速的压力,只是由于数字化的可能性才强有力地增长的。[30]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由于不断提高的生产速度,因而必须同时提高销售速度和消费速度,这些方面的速度提高是受到技术革新所推动的,同时它们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结构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被再造并且发生变化。这当中的前提条件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以技术加速的基本形式为特征的现代化,同时也一定出现,例如在现代的科层系统和管理体系中的组织流程、决策程序、管理过程和控制过程的加速,这 128
些进程的加速同样也在广义的技术的加速(也就是说通过创新的技术而特意实现的有目的的加速过程)的范畴之内。[31]

(2) 社会变化的加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技术的更新是通过什么方式对社会的制度和实践活动产生影响的,从而可以清楚地在社会的变化和技术的革新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尽管这两者在经验上和历史中往往都是肩并肩地发生的。我已经将技术的加速定义为特意实现的有目的的加速过程,同时,社会变化的加速也与速度有关,在社会变化中,一方面是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行为导向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组合结构和关系类型的改变。在这里可以假设,变化的速率本身也是变化着的,也就是说是加快着的。例如,

---

〔29〕 参照 Geißler,1999 年,第 89 页。

〔30〕 Geißler,1999 年,第 155 页;对于 Geißler 的反驳请见 Rosa,2001 年 a,第 341 页及其后页。

〔31〕 广义的技术加速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多种多样的工作流程的"人类-技术的"合理化的类型,例如通过费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方法,或者也通过现在的灵活的"准时生产"(just in time)和"精益管理"(lean management)等形式实现的合理化;进一步来看,诸如在体育运转中的跑步技巧和游泳技巧、学习过程中的阅读技巧等之类的节省时间的改善,也可以纳入这个范畴。

用泰勒式的工作管理*代替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作组织方式,体现了社会变迁的一种形式,并且也同时展现了技术加速的一个现象,但是单独来看这绝对不是社会变化加速的例子。只有当工作流程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被不断地重组才可以看做是社会变迁加速的表现。相反,当具有四年有效期的党纲被两年有效的党纲所代替的时候,就可以看做是加快的社会变迁的例子,而这其中并不包含技术的加速成分。这样的差别也可以从创新扩散的历史中找到例子:从19世纪末收音机被发明出来,到它
129 拥有5000万收听者用了38年的时间;而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被引入的电视机达到同等规模的需求时仅用了13年;另一方面,从第一个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到第5000万名用户却只用了区区的四年时间。"是否还有人仍然怀疑,(社会的——本书作者注)变化是否在20世纪是加快了的?"针对以上的发现,托马斯·H.埃里克森(Thomas H. Eriksen)**掷地有声地问道[32];与此同时,弗朗西斯·海林恩(F. Heylighen)也呈现了类似的数字游戏,他指出,从打字机在1714年被发明到在市场上的普及用了175年,而在20世纪初期的冰箱和吸尘器走过同样的路程用了大约30到40年,诸如CD播放机或录像机这样的新技术,从被发明到在大众中广泛普及只用了10年。[33]

在这里关键的是,新技术被广泛使用的速度,也就是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行为导向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的速度,与技术加速本身没有逻辑上和因果关系上的联系(当然撇开基础设施这个前提条件不谈)。因此,只是单纯的计算机的处理速度的加快既不能带来行为导向的重大改变,也不能带来社会的联合模式的变迁,就这一点而言,它对于社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性的(但由此不能否认,技术革新实际上往往会带来实践活动的形式和/或关系模式的变化的结果)。

与广泛传播的说法——今天的社会以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速度在发

---

* 泰勒式的科学管理是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费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1856—1915)所提出来的,是通过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来谋求最高效率。泰勒在他的主要著作《科学管理原理》和《科学管理》两部书中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指出管理是一门建立在明确的法规、条文和原则之上的科学,它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经过充分组织安排的大公司的业务活动。——译者注

** 托马斯·H.埃里克森(1962—),挪威社会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快与慢》《人类学史》《文化认同的矛盾》等。——译者注

〔32〕 Eriksen,2001年,第97页;对此也请参照 Beniger,1986年,第324页及其后页和第362页及其后页。

〔33〕 Heylighen,2001年,第3页。

生着变化[34]——相反，埃里克森所提出的雄辩有力的问题并不能轻易地放在一边，因为在社会学的讨论中并没有就一些具体的细节达成一致：通过什么能够确切地定义社会的变化，社会变化的指标是什么以及哪些革新应该作为基本革新，因此有关社会变革的加速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根基。[35] “当出现大量关于……整个社会的变化速度加快的讨论的时候，如何定义变化的速度却是在社会科学中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玛丽·雅霍达（Marie Jahoda）*指出了这一点；[36] 而与此同 130
时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在一个详尽的而且非常复杂的分类体系中区分了19种社会变化的类型，并且将它们分别归入四个速度分类中（政治的变化和生活节奏是这里面最快的，而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却发生得最缓慢；这中间是诸如技术和经济的变化，以及还有观念和心态的变化），虽然如此，但是当涉及有关加速的问题时，人们却发现，尽管已经有了大量加速的证据，但是这项研究最后却不得不依靠个人的直观感觉和印象。[37]

鉴于这样的情况，我建议首先在赫尔曼·吕伯的帮助下引入社会变化的加快这个概念，并且也在卢曼的系统理论所证明的现在的萎缩的概念下对它进行定义。根据吕伯的观点，现在可以定义为一个持续一定期限的或者说稳定的时间段，在科泽勒克的定义中，经验范围和期望视野对于“现在”来说是不变的，而且因而是可以涵盖“现在”之外的所有范畴的。只有在这样的时间段内，才能从已有的经验中为现在和将来得出结论，并且经验和学习过程只有对它才具有指导行动的力量，因为一定程度的预期的安全感形成了。[38]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就是指一切不再

---

〔34〕 这里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参照 Robinson 和 Godbey，1999年，第46页。

〔35〕 对此参照例如 Sztompka，1993年；Müller/Schmid，1995年和 Eder，1995年。

* 玛丽·雅霍达（1907—2001），奥地利和英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关系中的研究方法》《政治和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积极精神健康概念》。——译者注

〔36〕 Jahoda，1988年，第169页。

** 彼得·拉斯莱特（1915—2001），英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我们丢失的世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过去的家务与家庭》《一张人生的法国地图》等。——译者注

〔37〕 Laslett，1988年，第31页及其后页。拉斯莱特以有趣的方式假设，政治变化与大多数其他变化类型相反，它可能没有加快速度，因而这可能会导致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要讨论的不同步现象的出现。但是，据我看来，拉斯莱特极其令人难以理解地坚持将个人生活节奏与政治的变化速度相提并论，而我将在接下来的部分指出，生活节奏的提高是社会加速的三种基本形态中的一种。

〔38〕 有关关键词，诸如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可以相应地参照辞典《记忆和回忆》（*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Rosa，2001年b）。

有效的事物,而将来则可以理解为那些还未生效的事物。[39]

这个定义使得在不同价值领域、功能领域和行为领域区分和多元化
131 "现在"成为可能,并且因而可以将同时期的不同期性[40]的概念引入:在地理空间和社会领域会出现,在另一处已经失效的而在这里却是发挥作用的,也就是在那里是未来的地平线。因而,吕伯所提出的猜想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指出,在这个定义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加快的"过时的速度",或者说不断增大的社会文化的"革新密度",正在经历持续的现在的萎缩。[41] 这个假设在科泽勒克的观察中得到了强化,在那里对这种压缩的感知直截了当地被定义为从现代就开始
132 的历史性的加速体验。[42]

因此,社会变化的加速可以定义为指导行为的经验和期待的失效的速度的提高,以及分别在功能领域、价值领域和行为领域将某个特定的时间段确定为现在的缩短。从这个定义当中得出的衡量稳定性和变化的标准,也可以用在各种类型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制度及实践活动上:有关社会变化的普遍性的加速的理论说明了,在政治中的"现在"同在经济、科学和艺术、商业关系以及家庭布局,同样的还有道德规则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规矩,并且因此也包括在文化的和结构的视野中的"现在"一样,都是在萎缩的。"这个'现在',即社会情境中具体事件发生的当

---

〔39〕 卢曼也证明了这些定义(Luhmann,1997 年,第 1073 页)。

〔40〕 参照 Koselleck,1989 年,第 323 页及其后页。

〔41〕 参照 Lübbe,1998 年,第 263 页及其后页:"现代萎缩……由于与每个时间单位的创新的数量的增加有关,因而当我们进行回忆时,只隔越来越少的年份,我们就看到一个在生活的重要方面都已经过时的世界,在那里我们不再能够认出当下熟悉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了……与创新相关的现代萎缩意味着,它是对与越来越陌生的过去之间的时间顺序距离不断缩短的补充;同样也意味着,当我们为了生活境遇做打算而展望未来时,我们会发现只隔了越来越少的年份,大部分地方已经与当下的生活情况不再一样了。简言之:现代萎缩,是时间段延伸的缩短过程,这个时间段是指我们能够预计到在这期间我们的生活境况是稳定不变的。"在吕伯的定义中恰如其分地向我们展现了,现代萎缩这个概念与革新的概念在这里并没有联系:吕伯所描绘的现代萎缩的形式可以是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变化(因而也包括,例如退回到旧有的境地)加速的形式所带来的结果;现代萎缩并不需要真正的革新(这样说是因为,人们也会把诸如解体社会福利国家或者退回到军事化的民族国家政策当做为革新)。

〔42〕 参照 Koselleck,1989 年,第 328 页及其后页和第 367 页,或者 2000 年,第 150 页及其后页。指出"当代"是持续进行的"时间—空间—压缩"的过程的大卫·哈维,从不断缩短的时间地平线和稳定性范围中,发现了这个过程的根本性的标识和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尽管他用了与吕伯截然不同的专业术语:"空间看来已经萎缩成一个'地球村'了……而且由于时间地平线变短成了一个点,在那个点上就是所有的现在……因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处理由于我们的空间的和时间的世界的压缩而带来的被淹没的感觉。"(Harvey,1990 年,第 240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下，在与之前的社会形式相比时，看上去被丢弃在一个新的情境中：它变得越来越短小、更加有限，而且被放置在早先的以及特别是未来所期望的事件的压力下”，阿明·纳瑟黑紧随卢曼之后也这样认为。[43] 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即包含在加速的第一个类别中的技术速度提高的现象首先被理解为是在社会中的加速时，是否有理由将之作为社会本身的加速来讨论。值得思考的当然还有，这个萎缩过程在不同的领域里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并且在单独的社会领域里出现了停止或甚至相反的“现在扩张”，这些都会导致社会不同步现象的不断增加。因而，加速理论下的时间诊断不得不仔细地从所研究的社会中探寻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发展的迹象；为此，我将在下面的部分开发必要的类别化的知识。

吕伯目前只是通过行为理论的方式定义了社会变化，而这与尼克拉斯·卢曼的系统理论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并且从卢曼的思考中得到证明。对于卢曼而言，“现在”首先是每个系统操作的根本，因为它不断 133
地区分着新的过去和未来，在这中间，过去表现为确定，而未来则是（尚）未确定的。他进一步地将“现在”理解为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中，（从系统的视角来看）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地平线以及因此产生的期望和决定或者说选择的基础，是保持稳定不变的；而且卢曼毫不怀疑，现代性的特征表现为这个时间段的不断缩短。[44]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萎缩”或者社会的加速意味着，不同的社会领域中的过去和未来必须被放在越来越短的距离内进行重新解释。[45] 因而，对于卢曼来说，事实上社会变化在现代社会中并不算什么大问题，而通过对期望和重构的体验的持续地修正而产生的时间地平线和选择基础的不稳定性才是重要的问题。[46] 我将在第五章回到有关不稳定性和变迁之间的差别这个问题上，在那里将围绕着这两种社会加速形式的表现形式和实证证据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进行讨论；比起技术加速的情况，社会加速的情形相对不够明显，因此我在此建议，将变化的时间

〔43〕 Nassehi，1993 年，第 342 页。

〔44〕 “只有在现代和只有通过现在的时间范围的缩短，才会出现停滞或停留这个问题……‘现在’通过在过去的 200 年里重构时间，发挥着对时间的整合功能；但是‘现在’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这个功能。”（Luhmann，1990 年 a，第 135 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并请参照 Nassehi，1993 年，第 342 页和第 375 页及其后页。）

〔45〕 参照 Guy，2002 年，第 2 页；Nassehi，1993 年，第 342 页和第 375 页及其后页。

〔46〕 参照 Guy，2002 年，第 7 页。

地平线和期望本身就理解为社会变化的声明。[47] 它们的稳定性可以作
134 为社会变化的加速或者放缓的衡量标准。

(3) 生活节奏的加速

正如我在第三章"1"中尝试着指出的,作为每个时间单位里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增多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并不能简单地从社会变化的加速中寻求根源,尽管生活节奏的加快合情合理地表现为对社会变化的(但不是必需的)反应。[48] 由于生活加速所导致的时间资源的短缺和因此产生的"时间贫穷",面对技术的加速这个类别构成了似是而非的关系。生活节奏的提高尤其在大众科学的讨论中处于对加速的诊断的中心位置,并且带来了最强烈的动机去呼吁减速,在这里它构成了社会加速的第三个可独立分析的类型。

加速的第三个类型可以通过客观的和/或主观的组成部分加以鉴定。生活节奏的提高客观方面包括行为事件的缩短或者紧凑,这些往往主要是通过对时间预算的研究,此外还有伽哈玛(Garhammer)、格尔舒尼(Gershuny)以及罗宾逊和戈德柏的研究[49]所调查清楚的。例如吃饭时间和睡眠时间的缩短,或者在家庭中平均交流时间的减少,就体现了这一点;而且也包括,努力缩短每次看电影、参加节日宴会、参加葬礼总共所用的时间,也就是从上一个活动的结束到下一个活动的开始之间的时间段的缩短。这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提高行动的速度(更快地咀嚼
135 或祷告)得以实现,而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缩短行为之间的中间休息和空转时间来达到,这也可以被称为行为事件的"紧凑"。[50]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样的压缩以及由此时间单位的行为事件的增加,并不只是通过直接的加快速度,而是也通过行为的相互重叠,也就是说,通过

---

〔47〕 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也被 Nassehi(1993 年,第 307 页及其后页)证明是合理的,他将由缩短的时间地平线所导致的预期的关联性的丧失解释为对"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的塑造中的社会变化的加速。

〔48〕 作为对时间地平线的缩短和由此产生的期待的不稳定性的反应,也完全可以看做为是一个被动的、宿命论的和还原论的姿态;相反,稳定的期望视野和经验视野则与行为速度的提高和(感觉上的)时间资源的短缺相伴出现,这一点正如 Ernst Benz(1977 年)和 Reinhard Koselleck(2000 年,第 177 页及其后页)在基督教—末世论的时间构想的例子中所指出的。有关现代社会的三种加速形式在一个自我加强的加速循环中的历史—实证的共同作用,请参照本书的第七章。

〔49〕 Garhammer,1999 年;Gershuny,1990 年;Robinson/Godbey,1999 年和 1996 年。

〔50〕 Garhammer,1999 年,第 470 页及其后页;Robinson/Godbey 将这称为"时间—深化"(time-deepening)(1999 年,第 24 页及其后页)。

同时从事多项行为(多任务作业)来实现的,而这实际上导致了每个行为的速度的降低,但是,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使得更快地完成所有的行动成为可能。[51] 这样的时间上的变化塑造了稠密的模式,因而最终它使得提高行为的密度或者同时也增加时间单位的行为事件成为必要,这些都可以用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证方法加以客观地检验。[52]

因为生活节奏的提高可以理解为时间资源短缺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行动"数量"的提高超过了执行速度技术上的提高[53],因而,生活节奏的提高(与以中立的方式对待新被占用的或被释放的时间资源的速度本身相反)主观上被不断增强的时间贫乏、时间压力和以令人感到紧张的形式出现的加速迫力的感觉,以及对于"不再能赶得上"的恐惧所打败了。行动片段的加速和压缩则是表现为对这些感觉的合理的反应。时间资源的紧张因此(与现在的萎缩的体验一起)可能也构成了"时间本身流逝得越来越快了"这样的感觉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些时间体验对于此刻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来说是很容易出现的;生活在富裕的工业国家的居民甚至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指数级的加速或者至少是新 136
的加速浪潮的广泛的影响所导致的)时间压力,他们纷纷抱怨时间的不够。[54] 这样的时间体验至少从 18 世纪开始就一直以不断循环往复的浪潮伴随着现代社会,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因此证明,在现代的社会速度"已经一直是很高的了"。而更多的是说明了,生活节奏是不断地加速的;它是时间资源短缺所带来的结果,而严格地说,时间资源短缺并不能对生活的"绝对"速度产生什么影响。

然而,这里并不是就生活节奏加速的原因、表现形式和结果进行过多讨论的地方,我将在第六章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在按类别阐述我的有关社会加速的理论的基本知识的框架下,我在这里只是阐述我所提议的社会加速中第一个维度和第三个维度之间的界线问题。在有些情形下,行为事件的缩短同样直接与新技术的引入,即与技术的加速联系在一

---

〔51〕 在吃饭的同时熨衣服、打电话并且看电视的人,如果考虑到每个活动的话,可能是相对的时间—低效率的,但是尽管如此,比起按顺序一一做完这些行为,这种方式还是会更快一些地结束所有的事情的。

〔52〕 我将在第六章"1"中讨论对于这样的设计的真正的实证证据;事实上,它们被到处假设,但却难以证明。

〔53〕 参照上文中的图 *3-4*。

〔54〕 Geißler,1999 年,第 92 页;Garhammer,1999 年,第 448 页及其后页;Levine,1999 年,第 196 页及其后页,以及尤其是 Robinson 和 Godbey,1999 年,第 229 页及其后页;有关这些现象的批判性讨论请参见第六章"2"。

起。例如,当通过新的跑步和呼吸技术的开发,而使 10000 米的长跑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完成时,根据两个目前已经开发的定义,这个变化既与技术加速形式(也就是说,通过使用新的技术而实现的有目的的加速)有关,同时也体现了生活节奏加速的现象(也就是说,行动片段的加快速度)。后一个定义从上下文来看尽管不是荒诞不经的,但至少也是有悖常理的:将跑步用时的改善理解为生活节奏的提高,与其说是一个有启发的科学成就,不如说是令人愉快的科学失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对行为事件进行定义时必须小心翼翼:不是跑步本身,而首先是对相
137 应活动的参与,应该被理解为所完成的行为事件。一个个事件不仅是通过它所包含的行为所决定的,而且也是通过所在的背景决定的。一场田径运动会,例如通过同时举行投掷铅球比赛和长跑比赛,而从六个小时缩短到四个小时,事实上就是一个生活节奏加快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还可以做其他的解释,仅凭单独的行为事件或体验事件的缩短,并不足以断言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资源(通过技术的加速或通过放弃某些行为)的释放本身——也就是说没有再用于新的活动——如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甚至是生活节奏的放慢。只有每时间单位(例如,以天、星期或年为单位)行为事件的增加,才满足前文所提到的定义,并且,继续以刚才的例子为例,这就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将从跑步加快所赢得的时间用于更早地去看电影,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为生活节奏的加快。

这种在现代社会占上风的时间紧张和社会生活的快速进行的感觉,是超出这里所提出的可测量并且客观的定义的非同寻常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如果没有系统地将文化因素纳入进来,是无法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的。从第六章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在现代被当做生活节奏的加速所体验到的,实际上包含了行动速度的加快,同样也有日常生活的时间体验的结构上的变化。

3. 停滞的五种类型

在对加速理论的基础进行分类研究的背景下,会有将社会生活的所有的领域和现象简单地根据归纳逻辑,分解为三个决定着加速动力的完全不同的舞台的危险,因而当对每种过程和现象的形式、功能和状态进
138 行确切的定义时,这种分类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抽离动态性或者甚至出现主动性的矛盾,也就是一些现象和过程显现出或者不是可加速的,或

者是放缓的趋势。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现象和过程在加速的环境中就发挥着“刹车者”或者“减速者”的作用。只有当我们将导致加速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确定下来之后，我们才能够指出社会的加速的确切的意义。在这里，可以将减速[55]或者停滞分解为五种类型，它们似乎横亘在三个前文所定义的加速维度的面前。

(1) 自然的速度极限

首先非常显而易见的是(地理)物理的、生物方面的和人类的速度极限，也就是说那些它们的持续时间和速度完全不再能被操纵或者只有在付出非常大的质量上的改变的代价其速度才能得以提高的过程。例如，这包括大脑的速度极限(比如说，感知、处理刺激、作出反应以及也包括恢复的过程)[56]和身体的速度极限(可以想一想生长的过程或者战胜疾病的过程)，也包括自然的原材料的再生速度，例如，从海洋沉积物 139
到石油的生成。最重大的速度极限之一可能是地球的生态系统处理有毒物质和垃圾的潜力。[57] 一年一年的时间和一天一天的时间也是不能加速的，尽管它们偶尔会在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方面，通过用暖气系统改变稳定以及用人造光线将黑夜变成白天，而被操控或被模拟。在农业方面，人们在一些情形下成功地改变了生物过程的自然的速度界限，例如通过使用人造光线改变白天和黑夜的转换节奏，从而将一天的时间缩短为23个小时，最终提高了母鸡的产蛋量，或者通过养殖加快生长的过程，例如所谓的“支柱树”的完全结果可能只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而传统的树种却需要15年或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树在之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又不再结果了，似乎又被当做“淘汰掉的树”。

当社会的过程因为受到自然的加速极限限制而使其加速受阻时，社

---

〔55〕 有关弗里茨·瑞海斯所提出的脍炙人口的新概念“减速”(Reheis，1998年)，请参考《关于世界构成的袖珍字典》(*Handwörterbuch Umweltbildung*)中相应的关键词(Reheis，1999年)：“减速意味着负加速，也就是降低速度、放慢、延缓或者也指时间延长”(第53页)。但是，与我对这个概念的用法有所不同，瑞海斯将这个概念理解为说明与“高速运转且没有停止的社会”相对的“另一种设想”的规范的概念。“相反，减速意味着速度的降低……在经济中，减速就是指技术更新的速率的下降、产品的耐久性的增强以及产品和消费品都向耐用性的方向发展……在政治中，减速概念是指在努力反对在政治流程的构造中迫于经济的压力而缩短办事程序……在与人类的心理相关时，减速这个概念则是对许多人通过更经常或者更密集的外在事件来提高生活的享受这种努力的反对”(Reheis，1999年，第53页)。

〔56〕 对此请参照例如 Pöppel，1997年。

〔57〕 这是弗里茨·瑞海斯的中心论点中的一个(Reheis，1998年)。

会的过程会尝试着改变自然的加速极限,并且这样的尝试往往并非罕见地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因此,在假设绝对的速度极限时应该小心谨慎。尤其要提防的是,将通过大规模的加速推动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心理的甚至身体的刺激轻率地理解为不可控制的或者完全是人类的与生俱来的障碍。火车旅行的历史就能很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在考察了火车的制度化过程后,沃尔夫冈·席维尔布什(Wolfgang Schivelbusch)*非常有才气地复制了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改变,并且说明,"空间和时间的灭绝"(或者说,空间通过时间而灭绝)完全可以作为今天的核心标志的现代全球化过程的停滞,早在19世纪上半叶火车发展的早期阶段
140 就已经表现出来了。[58] 在那个时候,早期的火车旅行并不只是消灭空间和时间,而且也可以当做人类身体可以胜任的速度界限和感官处理的极限:可以抵达远方、不能将事物长久地固定住的、能够在快速的向前运动中感觉和享受从旁边经过的风景的"全景式的目光",必须是逐渐发展并且习惯起来的;早期的旅行者在从车厢的窗户看出去时,由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景象、人物和风景迅速地变化,没有几个人不感觉到恶心的。[59] 因此,席维尔布什指出,随着火车的技术革新,慢慢地一个将移动性作为决定性的要素纳入其中的、新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形成了,并且逐渐发展出新的、与加快的速度相符的感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它们在最初简直是*病态性*的表现同时又似乎是新的正常状态,甚至逐渐被这样要求。[60]

正如埃里克森所注意到的,速度界限的推移和与之相联系的对快速及缓慢的感觉的变化体现在,18世纪时候的火车在当时被看做是快得不可思议而且有损健康的,而在今天却实现了比那时快得多的速度,但是今天的火车却被当做缓慢而悠闲的交通工具,考虑到高速公路和飞机运输,火车简直是"慢悠悠的时代"的典型代表。[61] 特别类似的另一个

---

* 沃夫冈·席维尔布什(1941—),德国文化研究学者、历史学家和作家。主要著作有《疏远的亲戚》《失败的文化》《工业化的旅行者》等。——译者注

[58] Schivelbusch,2000年,第16页和第35页及其后页。

[59] 同上书,第51页及其后页;此外也请参照Treptow,1992年,第7页及其后页,和Eriksen,2001年,第54页及其后页。

[60] "火车上演了新的风景。使拉斯金(Ruskin)('旧的'感知方式的典范式的代表——本书作者注)所感觉到的对象都蒸发了的,并因此使这些对象都进入到冥想式的存在的速度,对于新的感觉来说简直是生活的仙丹妙药。只有通过速度,可见的世界中的物品才能拥有诱惑力"(Schivelbusch,2000年,第58页,参照第143页)。

[61] Eriksen,2001年,第54页及其后页。

例子是，爵士音乐在它出现的20世纪上半叶被感觉为上气不接下气的、急急忙忙的、过快的、机器一般的和令人失去知觉的—混乱的，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而在今天，爵士音乐却被赞颂为“带来安静时光”的特定的音 141
乐形式，“爵士音乐特地为悠闲的午后而准备”。[62]

根据这些现象，席维尔布什追随着弗洛伊德*、伊里亚斯和瓦尔特·本雅明的思路以及齐美尔有关有大城市印记的思维进程的思考，从而猜想，社会生活中的促进文明的加速，让现代人以越来越密集的顺序遭受到新的和攻击性的刺激，它们会带来烦躁不安和烦乱的感觉，涉及人的心理无法以（改变意识和感知的）“刺激保护机制”的加强作出反应。[63] 在对晚期现代性的讨论中，所观察到的对于继续进行的新一轮加速的恐惧的增强，是否只是体现为，在形成恰当的新的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之前，对著名的针对新的加速推力所出现的文化上的反应的反射式的重复；或者这确实标志着达到了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可能是人类学上的更高的极限，这种超越可能会导致现代性在结构上和文化上的布局的倒塌，这一切都是实证式的开放问题。我将在我的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说明，并且尝试着与后一种猜想进行系统的联系。至于对心理的—人类学的速度极限的克服，需要斟酌的却是，如维希留在《移植革命》（*Transplant Revolution*）中所发现的，基因技术和基因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所暗示的新的可能性[64]，使得又一次的革命将可能克服到目前为止稳固如山的障碍。因此，文化的和结构的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可能会比生物物理过程表现出更严重的速度限制。 142

（2）减速岛

当然，也可以找到无论是地域上的，还是文化或社会上的小生境或“减速世外桃源”，在那里到目前为止完全或部分地还没有受到加速的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些地方、在这些群体中[例如，在某些教派中迄今为止仍然与世隔绝的群体，如俄亥俄州的（Ohio）阿米什人

---

〔62〕 参照《爵士遗产的社会》（*Jazz-Heritage Society*）的CD版。这条建议归功于Bethany Ryker，她研究了社会的和音乐的对时间的感觉之间的联系，并且发表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非常优秀的《学期论文》（*Term Paper*）上（Ryker，2002年）。也请参照Ogren，1989年。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知名医师、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图腾与禁忌》等。——译者注

〔63〕 Schivelbusch，2000年，第142页及其后页。

〔64〕 参考Armitage，2000年，第49页及其后页。

(Amish)*的社区]或者在这样的实践中的相互关系[65]里,确实体现着"时间停下来了":这个通俗的习惯用语恰恰体现了抵抗各种进程的社会形式,这样的社会形式与到处都是速度动力的社会系统相比,体现出强烈的不合时宜,在那里,时钟"像是在一百年前"运行——这就是刚才的那个习惯说法所要表达的意思。晚期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减速世外桃源"在地域上、文化上和经济上都越来越强烈地处在被侵蚀的压力之下;这些"减速世外桃源"与它们所处的有着加速能力和加速意愿的周围环境之间,时间距离变得越来越大并且因此更加昂贵,但是与此同时,它们的"刹车作用"也出现在它们与加速的社会世界之间的交界处。这种侵蚀现象的例外当然是有意识地创造减速岛,或者保护一些地方和实践活动形式(诸如"健康绿洲"),它们都属于在这里所界定的减速类型中的第四种。正如海尔格·诺沃特尼和赫尔曼·吕伯一致指出的,这样的加速免疫现象似乎兼具了"怀旧的"价值或者预兆的特性,它们越是
143 罕见,就越是如此。[66]

(3) 作为功能失调的伴随之物的放缓

放缓和抑制在现代社会以更加庞大的规模并且越来越频繁地作为加速过程的计划之外的伴随物出现。在这里包括功能失调导致的减速现象和放缓的病态的形式。最著名的例子无可厚非地首先当属交通堵塞了——例如,在美国的人口密集的州,平均的交通速度自很多年以来伴随着持续增加的交通管理已经不断降低;同时,有关第二点,可以从最新的研究中找到很多线索,抑郁症疾病体现为对社会的加速压力所作出的病态性的从中脱离出来的反应。在抑郁的状态下,时间对于患病者来

---

* 阿米什人是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又称亚米胥派),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着简朴的生活而闻名。阿米什是1525年来自瑞士的德裔瑞士移民后裔,从门诺派或是重洗派分裂出来的宗派组成的传统的、严密的宗教组织。他们不参军,不接受社会福利或任何形式的政府帮助,许多人也不购买保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译者注

[65] 这样的抵制加速的实践形式有时会在广告中被树为理想的,例如在取景于田纳西州(Tennesse)(与此同时它也出现在充满加速的烟草广告中)的著名的杰克丹尼(Jack-Daniel)(美国有名的威士忌品牌,以其方形的瓶子和黑色的标签为主要特征——译者注)的广告,或者在Werther's Echte(德国的著名糖果品牌——译者注)的广告画面中暗示的,只有通过这些不受加速干扰的实践活动才能对两代人之间建立起密切关系有帮助,代际关系在这个受到保护的世界之外,由于社会变迁的加速而导致的代际内部的变化速度的加快,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请参见后面的第五章)。

[66] Nowotny,1993年,第127页和第133页;Lübbe,1998年,第288页及其后页。

说常常变成为静止的或者是黏滞的一整块东西。[67] 只要是因为在生产流程的速度加速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率的加速中的结构性的原因，雇员被排除在职业生活之外也属于这个类型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些加速对于涉及的人来说很难得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即他们无法跟得上经济中所要求的高劳动速度和革新速度的步调，然后这最终导致了以失业这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并非心甘情愿的）极端的减速。[68]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地区用“经济放慢”（economic slowdown）所表示的经济上的不景气，可能本身就是成功的加速所带来的功能失调的副作用——尤其是生产过程中的加速的副作用。[69]

但是，放慢不仅是作为加速过程的伴随物出现，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速度加快所导致的）不同步表现的伴随物，也就是说以“等待时间”的形式出现。在功能分化的社会，各种过程之间必须要一直保持同步，或者说时间上一致，在那里，像过程的加速这样的时间的变化会在需 144
要同步的位置导致潜在的摩擦问题的出现。存在问题的而且能直接感觉到的正是在高度加快的程序与“落后”的系统相遇的地方：运行得更快的过程通过运行得较慢的过程而不断地刹车或者停下来。[70] 在有些情形下，这种不同步（暂时地）导致了强有力的、实实在在的放缓，例如，复杂的工作链条因为中间被卡住而导致节奏被破坏了。因而，滞后的印象完全可以从不同的速度相遇的地方产生，尽管在那里看不到真正的刹车效果。对此，一个有趣的例子出现在当因特网的搜索引擎只是以惹人烦的慢速度提供搜索结果时的那种不可忍受的不耐烦——而它实际上应该是可以适应的。这里最终也涉及同步化的问题：计算机“模拟”对话、回答问题，但经常伴有远远超过了谈话中的可以忍受的“三秒钟注意窗口”的界限的延迟；因此就产生了被计算机“耽搁”了的印象，尽管比起传统的信息获取工具来说，因特网的搜索引擎已经实现了巨大的时

---

〔67〕 请参考第 11 章“3”。

〔68〕 参照 Sennett，1998 年，第 159 页及其后页；有关作为失业的后果的时间结构和时间感知的变化，请参见 Jahoda，1998 年，第 169 页及其后页，以及 Jahoda、Lazarsfeld 和 Zeisel，1933 年。

〔69〕 参照例如 Hall，1988 年。

〔70〕 我们可以在这里非常直接地观察到上述现象：当一位匆匆忙忙的经理忙着向一位有着大把大把时间的卖报纸的人问路时；或者匆匆忙忙的教授在图书馆借书处的耽搁而导致他的时间计划的落空；或者高速的工业生产流程由于过时的一缓慢的维修服务而被落了下来。

间收益了。[71]

最后,放缓和滞后也可以作为(往往是时间紧凑的)事件的功能失调的伴随物出现,如事故、自然灾难或战争(最后一个有时会被有目的地使用,从而延缓敌对国家的发展,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它应该归属于下
145 一个类别当中)。

(4) 有目的的减速的两种形式

无意的和功能失调的减速的现象,与有目的的努力以及往往是有意识形态的基础的运动所导致的有意识的减速和社会放缓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后一种减速又可以分为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减速运动——它通常是伴随着决定性的反现代的推力作为基础的反对力量出现,和放缓的努力——它的目的在于维持或者仍然促进(个体的或社会的)功能能力和加速能力,也就是说最终它甚至仍然表现为加速的战略。

① 作为意识形态的减速

对坚定的或极端的减速的呼吁,正如在反对新的技术,如机械织布机、火车或电话的例子中已经表明的,在历史上,现代性到目前为止往往是作为加速浪潮的伴随现象而出现的,也常常与对现代性的根本性的批判和对现代化的本质上的反对混合在一起。[72] 因而,当这本书中所支持的理论是,现代化进程首先可以被理解为加速过程,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地方了。现代性对失去的悠闲、稳定和舒适的世界的根本的渴望,完全是来自对前现代的幻想的图景,这些画面在社会的反对运动中与对减速的后现代或反现代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激进的放缓的根本要求,面对着所诊断出的加速浪潮,随着 20 世纪末期在工业社会里的数字革命和政治革命,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并且它们也披着对现代文化和社会形式的激进批判的外衣而出现,这些都没有什么值得称奇
146 的。[73] 事实上,政治的激进主义在 21 世纪更强烈地反对持续的变化,并且将保存和停止于现有状态作为目标,因而,彼得·格罗茨提出这样的假设:减速目前"成为正在形成的攻击性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牺牲品正成为快速壮大的阶级(或社会阶层)",因而正要换上作为榜样的社

---

〔71〕 参照例如 Lauer,1981 年,第 30 页;有关三—秒钟—窗口请见 Pöppel,1997 年,第 64 页及其后页,和第 84 页及其后页。

〔72〕 也请参见 Levine,1999 年,第 111 页及其后页。

〔73〕 在一些广受欢迎的畅销书中也指出了这些,例如在 Reheis(1998 年)和 Gronemeyer(1996 年)。

会主义的构想。[74] 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以更好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为名，使现代的加速进程停止下来。它受到了千差万别的宗教的、深层生态学的、极端保守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源头的给养。[75]

放缓运动承诺“通过减速实现新的繁荣昌盛”[76]，并且组成了部分属于知识分子的、部分平民化的诸如“延缓时间联合会”或“幸福的失业者”联盟，为“无所事事的人”而欢庆[77]，而且因此将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和伯特兰·罗素作为传统渊源。[78] 在这样的环境中流行的极端的放慢的观念和幻想加强着向理念的层面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们很难到达行为的重要的结构层面。[79] 这是因为，在后现代社会工业上的放缓要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如果有人（通过加入某个教派、接管一所生态农庄或者沉浸在某种忘却时间的毒品文化中）从速度压力中撤离出来的话，会面临着错过所有的与外界的联系，并且不再会有重新加入的机会。当这个人在若干年后又想回到主流社会的时候，他的资源 147
都已经无可救药地过时了。诸如慢食（Slow-Food）行动、自求简朴（Voluntary Simplicity）行动等这些运动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普及，从而在整个社会中真正成为意义重大的行动，这些都需要拭目以待。[80] 另一方面，自然有很多减速的愿望——尽管甚至不是其中的大部分——最终都不是反对现代社会的，而只是针对它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如工作中的仓促、在自己住处的交通的速度，当然因此它们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减慢速度的需求都是有选择性的，没有考虑到这些需求的正反两面：例如，我们期望着最终能够重新拥有用于自己、家庭和兴趣爱好等上面的时间，而为了实现这些，我们同时就会希望并要求所

---

〔74〕 Glotz，1998 年，第 75 页；参照 Eriksen，2001 年，第 29 页及其后页。

〔75〕 对此有大量的来自于 Tutzinger 项目“时间的经济学”（Ökologie der Zeit）中的著作可以参考（概览性的内容请见 Adam，2002 年）。

〔76〕 这是瑞海斯图书的副标题（Reheis，1998 年）。

〔77〕 参照 Glotz，1998 年，第 76 页。

* 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78〕 参照拉法格 1883 年出版的《懒惰的权利》（*Recht auf Faulheit*）（1998 年），和罗素的《懒惰赞歌》（Russell，1935 年）。

〔79〕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加速技术的强有力的反对，例如破坏工厂和铁路线，自然只能导致短暂的延迟，但是从来没有扭转发展的方向。

〔80〕 所提到的第一个运动的目标是，从从容容、安安静静地享用有机—生态种植的食物；与此同时，从不久以前开始，美国的富裕阶层尝试着开展第二个运动，目的是通过放弃消费，从而打破工作越多、收入越高和消费越多的“加速的恶性循环”（参照，Rosa，1999 年 a，第 739 页）。至少第二个运动已经过了它的顶峰期，但是并没有达到所期望的效果。

有其他人都应该加快速度:超市的收银员、财税局的官员,甚至连交通灯也应该尽快地变成绿色、城铁要开得更快些。因此,在复杂的和互联成网络的社会中,选择性的减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成为可能。

但是,这样的矛盾并不一定会带来这样的努力,也就是为他人建立起与所描写的减速岛意义相似的保护空间,即较慢的时间体验。有目的的减速这种形式也包括类似的"美学—艺术的"降低速度的展现,这不仅使得另一种时间体验的表现成为可能,而且在那里也能够产生对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的感知的改变。[81]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放慢速度体验有时却恰恰是产生于高速运转的结果,例如,人们通过在高速公路上或
148 8字形回旋滑道上的快速行驶从而让自己放松,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将焦虑不安释放出去了。[82] 这似乎是人们通过加速实现减速。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涉及有目的的减速的另一种形式了,这种减速并不是指向对"加速社会"的时间结构的反对,而是对其完全有功能上的帮助作用。

② 减速作为加快速度的策略

局部的、暂时的但有目的的减速过程和机制,对于现代社会的功能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减速形式并没有权利通过意识形态的反对运动的努力,反向逆转为当代的加速动力。这样的放缓速度的战略有时可能是其他的过程的进一步加速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种减速形式既可能被个体行为者所用,也可能出现在社会的组织中。

在个体这个层面上,在寺庙里进行沉思—停歇或者参加冥想课程、掌握瑜伽技术,都属于这一类的减速形式,只要它们的目的是能够在那之后,使得快节奏的职业生活、两性关系和日常生活更加成功,也就是说能够更快地胜任。[83] 它们因此扮演了用于"加油"和"加速"人造的减速世外桃源。例如通过有意识地放慢单个的学习过程,以便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更多的学习内容的尝试,或者通过有目的的中间休息,来提高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也都清晰地体现了通过放慢速度以提高速度的策略。[84]

---

〔81〕 对此请参考 Dieter Ronte 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关于在画廊和博物馆中的时间体验的论文(1998年)。

〔82〕 Radkau,1998年,第220页及其后页。

〔83〕 因而,无可置疑的是,寺庙和瑜伽技术也可以用在所谓真正不同的、减慢速度的生活形式中;如果这样的话,那它们就属于"作为意识形态的减速"这种类型。

〔84〕 有关这样的策略请参照例如 Seiwert,2000年[《如果你赶时间,那么走得慢些》(*Wenn du es eilig hast, gehe langsam*)]。

类似的，在群体的层面上，首先是在政治中，设计并实施不同形式的延期清偿，为技术、社会、法律或也包括与环境有关的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赢得时间，这种延期清偿本身又表现为进一步的加速推动力或现代化 149
推动力的阻碍。[85] 由此打开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的稳定与动态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的视角。对于减速的呼吁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动机——一种是反对现代化的，另一种似乎是“发挥作用的”，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格罗茨将事情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他只是简单地为减速打上现代化的失败者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当中，他忽略了，通过制度性的停止和框架条件的保留、保证所实现的加速，是现代的加速历史的基本原则和成功定理。在中心领域的加速只有通过社会的权威机制，例如法律、政治上的控制机器、固定的工业中的工作（时间）管理，才能够实现统一的而且也是主导性的、抽象文化式的导向——它们集中在进步、合理化、个人主义、普世主义和唯意志主义[86]的价值和观念周围；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期望的安全性、计划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都应该看做是经济、技术和科学加速的基础，也许也是个体的加速的生活形式的基础。[87] 只有在这种稳定的期望视野的背景下，进行长期的规划和投资才是理性的，而它们对于大量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那些机制和导向的被侵蚀，将会进一步地带来仿佛是“没有限制的”加速，正如它 150
被大量的社会科学家在对晚期现代性的诊断中所发现并且为后现代哲学或新自由主义哲学的拥护者所鼓吹的那样，它会将保障晚期现代社会的稳定性的前提条件以及晚期现代社会的稳定性本身都埋葬，因此现代的（加速）规划将比那些反对现代的减速运动遭受到更强烈的威胁。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已经指出了这种可能性，通过为了使加速最大化而清除所有速度障碍的努力，也就是说解放“整个

〔85〕 对于 Chesneaux（2000 年，第 411 页）而言，这样的延期清偿本质上属于民主社会和现代社会，因为它将未来的地平线面对所有推动加速的封闭趋势保持开放，并且正因为如此，而使得未来的发展成为可能。进一步请参考 Eberling，1996 年，他建议，将起减速作用的延期清偿作为政治用来夺取对科学、技术和经济中的独立的过程的控制权的中心工具；类似的还有 Reheis，1998 年，第 217 页及其后页。

〔86〕 将后面几个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稳固的基本价值是按照帕森斯式的“模式维护”的意思来确定的，参照如 Voß，1990 年。

〔87〕 我将在第三章“4”中详细地讨论这个论点；对此也请参照 Bonus，1998 年。

*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景气循环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和《经济分析史》等。——译者注

市场",能够实现与本来目的对立的一面:发展动力的完全崩溃和通过衰退和萧条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放慢速度。因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枷锁和刹车"[88]可以作为进一步加速的有用之物。[89]

赫尔曼·吕伯的观点是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将一些文化的原点的牢固性和得以存在的保障也看做是成功的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并且也作为灵活而且快速的社会变化的条件:

> 高度的文化发展动力是以一部分文化要素的有效性的高度稳定性为前提条件的。多变的文化通过对它的动态性作出补充的快速的传统过时的速度,而会威胁到自身,并且会在这样的挑战中……被终结,因而越是需要文化的稳定性发挥作用,适当的可逆
> 151 性的传统的存在就越重要。换而言之,无论是从机构的,还是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这都体现了个体的和机构的对革新的处理能力的极限。[90]

从这个角度看来,需要强调的是,用来阻碍必须存在的制度被侵蚀的有选择的社会减速,既在文化上也在功能上是当代加速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加快速度压力下的晚期现代社会中对这种侵蚀趋势的研究,是这本书的第四部分的主要工作。

(5) 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停滞

在社会加速的理论框架下,在(至少是在表面上)与之相反的减速当中,可能最有意思的形式,应该是文化上的和结构上的停滞或者晶化的现象了,我们在这本书的论述过程中不止一次遇到这些现象,并且将它们作为在放缓或停滞的类型中的第五个和最后一个。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在与社会加速表现得密切的联系中观察到文化上的和结构上的停滞,并且形成诸如"历史的终结""创造乌托邦式的能量""文

---

〔88〕 这是 Claus Offe(1989 年)的一篇论文的题目。

〔89〕 事实上,熊彼特用实用主义的论点为以下观点辩护,快速的而自由的经济发展首先需要维护在国家的干涉、价格联盟和同业垄断集体下形成的制动、静态—低效率的市场限制,因为它们最终是"长期的扩张进程的加速要素,它们更多的是保护加速,而非阻碍"。这样的观点"就像说有刹车的汽车可以比没有刹车的汽车开得更快一样,是不矛盾的"(Schumpeter,1993 年,第 146 页)。因此,如同 Offe(1989 年,第 752 页)对此所评论的,资本主义的巨大的成长动力对于熊彼特来说,"恰恰不以自由的价格竞争和市场关系的不受阻碍的发展为基础,而是建立在通过垄断主义的实践而形成的(暂时的——本书作者注)束缚基础之上的。"

〔90〕 Lübbe,1998 年,第 288 页及其后页;参照 Brose,2002 年,第 126 页及其后页。对于文化再生产的问题的富有启发的讨论也请见 Bonus,1998 年。

化的晶化”和“零选择性的乌托邦”这样的理论;[91] 而对现代社会内部发展的瘫痪的静止状态的假设,是对社会变化加速的诊断的互补。现代社会的坦率和它的迅速而持续的变化只是在“用户表面”的表现[92],与此同时它的深层结构却是未被人注意到的坚硬和僵化。在第二章“3”我提出了这项研究的基础假设,即社会的过度快速和社会的停滞作为相 152
互补充的过程——“快速的静止”这个隐喻是对它们最有表现力的表达,不仅是以一定的定额方式而且是系统性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包含在这个类别中放缓的形式并不与现代的加速动力相对,而且也没有形成功能失调的副作用,而是这种放缓的形式表现为加速进程的内在要素和固有的互补原则。因为要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的独立的一章里对它进行分析,在那里将对所开发的加速理论进行系统化汇总,因而在这里就不再对它进行赘述了。

4. 有关现代社会中的运动和停滞之间的关系

在刚刚的这个部分里所介绍的停滞的类型清楚地指出,随着现代的开始“一切”都将越来越快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许多事物都保持着同样的快速(或者慢速),而有一些甚至放慢了速度。在那个尽管被固执地一再重复的公式里,反映的却是对于现代而言完全是决定性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在停滞要素和加速要素之间的不断向前的平衡的切换是有利于后者的。[93] 根据对社会加速和社会减速的形式的定义,现在我们能够呈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因此检验那些想法的可信性。

在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可能性值得思考:第一个是,导致停止的力量和导致运动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保持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会的速度结构中既能发现加速的过程,也能发现减速的过程,而且看不到有任何一种长期的主导方向。相反,第二种可能性却是,事实上,这种均势是向着运动和加速的方向移动的,也就是说,是有利于持续的动态的。 153
当能够被发现的(而不是发挥功能的)放缓的元素和与加速力量相对的停滞被证明既没有残留,也不发生反作用的时候,第二种判断是(而且只是这种情况下时才是)正确的。

---

〔91〕 Fukuyama,1992 年;Habermas,1985 年;Gehlen,1978 年和 1994 年;Offe,1986 年。
〔92〕 参照 Baier,2000 年。
〔93〕 参照 Rosa,1999 年 b。

而我的假设是,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条件事实上是可以满足的。我的理论涉及两个假设:第一个是,前文所提到的停滞的类型详尽阐述了所有重要的现象;第二个是,这些停滞的类型中,没有能够作为相对于现代的加速动力的结构上的和/或文化上的等量齐观的相反趋势。对这两个假设的验证如下:在"自然的速度极限"(减速类别1)和"减速岛"(减速类别2)这两个类别中所保护的现象体现了(被拒绝的)目前为止的社会加速的界限;它们并没有代表任何反作用力。第三类的放缓("作为功能失调的伴随之物的放缓",即减速类别3)体现了加速所带来的后果,并且是从加速中所引导出来的,因而这种类型的放缓对于加速而言是第二位的。相反,划分在"有目的的减速"(减速类别4)中的第二种形式"减速作为加快速度的策略"(减速类别4②)当中的过程,对于加速过程本身而言却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的,因为它们必须或者体现为加速过程中的要素,或者至少属于保证加速的可能条件和/或是使加速得以存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放慢速度不是加速的反向趋势。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减速"(减速类别4①)中,列出了反对社会加速的有目的的抵抗的努力,而且减速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又一次成为对加速压力的反应也表现为加速压力所产生的结果。作为意识形态的减速伴随着现代每一次因为新变化而带来的加速浪潮,尽管如此,这并不能保证未来也会是这样,因为这种减速往往更多地被证实是短暂的并且最终是非常失败的。伴随着加快速度动力而出现的交往方式的变化可能说明了,变化的原因正是在这对没有目的的反抗的反复的体验之中,并且从中体现了,"高技术——一代"与他们的前辈尤其是在青年运动中,有着多么大的区别。到目前为止的运动,如1968年的运动、嬉皮士、绿色环保运动、新生代运动等,都伴有对(来自社会和机器的)加速迫力的反抗的烙印。但
154 是这些运动至少在这个层面上都失败了。今天的"高科技一代"可能从中吸取了教训,并且拒绝反抗:和当时的*未来主义者*(正在消失的一个小群体)将寄希望于加速进程的顶峰相似,"高科技——一代"使用所有能够节省时间的机器和最快的媒体及技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赢回对时间和技术的主权,并且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机器,而不是用无意义的反抗将其捣碎。然而,正如我将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所要讨论的,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应该就是现代的规划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在每种情况都可以看到,减速的力量既不能在结构上,也不能在文化方面与加速动

力势均力敌，它们更多地像是处在寄生的地位。[94]

仅是通过五个类别中所包含的文化上和结构上的减速过程，并不能将减速看做次级的、作出反应的或残留的现象；相反，它们其实更多地表现为加速过程自身的固有的和决定性的元素，并且与加速过程一样也是与现代性密不可分的。分化过程、合理化过程、驯服过程、个体化过程和加速过程是现代化过程的基本趋势，而在减速过程中，是围绕着现代化过程的（特别是与加速有关的）反面进行的，并且可以猜测，这些反面会随着加速本身的力量或者生长或者消失。

尽管我们可以没有任何质疑地指出，加快速度的趋势没有面对势均力敌的反抗力量，但是，认识到制度性的静止对于现代加速的成功是主要的社会的基本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框架条件的确定尤其产生于，通过法律的设立、政治上的调节、经济的增长、教育和职业的发展稳定而铺平的稳定的发展大路，并且由此出现了在早期现代的每个社会领域的液化和动态化的第一个阶段和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大生产阶段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传统和广为流传的价值原则的被质疑、新的实践行为的确立，早在现代伊始就使社会机制的偶然性显现出来，而且完全将社会 155
动态化或“液化”。社会构架的制度性再确定［或者用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的概念——组织化］[95]，通过现代的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取消那些根本的偶然性和可变性，因为根据现代法律和民主政治的特性，它们是动态发展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变化是在固定的轨道上或根据可以预测的规则进行的。

对于个体而言，当他们从出生到接受教育直至退休都按部就班的话，就能够拥有可信赖的人生—历程；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创造长期的可预测的基础和预期的确定性，就能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我将要尝试指出的是，正是通过“游戏规则的放缓”[96]，才使得物质材料的再生产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极大的加速以及许多——尽管不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液化成为可能。因此，现代性在它所包含的机制中似乎创造了一个

---

〔94〕 参照 Hörning、Ahrens 和 Gerhard，1997 年，第 176 页及其后页；Baier，2000 年，第 12 页及其后页。

* 彼得·瓦格纳，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社会学》等。——译者注

〔95〕 瓦格纳（Wagner，1995 年）在现代的历史中定义了相似的三个阶段：液化过程、重组织化过程和晚期现代的机制和导向模式的去稳定化过程。

〔96〕 这是 Holger Bonus 一篇论文的题目（1998 年）。

特有的停滞的片刻,这个瞬间对于现代性的突出的基本趋势是一种奇怪的张力,"静止的和固定的"一切都转向和变成运动的。根据机制(Institution)的拉丁词根,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断增强的变化也都要经受着固定不变和停滞;因此尼采早就看到机制这个概念与"现代精神"之间的矛盾了,在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指出:"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直觉了,都是从机制中产生、从未来中成长,西方世界的'现代精神'最后可能就变成令人极其厌恶的虚无。人们只为今天而活着,人们生活节奏很快,因而人们生活得非常没有责任感——这正是人们所谓的'自由'。机制从制度中做了什么,不被重视、被仇恨、被拒绝。"[97]

156 然而,将在下文中进行论证的命题却是,机制和现代精神可能不再是矛盾的,因为加速力量已经发展到那些影响着和推着它发展的制度性的结构已经无法跟上其步伐的程度了,并且正向另外一种情况过渡:现代性本身将成为加速的阻碍和制动力量。社会的加速将超过加速力量,并且从此开始将它侵蚀并且导向社会框架条件的制度化静止这个阶段的终结,而在这样的阶段里,根据游戏规则,经验领域和期望视野是完全相同的。正如我将在第四章中指出的,这对于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曾被韦伯作为加速器而赞美的、在过度加速的时代却会变成缓慢而缺乏灵活性的)科层制度也是一样,但是可能对于代表民主的制度、"典型的现代"的工作(时间)管理、生产和再生产——或者说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制度性分隔、生活历程管理、稳定的个人身份确定的"制度化",以及甚至是对于法律也都是有效的。[98] 但是,这样的发展的后果几乎是不可预见的。这样的发展可能矛盾地导致加速机制自身的投降,更确切地说是以两种方式:第一种(在狭义的意义上)是以放弃前进的前景和"道路"为代价,而进入到以所有发展方向都缺席为特征的"迅速的静止"的情境中;另一个是,通过似乎是"后现代的"腐蚀过程而从根基上动摇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极端稳固"[99]的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现代社会的结构。

因此,可以看到,停滞和运动的关系在现代历史上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从前者到后者的线性发展,并且因此社会的变革也不能被看做是线性的加速过程,而是以特有的方式,或更确切地说是遵循着马克思

---

〔97〕 Nietsche,1988 年 c[《不合时宜的概述》(*Streifzüge eines Unzeitgemäßen*)],第 39 段。

〔98〕 对此也请参照 Rosa,1999 年 b,第 393 页及其后页,以及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99〕 Schulze,1997 年 b,第 79 页。

和恩格斯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的发展逻辑的。看来，加速的动态力量根据它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要自己创造它所需要的制度 157
和实践形式，并且在实现这个目标后，又会通过它自己使之成为可能的速度极限去毁掉这些制度和实践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它与加速动力密切相连），而是速度的加快令人惊讶地表现为（现代的）历史的真正的驱动力。对现代加速过程的这样的看法，当然也隐藏着未经深思熟虑就将加速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危险。为了应对这样的危险，我将在这个研究的第三部探寻现代的加速圈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机制。 158

第二部分

影响方式和显现形式：社会加速的现象学

第四章　技术加速和空间—时间—制度的革命

没有人会想到去怀疑，经过严密论证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有关在现代社会的历史中交通、通讯和生产的巨大的加速过程的实证证据，因此，在这里可以放弃对它们再进行一一讨论。由于技术加速，人们在“这个世界中”——也就是在时间、空间和相互关系中，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以及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又使占优势地位的对自我和世界的解释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且因此主观性和团体的构造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1] 为了证明这个假设，完全不必拥护技术决定论*：正如将要指出的，技术加速本身是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前提条件所带来的结果，而且技术加速对主体性的形式和团体的形式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个事实，也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决定它们。对于空间与时间感知和概念化的改变、技术革新在这些变化中的运行方式以及与这些变化相处的方式，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的。事实上，运输和通讯的可以感受到的明显的加速已经发生了，并且它们开始独立于之后在工业革命中所输出的巨大的技术革新，如蒸汽机和电报。莱因哈特·科泽勒克这样说道：

> 前机器时代的速度提高从17世纪开始就有很多记载。道路网

---

〔1〕 参照 Rosa，1998年，和2004年b，Charles Taylor 的哲学观点里涉及证明这个假设的一些重要的元素，他认为自我解释和世界解释的变化了的形式最终对于主体以及社会现实是非常重要的。

* 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于技术发展的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它建立在这样两个原则基础上：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其理论可分为两大类：强技术决定论和弱技术决定论，前者认为技术是决定社会发展唯一重要的因素，而后者则主张技术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译者注

161 络和运河的建设提高了运输单位,也就是在同样的时间里,完成了更长路程的运输。[2] 在法国街道上的私人马车的平均速度从1814年到1848年翻了不止一番:它从每小时4.5公里提高到9.5公里。在同一个时期里,在普鲁士,邮件从柏林到科隆的投递时间从130小时缩短到78小时……类似的速度提高的开端,我们也可以从海上通道中发现。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北美设计了快速帆船,这种窄长的帆船有着高高的桅杆,它从纽约经过合恩角(Kap Horn)到达旧金山(San Francisco)(19000公里)需要航行90天,而不是之前的150天到190天……它实现了蒸汽船在很久以后才达到的速度。

类似的现象也可以从消息传递中看到。在电子电报投入使用之前……其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光学电报网络发展到了最完美的状态。通过将巴洛克行政管理文书按规定精简、通过将信号体系化,然后将它们从一个高塔传递到另一个高塔,使得符号传递的速度大大提高。[3]

这样的从运输到通讯的技术的加速,但也是前科技的加速,已经显示了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改变,这些首先体现在对地点的空间感知和对空间的时间感知的不断分离。因此,地图和机械表上的科学—技术革新的普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地图的使用的增加改变了"自然的"、与地点联系在一起的空间观念,这种观念的中心例如"这个村庄",是观察者的生活的中心点,而地图将中心圈子中的生活世界的地平线伴随着不断减少的熟悉而向外发展,到达抽象的空间观察中的一定程度上的
162 "没有地点的"或中心不断变化的形式。我们很容易看到,后一种视角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即空间可以概念化为可以控制和消除的,因为观察者可以用变化的方式与空间发生联系。[4]

与此紧密相连的是时间从空间当中分离开来,这首先是通过机械表的发明和普及而成为可能的。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时间感知首先似乎是空间感知的功能:时间感觉之所以得以产生,是因为我们所在的位置上的空间特性发生了变化,例如它变亮了、变暗了、变成夏日的酷热

---

〔2〕 但是,在这里科泽勒克无疑作出了在第三章"1"中所指出的错误结论,他将数量的增加理解为加速的固有的后果;正确的应该是:"在同样的时间能够完成更长路程的运输,能够(但并不一定必须要——译者注)提高运输单位",即速度的提高使得相应的被运输的数量的增加成为可能。

〔3〕 Koselleck,2000年,第158页及其后页。

〔4〕 对此首先参照 Harvey,1990年,第201页及其后页。

和冬天的寒冷。因此，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直到19世纪——或者说最终直至铁路的建成，由于火车是以时刻表的固定不变为基础的，才迫使至少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时间出现；[5]在这里技术和意识之间的辩证过程又发生了颠倒：每日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或者至少是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是不同的：当太阳升到顶点的时候，就是中午了（而秋天是当地里的某些果实成熟的时候，等等）。相反，机械表[6]使得时间从空间那里分离出来；因为有了机械表，因而基本上时间的确定不仅能够独立于空间的特性而且从根本上能够独立于具体的驻留地点。1912年，在巴黎召开的全球时间大会将1884年已经设计出来的统一的、全球有效的世界时间引入使用，模仿通过地球仪所确定的没有地点的空间确定方式，使得近似于没有地点的时间确定成为可能。[7]

通过这样的发展，时间从空间中解放出来了，成为独立的和权利平等的世界的维度，因而之后尤其是运输方式的加速革命——它又使得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时间—制度发生了进一步的革命，使得空间在感觉和它对社会和文化进程的重要意义上似乎“萎缩了”，并且最终 163
直接使时间的功能成为可能。科泽勒克为时间和空间的这种类型的重新概念化引用了《当代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 der Gegenwart*）中的一段记载作为解释性的例子，这是关于1838年的火车的特点的：“火车通过在时间中的靠拢而取消了空间上的分隔……因为所有的空间都只是通过我们所需要的那么多时间将其穿过的，它对我们意味着是距离。当我们加快速度的时候，空间对生活的影响和空间中的往来自身就缩短了……火车将欧洲缩减为大约是德国的面积。”[8]

空间萎缩或时间—空间—压缩的过程在20世纪通过汽车和飞机以及最后宇宙飞船的发明和普及，而继续向前发展着，尽管最后一个交通工具直到今天自然还不是生活世界的空间意识的直接组成部分。但是即便不管它，从这个角度来看，空间从18世纪以来已经缩小到约为那时的六分之一了（参照图*4-1*）。

---

〔5〕 直到1870年仅是从华盛顿到旧金山这样一段路途中就使用着200多种不同的地方时间（Kern，1983年，第12页；美国从1883年才开始使用全国标准时间）；参照Levine，1999年，第101页及其后页；Schivelbusch，2000年，第43页及其后页。

〔6〕 机械表早在13世纪末期在晚期中世纪的修道院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并且之后很快在城市生活中获得了对劳动和交易调整的功能（参照LeGoff，1977年；Dohrn-van Rossum，1988年，Thrift，1988年）。

〔7〕 参照Kern，1983年，第12页及其后页。

〔8〕 Koselleck，2000年，第1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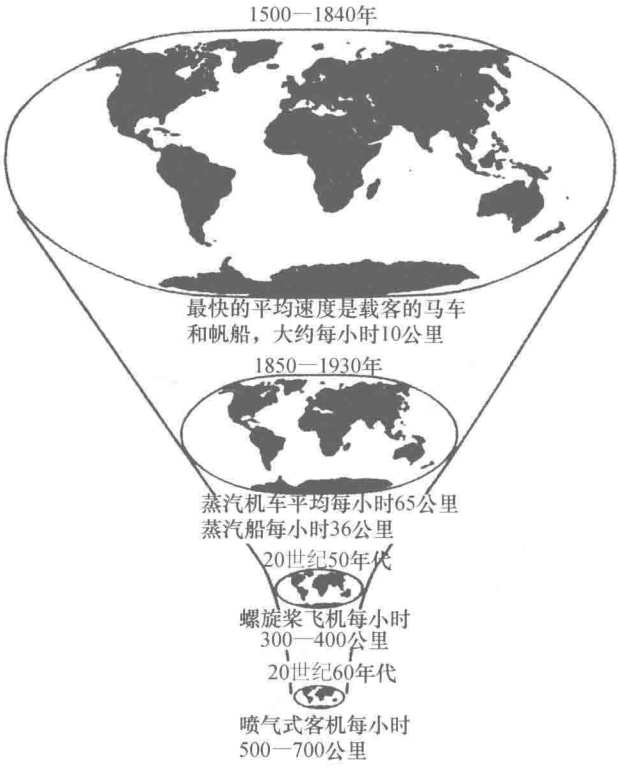


图 4-1 通过运输速度的加速而导致的空间的萎缩
(根据 Harvey,1990 年,第 241 页)

在空间萎缩的过程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所产生的影响中,可以直接用现象学来对这个过程加以理解。正如维希留,当然也包括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所指出的,空间意识是紧密地与自身在空间里向前运动联系在一起的[9]:只要我们用脚向前走着,我们就在空间的所有特性中感知空间,我们感觉、嗅闻、倾听、观看它。因为道路的建设而开始将一块块地方铲平、去除障碍、加工整理空间的特性;空间不再是供在其中漫游,而是被有目的地穿过。随着高速公路的发明,空间又被缩短、被挤压在一起、逐渐淡出。当将目光从永远一样的行车道上移开并看向周围的时候,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在那里,司机不再能看到从身边经过的风景了,而是要去读取路边的或者甚至是车载电脑的显示屏上的那些抽象的符

〔9〕 Virilio,1980 年;Gronemeyer,1996 年,第 107 页及其后页。

号。现代的“空间灭绝”的基本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有着非常现实
的基础的。而当人们最终乘上飞机的时候，生活中和地球表面的地形上 164
的空间就完全消失了；对于他们来说，空间就只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距离，是用飞行所持续的时间来衡量的。现代的旅行者与时钟做斗争，因为他们必须要到达中转站和遵守约定的期限，而不再与空间作对，因而，在这里也反映了在定位维度中从空间优先向时间优先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也涉及行动计划和障碍的出现。所以，并非罕见的是，现在空间在
确切的意义上确实只是时间的一个功能：人们在什么地方，取决于时间， 165
反向的确定关系现在已经过时了。[10]

空间终于在物理的运输过程被电子的信息传送所代替的地方，完全失去了它的导向职能：在因特网中，尽管仍然记录了数据输入和查询的时间，但是不再登记它们的地点了——后者对于很多事件都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而与此同时，有关时间的报告进一步在全球活动链条的协调和同步化方面赢得了重要性。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将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变得仿佛是“没有地点的”。

空间失去价值的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个只是表面上的矛盾，因为与从中所产生的趋势相反，地理的空间和地缘政治的空间，以及有时也包括一些地方的本地的特殊性，对于很多决定和发展而言突然赢得了新的重要性：恰恰是因为对于诸如空间的经济投资决定和选址决定是偶然的和可替换的，因而本地的和地区的差异（例如，气候、基础设施或政治方面的）突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它们甚至能（暂时地）导致地区身份的升值、变得与众不同，尤其是当这个空间再次具有政治性。[11] 但是，这种

---

〔10〕 Johanna Maxer 用非常出色的、艺术的、诗歌般的方式完成了一篇以非常出色的双重含义的题目《离开维尔茨堡》（*Weg aus Würzburg*）为题的文章，并且获得第四届德国研究奖[《速度！这个加速的世界》（Tempo! Die beschleunigte Welt）]。Maxer 通过文字和图表，将运用八种不同的技术或媒介而处于在路上的状态时的那些特殊的自我感知、世界感知和时间感知记录下来，从而论述了在时间社会学的文献中不断被假设的——但是却没有被阐明的——人类的与自我关系和与世界的关系通过他们的占主导地位的前进的方式以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所“探查到的”他们的机动性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这样的探测使得她能够通过原始的和保持前后一致的自我研究，非常清晰和细致地观察了自身对空间、反应模式、人的和运动形式的以及交通流的原时的感知，并且因此在这里也能够观察到这当中所出现的冲突，以及通过艺术的方式将这种变化用文章、图画和美术设计等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她还在有关所选择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媒介对我们的客观的、主观的和社会的与世界的关系影响这个方面，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解。

〔11〕 Harvey，1990 年，第 271 页及其后页；比较 Castells，1996 年，第 376 页及其后页。

166 重要性的获得只是表面上的或者次要的:因为这涉及空间已经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它是不可动摇的真实、不可改变的背景条件这样的特性,并且步入了具有现代的偶然性、选择性和暂时性的特征的领域。

这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20 世纪(晚期)的"传输革命"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达到其运动方向最高点的"运输革命"的逻辑是相反的:后者的动力性能存在于,用不断加快的速度使更多的人员和物品在地球表面移动;而前者的动力性能却似乎是通过虚拟化和数字化将地点和物品进行复制,从而能够在各个地方都能"静止地"获得它们。运输革命将人们带向世界,与之相反,传输革命却是将世界(虚拟地)带向人们。因此,对于维希留而言,这个动态性的过程会辩证地突变为停滞过程,在那里面,人们并且最终也包括物品本身实际上都不再移动。在最终的登峰造极的场景中,一切都是动态的结果就是流动的数据流;数据流伴随着"移植革命"的开始,通过诸如"数据手套"和"赛博感应外套"或者甚至是新型的计算机和身体之间的连接,就能够传输地球的所有空间特性,而且甚至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完全逼真地向更远的星球传输,因而"真实的"地点确定的尝试已经是空洞无物的了,这正是维希留对于最终的"快速的静止状态""极限惯性"的想象。[12]

尽管在今天,教育学家、心理专家和儿童医生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儿童和青少年有太多的时间被动地在计算机和电视荧屏前度过,并且因此对他们的空间定位能力和他们的运动能力都有着令人担忧的威胁[13],但是丝毫不用怀疑的是,目前这样的诊断最多也只是描绘了逻辑上的趋势,因为人员和物品不仅虚拟地移动,而且也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高速度真实地在空间中移动。尽管如此,全世
167 界范围内同时存取各种类型的信息,和由于运输加速而导致的"空间萎缩"——它被麦克卢汉*隐喻为"地球村",也被比喻为通过卫星图像所带来的非常可信的"宇宙飞船中的地球",或者是如同电信企业的广告中所说的那样:"那里将不再是'那里',我们都将在'这里'",都直接带来了新的观念特性;而且,新的流行潮流、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当然也有新的疾病类型、恐怖活动形式等作为组合在一起的各种加速的结果,在

---

〔12〕 Virilio,1998 年 a;对照 1993 年,第 7 页及其后页和第 17 页,进一步还可参考 1980 年的好几处,和 1997 年,第 9 页及其后页。

〔13〕 参照 Baur,1989 年;Fölling-Albers,1992 年。

*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2),20 世纪媒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古登堡星系》《理解媒介》等。——译者注

全世界几乎是同时登场了，由此那些新的观念也将被强化。

与此同时，正如曼努埃尔·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安东尼·吉登斯或者约翰·厄里（John Urry）*等社会学家所阐明的，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和通讯革命这些关键词下所形容的过程，不仅导致了空间的含义和体验的变化，而且它们也改变了社会时间的形式和对它的感知。伴随着新媒介的几乎是没有极限的存储潜力和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的不同时的同时性的现象的增多，时间开始丢失了它的非线性的、帮助定向的特性，因为连续性和时间顺序之间的相互联系似乎正在不断地松开。

我们可以通过五个例子来详细解释这一点：（1）在因特网中的信息和数据是在不同的时间点输入的，并且它们告知了不同的历史时代的信息。这些信息和数据不间断地而且不分等级地放在一起，并且通过在有序的、有固定的时间顺序的地方用五花八门的、碎片化的模式来排列，从而有时系统地削弱了时间方向。时间—顺序的错乱的现象可以在大量的视频、电影和电视生产中的作品里找到文化上的对应物，在那些作品中，图像和消息的时间顺序的—连续的和线性的—记叙的排列，被时间—空间的活动布景的联想式的、万花筒般的交替出现所代替了。[14]（2）类似的，这个时代的不同步通讯的形式（例如电子邮件、电话答录机）可以使得将交往联系“去时间化”并且按照任意的顺序、在任意的时间点上又将其激活成为可能。（3）同样的，文化后现代的不同寻常的风格原则也符合这一点，在艺术和建筑、流行和生活方式，甚至有时在政治和科学中，出自不同时代的元素能够用电子的方式被作为平等的要素放在一起并用多种方式连接起来。（4）如同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一样，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似乎是属于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时代的事件和插曲，会按照偶然出现的顺序或前后或并列地一起出现[15]：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在阿富汗，战争和21世纪的世界政治在一个中世纪的宗教国家 168

---

* 曼努埃尔·卡斯特斯（1942—），西班牙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城市问题：以马克思的路径》《经济危机与美洲社会》和《网络社会：从知识到政治》等。——译者注

* 约翰·厄里（1946—），英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和《旅游文化》等。——译者注

〔14〕 有关在文化中察觉世界体验的有序排列的丢失并将其搬上舞台的一个可能最有趣的例子当属 Christopher Nolan 的电影《记忆碎片》（*Memento*）。电影中的主人公失去了将事件和信息储存到长期记忆里的能力，因而世界对他来说就像是无法识别其相互联系的一系列的事件，因此电影在时间上是“后退的”。

〔15〕 有关对于这种感知的系统的解释请参照第12章“3”中对历史的去时间化的进一步的思考。

(和那里的战争的缓慢形式中)相遇,这个宗教国家一方面通过新方式与恐怖活动的高度现代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但随时又会退回到前现代的种族战争的时代。同样也有可能,在一个"全球化城市"的街道上漫步时,会看到一个展现出中世纪景观的市场和宗教场景的街区出现在21世纪的金融和通讯中心当中,同时在那里又可以看到让人们想起工业革命的工业区——的确,这三个时代的元素在同一个市区中完全有可能相互碰撞。(5)最后,在涉及生命历程时,生理年龄也丢掉了它的有序的排列功能:受教育阶段可以替代就业阶段,可能在很大的年龄开始为人父母或者才退休,单身状态可能出现在婚姻状态之后,等等。

安东尼·吉登斯将这一类的过程定义为"时间—空间—区隔"的变化和扩展,它们主要是以社会事件从随处可在的时间—空间—模式中分离出来为标志的;[16]而曼努埃尔·卡斯特斯为信息时代的占优势地位的时间形式打上让人们想起"没有地点的空间"这个概念的"没有时间
169 的时间"的烙印:

> 当我为我们的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时间性做标记时,我提出了"没有时间的时间"这个概念:它发生在具有信息社会的范式和网络社会这样特征的环境中,在现象有序地出现在背景里这个方面诱发了系统的扰动。这样的扰动可能是以压缩现象的发生的形式出现,目的是实现即时性,或者是在顺序进行中引入任意的中断。对顺序的消灭创造了没有差别的时间,它与永恒相当。[17]

显而易见的是,不仅是空间,而且至少在一些背景下也包括时间,丢失了它们的帮助定向的功能,这使得在晚期现代的行为的相互联系中构建新的定位感知能力就显得是必不可少的了。我将在对社会加速的后果进行讨论的部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变化,或者社会的时间—空间—制度的变化,并不是通过技术加速所引起的这样或那样的变革的唯一的形式,在这些变革当中,主体将"在世界中确立"。用简化的和图示化的公式来表示的话,将能够更确切地发现,正如我们与空间的关系主要通过运

---

〔16〕 Giddens,1995年b,第33页及其后页。

〔17〕 Castells,1996年,第464页。这样的时间表现出令人感兴趣的停滞不动和"冻结",如同维希留所说的以空间为中心的"极限惯性"。两个概念都因此非常清楚地在本项研究中被定义为社会加速的固有的和矛盾的反面的社会停滞。有关它们的逻辑关系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进行分析。

输的加速而发生了变化，我们与人的关系通过通讯的加速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同样我们与物品的关系通过（再）生产的加速也发生了变革。而之后，所有三种加速都推动了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参照图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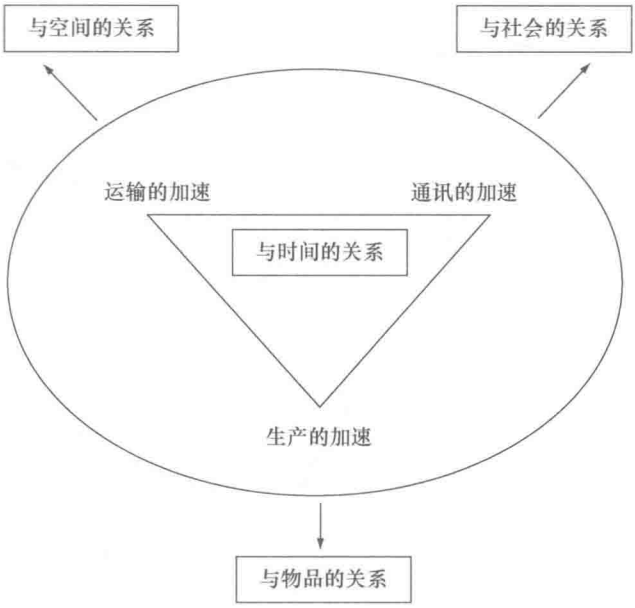


图 4-2　技术的加速和世界关系的改变

我们与空间、与他人和与物品世界的物质结构的关系的改变，正是遵循共同的逻辑的，而这个逻辑正是完全代表了现代化进程的特征，即现代化进程将似乎是“液化”的，也就是可以发生短暂的、迅速的变化，而且是偶然的。[18] 因而，交通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的移动性解开了主体 170
与有地域的空间之间的古老的联系；与此同时，带来了“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与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人保持通讯联系”的趋势的通讯技术的发展[19]，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关系的变化的重要前提。这样的变化首先产生于，联系模式和相互关系不再或者只是在较小的范围与共同的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并且因此，一方面是容易解除和改变这样的联系，而另一面也包括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其次，是从通讯

〔18〕 对此也请参照 Zygmunt Bauman 对“液态的现代化”的判断（2000 年）。
〔19〕 参照 Myerson，2001 年，第 12 页及其后页。

171 对象的增加和快速变化中产生;第三个是从通讯媒介的变化中产生,这种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互动的质量并且因此影响社会关系本身。面对面的接触和凭借媒介的互动之间的形形色色的差异,正是有关这方面最好的例证。[20]

生产的加速最终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物质结构——我们的衣服和鞋子、我们的住房或至少是我们的家具、厨房和浴室、我们的家电用品和劳动工具、我们的汽车和奢侈品的——不断变化的主要前提条件。这些产品在生产方面的巨大的加速,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经济命令所要求的成为可能,即材料转化的全部的社会系统和其中的资本转化的速度的加快运转。[21] 因此,我们身边的日常用品也完全与我们生活世界的
172 物质结构一样同样是偶然的和暂时的。由此,可以假设,主体和物品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通过这种关系的不断的过时和变得陈旧(昨天仍然是承诺加速的计算机在今天由于更快的程序它就已经变成了制动闸了),并且通过扔掉和替换代替(去)修理成为经济的合理性[22],构建身份时与这种关系的"融合"过程,或者甚至是连生在一起的过程也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了。[23]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性的特征是,持续的置换通过道德上的耗损(马克思)所产生的物理上的磨损,物理上的磨损是物件和设备做物质上的替换的原因:这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前

---

[20] "在面对面的社区中,他人所扮演的角色相对固定。只有出生和死亡的变化,而从一个城镇——很少是州或者国家——搬到另一个城镇是很困难的。而在今天的世界,通常维持的关系的数量与过去形成很大的反差。列数一下某个人的家庭成员、晨间电视新闻、汽车收音机、火车上的同事和地方报纸,典型的长距离上班往返的人在一天的最初两个小时里就会面对许多(在观点或形象上)完全不同的人,这几乎和生活在社区当中的前辈一个月遇到的不同的人的数量差不多了",Kenneth Gergen(2000 年,第 62 页)认为技术加速是导致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数量和强度的增加的关键,这也使得在后现代社会社交世界进入到"成功地突破"(饱和的)自我的状态:"通过这个世纪的技术发展,我们能够保持的关系的数量和种类、可能的接触频率、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强度和能经受多长时间的考验,都稳定地增长着"(同上书,第 61 页,参照第 49 页及其后页)。有关随着通讯领域的技术加速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可以进一步参考 Eriksen,2001 年;Myerson,2001 年;Kirchmann,1998 年,以及 Hörning、Ahrens 和 Gerhard,1997 年;同样请参照本书第五章和第 11 章"3"。

[21] 正如齐美尔(Simmel,1900 年,第 637 页及其后页)已经指出的,家居布置中的重要部分,即今天我们所谓的"家具",直到进入现代社会很久了,仍然完完全全是房子中的固定的、不可移动的一部分;不动产,在今天,至少是在美国房屋本身也是机动的。

[22] 如同诸如 Linder(1970 年,第 38 页及其后页)所指出的,"一次性的社会"的趋势的合理性基础在于,因为生产过程能够比几乎不能加快速度的修理过程要有着更为强劲的加速,因此后者相比于前者要昂贵得多。

[23] 对此参照第 1 章"3"。也请参考 Frisby 追随瓦尔特·本雅明的思考(Frisby,1988 年,第 230 页及其后页),以及齐美尔(Simmel),1900 年,第 638 页,和 Rosa,2002 年 a。

进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物件和设备的物质实体部分会被（不可修复地）用旧或耗尽，而且它们在技术意义上会“陈旧”或者在时尚上会过时。因此，物件和设备与前现代社会的不同，或者几乎没有一点相同，而几乎完全要用改变了的形式重新生产。

即便主体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地点、他的社交伙伴和重要的物质客体，如他的房子或他的汽车，或者也包括他的提包，但是在那里主体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在（晚期）现代的地平线上也会变成偶然的，变化在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的可能，与运动相反，“停滞”似乎是有义务去证明它的理由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输、通讯和生产的加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主体的自我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且因此也作用于重要的社会的身份确定模式：通过空间、固定的交流伙伴和参考群体、物品的身份确定模式接受了有时间限制的和时间限额的特征，因此主体将被迫与自身保持如此宽阔的距离或者从自身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自愿的或被迫的）在 173
不失去自我的情况下经受住变化。根据这样的趋势，生存如同“没有地点的地方”一样，正是没有身份和没有历史的。[24] 在这里，这一点首先仍然还是一个假设，我将在第六章“3”和第十一章在社会加速的框架下详细讨论身份确定模式和自我关系的变化这个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进一步超越了技术加速。诊断所发现的空间—时间—制度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的加速的变化以及我们与我们的环境中的物质结构的关系的变化，都不仅仅是技术发明的结果；这些变化与技术发明并不存在逻辑包含关系，而是在这些变化的外在表现方式上与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或者说我们的社交关系时，更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正如将要阐述的，互动模式快速地变化着，并且在特性上也发生着改变，加速的社会变化的形式和结果至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结果一样显著；或者，换言之，后者的特殊的影响是要在前者的环境中才能产生的。类似的，我们的物质环境的结构中越来越迅速的革命，与没有明确目标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及其所产生的现象是一样的。因此，技术加速对于多种多样的社会加速过程而言，仿佛只是物质的基础和可能的前提条件，而社会加速是每一个变化的基础，而且在今天是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下对它加以讨论的：技术加速因而构成了另外两

---

〔24〕 参照 Augé，1994 年；Bauman，2000 年，第 98 页及其后页；Lübbe，1998 年，第 268 页及其后页；Rosa，1998 年，第 205 页及其后页，和 2002 年 a。

种形式的社会加速的物质基础,而社会加速又作为技术加速过程的"动机给予者"不断向前推进技术加速。这进一步阐明了,是可以把社会加速分解为不同的三个维度的:同时关注这三个维度以及特别是研究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理解社会加速的实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作
174 用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我开始探讨社会加速的原因和所产生的后果之前,我将首先转向对社会加速维度中的另外两个维度进行现象学的清点分析。然后在第七章将系统地阐明,技术加速与社会变化的加速
175 和社会速度的加速,是如何在一个反身循环中互相推动着的。

第五章　滑动的斜坡：社会变化的加速和偶然性的增加

“人们现在不再能学习到任何对他们的一生都有用的东西，这简直糟糕透了……我们的祖先只要谨遵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学到的课程就可以了；而我们现在必须每五年就要重新学习，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跟不上潮流”，歌德已经让爱德华（Eduard）在《选择性亲和》（*Die Wahlverwandtschaften*）中这样抱怨了，而科泽勒克在重新学习的时间周期的（或者知识的半衰期）缩短中看到了，它与现在萎缩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这是对加速的社会变化的感知的核心。[1] 正像我尝试着去阐释的，加速过时的储备知识出现在实践的形式和行为导向之中，也出现在关系结构和关系模式中，它与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以及主题的自我关系的认知性元素有关，并且也影响到社会现实的结构性和文化性层面。现代社会是以“动力能量”或“变化的躁动”的史无前例的规模为特征的，从马克思到伯曼和鲍曼*都纷纷将现代社会比喻为持续的融化的、蒸发的和流动的社会结构。[2]

根据在20世纪末期左右所出现的与民族国家相关的经济上、法律上、政治上和社会福利国家方面的制度结构的被侵蚀；这些在“经典的现代”发展出来的，而且直到20世纪末期之前都被证实为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固的制度结构，在当前的时间诊断中，它的新的现实性赢得了“流

---

〔1〕 Goethe，1993年a（《选择性亲和》，I，4），第370页；Koselleck，2000年，第164页。

*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1925—）波兰社会学家，1971年因反波兰犹太主义被迫离国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的社会学教授。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人知。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社会环境》《现代性与大屠杀》。——译者注

〔2〕 有关对“社会变化是通过社会的‘动力能力’进行”的说法解释，请参考Radkau，1998年，第13页及其后页。

动的”和“液化的”这样的比拟:诸如卡斯特斯、鲍曼、厄里或阿帕杜莱*等作家都将流动性作为几乎没有阻力的、以迅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人流、信息流、货币流和货物流的特征,这个特征能够迅速地蔓延到
176 各处;但是只有很少的领土上的或政治上的变化能够向另一种方向或通过另外的渠道流动或又撤退回来,也就是说,不能实现稳定而长期的聚集状态,或者说相互之间不再有稳固的联系。因此,在被判明的现代性的动态化相对于(毫无疑问同样也可以列入现代性的)制度的停滞力量所取得的胜利中,看不到新的原理,而只是现代原本就有的加速过程和液化过程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阿尔君·阿帕杜莱描写了连接紧密、具有历史的和地理的稳固性的社会集合体在液态化的作用下消散,而变成永远在运动和变动中的“人种心理的、科技的、金融的、媒体的和观念的风景”,这些作为“文化的河流”而从相互之中分流开来、互相移动分开,因此它们似乎不再能在原来的地图上反映出来,而是只能在相互连贯的屏幕的动态的可视化中得以表现;阿尔君·阿帕杜莱的这番描述为这些发展变化提供了清晰明了的措辞和可能的衡量标准。[3] 同时,这样的“河流”往往以复数出现:根据这个趋势,领土、人种、金融流和观念流,同样也包括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实践活动的形式,它们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因而每条河流都可以在不同的方向流动,也就是说,由于几乎是可以任意(再)组合的,因而进行有目的的控制也显得不再可能,认识到这个事实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是非常关键的。

同样的,有关社会变化的速度可以假设,当持续的数量上的增加到达了重要的临界值时,就会在社会现实的结构上导致质量上的巨大变化。正如简·艾斯曼(Jan Assmann)**或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等作家所指出的[4],社交社会记忆所持续的时间极限约为 80 年到 100 年之间,这意味着,那些被作为现代标志的经验空间与期望地平线相互分离的现
177 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现在萎缩”的体验会出现在三代或四代之内发

---

*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1949—),著名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有《消散的现代性》《殖民统治下的崇拜与冲突》和《对少数者的恐惧》等。——译者注

〔3〕 Appadurai,1990 年和 1996 年;有关这个问题的实证证据也请参照 Urry,2000 年 a 和 b;以及 Castells,1996 年,第 376 页及其后页。

** 简·艾斯曼(1938—),德国的埃及古物学家。主要作品有《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政治神学》等。——译者注

〔4〕 Assmann,1992 年;Koselleck,1989 年,第 328 页及其后页和 366 页及其后页;参照 Bering,2001 年。

生了显著变革的过程中。社会变革,即结构上和文化上的确定性的变化,在面对更快的速度时,会成为简单的代际更换,因而可以猜想,从中所产生的重大的后果并不只是影响到代际关系,而是如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假设的,对生活世界的确定事物的腐蚀会形成新的性质,而这不可能不触及文化的再生产以及主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5]由于更高的、几乎不能明确确定的临界值,使得变化最终不再能被看做是固定结构的改变,而是作为从根本上而且可能是混乱的*不确定性*。[6]因此,在今天,后现代的观念的吸引力能够通过达到这样的临界值而被表现出来;而另一方面,记叙式的、累积的和线性的世界连接不再存在。

这本书所支持的对于在现代化进程社会变化的持续不断的*加速*假设,现在用清晰的方式表述就是,从早期现代的在代际发生变化的速度,经过在"经典的现代"的与代际更替同步的阶段,最后到晚期现代所出现的代内发生变化的速度趋势,变化的速度在不断提高。[7] 正如我已经证明了的,通过实证证实这样的猜想是困难的,因为哪些革新可以看做为*基础革新*和哪些指标能真正表示社会的变化,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都是非常不明确的。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即一 178
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应该是那些组织起基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制度。[8]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从早期现代开始,家庭的机制和(资本主义的)雇佣体系就没有发生变化,而在分析社会的变化时,往往正是集中

---

* 卡尔·曼海姆(1893—1947)是一位犹太裔社会学家,生于匈牙利,他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领域,是经典社会学和知识社会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知识社会学问题》《保守主义思想》和《竞争在精神领域之中的意义》等。——译者注

〔5〕 Mannheim,1964年;进一步参考 Ahmadi,2001年,第194页;和 Lauer,1981年,第144页;对于后一个论点请见诸如 Lübbe,1998年,和 Lauer, 1981年,第113页和第140页。

〔6〕 参照 Lübbe,1998年,第288页。

〔7〕 这一眼看上去与这一章开头引用的歌德的话是矛盾的,在那段话里,早在19世纪的早期,就诊断出的文化的过时的速度,因而要求*每五年就要重新学习*。正如我将要说明的,这里的"速度说明"并不涉及行为人生存的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的速度,更确切地说是指次要的知识领域。而有关社会变化的速度的诊断的可信性并不依赖于某些特殊的"一代人的观点"的正确性。

〔8〕 参照例如 Castells,1996年,第228页。一个异常的立场与对卢曼所提出的系统理论的支持有关,这个观点认为社会分化(在这里是指分为不同环节、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分化)的基本形式确定了社会的基本构造。基本分化的变化的加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这里并没有考虑到从所给出的上下文联系中应该感兴趣的并且卢曼自己也诊断过的"现在萎缩"现象或者说时间地平线的稳固的期限越来越短的现象。正如我将要指出的,现代社会中的系统化的过程看上去不可动摇的稳定性,甚至是刚性,与社会变化的加速的诊断并不矛盾,而是它的这个反面的补充:(子)系统的运行逻辑的稳固不变在现代社会是物质、社会和文化的关系的持续变革的必要的补充(参考 Jameson,1998年,第57页及其后页)。

在这些领域的。

尽管在实证发现中有各种各样与这两个社会层面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并不能因此说以下的假设就是不可信的,即假设对于这两个领域而言,变化的加速从代际速度经过一代的速度直至可能实现代内的速度,如果我们在这里只是关注社会内生的变化原因,也就是自我生成的变化原因(而不是诸如敌人的入侵、自然灾难等外在的事件)的话。因此,例如作为经济单位或者说作为"财政预算"的家庭的生命周期,理想模式的家庭结构,在农业社会往往是在长长的代际链条上保持稳定的:代际的更替不会涉及基本结构,变化的似乎只有个体所拥有的位置。因而,亚瑟·伊姆霍夫(Arthur Imhof)以北黑森州的(nordhessischen)村庄为例(在这个例子里讲述的是关于农场的,在这个角度看来农场的继承关系与朝代中的继承更替结构是同等类型的),对家庭结构经过很多代之后
179 依然保持稳定做了如下的描述[9]:"并不是出生在这一年、去世于那一年的个体的约翰内斯·霍什(Jahannes Hoos)是决定者。确切地说,重要的是,名为约翰内斯·霍什的后继者准备好了接受这个角色——在他身体上最强壮和社交上最游刃有余的年月里,他来掌控这个农庄的命运。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农庄并不只是在 10 年、20 年或 30 年内被约翰内斯·霍什所拥有,而是在 25 年里保持连续性。的确,尽管寿命的长度是不确定的,但是农庄却有令人惊讶的稳定性!"[10]很多社会成员,例如奴隶或女仆都被禁止组建自己的家庭,但是这并不与以上判断相冲突: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与所服务的家庭的关系来定义的,在有些场合他们就是这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因此,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重要的家庭结构(至少根据这个例子)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在"经典的"现代,最理性的方式往往是,在一代中建立家庭替代了原来的大家庭和与之相关的代际的家庭联合体以及相应的保持长期稳定性的结构,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它的结构随着这对夫妇的死亡而瓦解。现代的普通市民(包括不断增加的无产阶级)的个体身份构成的和自我管理的任务以及作为经济单位所建立的自己的家庭,这些都随着夫妻两人的去世而完全终止了存在。之后,在晚期现代,家庭周期最终显示出明白无误的趋势,世

〔9〕 参照 Nassehi,1993 年,第 346 页,注释 104。

〔10〕 Imhof,1984 年,第 188 页。卢曼(Luhmann,1980 年,第 299 页)也观察到,从在中世纪家庭结构的"制度上的不消解性",到在现代中的这些结构以代际更换的速度进行不连续的重新建立的过渡。请进一步参考 Kohli,1985 年,第 11 页及其后页。

代内的寿命长度在增加,而升高的离婚率和再婚率,以及家庭的重新组织或家庭的解体是这方面的清晰的证明。[11]在今天,人生阶段性伴侣代替了人生伴侣,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是假设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理想的倒 180
塌,相反,与实证检验的发现不存在任何问题地达成一致的是,这种生活方式甚至是在不断增加的范围内成为社会的理想[12],以及个体在今天毫不气馁地倾向于进入的(新的)家庭关系。因而,终其一生的一夫一妻制被新形式的"按序一夫一妻制""有期限的情侣"所代替了。[13] 正如托马斯·H.埃里克森所注意到的,这一切所涉及的是"迅速的静止"的显著的宣言,而这正是晚期现代的完全的标志。[14]

通过家庭结构变化的公式化的展示,从而实证证实了有关家庭变化的想法,顺着这些思考在任何情况下几乎都不能否定,在家庭关系方面对于偶然性的意识也不断增强了:也就是意识到,也可能是其他的情形,更确切地说,通过自己的决定和通过他人的决定一样,从这些决定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对停滞的辩解的压力毫无疑问都增加了。对此,西哈德·奈克尔(Sighard Neckel)*中肯地写道:"尽管每个人都知道,生命历程在另一个人那里是另一番风景,但是人们觉得有义务证明自己的生命历程的合理性,并且生出必须将自己表现得像所虚构的人那样的行为压力……这就促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真实,而人们无法回到这个真实的背后。这些就已经改变了社会,而不取决于是否事实上社会中的一切都与社会是由少数几个大群体所构成的时代的真实不一样……"[15]而且与"外源的"偶然性和"外生的"人生的变迁——如疾病、自然灾害、统治关系所产生的武力影响——不一样,使前现代的家庭结构受到瓦解威胁的 181
往往是,晚期现代的家庭结构中的偶然性自身所产生的、源自家庭内部的特性。

---

〔11〕 有关家庭结构的变化请参照 Laslett,1988 年,第 33 页;Brose,2002 年,第 127 页;Castells,1997 年,第四章;Hildenbrand,2001 年;Beck/Beck-Gernsheim,1994 年;Bauman,2000 年,第 160 页及其后页。

〔12〕 参照诸如 Fuchs-Heinritz,2000 年。

〔13〕 Burkart、Fietze 和 Kohli 也将"有期限的情侣"定义为伴侣关系的最现代的形式(1989 年,第 244 页及其后页),尽管其他形式,如传统的婚姻或时髦的婚姻形式在一些环境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因此,这间接地证明了这样的假设,加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等同于现代化的。

〔14〕 "按序的一夫一妻制是在迈向新的千禧年时,生活趋向于在快速度中静止的现存的最好的例证(Eriksen,2001 年,第 131 页)。"

* 西哈德·奈克尔(1956—),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身份与羞耻心》《差异的力量》和《向前逃去》等。——译者注

〔15〕 Neckel,2000 年,第 40 页。

这样的动态性的检验结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雇佣关系的发展。典型的论调是,在前现代和早期现代,往往工作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因此职业结构和雇佣结构也似乎表现出在几代之间都是稳定的。而后,自由地,并且通常是一次性地选择一个自己的、一生的和促成身份确定的职业,这是"经典的"现代的根本标志,在职业结构中呈现出"一代之内的"稳定性。[16] 在组建你自己的家庭的同时,找到你自己的工作!在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里,首先这成为对于年轻男性所提出的身份构建的第二个任务,之后也向年轻女性提了出来:根据实证调查,在职业生涯之内,多次更换职业或者换工作(而且往往伴随着或长期或短期的失业阶段),也从绝大多数不符合这种情况到变成为常规情况。"今天,年轻的美国人在 40 年的职业生涯中至少要换 11 次工作并且因此至少要更换三次他的知识基础,因此,他至少要计划出两年的学习时间以胜任这些更换",理查德·桑内特在他的与之相关的研究中作出这样的判
182 断。[17] 对于德国而言,到目前为止通过对灵活性的渴望的抵制,而显现出企业里的高度的职业稳定性的模式,[18] 这样的模式可以从极其显而易见的职业结构变化的加速趋势和雇员的职位变化的加速趋势中识别出来。在对 Mikrozensus* 以及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BIBB)和德国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在 1975 年到 1997 年之间所进行的雇员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之后,以克里斯托弗·科勒(Christoph Köhler)和欧拉夫·斯图克(Olaf Struck)为负责人的研究小组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且将它作为耶拿大学(Universität Jena)的 580 号特殊研究领域的一个部分,尤其是从 1990 年开始,他们确认:"固定的和稳定的工作日益受到侵蚀"[19],尽管他们的发现并不是非常引人注目,

---

〔16〕 在理性的状态下,这种稳定性不仅延伸到职业身份的确定,而且甚至触及具体的雇佣关系。因此,齐格蒙·鲍曼(Bauman,2000 年,第 116 页)评论道:"'福特式'工厂在现代化密集展开的时代,是最被渴望和被热烈地追求的合理的工程监督的模式,它反映了……'即便死也不会让我们不分离的'在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婚姻关系……这意味着持续到'永远'(无论如何至少应该是指个体的一生),而且往往就是这样。这样的婚姻的实质是一夫一妻制,对夫妇双方都是如此。离婚是根本不会考虑的。"

〔17〕 Sennett,1998 年,第 25 页。"无论是谁在微软(Microsoft)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如果打算也在这里结束的话,绝对不是一个最明智的想法。如果有人是在福特或雷诺(Renault)开始的话,几乎可以肯定,他的职业生涯也可以在此地结束",Daniel Cohen(引自 Bauman,2000 年,第 116 页)总结了这些变化。

〔18〕 参照例如 Berthold,2002 年;Donges,1992 年。

* Mikrozensus 为德国的一项持续进行的居民信息调查项目。——译者注

〔19〕 Grotheer/Struck,2003 年,第 35 页。

但是明确地确定了发展趋势。他们发现了在企业里明显缩短的平均工作期限、不断增加的在企业之间更换的岗位的数量、雇员的不断提高的机动性、不断增多的短期或中期的雇佣合同以及雇佣关系的不稳定在整体上的增加。而且(主体的)离职风险也在增加。[20] 因此,"这一切显示,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市场的关系向着缩短的期限和较高的机动性的方向变化着。"[21]

这些检验结果支持了这条理论:晚期现代社会也是以从一代之中的到一代之内的职业结构变化和劳动力交换为标志的。[22] 由此可以看 183
出,在工作领域比在家庭形式(它在晚期现代在一定程度上也变得多样化了)[23]中发生更强烈的变化的不仅是雇佣关系,而且雇佣形式和职业领域的宽度自身也发生了迅速的改变。劳动关系的去规制化形成了新的雇佣形式,诸如临时工作和不同形式的兼职;而且与此同时主要是信息技术也带来了新的职业分支,这也是与大量传统职业的消失相伴而行的。这也涉及社会内生的特性再一次成为变化的动力;通过自身的或外在的决定将能够带来变化;以及对偶然性的意识,也就是说对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就业形势的不确定性,在职业和雇佣关系没有发生更换的地方,也出现了。[24]

因此,我的观点就是,社会变革的加速完全可以从世代之间关系的变化中清晰地看出来:在前现代情形下,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存在状况往往是流传很多代;而当到了现代,正如安斯加尔·韦曼(Ansgar Weyman)所着重指出的,在那里"世代……作为集体行动者在结构构建和创

---

〔20〕 平均的雇佣期限或者说作为企业成员的期限从1991/1992年度到1998/1999年度从11.6年下降到10.1年(不包括公务员);与此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短期雇佣关系的比重从不到20%提高到接近27%(Grotheer/Struck,2003年,第14页及其后页,数据是有关西德部分的)。根据工作合同的发展,可以看到正常的雇佣关系在最近的15年下降了7%;"另一方面,在所谓的'正常的雇佣关系'中,在西德,尤其是有期限的合同(从3.2%上升到5.7%)、派遣劳动(从0.2%上升到1%)、兼职工作(从9%提高到11.7%)以及少许工作(从2.4%上升到7.3%)的份额都在提高"(同上书,第11页)。至于工作岗位的变化速率,研究显示,在1976年开始的必须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后,雇佣关系有接近60%是在两年后结束,超过20%是在五年后终止。(同上书,第15页)。

〔21〕 同上书,第30页及其后页。

〔22〕 参照Grotheer/Struck,2003年,第3页和第17页。

〔23〕 参照诸如Beck/Beck-Gernsheim,1994年。

〔24〕 有关实证发现除了Grotheer和Struck的研究之外,还有例如Garhammer,2001年、2002年;Kohli,1994年;未来问题委员会(Kommission für Zukunftsfragen)1996年、1997年;Sennett,1998年;Hoffmann/Walwei,1998年;Beck,1999年;Dörre,1997年;对于侵蚀理论的批判除了Berthold,2002年和Donges,1992年,还有Erlinghagen,2002年。

新方面”发挥影响,因而可以从世代更替当中读出变化;[25] 而最后到了晚期现代,在一代之内的时间里,各种关系会在一定的时间间隔里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将“现在的萎缩”定义为与行为条件的稳定性有关的期望的确
184 定性所延续的时间长度的普遍缩短,因而可以直接而清晰地看到,职业的和家庭的不稳定性的外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社会变化的加速的标志。在实践行为、局势和结构中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可修正性和可重新组合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偶然性的增加;与此同时,同样在其他的社会领域,甚至是社会结构领域——无论是日常实践的中心领域还是周边领域,也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迅速加速的“全球”社会,同样的不确定性逐步控制了作为现代的机动性[26] 的中心维度的未来的生活伴侣和雇主,同样也支配着居住地点、政治方向[27] 和宗教方面的态度[28];并且也对边缘的社会维度的行为条件和背景条件的稳定性加以控制:哪些电话公司、保险公司和能源公司,哪些休闲联盟、投资者和疾病或医疗保险在“明天”(按照吕伯的意思是指离“今天”越来越近的时间)仍然存在并且提供优惠的条件;同样不确定的问题包括,可以从哪些报纸、杂志、电视台、因特网提供者、搜索引擎那里得到可接受的服务(以及,哪些朋友和熟人仍然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哪些新的活动领域和实践活动形式将会产生,则是完全不确定的(有关因特网提供者和网络搜索引擎或者合适的电话公司的问题,在一代之前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往往认为流行、产品样式和艺术风格的(加速)变化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因为这些领域基本上不属于变迁的范畴,尽管当不再能够买到熟悉的类型和品牌的衣服、食品、化妆美容品等的时候,也会完全感
185 受到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因而,尤其是在创新速度如此之快从而必须很费劲地才能跟得上旧样式和新样式的更换的地方,产品周期的缩短对于零售商和购买者来说是成问题的。[29] 当然,正如我们在第三章“2”已

---

〔25〕 Weyman,2000 年,第 44 页。

〔26〕 参照 Walzer,1993 年,第 164 页及其后页,但是其中并没有涉及宗教方面的机动性,但是将社会地位作为独立的类别进行分析。

〔27〕 政治的易变性和候选人的更迭情况的增加在选举研究中是非常值得讨论的现象。

〔28〕 “哪一种宗教对我而言是恰当的?”这是一本时尚的生活方式杂志最近一期的封面标题,这篇文章对不受阻碍的宗教灵活性的观念提出了挑衅[《对宗教的测试》(*Religionen im Test*),刊载于《最大尺码的生活:现代生活的导航》(*XXLivng. Der Navigator für das modern Leben*),1998 年,第 6 期,第 44 页到第 52 页]。

〔29〕 对此请参照 Backhaus/Gruner,1998 年。

经看到的，“现在”，即稳定的时间阶段，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里是不一样长的，例如，在涉及生活（阶段）伴侣的时候，现在往往要比衣服样式中的要长。但是，有关社会变迁的普遍加速的命题意味着，“现在”或者是在所有的领域，或者至少是在所有集中体现价值观的（重要的）领域萎缩了。

因而，由于不同的变化速度和适应速度所导致的影响深远的非同步化现象，不仅出现在各个功能系统（例如，在教育和政治领域中的变化速度和革新速度要比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这些方面的速度要慢），而且也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尤其是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的不同世代。社会变迁已经达到了在同一代内发生的速度，因此可以预想，社会整合和文化上的再生产的机会和形式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结果。吕伯作出了如下猜想：

> 当共同生活于现代家庭这种小型的社会联系之中的两代人的不同文化观念正在不断地相互疏离的时候，代际的文化方面的信息传递可能受到威胁。走向成年的过程如同迈向老年的过程一样，都随着在平均寿命这样的较短的期限之内仍然保持有效性的文化存在物的数量的大幅减少，因而同样也表现出棘手的特征。[30]

尽管人们对“方向迷失的结果”的无法被实证证明提出质疑，但是所观察到的，尤其是涉及当代的媒体文化和日常文化时，不断扩大的代与代之间的“鸿沟”是不容忽视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不仅通过使用不同 186
的沟通工具，而且做不同的游戏、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电视节目和新闻节目、读不同的报纸、喜欢差别越来越大的音乐风格、穿不同的衣服、去针对不同年龄人所开设的商店购物，甚至是吃不同的饭菜和说不同的语言，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亚世界之中。

因此，不断累进的现在的萎缩也意味着，不是形成了一根这样的年龄裂纹线，而是两根或者更多。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仿佛成了“同时期的不同时性”的宣言，并且因此也带来了社会非同步化的问题：父辈的经验、实践和知识储备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是不合时宜的、没有意义的，只要这些知识是与所参与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这些对于年轻一代来说都是无法理解的；相反：任天堂游戏机、因特网、手机短信的世界对于很多父母们而言，或者至少对于许多祖父母而言，如同地理上相隔很远的

---

〔30〕 Lübbe，1998 年，第 289 页。

文化风格和文化活动一样,是如此难以理解而且陌生。一个有关这方面的实证的证据是,“年长人的”活动方式同时也是较为缓慢的,与此同时,研究表明,相对于年纪大的人,年轻人拥有“完成多种任务”的全新的能力和技能,即所谓的多任务处理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同时处理多个信息来源和行为领域。[31] 因此,在这样的加速的世界,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能力和知识储备不仅是不同的,而且前者从总体上来看是占有优势的。德·哈恩*指出,年轻一代不再从年老的一代那里接受教育了,并且要求将“作为过去的一代的成年人的自身权利”作为“最后的教育准则”,也就是在有目的地保存“减速的世外桃源”的含义下,为年长
187 人的生活世界提供保护空间。[32]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在充满了危险的差异的不同代际的生活世界和经验世界中的代际整合和团结的机会。[33]

“代际断裂”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在文化再生产方面毫无争议的是,今天的儿童和年轻人的方向性知识,越来越多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同辈人,而越来越少的是从老年人和古代人那里获取,因为古人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作为“现在的萎缩”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越来越快地失去了价值。[34]

因此,被迫发生变化的也有年长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在传统社会“智慧的长者”是不言自明的制度,长者有着突出的地位,因为他们“看到过”并且知晓“一切”,因此他们当中没有人会对生活中令人不适的地

---

〔31〕 参照诸如 Francis-Smythe 和 Robertson,1999 年,第 286 页。这些作者根据所提出的群集效应的假设,将年长的一代在多任务处理上的困难归因于年长效应,但是并没有对此进行正证明。

* 格哈德·德·哈恩(Gerhard De Haan)(1951—),德国教育学家。主要著作有《构成主义作为教育学的基础》《教育:建议还是苛求》《耐久性和合理性》等。——译者注

〔32〕 De Haan,1996 年,第 123 页。

〔33〕 另外,*Clemens Theodor Perthes* 也在有关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加速问题中指出“同时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三代人之间完全没有共识。由于 1750 年、1789 年和 1815 年之间的巨大差异而缺少了所有的过渡,并且人们看上去并不像一代接一代地生活,而是平行地生活着,祖父、父亲和孙子根据情况而定”,他在另外一处也断言:“历史将前仆后继的顺序越是紧密地压缩在一起,斗争就会越激烈而且更普遍。”(引自 Koselleck,1989 年,第 367 页)

〔34〕 参照 Gaines,1998 年,第 256 页和 260 页;Eriksen,2001 年,第 133 页及其后页;de Haan,1996 年,第 122 页及其后页。Margaret Mead(1970 年,第 61 页)在 30 多年前就已经通过对代际鸿沟的分析指出:“在过去,总是有一些老人就他们成长于一个文化系统里所获得的经验而言,比任何一个孩子知道得都多。今天,没有这样的人了。这不仅是因为父母不再是指导者,而且是根本就没有指导者了,无论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在国外都找不到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长者了,即他们知道那些在过去的 20 年内被抚养长大的人关于这个他们出生在其中的世界都知道些什么。”

方再感到惊讶了，而这一切在晚期现代社会实际上都消失了：更确切地说，年长者往往因为他们不再通晓世界也不再跟得上这个世界而蒙受耻辱。随着年长而不断迫近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的丧失，在一个有着飞快的变化速度的社会里是令人感到羞耻的障碍，正如在有些职业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在那里40岁的人就已经不再被雇用了，因为他们被看做是不够灵活和不爱冒险的，而这又导致了今天的职业生涯自身的加速，也就是 188
说在大约25岁到45岁之间必须完成职业生涯。[35] 常被文化批判所嘲弄的（晚期）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人的妄想”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加速环境下的根源：年老的人的理想形象不再是“智慧的老者”了，而是一直灵活的、能够适应变化的没有—真正—变老的形象，他们并不畏惧主动地吸收新东西。保持年轻的压力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永远在青春期”的压力，并不是产生于晚期现代社会的文化氛围中，而是被牢牢地写在它的时间结构中。[36]

由于社会变迁的加速而带来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背景条件、行动条件和做决定的条件的根本上的不稳定性，强迫个体，也包括组织和制度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期望、重新理解所经历的、重新确定什么是重要的，并且反复实现协调一致和同步化的努力。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所表示的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弹性化和去规制化，在20世纪末期数字的和政治的加速革命的伴随下，毫无疑问地将进一步驱动这个过程。

正如从现象学的视角去观察，技术的加速改变了我们的空间关系、时间关系、与物品的关系和社会关系一样，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社会关系与物质关系的“液态化”也对（晚期）现代的“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将在现代中所产生的并且在晚期现代普及和加强 189
的另一种存在感尝试着用“滑溜溜的斜坡”现象（slippery-slope-Phänomen）这个概念来表示；我用这种说法所想表达的是，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

---

〔35〕 参照Sennett，1998年。最近这段时间在这方面却表现出（可能是暂时的）相反的趋势，同样是因为“新经济”的巨大失败，很多企业又将经验在它们的管理层中给予了很高的地位。

〔36〕 参照krappmann，1997年。Ahmadi（2001年，第191页及其后页）通过Stefan Zweig的个人传记指出，在20世纪伊始的战前一代那里，经验和年长相对于灵活性和年轻具有优势；这使得年轻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让自己显得年长，正如今天年长的人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表现得年轻一样。这样的变化体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指标，即可以用代际更换的速度反映社会变迁的加速。

的感觉。[37] 事实上,此刻"滑动的斜坡"这个比喻(滑溜溜的斜坡)对我而言能够更好地解释晚期现代的心理状态: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按字面意思和比喻含义也就是更新硬件和软件)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这对于实际生活和实际行为意味着:如果有人不能一直努力更新的话,在他的语言、服装、外表、社交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力、休闲装备、养老保险和投资等方面,都将是不合时宜的。[38] 因此,这并非简单的只是指招致变化的自身的举动(如同滑溜溜的斜坡的画面所暗示的),也并不是指如同自动扶梯的画面所展示的单纯的不合时宜的危险,而是有关在一个高度动态的社会世界中的行动环境和决策环境,它
190 们可以用"滑动的斜坡"这个比喻来进行理解:行为环境和选择环境自身发生着多维度的、持续的变化,因此不再存在静止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宁静中"找到选择和连接。就像在山崩而造成滑坡时并不是所有的(地)层面都以同样的速度发生变化一样,在社会中会出现如同我尝试阐释的不同步的表现,也就是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速度运动,并且也会一再形成个别的"减速世外桃源",它如同山崩时的结实的岩石,在到处都发生着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证着有限的稳定性。尽管如此,结果仍然是"决策风景"的永远转换,也就是说不仅经验和知识储备总是因为新的事物的出现而变得过时,而且几乎不可能去预测哪些合作选择和行动机会在未来是意义重大和重要的。在重要性难以预测的地方,自然而然地作出的反应就是,尽可能多地抓住或者把握所有未来将要实现的可能性:这正是卢曼所形容的复杂性带来的速度化,而它又再次导向了加速。[39]

社会动态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志可能是 18 世纪末期日报的出现,

---

〔37〕 参照 Rosa,1999 年 b 和 d,以及 2002 年 a。

〔38〕 Levine(1999 年,第 80 页)做了如果有关一个人拒绝加速的压力和适应的压力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的说明。他引用了一个美国同事的故事,这个人通过长期居住在南美而逃离美国文化的迅速的生活节奏。当 Levine 在谈到这位同事偶然回到美国时的体验时,写道:"每次探亲我都很惊讶,感觉到很陌生。整个人好像被完全抛弃和调换在旧日的时尚中,不仅是指服装,而且也包括音乐、艺术和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语言都好像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我该如何穿戴、应该谈论些什么话题、那些词听起来已经十足愚蠢了。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完全不能跟上谈话。"完全不能明白在谈论什么的经历,很多老年人都会在面对年轻人的"技术泡沫"时体会到。

〔39〕 Luhmann,1980 年,也请看第八章"3"。

这是对人们日益增长的了解在社会不同领域所发生的迅速变化的需求所作出的反应,而且日报在一定程度上也再造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体育等的当日有效的"地图"。[40] 日报的耐久性期限就只是一天,没有什么比昨天的报纸更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形势的每日重新测量也不够了,因特网提供的新闻不断地带来新的变化,那里的新闻不再只是每日或每小时更新的,而甚至是"在线"更新的了。[41] 类似的,电影的"新闻周报"也早就被每日报道所代替了,而时髦的新闻电视台,如 CNN 通过至多三行的滚动字幕在图像报道之外,同时使它的观众确实能够获得"正在进行的"讯息。保证信息是"实时"的滚 191
动的字幕(不只是在计算机屏幕和电视屏幕上的,而且是在城市建筑和交通工具的广告牌上的),正是这个永远"不停止"变化的世界的象征。

当然,也有针对这个论点提出的有道理的异议:信息的加速传输的可能性不应该与它所报道的对象所构成的社会进程的真实的加速相提并论。在这里,我们又找到其他的有关技术加速和社会变化的加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例子:信息更快地被传输,使得对变化作出更快的反应成为可能(特别是如同证券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所清晰地展示出来的),并且导致社会变化的真正加速。信息更新的加速因此呈现出了"现在的萎缩"的典型情况:10 点钟的"对世界的认识"在 16 点左右就已经过时了[42],它的"有效期"在"新闻传送带"前面缩小到几乎为零。因此,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很多领域,与其说是实际发生的变化不如说是不稳定性导致了确定性的丧失:所报道的事实情况至少在六个小时之后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它们能够发生变化,至少是它们的*重要性*。

社会变化的加速所产生的最显著的感觉就是,仿佛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里都像站在"*滑溜溜的斜坡*"或者"*滑动的斜坡*"上一样,这种感觉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在这里文化上的逻辑完全与物理逻辑相符:行为者感觉处于紧张和时间压力之下,他们必须要跟得上变化的步伐、不能因为自己的只是能力的老化而失去行为的选择和连接机会。对新的信息的文化上的处理,也就是说将它们植入系统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记叙式的

---

〔40〕 美国最早的日报 1784 年在宾夕法尼亚州(Pensylvania)出现。参照,Beniger,1896 年,第 183 页。

〔41〕 对此也请参照 Eriksen,第 66 页及其后页。

〔42〕 MDR 广播电台新闻频道在每 15 分钟播报的新闻节目的开始口号就是:"世界的最新状况";这个节目用"世界从不休息"和"新闻播报,每 15 分钟全新报道"这样的警句为它自己做广告。

192 解释结构中,不可避免的是耗费大量时间。这是导致"时间压力"体验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时间压力下,无论是个体还是机构,都会努力去对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现的大量的更新进行文化上的处理"。[43] 因此,正如我在谈到吕伯的时候已经指出的,值得思考的是,处理能力的速度极限会被社会变化所超越,因而紧随数量上的速度提高,会出现文化上和主体的自我关系的新的性质上的("后现代"的)变化。"我们跑得尽可能快,以便能够待在同样的地方",作为大量的文化观察者的代表的彼得·康纳德,在他有关现代性的文化历史著作的第一页这样描述20世纪末期主体的日常体验和生活体验;而时间预算研究者罗宾逊和戈德柏在他们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证明这种体验,他们几乎用了与康纳德同样的措辞形容这种体验:"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
193 地。"[44] 因此,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处在这些现象当中了,这些现象,根据在第三章"2"所开发的概念,应该属于生活节奏的加速那个类别,对于它的现象学的分析是下一章的目标。有关对个体和集体处理社会变化时的关键的临界值的超越这个问题,我将会在这项研究的最后一个部分
194 详细讨论。

---

〔43〕 Lübbe,1998年,第270页。因而,社会变迁的加速的一个副作用是,混乱的增长变得功能失调,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在衰落之前通过博物馆化而对将其变成被保护的遗产(Lübbe,1998年,第286页)。

〔44〕 Conrad,1999年,第6页;Robinson和Godbey,1999年,第33页。迅速地站到位置上的最巨大的示意图就是在健身中心和健身俱乐部里的"跑步机",这可能不是偶然:跑步机如此受欢迎,因而从世纪之交以来,在市中心,尤其是在"全球化大都市"的闹市区是不可能没有它的。在跑步机那里就像聚焦在放大镜下面一样体现出了本书所研究的现象。首先,它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如跑步这样简单的行为的有效的商业化的过程,耳朵里插上CD的耳机、戴上脉搏测量器和血压测量计(正如已经证明了的与急忙病相联系的晚期现代的计数强迫症),并且紧盯着时钟,然后没有向前移动的移动就仪式般地上演了。时间在漫无目的的奔跑中长得没有尽头(可能这正解释了跑步机的魅力之所在:时间终于是无尽延伸的,而不是平日的收缩的);而从跑步机那里所夺取的额外的每一分钟都可以看做是个人的胜利、作为时间的赢得而欢庆,而且可能是体验为跑步者对时间的复仇。在健身俱乐部里受欢迎的训练项目都被令人印象深刻地标识为"锻炼":这个由快速的停滞这种似是而非的情境所导致的现代的对加速的渴望,只要仍然认为这种渴望的根源是存在于新教徒的工作伦理中的,那么就没有真正找到对它的确切的理解。

第六章　“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时间体验上的矛盾

“人们经常会听到谈起‘生活节奏’，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同一个时代的世界上的不同地方，甚至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以及同一个圈子里不同的个体身上都是不同的”，乔治·齐美尔早在1897年就这样评论道。[1] 而且从那时起到现在，同样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就是，有关在现代社会这个速度是持续提高的判断，因而这个时代的人要不断面对新的要求，用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最高纪录的速度生活。[2] 正如我们在这项研究的第一部分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样的感觉几乎一致产生于对生活节奏会变得太快了的恐惧。但是，关于如何测量生活节奏以及如何实证检验假设的断言这些问题，在今天尽管有大量的有关时间使用的研究，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它们仍然像在齐美尔时代一样是不清晰的。

齐美尔本人曾建议，将生活节奏作为每个时间单位内意识所呈现的内容变化的“总和和深度的产物”来确定[3]，这是个既有些稀奇古怪（尽管在直觉上是可信的），又在实证上不可操作化的定义；同时，齐美尔猜测，这个速度会与可支配的金钱的数量以及金钱的流通速度有关。[4]

---

〔1〕 Simmel，1897年，第215页。

〔2〕 在一项由Nadine Schöneck所展开的在全德国范围内所进行的民意测验中，有80.4%的被调查者在“您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加速”这个问题上给出了肯定的答案（2004年，第32页）。

〔3〕 Simmel，1897年，并参考Simmel，1900年，第696页；也请参阅前文第二章“2”。

〔4〕 参考Simmel，1900年，第706页及其后页。齐美尔从与农业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的急剧加快的生活节奏中推导出：“当我们把不同时间的货币的周转能力仔细地与生活节奏在不同时期的差别相比较，就会直接看到，所有一切的关键点都在于经济的运行。”

在一项饱受赞誉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对来自全球四个部分的31个不同国家的大城市的生活节奏进行了测量,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
195 社会学家列维尼和他的研究团队在这项研究中建议用另一种相对简单的实证操作化定义界定生活的速度。根据这个定义,能够通过三个指标算出不同的文化中的生活节奏:"第一个是步行速度,是指在市中心的区域里,步行20米的距离的所用的时间;第二个是指工作速度,一位邮局职员卖出一张普通的邮票所需要的时间;第三个是公共场所的钟表的精确度。"[5]这种确定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名副其实地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这的确是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成果。[6]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与其说在方法上,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在实证上有着值得质疑的有限的启发意义。尤其是人们不禁会问这样的问题:究竟在这里什么被测量了,是社会生活的节奏吗?! 首先值得质疑的就是指标的选择性。正如研究者从饱经风霜的经验中所得知的,纽约的邮局职员与欧洲的标准相比的确是非同寻常,甚至是闻所未闻的动作缓慢,而这可能是与在美国公共领域不受重视并且常年收入较低有关。[7] 而将这个测量作为这个大都市整体的生活节奏较慢的指标看起来确实是有问题的。相反,爱尔兰人被证明速度是最快的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可能并不能用普遍的迅速的生活
196 速度来解释,而是可以从爱尔兰经常的阴雨天中找到原因。[8] 为了能够在确定生活节奏的时候恰当地注意到每种文化实践中的时间特性,在这里就必须关注不同的行为领域中各种各样的过程所涉及的所有行为的速度,并将它们汇总起来。

有关究竟什么被测量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强调了列维尼所说的第

---

〔5〕 Levine,1999年,第179页;对此也可以详细地参考Rosa,2001年a,第343页及其后页。

〔6〕 列维尼的研究主要证明了人们一直以来的猜测,即经济发达地区比落后和贫穷地区节奏要更快一些[第38页及其后页;这其中的一个耀眼的经济上的原因就是,时间被作为短缺的(生活)资源来对待,因而应该根据合理的价值观对它进行分配,这就导致了被研究证明的物品富裕和时间富裕之间反向比例关系。有关这一点瑞典经济学家斯戴芬·林德(Linder,1970年)早在30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在气候比较炎热的地方要比气温适度的地方节奏缓慢一些(第47页及其后页);而正如齐美尔在他的一篇写于1903年的文章《大城市和精神生活》(*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中所证明的,大城市相比小城市有着更快的生活节奏(第46页及其后页;在这里列维尼主要是从其他研究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引人注目的是,西欧以大大超前的速度而成为最快的文化区域(位列前三名的是瑞士、爱尔兰和德国),而与此同时加拿大和美国只是被远远落在中间地段。

〔7〕 相应地,美国的邮局速度在列维尼的排名表上是31个排名中的第23个(Levine,1999年,第180页)。

〔8〕 有关这个想法我要感谢Manfred Garhammer。

三个指标，卡尔海因茨·盖斯勒观察发现，公共场所的钟表，尤其是那些大城市生活的汇合点上的时钟，例如现代的飞机场，正在不断地失去其价值，并且正从街景中消失（或者是不被察觉地摘了下来）；[9] 所以正确的是，之所以公共场所的时钟不再受重视，是因为公共场所时钟的精确性是落后、坚守在“经典”现代的象征，而不是走向快速度的“后现代”的表现。[10] 最后，列维尼的指标本身并不能够说明任何有关行为事件的“稠密”和所感受到的时间压力的问题，而这些至少在对快速的生活节奏的主观感知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而且无论如何不能将行为事件的“稠密”及时间压力与单独的行为的执行速度以线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能够比另一个人更快地完成某个行为，这可能恰好使他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减速，当然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人将释放的时间资源用于休息或者休养。 197

由于这些困难，我在第三章.2(3)中建议，生活节奏的加速可以定义为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每个时间单位的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增加，并且可以将其区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组成部分。有关客观的组成部分，至少基本上可以通过时间预算研究从对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稠密的测量中获得；与此同时，对紧张、时间压力和“快速的”时间的主观的体验是对紧缺的时间资源[11]和时间的快速流逝的感知的重要的指标。因此，生活节奏的加速包含着总体的行为速度的加快，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体验的改变。

我将在接下来的部分首先探讨有关客观上的行为事件和经历事件的变得稠密的表现形式和证据，从而能够在之后回答有关对时间压力的主观体验以及对时间资源和时间飞转的速度的感知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要尝试着分析生活节奏加速现象中仍然隐藏着

---

〔9〕 正如盖斯勒所认为的，时钟完全失去了重要性可以用个人用的计时器的广泛的普及程度来解释，在我看来这是合理的，但是没有被证明。时钟在飞机场和火车站的重要性越来越小，我认为这是个不合理的说法，相反时钟对于中转活动的协调和同步化是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但是，公共场合的钟表的消失和不被注意到可能体现了有关集体的时间节奏失去了意义的值得注意的征兆：指向 12 点钟的工厂的时钟并不再一定是表示午休时间，17 点也不再必然是下班时间，18:30 也不再是所有的商店的打烊时间，24 点也不再是电视节目结束的时间，而星期五晚上并不已经是集体的休闲时间的开始（参照 Rosa，实行 2001 年 a，第 342 页及其后页）。

〔10〕 可能在这里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照列维尼的这个指标，瑞士和意大利能够排在第一和第二名，而美国却只在第 20 名（Levine，1999 年，第 180 页）。

〔11〕 时间资源的短缺再一次可以解释为，当行为数量的增加速度和处理速度的加速之间的关系，它是当前者大于后者时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参照第三章“1”，图 *3-4*。

的维度,它与行为方式、体验方式,甚至与"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与重要的身份定义形式有关。这个维度的变化也会产生与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速所带来的文化方面的一样的结果,因此,这个维度表现为"加速圈子"中的必然的结果,在第七章也会作为到目前为止所有思考的总结而加以解释。

1. 客观的参数:行动速度的提高

在这个可以用定量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检验的维度上,生活节奏的加速的命题假设了在每个时间单位里的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数量的增加。对此,原则上有三个互不相同又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策略可供使用:第一是行为本身是能够加速的(走路、咀嚼、阅读得更快);第二,中间休息和空闲时间是能够被减少或者消除的;第三,有更多的行为可以同时进行(多任务操作)。罗宾逊和戈德柏在他们的时间使用研究中将这些策略称为"时间加深"(time-deepening)策略,并且在这三个策略之外增加了第四个,也就是用更快的活动代替较慢的活动,例如通过打电话给比萨外卖服务代替做饭。[12]

用普通的方式表述在这里所要验证的命题就是,平均的生活节奏从现代的开端起就在不断地加速,尽管这种加速不是线性的,而是中间伴有间歇和较小的趋势逆转的阵发式的。[13] 工作日的长度和不用工作的

---

〔12〕 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39 页,参照 Schmahls(1998 年,第 362 页及其后页)也提供了内容广泛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包括 18 种日常活动的节省时间和进行实践管理的列表。

〔13〕 在这里同时也意味着这样的猜测,生活节奏在现代社会比在其他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前现代文化中都要快。但是,对这个命题的实证检验却因为难以生成相应的可以比较的数据资料而失败了。林德(Linder,1970 年,第二章)从他的有关时间富裕与物品富裕之间的反向比例关系的定理中推导出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的存在:拥有富裕的时间和短缺的物品的社会;在经济的富裕程度和时间资源上保持平衡的社会;以及伴随着巨大的时间紧张物质大大剩余的社会。在林德的分析中,这三种社会类型很大程度上与前现代的、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相关。在人种学的研究中有符合这条假设的一些实证证据。因而,例如 Allen Johnson(1978 年)指出,秘鲁的玛奇根迦印第安人(Machiguenga-Indianer)每天所拥有的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他们可以用这个时间睡觉、打瞌睡或者聊天)比法国人至少要多四个小时,而后者要用是前者三倍到五倍的时间用来消费物品。进一步的证据请参见 Sahlins,1972 年;Cherfas/Lewin,1980 年;和在 Robinson/Godbey 的探讨中,1999 年,第 26 页及其后页;以及 Levine,1999 年,第 41 页及其后页;和 Dux,1989 年。

时间的数量在这里并不能就生活节奏说明任何问题。在早期现代,每天 199
甚至要工作 14 个小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为速度和体验速度特别的高,有可能它们是很低的,由于工作时间很长,迫使在有限的休闲时间里不得不让行为变得稠密。如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第一卷所观察到的,劳动变得紧凑和“工作日的每个毛孔”都被填满,就是对上述所提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加深策略的有说服力的例子;它们所带来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工作日的缩短。[14]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至少与工作相关的生活节奏,作为工作时间发生改变的直接的结果而加快了;与此同时,在不用工作的时间里的生活速度与这个时间的长度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它可以随着增加的业余时间而变慢或者加快;在物品富裕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了休闲时间的生活速度加快的趋势。[15] 只要有关时间压力和紧张的感觉是生活速度加速的指标的话,那么,在西方社会生活速度的可测量的加快与工作时间的缩短同时出现,就不值得惊讶,这个由罗宾逊和戈德柏所强调的出现在这两个数值(休闲时间的增多及尽管如此仍然不断增强的紧张感)上的矛盾,在仔细看过之后,会被发现是一个虚假的矛盾。

在日常生活中、报纸专栏和文化批判书籍中可以找得到的有关这三个(或者说是四个)使时间紧凑的策略的例子,既是数量繁多的,也是种类各异的。它们从有关“补充能量的小睡”(*power-nap*)(只用几分钟就能够提神的短暂睡眠)和关于压缩的和紧凑的与孩子在一起的晚间“宝贵时光”(*quality time*)*的指导,到有关快速阅读(*speed-reading*)和快速约会(*speed-dating*)(一种介绍伴侣的方式,在这种见面方式中,以一分钟为节奏,似乎是在流水线上与潜在的“约会对象”面对面的接触),直到开车经过的葬礼(*drive-through-funeral*),所有这些创新都受到了英国人的喜欢,但是似乎美国人才是这个方面真正的开路先锋。我们可以进 200
一步找到这种广泛流行的趋势的报告,例如经典的交响乐和歌剧的演出时间如同广播和电视新闻节目的时间一样都在不断地缩短。[16] 即便是我们的说话速度也有了显著的加速:这从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直

〔14〕 参照 Marx,1972 年,主要是第 1、10、15、17 章,以及第 19—21 章。

〔15〕 参照 Marx,1972 年,第 13 章。

* 特指父母排除工作和外界杂务的干扰,而专心致志与孩子在一起亲热欢聚的时间。——译者注

〔16〕 参照上文的第二章“1”。

接感觉到,并且显然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得以证明;[17] 而与此同时,在政治学家乌尔夫·托格森(Ulf Torgersen)*的研究中也发现,在挪威有关年度财政商讨的国会谈话中,每分钟所发出的音节的数量逐年连续增加:从1945年的584个增加到1995年的863个,提高了近50%。[18]

正如首先被格哈德·舒尔茨的研究所证明的[19],尤其是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生活的节奏不仅是通过(主动的、可以客观测量的)行为事件的数量,而且也是通过(被动的、主观的)体验事件的数量的增加而加快的。由于不是所有的体验都能够算做行为的[20],因此根据舒尔茨的观点,正是前者的数量和质量在"体验社会"中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并且似乎也为"美好的生活"的定义提供了重点:*在越短的时间里尽情享受了越多的丰富内心生活的体验事件,就越美好*,这是舒尔茨所提出来的这个社会的文化公理。[21] 不过,与作为基础的文化方案(我将在第八章"2"中讨论这个问题)无关,生活节奏加速的假设指出,每个时间单位内
201 的体验事件的数量也增加了,也就是说出现了"体验压缩"的现象。

而这个想法显然已经在齐美尔对生活节奏的定义中被证明了,他指出了在每个时间单位里,所意识到的内容的数量的增加与不同的意识内容间的对比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从CNN的广告短片的所持续时间的缩短来发现这种形式的体验稠密,CNN的广告短片在1971年缩短到30分钟,在当时的环境中可谓是先锋创举,而今天广告片甚至只有5秒钟。因此,广告片的观众每5秒钟就被丢弃在通过每一个叙事的结构碎片而发生完全变化的"意识内容"之中。[22] 变化更快的是这个时

---

〔17〕 例如Gleick(2000年,第103页)这样写道,在196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被允许在电视上不被打断的谈话时间平均为40秒钟,而现在缩短成了平均8.2秒的"简短引述"。也请参考Weibel,1987年和Kirchmann,1998年。

* 乌尔夫·托格森(1931—2006),挪威政治学家。——译者注

〔18〕 参考Eriksen,2001年,第71页。

〔19〕 Schulz,1994年,1997年a和1997年b。

〔20〕 我在这里是按照舒尔茨(Schulz,1997年a,第735/738页)所提出的这个概念的用法,而不是卢曼(Luhmann,1996年,第161页及其后页)对体验和行为的区分。

〔21〕 Schulz,1997年b,第90页及其后页。

〔22〕 参考Eriksen,2001年,第84页。另外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与好莱坞电影中的惯常的表现方法有关。动作镜头和打斗镜头被加速,以在银幕上呈现出重叠跳跃的效果,而观众并不能完全跟得上这些(打斗中)发生了什么: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在事后才明白过来的,或者就一直不弄清楚。参照Peter Wollen,2002年,特别是第109页及其后页,在那里对电影的加速历史做了非常有启发的展现。电影艺术影像让人很容易想起维希留和波德莱尔所提出的快速的停止状态,这些影像也是"通过超级快速而瘫痪"(Peter Wollen, 2002年,第114页)。

代的人在看电视时的“不断换台”——平均每 2.7 秒就换一次电视台。[23] 即便有人留在没有广告的频道里,也能够发现例如与 20 世纪 70 年代相比的大幅度加快的图像片段的频率。在齐美尔式的定义和每天平均看电视时间为远超过两个小时的背景下,这样的发现本身就已经能够作为生活节奏加速的有力的证明了;因此,罗宾逊和戈德柏非常惊讶地发现,人们在电视机前面度过的时间越多,他们就会更多地抱怨紧张和时间不够,这样的现象如果从前面所说的角度来看就一点都不矛盾了。[24]

当然,从这里面产生了困难,即只要体验总是通过它的背景来定义并且需要一个通过主体叙事式的确立的话,那么哪些可以作为独立的体验事件是不清楚的;[25] 因此,将每一个新的广告短片或者每一个叙事上 202
的序列定义为体验事件可能是不可想象的。尽管人们需要提出更全面的有关体验的定义,但是体验密度的持续提高的猜测仍然是可信的。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碎片化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说,通过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随着注意力窗口的不断缩小而被分割为越来越小的序列。埃里克森从中发现了晚期现代的“瞬间的专制”的特征,这是由持续不断的可抵达性(并且通过与之相伴的对多种多样的外在的干扰的注意)、实践活动的弹性化和去机构化以及信息过载和物品过剩所引起的。这种特征产生了这样的情境,“在那里,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都被切成一片一片的了;在那里,事情之间的间隔变得越来越小;在那里数量不断增加的时间拥挤在不断缩小的时间的狭槽里”[26]。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任务执行现象也是很有艺术的:它迫使人们以每秒钟为间隔在多种多样的行为背景下作出意识转换,因此,似乎不只导致行为的相互重叠,而且也包括体验上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里看到的,有实证证据表明,体验事件的缩短和稠密会带来时间体验的显著的改变,产生时间流逝得越来越快了的感觉。

在任何情况下几乎都不用怀疑的是这个事实,即可支配的而且可能是有意识的物品和信息不断增加的数量缩短了在每个单独的对象上所给予的时间段:当我们将我们的时间预算中固定不变的一部分用于阅读

---

〔23〕 Levine,1999 年,第 80 页。

〔24〕 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136 页及其后页、第 261 页及其后页、第 229 页及其后页和第 319 页及其后页;同时也请参考同一作者,1996 年。

〔25〕 参照 Schulz,1997 年 a,第 43 页及其后页和第 735 页。

〔26〕 Eriksen,2001 年,第 148 页,请参照第 141 页;进一步请参考 Bauman,1995 年。

书籍、听 CD 和回复电子邮件的时候,随着我们购买的图书、CD 或者收到或发送电子邮件的数量的增加,我们用在每本书、每张 CD 和每封电
203 子邮件上的平均时间就会减少。[27] 同样,随着有影响力的刊物的数量的增多,我们应该用于阅读专业期刊的时间也减少了;有关这种被迫加速的例子可以任意举一反三,它们都一再显示,在现代社会增加的逻辑和加速的逻辑是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增加的速率超越了加速的速率,就会出现时间资源短缺,并且因此导致生活速度的提高。

用于作出合理的和明智的选择决定以及用于行为之间的协调和同步化所需要的时间的增多,也进一步推动了时间资源的短缺。一方面市场上所提供的越来越复杂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行为实践的去规制化、弹性化和去常规化,也都要对此负责。这些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一生中越来越多的时点上和在日常实践活动里,涉及不同的选项的决策过程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因为无法预测各种决定所带来的结果(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被迫变得成本更高,因而需要更多的时间作出决策。[28] 因此,对于我们的时间实践,从中产生的几乎都是不满意的感觉:人们最终要么是(1) 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充分而作出至少部分上是偶然的决定(尽管可能在其
204 他任何一位经销商那里的其他的任意一款计算机机型都要便宜很多,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找到它:林德认为广告的功能上的秘密就是从信息中得到建议和功能上的等价物的能力)[29];或者(2) 人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获得了非常详细的信息,之后感觉到用了过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决定;或者(3) 人们放弃做决定,接着用手上的计算机机型或者

---

〔27〕 通过化繁为简的方式,可以这样阐述由系统理论所假设的由复杂性所带来的(作为对复杂性的反应的)时间化与加速之间的关系:当然,当我们购买图书或 CD 时,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并不是所有的书或 CD 都要在一个月内去看或听的,而是有整年整年的时间;这样的打算是以我们在未来新购买的图书或 CD 的数量是下降的基础上的,而我们很有可能不会这么做,因而被迫加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在下一个月或明年情况看起来会更加糟糕……

〔28〕 因而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如:考虑到价格因素、实用性、网络连接的选项,哪一款计算机对我来说是合适的?哪种医疗保险对于我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是最合算的(考虑到我的职业和家庭发展都是不稳定的这样的事实),哪种投资是最有成效的?在时间资源萎缩的同时,增长的信息需求是各种专业咨询服务能够营利的原因。

〔29〕 "人们确实想被广告影响,从而产生瞬间的感觉,觉得自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去买这个或那个商品,但是这些商品的真实价值人们却知道得非常少。只有不明智的购买者才去获得所有的信息"(Linder,1970 年,第 74 页)。

保留已有的医疗保险或老式的存折等。[30] 根据林德的分析,这些情境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每个决定的质量下降的结果,也就是说,决定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能力的下降;时间合理化的要求迫使不断增加实质上的不合理性。[31] 正如我打算在第十二章中所要指出的,集体的、政治的决策过程也同样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当中,而这些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的集体性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并会影响社会的政治的自我理解力。

在晚期现代社会中大量的行为领域暂时的去规制化和去制度化因而大大增加了制订计划上的开支,并且因此也增加了用于协调和同步化日常行为次序的时间需求。以集体共同的节奏和时间结构[32]为代价所带来的结果是,每日的、一周的和每年的程序不再理所当然的是预先结构化的,而总是随着新现象的出现以及保持与合作伙伴的协调而不断地进行安排并行动的。[33] 当既不是(几千年来都一如既往的)日出和日 205
落,也不是工厂的汽笛声,而且同样也不是电视节目的结束和开始,发挥着起床和上床睡觉的有规律的脉冲传感器的作用时,就必须每一次都要对相关的决定进行打算和权衡。“在今天,有谁还能自觉自愿地起床,或者愿意去尝试这一点?人们是需要刺激的”,时间研究者盖斯勒一语中的地这样评论。[34] 通过这类的(花费大量时间的)决定过程和计划过程所引起的多重负担解释了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的中心论点,即鉴于人类基本的行为诚意和决策诚意,社会机构执行着重要的

---

〔30〕 有关对于这样的时间的两难困境和决策方面的两难困境的实证证明请参考Hörning、Ahrens 和 Gerhard,1997 年。

〔31〕 《增长的不合理性的合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Growing Irrationality*),第六章,Linder,1970 年。

〔32〕 诸如工作时间、休闲约会、商店开门时间和做祷告的时间、规定的周末、新闻节目等等;对此请详细参照 Garhammer,1999 年,第 30 页及其后页、第 347 页及其后页和第 474 页及其后页。

〔33〕 Eriksen(2001 年,第 132 页)提供了有关这类过程的形象的例子:“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最主要的当务之急就是用工业化的组织方法管理家庭时间。这个过程基本上就像这样:如果你今天带 X 去上小提琴课,我就去幼儿园接 Y。如果你周末带着两个孩子去乡下,那么我就能不受干扰地做些什么。下个星期我将带他们去我的父母家。今天你能留在家里看孩子吗,这样我就能去参加聚会了?如果我明天能早点离开家去上班,那么你在星期四就可以这么做。成交!”

〔34〕 Geißler,1999 年,第 142 页,因而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有趣的现象,即人们明显地认为夜晚更重要,而且也更喜欢夜晚:昨天晚上还调好闹钟以便明天早上发挥作用,但是今天早上就拒绝将它作为让我们起床的脉冲传感器了。

* 阿尔诺德·盖伦(1904—1976),德国重要的而且富有争议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人类:他们的特性和在世界上的位置》《原始人和晚期文化》和《技术时代的精神》。——译者注

解除负担的功能。[35] 当今社会中大量实践活动的去机构化将直接导致(实践上的和认知上的)多重负担,而它必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时间资源的紧缺并且因此导致生活节奏的提高。

鉴于有关时间的合理运用的问题,技术的加速和灵活的可实现性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与社会的行为期望之间的相互作用就非常吸引人了。事实上,今天的约会越来越多地甚至是"随时间而定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再事先被确定在日程表中的某个特定的时刻,而是可变的、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加以商定的(与"我们 *12* 点钟见面"相反,而是"等我这边结束了之后,我给你打电话,看一看你到了没有")。曼弗雷德·伽哈玛在他对欧洲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时间使用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普遍的趋势,即人们的行为之间有着更多的时间上的(和社会的)联
206 系,而不是以往的较低的关联。[36] 而因为变量和偶然性的数量都翻了一番,这样的趋势就增加了计划成本和协调时间,但是它又缩短了等待时间并且避免了时间上的刚性(例如,前面的一件事情提前停止了)。鉴于这种让人在时间预算上感到左右为难的结果,因而一方面似乎应该做到更高级别的合理化,因而需要放弃"可变动的"和弹性的约会安排,以便节省时间和力气;而在另外一方面,在这样的环境下具体来看每一个单个的决定,它们又显得高度的非合理化(为什么当你完成手上的事情后,不给我打电话?!)。类似的这种高度的不合理的情况也出现在,由于电视里正播放着无聊的电影时而不能换台;面对飞快的电子邮件来往却很长时间得不到想要的信息(这当中也包括错过了重要的信息);或者甚至如同卢曼在对于"瞬间的专制"这个问题所建议的解决方案那样[37],在事先已确定的工作日中让同事联系不上成为完全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如同前文所定义的暂时的、人为的"减速"),但是,当一年中最重要的会议或者来自国外的同事的拜访恰好是在这样一天里的时候,即便是卢曼所提出的这一类的原则的最信服的支持者也会允许例外的,当然这只是更毫无戏剧性、更日常的协调问题,它们需要动用不合理的和/或妨碍社交的策略:如果你明天没有给我发送这个附件,我就会错过申请截止期。如果你明天不到对面的门厅与我碰面的话,我后天就必须额外再进城一次。这一类的宏—时间节省策

〔35〕 Gehlen,1986 年。

〔36〕 Garhammer,1999 年,第 412 页及其后页。

〔37〕 Luhmann,1968 年。

略的成本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往往都是过于高昂的(尽管时间咨询顾问会一再这样建议)[38],这是因为人们将它再制度化为集体的约束。[39]

最后,程序上的技术加速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上已经确立了的时间的合理性的标准:等待回信要用七天、某件事情需要八天,看上去都是恰当 207
的,如同电子邮件的回复期限一样,如果回邮的接收者过了几秒钟才收到的话,就显得不合时宜的漫长了。技术加速没有迫使生活节奏加快,但是它们通过改变作为基础的时间标准,而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和计划。[40]

不幸的是,在常见的时间预算研究中,实际上并没有把所有这些发展考虑进去(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在此期间在所有大型工业国家中的加速进行系统的数据记录)。因而如果有人希望,能够从现在已经泛滥的时间使用研究中为这些稠密过程和加速过程找到实证证据,而不是片段性的单个的发现,那么他一定会非常失望的。目前的时间预算研究的形式将焦点集中在不同的活动领域中的时间安排,也就是说,谁可以在哪一类活动中用多长时间;并且同时告诉人们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对时间资源的使用上的不同(在这当中,他们确定了,例如去剧院看戏平均所花的时间略微减少,而在计算机前度过的时间却增加了;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一再充斥着激烈的斗争[41]),以及对工作时间的态度与对休闲时间的态度(以 208

---

〔38〕 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大量对时间结构进行分析的同仁都不断地发现,他们的研究被变成了某种有关减速的实用建议;例如 Reheis,1998 年;Levine,1999 年;Geißler,1999 年;Eriksen,2001 年;以及甚至 Luhmann,1968 年。

〔39〕 甚至卢曼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制度化的借口能够保护对合作的要求。”(Luhmann,1968 年,第 158 页)

〔40〕 Eriksen(2001 年,第 150 页)因此得出结论:在现代社会成立的是,快速时间灭掉慢速时间,即在快速过程和缓慢过程交汇的地方,所产生的不对称就会导致缓慢的过程处于加速的压力之下(而并非相反的情况)。

〔41〕 参照例如 Robinson/Godbey,1999 年,在那里发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工作时间有轻微的缩短;和 Schor,1992 年,提出了在美国工作时间显著增多方面的加速。不同的结果是对哪些可以算作是工作时间这个问题的不同的理解(有争议的如工间休息、离开工位的时间和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以及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在 Garhammer 所提出的猜测(1999 年,第 293 页及其后页)的上下文中所指出的,那些能够观察到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只要它们不是因为不断增加的失业率所导致的话)所节省的时间,被用在与工作有关的,但是不付报酬的活动上(例如获取信息、构建人际网络、继续深造等活动)了,甚至超过了那些被缩短的时间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对此也可以参照 Hochschild,2000 年。在最近几年里,增长的工作时间的趋势变化却是无可置疑的。

及其他[42])之间的关系。但是即便是凭借为此所开发出来的调查工具,也没有办法把握在这里所猜测的加速现象。一天里能够使用的所有时间一直是24个小时,因而如果在某个活动上(例如家务劳动)节省了时间,就能用在其他活动上(例如看电视),因此结果就是总是处在与速度无关的零和游戏中。[43] 是否在工作时间时更多而且因而更快地工作、在阅读时间更多地阅读,或者在交流时间开展更多的交往,这些都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即便可以通过时间日志本相对容易得知的中间休息和空转时间的缩短,也会时常使被调查者和研究者感到困惑,因为有关这种时间的缩短也将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领域(例如交通过程、睡眠或交流)也算进来了。因此,关于在每个时间单位里是否出现了行为事件的变得稠密和体验事件的变得稠密以及是在多大程度上变得稠密这样的问题,从目前所呈现的时间预算研究中还找不到答案。

因此,从迫切需要进行的研究中就产生了革新研究设计的要求,新的研究设计应该系统地探明将三个(或者说是四个)所诊断出来的加速
209 形式——单个行为的加速、消除中间休息、活动在时间上的相互重叠以及用省时的行为代替费时的举动。因而这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加速的陈述应该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因此只有通过按照历时的、反复的调查(特别是通过跟踪调查)才能真正地对此进行检验。

如果不进行这些研究,那么只可能间接地通过确定时间预算移用到其他活动上而推断加速过程了,并将它作为对行为事件缩短的解释。因此,特别是在用于个人的恢复(吃饭、睡觉、身体清洁)的时间方面,可以证明,由于相应过程的加速而出现了缩短的现象。

而且,事实上,目前已有的研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富有启发意义

---

〔42〕 这当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罗宾逊和戈德柏所系统证明的有关"越多就越多"模式的观察发现(1999年,第41页以及这本书中的其他好几处):一个人在社交领域里越是积极,那么他在其他领域里也是积极主动的;不是那些最可能愿意接受荣誉职位或额外的工作任务的人,他们很少劳动并且几乎没有兴趣爱好,而恰恰相反,随着所履行的职责和任务的数量的上升,这些人的意愿也随之提高。在这里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例如,如何运用并且促进激励资源用于公民的义务(参照Giegel/Rosa,2000年;Giegel/Rosa/Heinz,2001年)。进一步请参考Robinson/Godbey,1999年对美国的研究;Garhammer,1999年和Gershuny,2000年对欧洲的研究;Holz,2000年,对德国的研究。以及Schor,1992年;Gershuny,1990年;Benthaus-Apel,1995年;威斯巴登州立统计局的统计数据(Statistisch Bundesamt Wiesbaden),1994年。

〔43〕 对此请参考诸如罗宾逊和戈德柏(Robinson/Godbey)对时间的"零和特性"的解释,面对两位作者自己所描述的时间压缩的可能性,时间的零和特性表现出令人目瞪口呆的敏感性:"简单地假设一下,如果有人用更多的时间在某个新活动上……那么在其他活动上所花的时间就必须表现出减少。"(1999年,第15页)

的,即前面所证明的大约在1989年开始的数字时代和政治革命的年代是以显著的加速阵发为标志的假设,是对来自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的时间使用研究[美国人时间使用研究项目(*American's Use of Time Project*)]的从1985年(样本量=5300)到1995年(样本量=1200)数据的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男性,每星期用在身体清洁上的时间约减少了2.2小时、吃饭用时约减少了1.8小时,睡觉时间则大约少了半个小时,这说明,被调查者吃饭、洗澡更快,睡得更少(有关女性的相应的数据为:洗澡减少1.9小时、吃饭减少1.5小时,但是睡觉增加了1.3小时)。[44] 这样的结果在伽哈玛所分析的欧洲人的时间使用数据中得到了证实,在这项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个体需求”在时间上的“变得稠密”的明显的趋势,并且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相应的行为的加快。[45] 在这里,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是,平均睡眠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减少了大约30分钟,而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则少了近两个小时。[46] 仅是这个数字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解释这些调查研究结果要多么小心谨慎。因为,对于前一个数据,一致被其他研究者所 210
质疑,[47] 而对于第二个数据,如果将它作为一个躁动不安的没有停歇的社会的症状去理解的话,就过于草率了:它也可能只是这些事实所导致的结果,即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后工业社会越来越少了,而且年龄大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及是因为“客观的”睡眠要求降低了。[48]

同时,目前已有的数据资料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证实了所假设的发展:不断增加的多任务执行的趋势和行为的不断增多的碎片化的趋势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毋庸置疑的。[49] 但是,正是它们损害了这些时间预

---

〔44〕 数据来自Robinson和Godbey,1999,第336页及其后页。

〔45〕 Garhammer,1999年,第378页。

〔46〕 同上书,第379页。

〔47〕 罗宾逊和戈德柏的研究中(Robinson/Godbey,1999年)特别奇怪的地方是,那些从1985年到1995年之间男性睡眠习惯的发展的数据更多地被两位研究者看做是非典型性的;而有关其他的两种行为种类从这个研究中所得出的数据,如果考虑到另外的比较时间段的话,也会出现不一致的状况。Gershuny(2000年,第219页)通过对他所进行的全球的纵贯研究中的对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自1960年以来,在较高职位者和受过更好的教育的人那里,平均的“睡眠压缩”约为20分钟。

〔48〕 Zulley/Knab,2000年,第118页及其后页。但是,最后一个观点并不能用来解释所发现的有职业的人的睡眠时间减少的现象;对此也请参照Holz,2000年,第14页,和Gershuny,2000年,第218页。

〔49〕 关于碎片化请参照诸如Robinson和Godbey,1999,第56页;或者Holz,2000年,第19页及其后页;同样也请阅读Eriksen,2001年。有关多任务执行请参考Gleick,1999年,第171页及其后页;Garhammer,1999年,第472页及其后页;Benthaus-Apel,1995年。

算研究的可信度:如果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同时平行完成多个行为(很有可能没有明确的重要、次要和第三位的层次区分),那么就会出现时间单位的具体分配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时间碎片化以及行为的类型、行为的地点和行为的时间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所带来的问题则显得更为严重:在那些在家工作,同时又完成家务劳动、照料孩子和休闲活动的地方;在那些在工作岗位上同样也有相应的休闲活动的地方;在以杂乱的顺序回复诸如私人的、工作的和寒暄式的电子邮件或相应的来电的地方,时间的分配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将行为清晰地分类整理几乎是不
211 可能的,因为工作领域、家庭领域和休闲领域都渐渐地模糊为不再能区分的了:如果有人在工作场合听贝多芬的音乐、在音乐厅却为一个重要的工作难题找到了答案,并且将朋友关系和业余活动相互结合起来,因而职业上的发展同时也对越来越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帮助,那么这个人会掉出时间研究的网眼。[50] 因此,从中可以证明,时间使用研究在它的调查研究方法上来看是对时间高度区分的"经典的"现代的体现,但是对于分析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价值的确是非常有限的。

这些数据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两项非常全面的最新的时间研究——罗宾逊和戈德柏的《用于生活的时间:美国人令人意想不到的使用时间的方式》(*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和曼弗雷德·伽哈玛的《欧洲人如何使用他们的时间》(*Wie Europäer Ihre Zeit nutzen*),都一致地将加速和时间压缩作为时间使用模式的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且他们对于这个趋势给予了最大的关注,但却没有能够从他们的数据资料中对此加以证明。伽哈玛在他的总结列表上将加速列为在这个时代时间结构发展的十大重要趋势之首,并且非常典型地援引列维尼以及其他人的研究作为对他的诊断的支持。[51] 他指出另一个主要趋势是变得稠密,也就是说行为的缩短和同时进行,他同时也将根据在这里的变得稠密的定义,作为生活节奏的加速的指标。罗宾逊和戈德柏将无与伦比的生活节奏的加速的诊断放在详细说明和讨论他们的实证数据资料那个章节的开头,用了整整 30 页的篇幅描写时间压缩和时间紧张的现象,但是并没有将这些现象与之后所展示的时间使用研究切实地联系起来。[52] 相反,对于时间使用数据的分析却使得

---

〔50〕 对此也请参照 Verkaaik,2001 年,以及 Michelson/Crouse,2002 年。

〔51〕 Garhammer,1999 年,第 466 页及其后页。

〔52〕 Robinson/Godbey,1999,第 29 页;参照第 33、35 和 46 页。

两位作者逆着他们自己之前的判断,而向读者证明,生活节奏的加速被 212
理解为(纯粹的)感觉现象。[53] 尽管如此,我想在这里努力指出的是,无论如何都存在着大量的、可观察到的、虽然很大程度上隐藏在时间使用研究数据中的“客观的”或者说是有形的可以用来证明生活速度的加速的诊断的基础,但是它不是对罗宾逊和戈德柏的结论的正确性的质疑,而是体现了时间体验随着生活实践和日常实践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客观的生活速度的数量上的提高导致了主观上的时间体验的性质上的变化。仅仅凭借时间预算研究和对实证的加速证据的分析并不能对现象进行解释,而是应该通过系统化的研究。

2. 主观的参数:时间压力和时间疾驰而去的体验

正如在第三章“1”对社会加速的概念性的讨论中所展示的,由于运输过程、通讯过程和生产过程的持续的技术上的加速而导致的生活节奏的加快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技术的加速缩短了这些过程所必需的时间,并且部分上解放了大量的时间资源,因此对于同等数量的行为和体验来说,有更多的时间可供支配,因而可以去期待更慢的行为速度、更长的中间休息和行为之间较少的相互重叠。正因为如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休闲紧张还没有被当做业余时间的问题来看待,而是被看做是人们(当然特别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由于不知道如何 213
(明智地)面对往往是全凭理所当然的猜测所认定的因为其他活动的加速而“大量的空闲出来的时间”所产生的问题[一位巴伐利亚(*Bayerisch*)生意人在一篇写于1848年题为《蒸汽过剩和时间过剩》(*Dampfüberschuss und Zeitüberschuss*)的文章中这样说]。[54] 但是,1964年《生活》杂志的大标题却是:“美国人现在面临着过多的休闲:当务之

---

[53] “(我们的)研究结果看上去与许多社会观察者所报道的时间模式严重不合,并且我们自己的许多回应报告,也影响了这些社会观察者的生活,例如大大加快了美国人的生活步伐”(Robinson/Godbey,1999年,第8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所加)。对于作者而言,这些矛盾主要在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诸如在电视前度过的(毫无压力的)时间看上去增加了。而我要努力证明的是,有关生活节奏加快了的诊断与上述现象并不矛盾。

[54] 引自Koselleck,2000年,第161页,注释17。

急是如何过安逸地生活。"[55]

相反,生活节奏的加快是对时间资源的紧缺的反应:用于一个单个的行为(或体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两种加速形式的同步出现,正如在前面的讨论中所指出的,只有在增长进程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行为数量的增加超过了处理速度的加快。这样的时间资源短缺感受为主体——也就是说在时间体验中采取行动的主体——带来了时间流逝得越来越快了的感觉,[56]特别是时间贫乏和紧张以及没有时间的主观感觉(而行为人以前可能感觉到无所事事)。

自从1960年这样的时间感觉开始出现以来,它就在所有西方工业国家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这一点现在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57] 例如,从罗宾逊和戈德柏对全美的时间预算的调查研究中所得到的数据里
214 可以看到,在18岁到64岁的美国人中,说自己一直感觉匆匆忙忙,或者说感觉自己处于时间压力下的数字,从1965年到1992年分阶段地从24%上升到38%;与此同时,感觉自己几乎不在时间压力下的数字,在同一个时间段中从27%下降到18%。指出自己常常有空闲的时间资源("你所拥有的不知道该用来做些什么的时间")可以支配的被调查者的数量,在1965年间到1994年间,从15%下降到7%——下降了一半还多;在这期间,对于同样的问题给出了"几乎没有"的回答的人在所有被

---

〔55〕 参照Koselleck,2000年,《前言》。有关"休闲时间问题"也请参考Gershuny,2000年,第58页及其后页。这个论点往往与这样的(从结果上来看是错误的)断言有关,工作时间减少了,休闲时间增加了。Gershuny本身似乎就奇怪地认为相对于休闲时间压力,大量时间资源的被解放的可能性是这两种"休闲时间危险"中危险较大的一个。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在工作负担和对时间紧张的体验方面,两性之间一如既往的巨大差异,这主要是产生于女性拥有工作和家务方面,或者说照顾孩子的双重负担。由于男性一直在很大程度上故意远离家务,因而女性既在客观上拥有较少的空闲的时间资源,也在主观上有更大的压力(对此也请参照Schor,1992年;Hochschild,2000年;Robinson和Godbey,1999年,第197页和第349页,但是他们的数据显示了这种差别正在逐渐缩小)。

〔56〕 只要这种时间流逝的感觉产生于不断加速的行为中,就不值得奇怪。

〔57〕 参照例如Geißler,1999年,第92页;Garhammer,1999年,第448页及其后页;Levine,1999年,第196页及其后页;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29页及其后页和第319页及其后页;同时有关于这个题目的大量的研究论文可以在"全球时间使用大会"(*International Time Use Conference*)的网站的2002年"时间压力、工作—家庭交界面和父母—孩子关系"(Time Pressure, Work-Family Interface,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的页面找到(www.lifestress.uwaterloo.ca)。

调查中所占的比例，从48%提高到61%。[58] 从这些数据看来，时间资源的紧缺是毫无疑问的。尽管罗宾逊和戈德柏在此期间发现了这些症状不断增加，但是作为短缺的时间资源的表现的紧张的感觉及处于时间压力之下的感觉，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着轻微的但不可忽视的减轻，这些数据显示了趋势的转变（回答说自己总是匆匆忙忙的人所占的比例从1992年到1995年下降了6%，而表示比起五年前休闲时间更少了的人所占的比例，在此期间下降了9%，1995年为45%），[59] 与两 215
位作者的理解相反，这些反映的绝对不是生活节奏的放缓（伟大的美国人慢下来了），而更确切地说是加速的减弱：时间资源减少得不那么快了。正如我所证明了的，紧张的感觉对于绝对的生活节奏什么也说明不了，而是只能对生活节奏的相对变化作出说明。因此，在这里，出现与罗宾逊和戈德柏的假设不同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60] 俄罗斯（*Rußland*）的居民自从1990年以来，表示自己体会到紧张和时间压力的人的比例相对高（26%的成年俄罗斯人说自己不再有可以支配的时间，相反，美国人中这个比例“只有”23%），尽管在俄罗斯生活节奏估计要远远地慢于美国：在处于变革当中的俄罗斯，加速的速率要比美国高出很多。

然而，罗宾逊和戈德柏的数据仍然期望通过其他的研究，尤其是来自其他工业国家的这一类研究的证实。[61] 如果这些数据被证明是无懈

---

〔58〕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32页。伽哈玛（Garhammer，1999年，第450页及其后页）的全球数据比较也指出了同样的方向。根据他的研究，1991/1992年度，大约有78%的有工作的德国人抱怨时间贫乏。与之相反，Holz（2000年，第10页及其后页）却展示了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根据时间预算的抽样调查研究，在1991/1992年度，被调查者中有71%的德国人表示没有处在值得一提的时间压力下。据我看来，这样的差异首先是因为，在这项研究中紧张—指标（想要有更多的时间用在某个特殊的活动领域）是非常不精确的。因此，很有可能被调查者将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特定的事情，按照典型的时间预算的零和游戏，理解为关于“时间重新分配”的愿望了。当然，这些有关紧张的数据基本上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市民群体会以同样的程度面对这个问题，比如退休的人和失业的人种遭受这样的压力的人要少得多（Holz，2000年，第13页）。这项研究的中心论点是，加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趋势或基础特征，那些从文化上或结构上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市民群体，就因此不可能拥有显著的加速体验。

〔59〕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39页及其后页和第314页及其后页；参照，1996年。根据约翰·罗宾逊2002年7月10日在布里斯班（Birsbane）举行的第十五届社会学世界大会上的发言《生活的脚步在加快吗？一些实证证据》（*Is there an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Life? Som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展示的数据，这个趋势仍然体现在最新的美国时间使用的数据中。

〔60〕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79页及其后页。

〔61〕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新的德国人时间使用抽样调查（2001/2002年）值得期待。

可击的,那么它就能作为这个假设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而被加以解释,这个假设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波加速浪潮在 1990 年左右到达它的顶点,并且在此期间开始退潮。

在时间使用研究者的数据中,前面所提到的矛盾在此期间进一步表现为更加令人吃惊的变体:对紧张和时间贫乏的感觉从 1965 年到 1995 年有了急剧的增强,而与之相伴的是休闲时间也同样有了显著的增加,后者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表示空闲的时间资源的增加。因而,休闲时间在时间预算研究中通常不应该简单地被定义为不用从事工作的时间,而是应该被理解为不与有义务要做的事情绑定在一起的时间资源,对于这样的时间资源或多或少地可以按照个体的喜好来支配,也就是说,是在减掉工作时间、家庭和家务劳动时间(照料孩子、购物、家务劳动)和照
216 料自身的时间(吃饭、睡觉、清洁身体)后所剩下的时间。这种"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时间从 1965 年到 1995 年之间事实上对于所有的市民群体都在持续增多着,即便是对于职业女性也是一样(每周的休闲时间增加了 5.6 小时,而家庭主妇则增加了 10.3 小时;职业男性每周又额外地赢得了将近 6 个小时)。这是因为工作时间的减少,但是主要的还是归功于用于家务劳动时间的缩短;后者又被特别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工作时间的增加所部分"弥补"了。[62] 这些为罗宾逊和戈德柏的有关生活节奏的加快主要是感觉的问题的猜测提供了根据。

尽管在前面一节中已经指出的思考,即由于在每个时间单位里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增多这个含义下的生活节奏的加快,与不需要工作的时间的增长相安无事且毫无冲突地相伴出现,因此就需要解释,为什么被访问者会抱怨不断增加的时间压力和加速迫力,并不是速度加快本

---

〔62〕 数据出自 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339 页。并不能将女性和男性的差别组合起来观察:因为对于女性而言,大幅减少的是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与此同时,工作时间却是增加的;而对于男性而言,用于家庭和家务的时间增加了,但是工作时间却减少了。这两个性别都有显著增加的休闲时间入账(同上书,尤其是第 346 页)。伽哈玛的国际的自 1960 年到 1965 年的数据比较(欧盟和美国)也证明了休闲时间的增加;但是根据他的数据,没有看到用于家务的时间和工作的总体时间的减少,而是对自身的照顾活动加快了:"由于付薪工作的发展,因此每天用在那上面的时间……有了从 7.6 小时到 6.5 小时的显著的下降……另一方面,正如人们所预想的,不付薪工作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却有了同等数量的(显著)增加——从每天的 1.7 小时到 2.8 小时,因此总体的工作时间到了世纪之交之际仍然是保持每天 9.29 小时不变。每天的休闲时间从 60 年代以来增加了 38 分钟,达到 4.9 小时,但这并不是因为职场的人工作得少了。'时间盈利'的源头更准确地说是人们将在他们的个人需求上所用的时间压缩了一个多小时——从 10.5 小时到 9.5 小时……这个趋势可以解释所有数据来源中的疑问"(Garhammer,1999 年,第 427 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出自原文)。

身,而是根据数据看到的处于匆匆忙忙的感觉是令人诧异的。这可以在调查结果中找到对应的现象,被调查者拥有在一定程度上与数据成反比的印象,他们觉得自己的休闲时间持续地下降了——在“实际的”休闲 217
时间增加的同时,所估算的休闲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在持续下降;估算的休闲时间甚至是从时间日志中所计算出来的休闲时间的一半还不到,而且甚至比人们事实上在电视机前平均度过的时间还要少![63] 显然,从中首先只能确定,行为者所算出的休闲时间并不是空闲的时间资源的储备,而应该是被体验为快速流逝的并且和行为(以及体验)绑定在一起的时间数量。[64]

两个可想而知的产生时间压力的感觉的原因,首先是错过恐惧和适应强迫,它们出自不同的根源。正如我将在第八章“2”中要阐述的,对错过(重要的)事物的害怕并且因此产生加快生活节奏的愿望是在现代发展中的文化进程所产生的结果,它是通过加速的“享受时间世界上的选项”而产生的,也就是说,通过体验速率的提高,从而充实个体的生活,使得生命中有丰富的经历,并且从而实现“美好生活”。在这个观念里体现了文化上的对加速的承诺;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主体希望更快地生活。

适应强迫却是晚期现代社会的结构上的动态性所带来的结果,特别是社会变化的加速。不断加快的变化不仅出现在周围环境的物质结构上,也发生在关系模式、联盟结构、实践方式和行为导向上,正如我所尝试着指出的,这些必然导致“滑溜溜的斜坡”的现象;它使得行为者产生 218
了站在滑动的斜坡上的存在感。在一个动态的社会里,“现在的萎缩”的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知识储备和财产储备都面临着不断的过时的威胁。即便在行为者拥有自由的、不用做什么事情的时间资源的那个时间段里,他周围的世界也在以飞快的速度发生着变化。随着这段时间的流逝,行为者从很多角度上来看都处于落后的地位,并且因此就被迫要去追赶:例如,一位学者发现在八天的休假过后,电子邮箱里塞满了各种请求、一大堆有待批改的考试答卷、数量惊人的与他的研究有关的新现象、新的软件和硬件的介绍等等。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高度动态的社会里,时间迅速流失的感觉和由此而来的时间压力甚至会出现在不用工

---

〔63〕 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135 页;参考第 279 页的表 30。

〔64〕 因此,从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些资源首先与消费活动捆绑在一起,消费活动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作的时间里。“客观的发生过程”以比采取行为和进行体验要快得多的速度飞快地进行着。[65] 这是因为现代的结构上的加速强迫力;它使得主体必须更快地生活。

为了确定,错过恐惧或者适应强迫(这两者从实证上来看当然不能总是分得清清楚楚)是否更强烈地导致了生活速度的加速,仅凭定量研究或者标准化研究是不够的,这一点已经可以从在此期间的时间使用研究中看到。[66] 首先关于(休闲时间的)活动和时间分配变化的动机的有关分析是有启发的。

当然,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的承认模式中的时间压力有着积极的内涵意义:没有时间标志着是孜孜不倦上进的、有生产力的,时间紧缺因此毫无疑问尽管不是社交广泛所引起的,也是它所加强的现象。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与速度相关的地位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到目前为止,人们认为越快越好,因为这标志着更高的能力和更多的资
219 源以及因此所带来的发展的和社会的优势,但是在晚期现代完全可能是放缓成为地位的象征:如果谁能够做得到留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能够自己控制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有空闲的时间资源,那么他就占有优势。

由于缺乏对这个问题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因此在解释休闲时间的分配或者为其辩解时,无论如何应该关注在社会的休闲时间的语义中,表示必需的和有义务的词汇所占有的统治程度。仅凭产生于社会的希望的时间紧缺,并不能解释占统治地位的个体休闲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发挥着微不足道的限制作用的伦理法典之间的引人注目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在社会中活动的行为者令人惊讶地不断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有义务去做的:我必须马上再去读读报纸;我应该继续为我的健康做些什么;我必须买新衣服、学习新的一门语言、考虑我的兴趣爱好、再去见见我的朋友,是的,还应该去看歌剧、去休假,等等。[67] 因而,在西方社会比在高度规范的传统社会,必须——语义与非生产性行为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毫不令人惊讶。这似乎是对生活在滑动的斜坡上的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困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

---

〔65〕 参照 Luhmann,1968 年,第 149 页。

〔66〕 参照 Michelson/Crouse,2002 年;Garhammer,1999 年,第 32 页及其后页;Benthaus-Apel,1995 年;Robinson 和 Godbey,1999 年,第 290 页及其后页。

〔67〕 有关“休闲时间紧张”所产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类义务的清单请参照 Opaschowski,1995 年,第 85 页及其后页。

不见岸边”,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作出了符合逻辑的判断;与此同时,罗宾逊与戈德柏和休闲时间研究者奥帕斯沃斯基**都一致指出,必要的事情和必不可少的事情指数量级地增多也体现在休闲时间当中了。[68] 因而,只要斜坡更陡峭了,也就是说变化的速率加快了,就会发展出动机逐渐转移的固有的趋势:有关加速预言的修辞会在个体的和政治的层面上越来越多地被适应强迫的修辞所替代;在那里,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符合长期目标的方向,并且对以变动、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标 220
志的世界的选择和连接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69]

在这里有理由作出冒险的猜测,因为毕竟可能借此找到一些实证的线索:为了跟得上变化和由此产生的要求的步伐的努力,和由于不仅是周围环境而且是自身的需求的不可衡量性的不断增加而带来的选项的数量,尽管没有增加[与根据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的现代道德绝对要求的标准相比的话[70]]但是至少维持了这样的情况,人们出于自己的意愿认为是有价值的或者值得去采取的行为从视野中消失了,因为没有时间去做“的确”有价值的事情。这种情况绝对不只是在休闲时间中出现,而且至少是以同样的程度出现在工作中。对于长期来看重要的事情,以学者为例的话,如写一本书,看来无论如何是没有时间的,因为总是有琐碎的要求完成的事情迫在眉睫,它们往往非常直接地与保留选择性有关。为了支持这个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没有道理的观点,首先可以以有趣的方式定义一条极为有效的社会功能原则,其次展现令人惊讶的调查数据。

排序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手段,能够将行为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并且排列:[71]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事情最先做,之后是次等重要的,以此类推,而不太重要的事情要在还有时间资源可供使用的时候

---

* 肯尼斯·格根(1935—),美国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建构论》《积极老龄化》和《第一序列和第二序列道德准则》等。——译者注

** 霍斯特·奥帕斯沃斯基(Horst W. Opaschowski)(1941—),德国未来学家。主要著作有《开始生活:如何在德国独立》《休闲经济学》《21 世纪的教会》等。——译者注

〔68〕 Gergen,2000 年,第 75 页;Opaschowski,1995 年;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305 页。

〔69〕 Rosa,2002 年 b;参考下文的第 11 章“3”和第 12 章“3”。

*** 海因茨·冯·福斯特(1911—2002),奥裔美国物理家,将哲学与物理学结合起来,是控制论的先驱。主要著作有《理解理解》《记忆是什么》等。——译者注

〔70〕 参照 Gamm,1992 年,第 80 页,以及 Rosa,1999 年 a 和 2002 年 b。

〔71〕 “‘在玩之前先工作’这样的行为顺序反映了价值等级”(Lauer,1981 年,第 35 页)。

再去完成。但是,在一个有着广泛联系的互动链条的功能分化的社会里,这种排序原则会越来越多地被期限和限期所替代,后者被用于行为的协调和同步化。针对时间代替了导向的优先权,卢曼指出,"似乎时
221 间因素的加入,将价值的顺序打乱了。"[72]"期限的力量"现在确定了行为的顺序,并且由此带来了,在有限的时间条件下,那些没有与期限或者限期绑定的目标逐渐地就会淡出视线,因为(先)"完成"它们的负担似乎过重了,它们只会给人留下什么都没有做的不确定的感觉。因此,我们常常是"去灭火",在不同层面的协调强迫力中不断重新地开展我们的行动,而不再能够去发展长期的目标打算,也拒绝去实现它们。[73]"事实上,时间分配和价值判断不(再按照传统的方式——本书作者注)……是相互分开的了。对期限的强调改变了期限的特权、以价值为基础的优先权利,这与人们以前承认的其他的价值不是一致的"[74],卢曼进一步观察并且解释了,由于速度结构带来了价值体系的双重化,因此我们"拥护"某些有很高价值的行为或者甚至是生活方式(例如,在海边散步、去剧院看戏、参加公益活动、拉小提琴、写小说),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优先顺序中几乎不能找到这些"有哲理的"价值顺序的反映。

而且,将时间使用数据和生活质量联系起来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研究显示,行为者将大量的休闲时间不仅用在努力完成他认为价值较低的行为而且是日程安排中的所有行为中不太能够为自身带来满
222 足感的行为上。这一点尤其显示在看电视的行为上:被调查者认为看电视不仅是所有休闲行为中价值最低的[75],而且从中所得到的满意感甚至比从工作中得到的还低[在从 1 到 10 的满意度阶梯中,在全美范围内 1995 年进行的调查显示,看电视的平均满意度是 4.8,而工作却是 7.0

---

〔72〕 Luhmann,1968 年,第 143 页。

〔73〕 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292 页。

〔74〕 Luhmann,1968 年,第 148 页,并参照第 154 页,在那里卢曼对管理部门的公务员的工作环境的描写,似乎是晚期现代的生活的总体特征的描述:"由于要求履行大量的协调义务,每个人觉得他的时间如此短缺,并且是如此支离破碎的;尽管他是要在相互协作的联系中发挥作用的,尤其是要将一个工作背景中的最新的信息传递到另一个工作环境中,但是他根本找不到稍长一点的时间来思考。他的工作是管理可以迅速获得的并且可供利用的数据和符号;时间上的、业务上的和社会方面的远方的信息不再会考虑到,迂回的思考方式也不再会用到,因为用以协调的路径已经确立好了。"

〔75〕 在调查中所表达的意思是,被调查者指出这个行为正是他们首先准备放弃的(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242 页)。

(在1975年甚至是8.0)],也低于购物(在1985年所进行的调查中是6.4);在1995年的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至少在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中也甚至有比坐在电视机前更高的满意度(5.6),与此同时,男性被调查者表示,做饭(5.5)比看电视有更多的乐趣。[76] 但是,尽管如此,西方工业国家的居民们仍然把平均将近40%的休闲时间贡献给了看电视,也就是说每天超过两个小时,比用在其他任何休闲活动的时间都要多很多。相反,很多被行为者认为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而且的确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满意感的许多行为却忘记去做了[77],这些行为只占用了非常少的时间资源,而且从1965年以来,所用的时间资源还在继续减少。“换言之,将空余时间安排在那些‘值得花时间去做的’休闲活动上,诸如读严肃的文学作品、从事社区活动或参加文化活动,只是休闲雷达上的一个小光点”,罗宾逊和戈德柏在他们的结论中这样总结,并且指出在行为者表示他们喜欢做什么和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不成比例的关系。[78]

因此,下面这个判断第一眼看上去与到目前为止所开发的论点有着非常引人注目的矛盾:被调查者用了如此多的时间去做他们自己并不看重的行为——用在看电视上,这个事实,显得与出于期限的重要性和时间资源短缺性的考虑,妨碍人们去追求更令人满意的行为,相互矛盾。但是,仔细审视这个判断会看到,它与后一个命题并不矛盾,而甚至是对这个命题的支持。第一,无可置疑的是,看电视是目前少数几个用以填补短暂的时间碎片和过渡到休息的活动之一:它不需要前期和后期的准备工作。这些研究合乎逻辑地证明,在休假时、在空闲时间资源较少地碎片化的时候,尽管休闲时间增加了,但是用于看电视的时间显著减少了(与此同时,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活动才有机会大大地活跃起来)。[79] 第二,看电视只需要花费非常少的心理的和体力的能量。除了睡觉和打盹之外,没有其他的活动像看电视一样需要如此小的“投入”了,因此看

〔76〕 Robinson/Godbey,1999年,第241页及其后页。

〔77〕 特别是性活动、球类运动(与瑜伽和健身房的“训练”项目相比所用的时间在减少)、钓鱼以及从事艺术或音乐活动得到了非常高的满意度(在9.0到9.3之间)(同上书,附录O,第374页)。拜访朋友和亲戚也往往在满意度阶梯中有较高的值,但是至少在美国用在这方面的时间资源在不断减少(同上书,第297页)。

〔78〕 同上书,第126页和第292页。

〔79〕 同上书,第311页。

电视通常被作为“被动的行为”来对待。[80] 因而,看电视活动(以令人误解的方式)[8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对在高度的时间压力下的紧张的日常体验的平衡“行为”。相应的观察中,发现了日常时间中的“极化”阶段,也就是以紧张、负担重和要求高为特征的时间段,对此需要互补的平衡时间,它是以被动行为为特征的。[82] 已经由尼采所诊断出来的现代生活的趋势就指出,主体处在这样的紧张和时间压力之下,因此一旦他们有了自己的时间,最喜欢的就是“不仅可以离开,而且能够四叉八仰地慵懒地伸展着”(或者做尼采还不能做的事情:看电视)。[83]

224 因此,第三,看电视似乎是体现了晚期现代的娱乐文化的特性的活动,它们的“投入—产出”的比例关系在直接的满足这个方面是正向的:看电视保证“即时满足”,而不需要在此之前的时间上的和能量上的花费,这样的行为在一个以较高的变化速率为特征并且只是建立在短期有效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电视(和其他用于被动消费的消遣媒介)的心理上的吸引力则体现了它的进一步的重要性:在看电视这个行为的过程中,被调查者往往比在看电视之后表示了更高的满意度;而且比起他们在满意度阶梯量表上给予了更高的满意度或者价值的行为来说,他们通常在看电视时会更加主动地体验观看过程。看电视过程中的短期的体验所得相对较高,但是“保留下来的”价值却没有什么:这不仅“主观地”体现在调查中的对看电视的价值低估,而且在看完电视之后的心理学方面的满意度调查、情绪调查、注意力和关注能力的调查中,也表现出来了。看电视看起来最终留下了疲劳的、几乎没有得到休息的而且情绪糟糕的观众。[84] 事实上,卢曼所阐明的这个潜滋暗长的“由时间问题所带来的价值次序的重构”,现在正用这种方式在文化生活中得以发展:因为以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变化速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偏爱短期性,而娱乐工业正确确实实地打开所有的“有吸引力的”体验机会,它们在实惠的投入—产出关系下提供了“即时满足”;对于那些

---

〔80〕 参照 Kubey 和 Csikszentmihalyi 对此的大量关于关注度及其他方面的研究(1990年)。

〔81〕 正如 Kubey 和 Csikszentmihalyi 所指出的(1990 年,第 122 页及其后页),尽管看电视的过程中能够放松,但是之后行为者却感到紧张和没有得到休息;而体育运动与之相反,在运动的过程中是劳累的,但是之后却发挥出了放松的作用。

〔82〕 参照诸如 Achtner、Kunz 和 Walter,1998 年,第 1 页及其后页。

〔83〕 Nietzsche,1986 年,第四本书,格言第 329 条[《悠闲与懒散》(*Muße und Müßiggang*)]。

〔84〕 参照 Kubey 和 Csikszentmihalyi 研究中的数据,1990 年,第 122 页及其后页。

在抽象认知层面被看做是更有价值的和更令人满意但需要长期的时间和能量的投入的活动，用在上面的时间资源不断地减少。[85] 人们觉得 225
歌剧比音乐喜剧更有价值，但是却去看后者；一家优雅的餐厅被认为比麦当劳（McDonald）更令人满意，但是却“降落”在了快餐连锁店；人们给予练习小提琴更高的价值，但是却在文化商店试听最新的演奏 CD 来代替前者；诗歌创作被看做可以带来无与伦比的体验、创作小说是最值得追求的事情，但是根据调查数据的显示，这条路却终结于玩计算机游戏；尽管我们的确非常确信我们可以从高质量的经典影片中比从好莱坞的动作喜剧片中得到更多，但是还是买下了后者的入场券。

因此，原本被看做是有价值的行为，从长期来看会被遗忘并且贬值：“这样的任务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而且最终会贬值，落入比较不重要的排位，从而使得命运和重要性协调一致。因而从时间问题本身就会产生价值秩序的重构。”[86]

这样的思考自然包含了文化批判上的弦外之音，但是它被这样的判断所掩盖了，即行为者认为有价值的和能够从中体验到满足的行为，与他们在西方工业国家所做的显然不同。如果有人要支持文化衰落的判断的话，我建议，应该将时间维度的分析放在中心位置。

但是，这里所暗示的社会的价值秩序的被修改，是时间结构的社会发展的未经过深思熟虑和并非有意的伴随结果。一个民主政治的联盟面对确定了集体自治的独立观念的社会进程，能够从中产生在政治上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这个共同体就必须在必要时动用完全矛盾的似乎 226
是民主—审查、“自主—家长专制”的自我约束的手段，从而阻止被这个共同体视为非常有价值但是需要长期的时间投资的文化实践活动通过不受控制的、短期有利的“市场专制主义”所腐蚀。[87] 只有当年轻的一代通过稳定的信任关系和可信赖的榜样所激励的时候，他们才会参与长期发展的和需要高昂的前提投资的时间活动。这样的信赖关系只能在

---

〔85〕 将这个观点放在林德的基本假设的光芒中去观察，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合理的时间安排往往以最合理的投入—产出比为目标，也就是，从尽可能少的时间花费中得到尽可能大的效用（Linder，1970 年，第 2 页及其后页）。据我所见，这个观点本身也被“时间化”了：变量表现在，对效用的计算是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时间地平线上的。在一个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社会，在那里对未来的期望和实现期望的条件都是不确定的，就一定会出现将合理化标准推向有利于短期的效用计算：如果从长期的效用的实现来看，就是不合理的。

〔86〕 Luhmann，1968 年，第 148 页。有关这方面的思考请参考 Eriksen，2001 年，第 63 页及其后页。

〔87〕 对此请详细参照 Rosa，1999 年 a，第 753 页及其后页。

长时期内逐渐发展出来。这些文化上必不可少的设置似乎也是在第三章"3"所提出的国家所保护的"减速的世外桃源"的进一步的发展,从这里面会产生相应的经验。[88] 这样的自我发展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发展中的政治控制在结构方面的先决条件:但是,如同我将在这项研究的最后一个部分所要说明的,在当今社会中,由于加速所导致的功能领域的不同步化,这些条件正在变得糟糕。

但是,首先应该对尽管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资源和更长的休闲时间,但是仍然蔓延到每个人身上的紧迫的时间紧张的感觉,作出明白易懂的解释:在晚期现代的社会,完全作为心理上的"吸引因素"发挥作用的丰富的体验供应物,伴随着有着较高的投入—产出比和立即获得的满足感,没有为被看做是"真正重要"的事物留下时间,我们的确没有时间,去做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安慰自己,我们在今后的某个时间会有时间去做。在此期间,我们根据短期上的紧迫程度决定我们的方向,而我们可能已经有了很多的休闲时间资源却不再重要。因而,1993 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一项有关参与艺术活动的调查显示,多数被
227 调查者所给出的远离文化活动和博物馆的原因是"没有时间"(这个回答比没有钱要高四倍);与"越多就越多"模式相吻合,(在排除了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两个因素之后)正是那些拥有最少的不与某件事情绑定的时间资源(也就是说工作的小时数最高)的人,却是最经常参加文化活动的人。[89] 尽管如此,"没有时间"这样的回答并不应该只是一个廉价的借口,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考虑前文所举出的一系列例子中列在前面的那些活动时,时间紧张的感觉就会产生,尽管我们在第二个活动上度过了更多的时间。

而与此同时,库比* 和齐克森米哈里**借助最新开发的"流畅—概

---

〔88〕 相反的做法是,例如,我们将高级中学的学制缩短,并且因此将作为潜在的"减速绿洲"的学校也放置于加速的压力之下。

〔89〕 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152 页和第 255 页及其后页。

* 罗伯特·库比(Robert Kubey),美国新闻学者和媒体研究者。主要著作有《电视与生活的质量》(合著)。

** 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1934—),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电视与生活的质量》(合著)、《在无聊与焦虑之外》和《自我进步》等。——译者注

念”(Flow-Konzept)*,解释了在长期的满足价值中的差异。根据他们的解释,在自身具有目标的并且不用满足困难的背景条件的行为中能够产生最强烈的(而且持久的)幸福感,在这些行为中,能力和挑战在较高的水平上保持平衡:也就是说,我们没被挑战时,即能力远远高于要求,就会处于无聊之中;但是相反如果我们被过高要求,我们就会作出紧张和恐惧的反应。这个平衡水平越高,出现流畅的体验的机会就会越高。打网球或者拉小提琴、写小说、主持学术研究或者也包括理解复杂的十二音阶音乐作品都是这一类活动的很好的候选者;但是它们都是以长期的投资和延迟需求为前提的。[90]

在这样的思考的背后——当然它也有实证证据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猜测出文化批判—精英主义的偏见。然而,这些偏见与时间体验的矛盾之间有着到目前为止未被重视却非常有意思的关系,这对解释“飞快流逝的时间”的感觉是极富启发的。

正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魔山》(*Zauberberg*)中的汉斯·卡斯托普(Hans Castorp)***所注意到的和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从心理学方面所尝试解释的,时间具有在记忆中所体验的时间与在经历过程中所体验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相反”这种显著的 228
特性:“通常,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有趣的经历的时间,在经历的过程中显得短暂,但是当我们回忆时却会较长。在另一方面,一段经历空白的

---

* 齐克森米哈里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流畅理论(Flow Theory),他与其他学者发现,人们在舞蹈、阅读、手术操作、做数学题等活动时,许多人由于全神贯注而暂时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不同程度地感到时间快、效率高。齐克森米哈里把这些感受统称为“Flow”。因此,齐克森米哈里把“Flow”解释为“由于全神贯注投入而更好地完成任务的一种心理状态”,个人因自身的兴趣完全融入其中,专注在自身注意的事情上,并且丧失其他不相关的知觉,就好像被活动吸引进去一般。当人们处于该状态时,因为过于关注、浑然忘我而无暇去思索其他问题,自我意识消失,时间感扭曲。它带来的内在满足感能使人们在从事任务时满怀兴趣,忘记疲劳,不停探索,不断达到新的目标。——译者注

〔90〕 参照 Kubey 和 Csikszentmihalyi,1990年,第140页及其后页。

**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著名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大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戏剧、记叙类文章以及杂文等。主要作品有《魔山》《绿蒂在魏玛》《浮士德博士》《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等。——译者注

*** 小说《魔山》的主人公。——译者注

**** 威廉姆·詹姆斯(1842—1910),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心理学原理》《人的不朽》《多元的宇宙》《宗教精神之种种》等。——译者注

时光在度过的过程中显得漫长,但是回顾时却是短暂的。"[91]因而,时间体验要么产生短暂—漫长模式(短暂的体验中的时间,漫长记忆中的时间),要么产生漫长—短暂模式(漫长短暂的体验中的时间,短暂漫长记忆中的时间)。这样的现象被所谓的主观的时间佯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并且可以通过一些原理进行解释,感觉有趣的体验事件相比"无聊的"体验事件会留下更深刻的记忆痕迹,前者的更多的记忆内容产生了扩展记忆中的时间的作用,反过来也一样。[92]

相反,对于有关背道而驰的现象的第二个模式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我参考阿丽亚娜·巴特(Ariane Barth)的思考,打算将这个模式称为电视佯谬(Fernsehapadoxon)。[93] 这是指,在电视机(例如看侦探剧)前度过的时间,尽管在经历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所有的短暂的体验中的时间
229 的特征(当罪犯逃窜或者守门员向着点球处奔跑时,产生了高刺激密度、情绪的高度卷入,因而改变了心跳节奏、血压和皮肤表面电阻以及对时间"流逝"的感觉[94]),但是即便在刚刚关掉电视、去回想电视情节的时候,就像在长体验中发生的一样,几乎"什么都回想不出来",记忆中的时间随着非常紧急的状况而缩成一团,因此受试者往往在看完电视后,对于高密度的体验报告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巨大的空白",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看完电视后所产生的糟糕的"情绪"。库比和齐克森米哈里引用了一位英语老师所总结的他自己的体会:

---

〔91〕 James,1890 年,第 624 页。我们可以通过一次旅行中的一天来形象地描述上述理论,这一天早上我们从斯图加特(Stuttgart)出发;在瑞士的卢塞恩湖(Vierwaldstättersee)吃午饭;在米兰(Mailand)喝过咖啡、吃过点心后,参观了大教堂;晚上在里维埃拉(Riviera)海滨度假区散步。当我们上床睡觉时,我们不禁问自己,我们真的是今天早上才出发的吗,好像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尽管这一天的瞬间过得很快。相反,当某一天主要是在等待官员办事或者在牙医诊所里排队(前提条件是,我们没有对牙医很强烈的恐惧而使得看牙医变成难忘的事情),这天的晚上上床睡觉时,就会感觉到好像是刚刚才起床。Flaherty(1999 年,第 40 页及其后页)发现,当我们在非常积极地参与当中、有相对多的信息输入的时候,时间有时也会过得慢一些,也就是说,尤其是在极端的情境下,如事故、抢劫或自然灾害(参考第一章"1",注释 21),这与詹姆斯和曼的观察并不冲突。

〔92〕 Michael Flaherty(1999 年,第 112 页)在他的有关由于事件记忆不同的被侵蚀时间而产生的时间体验的研究中解释了这一点:"事件记忆向着对活动的回忆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一个情境中一直是一个低层次水平的活动在发生,就会产生这个过程很长的体验。但是,由于在这样的情境中,似乎在长得无法忍受的时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它们只留下了微弱的并不断减弱的残余在人们的事件记忆中。"参照 Ernst Pöppel(1997 年)或者 Frederic Vester(1998 年)的神经心理学方面的研究。

〔93〕 参照 Barth,1989 年,第 208 页及其后页。

〔94〕 有谁没有这样的体验——"只是想扫几眼电视节目,但是在关电视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

> 我觉得电视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当它开着的时候,我无法忽视它。我也无法关掉它。我感觉到大伤元气、不受意志力控制、失去了活力……所以我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我记得,当我们刚买电视机的时候,我每次都会一口气看上几个小时,而且我记得之后会觉得疲劳和焦虑,一种时间被可怕地浪费了的感觉。这就像吃棉花糖;电视的承诺是那么吸引人,我几乎无法等待,但之后它又蒸发到空气里去了。在看了很长时间电视之后,我感觉到自己完全被抽干了。[95]

因此,看电视从总体上来说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时间体验的新形式的而且矛盾的短暂—短暂模式,这并不意味着,看电视一直会产生这样的时间体验;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产生“正常的”时间体验模式,我马上就会讨论这一点。遗憾的是,现在暂时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据能够实证证明电视效应。[96]

但是,看电视可能不是唯一产生这种短暂—短暂模式的活动。计算机游戏在带来这种时间体验方面显得更为相关:它时常诱导游戏者好几个小时、狂热地投入到这种伴随着高刺激密度和高卷入度的活动中,但是在退出的时刻(特别是,当在达到游戏目标前而被打断时),会产生一种时间“缠绕在一起”的强烈感觉。有趣的是,“关闭的几秒”,也就是计算机退出游戏程序所需要的短暂时间,在这里显得不能忍受的长,并且让人感觉极其受折磨;也许这正是因为在这几秒钟特别清晰地体验到了“时间的萎缩”。因而,这个短暂的阶段甚至可能是遵循漫长—漫长模式的,这与在极端的情境下的时间体验不一样,在这里,时间流动显得放慢了,或许在体育比赛的关键时刻中做决定的情境可以作为很好的证明:[97]成功的运动员都拥有将体育场上飞快发生的事情以“慢镜头”的速度感觉并且从而握有足够的作出反应的时间的能力;这种时间体验有可能在记忆中也不会发生变化(*表 6-1*)。

---

〔95〕 Kubey 和 Csikszentmihalyi,1990 年,第 145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96〕 但是,这里所呈现的思考从两方面获得了实证的可行性:一方面是通过广泛的来自电视观众定性的体验报告;另一方面,由于在解释主观的时间佯谬后,我都会无数次询问人们是否能够在自己看电视的过程中找到相应的模式,提问对象包括特别具有批判性和好辩论的老师、中小学生、大学生、同事和其他有趣的人,几乎每次都得到“啊哈! 是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他们都确认了短暂—短暂模式的存在(我要特别感谢布伦瑞克的德国学生学会的特别有耐心和创造力的参加者从 1998 年到 2003 年的参与)。

〔97〕 参照 Flaherty 的详细的报告,1999 年,第 40 页及其后页和第 69 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 Levine,1999 年,第 58 页及其后页。

图 6-1 时间体验的伴谬

	体验中的时间	记忆中的时间	例子
主观的时间伴谬	短暂 漫长	漫长 短暂	旅行 等候室
电视伴谬	短暂 漫长	短暂 漫长	侦探电视剧 计算机游戏 紧急关头的体验 体育运动 关闭的几秒

让人深受启发的一个问题是:看电影的过程中遵循的是什么样的时间模式。在这里,背景条件和有关"一部电影对观众有什么样的主观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同样,这也为解释电视伴谬提供了建议:我的猜想是,在看电视(和玩计算机游戏)的情形下,由于这当中的体验首先是去感官化的,其次往往也是去情境化的,因而记忆痕迹会很快地消失。去感性化的,意味着只需要视觉和听觉,而与此同时触
231 觉、嗅觉(众所周知这对长时间记忆非常重要)或者味觉都是缺席的。另外,所有的刺激都来自一个空间非常局限的"窗口"。相关的研究发现,在看电视时活跃度和大脑的行动度都与其他活动的活动度和大脑参与度不同,或者说是局限的。[98] 但是,去情境化现象,在这里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电视上所发生的与我们的其他经历,我们的情绪、需求、愿望等都没有相互联系,并且前者也不对后者作出反应,因而电视上所发生的在我们的生活的(记叙式的)背景中几乎完全是"没有背景的"或者没有情境的,因此无法转变为我们的身份定位和我们的生命历史中的经验构成部分。它们是模式的故事,没有与我们之前或之后所做的,或者我们之前或之后所相信的事物之间的关联,因此"什么都没留下来"。如果这样的关联能够产生的话,就必须用完全不同的做法,例如,对于《星球大战》(*Star-War*)迷而言,他们生活在他们的英雄的生活中,并与之一起生活,收集相应的纪念品、参加影迷集会、阅读杂志等,因而当观看最新片段时,就不是没有上下文的,它们存在于星球大战迷的生活的地平线上,能够被星球大战迷不费力地纳入自己的身份定位中。在这种情况

[98] 库比和齐克森米哈里(Kubey/Csikszentmihalyi,1990 年,第 135 页及其后页)报道了类似的低水平的大脑皮层兴奋度和"注意力的惰性"的现象:"目光停留在电视屏幕上的时间越长,就必须越是强烈的外在刺激才能再让目光从那里移开。"

下,星球大战迷看电视和看电影的体验就是遵循短暂—漫长模式的。

短暂—短暂模式应该是对于(晚期)现代的“飞速的时间”体验最有 232
启发性的证明:可以想象,在这个时代的社会中的日常体验越来越多地产生着这种时间模式,因为紧密地跟随而来的体验事件显示出了持续地去情境化的趋势,它们是简短的、刺激丰富的,但是相互之间是隔绝的,也就是说相互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的体验事件会在突然的变化中相互替换,因而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两个终点”的方向开始的:在被感觉为娱乐消遣(并且同时也是令人紧张的)的活动中,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但是,它同时也在回顾时显得“萎缩”了,因此日子和年月就像乘着飞机一样匆匆逝去,并且我们最后感觉到几乎没有活过,尽管我们可能年复一年地变老了。[99] 与之相关的客观的线索是,在当代的社会中回忆中的时间确实显得比所期望的走得更快,米歇尔·弗莱厄蒂(Michael Flaherty)在一项实证研究中对来自不同年龄段的366位受试者进行了调查,请他们就过去的一年对他们来说过得有多快在从1(非常缓慢)到5(非常快)的五分表上表示出来。[100] 在这里平均的回答是在4.216分上,也就是说在快到非常快之间![101] 233

因此,所猜想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去情境化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日常生活的持续的去结构化和与之相联系的不断增多的行为和体验的机会。如果吃胡椒蜂蜜饼、草莓和去游泳的可能性在一年365天里都有的话,那么它们就脱离了特殊的空间、时间和社会背景了,并且使得与它们绑定在一起的经验与更为广泛的体验背景和记

---

〔99〕 参照Rosa,2004d。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即在晚期现代社会时间体验越来越多的是遵循电视模式的,那么这可能也体现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消费化或殖民地化所产生的伴随后果:诸如逛公园、去迪斯科舞厅跳舞或去戏水池玩这样的活动,也会体现出所谓的如插曲一般的“去情境化”的趋势。

〔100〕 这项调查研究是在1990年3月展开的,因此“去年”是指1989年。

〔101〕 Flaherty,1999年,第115页及其后页。在研究中的所有年龄组中这个值都超过了4;令人惊讶的是,与认为时间的流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快的假设相反,并不是最年长的一组(平均年龄超过70岁),而是在(有工作的)中年组(平均年龄为38.4岁)当中这个值是最高的(4.328)。但是,弗莱厄蒂对调查结果的解释与我的解释不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记忆效果,也就是说这是通过时间所导致的事件记忆被侵蚀的后果,在一年之后,主体几乎不再能回忆起他们的经历和行为了。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按照弗莱厄蒂所看到的效果(记忆被侵蚀的后果)只是带来时间的流逝如以往一样“正常快”(数值3)的答案:一年流逝得如同它实际流逝得那样快,记忆的侵蚀在每一年里都是同样的,因而在每年里都留下“同样多的”(或者同样少的)记忆。因此,按照我的观点,特别高的数字证明了加速效果:时间对于被调查者来说(在回忆中)流逝得太快了,因而与(从经验中所产生的)期待或希望相比在记忆中留下得就较少了。

忆背景之间的纽带不复存在。[102] 在各种情况下,去结构化和去情境化都使得几千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智慧——它们都有自己的(特定的)时间(并且可以让人们去追寻的固定的地点)——变得陈腐过时:许多事物都是永远都能得到的,并且几乎可以任意地与其他的事物组合起来。

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瓦尔特·本雅明的有关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考显得特别尖锐而有远见,他在其中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是体验领域和期望地平线之间的分裂,另一方面是加速发生的、相互之间孤立的体验事件的并非累积的相互连接,持续地改变着主观的(时间)体验的结构。[103]

本雅明诊断出持续出现的现代社会的经验丧失[104],是由于主体没有能力将大量的令人震惊的日常生活中的体验(这一点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大城市生活表现得是碎片化的)转化为真正的经验。对于本雅明而言,经验不可避免地与将所体验到的嵌入到所经历的历史和所体会的传统中的过程捆绑在一起,经验产生于铭记于记忆中的、稳定的叙事模式的帮助下和经过历史证明的、先前的经验地平线的照耀下,对所经历到的进行"吸收融化"。因此,体验只有在当它能够与那些个体的和集体的过去和未来之间产生意义重大的联系时,才能变成经验。因而,可以从中推导出,真正的经验会进入到主体的身份定位、他们的生命的历史当中去;真正的经验的记忆痕迹很大程度上是抗腐蚀的。但是,真正的经验不可能在一个持续变化着期望地平线和不断构建新的经验领域的世界中产生。[105] 因此,经验领域和(当下的)期望地平线之间相互重合的时间段越短,而且每个时间单位里的体验事件的数量越多,从体验到经验的转换就越不可能。[106] 因而,对于本雅明而言,现代的时间是

---

[102] 因而,体验的去情境化可以导致体验的强度的降低。乔治·齐美尔已经猜想,个体会对此作出降低他们的心理"兴奋度"的反应(Simmel,1903 年,第 116 页及其后页)。同时,在晚期现代的(体验—)社会,对有一定强度的体验的渴望可能是强烈的,因此导致,计划完成的体验内容越来越"更加极端",这可以解释对强烈的"刺激"的追寻以及甚至是暴力意愿的提高(对于后者请参考 Enzensberger,1994 年,第 33 页;Nassehi,2000 年;Assheuer,2000 年)。

[103] 参见 Benjamin,1974 年 c,特别是第 609 页;进一步也请参考 1974 年 a 和 1974 年 b。

[104] 对此也请参照 Honneth,1999 年,特别是第 101 页及其后页。

[105] 对此也请参照 Giorgio Agamben(1993 年,第 13 页及其后页)对经验的被破坏的诊断:"现代人的日常的一天实际上已经不包含什么仍然能够转化为经验的了……现在,这种不可转化为经验的特性使得每天的存在是难以忍受的。"对此也请参考 Ahmadi,2001 年,第 191 页及其后页。

[106] 参照 Benjamin,1974 年 c,第 612 页及其后页。

赌徒的完全没有经验的时间,它产生于非累积性的、相互没有联系的和令人惊诧的经历链中,而主体今后要在“纪念品”(也会表现为“照片”的形式)的帮助下才能尝试着回忆起这些时间。[107] 只有看电视和玩计算机游戏这样的行为是这一类的孤立的体验事件的碎片式的演变更替,因而它们的无法转变为经验的特性使得它们继续作为插曲而存在,并且加速了与它们相联系的记忆痕迹的被腐蚀的过程。

因此,从以上思考可以看出,以短暂—短暂模式为标准的社会是一个体验丰富,但是经验丧失的社会。它似乎使时间在两个终点上——在 235
体验当中的和在记忆当中的——从手边化为乌有。从主体的时间体验的角度来看,可以从电视佯谬中得出结论,实际上是时间的流动本身出于社会结构的原因在加速。

3. 时间结构和自我关系

正如在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所指出的,技术加速的过程对于主体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与在主体与人和物的关系上的影响是一样的;与此同时,生活节奏的加速通过增加每个时间单位中的行为速度和体验速度,而改变了主体的行为和体验。因此,这些必然会导致,现代的加速动力不只是改变了主体的举动,而且也改变了主体的存在,也就是主体的自我定位或自我关系,因为自我关系是通过那些关系和行动所建构的。我们对于“我们是谁”的意识正是我们与空间、时间和其他人、我们周围的物体和我们的行为与体验的关系所发挥的功能,并且反过来说:在我们的行为和关系中反映了我们的身份确定,它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108] 在社会学中人人皆知的一个道理是,社会结构和自我关系结构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而诸如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能从主体的自我关系的结构中找到对应。[109] 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我的假设是,正是(社会的和主体的)时间结构是将这里和那里链接起来的链环,并且似乎保证了“结构上的耦合”。在这一节中现在就要致力于这个问题了,即发生了变化的时间结构是用什么方式体现在现代

---

[107] Benjamin,1974 年 a;也请参考 Frisby,1988 年,第 262 页。

[108] 我在我的《身份确定和文化实践》(*Identität und kulturelle Praxis*)(1998 年)一书中试图确定这种动态的关系。

[109] 参照诸如 Willems 和 Hahn,1999 年;Keupp,特别是 1999 年;或者也包括 Rorty,1989 年;以及 Rosa,2002 年 a。

236 的和晚期现代的身份确定形式上的。是否存在例如身份确定的动态化或加速、自我关系的动态化或加速,或是存在方式的动态化或加速?

为了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就需要看到自我关系一定有一个将主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上的结构。[110] 人们往往是通过确定他们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成什么样子的、将要是什么样子的和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从而来确定自己是谁。在每一个对身份确定有帮助的、记叙式结构的人生历史中,不仅过去被重构了,而且正因为如此,与此同时现在也被加以解释,并且可能的未来被加以规划。因而,无论如何自我关系也是时间关系,并且可以表现为重要的与文化相关的变体:在有些文化圈子里,身份定位主要是以过去和传统(以及从出身推导出来的义务和身份确定)为导向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在另一些文化圈子里,对未来(也就是或通过主动的构建方式或通过听天由命的方式而填满的时间)的期望和设计决定了对于自我的意义。在一个过去在这里丧失了它的约束力量并且与此同时未来被看做是不可预知和无法控制的社会中,就可能出现与现在相关的或者"情境式的"身份定位模式占主导地位。[111] 同时,在主体的日常的身份确定的工作中,往往多个不同影响范围的时间地平线相互联系在一起:不同情境下的、不同于既有的日常实践活动中的、从自己的生活的直观重要的角度出发的并且最终历史时代的时间模式和身份确定模式,都必须时常与新事物相互协调一致。[112] 社会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的变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对时间结构和身份定位的稳定性、身份定位的维护产生影响,因而正如我将在第十一章中所提出的假设指出的,现在与任何时候都不同,一个在"经典的"现代和人们所谓晚期现代或者(根据不同的视
237 角)也可以称为后现代的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

所诊断出来的以代际内的速度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和因此所导致的偶然性及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于由重要的社会加速所导致的身份确定的时间结构的变化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利奥塔*的观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偶然性及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可以说明在"后现代",所有的构

---

[110] 对此请参照 Straub,1993 年和 1998 年 a。

[111] 参阅 Lauer,1981 年,第 35 页及其后页和第 112 页及其后页。

[112] 参照 Straus 和 Höfer,1997 年;Ahlheit,1988 年;也请参照本书的第一章"1"。

*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主要著作有《后现代状况》(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定名之作)、《现象学》《旅程》和《政治学文学》等。——译者注

建身份的关系和规定都需要以时间为界限：当一个家庭、职业、居住地点、政治的和宗教的信仰和实践基本上在任何时间都会被更换，或者说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人当然现在不再是糕点师、Y 的丈夫、慕尼黑人、保守党人和天主教徒，而只是在一段不能预知期限的时期里，这个人“在那个片刻”——也就是说在正在不断缩小的现在，是这一切；这个人曾经是另外的样子，而且（可能）将要是另外一个人。[113] 因此，社会变化也似乎转移到主体的身份确定当中去了。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身份定位究竟是否能够确定这些关系，或者我们从对我们的身份定位中的称谓的自我描述中是否能够看到这些关系，即这个人现在不是糕点师，而是他（自两年前开始）就作为糕点师在工作；这个人现在不是 Y 的丈夫，而是正与 Y 住在一起；这个人不是慕尼黑人和保守党人，而是（明年）将要住在慕尼黑并且给保守党投票。[114]

这样的观点最终会带来有关身份定位萎缩的假设：自我似乎正收缩为没有称谓的“点状的自我”了[115]，不再能将它与所扮演的角色和关系， 238
或者说与潜在的自我确定中的称谓（完全地）视为一致的了，而似乎是工具式的相互关系代替了后者。

在此期间，在身份确定的研究中，往往是将所观察到的变化（尽管对于变化的程度和范围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在发展趋势上是无可置疑的）[116] 理解为身份确定的或者说自我的动态化：主体将继续通过他的角色、关系和信仰来确定并且从中获得对自我的理解——他还继续是糕点师、丈夫和天主教徒，但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实质上的）自我关系（包括偏好和价值观念）在时间上是不稳定的：这些身份是随着情境的变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117] 我将在第十一章中指出，这两个诊断并

---

〔113〕 “在职业、情感、性关系、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同在政治事务领域一样，暂时的合同（代替了）永久的结构。”（Lyotard，1986 年，第 191 页）

〔114〕 追随 Paul Valéry 和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Amir Ahmadi 将这种在自我和角色之间的分离（2001 年，第 192 页）诊断为社会加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当个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承担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他们的契约只包括，扮演角色，但是他们觉得这些角色并没有触及他们的存在的核心。因此，每个人都不言而喻地成了一个讽刺。自我暂栖在日常事务之上和之外，焦虑地想象着对永远的期望，而与此同时它的在尘世间的影子正用尽全力将自己投入日常的与时间的斗争中去。”

〔115〕 Taylor，1994 年，第 288 页及其后页和第 309 页；Sandel，1993 年；Rosa，1998 年，第 342 页及其后页，第 403 页及其后页，以及 2002 年 a。

〔116〕 对此请参看 Straub，1998 年 b 和 2001 年，或者 Wenzel，1995 年。

〔117〕 Gergen，2000 年；Willems/Hahn，1999 年，第 19 页（导论）；Willems，1999 年；Harvey，1990 年，第 286 页及其后页。

不一定是不兼容的,它们似乎只是涉及了自我确定过程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我确定自己*,这是这个过程的主体侧面(*确定是谁*),收缩到一个没有称谓的点上了,与此同时,客体侧面(*确定是什么*)表现为是情境化地流动着的。[118]

因而,稳定的个人身份确定这个概念似乎可以表现为社会变化的自然关联,当它的速度与代际更替的速度同步时,就显示了"经典的"现代性的根本性的特征。在变化速度较慢的传统社会里,个体通过先前就有的并且非常持久的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一定程度上由"跨代际的"身份确定来确定自我;而到了晚期现代的社会,稳定的、持久的个体的身份确定经不起快速的变化速度,并且似乎"破裂"了,因而向"*代际之内的*(或者说*个体之内的*)身份定位顺序"发展。因此,诸如晚期现代性这样的高度动态的社会,迫使在个体的自我关系和身份确定模式中,灵活性和变
239 化意愿相对于坚持和连续性的优先这种对应情况的出现:主体必须要么从一开始就将自己设计成开放的、灵活的、愿意改变的;要么就可能要面对承受持续的挫折的危险,因为他的追求稳定性的身份定位的设计会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破产。

我将在这本书的第四部分讨论社会加速所产生的*后果*,并尝试详细确定由此产生的"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作为目前的研究发现可以确定的是,生活节奏的加速事实上就意味着存在形式的顺序化和动态化,也就是说,它不仅导致了在个体做什么和体验什么中的加速,而且也导致
240 了他们*是什么*的加速。

---

[118] 参照 Rosa,2002 年 a,第 11 节"1"。

第三部分

原　　因

第七章　社会加速作为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加速的循环

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了？正如在第三章的讨论中所看到的，如果将这个问题作为分析现代加速动力的出发点至少是将人引入歧途的，因为首先，并不是“一切”都在加速，也有很多的过程甚至变慢了。其次，并不是所有可观察到的加速过程是同一种类型的，应该对所总结出来的三种社会的加速形式——以技术加速为目的的过程、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之间进行分析上和逻辑上的严格区分。它们之间不能相互简化为某一种类型，而是可能会有彻底的矛盾关系——至少在技术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之间的情况就是如此：技术加速产生了可确定的空闲的时间资源，并且因此对这种资源的短缺直至生活速度的加速都起到反向的作用。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对社会加速的表现形式的分析的章节中，通过与各种加速形式相应的现象，大量地展现了有关这三种加速形式的实证的相互作用和因果上的相互关系，在这一章中将对它们进行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从而找出对看上去普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加速动力的根源和驱动力是什么的基本答案。

我将要论证的假设是，社会加速在现代变成了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三个加速领域以似乎是循环的形式形成了相互的提升关系。因此，在这个循环中不断产生加速，并且不可避免地生成更多的加速，加速成为自我加强的“反馈系统”。

由于将要研究的因果链条具有循环的特性，因而分析的过程可以从任意一个位置开始。用与第二部分相反的顺序去观察相互作用，并且将生活节奏和技术的加速之间充满问题的关系作为开始，从启发学的角度来看是最富有启迪意义的。

技术加速的社会目标和直接的影响在于,节省时间,也就是说降低与过程相联系的时间需要,并且因此创造空闲的时间资源。这是诸如交通、通讯或生产的加速的社会功能:相应的过程将被缩短,因而产生了更多的时间可以用于其他过程。正因为如此,它成为用来回应时间紧张问题的互助的答案,而时间紧张——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是生活节奏加快的原因。行为者通过压缩行为事件来对紧缺的时间作出回应,他们或者通过采用加速技术来实现,或者通过缩短中间休息的时间和将行为重叠起来同时完成(多任务操作)。[1] 但是,由于后两种加速可能会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因此显而易见的就是:时间资源越是短缺,并且因此生活节奏的加速越大,对加速技术和加速科技的需求就越大。

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普遍出现的紧张和时间贫乏的感觉(导致它们的原因是什么并不重要),以及因此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行动者的
244 时间资源的短缺将技术的和科技的革新进程塑造成了以加速为目标的过程。时间贫乏情况越严重,对更快的交通工具、更快的计算机和更短的等待时间的呼吁就越强烈,而放满速度的要求就越显得厚颜无耻。而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通过改进的技术而实现节省时间——可以在管理过程、制定法律和教育等方面,也可以在休养生息或消遣娱乐中,会产生较大的将通过发展和运用这些技术所释放的时间资源用以进行新的分配的社会压力。因此,例如通过根据当前的需要而置办的更大的硬件资源、更宽阔的道路、更大的能量存储器等,而带来的未来的加速可能性的保留将会成为社会行为的命令。与之有关的疏忽对于行为者从长期来看往往(在时间上和金钱上)是昂贵的;技术加速的期望(和与之一致的交通工具、信息处理、能源需求的数量增长等)因此似乎已经在社会的和物质的基础设施中了。技术加速因而是时间资源短缺和由此而来的生活节奏的提高的直接后果(图 *7-1* 的加速循环中的箭头 1)。

---

〔1〕 正如我在改善跑步技术和缩短田径运动会的时间的例子中所尝试指出的,技术加速只是导致了生活节奏的加快,如果它是被用来缩短行为事件或体验事件的话。"节省下来的"时间同样也可以用来延长中间休息、放缓前期和后期的准备工作,或者将之前重叠完成的事情按顺序一件件地做(也就是用单任务操作代替多任务操作)。越来越短缺的时间似乎"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对技术加速的要求,而矛盾就在于,反过来却并非如此:技术加速不会导致时间的短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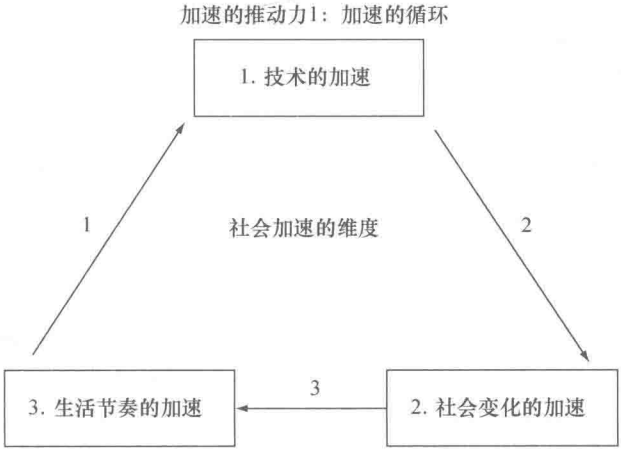


图 7-1　加速的循环

但是，以技术加速为目标的过程，以及尤其是对新的加速技术的引入，所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实现它们所需要的时间资源的数量上的变化，而且正如在第四章当中对相应的加速过程的分析所指出的，它们也导致了我们与空间和时间的、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关系在某个转折点上发生了根本的质量上的改变，并且因此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革（参照前文图 *4-2*）。

简略地回顾一下，在运输、通讯和生产方面的技术的基础革新对现代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历史性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中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我们在铁路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对于加快速度的移动的可能性的适应，甚至要求开发新的感觉方式和新的心理行为模式，从而能够从身体上到心理上忍受并且处理“高”速度。[2] 今天的心理学和教育学 245
发出非常类似的声明，晚期现代所传递的信息流的高速度导致儿童和青少年身上出现了同时处理信息的新的能力。[3]

同样，汽车在大众中的普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且由于个人化的交通工具的出现，导致在汽车普及后不到十年间在文学作品中就将这个社会称为“汽车”社会了，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特别是汽车的普及带来

〔2〕 海因里希·海涅就已经预料到铁路所具有的改变生活方式的特性了，他（尽管带着讽刺的弦外之音）猜测，铁路将会开启世界历史的新阶段：“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整体存在在新的轨道上被拖着向前走、被甩出去，新的关系、朋友和痛苦正在等着我们……”（Heine，1974 年，第 448 页及其后页）。参照本书第三章.3(1)。

〔3〕 参照本书第五章。

的联合结构和关系模式的快速改变,更说明了技术加速所带来的变化:汽车的引入通过允许在居住地和工作场所之间有着更远的距离,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和工业社会的地理,并且用同样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城市、郊区,甚至是农村的移民结构。[4]

伴随着在工业革命中的社会的生产过程的加速和因此而产生的物质的新陈代谢,所带来的工作关系的变化以及紧接着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样不需要进一步地阐述,大量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对它们进行了非常细致且多样的研究了。[5]

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个同时也仍然在持续的数字革命"加速浪潮"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是由于新的计算机技术和媒体技术而导致的集中在通讯流和信息流的加速至上的一次加速。它通过带来新的职业结构、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的沟通模式和又一轮的时间—空间—压缩,
246 而对社会时间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从数量上的速度提高到质量上的新的社会形式的转变,在这里尤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变化用以说明。由于全球的大宗金融交易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并且在几秒钟就能完成,因而货币的资本与常备资本之间的关系[6]、投资模式、贸易实践、投机的机会和因此而来的经济行为的政治风险(例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都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就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政治的回旋余地也随之一起出现了剧烈的变动。[7] 诸如卡斯特斯和埃里克森等社会学家诊断指出这些变化过程会带来新的社会革命,这是工业革命完全不能与之媲美的,并且作为结果,会带来新的社会形式[信息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的发展。[8]

我们与空间、时间、物品、其他行为者的关系的变化,是以技术加速为目的的过程的结果,有关这个问题我将在第十一章"3"中加以阐述,也包括随之而来的主体性的形式的变化。主体化的实践与社会化的实

---

〔4〕 参照例如 Birkefeld/Jung,1994 年。

〔5〕 参照诸如 Thompson,1967 年,或者 Zoll 的论文,1988 年;Virilio,1980 年;也包括本书的第八章"1"。

〔6〕 特别是产生了一方面是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几乎完全分离的局面,因而最终导致所谓"新市场"在2000年夏天的崩溃并最终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也出现在标准证券市场中。

〔7〕 尤其是,Held,1999 年,第 189 页及其后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也请参照本书的第十章。

〔8〕 这是曼努埃尔·卡斯特斯三卷本著作的标题(Castells,1996 年、1997 年、1998 年);参照 Eriksen,2000 年,以及 Lestienne,2000 年。

践和随之而来的身份确定模式及个性结构，是上述那些关系的函数；当后者随着技术的加速而发生变化时，前者也不可能不受影响。[9]

因而，技术的以及尤其是科技的加速发挥着社会变化的强有力的发条的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技术加速和科技加速以它们的实证—历史的作用方式，导致实践形式和行为导向、联合结构和关系模式以及甚至是自我关系和心理方面的气质的持续的改变。我在第三章中已经 247
将社会变化的加速定义为，在其中正是导致结构和方向以及社会的社会形式发生改变的速度的提高。由于技术革新的发展和广泛普及为相应的改变速度的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而社会变化的加速是技术加速的直接的（并且最终也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图 7-1 的加速循环中的箭头 2）。[10]

现在我将讨论加速循环的基本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环节，即社会变化的加速又包含了经验领域和期望地平线的不断的瓦解以及在“现在的萎缩”的含义下的时间地平线的稳定性的缩减：行为条件和情境确定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间隔中失去了它们的效用的稳定性。正如在第五章的分析中所指出的，这些都导致了可以用“滑溜溜的斜坡的症状”来形容的站在“滑动的斜坡”上的存在状况，这种状况 248
不仅是个体行为者的，而且也是组织的和机构的，也就是说期望的地平线和经验的地平线必须不断地更正修改，行为者不得不跟上周围世界快速的、多维度的变化，并且还必须要作出相应的适应。正如已经阐明的，因此可想而知，导致了所有类型的静止位置的被侵蚀——静止状态不可避免的就是落后的一种形式，不仅在经济中，而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

---

〔9〕 有关通过因特网构建新形式的社会的身份确定请参考诸如 Turkle，1995 年，或者 Buchstein，1997 年。

〔10〕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加速是社会变化加速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对这里所提出的论点值得质疑的是，以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技术加速尽管影响了社会变化，但是并不一定引起社会变化的加速。这种争议又可以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观点：第一个是，所有的社会最终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也会产生社会的变化过程（参照 Laslett，1988 年），即便这个社会里没有发生技术革新。但是，这个似乎是“自然的”（同样也与社会结构有关）变化速度通过技术加速的登场无疑会加快。第二个是，技术革新似乎是对社会世界产生指数级的加快的作用：每个单个的发明，例如通过火车提高了运输的速度，都会对社会产生多个维度的作用（它们同时改变了社会的实践、交际关系、感知模式、移民结构，等等），并且通过将它的作用相互增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快了社会变革。因此，在这里当然就会提出这个观点，即革新进程本身也在加速（我们昨天拥有什么、如何拥有的，并不是能轻易地证明的，因而往往搞不清楚的是，哪些可以作为基础革新、哪些只是进一步的开发）。革新速度的提高不是技术的结果（尽管社会技术帮助实现革新速度的提高），只要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在这里所涉及的就是社会变化的加速的形式。

面中。因此,绝对必要的行为的范围扩张了,这些必要的行为是指带来(适应的)成效的行为,同样也包括可能要做的行为的清单也加长了,最终社会的行为者(和系统)的时间就短缺了。

因而,正如卢曼所观察的那样,时间的紧缺是以下事实的结果,即环境的变化本身不会产生时间的紧缺,但是与此同时用来处理每一个变化所分配的时间资源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因为(每个变化自己的)时间地平线和("客观")的期望结构越来越分离了[11],或者,在布鲁姆贝格的分类中,生活时间和世界时间越来越不一致了。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对加速的社会变化进行文化上的领会的尝试,也就是说通过记叙式的释义模式对加速的社会变化进行历史—意义领悟式的理解的努力(是将体验转化为经验的前提条件),由于上述的原因而一直是成问题的。[12] 即便在面对快速的变化速率仍然可能作出反应行为的地方,即便在我们——用卢曼的话来说——"在合作的关系中仍然发挥作用"和"将从一个工作环境中获得的信息传递到另一个工作环境中"的地方,理解文化方面的世界图景的发展、叙述法、文化机制和释义模式,也是困
249 难的。时间压力的这个维度的根源在于这个广为传播的文化上的观点——这个世界"不再有时间说话"或者哲学对于晚期现代社会来说过于缓慢了。[13] 人类的意义领悟方面的特征使得人类变得"过时"了,这个特征,正如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所确信的,在现代的世界里,所有需要一段时间的,都持续了太长的时间;所有需要时间的,都要求了太多的时间[14],因而,与此同时,他也猜测这种特性也导致了时间紧张在结构上也是不可避免的。

---

〔11〕 "人们当然可以期待任何客观的事件的发生,但是自己的真正的体验和行为只能发生那么多,也就是每个发生都对应自己相应的时间位置"(Luhmann,1968 年,第 149 页)。Lübbe(1998 年,第 272 页)在这种关系下指出,时间紧缺的结果是"在生命时间的紧密的时间界限上折射出创新的密集"。

〔12〕 诸如吕伯(Lübbe,1998 年,第 272 页)以不太自然的方式做了如下的表述:"……创新的密集在这里以时代特有的方式通过财富增加的偶然性的结构性地增大,而将时间压力上升为时间紧缺的体验了,这种偶然性的增大是因为所提供的获取财富的可能性会受到从根本上来讲持续保持不变的生命时间的束缚,因而相对来说,获取财富的机会就减少了。"

〔13〕 这段引文出自对德国汉堡 *Springer&Jacoby* 广告公司的总经理的采访,刊登在 1998 年 2 月 7 日的《明星》杂志(*Stern*);还可以参考 Myerson,2001 年,他猜测,将意义作为媒介对于所要求的反应速度而言太慢了(第 46 页)。

* 京特·安德斯(1902—1992),奥地利哲学家、诗人、作家。主要著作有《过时的人》《关于拥有》《没有世界的人》等。——译者注

〔14〕 Anders,1987 年,第 338 页。

但是，时间资源的短缺也必然且的的确确导致生活节奏的加快，也就是说，在时间压力的体验下，导致行为事件和体验时间变得稠密[15]，加速的社会变化因此是生活节奏的加速的强有力的发条。面对这个“因为飞速变化而会失控的世界”[16]，产生那种似乎总是已经太晚了而不能赶得上了的无处不在的感觉的基本根源，并不在于个体的或机构的时间浪费，或者是“懒散”，而是在于随着现代化的持续发展而出现的世界时间和生活时间之间的结构上的不一致性。由于时间的短缺而导致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因此是社会变化加速的直接的（并且不可避免的）后果（图 *7-1* 的加速循环中的箭头 3）。

但是，鉴于存在的基本状况，时间紧张会呼吁解除这种状况，并将通过能够实现节省时间的所有的技术加速的过程，作为文化上的以及结构 250
上的决定性的战略回答，因而加速循环就牢固地闭合了。在这里，有对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看上去“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了”，或者说为什么速度——用埃里克森的话[17]来说就是——“被点燃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基本的回答：社会的加速在现代社会是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

因此，加速循环是一个有关个体的和集体的合理性瓦解的有说服力的例子：从微观社会的视角来看，解决时间紧张这个难题的方法似乎是以实现技术加速为目标的过程；在宏观社会的层面上，这个解决方案是导致时间紧张的原因中的重要因素。在日常实践活动的背景下，这种情况反映在我们要求所有的例行事物的过程都实现最大化的加速当中，这 251
意味着，所有我们与之接触的其他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加快速度，这样才能给我们留有时间，显然这是一个自掘坟墓的策略。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技术加速所带来的矛盾的时间紧缺的后果，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的行为的另一方面，也就是说隐含的时间标准和行为合理化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用发送电子邮件代替了邮寄信件，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时间资源（以及显然也可以节省体力能量），但是带来的风险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后（而不是几天之后），就会收到回复，并且因此要重新处于行为负担之下；如同在前面的论证过程中所看到的，这也是“现在的萎

〔15〕 吕伯以阅读速度的加快为例描述了生活节奏的加快，他指出阅读速度的加快是“阅读公众”对 18 世纪晚期的“出版方面的创新密集”所作出的文化上的“标准的反应”（Lübbe，1998 年，第 270 页及其后页）。

〔16〕 《失控的世界》（*A Runaway World*）是安东尼·吉登斯一本书的很有表现力的标题（Giddens，1999 年）。

〔17〕 Eriksen，2001 年，第 70 页。

缩”的一种形式,在这里隐藏着通讯链和行为链的加速发展的与生俱来的冲量。

但是,这会直接抛出一个问题,这个自我推动的加速循环可能在哪个位置停下来或者说被中断。[18] 在进一步观察后就会迅速看到,在图 *7-1* 中用箭头 2 和箭头 3 所标出来的过程,是对有目的的控制或者操控有很强的免疫力的:因为在技术加速度所带来的影响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实践和关系当中,所涉及的往往是技术上的更新所带来的并非有目的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因此,在这个位置上中断这个反馈系统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加速的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和因此所导致的在我们的时间资源中的“现在的萎缩”了,在此也是同样的原理:根据“滑动的斜坡”的逻辑,当行为者的方向应该保持与结构方面的变化同步的时候,时间资源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

因而,看起来用箭头 1 所表示的过程似乎是在现代的变得自治独立了的加速动态过程中的“自然的”或者本身就适合用来进行(政治的)干涉的地方了:对于时间资源短缺的难题所作出的技术方面的回答并不是
252 逻辑必然的,而且看上去也是可以对此加以干涉的。但是,这个加速循环被证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个体的中断努力是免疫的,尽管时间顾问建议人们这么做。当有人个人放弃节省时间的技术,是要付出部分不同步的代价的,他不再能够跟得上“奔跑的步伐”,而且失去了(之后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连接的机会,他因为时间方面的原因而被排除在互动关系之外了。

因而,时间方面的行为合理化的改变使得在早期现代和在“经典的现代”作为贫穷和落后的表现的时间上的日常状况,也就是缓慢的和暂时不能联系得上的,在晚期现代社会看起来都是昂贵的时间—奢侈品。例如,可以想象一些只是一百年前的偏远的黑森林(Schwarzwald)农庄,在那里没有汽车、电话、电视机,当然也更没有因特网接口,而且可能也没有电力。但是,今天当有人要去黑森林度周末的话,可能会面对着这样一张“任务清单”:*如果你到了的话,请将我们需要处理的数据用附件发给我。周末的时候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在黑森林的话,务必到弗莱堡(Freiburg)来看我,我离你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周末,你一旦有时间的话,请看一下我们的主页。另外,周日在某某频道有一个有趣的电视节目,是与你的研究有关的,等等,*诸如此类。从这个例子来看,

[18] 能将这些思考相互联系起来要感谢 Nancy Fraser 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在黑森林农庄的晚期现代的周末，如果没有汽车、电话和因特网接口的话，简直就如同逗留在一个“减速的世外桃源”里一样：这能保证有时间散步、砍柴、看星星等。[19] 他只能（特别是在重复这样做的情况下）在这 253
种情况下负担得起这一切，就是他并不感兴趣，是否所有的选择保持开放仍能供他选择，并且确信他能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将累积的“时间上的落后”追赶回来，从而让一切正常运转：他的电子邮箱里将塞得满满当当；要补上没打的电话以及没去的拜访；电视节目如果确实重要，可以先用录像机将它们录下来，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在减速世外桃源之外使得时间资源的短缺更加尖锐，并且一些连接可能会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想要摆脱这种能随时联系得上的状况，在今天已经涉及社交中的正当的义务，因为技术的可能性使得这种互动期望已经成为标准，所有为什么你不来拜访我、没给我打电话，等等。

基于个体的减速所带来的巨大的成本，理智的行为者可能就会选择这样做：在农庄过周末、所有的技术联系可能都保持畅通，但是与此同时也下定决心不主动用它们做什么。偶尔发送附件，或者看电视，或者开车去弗莱堡听非常出色的音乐会，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容易的，但是这个事实却是将对技术的使用的成本/用途计算以及因此而来的寻找合理性的负担明显推向了有意的减速的反面：由于加速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因而“世外桃源”也几乎不再能保存下来了。

正如我们从卢曼那里所看到的，当应该放弃对加速所带来的可能的益处的充分利用时，就需要“制度化的借口”，也就是与集体的强制性的决定。只有通过有目的的政治干涉，才有可能阻止针对某个目标的社会过程向着技术的（或金融的）可能的极限去加速。因此，设立新的和保护已有的“减速绿洲”，即人为创造的延缓时间或者静止的时间，是诸如弗里茨·瑞海斯、马提亚斯·艾伯林、杰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以及托马斯·H. 埃里克森等社会减速的支持者所面对的主要挑战。[20] 254

---

〔19〕 但是，由于意识到，在看星星、散步的同时，还能够处理紧急的来电、看有意思的电视节目、发送邮件附件和拜访朋友（所有这些活动可能已经归入必要的经历的范畴之内了），这样的意识已经出其不意地改变了看星星、散步等“简单的”行为的背景并因此也改变了它们的特性和质量了：即便在减速的世外桃源，我们也不能够摆脱（晚期）现代的空间—时间意识（请参照本书的《序言》中有关渔夫和企业家的差异的思考）。

* 杰瑞米·里夫金（1945—），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北方将再度崛起》《异教徒的声明》《生物技术的世纪》。——译者注

〔20〕 Reheis，1998 年，第 217 页；Eberling，1996 年；Rifkin，1987 年，第 189 页及其后页；Eriksen，2001 年，第 147 页及其后页。

他们尝试着,从在图 *7-1* 上用箭头 1 所标明的在时间资源的短缺和通过技术加速的重新赢得之间的交界面这个位置,来打破在结构上和文化上已经常规化的加速循环。

但是,由于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所要详细研究的两个原因,使得上述这种大胆行为比许多减速意识形态的支持者想象得要困难得多。第一个原因是,在现代的社会加速不只是通过它的自身活力所推动的,而似乎也是通过文化方面的和结构方面的作用因素,它们使得加速循环起来,并且增长的动力和加速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在加速从自身的反馈循环中不能产生这些动力和相互作用的地方得以维持并被激发起来。下一章将确定作用于社会加速的这些外在的"驱动引擎"。因此,对加速循环的有意的政治上的中断,不仅必须要对抗社会加速的自身活力,而且也要反对那些独立的文化上和结构上的加速理论。

而第二个原因是,对加速循环的有意图的政治上的中断(或是修正)的观念,涉及对社会发展的(最好是民主的)政治上的控制的想法。但是,这种可能并不是没有时间方面的前提条件的,相反:正如我将在第十二章中所阐述的,社会的民主式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在晚期现代恰恰通过社会加速所带来的后果而可能被侵蚀了。[21] 由于现代的系统的过程是独立运转的,因此对加速循环的有效的中断是非常不可能的,它需要动员那些能够将现代的规划首先经受得住(个体的和)政治自治诺
255 言考验的力量和激励。

[21] 对此请参照诸如 Rosa,2003 年,第 20 页及其后页;Scheuerman,2001 年 a 和 2003 年。

第八章　加速和增长：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

如果想要理解现代社会的加速能动性，就要如同在第三章中对加速概念的定义里所指出的那样，并不需要将加速能动性与增值能动性彻底分开。因此，通过对三个加速维度进行归纳而形成的加速概念，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中的数量的增加，就根本不是偶然了。特别是已经证明了，鉴于自由的和受约束的时间资源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逻辑上独立的数量（要被运输的、传送的、生产的数量，以及行为和体验的数量）的增加的话，那么生活节奏的加速与同时出现的为了实现技术加速的过程之间也是兼容的。只有在相应的过程中当增长的速率超过了加速的速率的时候，才会出现尽管采用了技术方面地节省时间的手段，但是时间资源仍然紧张的情况。[1] 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同时出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将现代社会描述为特殊的“加速社会”，这意味着，在增长过程和加速过程之间不是逻辑的—可分解的相互联系，而是从文化上和/或结构上建立的联系。并且，事实上，确定相应的增长速率并不困难，这其中也包括了对诸如选项和偶然性的增多的计算，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增加、行为的可能性和体验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相应的增多。从各种角度来看，与指数级的数量增多相对应的“只是”线性的加速，有关这个假设事实上有足够的论据支撑。[2]

在这项研究的第三部分的中心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推动这些加速进程的是什么；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定量的增长逻辑和现代的加速能动性是以结构上和/或文化上什么样的方

256

〔1〕 参加本书的图 *3-4*。

〔2〕 Eriksen，2001 年，第 78 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章“1”。

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自我加强的加速循环在这里并不足以作为回答,因为它只能非常有限地证明加速过程[3],而且对加速循环自身的运转机制的解释也仍然是有缺陷的。

因此,我将在接下来的部分首先确定三个相互独立的而且也与加速循环独立的,即似乎是"外在的"社会的驱动引擎,这三个驱动引擎以特殊的方式和增长情况,和加速情况联系在一起,并且从"驱动的逻辑"的意义上来看,可以算作三个加速维度的首要的驱动力(参照下文的图 *8-1*)。在下一章节,我将用这一章里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尝试着精确地确定诸如维希留、吉登斯或绍伊尔曼等人所提出的民族国家和军队在现代的加速进程中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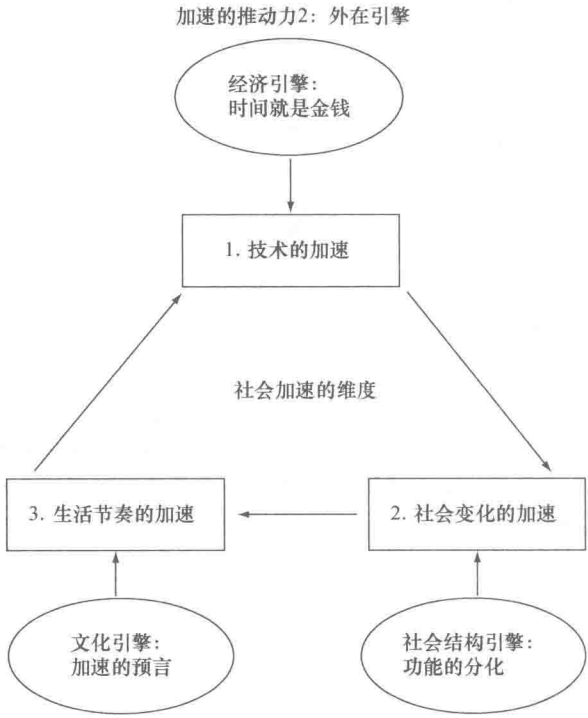


图 8-1 加速的外在推动力

〔3〕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技术加速产生了数量增加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导致数量增加的实际出现。社会变化的加速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增长";只有在当这些变化经过文化上的处理,并且"转化"为"知识"或者行为导向的时候,社会变化的加速才产生了增长。因而,这种形式的增长是作为一个驱动因素对生活节奏的加快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从每个时间单位中,行为事件或经历事件的数量的增加的角度来看,这种社会变化的加速可以定义为增长过程。

1. 时间就是金钱:经济引擎

现代社会的决定性的要素将两个原则——加速原则和数量上的增加原则或者说为了增加数量的目的的加速——统一起来了,并且将这两个原则纳入共同遵守的行为逻辑当中,事实上确定这个要素并不费劲,它就是在其中加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这种经济系统是嵌入在社会的物质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事物。通过以调整经济逻辑和资本 257
变现逻辑或者说是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式取消传统的、似乎是自然生成的生产与满足需要或者符合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以"为了生产而生产"的方式消除"为了(用传统的方式确认的)需要而生产"[4],使得动力系统得以运转,在这个动力系统里以往的满足需求的经济形式中的所有的限制都被克服了。它允许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因此对于时间优势和时间效率的追求,必然导致要求生产独立化的不可避免的系统命令,这似乎能够同时产生相应的需求。

正如大量的时间社会学研究所一丝不苟地研究出来的那样[5],在现代社会中的"操作性"的时间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特征的时间的具体化和商品化而产生和形成的[6],也就是说,通过时间变成短缺的、可以按照效率的观念进行经营管理的物品,时间被体验成线性的、没有特性的[7]和抽象的数值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从他们的雇员那里买下的是"时间"本身,而不再是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 258

资本主义经济至少在三个方面从根本上影响了对时间优势的获得

---

〔4〕 Reheis,1998 年,第 66 页及其后页。Schlote,1996 年,第 63 页:"经济目标从满足需求到生产剩余价值的转变(也就是说,从商品—货币—商品—形式的循环过程变成了货币—商品—更多的钱—形式——本书作者注)是理解独特的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的基础。"

〔5〕 在这里从大量的研究中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如 Thompson,1967 年;Zoll,1988 年;Scharf,1988 年 a;Adam,1990 年;Giddens,1995 年 a;Sennett,1998 年;Reheis,1998 年;Rinderspacher,2000 年;Schlote,1996 年;Richter,1991 年,以及特别是 Postone,1996 年;有关文献综述可以进一步参考 Bergmann,1983 年,第 483 页及其后页。

〔6〕 在这里我完全同意芭芭拉·亚当的观点,在她对我的早期思考的讨论中,商品化的时间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的观点形成了(Adam,2003 年)。

〔7〕 "没有特性的"时间,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结算方式中,时间不再能够通过不同情形(通过节日或工作日、白天或晚上、青年人或老年人)进行区分了,这个事实是时间一再地被体验为、形容为"无生命的"的主要原因。

和利用,因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最终所有的经济都变成了时间经济[8],本杰明·富兰克林所提出的著名的言简意赅的说法"时间就是金钱"格外符合这种经济形式:"当时间就是金钱的时候,速度就成了商业中绝对的、坚不可摧的命令了。"[9]根据马克思所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到,首先,工作时间完完全全就是决定性的,或者说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因为时间通过劳动转化为价值。[10] 只要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通过完成它所需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那么节省生产时间就能直接转化为(相对的)利润:如果有人能够用较短的时间生产,即生产一个产品所用的时间低于平均的必需劳动时间,那么就可能赚得更高的利润,并且提高劳动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一个工作日中的"必需的"(和为此付报酬的)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朝着有利于后者的方向转移了]。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直接体现为每个时间单位所生产出来的数量的增加,可以直接定义为加速,因而通过使可能是无止境的加速螺旋运转起来,而表现出了竞争优势,但是只是在竞争对手没有追上来并且是社会的必需的劳动时间不低于这个新的水平的时候。[11] 诸如通过劳动强度增大或者"变得稠密"而实现的生产加速,作为竞争原则的结果而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要素。

第二层的相互联系是,通过引入新的生产技术或新的成果而获得和利用时间优势,这对在竞争中获得生存必需的"额外利润"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创造了产品暂时以比生产成本高得多的价钱卖出去或者说在竞争对手赶上这个差距之前,以低于市场价值的成本生产出来的可能性。革新循环的加速和技术的进步,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都有它们的

---

〔8〕 Marx,1983 年,第 105 页。

〔9〕 Adam,2003 年,第 50 页;参照 Postone,1996 年,第 378 页及其后页;Giddens,1987 年 a,第 150 页及其后页;Garhammer,1999 年,第 73 页及其后页和第 88 页及其后页。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时间的商品化和变成金钱的等价物在今天日常生活的很多层面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变成了感觉上的经验之谈:如同金钱一样时间也越来越短缺了,无论人们拥有多少;而且完全与金钱一样,人们也会丢失、投入、浪费、接受、分享时间。就像两种货币一样,金钱和时间也可以相互兑换:如果谁缺少钱,就必须投入时间,就像照顾婴儿的保姆、修剪草坪的工人、领取薪水的雇员,为了赚钱,就必须花费时间;或者例如人们为了省钱而徒步、用手清洗或者缝补旧袜子。相反,如果有人缺乏时间,可以投入金钱,赢得时间:他搭乘出租车以便更快地回到家,委托园丁、洗衣工和送比萨服务,来节省整理花园、洗衣服和做饭的时间。众所周知的是,自由兑换也有边界,就在时间不再被需要的地方(失业),也在于时间不可能(生息地)为未来而储存。

〔10〕 参照 Schlote,1996 年,第 66 页;Richter,1991 年,第 57 页。

〔11〕 参照 Schlote,1996 年,第 67 页。通过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的生产加速又将产生生产数量的增加,也就是经济增长——只要是坚持充分就业的目标的(因为同样数量的社会劳动能够生产更多了),因而加速螺旋和增长螺旋就相互推动向前了。

"系统条件的"原因。[12]

最后,有关第三个层面,根据机器和设备的利息原则[13]和"道德上的磨损"[14](也就是说,由于在加速动力过程中而拥有的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机器通过高效的生产技术的开发而变得在经济上没有价值了,在它们用坏之前就没用了),所投入的资本进行加速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 260
经济体系中成为企业管理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投入的资本在开始再生产之前所用的时间越长,利润就会变得越低,并且竞争的机会也变得越糟糕,由此就产生了机器的运转时间尽可能地长、最好是尽可能持续下去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因此提供了,对在节省时间的技术的引入和紧随其后的时间资源的短缺——即生活节奏的加快——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解释:"因此,这就是经济上的似是而非:最有力的缩短工作时间的工具变成了最可靠的工具,它将劳动者和他的家庭的所有的生命时间变成了为了变现资本而可支配的劳动时间。"[15]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观察了生产技术上的"加速的循环",由于运转更快的机器使得劳动的强度增大,而后者至少从长期来看是需要缩短劳动时间的,因此这又刺激了发展和购买更快的机器或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技术上的加速的循环。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和现代的加速能动性之间的根本性的相互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的麻烦,即资本主义的瞬间经济所肩负的生产的加速必须要求销售和(至少是随着打开新的市场而创造的可能性)消费的同时加速,这样才能超越生产领域的动态化的要素。事实上,资本变现过程的速度对流通的速度有着决定性的依赖,也就是说主要是依赖于对物品的运输、仓储、分配和销售的速度,以及获得原材料的速度;由于在这里不是所创造的价值,而是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变现过程被延迟

---

〔12〕 参照 Garhammer,1999 年,第 79 页。

〔13〕 马克思(Marx,1957 年,第 685 页)已经将金融银行业形容为促进"流通或者商品形态变化也包括资本的形态变化中的单独的阶段的加速,以及由此产生的再生产过程的加速"的功能。有关利息原则和加速之间的关系也请参考 Reheis,1998 年,第 181 页及其后页,在那里他赞同 Silvio Gesell 的(尚无定论的)假设。

〔14〕 Marx,1957 年,第 254 页及其后页。

〔15〕 同上书,第 257 页。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个矛盾也产生于当恒定的(机器)和可变的、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劳动)之间的关系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移动时,并且也出现在因这样的变动而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时(也请参照 Marx, 1957 年,第 614 页及其后页)。

261 了,因而流通过程的时间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贬值了的时间"[16],加速强迫力以特别的分量作用于流通过程的时间。

因此,关于现代加速能动性的产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状况,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通过资本变现的逻辑所推动的加速不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而恰好是在销售领域或者说是流通领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17世纪以来,运输和通讯明显是在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发生很久以前就开始加速了,而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带来了生产领域的加速。之所以会是这样,重要的原因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首先是贸易领域,也就是在流通领域,资本得以积累,并且要求周转的速度提高,而在生产领域,实体的特性和行业特性暂时阻碍着相应的发展。[17]因而,贸易和运输的加速从历史上来看先于生产加速的发生,生产的加速是后来在工业革命中扣人心弦地到达它的第一个顶点的。因而,作为基本的加速器发挥作用的自然是先行发展的金融银行业;只要看一看国际金融市场的飞速的变化和巨幅提高的金融交易的速度,就立刻明白,这样的发展到今天也没有结束。[18]

每个时间单位的资本周转和商品周转的增多自然也作为经济上必然的联系,导致了与生产速率的提高相对应的每个时间单位消费行为的增多,因为只有在消费中剩余价值才会实现。因而,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迫使"与生产过程中的情况相似的消费强度的增大,并且能够将被定义为生活速度加快的每个时间单位中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增多破解为经济上的必不可少的事物。尽管如此,对于国民经济来说意义重
262 大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上的基本难题并不是(静态的)分配问题,而是对加速的循环的维护。但是,这个系统的必不可少之物并不能够从消费的那一面对生活节奏相应的加快作出行为理论上的解释:没有人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增加"每个时间单位的满足需求的行为的数量的"[19],并且因此被迫用这个行为的数量的增加速率来衡量休闲时间的价值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主体倾向于如何确定他们的时间的价

---

〔16〕 Marx,1957年,第458页及其后页;参照Schlote,1996年,第72页。

〔17〕 对此请参照诸如Richter,1991年,第27页及其后页,或者Dohrn-van Rossum,1988年。

〔18〕 对此请参照Marx,1951年,第五部分,特别是第27章(第436页及其后页);以及Simmel,1897年。

〔19〕 Scharf,1988a,第157页。

值,既不是人类学方面的特征先天决定的,如同林德所指出的那样,[20]也不是简单地出于经济上的必要性而推导出来的,而是如萨夫*所指出的[21],这是出于文化基础的重构的需要,而新的文化基础是具有现代特性的个体的行为导向[22]。我将在下一节中从总体上探索,加速的相应的"文化逻辑",它对于系统的时间地平线和个体的时间地平线的同步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这种时间导向的形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与时间是线性的和抽象的这个概念的全球化紧密相连的,并且也与工作世界中的时间经济的规范的被接受密切相关。如同我在导论中所尝试指出的,时间结构首先是系统的命令和主体的行为导向之间(通过同步化)相互调停的地方。从中就产生了这样的必要性,伴随着个体的时间上的行为导向的相应变化,就会出现经济中时间地平线的改变。实际上,从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中产生的高效率地利用时间资源的强迫力,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深刻地并且大范围地在占优势地位的时间实践的形式和实质方面对工作人群产生影响。这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社会斗争,而且如同爱德华·汤普森在被广为引用的小品文《时间、工作原则和工业资本主义》(*Zeit, Arbeitsdisziplin und Industriekapitalismus*)中所分析的[23],通常也会伴随着通过外力所形成的变化的出现,在这里产生了用来适应经济系统的加速要求的主体的气质,并且表现为工业领域中的工作时间从所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的三重分离。 263

(1)第一重分离是,雇佣劳动的时间与机械钟表的预先出现相关,并且因此从之前如果不是有了几千年历史,也至少是有了几百年历史的

---

〔20〕 Linder,1970 年,第 77 页及其后页。

* 君特·萨夫(Günter Scharf)(1938—),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与资本主义》《工作时间缩短的历史》等。——译者注

〔21〕 Scharf, 1988 年 a。

〔22〕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也请参照 Rosa,1999 年 a。

〔23〕 Thompson,1967 年;进一步参考例如 Zoll 的文章(1988 年);或者 Richter,1991 年,第 61 页及其后页。针对汤普森的质疑是:线性的时间概念的形成和时间原则的获得并不是在工业革命中才开始的,而是有一系列的重要的历史先驱,诸如在寺庙或修道院里;社会的时间导向往往是"复数的"、复杂的并且是多种多样的;两个时代的时间导向之间重来就不能简单地并且完全地分离(Thrift,1988 年;Glennie 和 Thrift,1996 年;Garhammer,1999 年,第 73 页及其后页;对此也有 Dohrn-van Rossum,1988 年)。有两点是没有争议的:其一是,由于工业革命和工业时代的制度化的管理导致了严格的、影响广泛的、由此形成社会约束力的时间模式和时间结构的出现;其二是,尽管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时间导向,但是从此以后,现代社会的时间规范占有统治地位。两点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社会生活主要由自然节奏来塑造的结构化分离出来的。一天的时间和一年的时间如同天气情况一样,对于工业的生产过程来说基本上不再有任何重要性。特别戏剧化地表现这种分离的方式是通过轮班制工作。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倒班制工作似乎是时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持没有特性的这个事实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在这里时间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冬天,都以同样的节奏前进,并且往往当在一个小时里,机器静止了或者没有工作,或是没有运输,或是没有销售,那么这个小时就被当做经济上消失的一小时。"因而,能够在一天 24 小时都工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追求",马克思前后一致地作出了结论。[24] 这个到今天为止继续进行的而且永远都不结束的取消
264 的过程,最开始是取消自然节奏,后来也取消新出现的、集体的社会节奏,不仅是生产中的,而且也包括流通和消费中的(也就是说,取消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礼拜日和工作日,开放时间和关门时间,发送时间和发送间歇,简言之:取消可支配的时间和不可支配的时间),最后形成了"没有特性的"、永恒的同步时间,这些都有着它的经济核心。

(2)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发展出了精确严格的而且几乎是完全的工作与休闲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并且也同时为个体的时间体验和时间计划以及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一起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通过这种分离,能够产生作为现代的特征的"休闲时间"制度化和与之相对的"工作时间"制度化,这些制度化会尝试着用不同权重从根本上重新构造主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以及使得日常生活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时间协调一致的形式。工作和私人生活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离同时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政治结果,即在现代明确了在公共的和私人的之间的特殊的边界划分。[25]

(3) 最后,工作时间与工作对象也分离了,也就是说,工作时间将根据抽象的、由日历和钟表确定的期限固定下来,而不再根据所面对的工作或者事件(在传统社会,特别是农业为主导的社会里,是通过要完成的工作来对行为进行时间上的结构化的)加以确定。工作时间的开始和结束从现在开始都通过工厂的汽笛或考勤钟而不再通过工作任务的要求来确定了。传统的"事件时间"是根据行为和事件的持续时间和速度来确定的,所持续的时间和速度又是通过这些行为和事件的由自然和

---

〔24〕 Marx,1972 年,第 271 页;参考 Garhammer,1999 年,第 79 页。

〔25〕 参照例如 Giddens,1987 年 a,第 151 页。

历史所决定的特性或者由它们的完全顺从于波动的“原时”所确定；现在，通过事先确定行为和事件的时间框架而使传统的“事件时间”被抽象的、线性的时间网格所代替；传统的“事件时间”被替代是可计划性的前提，并且因此也是时间的可操控性的前提，必然也是社会过程加速的 265
先天条件。由于传统的“事件时间”被替代，时间上的注意力焦点从任务导向或事件导向变成了抽象的时间导向。[26] 正如吉登斯一再强调的那样，工业资本主义的时间，一方面通过工业生产的特殊的技术逻辑所确定[27]，因此表现为抽象的、线性的；但是，另一方面，诸如围绕着工作时间展开的斗争所清晰地展示的那样，它也是两极分化的时间。

在工厂里使用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时间周期，在工业革命期间部分是与猛烈的反抗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工人毁坏作为这种发展的中心标志的工厂时钟，或者流水线工人倔强地“旷工”，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也完全感受到了新的生产制度的惩罚力量。[28] 对于新的时间概念的全球化而言，更为重要的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产生了约束和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度，使得在工厂、医院、监狱、兵营、幼儿园以及特别是学校里，相应的观念和时间都必须将这些约束和制度变为习惯。[29]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时间完全表现为米歇尔·福柯所分析指出的现代的纪律社会的主要工具。遵守严格的时间纪律在所有那些其行动模式往往是通过大部分是非常呆板的、抽象的时间模式所决定的（可以想象一下课程表、飞机时刻表和监禁处罚的时间周期）机构中扮演突出的角色，并且表现为纪律的中心目标。钟表因此成为最好的监视工具，因为它打破了人们通过自然和习惯而确立的原节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触发现代的加 266
速能动性和增长能动性的前提条件，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那个著名的发现所指出的，时钟，而不是蒸汽机之流，是工业时

〔26〕 这种转变也适用于汤普森所说的主要注意力的改变（Thompson，1967）。

〔27〕 Giddens，1995 年 b，第 75 页及其后页，和 1987 年 a，第 149 页及其后页。

〔28〕 参照诸如 Scharf，1988 年 b；Negt，1988 年；或者 Thompson，1967 年。

〔29〕 而且公共交通的时刻表或者剧院和电影院的演出安排也为根据线性的和抽象的钟表时间确立日常生活的时间导向和时间实践作出了贡献。

* 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并因其对城市和城市的建筑研究而闻名。主要著作有《科技与文明》《枝条与石头》《生存的价值》及《历史名城》等。——译者注

代的"关键机器"。[30] 写入到身体之内的时间纪律因而首先产生了以抽象的时间样板为自己的行为导向的能力,也就是做到准时,并且每个既存的需求(诸如睡觉、饥饿或欲望、去厕所等)都因为首先要完成固定的时间模板上的任务而被推后,因此必然产生延迟对需求的满足、压制冲动,最高生产能力和休息恢复阶段都是被限定在抽象的时刻的。[31]

但是现在绝对不能断言,所谓的社会机制和在社会机制中所传达的时间导向,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来看,最终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所产生的结构和副作用。正如我将要进一步阐明的,社会机制和它其中的时间导向恰恰既是功能分化(如果没有以抽象的时间网格为导向,行为的协调和同步化是不可想象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及军队的合理化以及特殊的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的后果,又是它们的必要条件。这些事物首先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根据韦伯所强调的"选择性亲和"
267 的模式编织成现代的机构的独特的网络。[32] 从中可以看到,观念和机制在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适应过程中共同前进地发展和变化着;但是在这里也不能放弃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发展或者文化发展的单一原因的或非线性特征的假设。[33] 由于社会加速的趋势适合于结构的和文化的总体安排,并且都均匀地写入总体安排的各个部分,因此也可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确定首要的驱动要素。

在技术和科技加速的维度中的更为主要和更为直接的驱动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时间经济的竞争逻辑,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运输、通讯和生产的仍然正在进行的加速在这里找到了突出的原因,并且从中所产生的加速压力当然并不只局限于技术加速的领域,而且也伸展到工作组织的发展上以及从那里又似乎"照耀到"其他的社会领域里,如现代的管理、科学加速的发展和法律的调适等等。现代的强有力的技

---

〔30〕 芒福德,1934 年,第 14 页;有关现代的时间意识的发展与机械表、报时钟、精密钟表在修道院式的例行公事、都市的管理和(后来的)工业化的背景下的引入及推广的历史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钟表,也请参见 Dohrn-van Rossum,1988 年;LeGoff,1977 年;Thrift,1988 年。

〔31〕 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通过让孩子熟悉相应的时间实践的学校的时间制度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学校的日常生活产生于与线性时间的持续对峙。早上闹钟响起;在吃早饭的时候可能收音机里会有报时;之后,在上学路上要精确遵守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的开车时间;最终到了学校,礼堂或大厅里的分针催促着加快速度;一节课结束时铃声宣告开始休息。学校所发挥的作用是'使时间使用变得紧凑的装置'。"(Richter,1991 年,第 40 页;进一步请参照 Treptow,1992 年,第 9 页及其后页;Garhammer,1999 年,第 73 页及其后页)

〔32〕 参照 Giddens,1995 年 b,第 75 页及其后页。

〔33〕 参照 Rosa,2004 年 b;也请参照 Garhammer,1999 年,第 75 页及其后页。

术革命最终是为钟表效劳，而非相反：技术革命使得（时间经济高效率的）加速成为可能。因此，在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的逻辑因而就是时间的逻辑；保罗·维希留的假设因而是值得信赖的，他认为“速度方面的”革命将比工业革命更加深入和广泛（而且发生得更早），并且是现代性的真正的摇篮。[34]

有关现代的加速能动性与其说是出自现代的制度的安排、不如说是它们的基础的猜测，当我们观察当下的后工业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的制度变化时，这个猜想立即就会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在这里可以证明的是，经典的现代的工作时间制度和与它有关的前文分析的工业化 268
现代性的三个时间上的“分离”中至少其中的两个分离，（一眼看上去）是向着呈现出前资本主义特征的模式逆向发展的。

根据当代的劳动社会学和工业社会学的研究发现[35]，目前的朝向——弹性生产、从空间上和时间上对工作的去规制化和“准时生产”及“准时发货”的趋势，腐蚀了按照规范工作时间的僵化的管理的趋势，导致在工作领域的任务方向或事件方向的元素又变得不可预测，并且逐渐产生了工作和“生活”的再一次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去差异化。对于新的职业分支，例如所谓的“新经济”的工作世界，以及高资质的雇员尤其如此，但并不仅限于这些领域。越来越常见的是，在晚期现代的社会里，当时针指向五点或者日历宣告着周末的来临的时候，“工作”并没有结束，而是只有当完成了所分配的任务时才是工作的结束，也就是说，往往是遵守了完工期限或完成了项目合同[36]的时候。因此，在这期间，甚至传统的生产企业也发生了转变，废除了工厂时钟和考勤钟，甚至连出勤检查也放弃了。工作定额不再是通过钟表，而是通过工作对象来确定的了，也就是，它再一次是以任务导向或事件导向来定义的，在深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工业社会学看来，这些变化完全等同于一场不可

〔34〕 参照 Virilio，1980 年，第 61 页及其后页；对此也请参照 Breuer，1988 年，第 314 页及其后页。

〔35〕 Piore/Sable，1984 年；Behr，1999 年；Voß，1998 年和 2001 年；Sennett，1998 年；Garhammer，1999 年和 2002 年。

〔36〕 从长期的流程化的工作到“项目式工作”或者说到（往往是在团队中完成的）工作项目清晰可见的过渡，在这里只是以抽象的—固定的和外部确定的时间模式为导向的工作，被确定了短期或中期的期限，但是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的行为所替代的标志。

269 思议的革命。[37] 资本主义时间实践的逆转如同生活领域中的又一次空间和时间上的去差别化一样,同样也是引人注意的朝向前现代关系的虚假的回归。在晚期现代,随着趋势的发展,工作岗位又将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或者相反;工作可以带回去在家中完成或者就直接在家里完成,生活世界的利益和要求又再一次遛进工作领域了。一个典范式的例子是远程工作的最新发展,尽管根据科学的观察,这种工作方式的普及度还不是很高。[38] 可以代表最近的发展的是许多企业所作出的大量努力,从而使雇员能够带孩子来上班,或者在工作场合满足文化上的和体育运动上的需求,并且促进实现企业的"联盟化"的新形式。[39] 通过这些方式(同样也包括通过诸如确定节假日和关闭时间等社会性的指令),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再一次允许有了分界线,并且形成了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与工作有关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新形式的分散领域。[40]

这样的发展生长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巨大的改变能力和变革能力,它们在当前带来了转变的潜力和多样化的局面,因而就会出现对统
270 一的发展逻辑,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统一性的挑战。[41] 据我看来,这种怀疑只是对职业的单方面分析所带来的结果。[42] 对于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意义和它对现代的生活形式和社会形式的尝试,基本上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和政治学方面的对资本

---

〔37〕 在这期间有关这个领域已经开展的研究虽然正确,但是还是要提醒注意不要将这样的判断过分泛化了:在很多,尤其是高度机械化的和通过低资质人员完成的企业里,"传统"现代的工作时间制度仍然占主导地位,随着"新经济"的崩溃和伴随新经济出现的年轻的一代管理者甚至绝大多数又看上去巩固了这种工作时间制度,并且因此被广泛讨论的"没有边界的工作的边界"也变得清晰可见了。但是,我认为研究所指出的发展在大方向的趋势上是无可争议的(也请参照 Döhl/Kratzer/Moldaschl/Sauer,2001 年;以及 Moldaschl/Sauer,2000 年;进一步可以参考 Schneider/Limmer/Ruckdeschel,2002 年)。

〔38〕 当然,远程工作并不是唯一的符合新式—旧式的工作导向的:基于新的技术上的可能性,通过便携式电脑及移动电话,使得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而能联系得上和不再受空间的限制成为可能,这不仅使得(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分隔越来越小,而且诸如不动产掮客、编程员或者保险销售代表也将如此,或者说工作与休闲之间的转化在不再有空间上的差异而且以越来越快且不规律的节奏进行。有关远程工作请参照诸如 Garhammer,1997 年。

〔39〕 参照 Behr,1999 年,第 145 页及其后页;或 Deutschmann,1989 年。

〔40〕 在这样的关联中,产生了劳动社会学有关晚期资本主义的工作中的"消除边界"和"主体化"的最新讨论;参见 Voß,1998 年和 2001 年;Behr,1999 年;Schneider/Limmer/Ruckdeschel,2002 年;Döhl/Kratzer/Moldaschl/Sauer,2001 年;以及 Moldaschl/Sauer,2000 年。

〔41〕 参照 Elmar Altvater 为杂志《思索、知识、伦理》(*Erwägen*, *Wissen*, *Ethik*)所撰写的文章(Altvater,2002 年),以及在那里刊登的讨论文章。

〔42〕 请参考 Rosa,2002 年 b。

主义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变量大部分是涉及社会的分离、分裂和矛盾，这些往往都与经济形式相关，尤其是指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或者是在较发达的国家和“较为落后”的国家之间。[43]

相反，另一个到目前为止更受推崇的分析方向却是集中在对构成要素的分析上的，也就是那些决定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以及从它们的动态性到阶级界限的要素。在我看来，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应该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的，这本书对发展的讨论也是在这个 271
角度下的；而且，进一步仔细观察，会看到它进一步指出了，阶级对抗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增长迫力和加速迫力*，以及*增长承诺和加速承诺*，这些都对现代的生活形式和社会形式时常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是在资本主义时间经济中共同前进的提高原则，并且在资本主义的所有的历史变革过程中坚持下来了。当阶级对抗蒸发、不再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无产者的区分以及不再有“革命的主体”和他们能够对生活方式、社会项目有着重要影响的时候，增长迫力和加速迫力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也是保持着文化影响力和结构塑造能力的。[44]

在这里所描述的晚期现代的发展保持不变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如同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资本主义的不同的生产方式，这就是时间经济的命令的有效性：改革和变化一直站在时间有效性的命令之下，并且尤其是*加速的逻辑*，它在非常令人惊讶的资本主义的弹性和变异可能性的中间和背后开创了一条不会衰退的道路，尽管这个逻辑在不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下进行了不同的改变，带来了诸如“莱茵式的”（rheinisch）、“盎格鲁撒克逊式的”（angelsächsisch）和“亚洲式的”（asiatisch）

---

〔43〕 在这个范畴里也包括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2001 年）很受关注的最新研究，他们的分析的（或者“本体论的”）基础构建了“帝国”和“群众”之间的区别或者“基本矛盾”。Hardt 和 Negri 坚持将无产阶级定义为潜在的革命的反对阶级，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对于解释晚期现代社会的现实有着明显的分类上的不足。“劳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是对资本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服从。处于资本当中和维护资本这个事实使得无产者被定义为一个阶级”，Hardt 和 Negri 这样写道（第 53 页），并且不情愿地指出，这些“无产者”没有形成阶级，而是被描写为*所有行为主体的生活关系*。对于谁而言，这个定义不是正确的？只要在现代社会的*所有的主体*或多或少地屈从于主观性的形式和资本对身体关系的有效的强迫之下，就绝对会首先沿着阶级冲突的路线出现反抗潜力的，或者从“工人阶级”中去寻找反抗潜力，如同 Hardt 和 Negri 所提出的，*而不是在建立在个体的和政治的自我决定基础上的社会传统中找到*。

〔44〕 这两个变量也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例如可以从 David Harvey、Fredric Jamesons 或 Moishe Postoned 的作品中找到。

资本主义的变种。[45] 连接这些变种的是它们都隶属于资本主义时间经济的法则,尽管会有猜测认为,它们的计算地平线在时间的延伸中完全
272 是在变化着的。因而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主义来说,有效的是以短期的效率提高为导向,而在莱茵模式中却是以长期的效率提高为导向。[46] 尽管如此,但是仍然会有这样的加速,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种模式事实上已经在全时间实施了,从时间角度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加速地平线的缩短。

由此可以惊讶地看到资本主义系统的发展能动性:类似于马克思对劳动力的历史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确定,在这里给人们带来的印象是,速度的提高或者说加速力量的增加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根本的驱动要素。因为加速能动性往往产生了新的时间实践和时间机制,它们使得加速能动性在它自己撞到它的速度极限之前,在长时间里能够继续提升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遇到加速阻碍,并且因此最终被加速能动性自己所生成的加速力量所"战胜"之前,加速动力都可能继续增加。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正式的、严格线性化的、抽象的时间在工业化时代里的制度化,和因此而产生的工作和"生活"的严格的时空上的分离,似乎是使得意想不到的加速过程开始运转的"杠杆",这个加速过程首先是生产的加速,之后是流通的加速,最后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加速。加速潜力的发展恰好将不同的工作领域从生活世界的利益中解脱出来:通过严格的排除而使得填满"工作日的每个毛孔"成为可能;因此,在工作领域中,将不受阻碍地完全贯彻时间经济的合理性。福特主义(Fordismus)和泰勒主义(Taylorismus),以及德国企业管理协会*的工作和方法

---

〔45〕 威廉姆·E.绍伊尔曼对我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社会加速的主要驱动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人们不清楚我所关注的是哪一种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Scheuerman,2003 年,第 42 页),因此在这里加以补充之后的论点是,动态化的后果是它的与经济形式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形式。

〔46〕 诸如 Sennett,1998 年;也请参考 Garhammer 的不同研究(1999 年);以及 Streeck/Höpner,2003 年。

* 德国企业管理协会(Verband für Arbeitsgestaltung, Betriebsorganisation und Unternehmensentwicklung,REFA)源自 1924 年 9 月成立的"帝国劳动时间考察委员会",是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劳动研究和企业管理组织。德国企业管理协会的目标是结合企业生产能力和员工需求为企业定制营利的解决方案。对高效工作流程的开发是德国企业管理协会的第一次重要创新成果。第二个重要成果是以测量、评估和塑造工作系统为基础的研究工作的发展。——译者注

时间测量*工程师只有在“付出系统性的漠不关心的代价”[47]的条件下，才能使时间效率达到最大化，也就是说，是在从所有的生活世界的、私人的和主体的关系中抽出的“纯化的”工作环境下。另一方面，严格 273
的功能区分和领域划分对于工作的主体来说也具有好处，私人领域或者说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从经济方面的要求和（工具—策略的合理化的）需求中解脱出来了。[48] 这些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经济斗争打上了这种工作时间制度的烙印，因而工业化的“经典”现代性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每个领域应该得到多大的权重，也就是工作时间的长度。[49]

在20世纪晚期，福特—泰勒式的管理制度带来的加速可能性被证明是使人筋疲力尽、耗尽能力的，因而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化的劳动管理也似乎突然从时间经济“加速器”变成了“刹车片”。[50]

经典现代的工作管理，是通过排除可能起到阻碍作用的主观的对意义进行探索的问题和减速的生活世界的时间实践，而实现劳动强度的增加（和因此而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加速）的，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在这当中经济的能动性只有通过对工作的再—主体化的反向过程以及对生活世界的权限与资源凭借取消区域划分的“殖民化”的折返过程，才有可能实现：在今天，通过企业有目的地提高主体的干劲和能力并且考虑到“自己的时间”、个人的节奏和主体对空间—时间的需求，从而 274
使得工作的强度得以增强。例如，当不再用工厂的钟表对工作成绩进行

---

* 方法时间测量（Methods-Time Measurement，MTM），是指执行某项特定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依赖于选定的工作方法，也就是方法确定时间。方法时间测量是一种借助定义好的过程模块来描述、整理、设计和规划工作系统的工具，因而成为一种高效生产系统的标准。MTM是今日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预定时间方法，由此成为跨国公司所属各个单位的一种统一的生产过程计划与效率规范。——译者注

〔47〕 Behr，1999年，第44页，与卢曼的观点有联系；也请参照Richter，1991年，第65页及其后页。

〔48〕 Habermas，1981年，第二卷，第471页。

〔49〕 参照Behr，1999年，第34页及其后页。之后的工作的强度增加已经是资本主义加速逻辑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了：正如马克思（Marx，1972年，第245页及其后页、第279页及其后页、第425页及其后页）所做的历史性的、小心翼翼地分析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首先通过增加工作时间而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就是通过将工作时间延长至14个小时到16个小时，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更多小时。这种生产加速的方式就触碰到了它的极限——它导致了生产能力的丧失，而且最终使得付报酬的劳动过程变得低效率。经济系统通过变化对此作出反应，即通过增加劳动强度来同时实现缩短劳动时间（并且因此有足够的消费时间和深造时间）和经济上的加速。

〔50〕 因而诸如Gert Günter Voß（1998年，第1页；参考2001年）假设在工作世界的所有维度中都沿着在这里所阐明的发展路线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化”。

管理,而是代之以完工期限的时候,就一方面为主体打开了新的安排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也为雇主带来了新的绩效提高的机会,以及因此而来的加速的机会。显而易见的是,"对个体的业绩能力在一天、一周、一年和整个工作生涯中的节奏的漠不关心",也不去过问"整个人是否恰好忧心忡忡或者感冒了",而是要求"基本上每个小时付出同样的努力",并且因此对劳动者的非经济方面的激励潜力不感兴趣,这样的工作(时间)制度白白浪费了增加强度的可能性,而限制"框架控制"、允许主体化和允许去除劳动的边界并且因此促进效能的完全发挥的系统却与前者完全相反。[51]

对于企业家而言,时间经济的好处可以凭借以下方式成为可能,对工作时间实现各种各样的弹性化,例如通过个体化设计的、运行时间越来越短的工作合同、通过"根据需要、电话召唤的"工作委托以及通过临时工作关系等等;消除经济上无效率的空转时间或缺席时间;并且改为使用高效率的方法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情况,如能够作出迅速反应的"准时生产"。[52] 可以这样解释,现代的工作世界首先需要保护不受传统的生活世界的干扰,以便能够确立它的时间制度和通过合理化在社会加速的界限内实现社会加速;与此同时,经过开发的时间导向和时间原则也如此广泛地入侵了生活世界的日常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因而似乎是实现了"反向的殖民化":新教伦理的道德伦理和它的理性化逻辑也在
275 生活世界和休闲文化中扎下了深深的根基,通过工作领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去差别化已经不再能够撼动它了。更确切地说,后者带来的影响是,仍然存在的生活世界的减速的潜力和减速世外桃源已经朝着有利于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加速的方向发展了,并且因此也带来了资本变现的加速,因而减速的潜力和减速绿洲都受到了侵蚀。格特·君特·沃斯(Gert Günter Voß)*在他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了雇员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 能够基本……确认的是:工作关系的去边界化越是明显,和因此而来更加积极地去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的迫力越是显著的话,就会越发强烈地生出将整个日常生活有目的地按照职业的要求去安

〔51〕 引文来自 Garhammer,1999 年,第 74 页;Michael Behr(1999 年)也支持这个理论,特别参考第 171 页。

〔52〕 详细内容请参考 Garhammer,1999 年;Grotheer/Struck,2003 年。

* 格特·君特·沃斯(195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Web2.0 时代的企业》《劳动力企业家》《工作的顾客》等。——译者注

> 排并且有效地加以组织的必要性……韦伯已经记录了在某些群体中会出现这样的发展，并且得出了历史性的普遍结论。……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实现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合理化的“科层制度的”理想却很有可能撞到了边界，并且可能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系统的边界消除有关的弹性形式。现在这一切正在发生。[53]

工作和社会之间的去除边界也体现在，许多行为，诸如在继续教育、构建机会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和维护”或对职业市场的观察等方面，不再能清晰地归入工作或休闲之中了：有的人晚上和同事一起去打保龄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有的人致力于公益活动或者个人的继续教育，为了提升就业机会；有的人在业余时间忙于学习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以满足个人的，也是职业方面的兴趣爱好；有的人在心理生理学的健康培训课程中尝试着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对生活的乐趣，这些人往往是同时忙于私人的和工作的事务。“劳动力企业家”（*Arbeiskraftunternehmer*）（沃斯）既对他的生活中的所有方面，也对经济上的变现感兴趣，正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使他在生活所有领域也都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都将这种状况看做资本主义 276
企业家的标志：当他不能向上攀登时，他就掉下来了。[54]

鉴于这种随着当今的变化而产生的晚期现代的时间导向和任务导向的混合，或者说抽象—线性的时间和事件时间的混合，以及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混合，大量的时间社会学家建议，在“多样时间性”的概念下去解释当代社会的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特性意味着根据不同的情境灵活地在可计划的时间、线性的时间和事件时间、“时间化的”时间之间的来回变换，并且强调了主体重新赢得的进行安排的自由空间和时间上的主权。“最富有成效的……是，人们能够完全按照当时情境的要求灵活

---

〔53〕 Voß，1998 年，第 25 页及其后页；也请参照 Voß，1990 年；以及 Sennett，1998 年。

〔54〕 事实上，韦伯将这种原理看做是（经济上的）合理化过程的必然结构（Weber，1991 年，第 57 页）。理查德·桑内特又一次在他的小品文中评价了新的“涡轮发动机—资本主义”的文化，静止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后退，这种感觉最终也导致经济上的不合理的超级—能动主义（Sennett，1998 年，第 99 页及其后页）。罗宾逊和戈德柏也在他们的时间预算分析中有趣地将这种态度定义为（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45 页）生活方式的主导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空闲时间和工作之间的界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重要了——什么也不做，就是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工作还是空闲时间的活动对于定义‘我是谁’都非常重要。准备简历已经变成一门科学，而且这样的简历现在往往都要包括个人的空闲时间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工作经历，这些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地在事件时间……的世界和钟表时间的世界之间跳来跃去。"[55]但是我觉得,这种时间概念是否确切地描述了晚期现代的"消除边界"的工作布局的特征,是很成问题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时间经济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与线性的、通过日历和钟表所确定的时间有关,而且正是这种时间经济的要求,在那些在分化的系统当中和这些系统之间扩展的互动链条必须相互协调和同步的地方,仍然是到处都具有决定性的。如果企业(和不断增多的公共机构)不再事先抽象地规定上班时间,而只是向雇员或者(虚假的)自由职业者确定交付期限、生产期限和完成期限的话,那么在这里线性时间和事件时间就以最棘手的方式相遇了:在没有集体
277 时间制度的固定的框架和卸去经济负担的"业余时间"的固定的框架的情况下,最终应该能够实现经济方面的时间效率,它应该超过旧有的规定好了的、没有灵活性的、线性的时间制度的效率。因此,我似乎至少可以在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工作时间安排的角度下,讨论事件时间通过线性时间的殖民化和时间自治通过时间他治的殖民化,而且这种形式的殖民化导致——正如我将在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要讨论的——不仅是在个体生活方式的微观社会层面的"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而且也在政治控制和构造宏观经济领域,甚至也包括经济方面的战略领域本身实现"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56]

在这个背景下,在对资本主义提出批判的工业社会学和劳动社会学中在此期间所发现的对经典现代的、"制度化—线性的"时间的某种渴望,并不值得奇怪。[57] 在这个过程中清楚地展现了,资本主义加速中的所谓的时间经济的能动性,根据它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首先创造了并在后来又消灭了制度和行为方式(以及,如同已经详细指出的,主体化的形式)和它所需要的时间导向。但是,在这样的资本主义控制逻辑下,加速和增长也是在系统的宏观层面上直接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经济的速度"可以用它的增长速度来衡量,而衰退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放缓。

---

〔55〕 Levine,1999 年,第 141 页,参考第 283 页及其后页;同样请参照 Geißler,1999 年,第 168 页及其后页。

〔56〕 例如 Piore 和 Sable(1984 年)将当代的灵活的专业分工的经济策略看做是一个"持续革新的战略:这是对适应不断的变化,从而能够控制它所作出的尝试"(这里引自 Sennett,1998 年,第 64 页;也请参照 Backhaus 和 Gruner,1998 年)。

〔57〕 诸如在 Sennett(1998 年)和 Garhammer(1999 年)的著作中;也请参照 Rinderspacher,2000 年。

因而,在经济—技术的社会领域所产生的快速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为社会中的所有的其他的领域——政治、教育和培训、文化再生产甚至是法律体系等领域,带来了令人感到紧张的难题,这些将是第十二章所着重分析的问题。 278

2. 加速的预言:文化引擎

在社会科学的著作中,秉持最终仅凭经济方面的引擎就能够完全解释现代性的加速趋势这种观点的作者并不少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其他社会领域的加速或多或少是被迫的,并且似乎是伴随着资本主义领跑者而带来的附带现象,这当中必然也会产生相应的文化方面的"主要现象"、现代的速度意识形态和现代的加速渴望。[58] 加速应该从经济—技术要素变成文化要素,因为加速和生产的增长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和流通方面的加速和增长。诸如快餐、闪电战、赛车雪橇等现象中所代表的无法从经济上加以解释的现代文化的诱惑力,从上述的角度来看却被理解为是对来自物质基础的要求的附带的文化上的反映,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不合理的。

这种简化式的理解从两个角度来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它不能说明经济上的结构要求和主观的及文化的意义模式之间相互调停的关系——当加速为主体不仅没有带来经济方面的刺激而且相反还让主体陷入金钱上的困难(并且因此也陷入了与之相连的时间上的贫乏)的时候,为什么主体参与了他们的消费行为上的加速,并且必然加入生活节奏的加速?资本主义的加速迫力本身不足解释其在非技术的加速维度中也几乎毫无阻力地推动了加速过程,也就是说,无法解释反对自我驱动的能动性或者说反抗经济加速命令的"有力举措"的结构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阻力为什么是缺席的。从现代文化上的自我关系的角度出发,动态化的继续发展显然不是有关对外在强迫力的适应的问题,而是关于自我确定的重要的因素。 279

其次,这种唯物主义的简化没有看到精神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前提条

---

〔58〕 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Reheis,1998 年(特别参照第 64 页),Jameson,1994 年和 1998 年;Harvey,1990 年,非常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点;也请参考 Scheuerman,2001 年 a,第 2 页及其后页;以及 Postone,1996 年,第 224 页及其后页。

件,而这些前提条件使得生产力量和加速力量能够按照所描述的方式发展。[59] 正如针对经济优先假设的文化主义方面的批判的支持者所指出的,经济方面的能动性的发展从它的角度来看也不是没有文化方面的前提条件的,而是高度特殊的文化的和精神情绪历史的"需求状态"所产生的结果。[60] 然而,根据这里所提出的受到拥护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基础的、历史性的变化所具有的清晰的并且似乎是先验的因果属性,就会涉及历史哲学方面的错误,因为精神的发展和制度的发展是被理解为共同进化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两个方面一边是保持相互依赖的关系,另一边是在一定程度的弹性界限内,也是能够部分自治地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直至遇到合法性的危机或者制度危机以及通过制度的基础的革命或者通过思想史上的范式变化所带来的跟随而来的平衡;[61] 并且,根据这个假设,特别是时间结构和时间导向,是在精神发展和制度发展的相互调停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因此,这样说尽管是正确的,即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不断出现的成功中能够下结论,现代性的文化正是以加速为基准方向的或者至少必须是与之兼容的,但是这只是暂时站得住
280 脚的;因为从中所推导出来的就是精神和文化的发展只是简单地因为经济的系统命令对此提出要求。因而在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加速能动性在现代是以什么方式进行文化上的规划的,也就是说,增长和加速的提升逻辑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在新时代的文化基础上受到约束和停靠下来的。

被普遍接受的通行的见解是,在高度发展的现代性中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意识,可以被描述为线性的、伴有开放的未来的,对发展的前景的设想在很多层面都是不确定的。但是从过去线性发展而来的未来先是占据了我们的时间体验[62],接着产生了晚期现代文化中的时间贫乏和对加速的渴望的第一眼看上去令人诧异的影响。当一方面没有世界尽头的,也没有世界末日论的预言这种带来人世间的时间所剩无几的感觉的威胁,另一方面新的类型的、更好的未来就在此时此刻或者(世界)时间的那一边开始,这样的未来很快通过例如政治方面的行为而招致加速

〔59〕 参照 Rosa,1999 年 b,第 395 页及其后页。

〔60〕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有关新教的研究中为这个观点提出了经典的论述(Weber,1991 年);进一步请参照 Gronemeyer,1996 年;Blumenberg,1986 年;或者 Heintel/Macho,1985 年。

〔61〕 详细内容请参考 Rosa,2004 年 b,以及 1998 年,第 271 页及其后页。

〔62〕 对此请参照本书的导论和第一章"1"。

意义下的前进的时候[63]，完全可以期待它们会为时间意识形态提供基 281
础。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卢曼也指出，现代的“目标不断变化的”时间意识形态在提高速度方面无疑比去实现其内容更为重要，并且比引起人们产生“‘我们的时间概念进入到了望不到尽头的无穷无尽当中和我们没有最后的期限、没有世界的终点’这样的想法，要更加引人注目。照这样的时间意识形态，我们有时间，有无穷无尽的时间”。正因为如此，卢曼继续指出，这种对时间富裕的设想必须“被禁止，更确切地说是从道德上禁止”，因为它与当代社会的结构方面的要求是不相符的。[64]

正如马克斯·韦伯和被他所启发的（时间）社会学所分析得出的新教伦理的道德伦理中所指出的，现代的文化事实上是这一类的道德上的“对浪费时间的禁止”的重要的源泉[65]，对于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怀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高效使用时间、紧凑地使用和利用每一分钟的规定是这种道德伦理的核心元素，它在被这种道德伦理所统治的时间实践中发挥着理性化和纪律约束的作用。韦伯所提出的内心世界的禁欲在这里表现为严苛的和一丝不苟的时间纪律。因此，这也证明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主义的旗鼓相当，而且特别是它们在时间观念方面的不相上下，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提供了严丝合缝的文化对应。对于新教伦理而言，时间多得不得了的想法实际上是在道德上禁

〔63〕 在这种观念的基督教的基础上，历史确定了它的进程的目标和方向，并且任其加速，Ernst Benz（1977 年）和莱因哈特·科泽勒克这样指出（Koselleck，2000 年，第 168 页及其后页和第 177 页及其后页）。历史又以变化了的形式成为长期在人类的进步中缺席的、具有启蒙意义的行为的推动力量，而现在用所有的力量使这些行为加速的目标变成了历史固有的了（Koselleck，第 168 页及其后页和第 177 页及其后页；Blumenberg，1986 年，第 218 页及其后页）。在决定论的历史哲学基础上，能够从中推导出革命性的政治—历史的加速委托的理念，它直至 20 世纪都一直为社会革命的行为插上翅膀。

因此，最先的基督教的和之后的尘世的被拯救的期望中的要素成为现代的加速推动力的起源，这一点不应该被低估。即便汉斯·布鲁姆贝格（Blumenberg，1986 年，第 246 页）也在这种关系中指出，“加速意识形态”在封闭的、决定论的历史概念中是合理的，而在拥有开放的未来的时间概念中却是非常不可能的，他强调，“对历史的过程中的必要之物的洞察……本身……”缺乏“足够的动机去产生用所有的加速的力量去支持所熟悉的事物的意愿的”，以及对于“不熟悉的……”应该对“对它产生影响、使它参与到”有力的加速当中的决心。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加速冲量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时间概念的变化，并且甚至变得巩固了。

〔64〕 Luhmann，1968 年，第 156 页。

〔65〕 Weber，1991 年；对此也请参照本书第二章；进一步可以参考 Neumann，1988 年；或 Sparn，1999 年。

止的,按照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话来说,浪费时间是"第一宗也是最重的一宗罪恶"。[66] 这种时间观念是如何对现代的劳动
282 社会构成束缚的,伯特兰·罗素在他的著名的《懒散颂》(*Lob des Faulheit*)中做了形象的说明,这本书是这样开头的(与韦伯的理论无关):"与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会提到这样的谚语,'撒旦发现一些恶作剧等着游手好闲的人去做',当我还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孩子时,我相信人们告诉我的一切,并且良心会让我一直努力地工作直到现在。"[67]

仅凭建立在宗教历史基础上的对浪费时间的道德上的禁令,是不足以解释现代的加速意愿的,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样的禁止不能形成有激励作用的意识形态[68],因此卢曼所提出的目标不断变化的时间意识形态并不足以确定对浪费时间的禁止,为了使他的解释成立,还需要额外加上道德的或者最好是伦理的信条,也对赢得时间充满期望。其次,新教伦理最初的道德力量和文化力量是与有着闭合的历史的线性的时间相关的。禁令之所以是合法的并且起到激励作用,是因为它与对灵魂的救赎和在(被认为即将到来的)世界的终点永生的关怀有关。因而,在这里一直存在的问题是,世俗现代的加速渴望的文化的激励能量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与开放的未来地平线联系起来的。

现在在第一个问题上可以明确,新教伦理的时间命令,即禁止浪费时间和要求提高效率,是通过恐惧和预言(它们归根结底是最基本的人类的驱动原则)同样地起到激励作用。根据韦伯的说法,新教徒式的工作狂,同样是面对探寻上帝恩赐所选中的对象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时,对于从中所产生的命中注定的宗教式分离的揪心的恐惧所带来的结果。禁欲主义—遵守纪律的唯意志论对于(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而言,在

---

* 理查德·巴克斯特(1615—1691),英国新教教会领袖、神学家、赞美诗作家。主要著作有《圣徒永远的安息》《召唤未回归者》《归正的牧师》等。——译者注

〔66〕 参照本书的第二章.2(1),注释62。同韦伯所关注的一样,我发现同样的道德上的严苛可以在本杰明·富兰克林那里找到它的尘世化的变体,他提醒人们,那个因为懒惰不愿意挣五先令的人可能会将他的所有的获益潜力"谋杀"成"上千片碎片"(引文来自韦伯,1991年,第40页及其后页)。浪费时间因此已经从备受谴责下移到了最糟糕的资本犯罪的台阶上了。

〔67〕 Russell,1935年,第11页。沃斯(Voß,1990年)尝试着指出,新教伦理以什么样的方式到了今天仍然作为权威的生活方式的典范而存在,尽管是以变化了的形式,甚至是以扩展了的形式。

〔68〕 因此,诸如不许杀人或不许偷盗这类严苛的道德禁令并不能带来相应的积极的激励能量。

宿命论的作用和取消教会—神圣的拯救作用上似乎发挥着催化剂的功能,特别是在聚集着大量恐惧潜能的领域是唯一可靠的"慢慢化解宗教 283
上的恐怖感觉的手段"。[69] 与之相关,对灵魂救赎、成为被选中的永生的对象或者被选中的恩赐的对象的预言,尽管根据加尔文主义的教义,这些是不可能通过任何东西得到的,而是上天事先注定的,但是人们普遍地相信,是从实现高效率利用时间的生活方式的成功(和可能的职业上和物质上的成功)中"看出"被选中的对象的,在这里,在宗教的日常实践中的差异被慢慢磨平了。[70]

现在作为主体行为和文化发展的发条的独立的恐惧和预言,不是新教伦理的特性,并且因此也不是现在的加速文化的特性;作为与喜悦和痛苦的意义结构相关的事物,恐惧和预言毫无疑问是普遍的最基本的心理上的激励要素。相反,特殊的是对它们在时间经济上的运用:现代文化的独特特性是那些发条与时间效率的原则的相互联系,并且与和时间效率原则相联系的加速期望联系在了一起。我的假设是,这样的联系现在在世俗化的变化过程中依旧保持着它的意义基础。

可以这么说,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过程中,恐惧和预言尽管通过它们的投影区从超出社会的出类拔萃(永远的极乐相对于永远罚入地狱)的区域走出来、转移到了社会竞争的系统固有的区域而改变了它们的文化形式,但是它们作为(增长过程和)加速过程中的发挥激励作用的发条的功能,却伴随着从封闭的未来地平线到开放的未来地平线的过渡过程,毫发无损地保留下来了。

在本书的第五章所讨论的普遍存在的最先来自于资本主义企业家 284
的似乎在所有的存在领域里都是站在滑动的斜坡上、站在滑溜溜的斜坡上的担忧,是动态的现代加速社会基本的恐惧,也就是说,在偶然性不断增加的世界里,不可避免的担心、关键的选项和连接的机会会丢失,或者会陷入无法追赶的落后之中。因此,时间在独特的宗教意义基础"渐渐死去"之后在存在上变得紧缺了。

---

〔69〕 Weber,1991 年,第 129 页。通过取消告解就去除了"阶段性慢慢化解"浓郁的罪恶感的"方法"(同上书,第 124 页)。而没有休止的工作和有时间意识地按计划进行的生活方式都是被反复提及对抗罪恶感的心理上的"解毒剂"。

〔70〕 这也与加尔文主义原本的教义的两个阐释是矛盾的,根据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宿命是无法通过外在的标志识别的。

"永远存在的繁荣昌盛"[布克哈德·卢茨(Burkhard Lutz)*语]的承诺,或者说对绝对的财富的预言[克里斯托弗·多伊奇曼(Christoph Deutschmann)*语言]发挥着预言的作用。[71] 在这种预言中,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反映现代特征的增长和加速的相互连接:正如多伊奇曼已经阐明的,在不再受教会约束的尘世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似乎是"流动的"时间)通过作为对偶然性的克服者而站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从而赢得了宗教的替代功能。由于未来的根本的不确定性,上帝的安慰不再能够保证强有力并且安心地面对偶然性了,令人振奋的多祷告的基本思路恰恰是出现在这样的想象中,一直希望发生的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因此祷告是有好处的;而现在是这样的想法发挥了同样的功能,支配尽可能大量的金钱和机会,能够对将来的偶然,或者说新的需求和新的受威胁的状况作出恰当的反应。多伊奇曼追随了卢曼,他认为,金钱作为资本承担了将不确定的复杂性变为确定的复杂性的任务,而且因此"作为不确定性的恰当的克服者"而发挥作用。[72] 金钱财富用这种方式诱导了"个体的绝对权力的强迫症"(也就是说,保留所有选项的强迫症),而且与在早期的宗教的预告中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于"绝对的财富",尽管有很多预言,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最终只有很少的人被选中。[73] 由于
285 时间和金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等值的,而且不仅由于生活中本身不可克服的偶然性,也由于在向前发展的动态的晚期现代偶然性的剧烈增加,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要求现代文化进一步加速(和附带的增长)的期望也被不可避免地写了进来,正如这个愿望永远无法满足一样。

如同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在这里好像是[74],现代社会中对安全感的需求(也就是说,防止偶然性和创造可预测的行为基础)与现代社会的加速的愿望相互冲突。这项研究的基本假设中非常有趣的地方是,现代的加速能动性能够与其他所有的发展原则相反并在辩证的过程中实施,这一点可以不止一次地被证明:在早期现代的开始加速之后,就产生了巨大的个体的和社会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因而逐渐形成的"有组织的"现代的社会福利国家就创造了新的"保

---

* 布克哈德卢茨(1925—2013),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中小企业的人员管理和革新能力》《技术与社会变革》《永远繁荣的短暂美梦》等。——译者注

* 克里斯托弗·多伊奇曼(1946—),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作为意识形态的计划经济》《工作社会进入危机了吗》《对绝对财富的预言》等。——译者注

〔71〕 Lutz,1984 年;Deutschmann,1999 年。

〔72〕 Deutschmann,1999 年,第 100 页。

〔73〕 同上书,第 177 页和第 179 页。

〔74〕 Gronemeyer, 1996 年。

险构架”，创造了稳定的计划基础，并且正是通过它们巨大的加速效果得以发挥。[75] 正如泰勒式的劳动管理，在晚期现代中身处加速压力，因此也处于侵蚀压力下，变得像这种（民族国家的）保险体系：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所有最新的时间诊断都是一致的，也就是与“经典的现代”相比，是通过晚期现代的社会以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为标志的，它是通过已经确定的晚期现代的加速推动力而产生的。[76] 因此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现代的对安全感的要求最终是要付出它的加速的需求的代价的，并且导致时间紧缺。

因此，在这里根据多伊奇曼的观点，现代的加速的预言必须产生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对安全感的承诺之上。而且，事实上，还可以发现加速想法中的另一个预言的角度，它作为现代文化的决定性的部分完全 286
独立于新教伦理的观念复合体和规则复合体。根据汉斯·布鲁姆贝格、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等人的有关“文化化”的论证中所猜测的[77]，社会加速中的真正的、隐藏的但是在文化上最富影响力的“拯救的承诺”产生于，加速预言看上去提供了“永生”观念的尘世功能上的等值物，而且因此可以将它理解为对人类的有限性——死亡——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大的文化难题的现代的回答。

这种权威性的意义象征在基础结构中看上去是这样的：“高级的时间”是极乐时间、是隐藏在死亡或者在世界尽头后面的真正开始的所有的时间和生活，并且与所有的总归只是短暂的、无价值的、最终是一再发生的事件的无意义的循环往复的（作为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的）尘世的时间相比，它是慢慢地发挥它在文化方面的强有力的作用的，但是在现代已经丢弃了对这种“高级的时间”的想象。[78] 对于格罗内迈尔而言

---

〔75〕 参照本书第三章.3(4)。

〔76〕 有关20世纪末期的“加速浪潮”也请见第十章。

〔77〕 Blumenberg，1986年；Gronemeyer，1996年；de Haan，1996年；Geißler，1999年；Achtner/Kunz/Walter，1998年，第76页及其后页。

〔78〕 事实上，这个关于在现代加速和世俗化的关系的问题既非常复杂，又很有趣。有关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有一些思考（参考注释63），根据这些思考，加速的想法首先是犹太教—基督教对拯救的期望所带来的结果，同样可以有说服力的论点是（传统的）信仰表现为巨大的文化上的对加速的阻碍。因为宗教的观念几乎一致都包含于“超验的”时间维度（神圣的时间），它是稳定性的要素，也许甚至隐含着静止（对此参照Achtner/Kunz/Walter，1998年，以及Sparn，1999年，第19页及其后页）。因此，社会的大范围的世俗化可能是翻天覆地的加速的前提条件；同时前者在部分上也是后者的结果。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论述的，因果关系的肩头指向了两个方向，原因的谜团仍然无法解开（Taylor，1994年，第366页及其后页和第368页）。如果试图解开其中的纠结，可想而知的是，也可以从这本书中所观察到的加速的辩证式的能动性的不同关系中看到的是，基督教的救赎的期望使得加速动力开始运转，而后者最终变得如此强大，从而它与那些宗教的设想不再一致，并且因此开始腐蚀它们。

[在这里她从文化历史学家艾根·弗里戴尔(Egon Friedell)*[79]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得出结论],这种发展和对这种形而上的确定的丢失的催
287 化剂是在14世纪黑死病所带来的集体的创伤性的经历,从中产生的对现代文化在思想情感历史方面的(通过加速的愿望吸收了从这跑开的要求的特性的)重构,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充满恐慌的逃逸反应。

尽管人们不愿意分享最早的讲述,但是这样的论点仍然存在,即与在死亡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看做是在生活的想法的告别,是一种有约束力的文化观念,根据这个概念,生命无论如何只是在死亡之前拥有它的意义和方向,因而主体的和文化的意义基础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质疑:根据布鲁姆贝格的分类所得出的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由于它们的分离现在产生了要去重新解决的文化上的、扣人心弦的难题。在此之前,个体的生命终点与未来即将到来的,同时也标志着"真实的时间"的开始的世界的终点被认为是统一的,而随着后者的渐渐消退,这两种时间的地平线现在就非常明显地被踩碎了:

> 世界的期限,即从世界被创造到最后判决的世界的毁灭,曾经是人们用来计算在新时代的开始、从出生到死亡的期限的时间单位。人们现在觉得重要的是他自己在时间中的停留时间。而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相信他们个体在逐渐变老的世界的剩余时间中的参与是会在他们死后继续延续的……他们只操心一个问题,即最终到底是落入地狱还是进入永恒的天堂。但是这样的担忧与他们在人世间的生活的长短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类型……自从寿命粗暴地从世界时间和永恒时间中割裂出来之后,不再是从古老的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个体的生命,而是相反,是从脆弱的个体的生命的角度来打量世界了,因而就出现了对持久的慢性匮乏。[80]

现在基本上就出现了对这种情境作出反应或者说从意义结构的角度加以克服的一系列的文化上的可能性,而且这些选择中的大部分在现

---

* 艾根·弗里戴尔(1878—1938),奥地利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诗人的利用价值》《近代文化史》和《时光机的旅行》等。——译者注

[79] Friedell, 1976年。

[80] Gronemeyer,1996年,第91页及其后页;对此参照Blumenberg,1986年,第86页及其后页。

代至少仍然在继续尝试。[81] 从这种伦理的困境中走出来的出路，可以产生于例如斯多噶派*所提倡的冷静的发展，或者产生于攻击性否定世界和生命的存在：如果有人认为世界和于其中的生命最终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认为是“苦海”，他没有失去什么——死亡不能从他那里带走任何东西。另一种对个体的生命的无可挽回的短促所作出的可能的反应是，发展出去个体化的“类属的忍耐”，正如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中所建议的，个体生命从自身是长长的链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获得它的意义和慰藉，尽管这不能通往新的类型的永恒时间，但是至少跨越了与世界时间的区别。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的分离可以通过主体的进一步的努力被克服，即主体以他的“作品”，也就是以艺术家的、科学家的或者诸如政治家的方式似乎“变成永恒”的了，也就是说，*留下印记*，这使得个体生命的发挥影响的那段时间超越了它的期限而得到了延伸，并且因此至少与世界时间接近了。因而，可以毫不困难地将新时代的历史时期中的这种动机确定为是具有文化影响力的。

但是，实际上，在现代的前进过程中，另一种文化方面的霸权获得了成功，它似乎在晚期现代成了对于死亡难题的无可匹敌的回答：*通过加速完全享受世界中的所有选择*、通过“更快的生活”使得存在于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之间的鸿沟变小的想法。为了理解这种想法，必须看到，探寻死亡的意义这个问题一直与有关什么是正确的或“美好的”生活的问题有着解不开的关系。因为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相应的、在文化历史上变为主导的有关*美好的生活*的设想产生于，*将生命作为最后的机会去把握*，也就是说，在死亡画上最终的句号之前，应该尽可能紧凑地和尽可能丰富多彩地利用分配给主体的人世间生活的时期，这就是格罗内迈尔的令人着迷的简洁的基本命题。由此产生的新时代的生活理想和时间 289
理想就是，*美好的生活就是被填满的生活*，因此应该尽可能多地去尽情享受世界所提供的东西，并且尽可能丰富多彩地利用各种可能性和供给物。歌德在《浮士德》中的下面这段话用非常卓越的方式描述了这种生

---

〔81〕 对此请参照 Gronemeyer，1996 年，第 92 页及其后页。

* 斯多噶派（Stoicism），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约于公元前 305 年左右创立的哲学流派。这个学派的基本主张是，宇宙是绝对的理性，理性能提供“共同概念”，使人人具有共同的经验，从而，以形成知识、真理的标准；世界是理性，人是世界理性的一部分，因此应该避免理智的判断受到感情方面的影响，人生目标就是符合这个世界的理性，即达到有德性的生活，将克制、知足、平静（一种对外在事物的冷漠）视为美德。另外，他们也相信“命定论”，即一切都已经注定，都是因为之前做的事情（前因）才会必然地导致后果。——译者注

活原则,并且似乎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已经预示了20世纪后期的大胆放肆的行为所带来的可能是非常惨重的后果:"我要全神贯注地享受所分配给整个人类的,用我的全部的精神去把握它,用我的心去把握它的美好和苦痛,并且将我的自我延伸到它的自我当中去,并且如它一样,最终我也会被击碎!"[82]

最近,尤其是格哈德·舒尔茨试图指出这种世俗化的有关幸福和时间的概念所产生的持久的文化影响力和以此为基础的提升的逻辑。根据他的诊断,在晚期现代,世俗化的幸福和时间的概念的文化影响力体现在每个时间单位的体验事件的增多和变得稠密上面:

> 能够带来假想中的体验财富的提升的两个技巧在最近的10年里持续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们使所体验的对象增多和变得稠密。直截了当的计算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体验手段(电视节目、衣服、休假状况、伴侣等)越多(增多),我们越是将它们紧凑地塞在时间里(变得稠密),我们的内在生活就越是富有:通过拥有的提升带来存在的提升。[83]

除了完全利用所有的选项这样的想法之外,还有人本主义的教育理性也在同样的方向上发挥着补充作用,它认为美好的生活首先产生于,要将主体所拥有的天赋和潜力尽可能全面地得以发展。[84]在这种观念
290 中加速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完全利用所有的世界的和主体的可能性,只要有这些可能性的话;由于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的分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几乎无法全部利用的世界的选择和在个体生活中的有限数量的选择之间的关系不成比例。由此而产生的加快生活的节奏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因为要尽可能多地实现可能性,尽可能快地不断穿过一个个阶段、片段或事件,因此加速毫无疑问是使世界时间和生活时间相互接近的最有前途的、唯一的策略了。如果有人能够加倍快地生活,那么就能实现双倍的世界的可能性,就可能抵达两倍的目标、进行两倍的体验、收集两倍的经验;因而他就能使得他对于世界的选项的完全适应程

---

〔82〕 Goethe,1993年b,第54页。对于歌德关于现代的"魔鬼般的匆忙"的本质的有预见性的阐释,请详细参见Osten,2003年和2006年。

〔83〕 Schulze,1997年b,第90页;以及1997年a和2003年。

〔84〕 仍然可以从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当中找到对这个想法的经典(当然最后这个想法被悲观地收回了)的文学上的描述。

度翻了一番。[85]这表明，技术的加速和生活速度的提高之间是如何通过数量上的增加而在文化逻辑上联系到了一起的，并且也说明，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增长和加速是如何不可分割地捆绑在一起的。如果有人生活得更快，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在他的寿命中实现大量的生活的机会，并且能够开启更多的经验可能和体验可能，因而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在这里是如何通过对没有边界的加速的想象又重新赢回了“永恒生命”的地平线的。如果有人永无止境地快下去，那么作为选项的终结者的死亡 291
就不能带来恐惧；在他和死亡登场之间有着无穷无尽多的“生命的机会”。

生活速度的提高对死亡作出的现代性的回答，和因此产生的加速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幸福论（Eudaimonismus）*式的谐音，它也出现在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中，同样也体现在方程式 I 赛车的魅力或者晚期现代的广告语中：“我投入到了速度之中”“你所需要的就是速度”。从弗里德里希·安西隆的观察中可以看到，在新时代，人们在运动中寻找“真实的生活”，“并且只在那当中”寻找，因此加速所作出的幸福的承诺可以被看做是在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之外的第二个外在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加速循环似乎从外面被现代加速动力的驱动“引擎”所推动。它的插入点是主体的和文化的意义模式及行为导向，这意味着，这个引擎通过提高生活节奏的愿望，推动加速的过程，从而增加每个时间单位中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数量，并且为这个目标节省时间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看起来不仅是加速思想的原因，而且也是它的手段。正是从这个角度，海音提尔（Heintel）和马可（Macho）评论道：“我们的经济体系可以被看做是对通过数量上的时间

〔85〕 这个抽象的想法完全在这个时代的对于（美好的）生活方式的概念中扎下根来，据我看，它尤其体现在许多女性的（在时间预算研究中做了详细的记录的）时间实践和时间难题上了：因为她们希望，同时过着“优秀母亲”和成功的职场人士的生活，但是这两种生活规划各自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因此这些女性就通过将她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一倍，从而过上似乎是两种完整的生活；她们或者通过努力地并行满足对于母亲的合理的要求和来自职场的合法的要求（尽管将各方面的速度都加快了，这样做还是会持续地给她们带来时间贫乏的问题），或者她们先追求职业生涯，然后再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或者反过来；根据我对我的成功的英国女同事的快速的工作速度的最新观察，可以看到如果人们想在带大两个孩子之后开始科学研究生涯的话，就必须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工作）。同样对于那些打算在过完企业咨询师的生活之后，开始艺术家的生活，或者在职业生涯中是经理人，而在业余时间打算作为老师或家庭教师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情况。

* 幸福论是西方伦理思想中一种以幸福解释道德的本质和目的的伦理学说，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早期的思想家梭伦，他把幸福范畴提到道德研究的首要地位。——译者注

填充……来克服死亡的绝对界限的补充尝试。"[86]

因此,在第七章所呈现的这个加速维度与技术加速和社会变化之间的联系,展现出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而且矛盾的结果,它导致现代性的加
292 速程序变成了西西弗式的苦役,并且使得加速所暗含的"幸福的承诺"必然破产: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曾经能够快速地实现世界的可能性的以及因此能够提高生命中所实现的选项的总体数量的同样的发现、技术和手段,也增加了这些可以实现的选项——也就是世界时间的数量和种类,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以并不罕见的指数级增加的方式。[87] 我们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新的媒介带来了选择的巨幅的增加,例如有线电视[88]、因特网,它们不仅加速了传统的信息流程和通讯流程,而且也在服务、娱乐供应和通讯方式方面打开了新的可能空间,这两个媒介只是两个例子而已,它们反映了在现代社会里"错过的程度"是以什么方式呈指数级增加的。

而且,社会弹性化在多个层面的发展、去规制化和去惯例化,以及自然科学的进步,也都不断地增加着可实现的世界可能性和有待决定的选项的数量。晚期现代的行为者一直需要作出决定的是,他要面对不断增多的选择,根据"复杂性的时间化"的逻辑(这一点我们将在这一章的下一节中讨论),同时决定通过将哪些选择的实现推迟到较晚一些的时间点上,而使得它们仍然被保留下来:如果现在已经不是孩子,可能就以后再说了;如果在中学毕业之后就立即开始做学徒,之后可能将大学学业和它联系起来;如果这部电影不能从一开始就看的话,那么就将它录在录像带或 *DVD* 上,等等。但是,在后来的时间点上,可以支配的选项(至少是与平均剩下的生命时间的比例关系)往往不是减少了,而是进一步
293 增多了,复杂性的时间化没有消除加快速度的强迫力,而是强化了它:被拒绝的选项回来了,并且成为未来的选择的负担。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完全使用的程度,即在生活中所实

---

〔86〕 Heintel/Macho,1985 年,第 66 页。Castells(1996 年,第 452 页及其后页)从"信息时代"的文化中也诊断出同样的通过同步完成所实现的超级加速来超越死亡的尝试(但是却导致了死亡在文化上的迫近),并且也尝试着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达到永生,但是他明确强调,在这个观念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并不存在着相互关系。他忽视了我所认为的重要的连接,即从加速原理中产生了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

〔87〕 对此请参考 Nowotny,1993 年,第 139 页及其后页。

〔88〕 如果有人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还没有开通有线电视的话,那么在那个时候就会错过两个频道;而到今天还有人这么做的话,可能就会错过上百个频道,正是这些频道带来了"扫台式看电视"的加速了的消费习惯。

现的世界的可能性与可以实现的世界的可能性之间的比例关系,与加速的预言相反是在持续减小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疲于奔命地去加快生活的节奏。新时代的使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平衡的策略因而也失败了。由于(选项的)增加速率超过了不可避免的加速的速率,因而无疑使得已经不多的时间资源进一步紧张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进步的毫无意义的无休无止也完全转移到了生活中:(晚期)现代的主体不再能够去追求"老派和生命充实",也不能使得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协调起来,也如同前现代的鲍尔·韦伯(Bauer Weber)不再站在线性的、未来开放的时间中,而是站在以白天与黑夜、夏天与冬天、年轻与年老为循环节奏的循环式的时间中[89],因为被体验的所有的一切,早就被新的和加快的体验的、事件的和经验的可能性所赶超了。因此,这个似是而非的现象的文化的侧面,也被描写为在与此同时的技术加速中缩减着时间资源。[90] 加速的螺旋通过文化的侧面似乎以双倍的速度继续运转。

3. 复杂性的时间化:社会结构引擎

通过这一章的第一节所得出的现代经济的逻辑,并不足以理解在现代性当中和经过现代的过程中,时间结构的变化的社会结构的层面。一眼望去,我对于新时代的加速动力的三个基本引擎(或逻辑)的定义似乎出现了严重的分类错误:当人们将结构上的发展和文化上的发展分开分析并且相互对比的时候,经济上的引擎难道不是结构引擎的一个组成

---

〔89〕"亚拉伯罕或者旧时代的随便那个鲍尔'老派地而且生命充实地'死去了,因为他站在生命的有机循环中,因为在晚上想起度过的白天时,会发现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他的生命不是一个他要去解的谜团,因为生命所提供给他的对他来说'足够'了。但是文化人带着思想、知识和难题,站在文明不断发展的富饶之中,他们会'活得累了',但却不是生命充实。因为他们必须抓住生活……不断重新提供的东西,哪怕只是最微小的部分,并且一直只是暂时的、不是永远有效的,因而死亡对他们来说是无意义的事件。而由于死亡是无意义的,因此文化生活也因为它的无意义的'进步'和死亡一样被打上了无意义的印记"。通过对科学进步的"无意义"的观察,韦伯(1988 年,第 594 页及其后页)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阐述了加速程序的破产是对死亡的回答。

〔90〕当 Balint Balla(1978 年,第 26 页)认为,时间紧张是普遍现象,而并不是与文化相关的现象,因为"在一方面是满足需求、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所需要的时间,另一方面是确实可以支配的时间之间一直有赤字",但是他忽略了,他的观点对加速理论的解释正是显示了时间紧张的根源在所描述的文化模式中。通过以加速为目标的过程当然往往是为了克服时间紧张的问题,使得为了满足现有的需求和愿望所需要的时间能够逐渐与所能支配的时间保持平衡。但是现有的需求以同样的或者更高的速率在增加,因此它当然会恶化时间紧张的问题,尽管需求已经被更快地满足了。

元素吗?因此将社会结构引擎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推动原理是不是错误的?但是仔细审视,会很快清楚,这两个驱动动量一方面是出于社会的主要区别的形式,另一方面是产生于特殊的经济的"操作代码",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可以清晰分解的,(而且在实证上也足以)有区别的加速要素。

社会时间的本质,也就是对时间的感知和结构化,将通过社会结构的形式来确定[91],它是时间社会学的基本假设。[92] 现在所需要讨论的
295 问题是,在第二章.2(2)中所确定的现代社会的中心发展原则的功能上的分化原则,在多大程度上是出自于自身的,也就是说,根据它的自身发展逻辑推动或者迫使社会过程的加速的。这个潜在的动态化的引擎的可分解的独立性显示,可以想象有这样的社会,尽管是功能上的分化的社会,但是它的经济的(次级)系统不是以最大化的资本变现为导向的,而是以例如(本身是速度中性的)满足需求的原则为导向,即不是按照市场资本主义的原则组织的。相反,一个社会也可能尽管是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变现的原则进行生产,但是这个原则并不是首要地发挥功能的,而是例如按层次进行分化的(或者根据经济的、宗教的或者政治的特权)。经济的加速引擎和现在要进行研究的社会结构的加速引擎因此并不能互相简化或者互相演绎。

有关功能上的分化,首先可以理解为所有生产过程和发展过程的速度提高机制,因为功能陌生或系统陌生的观点和障碍都被排除在外了:如果科学发现、技术革新、经济生产等摆脱了"外在的"(例如宗教的或政治的或者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期望的负担的话,它们都能够用大大加快的速度前进。通过这样的加速作用,区分原理首先可以作为对加速要求和时间紧张难题所作出的有成效的反应。对于区分原理而言,在同时有个体部分投入和个体多项投入的不同的功能领域,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即区分原理必须确定按序进行的时间计划,以决定人们在哪些不同的领域(工作、家庭、名誉职位、教堂等)、在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时间节奏和时刻表的开发似乎是功能区分的自然而然的补充。

---

〔91〕 我在这里使用的社会结构的定义来自卢曼或涂尔干所建议的基本的社会的轮廓差异的含义;而不是按照与不平等、社会环境和身份地位有关的社会结构研究中的分析所用的含义。

〔92〕 参照本书第一章"1";也请参照 Bergmann,1983 年,第 476 页及其后页。

但是，现在这种分化形式也会反过来带来时间上的紧张，因为区分原理（这是系统理论的基本假设）会导致极大的复杂程度的提高，并且 296
由于复杂性的增加，如同贝尔格曼在卢曼那里所注意到的，可以被理解为时间紧张的重要源头。“时间紧张的印象产生于世界的复杂性，即可能性的地平线与系统的消化处理能力之间的差异。”[93]（合理化的）选择和可能性的指数级的增长，以及因此所带来的系统的可能性的过量，在这里是无法只依靠系统过程的（线性的）加速来克服的，这只是在前面的一节中所定义的文化难题的系统—结构的层面，而这个文化难题是指，尽管加速仍然面对着“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的不断瓦解，数量增加和加速之间的内在联系必然是现代性的特征。[94] 根据卢曼的观点，更确切地说，是选择决定的多元化和同步化要求迫使复杂性的时间化的出现：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将“推移到”将来，并且要保留未来可能的更新升级的可能；选择项目将沿着投射在未来的时间轴进行安排。“只不过到了未来，在时间维度中的方向将达到一定程度的复杂性，这与当今社会系统的结构的复杂性相一致。”[95]

复杂性的时间化显示的是，通过将决定排列为“一个接一个的顺序，以可能比同时的顺序实现更多的联系”，并且“将选择动作推迟，而当下的未来就像是蓄水池一样，可以存放以后要去做的决定”[96]。但是，复杂性的增加不会在这个当前的现在结束，并且未来的现在将通过从过去推迟而来的选择决定和选择的过量而背负额外的负担。[97] 297

因此，伴随着功能分化所带来的复杂性的增加的后果和复杂性时间化的后果，社会系统（无论是互动体系、组织还是社会体系）也以两种方式处于加速压力之下。正如卢曼所强调的，加速迫力通过这种时间化的系统从自身内部产生了“内在的喧闹的”而且只能是动态的稳定，也就是说，加速迫力处于不能停止的过程中，并且被迫使系统的运行不间断

---

〔93〕 Bergmann，1983 年，第 483 页；参照 Luhmann，1990 年 a，第 131 页及其后页。

〔94〕 有关相互提升的关系也请参考 Luhmann，1980 年，第 251 页及其后页。

〔95〕 Luhmann，1991 年，第 124 页。

〔96〕 Luhmann，1980 年，第 238 页，和 1990 年 a，第 141 页；参照 1996 年，第 76 页及其后页；以及 Nassehi，1993 年，第 199 页及其后页。

〔97〕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一个录像机能够用来推迟决定的技术成就的作用方式的例子：如果有人因为电视节目的选择多样化，而在两个频道之间举棋不定的话，可以最后决定看一个频道，将另一个频道的节目录下来；但是等到下一次“电视会议”的时候，他需要决定的就不只是选择当时的电视节目了，而是额外地还要作出看还是不看所录制的电视节目的决定。复杂性的时间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导致了复杂性的雪崩式的增加。

地与新的、可能实现其他事务的运行连续起来。

> 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是,时间化的系统一定变得快速("急躁"),这个系统一定会增加完整性和(自我观察的)歧视能力……而且是以能够符合速度要求的形式……因而,对于伴有时间化的复杂性的系统而言,再生产一直是长期以来的难题。这个理论(指系统理论——本书作者注)并没有像传统的平衡理论那样涉及在吸收了干扰之后如何回到稳定的平衡位置,而是关于对系统元素的无休止的更新的保证;或者简而言之:不是关于静态的稳定性,而是关于动态的稳定性的。[98]

事实上,在这里系统理论的措辞让人很容易将所表现出的现代的时间难题翻译为时间视角的问题,这在当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在自创而生的完整性中进行区分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相互关联从这个"内部视角"看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每个时间点上都有要去做的决定,要计
298 划在将来的运转,并且要去组织这种没有休止的中转能力。这一类的系统的行为迫力和由此所产生的时间紧张不可避免地转移到行为者的身上,卢曼对此进行了阐述:"一个被这样操控的系统……在它的环境中铺得很开,并且塑造着那里的人和事物,使得它们和这个系统联系在一起,并能够按照它的控制节奏发挥功能。因此……复杂性的时间化是从内到外迁移的,它牵扯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物品的损耗……"[99]这样的延伸过程很容易以一个行为者的例子进行阐释,比如一个人同时是家庭中的父亲、大学教师和市民自发组织的成员,他积极地参加家庭事务的时候,大学和市民自发组织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干扰的"环境,因为它们阻碍了所期望的家庭的"运行速度",而使得家庭系统总是被迫"中场休息"、妨碍家庭系统实现可能性和产生连接能力,甚至直接导致它"停止下来"——如果当这个行为者在其他的(大学的、市民自发组织的)功能联系中操作的时候,就没法邀请姨妈来做客、无法修理儿子的自行车、只能推迟女儿的生日派对了。由于"自创性的"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能够达到和保持"一个对它来说正常的或者仍然在可容忍的界限之内的事件顺序发生的速度"之上的,因此"空余的时间就被消除了……而且纳

---

〔98〕 Luhmann,1996 年,第 79 页。

〔99〕 Luhmann,1980 年,第 225 页;参考 1990 年 b,第 114 页及其后页。

入到按序进行的事件中"[100]，对于这个行为者来说，似乎他在其他的互动关系中度过的每一分钟都被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而不再能用于完成"系统操作"，他是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失去的时间。在系统视角下，连接行为一直是必要而且是所期望的；它通过系统的"空转时间"——行为者在这个时间里做着其他事情，在系统环境中被耽搁了，但往往只是滞后。复杂性的时间化因此产生了卢曼所指出的根本性的行为强迫："体验领域的时间问题变成了行为领域的时间问题，因而时间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催促着人们。它迫使人们保持活跃"，卢曼这样评论，并 299
且引用了卡尔·E. 维克(Karl E. Weick)*的话："'宁可要混乱的活跃，也不要有序的不活跃'……不行动是丢弃时间，那是一段什么都没实现的当下。"[101]

这里所选取的例子从两个系统内部视角中的另一个角度来看，显而易见这个情境恰恰是对称的，如果市民自发组织没有以无休止的顺序不断设计、计划和实现新的活动的话，那么它就处在会从互动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严重的危险中；因而在这里的暂停也是会带来问题的。而相反，当我们的行为者正坐在他的办公室，处理着大量的工作，他在家里或在市民自发组织中度过的时间对他来说，就是"被浪费的"，它们现在是干扰的和碍事的环境。实际上，他必须确定，即便是他的大学的工作也要分成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也是建立在相似的"放入事件链条之中"的基础上的，并且也显示出由于时间紧张所导致的无休止的复杂性的增长的特征：当他站在研讨课上的时候，似乎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不能把课程准备得更好一些、为什么不能更仔细地阅读所研讨的文章、更周到地准备教学大纲、幻灯片做得更整洁一些。而他正在写作的图书，假设就是《社会加速的理论》，现在对他而言也是构成干扰的，因为影响了需要大量时间的"研讨课世界"。相反，当研讨课结束，而他所领导的有关公民责任主题的研究项目的项目会议开始了，他的时间视角就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什么他没有从昨天就开始阅读这些访谈、没有写新的手册、没有给生病的项目成员打电话？当他最终又坐在他要写的书的前面时，可能需

---

[100] Luhmann, 1990 年 b，第 117 页和第 126 页。

* 卡尔·E. 维克(1936—)，美国组织学理论家。主要著作有《组织社会心理学》《组织意识》等。——译者注

[101] Luhmann，1980 年，第 279 页及其后页。

300 要他真正忘记现在起干扰作用的环境……[102]

但是,在内生的、内部系统所产生的加速的压力之外,在功能分化的社会的结构条件基础上,也会出现其他的系统外源的加速要素,它使得加速似乎成为这样的系统中的"合理的时间体验方式"。[103] 正如卢曼所不厌其烦地强调的,未来提供所描述的方式作为期望的地平线发挥作用,从而克服可能性的过量并且推迟对选择所要作出的决定。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现在正趋向于使得期望的地平线本身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因此未来似乎变得"越来越短"了。这是在相应的系统环境中的每个其他的社会系统的过程的内生性的速度加快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简言之,所有发挥功能的社会子系统相互刺激和沟
301 通(作为在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真正的系统操作——本书作者注),从而挑起了更多的沟通",让·塞巴斯蒂安·盖伊(Jean Sebastien Guy)概括了这种自我增进的相互作用。[104] 他认为,功能分化增强了社会变化的加速,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系统操作都将其他的系统看做是另外的环境事件。有鉴于此,在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的环境中,社会系统被迫

---

[102] 系统的内部视角的时间紧张向行为者的行为的转移,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完全需要足够的先决条件,因为意识系统或者"心理"体系——根据系统理论首先是通过自我问责和外部问责而形成的人格面具,与社会系统中的交际活动没有有效的联系。在社会系统的时间的紧张,只是间接地意味着,对于个体的行为者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转移机制如何能够按照系统理论那样重构呢?阿明·纳瑟黑指出了其中的路线。在他的《社会的时间》(*Zeit der Gesellschaft*)(Nassehi,1993 年,第 175 页)一书中,纳瑟黑首先指出,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连接最终表现为时间上的连接,但是只是在时间上的特性方面,也就是说,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在同时性的模式下运行,当前者适应于社会的环境的时候,而且也只是在它适应于社会的环境的期间,即一定程度的"锁合上了"("结构关联的系统最终只有通过系统和环境的相互的同时性,才能相互接近,但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带来选择性和相互之间的连接")。但是,由于心理系统在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再次"打开锁合的状态",或者说追求其他的选择性和相互间的连接,因此这种时间上的关联的形式并不足以在个体身上产生功能分化的加速效果。个体的系统历史和社会的系统历史之间的协调和同步化不可避免地首先建立在相互间对于对方来说都是功能上的必要之物的基础上。因而纳瑟黑指出,这只有在过程结构的帮助下才能发生,也就是使行为过程和事件链条是可以预期的,并且在这里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在时间上是相互连接的。"过程结构能够通过将个体作为沟通的接收者,从而实现社会和意识的同步化……不仅在社会的维度上,而且在时间的维度上,意识都是作为人而存在的,也就是人们通过对沟通的体验不仅知道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而且也知道是在什么时间发生"(同上书,第 353 页及其后页,注释 111)。特别是在系统操作的执行依赖于具体的人用什么方式决定行为的地方,作为通过复杂性的时间化而带来的系统的时间短缺的结果,系统操作就会处于时间压力之下。

[103] Rammstedt,1975 年,第 50 页和第 55 页及其后页;也请参照 Nassehi,1993 年,第 194 页及其后页和第 376 页及其后页。

[104] Guy,2002 年,第 4 页。

将它的期望的地平线（和与之相应的过去向回所投射到的经验的地平线）修改为越来越短的时间间距，并且不断地表现出提高它的同步化的努力。对应做的决定的推迟也因而会变得越来越有风险："现在的时间位置不能为任何其他的时间位置做担保，因为社会结构本身已经开始视情况而定了。早先社会的稳固的社会结构通过期望的联系使得未来的当下相对能够不令人失望地被接受，因为它大致是按照传统的延续构建的……与之相反，在现代社会的自我描述必须不断发生改变。人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期待，结构所给定的预期往往是不可预测的。"[105] 这再一次显示了，在第五章的"现象学"所描述的"滑动的斜坡"的经历和现在的萎缩以及必然的加速的社会变化的假设之间只有系统—结构的联系。[106]（从某一个系统出发所观察的）系统环境的快速意味着选择基础和期望的地平线的加速改变，并且因此"从外部"迫使功能分化的系统提高运转的速度。

继续我们的例子，用于处理项目的时间、用于对市民自发组织作出反应的时间和所面对的家庭任务的完成期限看上去都在缩短；相应的行为染上了不能推迟的特性，否则就会作废。在社会的子系统层面，例如 302
政治和立法以及教育系统都同样地处在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保持步调一致的压力之下（反过来也一样），与此同时，在组织层面上，例如企业对于易变的金融市场的指导路线不仅要被迫作出反应，而且也要被迫接受它。[107]

由于系统内生和系统外源的两方面的原因，社会系统的时间是短缺的，并且运行加速是再生产的要求，由此高度发展的功能分化也呈现出

---

[105] Nassehi，1993 年，第 376 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第 332 页及其后页；Luhmann，1980 年，第 296 页及其后页。

[106] 卢曼自己也一直指出缩短的现在是不断加强的复杂性的时间化的后果。参照，Luhmann，1980 年，第 296、261 页和第 242 页及其后页；或者 1990 年 a，第 119 页及其后页；也请参照 Nassehi，1993 年，第 342 页及其后页。

[107] 卢曼自己对功能分化所带来的这种（双重的）加速效应并不怀疑（参照 Luhmann，1980 年，第 239、288 页或者第 296 页，或者 Luhmann，1990 年 a），但是他认为与之相联系的（并且被他自己所证明的）对"现在的速度提高、现在的缩短……永恒不变的也变成可变的了等"的感觉是过时了的语义所带来的结果，这个语义最终是与不合时宜的时间的变动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它不再能够适应今天的结构复杂性了。但是，他也并没有因此指出，应该如何用其他的概念恰当地描述这些现象（Luhmann，1980 年，第 296 页）。卢曼猜测，"大量的紧张和匆忙"因此可能只是"结构和语义之间的不对称的关系所带来的结果"（同上出处），这个猜测在他自己的复杂性的时间化的理论背景下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按照他的理论，时间的紧张是功能分化的系统的运行方式上的必然结果。

既是"自然而然的"又是重大的后果,即尤其是在组织的层面和互动关系的层面,那些系统都越来越强烈地倾向于打破它们的由社会定义的"时间窗口",并且要求所有过程持续地进行。对于"顺序的确定"的要求和消除空转时间的要求,一方面导致集体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节奏的消失并有利于"没有停息的社会"的稳固[108],在这样的系统化的过程中,趋势继续朝向全天候的运转:在因特网上,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继续进行生产、完成金融交易、订购继续教育产品等等,因而万维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一切都随处同时发生。即便如此在网络那里也展现出了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趋势:要求所有的可使用的时间、运行时间和存取时间是持续
304 不间断的,这与延长诸如生产时间和开放时间、能够在很多不同的时间去做礼拜、在周末也可以开工作例会、体育赛事也是在工作日的每一天都有、消除不播广告的电视时间一样,体现了时间上的去差别化的过程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强大作用。

同时,发展系统程序的持续运行为个体的行为者所带来的后果是,社会系统或者说组织和机构变得"贪得无厌"(科塞*)[109]:它们不再满

---

[108] 参照诸如 Adam/Geißler/Held,1998 年。

* 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1913—2003),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研究》《贪婪的制度》《理念人》等。——译者注

[109] 对此请参照刘易斯·科塞(Coser,1974 年)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贪婪的制度》(*Gieriger Institutionen*)。科塞从中得出,建立在"完全收进"原则基础上的清晰的功能分化对抗是"贪婪的制度"。与"贪婪的"收进所带来的可能的自治权丢失的结果相反,功能分化提供了被包含进入其中的多个相互间重叠的组织的保护(同上书,第 21 页)。科塞指出,这种多重联系阻碍了组织对于个体资源的全部利用的要求,因为它涉及对于相互冲突的要求的有集体约束力的规范性的和法律性的规定和限制,而且因此允许一个相对没有冲突的"有序的包含其中"。"因此……雇主可以合法地拥有个体的时间的数量被规范性地,甚至合法地确立了;在这个时间里,个体不能从事他的家庭事务或者其他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类似地,民主社会限制了可以宣称合法占有公民的领域……现代的非极权社会可以典型地形容为……通过结构化的安排竞争对个体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这里,个体远不再是被完全卷入某个特别的子系统中的了,事实上他们是部分地参与到不同的社会圈子里,没有人可以要求专有的忠诚……他们与多元化的角色—伙伴的多方面的参与……并不应该是陷入了不能解决的进退两难中……只要……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满足于他们整个人……都只有一部分被控制的话。这里所发生的少许的变化就是,一个社会的部分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安排同时发生的事务间的优先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少会考虑到个体所关心的"(Coser,1974 年,第 2 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在 21 世纪开始的时候,正如这条假设所指出的,"分部分"区分的组织自身变得"贪婪",并且在去边界化过程和主体化过程中从空间上和时间上超越了它的(特定的时间、空间和资源方面的)获取限制;本应该遵守的规范性和法律性限制也陷入被腐蚀的过程中,正如将要进一步阐述的,这可能会为个体的(和集体的)自治能力带来重大的影响。个体感觉到自己不再是面对一个"贪婪的"组织,而是同时面对多个(有关这个趋势 Bennis/Slater 也有论述,1968 年)。

足于社会分配给它们的时间窗口，而是不断地要求主体的未被分割的注 304
意力和全部的资源。因为从那些系统或者互动关系的内部视角来看，所有其他的行为只是干扰性的延迟和可以消灭的空转时间，因而高度时间化的系统对个体的抓取从趋势上来看是全部的。后者因此一直被迫保护他们对自己的时间预算的要求，因此用卢曼的话来说，他们在社会要求的磁场中移动着。[110] 组织和机构通过这种方式变得“贪婪”，而且似乎提出了对“所有的”时间的要求，因而，在经济的和文化的解释之外，这就是有关为什么人们在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如此普遍地感觉到“总是疲于奔命的”和对于任何活动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可支配的第三个决定性的原因。尽管，一位行为者打算将一天中的 24 小时都投入到一个功能领域中，但是他的时间资源对于完成系统所产生的任务来说也是不够的：总会不断出现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尽管完全不必要，但是往往又是不可推迟的，因而它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放弃其他那些没有正在做的行为领域的活动的愿望。[111]

即便在那些主体很努力地将不同的互动联系和他所参与的行为相互平衡起来的地方，作为系统的运行时间在时间上的“去边界化”的结果，主体也被迫在他们所参与的那些行为中“去除”他们自己的时间周期和时间节奏的“边界”：正如我在这一章的第一节中所尝试阐述的，从趋势上来看，工作永远不会停止，人们会带着它回家，并且在周末也继续工作，为此将家庭的需要“插入到”在工作时间“当中”，类似的趋势也同 305
样适用于市民自发组织。鉴于从每个系统视角来看都是“滑动的斜坡”，因而在每个单独的功能领域的义务都不再能约定期限。霍宁*、阿伦斯（Ahrens）和格哈德（Gerhard）在他们有关晚期现代的时间和生活方式的研究中分析了大量的时间预算的研究[112]，他们指出，未来的时间模式是灵活的“赌徒”那样的人的时间模式，他们会根据现有的情境决定，他们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做多久，这是晚期现代的工作、休闲和“生活”

---

[110] 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家庭的（合法的）要求必须为工作和市民自发组织作出让步、工作上的（合法的）要求必须向有利于家庭或者名誉职位上的投入作出退让；鉴于继续在市民自发组织中存在的要求，职业上和家庭中的过高要求也要对此加以考虑。

[111] 参照 Bennis/Slater，1968 年，第 93 页。

* 卡尔·霍宁（Karl H. Hörning）（1938—），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实践与美学》《时代先锋：弹性工作时间和新的生活方式》和《间接现代化》等。——译者注

[112] Hörning、Ahrens 和 Gerhard，1997 年；也请参考例如 Garhammer，1999 年，第 157 页及其后页，第 411 页及其后页和第 463 页及其后页；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286 页及其后页；或者 Benthaus-Apel，1995 年；也包括 Sennett，1998 年；Eriksen，2001 年。

的"去边界化"的社会结构的基础,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对个体的时间主权提出了要求,并且使之成为可能。因而考勤钟变成旧古董的原因,不只在于晚期资本主义所提出的生产要求,而是由于它在晚期现代已经完全不胜任作为排列顺序的工具了。但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这里所展现的只是指向未来的趋势;而完全不能说,当今社会的时间秩序已经被它大面积地席卷了。需要捍卫的观点只是,功能分化的逻辑必然导致不能停止的复杂性的增加,并且因此与社会进程链的加速联系起来,尤其是导致社会变化的加速和逐渐推向时间差别的取消。后者作为辩证的加速运动的一部分,体现了现代性的特征:功能领域在空间上的和时间上的分化,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的现代使得社会过程进入闻所未闻的加速当中,而到了晚期现代,它却是继续的系统加速或者说是持续前进的不断增强的阻力,并且以这种方式处于被侵蚀的压力之下。[113]

由此所产生的在主体的身份确定模式和自我关系中的变化,是在第
306 十一章讨论的问题。这里可以确定的是,严格的小时计划、日常安排、年度计划和一生的规划,都结构性地属于过去;由于功能高度分化的系统中的时间边界的去除,现在在那些系统过程的持续依赖于个体行为者的投入的地方、在那些作为角色的承担者的主体在不断前进的运行中不再能相互替代了的地方,都不再会保留这些计划了。因此,正如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所作出的结论,作为时间安排工具的精密的时间管理和精确的计划,都证明已经不再胜任而且是不合时宜的了:它们曾经(并且现在也)只有在那些功能分化还没有导致时间(和空间的)去差别化的地方是适宜的,并且现在在理性状态下,被对出自不同的功能领域的各项要求之间的(与数字计算机的程序相似的)微小时间段进行灵活管理的时间管理所替代,这种时间管理是为不停息的运行所构建的。我们再一次回到前面所列举的例子里:那位热心市民事务的大学教师和家庭中的父亲以不规则的顺序和间隔,不断地变换着家庭、大学和市民自发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不再能够独立于所面对的任务在家庭、大学和市民自发组织之间分配确定的时间(也不能借此摆脱其他领域的要求的负担),而是变为在此时此刻自己安排顺序,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与诸如

---

[113] 有关具有辩证的形成和侵蚀特点的现代的制度模式在加速力量发展过程中的模式请参考本书的第九章,尤其是表 *9-1*。

纳瑟黑或者萨德博斯*一样，都一致性地将这种现象称为时间的时间化。“可以确定的是，巨大的变化潜力带来很多问题。与过去的差异如同与未来的差异一样都已经变得越来越琐碎了。由于‘时间是不断变化着的’，因此必须每次重新确定一段时期里的方向并且说明理由。任何恒定性、连续性和持久的状态都必须费力地生成出来。当我们仍然在确定中期待，那么期望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此时此刻的时间才是可支配的。”[114]

307

因而，在第六章中所提到的时间预算研究中所观察到的晚期现代时间实践活动的碎片化和“多任务执行”的趋势，似乎表明了“过时了的”社会的功能分化的结构性后果；它们是从它们当中所产生的“确定顺序”或者是过程链持续运行的系统要求所带来的结果。现代技术，如电子邮件系统使得持续的系统运行的新的精度等级和在不同功能领域里的微小时间振荡的新的精确度成为可能，但是现代技术并不是新的精度等级的原因。

在社会系统的层面上，因此出现了关于保持它的同步化的能力，或者说关于可能的不同步表现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问题：如果以下猜想是对的，即功能分化的系统由于内在的原因已经倾向于加速它的过程链，那么显而易见就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由于不同的系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加速过程链，由于系统的“原时”允许不同的速度，因此当较慢的子系统努力与它所在的环境中的变化保持步调一致的话，就可能会产生对于整个系统来说功能失调的结果并撞上它自己的加速的极限。我将在第十二章将可观察到的晚期现代社会的政治上的自我控制丧失作为这一类的社会子系统之间的不同步化的结果加以讨论，社会子系统间的不同步尤其产生于经济—科学—技术上的革新速率与政治上的处理能力之间的不成比例。[115]

总的来说，在这里可以确定，在第七章所得出的自我推动的加速循环的逻辑之外，进一步寻找现代加速动力的原因，可以找到三个似乎是

---

* 麦克·萨德博斯（Mike Sandbothe）（1961—），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的时间化》等。——译者注

[114] Hörning、Ahrens 和 Gerhard，1997 年，第 168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也请参考第 179 页；Nassehi，1993 年；Sandbothe，1997 年，1998 年；也请参考卢曼的“时间化”的概念（Luhmann，1997 年，第 2 卷，第 997 页及其后页）。

[115] 有关功能分化和政治（框架）控制要求对于现代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安排是同样重要的这个假设，相比卢曼的观点，我更倾向于 Schimank（2000 年，请特别参考第 274 页及其后页）的。

308 “外部的”驱动引擎,它们在一定前提下共同对现代所产生的补充作用,可以解释增长和加速之间的基本的提升关系。这种关系因此在结构上表现为复杂性增加和复杂性时间化;在文化上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结果,在这种世界观中,加速是平衡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从而带来尘世的永恒
309 替代物的策略;而在经济上则表现为资本变现逻辑的结果(参考图 *8-1*)。这三个加速原则中的每一个在相应的加速领域中都是作为首要的引擎,尽管根据加速循环的作用方式,每个“引擎”自然往往是共同推动加速螺旋的:经济方面的逻辑对于技术加速而言是首要的加速器;文化方面的增长逻辑推动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功能分化的结构原理以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方式加速着社会变化。在原因分析的最后一部分将探寻制度方面的条件,它们使得增长关系和加速关系的发展在历史上成为可能
310 并且承受着这样的发展。

第九章　权力、战争和速度：作为机制的核心加速器的国家和军队

在前面的章节里所明确的增长和加速之间的动态的连接和辩证的发展，是这项研究的核心论点，描述了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和现代化的逻辑，毫无疑问也可以在新时代所形成的领土所有权国家和为这些主权国家服务的军队中找到它们的影子。社会加速的大量的制度上的背景条件和数不胜数的物质层面的加速革新，如果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机制和发起以及军队的机制和发起是不可能的，或者甚至必须直接将前者列在后者的名下。诸如维希留、绍伊尔曼、堤利*或艾伯林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政治学方向研究社会加速这个题目，而安东尼·吉登斯和赫尔弗里德·默克勒也都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1]，国家和军队是历史上非常强有力的、基本的加速要素，它们对现代的增长动力的产生和相应的时间实践的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接生术式的”作用。正如我将要指出的，国家和军队固然似乎在其他的相互关系中已经分担了“传递的现代”的那些机制的各自的命运，这些机制在晚期现代又遭到了由它们自身所释放的加速要素的侵蚀，这是因为它们的作用方式就是通过它们自身的稳定性，将加速器变成了制动器，或者速度阻碍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现代的领土所有权国家的进程中，传统国家的社会静态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被动态性所代替，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2] 与此同时，在新时代的领土国家中，社会过程和社会变化的加

---

* 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1929—2008），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集体暴力的政治》《竞争动力学》等。——译者注

〔1〕 请特别参考 Virilio，1980 年；Scheuerman，2003 年和 2004 年；Tilly，1990 年；Eberling，1996 年；Giddens，1987 年 b，1995 年 b 和 1995 年 a，第 182 页及其后页；以及 Münkler，2006 年。

〔2〕 参考 Giddens，1995 年 b，第 75 页及其后页。

311 速尤其是行为条件相统一的结果。采用同样的国家语言、货币、时区、教育体系、法律规范、管理系统、纳税义务、基础设施和中央的控制组织,都首先通过由此产生的对国家内部的转换障碍和交易障碍的拆除,而成为重要的发展加速器和流通加速器。通过系统地建设基础设施和确立法律保障及行为保障,并且也通过管理的(和控制的)垄断的确立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可信赖的不受外来侵犯的保护,民族国家创造了长期的可计划性和可预测性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正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工业加速得以系统的发展成为可能。[3]

与此同时,现代的法律与传统的惯例法或者静态的自然法构想不同,它能够对变化的需求作出动态的适应[4],这一点正如从中所产生的政治的民主制度相比传统的君主政体要更有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一样。同时,现代国家在它的科层式的管理体系中创造了高效率的决策工具和执行工具,它们凭借快速性和可靠性,特别是在获得和使用(尤其是税收)资源和信息方面远远超越了所有的老式的系统。[5]在法律规定的帮
312 助下,成功的现代领土主权国家通过国家的和科层式的规章制度和对社会过程的政治上的控制而实现了技术—经济的和社会的加速的无与伦比的发展。

欧洲国家为了进行领土的扩张而进行的竞争和对更远的殖民地的征服及开拓,首先都长时间地表现为运输方式和通讯方式的技术加速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国家被迫大规模地投资于军事方面和民用方面的运输和通讯计划,以便在对资源、销售市场和领土的竞赛中不至于落后。[6]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是中央国家的加速程序,它不是被别的事物所驱动,而正是被政治方面的对积蓄权力的追求所推动着

---

〔3〕 对此请参考第三章"4"。

〔4〕 我在这一点上完全同意 Scheuerman(2003 年,第 43 页)对我的思考的补充说明。

〔5〕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Weber,1972 年,第 562 页)已经夸赞现代的科层制度是最快的、效率最高的而且因此是必要的管理方式。"在传统模型中,行政行为是……有效地节省时间的国家,因为它使得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深思熟虑的需求最小化。行政官员不需要进行雄心勃勃的辩论,或者担心政策目标是否会被赞同,因为已经有人为他们做了这些了。理论上他们除了使用已有的规则之外不用再额外做什么了,并且像'机器人'一样只需要对任何特殊的事件恰当地'泼出决议',并通过'机械地朗读手头的已经编成法典的段落作为解释'",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3 年,第 45 页及其后页)在对科层式的决策过程的时间效率的探讨中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6〕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照 Held,特别是 1999 年,第 39 页及其后页和第 58 页及其后页;Münkler,2006 年,第四章,第 21 页及其后页;以及 Virilio,1998 年 b,第 22 页及其后页。

的，并且在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合约》*（*Westfälischer Friede*）所产生的系统中形成具有竞争力的领土主权国家。

统治和速度自然不是在现代才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如维希留所努力论述的，政治权力最终就是加速力量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占有优势的速度而使得对空间的统治成为可能，因而对于统治也一直都意味着通过使用加速策略和减速策略而实现对速度的控制和对灵活性的控制。[7] 而这条最终跨越了历史的原理，现在在由它所形成的新时代中却赢得了新的含义，因为政治的“时间—空间—距离”或者说空间时间的距离大小（吉登斯）[8] 的形式和范围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选取直接在场的空间上的和时间上的界限的能力发生了改变。绍伊尔曼中肯地强调：

313

> 现代的民族国家战胜了一系列与之相竞争的政治组织（帝国、城邦国家、城邦国家的松散联盟）的形式，部分是因为它们对速度的更好的控制。对于在危险的国际环境中获得政治上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是对加以控制的领地和人口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早已构成社会加速的主要根源。高速科技和社会组织的形式是在争夺领土和人口的战斗中不可或缺的工具。[9]

这些也完全地体现在军事层面：对空间的统治的目标并不只是对战略上重要的位置的占领和控制，而是要在军事上和行政上对所获得的领地进行统治，借此民族国家寻求获得和捍卫权力垄断。为了防守与为了进攻而发动战争的方式和进行战争准备的方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已经不再是为了建立或者包围难以攻克的要塞了，而是通过

---

*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Peace of Westphalia*）是指于1648年10月24日分别在神圣罗马帝国明斯特市和奥斯纳布吕克市签订的一系列和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签约方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法兰西王国、瑞典帝国、荷兰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帝国自由城市。和约由《明斯特和约》（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以及各自盟友）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和瑞典帝国以及各自盟友）的两部分构成。象征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结束，政治学者一般将该条约的签订视为“民族国家的开始”。——译者注

〔7〕 “速度一直都是猎犬和武士的优势和特权。赛跑和追逐是所有竞赛的核心。因而，在不同社会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用来掌握土地、获得领地以及用来掌握最好的观察工具以便去保护和防御的不同层级的速度。不动产直接或间接地与它的渗透能力联系在一起……”（Virilio，1998年b，第24页）。有关移动力量请参见 Virilio/Lothringer，1984年，第57页，以及 Breuer，1988年，第316页及其后页；进一步请参考 Eberling，1996年，第59页及其后页。关于在战争中的加速与减速之间的“辩证关系”请参考 Münkler，2006年。

〔8〕 参照诸如 Giddens，1995年b，第28页及其后页和第83页及其后页。

〔9〕 Scheuerman，2003年，第43页。

动态—灵活的方式使得在任意的位置都能战略性地抵达或者保护空间,而这是以密集的基础设施和移动的军事单位为前提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实力和移动力量的新的形式,最早是维希留在17世纪末期在英国出现的"*存在舰队*"的发展中发现的:

> "存在舰队"是一种后勤战略,即一门完成不可见的物体的移动的艺术,它一直在海上保留有一支不可见的海军,这支海军部队能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让敌人感到意外,从而通过创造在全球领域的不安全性而消灭敌人的作战意志……这是有关权力的一个全新的概念,这样的权力不再是通过直接的冲突和流血而产生,而是通过对军人数量的不对等的占有、通过对能够获得某些特定的要
314 素的移动的数量的评估,并且因此也是通过对它们的动态的作用的持续证明而生成的。[10]

快速的原则和在几乎全部领土上出现的这条军事原则,在20世纪通过可能"覆盖所有地区的"空军的发展而能运用到更广阔的空间当中了,并且可能在洲际导弹的生产中达到了它的逻辑上的和后勤上的终点,因为洲际导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从地球上的任意一点到达另一点。[11]

相互竞争的和扩张的领土主权国家的权力积累的逻辑,与此同时也作为关键要素对社会加速发挥影响,它不仅是狭义上的通过新的军事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发展而产生影响,也在于通过作为经济上的和"人力资源"、科学—技术的进步、行政控制和通讯即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的补充迫力而影响了社会加速。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竞争因而在社会的所有领域推动了现代的加速,直至最终实现了几乎"完全动员",在这一点上艾伯林与荣格(Jünger)、斯劳特戴克*达成高度的共鸣,他指出:"'完全动员'席卷一切,'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遍布整个地球。在持续的军事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的压力下,科学、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都运转得更快、更没有摩擦力。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的矛盾分

---

〔10〕 Virilio,1980年,第52页。

〔11〕 参照Virilio,1980年,第177页及其后页。

* 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1947—),德国哲学家。主要作品有《来自空中的恐怖》《对愤世嫉俗的理性的批判》《欧元主义:对政治动力学的批判》。——译者注

解了所有运动的加速，所有力量的完全的绷紧不能容忍任何怀疑。"[12]

在政治和战争中的速度的特权完全不是现代所独有的，与此同时，在增长和加速的动态辩证关系以现代战争的工业化、经济的资本化和管 315
理的科层化的形式发展的民族国家的背景下，速度特权也拥有了在文化上和结构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的新的特征。[13]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前面已经提及的从绍伊尔曼到吉登斯、从堤利到维希留的研究。但是，在这里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涉及，鉴于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民族国家的机制和军队的机制在21世纪伊始的全球化关系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们是否应该被看做是加速的根本的驱动力量，或者至少是作为结构方面重要的共同推动力量，因而使民族国家的机制和军队的机制在作用逻辑层面最终也登上与前面所确定的社会加速的三个外在的引擎所处的层面中，这一点正如在威廉姆·绍伊尔曼对我的构想的批判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4]或者它们在这里所开发的"助产术的假设"的意义里，是否可以被当做新时代的、涉及增长和加速的三重联系的、在它们自己与"经典的现代"机制的全体之间的动态化的助产医师，而"经典的现代"的机制的全体在晚期现代通过由它自身所发挥的加速力量而面临着被侵蚀的危险？正如我已经阐明的，我支持后一种观点。我将在下面的内容中首先讨论这个观点在军事方面的合理性，之后是在民族国家方面的。

在现代所形成的军事方面的特征，由于它对组织权力的不断增加的需求，也就是说首先要求快速地获得信息、政治—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资及人员的补给，而在社会变化的加速中扮演着不仅是不能被忽略的角色[15]，而且在社会加速的过程和另外两个层面的加速中，即技术加速和 316
生活节奏的提高过程中，直接占有关键的地位。也就是说，一方面，陆地、空中和海洋支援的武器系统方面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如同运输技术方面和通讯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一样，都无可争议的是快速的技

---

〔12〕 Eberling，1996年，第62页；参照 Virilio，1980年；Sloterdijk，1989年，第21页及其后页。有关战争本身对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的部分的加速作用、部分的延迟作用的详细内容请参考 Münkler，2006年，第二章。

〔13〕 有关军事、实行严格的行政监控的国家、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联系请参考 Giddens，1995年b，第75页及其后页。有关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不可简化原则（反过来亦然）请参见同上书，第83页及其后页；以及详细内容请参考 Giddens，1995年a，第182页及其后页。

〔14〕 Scheuerman，2003年。

〔15〕 参照 Münkler，2006年，第5页及其后页。

术进步先锋。因而,例如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Ludendorff)*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就可以理解为移动性强的法国的货车战胜了德国缓慢的火车;而23年之后却相反[16],迅捷的德国坦克构成了对法国的"闪电战"和"闪电胜利"的前提条件。同样喷气式飞机和火箭推进器的发明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技术方面的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即便是作为晚期现代根本的加速器的因特网,它的产生也要归结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

另一方面,在现代的市民人群及大众人群的背景下和可能是在学校之外的重要的教育机构的普通兵役制的背景下,兵营的机制在米歇尔·福柯看来就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心的纪律社会。[17] 在这个纪律社会中,新时代的时间纪律被或多或少地有力地"写进"了人们的身体里。至少,人口中的男性部分在兵营中对所有的自然节律免疫了,并且被那些忽视个体差异和主观的"原时"的新形式的纪律带来了最外在的完全"染成了蓝色"的结果,具有了将冲动和情绪化的反应置于形式的—抽象的时间管理和统治制度之下的能力。同时,身体的"移动力量"也通过身体的加速同样提高到了强行军和冲锋的速度,而且在时间的"一体化"中,大量的士兵(例如步伐一致地)被统一为精密的"军事机器"了。

因而,在绝对的时间管理远未在工业革命中普及之前,军队已经是
317 现代的绝对时间制度发展的理想的地方了。[18] 由此,通过严格的分层级的命令链和服从链条的指挥原则以及通过由于果断地删除不携带信息的通讯组成部分而带来的信息传递的加速,确实产生了行动和互动顺序的加速。最终,军队在生活的时间化中也是重要的有关当局,因为它将在军事化的职业生涯的形式中的、以时间为基础的可能的升迁模式投射到了(职业)士兵的生活中,因而加速的观点就成了他们有关未来的观点中准自然的组成部分了。与此同时,在技术加速之外,现代生活节

---

* 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是德国的著名将军,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重要主将。——译者注

[16] 参照 Eberling, 1996年,第61页。

[17] 参照特别是 Foucault,1977年。

[18] 实际上,从16世纪晚期以来,从荷兰推广开来的极为精细地将军队中的行为切割为单独的小部分的做法抢在了泰勒主义的加速概念之前。吉登斯(Giddens,1986年,第148页)指出,诸如莫里茨·冯·奥瑞尼(Moritz von Oranien)将操作滑膛枪分为43个单独的步骤,而使用长矛也被分解为23个单独的动作。McNeill(1982年,第130页)也强调,通过17世纪的新的军事训练形式,每个动作能够实现新的精确度和速度(对此也请参考 Scheuerman,2003年,第44页及其后页)。

奏的加快也完全是重要的军事方面的成就。

但是，军队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21世纪又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最新的情况。在这里，毫无疑问体现为士兵的训练的形式的军队的纪律不再为，或者在任何情况下不再能大量地为生活节奏的加快作出贡献了。可能的情况是，许多新兵同样因为被迫的等待时段和什么都没做的时段以及迟钝的单一任务，而将他们的服兵役时间体验为减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每个时间单位中的行为事件和经历事件的密度相对于所习惯的日常生活中的密度没有提高而是降低了。正如在对晚期现代的工作世界的时间管理的变化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的，加速作用在今天更多的是通过个人化而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完全利用个人的特点、节奏和原时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标准化和行为及移动的保持同步调实现的。因为在军队中产生的等级化的命令链是没有效率的了，这意 318
味着，这种命令链条在面对革新、弹性化、生产率的提高和对快速变化的要求的适应时太慢了，因此军队的指挥原理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尤其是在经济和管理领域，不断地被扁平的等级、团队作业和个人责任的提高而代替了。最后，军队由于它的作为“经典的现代”的机制的、线性的职业生涯模式，它的组织原则在晚期现代的时间的时间化的过程中，也明显显得不合时宜了。着眼于长期发展的职业规划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时代中失去了它的意义和导向力量；正如我们马上就要论述的，除了军队之外也只还有在国家的科层体系中能找到这样的职业生涯了，它们同样都可以看做是时代错乱的。[19] 因而，军队机构不再被期待会对于晚期现代的生活产生显著的加速作用。

那么，这对运输、通讯和生产的加速有什么影响呢？正如我已经作出的解释，保卫和可能夺取的所包围的领地的地理战略的逻辑，随着原子能远程火箭的开发在冷战的最高点上到达了它的决定性的界限。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几分钟之内——尽管不是几秒钟之内——就能到达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时候，建立在对要去保护的领地和（可能）要去

---

[19] “‘职业生涯’被看做是一个……标明了在前进中的一系列阶段并且伴有较为清晰的进入条件和入场规则的轨道……无论微软的员工或者它的无数的观察者及效仿者的员工怎样，经理人全部关心的都应该是更能适应潮流的松散的组织形式，以及商业组织被越来越多地看做为永无定论地、持续地努力在这个被感知为多样的、发展的和快速变动的……妨碍长期的结构当中，并且明确地妨碍将固有的预期寿命和工作—生涯通常的长度相提并论的结构世界里，建成一个具有更好的适应性的岛屿。在这些条件下，‘职业生涯’的理念才似乎模糊地、完全地产生出来”，齐格蒙·鲍曼（Zygmunt，2000年，第116页及其后页）借鉴了Nigel Thrift的观点并且这样阐述；也请参考Sennett，1998年；以及本书第八章“1”所讨论的文献。

占领的领地也就是前线和后方进行基本的区分基础上,即前线和后方的、有士兵和平民以及有近和远的基本区分的地理战略的军事计划就失
319 去了它的意义。“作为运动战的最后的形式的技术的爆发……导致所有相互分离而且也是有差异的事物的溶解,而这种不再有差别对我们而言是与政治上的失明等量齐观的。”[20] 正如维希留一再强调的,凭借这些武器所面临的毁灭是快速而且彻底的,它们埋葬了理性的政治决策的可能性,因为在生存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没有时间按照在政治模式中的决策程序作出合理的决定了,也就是说,不再按照普遍的建议和权衡方式了。因此,如同维希留的理论所言,在 20 世纪后半叶,军事方面的可能性最终被迫在‘例外的国家’的存在期限内存在,这样的国家仍然在军事上能控制的加速可能性的界限之内。[21] “达到完美无缺的高度的技术如此理性、如此快速,并且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们所带来的结果是不理性的,并且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是功能失调的。”[22]

因此,在 20 世纪末期的“完全的速度战争”是如此快速和毁灭性的,以至于由于在惩罚的同时肯定会带来自身的毁灭,这样的战争不再可行,因而在向 21 世纪过渡的过程中,突然开发出新的,同时也是旧的战争形式,它从很多角度来看都是借助武器和战略的帮助,并且以前现代或早期现代的时代的速度进行的:在世界上的很多区域,在战争中再一次使用常规武器、枪炮,甚至有的时候用上了弯刀和大刀,并且战士常常不再根据大面积占领所包围的领土的现代军事逻辑进行进攻,而是按照恐怖主义的或者游击队的逐点攻击和快速撤退的战略。[23]

尽管如此,在这种被上文标志为跨域历史的新的战争中,在战斗中选择性的加速和减速的能力仍然是值得奖励的,并且战争中的“速度酬
320 金”必然持久存在,因此,经典的现代的军事方面的机制正是从加速技术的角度来看,失去了它的开路先锋的角色:民族国家的军队“机器”正是通过它的占有优势的速度,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如此成功的,但是面对这个既新又旧的战斗类型,它几乎是无力的,它在面对根据游击战战术行动的敌人时过于缓慢、过于呆滞,也过于慢腾腾了,并且进入了一个不再有地理战略的边界的世界。由于经典的现代的军队的发动机制,

---

〔20〕 Virilio,1980 年,第 187 页。

〔21〕 同上书,第 177 页。

〔22〕 Eberling,1996 年,第 63 页及其后页。

〔23〕 参照 Münkler,2002 年,第 13 页及其后页和第 175 页及其后页;以及 Creveld,1998 年;进一步的还有 Enzensberger,1994 年。

诸如应召入伍和政治—外交上的宣战、动员和军队集结,都是花费时间的,正如赫尔弗里德·默克勒所指出的,这就是战争动力学;但是诸如马丁·凡·克瑞维尔德(Martin van Creveld)*等人认为,今天与经典的现代完全相反,完全可以期待战争的去军事化、权力垄断的倒塌和"市民战争的爆发"(恩岑斯贝格**语)。[24] 在21世纪伊始,美国军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力炫耀却并没有能隐藏得住,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美国用老式的国家战争的方式对阿富汗(Afghanistan)和伊拉克(Irak)发动了战争,而这种做法是不合时宜—"古老欧洲式的",而且也同样不是对现有的困难状况和危险状况的恰当的应对。面对信息时代中运转的恐怖网络所带来的可能性,新时代的军队机制没有任何机会了,它完全被证明是"过时了"的。[25] 从中完全可以看到,真正的军事上的革新在今天更确切地说是应该以毁灭技术的一定程度的放慢和精确为目标,这使得对快速武器的可控制的以及因此战略性的替代成为可能。利用激光制导的机灵炸弹不需要更快,而应该比它的前辈更加精确,并且在它的毁灭性力量中应该有选择性。在今天,军事技术发展的目标不再是快速地毁灭敌人,而是精确地切断他们的基础设施和抵抗力量。[26]

321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甚至是晚期现代加速技术——因特网——所带来的军事发展的虚假的武力炫耀,也有趣地支持了我的有关加速原理在军事逻辑中失去了作用的假设。尽管,因特网毫无疑问不仅是信息技术过程中的根本性的加速器,而且也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变化中的加速器,但是它的连接成网的逻辑对于军事战略的"发明者"来说不再是战

---

* 马丁·凡·克瑞维尔德(1946—),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主要作品有《希特勒的战略:1940—1941年》《科技与战争》《战争的变化》等。——译者注

**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德国诗人、作家、出版人。主要作品有《方言的历史》《报刊亭:新的历史》《自由之路》等。——译者注

〔24〕 参照 Castells,1997年;也请特别参考本书的第四章。

〔25〕 也请参照 Castells,1997年,特别是第四章。

〔26〕 默克勒(Münkler,2006年,第13页)发现:"以所谓的隐形轰炸机为例,最新的发展无疑体现出,新的军事要求不再是继续提高速度,而是与速度没有什么关联的减小对手对我方的识别度。"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3年,第46页)举例说明军事技术"最新的"加速作用因此并不能使人相信,英国城市的炮火并不因为德国的空军的出现就"过时了",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巴格达(Bagdad)运输炮火也不是军事技术的成就,并且"灵活炸弹"的成功也与加速作用无关。

争的加速,而是战争的减速:作为因特网的原始形式的阿帕网(*Arpanet*)*是美国国防部的发明,目的是通过通讯设施的分散和去中心化,在遭到[苏联的(sowjetisch)]核武器袭击的情况下阻止美国信息系统在被攻击后被切断。曼努埃尔·卡斯特斯发现"阿帕网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式的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了解、在广阔的领域分散游击队兵力对抗敌人的军事战略的电子对等物。正如阿帕网的开发者所希望的那样,它所形成的网络结构不是被任何中心所控制的,而且是由成千上万的自动计算机网络所组成的,它们之间有着无数的连接路径";而与此同时,赫尔弗里德·默克勒与这些想法完全不同,他指出毛泽东的游击队战术体
322 现了战争的减速。[27]因而,因特网这个例子说明了社会加速效果在极少的情况下是军事技术的减速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第三章"3"所定义的第三种减速类型的补充形式)的没有企图的附带后果。尽管这个例子证明,军事方面的发展能够进一步产生加速效果,但是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在这里所支持的假设的反例,即军事机制在晚期现代进一步丧失了作为社会加速的先锋的功能。

因而,从大量对全球化时代下的民族国家的功能丧失和功能变化的诊断中可以明显地看到[28],上述假设对于国家的机制也同样有效。众所周知,有关民族国家陷入衰落并且不断地失去权力的假设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但是,反面的诊断指出,各个国家继续是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塑造的主要行动者,国家最终导致政府间——尤其是强有力的工业国家之间——的协商和达成的共识的过程,即在今天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下讨论的过程成为可能。因此,民族国家仍然和以前一样,是公民的甚至正

---

* 阿帕网(Th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开发的世界上第一个运营的封包交换网络,它是全球互联网的始祖。——译者注

[27] Castells,1996 年,第 6 页及其后页;Münkler,2002 年,第 25 页及其后页,第 55 页。战争的加速和战争的减速自然同时是军事战略的基本的互补原则:针对潜在的攻击者的移动力量的提高,防御的一方往往就应该作出努力开发新的阻碍、抑制和停止的手段的反应,诸如城堡和要塞以及城墙和河道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的例子。但是,正如维希留所努力阐明的,到目前为止,技术的和组织的阻碍往往是因为从进攻速度的提高并且必然从加速技术的进步当中产生的,在这里也证明了,加速和减速是不对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帕网只是跟随在后的减速。这个"两难的困境"因而也非常有趣地出现在足球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针对进攻一方的新的加速战略和加速技术,防守一方要用不断改善的"减速方式"作出反应,但从总体上来看,足球比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快了。而且在这里也完全可以预期,足球运动也将不断接近它的生理上的绝对的速度边界。

[28] 参照例如 Beck,1997 年,第 34 页。

在不断增多的政治要求的主要接收者。[29] 但是，有关民族国家的权力无论是从它的统治权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它的自治权来看，都是败于中性的限制形式之下，对于这一点几乎没有太多的怀疑[30]：民族国家的统治权一方面是通过国际法的发展而被限制的，根据国际法，在一些特定 323
的情境中，例如尤其是人道灾难和种族灭绝，也可能是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家共同体允许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统治权通过自愿加入跨国机构［例如欧盟（EU）］而被削弱。后者首先是作为对于民族国家自治权的持续不断地通过尤其是经济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被削弱所作出的反应，全球化使得每个国家的政府在金融方面、经济方面和社会政治方面的活动余地大受限制。[31] 全球化首先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去规制化，这是高度工业化的民族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带来的后果，而全球化并没有对自治权的丧失这个事实情况有任何改变，自治权的丧失也无法通过每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弥补。有鉴于此，对于赫尔德*等人通过细致的分析所得出的论点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即当代的民族国家尽管不能以简单的和没有止境的权力丧失为标志，但是也是经历着它的功能上的根本的变化。[32]

这种功能上的变化在社会的加速方面体现得特别清晰。我的诊断以简洁明了的形式来阐述就是，民族国家从加速的关键机构变成了减速的核心机制，也就是说变成了加速的障碍。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早期和“经典的”现代中，领土主权国家的中央集权化、标准化以及社会发展和交换过程的规制化产生了非常动态化的后果：一方面是安全组织，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科层官僚机构的高效率的管理机器作为最重要的机构行使职能。有关与民主国家最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军队，我已经指出了它从现代的加速器到晚期现代的制动器的功能转变的假设：战争的去军事化也 324

〔29〕 参照诸如 Gilpin，1987 年；有关怀疑全球化的观点也请参考 Held，特别是 1999 年，第 5 页及其后页。

〔30〕 统治权在这里是指民族的行为自由的法律上的保护；自治权实际是行为的活动余地的确立；参照 Held，尤其是 1999 年，第 441 页及其后页。

〔31〕 参照 Beck，1997 年，第一章；Harvey，2000 年 b，第 65 页；Castells，1997 年；Held，特别是 1999 年。

*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1951—），英国政治学家。他和吉登斯同为著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创立者之一。主要著作有《批判性理论导言：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民主的模式》《民主与全球秩序》《全球转变：政治、经济与文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译者注

〔32〕 Held，尤其是 1999 年，特别请参见第 436 页及其后页、第 82 页及其后页。类似的研究有 Castells，1997 年，第四章，尽管它们所强调的要点在于权力的丧失。

是战争的去国家化,尤其正如不断增加的有关市民战争的类型的讨论中所指出的,对国家的统治权的挑战是通过国家之下的运动从内部发出的。[33]

类似的发展也可以从国家的第二个核心元素中,即民主国家的科层官僚机构中观察到。科层管理的结构和决策过程不仅失去了高效和时间上的合理化的总体形象,而且它现在完全成为无效率的典型了,也就是说是缓慢和不灵活的典范,在韦伯最初对它的合理性和快捷性的证明中可以看到,在科层制度中曾经所有过程都是行动适度的,行政手续也都是被严格遵守的,权限和规定被设定了统一的线性层级,固定的工作线路被确定,等等。[34] 由于科层的官僚体制过于缓慢,因而在今天科层官僚组织的去科层化就成为从减速中加速的王道了。卡斯特斯所诊断的从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Etalismus)*的危机"因此首先也是科层制管理的危机。国家社会主义在面对私有经济的资本主义的衰落,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控制的加速能力触碰到了它自己的极限的结果: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作为行为者,对于通过新的信息技术所创造的"网络社会"的时间结构而言过于迟缓和不够灵活了;它不再能够为到目前为止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一波加速浪潮提供更多的自己的能动性力量。[35] 在对于东欧的系统崩溃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325 中,也发现了一致的现象,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时间很大程度上表现为

---

〔33〕 参照 Creveld,1998 年和 1999 年,在这里也提出了民族国家和军队的功能转变是同时发生的。

〔34〕 参照韦伯,1972 年,第 562 页和第 825 页及其后页。有关工业化时代中的科层化和合理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进一步参考 Beniger,1986 年,第 13 页及其后页和第 184 页及其后页。令人意外的是,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3 年,第 45 页及其后页)认为科层官僚制度的这些僵化的特征在今天仍然起到非同寻常的加速作用。

* 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试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良的改良主义思潮。国家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是高度民族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强调:国家是绝对物,所有个人和集团都是相对的,国家是个人真正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制度,而是提倡一种能和社会化生产大分工相适应的以国家为主体的生产分配调控,这一点类似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但二者却有本质区别。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生产资料公有。而国家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在所谓的国家意志影响下的监控,政府表面上并不直接控制生产资料的配置和使用,只是政府代表国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控制权、使用权、分配权,但实际上却是将一切分配权集中在少数人(官僚、独裁者)手中。——译者注

〔35〕 参照 Castells,1998 年,第一章。

“静止的”，并且因此系统变化被感觉为巨大的加速过程。[36]

处于危机中的科层官僚制度，体现为正在出现的功能的转变，因此这不只是意味着单纯的管理危机：在与经典的现代完全相反的晚期现代中，不再能够通过对社会方面、文化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过程和关系进行国家的管制而实现加速，而是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去规制化产生加速。如同我将在第十二章中所阐述的，政治控制的加速作用已经被耗尽了，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政治控制的加速所驱动的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以及社会的社团模式中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和灵活，从而使政治系统不再能够跟得上它们的步伐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民主的管理要求：正如将要指出的，民主的意愿形成过程和决策过程本身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由于公共领域和社团结构在晚期现代的变化，甚至发展出更大的时间需求。由于这种时间上的不同步化，政治控制和社会加速的关系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几乎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在消除国家管制和放弃控制的过程中，保证了进一步的社会加速，因而控制要求和管制要求的保留，首先被 326
证明会成为经济方面的制动器。因而，在政治的倡导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例如巴伐利亚州（Bundesland Bayern）在 2003 年冬天就发表声明：要求“去官僚科层化：自由州应该去掉三分之一它所制定的规定；州政府应该通过大规模的网络调查确定哪些规定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这是来自《南德意志日报》（*Süddeutsche Zeitung*）2003 年 2 月 1 日/2 日的报道。在此期间也可以在其他联邦州看到类似的倡议。[37]

因此，在今天，国家也是加速的决定性的代理人，当然国家—政治的加速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步的政治”意义上的通过管制化和民族国家的标准化而实现的社会发展的动态化，正走向通过去规制

---

〔36〕 在 Chesneaux（2000 年，第 419 页）那里可以找到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Tschecholowaksich）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在 1990 年所说的一段话的引用：“当我在布拉格城堡开始我的总统工作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根本没有钟表，而这对我来说是个有力的象征；在很长的时间里、在年复一年中，都不需要去看时间，因为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历史停止了并且不仅在布拉格城堡中，而且也在整个国家当中。今天，历史突然向前奔跑……并且看上去是要追赶上丢失的时间。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必须重新回到时间的进程中去。”Priller（1992 年，第 610 页及其后页）指出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东德（DDR）的时间模式中几乎没有任何动态性变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剧变的来临，这可以看做是缺乏革新和现代化的象征。进一步可以参考 Borneman，1993 年，第 105 页；Keane，1991 年，第 189 页；以及 Urry，2006 年，第 20 页。这样的时间体验也可以在沃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er）所执导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反映东德剧变的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中找到有力的表述，在影片中年轻的主人公确信，生活在剧变后已经变得越来越快了，并且感觉到每个人都处在粒子加速当中。关于东德和西德的不同的生活节奏和有关将加速体验作为对剧变的体验的研究也可以参考 Hofmann，2004 年。

〔37〕 《南德意志日报》（*Süddeutsche Zeitung*），第 26 期，2003 年 2 月 1/2 日，第 48 版。

化和渐进地放弃特别的民族国家的标准(直至自己的货币)的动态化。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加速器式的竞赛在当今仍然继续进行,但是它主要发生在对经济上的有竞争力的位置这个领域的竞争中,在这个领域当中,由于竞争可能会通过诸如引起税收资源的枯竭而侵蚀自身的基础,最终反而非常矛盾地缩小了竞争优势。[38] 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一体化和中央集权化加快了速度,因而从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国家中间的差异就显然成为大宗交易的障碍也成为加速的障碍了:加速力量似乎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因而,今天在国家作为加速的代理人出现的地方,它对加速的代理主要通过有计划地推动对(到目前为止)作为对
327 它的定义的制度化的安排和它的流传下来的形象要求的侵蚀。因此,今天"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成功地成了去规制化、去科层化和逐渐消除国家的政治的核心,就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了,简言之,*政治失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39]

在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我将尝试着证明这条假设,即从时间结构的原因来看,事实上现代性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说,正处在从*后历史*阶段向*后政治*阶段的过渡当中。在这里,与此同时还可以从总体上确定,定义了"经典的现代"的社会机制的全体在加速力量和制度方面的框架条件之间的辩证发展中,表现出了大范围的和影响深远的功能倒置的特征。经典的现代的*加速器*变成了晚期现代的*加速障碍*或者*制动器*,通过加速自己所触发的开始运转的动态化的理论,现在正处于变化的压力和被腐蚀的压力之下(参照*表9-1*)。社会加速的能动性在前面的章节中所阐述的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推动要素的相互作用独立于那些机制,而现在又变成了对抗它们。这些适用于*军队*的机制和*国家的官僚科层制度*,正如将要进一步进行阐释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同样适用于*民主的形态*和政治的管制。由此,从严格划分工作和休闲[40]的工业化的*劳动时间管理*的机制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观察到这种所谓的辩证关系;而且甚至是在特殊的空间时间的*功能分化的制度化*[41]以及在稳固的个人

---

〔38〕 参照诸如Beck,1997年,第13页及其后页;Castells,1997年,第五章。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3年)对我早期所提出的民族国家的加速功能的丧失的理论提出了批判,但也赞同民族国家仍然能给予重要的加速冲量;而且他也指出了民族国家的矛盾的结构,对此我的理解是,国家已经成为晚期现代的加速的障碍了。

〔39〕 参照Beck,1997年,第203页及其后页。

〔40〕 参照本书第八章"1"。

〔41〕 参照本书第十二章"3"和第十四章。

的身份确定的观念上和以正常履历为导向而产生的现代的人生生涯管理的[42]观念上，也都能够观察到这一点。因而，无论从语义上还是从机制上，到目前为止稳固的现代的社会结构已经明确地开始变化了。从实 328
证上和从理论上将这种变化重构为社会加速的晚期现代阶段的后果，并且对由此所产生的伦理上和政治上的后果进行恰当的确认，将是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的任务。 329

表 9-1　加速和停滞之间的辩证关系：现代社会的加速器成为晚期现代的“制动器”

社会的中心机制	作为在现代的加速器	作为在晚期现代的“制动器”
民族国家	通过（时间、语言、货币、法律等的）统一实现加速	阻碍跨国或超越国家的（在“全球流动”的意义上的）交换过程
科层制度	管理的加速	延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军队	通过技术革新和时间纪律实现加速	军事机关/军队的命令结构过于迟钝和缓慢
政治上的控制	通过“进步的”政治实现动态化	在控制方面的要求作为动态化的障碍
民主	统治后果的加速；加速对社会政治要求的反应	作为政治的决策模式过于缓慢
“工作”和“生活”之间在空间/时间上的分离	经济领域的无障碍的动态化	抑制生活世界的动态化
稳固的个体的身份确定（职业方面的、家庭方面的，等等）	通过个体化而动态化	通过缺乏灵活性而阻碍人生的动态化
时间上延长的个体的人生计划	生活的时间化/生活节奏的加快	延迟对社会变化的适应；在时间的时间化[43]的意义下阻碍加速
（功能领域分化的制度上的形式）	（功能方面的自身逻辑的不受拘束的发展）	（阻碍跨领域的动态化）

〔42〕　对此请详细参考本书第十一章“2”和“3”。
〔43〕　对此的解释请见第十章和第十一章“3”。

第四部分

结　　果

第十章　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在前面一章里所提出的经典的现代的机制的全体的危机，在现今的大量时间诊断中被通常看做这些机制在以“全球化”为关键词的发展中所带来的后果。因而，诸如乌尔利希·贝克等人不仅将全球化过程理解为去国家化或者去政府化的先驱，而且也直言不讳地将全球化看做“机制的软化剂”，它将长期地抽走政治过程，使得社会福利国家的核心要素的僵硬结构运动起来并且似乎是“液态化”了：

> 看上去完全锁住政治形态的工业社会的机制能够被“撬开”并且打开政治上的掌控：社会福利国家和退休体系、社会救助和地方行政、基础设施政策、工会的组织化的权力、跨企业的劳资自主协定的谈判系统的前提条件，与国家支出、税收系统和“税收的合理性”一样，所有的都在全球化的新的暴烈的沙漠里的阳光下融化为政治上的可塑性（的过分要求）了。[1]

正如贝克所指出的，在机制的结构断裂的过程中并不必然会带来塑造它的政治（或者甚至是民主的）新形象的能力，而是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系统性的关联，即导致政治上的自我作用的可能性的持续的丧失，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中讨论。首先，在这里要准确地把握晚期现代的液态化过程的共同逻辑，并且为回答关于社会发展的当下阶段的

---

〔1〕 Beck，1997 年，第 16 页和第 13 页及其后页；参考 Harvey，2000 年 b，第 62 页及其后页。

333 真正的新来者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打下基础。[2]

对于这个新来者,并不只是在“全球化社会”这个关键词下加以理解,而是借助从先前发展的现代或者“经典”现代直到“后现代”的各种各样的诊断尝试对它进行把握。[3] 而且突如其来的后现代的诊断也观察了原本坚定不移的经典的现代机制的长时期的“软化”;还有它们加深稳固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身份确定的终结、线性叙事的意义模式被碎片化的刺激的原则所代替、民族国家的破裂,以及在诸如艺术与经济之间、经济与政治之间、政治与科学之间等不同功能领域之间的机制界限的被打破。[4] 极端的后现代诊断同时宣告了现代规划、理性、主体、政治以及其他所有一切的或多或少的终结,这些事物在现代曾发挥着产生意义和确立合法性的作用。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关后现代的社会哲学的立场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想法体现它的特征,即世界或者说“生活”无论从主体的视角来看,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都不再能够被解读、被理解和被塑造了,而且它也不再需要那些,因为控制要求和自治要求反正也只是现代性的错觉而已。因而,哲学的假设和社会学的分析通常杂乱无章地混杂在一起,尤其是在哲学的或规范的设计被当做实证的观察的地方,
334 更是很成问题的。[5]

但是,也有许多作者加入了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向21世纪过渡时出现的断裂面的感知,他们既没有追寻对全球化的讨论,也没有跟踪对后现代的讨论,而是用了诸如第二个现代性、晚期现代性或者反身现代性化等新的概念。这三个概念同时也反映了这样的加速,即这个新来者并不是在现代的社会发展框架之外移动的,而只是体现了在现代的社会范例之内的一个新的阶段或者发展高度。[6]

正如我已经在导论中所预告的,我将在接下来的三章里解释,无论

---

〔2〕 我在这里会有再一次提及,这个新来者并不能从机制和社会关系的液态化自身中产生,因为现代从一开始就是以“持续的和存在的”动态化的趋势为特征的。在静态的—传统的机制的动态化的第一波浪潮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经典的现代”的机制—总体却令人惊讶地遇到了很强的时间阻力,因为这种机制总体考虑到了现代的动态化特征,并且能够证明,社会世界中的加速过程和变化过程将自身引导到了稳固的轨道上,而且正借此推动着加速。详细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三章“4”,以及 Wagner,1995 年;Bauman,2000 年,第 2 页及其后页。

〔3〕 有关晚期现代和后现代的概念区分请参见本书的导论,注释 76。

〔4〕 众多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例如 Harvey,1990 年,第 113 页及其后页;Jameson,1998 年;Giddens,1995 年 b,第 186 页;Welsch,1994 年,导论;Urry,2006 年。

〔5〕 对此请参照彼得·瓦格纳(Wagner,1995 年)阐明的后现代诊断的实证基础。

〔6〕 有关现代的中断和延续的问题的社会学上的讨论请参考 Berger,1986 年。

是当代发展的间歇还是它的连续性，都只有通过对现代的时间分析方面的确定，才能精确地把握和实现实证上的教育意义。接下来要论证的假设是，西方发达的社会类型在最近的十年里经历了最新的加速波，这个加速阵发再一次改变了作为它的基础的空间—时间—制度，因此所形成的社会，无论对于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自我关系来说，都到达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这个所假设的加速阵发最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了它在经济上、信息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推动力[7]，它也首先从1989年左右的三个历史性的发展的相遇中，赢得了波及面非常大的冲击力：无论是那一年的政治革命，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瓦解，以及东欧国家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开放；还是尤其是通过因特网的出现（和卫星电视的扩 335
建）所推动的数字革命，在那之后很快也延伸到移动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微电子的、不受地点约束的通讯上的可抵达性成为可能；以及最后的灵活积累的经济革命或者说“涡轮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的“准时生产”所带来的经济革命，都是加速运动的核心。[8] 当然，在这里这些发展的作用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不断增强的，通过它们，促进了诸如在1989年之后的政治变革和信息技术的网络化，并且最终再一次使得生产加速的新的形式成为可能。

特别是，在信息传输中所实现的实时水平几乎对于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领域都发挥了强有力的加速吸力的作用，并且因此唤起了这样的印象，即我们是新的、本质性的速度革命的见证人，在其中所产生

---

〔7〕 卡斯特斯（Castells，1996年，第5页及其后页，和1998年，第335页及其后页）将从1968年开始的文化革命和从中产生的新的社会运动、在微电子技术中的技术大爆炸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的危机作为三个在加速的信息时代主要的推动力。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具体时间问题主要集中在对社会科学领域中对现代和资本主义的开始时间的争论，因而对此要格外小心。

〔8〕 有关“数字革命”请参考诸如Freyermuth，2000年；Eriksen，2001年。后者将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Jugoslawien）的解体和第二次海湾战争（Golfkrieg）看做是政治事件，它们发展了1991年左右的重要的加速阵发（第8页及其后页）。有关“政治革命”的动态化的作用请进一步参考Urry，2006年，第20页及其后页。有关“移动革命”请参考Myerson，2001年。关于特别是多国家，康采恩通过新的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战略、变化的采购关系和“涡轮资本主义”所推动的生产的新的空间分布和灵活的积累而导致的“经济的速度革命”，请参考本书第八章“1”，进一步可以参考Sennett，1998年，Harvey，1990年，尤其是第141页及其后页；Jameson，1998年，第67页及其后页。这些发展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中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时代，也就是说导致了生产方面、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体验的变化，为此，卡斯特斯用了三卷本的著作阐明信息时代的问题（Castells，1996年、1997年、1998年）。Hardt和Negri也在他们的尚有争议的时间诊断《帝国》（*Empire*）（2001年）中发表了类似的见解。

的速度不再将令人屏住呼吸的“齿轮咔嗒咔嗒转动的前进”作为象征了,而是通过万维网和诸如“即时满足”和“即时供货”这样的关键词来加以表述。[9] 因而,(例如在开发模块时)物质过程的可视化和数字化,
336 以及在“模拟的”,也就是物质的过程链条中的数字信息传输,同时导致了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加速。[10]

正如我在对现代的文化方面的自我观察的分析中已经指出的,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之交,对这些事件的文化上的感知和消化,是以许多对加速阵发的理解接受和反应的模式来不断重复的。[11] 位于自我观察的层面上、通过对所假设的加速阵发所作出的强有力的推理式反应的社会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分析,也为生产速度的加速(并且随之而来的销售速度和消费速度的加速)以及社会的生活节奏的加速和社会变化的最新的加速提供了“物质方面的”证据。[12] 但是,测量加速的尝试却遇到了与确定全球化的范围和程度时一样的困难。因而,作为所假设的加速阵发的指标,可能是处于在第三章“3”所确定的惯性力量和惯性小环境中的压力的强度:正如所猜想的,速度的极限当然可能受到双重愤怒的攻击(例如在那些早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努力刺激幼儿早期的学习能力的地方、在那些考虑通过植入计算机技术提高大脑的工作速度的地方或是在那些通过基因方面的操控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生物上的变化而达到自然养殖所需要的类似结果的地方);社会的“减速岛”正处于不断加强的(通过使十多年以来被人们所习惯的现代的传统变成牺牲品,例如在大学的教育体系中,也有很多是在生产过程,甚至是交通方式、合理化措施领域中的传统)被腐蚀的压力之下;而且至少在报纸专栏和专业类报纸中,越来越多地将诸如急忙病或“常见的”抑郁症之类的个体病态
337 的“减速反应”作为功能失调的附带后果来报道。[13] 同时,在文化方面的自我观察中,有关加速的社会变化只是发生在“用户界面”,而事实上深层次的文化静止却隐藏其后的印象似乎被强化了[14],与此同时对于减速的“意识形态上的”呼唤正在不断高涨。但是,可能是最有趣的发展却发生在功能方面的加速或加快的减速这些领域中。如同我在前面

---

〔9〕 Freyermuth,2000 年,第 75 页。
〔10〕 对此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章.2(1)。
〔11〕 参照本书的第一章“2”和第二章“1”。
〔12〕 对此请首先参考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所探讨的发现。
〔13〕 参照本书第三章“3”;也请参考第十一章“3”。
〔14〕 Baier,2000 年;Jameson,1998 年,第 50 页及其后页。

的章节中所分析得出的，加速压力在此期间变得如此庞大，因而正是通过它们自身的短期制动效果从而实现长期的加速的“经典的现代”的发挥制动和控制作用的机制网络——这当中毫无疑问要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国家行为[15]，不再能够承受得住晚期现代的“没有界限的加速”及其所带来的仍然是不可预测的后果了。[16]

而对于我的假设来说关键的是，前面所提出的三个发展同时也应该被理解为全球化的形式。实际上，通过对从20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关系中的信息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化所产生的作用的观察，确定了对全球化的讨论。但是，对这些关系中的特性上的新来者的确定，必须从时间分析的角度出发才可能成功，因为只有这样，有关全球化的诊断才能识别新来者，否则的话，对“新的时代”的证实的努力无法令人满 338
意，而且也是令人困惑的。[17] 信息、货币、商品和人员的跨越巨大的距离进行交换或流动并不是新鲜事，而观念和疾病的移动也不是：新鲜的是这些过程在今天运行的速度和无阻力。[18]

很多远距离交易能够以数字化的方式并且因此“实时”完成，也就是在实际操作中没有时间上的延迟、没有高额的成本也没有摩擦耗损：所有类型的资本投资、信息传送，同样也包括可视化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同步处理，都是这方面的众所周知的例子。在现代的移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从个人计算机中延伸发展出来的具有无线因特网连接的移动电话，使得在地点上直接地捆绑在一起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些交易而言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与此同时人员和物品的物质性的移动所需要的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却也在上一个十年里大大地减少了。用于克服距离的成本、阻力和时间的减少，自然会

---

〔15〕 参照 Harvey，2000年b，第58页及其后页：“资本主义一直是在加快周转时间、提高资本流通的速度，以及最终改变发展的时间地平线的冲力之下的。但是，这只能通过长期的（例如，在环境建设领域，也包括在周全而且稳固的用于生产、消费、交易、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领域）投资才能实现。与此同时，避免危机的主要策略在于通过长期项目吸收消化积累过剩的资本（例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国家所开展的著名的‘公共建设工程’），而且这也能够降低资本的流转速度。”详细内容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章.3(4)。

〔16〕 相反，功能减速的个体的形式正是高度繁荣，这一点也可以作为另一个停下来的加速阵发的证据：建议“停止下来”的课程、疗养、技巧和休假形式都是休闲经济的少数繁荣景气的领域之一，而且领导潮流的“健康—绿洲”也毫无疑问是有目的的创造减速岛的典范。

〔17〕 这也体现在哈维（Harvey，2000年b，第67页及其后页）和赫尔德（Held，1999年，第424页）他们自己对新来者的定义尝试中，但是在这里都拥有对时间结构变化的敏锐的意识；同时也体现在卡斯特斯（Castells，1998年，第356页）显得无助的新社会角度的列表之中。

〔18〕 对此请参考 Jessop，2006年。

对相应的交易数量的数量上的提高在很多层面产生影响。因而,赫尔德等人在他们小心谨慎的实证研究中,将全球化作为一个同时通过全球性的交易的扩展度(广阔性)、密集度、速度和影响程度(影响性)来定义的状态。[19] 由于广阔性,也就是交易过程的广阔的空间上的延伸,是全球化的可分解的定义标准,因而全球化的程度的变化只能通过其他三个参数来确定。因此,赫尔德等人的研究得出结论,这个时代的全球化的新
339 颖之处,主要产生于在社会的许多领域中的全球化的交易速度和交易密集度的提高。[20] 因而,影响程度的提高并不只是却首先是最先被提到的那些维度的提高所带来的结果。但是,无论是速度的提高还是密度的提高,都只标志着社会加速的过程:前一个维度的提高可以理解为是运输和通讯的加速,而后一个维度的提高则意味着每个时间单位的交易数量的增加。

但是,对此首先只是作出了数量上变化的反应。现代的社会构成上的特性上的变化的假设涉及这样的猜想,即全球化这个关键词所概括的加速过程正被引导向现代的空间—时间—制度的又一次的变化,或者已经被引导到那里了。同样的,在大量的理论推导的全球化诊断中,都或者含蓄或者明确地作出了这样的假设。因而,在对全球化的分析中,不仅将定性的空间时间的改变看做一个过程,而且也将它确定为新的社会状态,有趣的是,甚至有人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政治项目。[21]

根据哈维的看法,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是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新的一轮,或者说进一步的提高;或者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全球化是累进到达空间时间的间距扩大的新的水平(*time-*
340 *space-distanciation*),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的协调能力的范围的扩大。[22] 这个过程可以体现为之前所阐述的跨越空间上的距离的成本、阻力和所

---

〔19〕 Held,尤其是1999年,第14页及其后页。

〔20〕 同上书,第433页。赫尔德等人所开发的分析框架同时阐明了,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完全揭示了没有规律的和暂时的反向发展趋势:在单独的维度中,例如有关移民潮或者在有些地区甚至是对外贸易方面,全球化的程度在之前的历史时期要比现在高得多。

〔21〕 有关全球化的三个解释可能请参考 Harvey,2000年b,第53页及其后页。贝克(Beck,1997年,第26页及其后页)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定义的建议,他将过程维度看做是全球化、状态维度看做是全球性,而将项目维度看做是全球主义。

〔22〕 对于前者请参考Harvey,1990年;也请参考本书的第一章"3"和第二章"1"。对于后者请参考Giddens,1995年a,第90页及其后页。引人注意的是,(与采用他的概念的其他作者相反)吉登斯自己却疏忽了将这个观点前后一致地用在全球化过程中。因而,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维度的方案中没有考虑到这些观点(1995年,第92页及其后页)。有关全球化被定义为空间时间的安排的相应的变化请参考Jessop,2006年或Waters,1995年。

需要的时间在技术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减小，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对于许多社会过程而言，空间距离不再重要，并且越来越多的事件或行为都从空间时间中“脱位”了，也就是说，原因和结果与事件本身完全或者很大程度上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分离的。[23] 由于这样的脱位过程将行为和时间从它们的本土的环境中抽取出来，因而这成为在第六章“2”所观察的体验的去情境化的重要的原因，它使得日常体验成为相互间没有联系的片段的结果。

以下的事实可以作为空间的“脱位”的显而易见的例子，即例如今天的政治家可以宣传，不再是在国界上捍卫德国的安全，而是在伊拉克或者阿富汗；而在日本进行的足球赛可能引起莫斯科的骚乱；或者在阿根廷的一件事情会导致华尔街的股票暴跌，而且一切都是“实时”发生的。有关这种脱位的进一步的观点是，这些相互作用不仅是跨域空间的，而且也能够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在亚洲的经济上的事件可能对欧洲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美国的文化偏好以及其他方面产生影响。[24] 当然，由于这样的发展使空间或者说地点也会再一次赢得次级的重要性，并且努力“重新嵌入”（*reembedding*）[25] 到社会事件中；正是因为空间对 341
很多决定是依情况而定的，因而地域性的或地方性的差异和特性赢得了新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之前的脱位的结果。[26]

我已经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阐述的空间通过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加速——而缩小或消灭的表现，是现代性本身的基本特征，显然这也并非是新鲜事物。但是，这种形式正处于历史性的推力当中，特别是随着新的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引入，它导致了社会的空间—时间—制度的逐步的变化，也就是说导致了空间、物品和人员之间关系的改变，甚至也引起了主体的自我关系的变化，直至造成了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

---

〔23〕 参考 Giddens，1995 年 b，第 33 页：“对于‘脱离’我理解为社会关系从地点束缚的互动关系中‘取出来’了，并且社会关系的无边际的空间—时间—期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从中产生了“脱位”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空间体验的组织自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远与近用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同上书，第 174 页及其后页）：熟悉和陌生都已经不再与附近和遥远有关了，因为远处的可能是非常熟悉的，而近处的由于快速的变化反而却是完全“陌生的”。

〔24〕 参照 Jessop，2006 年，第 1 页及其后页。

〔25〕 Giddens，1995 年 b，第 102 页及其后页和第 112 页及其后页。

〔26〕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本书第四章。

社会世界的变化。[27] 因而,时间—空间—压缩的新一轮的浪潮带来了影响广泛的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后果,如果它们能够跨越现有的制度的关键转折点的话,它们完全能够建立全新的社会。由于是通过晚期现代的全球化过程而到达这样的转折点,因而说明现代化可以被定义为新的状态。

作为最近的时间—空间—压缩的结果,即对现代化最简明扼要的定义中所说的新的状态,产生了变化了的空间—时间—制度,在那里空间已经不再是稳固的固定,而是处在持续的变化中的"*流动*";而时间也被消除了固定的节奏和顺序,随之而来表现为到处出现的最不同时性的同时性。

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重要的空间特性在今天已经不再通过确定领地或地方的、固定的机制或通过固定的地点和位置来确定了,而是通过
342 似乎是来回流动的、一再改变它们的方向和形状的(如权力、资本、商品、人员、观念、疾病、风险等的)*流动*或*流量*来确定了,这样的想法正是今天的文化霸权所要实现的。至少,这样的观念在对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讨论中占有优势地位;因此,它似乎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中心心理状态。齐格蒙·鲍曼从中得出结论,当今这个时代可以被确切地描述为"*流动*的现代性",并且他也指出了在全球化的"使机制软化"这个层面和空间相对时间变得不重要之间的相互关系:

> 液体与固体不一样,不能轻易地保持它的形状。因此可以说,液体既没有固定的地点,也没有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时间。固体有着清晰的空间上的维度,但是通过中性化这个冲击力,从而降低了时间的重要性(有效地抵制时间的流动或补偿它的不符合时代的特性);与此同时,液体不能长久地保持任何形状,随时准备好(并且易于)变化形状,因而对于液体而言,时间的流动不仅是在液体现在正占有的空间上,而且也终究包括它"瞬时之间"填满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固体放弃时间;而液体恰恰相反,时间对于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形容固体时,人们可能会完全忽略了时间;但是在形容液体时,如果没有考虑到时间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对液体的形容是快照,并且需要在照片的底部写下日期。液体很容易漫游……液态遇到固体,液态显得没有受到损伤,因为是它遇到的固体——如果稳固不动的话,发生了变化,变湿了或者被浸泡了……

---

[27] 参照本书第四章;进一步请参考 Virilio,1998 年 b,第 24 页:"新的运输基础设施系统的采用总会为对社会的感受——无论是对社会的物质层面还是对社会关系层面的感受——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也导致了对整个社会空间的感知的变化。"

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小说中，当我们想要去抓住现在——现代化历史中的一个阶段的特性时，“流动性”或“液态性”被看做是最恰当的隐喻。[28]

343

曼努埃尔·卡斯特斯也看到了这一点，他通过确定空间—时间—制度的变化而定义了新的信息时代，并且在对从“地点的空间”到“流动的空间”的过渡的有力的实证分析中，尝试理解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原则的改变。流动的空间尤其是以它的网络状的而不是层级稳定的、只是在临时的压缩和可逆转的内容中操作的、没有中心的组织来体现的。[29]

与之相关的，卡斯特斯努力发现，空间的这种发生了改变的地貌是如何产生了社会时间的新的结构的，他将后者称为“永恒的时间”。“流动的空间……通过打乱事件的顺序和使得它们同时化而融化了时间，因此将社会装入永恒的朝生暮死之中。”[30]永恒的时间这个概念使得这样的观点变得合理，即时间是通过行为和时间的期限、顺序和节奏而形成的，并且因此，一种以消除期限、去除社会事件的节奏和取消确定的和固定的顺序（例如人生生涯、一年中可以获取的食品、日程安排或一周安排中的活动形式等）为特征的社会状态，也可以形容为永恒不变的，特别是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瞬间的同步的节奏模式和似乎是它的反向地平线上的永恒的节奏模式占主导地位。[31]

与大卫·哈维和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一致，卡斯特斯也指出，这些模式的主导地位首先与文化上的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有关历史的观念是以“集体的单数”（科泽勒克语）的形式与发展、进步和秩序的与受顺序束缚的时间性捆绑在一起的；而且其次，文化上的“后现代”的基本原则同时就是历史的活动布景在放弃了有序的秩序和历史的发展后的折中主义的和武断的组合。[32] 永恒的时间的概念与哈维完全

344

---

〔28〕 Baumann，2000 年，第 2 页，楷体强调部分出自本书作者。也请参考 Urry，2006 年。阿尔君·阿帕杜莱（Appadurai，1990 年，和 1996 年，第 33 页及其后页）在他对现代化的判定中定义了新的时间—空间—制度下的地理的概念，在这里地理不再是按照“静态的”地图的模式确定的了，在那种模式中地理是固定的领域的“集合状态”，或者说是由（相对）能够经受得住时间流逝的领土、人种、宗教、政治统治形式、经济形式和技术的发展状态所构成的，但是在相互分离的、相互推移的表现为“文化流”的“种族的、技术的、金融的、媒介的和观念的形状”的意义上，地理只是闪烁的屏幕的动态的可视化的写照。

〔29〕 Castells，1996 年，第 376 页及其后页，和第 469 页及其后页。

〔30〕 同上书，第 467 页。

〔31〕 同上书，第 464 页及其后页。

〔32〕 Castells，1996 年，第 462 页及其后页和第 4 页；参考 Harvey，1990 年，第 240 页和第 304 页及其后页；以及 Jameson，1998 年，第 58 页及其后页。

没有体系地一面指出空间被时间消灭,但是另一面又指出空间和时间的毁灭这个事实一样[33],非常有趣地呈现了这样的怀疑,即我们的时间观念经受得住时间从空间中的完全的分离,并且同样也受到了时间"被磨成粉末"所带来的伤害:时间的方向如果没有了空间的基础看来是非常难以支撑的。因此鲍曼也怀疑,空间的新的无关紧要性装扮成"时间的湮灭"的形式,并且他在不久之后发现了没有边界而却又是瞬间的时间的矛盾的结构,于是他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可能,时间杀掉空间相当于时间的自杀?难道空间并不是在时间慌忙地冲向自我毁灭中的第一个受害者?"[34]

与所提到的其他作者一样,卡斯特斯并没有宣称,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为全球化世界的所有的社会群体构建了基本的空间—时间—制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网络流控制的空间之外的(固定的)地点(地方的空间)和(线性的)钟表时间仍然一如既往地占据统治地位,但是网络流占主导的空间决定着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基本的发展逻辑。[35] 正如鲍曼所阐明的,也是在第九章所提出的现代的加速和现代机构的管理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指出的:当在"经典的现代"流浪生活(例如无家可归的人、吉普赛人、"游牧民族"等)的不受空间时间约束与在有"固定的地址"(和与时间方面的时间纪律)意义上的定居生活相反,前者被作为落后状态的象征,并且导致社会的隔离;它在今天与地点固定和匮乏的时间主权(在地点的空间中的自觉意识和与持久性的关联)
345 相反,往往体现了社会底层的阶级的落后、似乎是"躲避的",并且标志着被社会排除在外的危险。在全球化的讨论中一再提到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不断增加的优越性,这个论点的基础在于:资本似乎能够"永久地"在整个地球移动,而与此同时劳动者的移动性与他们的灵活性能力和加速能力却是极其有限的。[36] 即便流浪生活胜利归来的观念也超越了空间和视觉的固定而自然地将全球化的诊断和后现代化的诊断联系在了

---

〔33〕 参考 Harvey,1999 年的目录和章标题。

〔34〕 参考 Bauman,2000 年,第 116 页和第 118 页及其后页。

〔35〕 Castells,1996 年,第 476 页及其后页。

〔36〕 "我们目睹着流浪生活对领地主义和定居原则的报复。在现代性的流动的舞台上,定居的大多数人正被流浪的或治外法权的精英所统治",鲍曼这样写道(Baumann,2000 年,第 13 页),并且他在时间的视角中指出:"长期地被纠缠在一些事情上,超出了人们'所用尽的时间和停止的'期限,并且也超出了他们用来'更新和提高'的时刻,补充兵员和'提升'一直都有……这些都是被免职的征兆……耐久性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并且从资产变成了债务"(同上书,第 126 页)。

一起。事实上，后现代化的诊断相比空间上的社会重组，更强烈地以时间上的社会重组为导向。时间秩序的消解和各种类型的同时性占主导地位，与它们所隐含的流动性、去地平线化和“光怪陆离的碎片化”的意义，都站在后现代讨论的中心。[37]

随后的（出自约翰·厄里的）社会现象的组合清单，将在同时化或“即时时间”中心关键词的现象集合在一起，并且从而阐明，全球化的诊断和后现代化的诊断是通过什么方式在这里同时出现的，并且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三种形式的社会加速的逻辑而得以确定的。[38]

表 10-1　同时化的形式（根据 Urry，2006 年，第 20 页）[39]　346

同时化的形式
1. 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变化：这使得全世界范围内信息和观念的同步交换和获取成为可能。
2. （组织）技术方面的变化：这使得白天与黑夜、工作日与周末、休闲与工作的区别消失了。
3. 在“一次性的社会”里，物品、地点和图片的可交换性的增强。
4. 时尚、物品、工作程序、观念和形象更容易过时、越来越是暂时的。
5. 物品、工作、升迁发迹、自然、价值和关系的越来越强的“暂时性”。
6. 新的商品、灵活的技术形式和巨大的垃圾堆经常跨越国界地不断出现。
7. 有限期的工作合同和“实时出现”的工人的增加，以及制定长长的任务清单的趋势。
8. 证券和货币的全球范围内的一站式交易不断增多。
9. 休闲获得、培训和继续教育以及工作的不断地被“模块化”。
10. 不同社会的物品和风俗在任何地方的可用性剧烈地增加。
11. 增长的离婚率和处理家务的其他方式。
12. 代与代之间的信任的消失，并且代际间的休戚相关关系的减弱。
13. 感觉（全世界范围内的）生活节奏都很快，这与人们的基本经历相矛盾。
14. 政治选举态度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

[37]　这方面大卫·哈维（Harvey，1990 年，第 285 页及其后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概览性的内容请参照 Bettens 和 Natoli（2002 年）所主编的合集。

[38]　有关同步化、加速和全球化之间的基本关系可以参考《时间与社会》（*Time & Society*）（Lestienne，2000 年）中的《时间和全球化专题论文集》（*Time and Globalization* Symposium）中的文章。

[39]　厄里（Urry，2006 年，第 15 页）讨论了瞬间的时间，并且对它进行了如下的定义：“我……用这个术语……去描绘这些特征：首先，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建立在想象不到的短暂的瞬间的基础上，这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意识；其次，代替了钟表时间的线性逻辑的社会关系和技术关系的同步化的特征，表现为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的分离、它们分别发生在不同的瞬间；最后，瞬间的时间是对特殊的短期的和碎片化的时间的普遍的重要性的隐喻，即便在不是真正的瞬间的和同步的地方。”

同时化是当今社会的根本性的趋势,因而也有作者发现,全球化诊
347 断中的同时化和后现代化诊断中的同时化的对立更确切地说是可疑的。[40] 尽管如此,"永恒的同时性"的观点从很多角度来看最终只是隐喻性的或者甚至是"幻想"[41]出的特性。因此,在这里所讨论的诊断有义务对为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在当下使大量过程的加速导致了对时间感知从顺序模式到同步化的形式的巨大的变化,作出系统的解释。因而,我将在这项研究接下来的三章里指明,当下这个时代的"新来者"体现在,社会变革的速度跨过了关键的门槛,也就是超越了代际更换的速度,因此时间感知和时间处理的模式被迫被描写为时间自身的时间化和因之出现的生活、历史和社会的去时间化。在加速所引起的个体和集体的时间视野的变化的概念的帮助下,我将指出,占主导地位的时间结构的条件将从那些"永恒的时间""历史的终结"和静态—动态的同时化的概念中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被重新构造。

我将对于时间的时间化的过程一方面从个体的身份确定的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另一方面从政治的行为前提条件的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因为这个过程首先产生于系统—结构的时间模式和文化方面的时间感知及时间地平线的接缝处或者"转换处"。因而,在后现代的诊断中所假设的变化往往聚焦于这两个领域也并非偶然:社会的身份定位的碎片
348 化、增多和扩散("主体的终结"),完全与所观察到的对政治形象和社会的规范性引导的放弃("政治的终结")一样,都是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42] 在重构的液态化的过程和同时化的过程的启发下,后现代的诊断也被重新表达为到达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在现代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加速越过了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拥有了新的特性,

---

〔40〕 例如 Hanns-Georg Brose(2002 年,第 30 页)将同步化理解为时间意识的变化:在(传统的)现代,线性的、按序排列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有差别的时间感知占据主导,在那之后,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正在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建立在不连续性和不同步基础上的对世界的时间维度的感知可以通过(不同时的)同时性这个符号……来补充完整"。进一步请参考 Nowotny,1993 年,第 17 页及其后页,在这里与卡斯特斯类似,从这种同时性中看到了"扩展的现代"的形式;或者请参考 Geißler,1999 年,第 111 页及其后页。

〔41〕 Nowotny,1993 年,第 17 页及其后页。

〔42〕 对此请参考 Eriksen,2001 年,第 140 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有本书作者添加):"工作、消费、家庭生活和公共领域的碎片化为我们带来一个在事先准备好的'身份确认包'之外的世界。每个人都必须从没有联系的碎片中创造他自己的连贯的整体。一个远非不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任务是否是根本可完成的,或者是否生活不可避免地更像拼贴画了,并且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孤立的事件和印象、任意和自发性,短期选择代替了长期的方向,也就是快速的模式占支配地位,而不是快速和缓慢的混合模式。很多人都认为,这正是在许多领域里所发生的,从工作到道德,并且更普遍的是,所指出的变化可以被描述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

即个体的线性和连续性以及社会对问题、变化和整合的要求的感知和处理都被放弃了。快速的速度导致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都出现非融合的平行处理、碎片化、丧失控制、理解力丧失、可塑性缺失。

政治的终结[43]的诊断看上去首先与前面所假设的第三个全球化观点——将全球化本身就看做是政治项目——有强烈的反差。但是，当人们了解了这个项目的特征之后，这个矛盾就失去了它的尖锐性。因为这个政治项目主要是为了消除"全球流动"的流通障碍。由于这个政治项目处于全球流动的特性，尤其是资本在最小的政治和经济的阻力下向另一个方向流动的特性中，因而尽可能使流通条件有利于那些影响领域，就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方面的最紧迫的目标；否则的话，在被环境排 349
斥在外的意义下，就会出现前面所假想的新的领土的次级—重要性。因而，全球化作为政治项目，要求在全球化潮流的"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放弃管理本身，也就是说首先要消除政治上的管制要求和控制要求。但是事实上——也是对失去民族国家的权力要求提出争论的"全球化的怀疑者"的质疑中可以理解的地方，即对与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捆绑在一起的发展的不断加强的规制和惩罚阻碍了资本、商品、专家、信息的自由流动，但这却是政治项目的一部分。在这当中尤其要算上停止移民流或者至少加以阻止的努力。移民，如果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属于"全球精英群体"的人群——吸引这些人的到来是列在大部分国家的日程之中的——的话，是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的存在可以被算作是对所期望的流动的阻碍。

由于国家方面和民主政治方面对消除流通障碍的控制，一方面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在边界上的交易成本和摩擦带来的损失，因而这些控制对全球网络中的超级快速的流通过程起到的是制动的作用，这些流通过程完全没有摆脱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尽管这些控制表现为流动的、去人格化的权力形式。[44] 为了保证"全球性的权力"的自由的流动，正如齐格蒙·鲍曼所猜测的，全球化的政治项目有机会瓦解所有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约束，也就是将地方的社会关系迁入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中。"为了让权力自由流动，这个世界必须没

〔43〕　对此请参考例如 Welsch，1994 年，第 21 页，导论部分；或者 Georg-Lauer，1992 年。

〔44〕　在这里 Hardt 和 Negri（2001 年）追随福柯讨论了"无政府的管理"；与此同时，卡斯特斯（Castells，1998 年，第 366 页及其后页，以及 1997 年，第五章）指出，"流动的权力"自身驾驭了"权力的流动"。

有藩篱、障碍、用于防御的边界和检查站。任何紧密而牢固社会联结的网络,以及特别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坚固的网络,都是属于这种应该被清除的障碍。全球性的权力为了它们持续的和增强的流动性,应该不
350 断集中全力废除这些网络,这是它们的力量的来源,也是它们的绝对不败的保障。"事实上,鲍曼甚至认为,流通障碍的清除,首先是美国从1989年开始的"新的战役"的根本性的目标:"军事理论和它的'命中和移动'的作战计划预示、象征和预告了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中的新的战争类型的真正的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不是占领新的地盘,而是击碎那些停止新的、液态化的全球性权力的流动的围墙;击碎敌人的建立他们自己的规则的渴望;并且因此不动用军队而是借助权力打开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路障、围墙和其他操作不能接近的空间。"[45]

在全球化的和后现代化的诊断中所确定的新的世界秩序因而没有摆脱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但是也不再能算作民主合法的或政治的了,从个体行为者和集体行为者的角度来看,它们是未被控制的、不受操纵的,也是不可操控的。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加速化茧成蝶而成为使流动的权力具有免疫力的政治战略,也成为消除现代的民主的控制要求的政治。[46] 因而在这里产生了讨论中所确定的对全球化的"没有刹车的火车所酿成的大祸"[47]或疾驰的不受控制的马车的感觉,所有挡在路上的一切都被碾碎和毁灭(吉登斯语)[48],在这种感觉中隐喻性地再一次集中表达了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同样也是一种状态和政治项目,它是与新的加速水平的实现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对晚期现代的推论
351 式的自我观察的各个层面的理解,则是下面一章的目标。

---

〔45〕 Bauman,2000年,第14页和第12页。

〔46〕 只要这个战略在这里是被作为"政治失业的观念"来理解的话(Beck,1997年,第203页及其后页),就可以将这个战略理解为同时是政治的终结和政治的项目的要素。

〔47〕 Thomas Friedman,引自 Harvey,2000年b,第61页和第68页。

〔48〕 Giddens,1995年b,第173页及其后页,和第187—190页。

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1. 现代的自我的动态化

正如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所尝试阐明的，时间结构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地点；它实现了从系统的要求到个体的行为导向的必不可少的“翻译”，因为它也是在后传统社会规范性的约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期望的稳定性并且似乎也被当做是自然而然的行为的方向框架。这样的方向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身份确定模式的时间结构，在这种时间结构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必不可少地相互连接在一起，因为对于“我是谁”的感知是无法与弄清“我曾是谁”和“我将是谁”或“我打算是谁”分离开来的。[1] 因而，一个社会的空间—时间—制度的变化，会对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对占优势的人格类型或者身份确定模式发挥作用。自我关系正处于流动中，这正是因为随着空间—时间—制度的改变，行为者的事物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主体的“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是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2] 正如在第六章“3”中所阐明的，我们对于“我们是谁”的感知（必然也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份确定的感知）恰恰是发挥着确定我们与空间、时间、周围的人、我们所在的环境中的客体，或者说是我们的行为和体验的关系的功能。在这里，在对所假设的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断层的分析中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全球化”和“后现代

〔1〕 对其请参照本书第六章“3”。

〔2〕 参考 Giddens，1995 年 b，第 118 页及其后页；Wenzel，1995 年，第 124 页；以及详细内容请参考 Rosa，1998 年，第 84 页及其后页。

化”的诊断中所观察到的社会变化,其从空间上来说是又一次的空间的
352 “萎缩”,或者说是由于技术上的加速所导致的空间的不重要性,以及从时间上来说是朝向“永恒的”即时—时间方向的变化,这样的社会变化是如何影响晚期现代社会的主体化形式的。

因此,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下所讨论的液态化或者动态化本身并不是特性上的新事物,而只是体现了作为本项研究的中心的加速过程那三个维度的最新的阶段。在这里,要再次提起在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的末尾特别小心翼翼地提出的问题,即从身份确定的角度来看,对于现代性而言,一条关键的基础原则的定量的提升,是否能够转变为自我关系的定性的变化,并且又是如何转变的。

对于运动和停滞之间的平衡正向着有利于动态化的方向移动的感觉,正如其所体现的那样,从特定的自我的角度来看也是现代的基本体验。例如在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朱莉,或新爱伊洛斯》(*Julie oder die neue Héloïse*)中对主人公圣普乐(Saint-Preux)到达巴黎后的体验的描述,不仅在文学上对乔治·齐美尔从理论上尝试定义大城市对个体的影响的领先一步,而且也如同是对晚期现代的灾难的预言,它已经指出了通过占优势的关系[3]或者根据情境[4]确定的自我:“善的、恶的、漂亮的、丑陋的、真实、美德都只存在于特定的地点和特定范围内……(人们)必须比阿尔西比亚德斯*还要能随机应变,必须在每次集会的时候改变自己的想法,可以说他的理解应该是在每一步都变化着的,而且他的基本原则是用尺来衡量的。”很快,圣普乐发现,他开始“在身处于其中的这个喧嚣无比、不安宁的生活中感觉到醉醺醺的状态了;我失去了直觉,就像处于眼前有大量的东西飞快地闪过的状态一样。我的目光所注意到的事物里,没有任何一样进入了心中;一切都交织在了一起,并且引起躁动不安的感觉、马上又停止下来,因而很快我就忘记了,我是谁和我属于哪个
353 群体……我被从一种情绪中推向到另一种,并且……我不(能)确切地……知道我接下来恋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5]。

---

〔3〕 参照 Gergen,2000 年,第 139 页及其后页。

〔4〕 请参考 Rosa,2002 年 a;进一步的对于晚期现代的自我的暂时性的特征的分析请参考 Wenzel,1995 年或者 Straub/Renn,2002 年。

* 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公元前 431—公元前 404),雅典政治家及将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因三易其主而使其卓越的军事生涯毁于一旦。——译者注

〔5〕 Rousseau,1988 年,第 240 页(第二部,第 14 封信)和第 262 页及其后页(第二部,第 17 封信)。楷体强调部分来自本书作者;参考第 17 封信的附件(第 252 页);此外还有 Berman,1988 年,第 18 页及其后页。

事实上，在这里似乎所有的要素都集中在了一起，这些要素表现了关于在后现代的身份确定的诊断中，个体的曾经稳固的结构朝着开放的、体验丰富的碎片化，并且尤其是不断变化的自我关系发展的液态化，反映了无休止的“全球性流动”的动态性。因而，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的：“今天的身份定位……成了自愿选择的游戏，是自我的戏剧性的表现，在这当中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角色、形象和行为表现自己，对于改变、变化和巨大的变革相对漠不关心”〔6〕，伊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也对晚期现代的身份定位管理做了如下的描述：“你不断地改变你的地点、将你的生活划分在不同的领域中并且区分开来，你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移动的。你有意识地对‘你现在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你如何呈现自己’作出决定。”〔7〕即便对于这个断层理论持高度怀疑态度的更加小心谨慎的社会科学的观察者也发现，稳定的身份确定向着动态的自我关系推移，这可以从在一生中“持续的修订”，或者至少是从以前稳固的身份基础变成偶然的之中表现出来。〔8〕

与此同时，如果现代性是以“喜欢不断变动”为特征的并且人们“从变动中而且也仅是从变动中寻找真实的生活”（安西隆），如果因此在现代“身份定位也处于变动之中”的话〔9〕，那么对于在晚期现代身份定位理论的定义中的新来者的真正的问题就是：从哪里可以区分经典现代的 354
与晚期现代的身份确定的液态化和动态化的形式？对此，我的明确的假设是：它们的区别在于，在经典的现代当中，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个体化，而到了晚期现代变成了生活的时间化，也就是说，变成了将自己的生活看做一个可以从时间上进行塑造的规划，与此同时，晚期现代的这个动态化过程同样也影响了生活角度的“去时间化”地、情境化地确定身份定位。因而，在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的最后所阐明的“存在的加速”，在这个新时代表现为似乎是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自我

---

* 道格拉斯·凯尔纳（1943—），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媒体文化：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身份定位和政治》和《波斯海湾电视战争》等。——译者注

〔6〕 Kellner，1992 年，第 157 页及其后页。

** 伊恩·钱伯斯（1949—），英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文化与人文主义》《移民、文化和身份》和《大众文化：大城市的体验》等。——译者注

〔7〕 引自 Kemper，1995 年，第 24 页。有关后现代的自我关系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概览可以从 Wenzel，1995 年中找到；进一步可以参考 Gergen，2000 年的对于晚期现代的身份确定在系统地包含了（空间）时间动态化和不稳定性的视角下的全面分析。

〔8〕 Wenzel，1995 年，第 114 页；Straub/Renn，2002 年，第 7 页；Schneider/Limmer/Ruckdeschel，2002 年，第 13 页及其后页。

〔9〕 Straub/Renn，2002 年，第 13 页。

关系的形式中的双重断层,我现在凭借着手中的个体化和加速两个中心概念,将对从前现代到"经典现代"并且又由此到了晚期现代的典型的重构的过渡过程进行描述。

2. 从先验的实质身份到后验的稳固身份:生命的时间化

从主体的自我关系的或者人格类型的占主导地位的形式角度来看,现代化在社会科学的分析中,从社会学"经典作家"的时代起就表现为个体化的过程。[10] 个体化的过程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化与生俱来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它表现为将个体的行为实施和人生过程从僵硬的、预先给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中,从约束性的传统和习俗中抽取出来,并且大大提高了个体的自我塑造的自由程度以及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
355
尽管这样绝对地讨论"这个"前现代的身份确定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无疑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统一的社会形式的前现代,但是在这里可以对这个假设进行辩护,即在传统的社会中,直至早期现代到来之前,主体的实质性的社会的身份定位似乎是从外部确定和预先定义的。对于身份确定的问题(只要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会被作为生活实践的问题)可以从外界找到答案:传统和宗教向前现代的主体指明了他们在世界结构中和社会中的位置,并且预先定义了,他们是谁、在集体中看上去是什么样的和他们应该做什么。人们的"身份参数"——只要是与对传统和惯例而言是成问题的就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包括诸如宗教、居住地、"政治导向"、职业、生活方式等都是给定的,而不是选定的,因此从中很清楚地体现了,关于政治导向、宗教、生活方式或职业这样的问题,在传统社会的地平线中完全没有意义。

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在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产生于上帝确定的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预先给定的"有关存在的重要的秩序"的意义地平线中,而且得到承认的情况也已经是"先验地"确定了的,如果主体尽量在社会秩序中找到他的位置,那么他有权获得社会的尊重。[11] 与身份确定和承认相关的概念,在现代的前进中对于文化和政治越来越重要,但它们在前现代社会[例外是忠诚冲突中的极端的危机情境,例

---

〔10〕 请参考本书的第二章.2(2)。因此,"人格"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已经不流行了,并且很大程度上被(个人的)身份确定的概念所代替。这种概念的转换可能是与在这里探讨的这个事实本身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它标志着从实质的或者本质的自我的概念变成动态灵活的、极为反射性的、可塑的或者甚至是可以选择的自我呈现的形式。

〔11〕 Taylor,1993 年。

如在《安提歌尼》(*Antigone*)*中的典型体现]的自我理解词汇表中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作用，它们不能体现个体的影响，并且也因此是可疑的。自我关系或者身份确定因而在严格的传统社会几乎不是一个与自己探讨的题目，它们首先是转向内在的自身的结果，尤其是在新时代随着自 356
我确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发生了变革之后的产物。[12] 在传统社会，主体因而似乎拥有一个先验的实质性的身份。

因而，个体化可以被描述为发生在现代的实质性的行为选择和生活多样性的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加的塑造自己的生活的责任逐步地向个体转移。因而，其前提就是在对传统的默认值的液态化和角色模式的液态化的塑造方面的社会变革。任何人不再被外在确定，而是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由自己所参与的塑造所决定。个体化因而首先意味着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也需要自己找到或者选择任务，确定身份的角色、关系、职业、婚姻伴侣、宗教团体、政治信仰等，并且承担后果。因而，这样的自我相比于以前，是更趋向于成为“自身的规划”了。[13]

现在决定性的重要之处在于，这个意义下的个体化与生命的时间化有着必不可少的关联。身份定位的发展或者说“实现”变成了一个时间方面的规划，它是在人生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它是身份的“开始变动”在经典现代的形式。当对于出自自己人生的一切、生活方式和重要的身份确定规划的结果负责的责任落到个体自身身上时，个体就被迫为他的未来而操心，并且探测各种未来的可能性。因此，伊里亚斯在文明的过程中也观察到了(作为普遍的自我强迫的补充的)不断增强的“被迫使变得有远见”。[14] 与之相反，以过去为导向却失去了重要性。[15] 357

但是，身份定位结构中的时间地平线的这种形式的变更的一个重要

---

* 《安提歌尼》是著名希腊悲剧之一。这出戏剧讲述了神的旨意与人的法律之间的矛盾。狂热的克里安想建立自己的王国，他宣布不许为叛国者波吕尼刻斯举行葬礼，而俄狄浦斯之女安提歌尼却希望按古老传统为自己的兄弟举行葬礼，因而与叔叔克里安发生了冲突，最终以安提歌尼之死而结束。——译者注

〔12〕 Taylor，1994 年，第 209 页及其后页；Rosa，1998 年，第 181 页及其后页和第 351 页及其后页。

〔13〕 参照 Wenzel，1995 年，第 127 页，提到吉登斯的观点的部分。

〔14〕 Elias，1976 年，第二卷，第 336 页及其后页。

〔15〕 罗伯特·劳尔(Lauer，1981 年，第 117 页)恰好在那里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分开来。后者从过去获得它的价值标准和合法性标准，但是，这在日常的生活方式的实践中表现为以现在为导向的，只要当生活方式主要局限于对不可预测的事件作出反应式的适应和操心于日常生活(存活)时。

的条件,是未来的可计划性。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中,在越来越以社会福利国家的形式"进行组织的现代"[16],生活形式和集体形式的划时代的液态化被引导进入相对固定的、机制化的轨道上并动态地稳定发展的时候,身份确定才能成为将人生的运动调整到沿着不同的发展轨道运行的负有社会责任的规划。尤其是马丁·科利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从中他指出了机制化的"生命历程管理"对于经典现代的重要性。他发现,"现代化过程是从生命事件的相对的偶然性到可以预测的生命历程的过渡"[17],并且从中指出,按照时间顺序分解的生命历程在这里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它为社会福利国家在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制度化秩序打下基础,并且将这些制度化体系转身变为负有社会责任的预先规定;另一方面,它在"标准的生涯"的构想中促成了由身份所引导的一生的导向模式,而"标准的生涯"的构想预先规定了三段式的职业方面(培训、工作、退休)和家庭结构(在原生家庭的童年时代、与孩子在一起的自己的家庭、孩子搬出去之后的老年阶段)的"过程计划":"现代的发展是一个生命的时间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一种人生模式,在那里年龄只是一种分类的标准,变化到另一种人生形式,生命时间的过程中的集中的结构原则属于这种人生形式。换言之,在主要是静态地或者情境化地——也就是说超越固定的从属关系——安排人生形式的地方,就会出现占优势的一生的安排,也就是超
358 越生命时间的过程计划",科利总结了个体可塑的生活的经典现代的构想。[18] 在这个意义下,时间化了的身份与一种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这种生活方式在例如教育模式、职业生涯模式、家庭计划和养老计划中从内容可预测、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可靠性中走了出来,并且因此代替了科利所说的既可以描述为静态的(在身份和社会秩序的实质性的定义中),又可以描述为情境化的(在将生活变成对不可测的、外在决定的世界运行中的巧合或者变迁的反应性的适应当中)前现代社会的人生形式。

因而,社会机制的可靠性符合个人的身份的稳定性的观念,而身份

---

〔16〕 Wagner,1995 年,也请参考 Wagner,2000 年。

〔17〕 Kohli,1986 年,第 185 页;参考 Wenzel,1995 年,第 127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科利引用了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的)个体进行自传式的思考,创造了相互关联的、有连续性的身份,借此他能够用战略性、预估的方式构造他的生命历史、预测他的未来,并且拥有生命计划日历。"

〔18〕 Kohli,1986 年,第 184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是在人生展开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经典现代的”身份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后验的稳定的身份。对于现代的个体的身份确定的任务是：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选择一个职业、建立一个家庭、决定你的宗教归属并且找到一个政治方向。但是根据这样的想法的身份确定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根据固定的社会环境中的预先规定而进行，并且因此往往流入典型的“身份丛”，在那里与特定的培训路径、职业行为、生活方式、政治方向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大大限制了身份“模块”的自由组合；但这一点对我来说远没有这个事实重要，即一次性“被找到的”身份和它所确定的角色模式，从经验上来看只能做很小的实质性的修正。变化职业和离婚如同跨越到其他宗教团体或者进入其他政治阵营一样，在经典的现代尽管往往是可能的，但是仍然是作为例外，并且构成了失败的或者至少是受到损害的身份确定规划；它也似乎体现了在紧急情况下的身份修正。

尽管在“经典的现代”的地平线中的“修订”和“变换”自然也是人生发展的真实的可能性，但是在它们出现的地方，它们往往意味着在前进的历史的意义上的叙事式的重新修复，也就是说，它们是作为通往真实 359
可靠的生活的重要阶段，或者是作为从强迫中的解放和从错误中的解脱。[19] 因此，修正过的身份往往也再次表现为对于整个人生规划的继续的发展和展开的重要的展望。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关联的叙事的重新呈现，保留了前进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的形式，它们包括可重构的、提供意义的目标地平线。[20]

人生计划或者身份确定规划在一生中铺开这种形式，能够作为平民的教育小说和发展小说中的典范，在那里面几乎永恒不变的是找到一个自我确定的身份定位、在可能是敌对的或者不感兴趣的环境中表明并发展这个自我确定的身份定位[21]，对我来说不得不提到的是，这些似乎与在第五章中所定义的社会变化的“代际”速度的含义有着“结构上的”关联。这种身份确定的前提条件是，一方面经验领域和期望地平线有足够的差别，从而能够对自己的人生（正如社会的发展）在有方向的运动的意义上进行把握，传统不必再不加考虑地被接受；但是，另一方面，期望

〔19〕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 Rosa，1998 年，第 166 页及其后页。

〔20〕 对于叙事性的身份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形式根据这样的特征的有趣的区分可以在 Kraus，2002 年中找到。

〔21〕 对此请参照例如 Petersen，1991 年。

地平线应该保持足够的稳固,以便能够发展长期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人生愿景、系统地延迟愿望的满足并且等待人生的模式的贯彻。

在前现代社会中,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在一定的时间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三代人完成完全更迭的速度还要缓慢,因而时间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是不动的和静止的,就像是一个背景,在这个由传统所确定的背景前,没有方向的人生的巧合或者变迁不断发生着。相反,如果社会变化的速度比单纯的代际更替的速度要快的话,正如我就要指出的那样,稳固的个人的身份确定的想法就不再成立。只有在介于这两种动态的
360 难以确定的情况之间的经典的现代,如同安斯加尔·韦曼所阐明的,每次总是新的一代是结构上和文化方面的革新的支撑者。[22] 前文里所提到的要完成的身份确定的任务,在新的一代人那里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作为代内规划方面的在代与代之间进行更新的任务,但是这个代内规划同时要保证代内的稳定性。

从对于现代的身份确定来说毫无疑问处于中心位置的雇佣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齐格蒙·鲍曼借用了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的将"福特式工厂"与它们的雇员之间的"经典现代的"雇佣合同比作平民的婚姻的描写:起决定性的是稳定性("直到死亡才能把你们分开"),可中断的职业生涯模式和路径模式是不在考虑中的("根本不考虑离婚"),但是这个合同必须是被个体所接受的。[23] 当然,这一类的有保障的雇佣关系,即便在经典的现代,与其说是常规状况不如说是例外,但是这种雇佣关系确定了成功的职业传记式的身份的模仿形式,它在很长时间是作为现代性的化身。因而,代内的稳定性的这种形式不仅伸展到人生的中心领域(婚姻、职业、政治方向等),也进一步对周围的维度产生影响,如参加哪些协会、接受哪些名誉职务的义务等,甚至也包括对医疗保险公司、银行以及常见的汽车品牌的选择。这些方面的恒定对稳定的身份的可能性的重要性,只有当人们在晚期现代
361 面对着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不稳性时,才能看清楚。

---

〔22〕 "在现代社会,处于当时的历史的代际关系中的各代人都作为集体的行为者发挥着构建结构和创新性的作用。"

* 丹尼尔·科恩(1953—),法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现代的时间》《国家的金钱、财富和债务》《富裕的世界和贫穷的国家》。——译者注

〔23〕 参照本书第五章,注释16。

3. 从长期稳定的身份到情境化的身份：时间的时间化

社会所确定的运动和停滞之间的关系，对于主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往往必须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相对于变动和弹性的平衡。[24] 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平衡，比起在传统的社会里的来说是更为动态的，这一点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同样很明显的是，经典的现代的身份确定是按照相对经受得住时间变迁的方式构建的，并且因此只要是在变化和变革受到一定的阻碍的地方，它就是建立在人生的连贯性和连续性基础上的。与之相反的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就是说大致是对现代的空间—时间—制度发生变化的诊断到来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文化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对第二次个体化浪潮以及由此而来的多元化浪潮的观察[25]，这些观察发现，所谓的平衡发生了更新，并且持续向着有利于自我的或者说身份确定的动态化的方向推移。

因此，对于“后现代”的身份确定的各种各不相同的诊断，最终在指出稳固的个人身份朝着开放、体验丰富并且往往也是碎片化的自我设计的液态化方向发展的理论中趋于一致，这并不令人意外。个体化在它的晚期现代的形式中也意味着，在塑造自身的人生的过程中的选择的可能性和偶然性的增加，在这里这样的增长首先应该是指身份模块的可自由组合性的新的形式和更加容易的可修正性。也就是说，在晚期现代，一方面选择的可能性和不同的方式不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心的生活维度和身份维度中，例如职业、家庭、宗教、居住地，而且也逐步出现在国家、性生活和性别方面，甚至也出现在更为外围的但也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生活领域，诸如电话公司、保险公司、能源供应公司、协会、投资形式等。

362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无论是中性的还是外围的身份模块都几乎是可自由组合的，并且从趋势上来看是可以任意修正的；因此家庭、职业、宗教归属、党派偏好、保险公司和朋友网络都不再是生活方式中的原点，它们不再是在（一次性的）选择之后一生都保持不变了，而

---

〔24〕 参照，Rosa，2002年a，第268页及其后页；进一步请参考Krappmann，1997年；Straub，1998年b。

〔25〕 经典的观察请参考Beck，1986年。

是可能随时通过单独的选择或者决定修改成别的样子。即便在那些老式的模式继续流传下来并且完全没有将新的选择可能性和变化可能性变成传统的地方,对偶然性的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26] 同时,固定在一个维度中、不断地失去它对于选择的可能性的预先决定的力量,却在另一些维度中继续保留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影响身份定位的、僵硬的环境的逐步消失,另一方面是固定的顺序模式和事业生涯模式的消失,例如特定的培训不再几乎必然导致从事特定的职业,特定的职业也并不是很可能就伴随着对某个特定的党派的偏好,而这两者不再能一起预示着特定的宗教导向和休闲活动。同样,年龄阶段也失去了与特定的行为和观念之间的紧密关系:例如受教育阶段在传统上是与青少年阶段相互关联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成年阶段,或者是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之后的阶段出现;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恋爱、结婚和为人父母的人生阶段中;与此同时,例如长期的非自愿被排除在职业生涯之外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年轻的时候。[27] 也包括加入所谓的"青年文化",看来也不再是限制在某个特殊的年龄群体中的了。

在这种情形下,新现象是身份特征中的"丛"的不断消解,身份特征丛很可能是一起出现的,这一方面带来了个性化的不同的生活境况,另
363 一方面在个体在单独的生活领域作出决定之后,导致对人生的进一步的发展的可预测性的丧失。因此,可修正性在这里不意味着别的,而恰恰是个人身份的时间化:也就是说,不再能从已经延续了很多代的传统确定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规范模式识别某个人(如同在前现代时候那样);而且这个人也无法在他的整个寿命中一直都是确定不变的(如同在经典现代的时候那样);这个人更多的是随着在人生的展开过程中的时间点而变动的。因而,身份是暂时的[28],它是以代际之内的变化速度变化着的。正如我在第六章"3"所指出的,在晚期现代,体现身份的称呼因此往往必须配备上时间索引:某个人不再是糕点师、保守党人或者天主教徒本身,而常常只是"在此时时刻"和在不断缩短的当下的时段中的不能预知的期限里是那些身份;这个人曾经是另一个样子,并且(可能)将来是另一个人。在现代的继续进行中,身份模式的变化正好可以描述

---

〔26〕 "现在是这样。但可能也会是那样。"这是海尔格·诺沃特尼(Nowotny,1999 年)的一本书的标题。

〔27〕 马丁·科利(Kohli,1990 年,1994 年)因而判断出人生历程的逐渐的去制度化和去标准化;类似的还有 Castells,1996 年,第 445 页及其后页。

〔28〕 Straub/Renn,2002 年。

从跨代际的身份连续性到代际内的身份连续性的加速，这一点无论是从私密关系的角度，还是从职业关系的角度来看的“串联的一夫一妻制”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从趋势上来看它将代替这两个领域中的终其一生的一夫一妻制。[29]

因而，在身份确定的实践的角度所发生的、被卢曼当做功能分化和复杂性的时间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正是“存在模式”的语义不断地转变为“时间模式”的语义，这导致所有（促成身份确定的）地位和决定似乎是与时间有关的而不再是与存在相关的。

> （因而）时间不仅是主旋律，而且非常深刻地并且有效地嵌入到社会的自我描述中。因此，人们最终不再能保留先于时间确定的客体的和主体的身份；确切地说身份是在时间之中、在每个当下被构建和再造的，以便为某个时间产生时间联系，这样的时间联系在 364
> 极度不同的时间地平线上居间调节了过去（记忆）和未来（在所有可观察到的重要的区别中的摆动）。[30]

与此同时，这样的有关时间的理解在哲学中，同样也在社会科学中带来了时间的时间化的概念：时间的时间化是指行为、事件和联系首先通过期限、顺序、节奏和速度才能得以执行，也就是说：行为、事件和联系在时间中决定自身，它们不再遵循预先确定的时间计划。因此，时间的时间化也同时矛盾地意味着被卡斯特斯所描写的永恒的时间。[31]

对这里的这个身份确定模式的变化是对社会加速的结果的假设而言，其关键主要在于两个事实：首先，时间化的时间是与前面所讨论的、在对经典现代的身份确定方式非常重要的生命历程制度和正常的人生的含义下的生命的时间化完全相反的。现代的第一个动态化阵发，导致了将生活理解为沿着预先安排好顺序的不同的发展轨道的有方向的运动，这些发展轨道是通过形式上的可期望性和对未来的可计划性所确定的，并且因而促成了对“人生计划”的设计；而对人生计划的设计却又废除了预先安排的顺序和可计划性。时间的时间化因而意味着撤回了在时间的延伸中进行规划的含义下的生命的时间化。其次，与此同时，前面所指出的更确切地说是理论上推导的时间的时间化的观念，作为有着

---

〔29〕 也请参考本书第五章。

〔30〕 Luhmann，1997 年，第 1014 页及其后页。

〔31〕 对此请参考本书第四章和第十章，特别是第十三章；有关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中产生的时间理解请参考 Sandbothe，1998 年。

西方当代社会发展烙印的趋势,在实证上也足以被证明。鉴于这样的发展,即常规的职业方面的和家庭方面的实施顺序(教育、职业、退出职场,或者说恋爱、结婚、生孩子)之间一方面越来越少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也越来越少地与生理的年龄相互关联,并且另一方面,连续的前进和
365 有序的顺序被多次中断,正如马丁·科利发现了朝向生命历程制度的去机制化和正常的人生的帮助定向的力量的不断丢失的趋势。[32] 但是,时间化的时间也能够在半外围的和外围的生活领域中得到实证证明。例如,在市民参与这个领域,就从很长时间以来可以诊断出在名誉职位的形式上的变化(从"旧的"变成"新的"名誉职位)[33],这种变化能够精确地描绘时间化的时间这个抽象概念:年轻的热心于市民事务的人越来越不愿意长期地和在预先确定的范围内受"职位"的约束。相反他们更喜欢灵活的聘用形式,他们希望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期限,而且在所确定的期限中能够灵活地决定他们自己的一周的或者一个月的时间预算的分配,这意味着,对于这样的行动方式而言,名誉"职位"的概念毫无疑问是令人迷惑的。市民参与在时间的时间化的过程中,与职业行为和从趋势上来看也包括在个人生活中的行为和关系一样,采纳了"项目形式",也就是说将灵活地决定期限、顺序以及往往也包括速度;但是,项目通常是能在短期内结束的,并且它的运行时间是被限定的。[34]

跟随在晚期现代的时间的时间化之后的永恒的时间,它的逻辑不仅表现在生命历程在时间上的去结构化,而且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弹性化上。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经典现代的功能分化的社会中的时间使用模式,主要是通过外在于事件的、线性的时钟的预先设定而确定的,这意味着,个体的行为模式是通过精确有序的小时计划、日计划、周计划和月计划与不同的社会功能领域内的"时间窗口"相适应的。优秀的时间管理体现在,预先确定的行为顺序尽可能"没有损耗"地——也就是说没有
366 期望之外的中断和空转时间,但是也没有相互重叠地——互相衔接,并且所设定的任务和职责也的确在预先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一个时间段

---

〔32〕 Kohli,1986 年、1990 年和 1994 年;同样也请参考 Castells,1996 年,第 439 页及其后页和第 445 页及其后页。在同样的含义下,鲍曼(Bauman,2000 年,第 116 页及其后页)和桑内特(Sennett,1998 年)阐释了在职场世界的预先确定的职业生涯的顺序的被侵蚀。

〔33〕 参照诸如 Heinze/Olk,1999 年;对此也请参考 Giegel/Rosa2000 年;Corsten,特别是 2005 年。

〔34〕 对此也请参考 Garhammer,1999 年,第 157 页及其后页、第 411 页及其后页和第 463 页及其后页。

内的行为的期限和顺序是在这个时间前是确定的和计划好的，以便能够保证社会上的行为运转的同步性和协调性。[35]

在系统的持续发展和同步化的过程中以及“系统的时间窗口”通过可支配时间、操作时间和可动用时间从趋势上来说无限制的扩展而带来的去边界化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集体的节律被侵蚀了，随之而来的是用于个体的特定领域的时间的弹性化，它现在在日常生活的时间策略和时间实践活动中表现为“范式转变”[36]：如果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例如上班、购物、会朋友、处理信件、照顾家庭，等等，不再有预先确定的时间窗口可支配——其原因是可以在任何时间做这些事情，而且其他的未预料到的时间往往也要求计划之外的或更努力地投入，那么合理的就是弹性地安排日常生活，在这个中间尤其是新的移动技术能够协调和同步化行为链条。因而，“经典的现代”的日常生活是通过预先确定的时间计划和以在这中间发展出来的时间例行程序为标志的，例如可以这样安排：*7* 点起床，*8* 点开始工作，*12* 点午休，*17* 点下班并购物，*18* 点从体操房接回孩子，*19* 点吃晚饭，*20* 点与朋友约会。而晚期现代时间化的日常生活时间却与之相反，事件的发生、期限、顺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灵活的。晚期现代的一天也是从起床开始，并随着上床睡觉结束，但是工作时间是弹性的，并且只是与截止期限协调，而且与此同时很多活动都是全天候可行的，在这里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动机决定是做这个还是做那个。[37] 367
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工作上的约会都能够通过移动的协调技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灵活地安排：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一方面取决于我的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何，而另一方面是由××参加的会议要开多长时间决定的。只要会议一结束，她就会给我打电话。如果那个时候，我还在家的话，我们就在我的家里碰面；如果我已经进城了的话，我们就在 *Y* 咖啡厅见面。我是在那之前购物还是在那之后，我可以到时候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时间顺序因而是在时间中由自己个性化灵活地创造的。

这种复杂性的时间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选项和偶然性又一次增加了，出乎意料、不可权衡性和突然的情况变化也急剧增多了，这些都使得传统的时间管理越来越无法以对时间计划进行纪律化的控

〔35〕　参考本书第一章“1”和第八章“3”。

〔36〕　关于这种范式转变的原因请参见本书第八章“3”；有关它的实证上的可信性请参考诸如 Seiwert，2000 年，第 15 页及其后页；Levine，1999 年，第 249 页及其后页；Geißler，1999 年，第 111 页及其后页；Hörning，Ahrens，Gehard，1997 年。

〔37〕　Geißler，1999 年，第 142 页及其后页。

制的风格开展了。这也是为什么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认为在他们的有关在晚期现代所形成的时间实践的实证研究中通过个案访问和小组访问能够证实,线性时间管理和按序排列的时间计划的经典现代的形式在此期间不再能保留下来了,并且解释了"时间经理人"也逐渐被新的生活方式中的人物形象——那些"巧妙地处理时间的游戏者"——所排挤的原因。[38] 这个"游戏者"能够克服现代的线性的、算错的和计划错的时间地平线,并且用一个(某种程度上让人感觉是前现代的,但是现在
368 是反身的)情境开放的和"事件导向的时间实践"来代替它。[39]

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也在时间的时间化的概念下重新把握所形成的时间实践[40],因为"游戏者"并不是在整体计划的或者一个抽象—线性的时间概念的框架下对事件的速度和期限以及相关联的行为作出决定的,而是弹性地及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地、似乎是从每个当下的时间的原时和时间地平线中产生的。"这样的'游戏者'不想再事先规定好,也不想再被预先给定好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为什么和为何目的发生什么。他不再想要确定哪些时间化的形式在什么时候是恰当的,而想知道,他通常会有时间用于单个的安排。"[41] 三位作者指出,游戏者能够做到"常常将所给定的放在不同的观察角度下,并且因此能够胜任晚期现代的'变迁'。通过对'开始、中断、延伸、结束'的游戏,游戏者开发出了以自身为导向的时间实践的独特特性,通过这些特性他探寻在'游戏的玩耍'中尽可能保持灵活性"[42]。用这种方式,"游戏者"通过时间的去线性化和时间的时间化学到,正如理查德·桑内特将之作为晚期现代的令人感到威胁的特性的,即所谓的"诸如时间上的不安全感、非同时性、

---

〔38〕 但是,这些作者有些令人困惑地将借助最新的技术努力保持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并重新赢回计划的可靠性的经典现代的时间经理人的类型描述为"被技术所迷惑的弄潮儿"(1997年和1999年)。

〔39〕 与一位所访谈的"新式的、转变了的"游戏者的谈话内容:"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把我的日程尽可能地以随心所欲的方式安排;当然,我也会约定约会,但是也完全有可能,我会推翻所有的约定。坚守在传统的时间上只是令人行动不便。以前一切都完全不一样,在那时我的周计时器以及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半小时为节拍分割的,那个时候我把时间分成了一段一段进行安排,这些都是历史了。现在我更按照我的冲动对待事物。这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Hörning, Ahrens, Gehard, 1997年,第142页)

〔40〕 同上书,第145页及其后页。

〔41〕 同上书,第178页。但是在这里不要忘记,基本是游戏者,尤其是在职业领域也是与并非由他决定的期限和日程捆绑在一起的,因而在那里他与事件时间的游戏似乎是"被殖民化"了。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本书第八章"1"。

〔42〕 Hörning, Ahrens, Gehard, 1997年,第16页;楷体强调部分出自原文。

不确定性、在不同的时间文化中的相互冲撞、断层出现等这样的干扰”完全不是“异常现象，而是包含在通行的、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之中的正常状态”[43]。 369

这种新的、“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的形式，也就是不再能凭借“经典现代”的控制需求和对安全感的需求而对未来的开放性和不可计划性作出反应的时间实践形式，是将晚期现代的日常时间的视角和生命时间的视角与其本身也是情境化的*新的身份确定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对于*经典现代*的生活方式形象和身份定位类型来说，不可克服的晚期现代的超级加速，在“游戏者”看来不再是威胁，他完全充满乐趣地将这种超级加速当做可能性生成器，通过它能够实现“越来越迅速的‘时间的时间化’”。游戏者“摆脱了……预先给定的时间强迫、时间约束和时间命令……他修改并且模式化他自己的高度情境化的原时。因而，这个‘游戏者’在他的方向中反映了增加了的社会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这样的社会在事件的潮水中，越来越多地在只是瞬间性的情境描述中捕捉它们自己的身份”[44]。

格特·君特·沃斯也从不断变化的模式中界定了这一类的情境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一边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另一边是*战略性的生活方式*。前者的内在逻辑的核心是“稳定性和不言而喻性：人们通过这样的生活方式将社会预先给定的‘井然有序的’生活的观念牢牢地作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安排的导向，并且人们在对生活的‘安排’的努力中首先看中安全性和规律性”[45]。生活方式的这种形式，显然是与在前面所得出的*稳定的先验身份*的历时性逻辑相对应，也就是说一次性找到的对身份模块的安排将被一直保留下来：“在这个意思上而言，当有人找到了他的‘生活’的时候，就可以下结论说，他不再可能会有变化了。”[46] 相

---

〔43〕 Hörning, Ahrens, Gehard, 1997 年，第 178 页。Brose、Wohlrab-Sahr 和 Corsten 也在他们的有关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形式或者类型的研究中以临时工作为例子得出结论，对变化的条件最好的适应以及人生组织或者说生活方式的“最现代的”模式是与游戏者的做法非常相似的“去中心化的类型”：“在（其他）类型中感到难以解决的在去中心化的类型中却出现了进攻性的变化……这个类型的时间视野体现为‘当下的未来’。而这个未来表现为开放的……在这种可能性的含义下，未来是对不同的发展开放的……当不再有中心视角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固定的生活目标；确切地说这就是，是视角上的变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得以实现了，之后未来的偶然性不再是心神不宁的原因了。”（Brose、Wohlrab-Sahr 和 Corsten, 1993 年，第 322 页）

〔44〕 Hörning, Ahrens, Gehard, 1997 年，第 179 页和第 174 页。

〔45〕 Voß, 1998 年，第 20 页及其后页。

〔46〕 同上书，第 21 页。

反,对于从由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所定义的被技术所迷惑的弄潮儿
370 (或者说是时间经理人)的时髦人物形象不由自主地想到的战略性的生活方式,沃斯却将它作为在与晚期现代相适应的日常生活安排的方式中的一个变体、是许多生活关系中的一种,当然从他所选择的特征来看,这种弹性的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的确起源于福特式工业化的现代的生活方式。"'战略式的'生活方式涉及……系统的计划、计算和对人生中的关系和资源的主动的控制,从而实现人生规划:对于这种生活方式而言,重要的视角是对日常生活过程的持续的优化和压缩。"[47]沃斯对于这种情境化的生活方式和战略性的社会方式的相反之处作出了如下的总结:

> 战略性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严格的计划和僵硬的全面组织的基础之上的,它往往让人们想起企业中的科层官僚制度或者中央集权的组织(即便不是完全的泰勒化的)。而情境化的生活方式却是按照弹性化的逻辑,或者甚至是去中心化的逻辑,并且因此令人惊讶地与新的企业战略非常相似。战略性的逻辑实际上是与劳动关系、与虽然复杂但相比起来总是可以估算的、长期来看相对稳定的指导方针联系在一起的。相反,随着关系的动态性和去结构化的不断增强,情境化的逻辑将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48]

因而,我的理论是,日常生活的和一生的生活方式,现在是直接受身份定位的影响的,因为它们迫使个体保持时间地平线与时间期望之间的同步并且在时间的变迁中保持弹性和可变性。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被重新、情境化地联系在一起并加以阐释的地方,我曾是谁、现在是谁、将会是谁的构想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身份参数的形成和重要性也随着不同的情境而发生改变:"我是谁"要根据"我正面对谁"(肯尼斯·格根认为,个人的身份确定将很快被一个纯粹的'关系化的'自我的建
371 立所代替)[49]、"正在哪个社会领域里行动"来决定;哪个身份维度(职业、宗教、家庭、性关系和政治取向、消费风格、休闲活动等)是中心的、哪些是外围的都不再清晰了。自我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也因此变得要根据背景灵活地构建了,自我的稳定性不再与实质性的身份定义有关系。

---

〔47〕 Voß,1998 年,第 21 页。
〔48〕 同上书,第 25 页。
〔49〕 Gergen,2000 年,第 156 页及其后页。

因此，格根（与其他一些学者一样）[50]看到了可实证证明的预兆，即自我的愿景和地平线不再是历时地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向前发展，而是个体被裹挟进入同步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事件，也就是说自我不再能被看做是统一的或者至少是时间固定的身份规划了。这从主体那一面来说，折射了在前面一章里所讨论的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空间时间上的"脱位"的结构化的逻辑，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都失去了背景方面的关联。在"后现代"的身份确定理论中常常指出的在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的自我的碎片化、多元化或者增加，这些新事物在我看来，不是别的，正是同步的和历时的生活实践中的时间的去时间化的逻辑结果，而它又是社会变化速度加速越过了整合能力的关键的门槛之后所带来的后果。

在加速社会的强迫下必须放弃的是，持续或者长期进行的身份规划的观念，甚至是自治的想法[51]，这些使得主体的对自身所确定的价值与目标的超越背景的和时间稳固的追求成为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以相对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身份定位为特征的经典现代的人格类型与情境化"造型不断变化的"自我的形象（利夫顿*）[52]或者说"集锦式的人格"相遇了；而格根对"集锦式的人格"的定义是："集锦式的人格就是社会 372
中的变色龙，不断地从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得到的资源那里借来零零星星的身份，并且不断地将自己构造成对于所给定的情境来说是有用的或者是令人满意的。"[53]因此，前面所描述的发展中显现出了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消失点，在这个消失点上完全不用再讨论身份确定了，因为在一边是连续性和一贯性、另一边是弹性和变动的平衡正不断向着使前者消失的方向移动。在有关身份定位理论的争论中，针对这样的观点所提出的异议，不仅对相应的观察的实证上的说服力提出了疑问，而且也对这种自我关系的形式的存在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54] 我也反对这样的假

〔50〕 Bilden，1997 年；Helsper，1997 年；也请参照 Wenzel，1995 年。

〔51〕 我在这里和接下来所使用的"自治"的概念并不是与康德所说的道德上的自我监管密切相连的，而是在道德伦理上和身份确定理论的理解中的人生过程的独立自主的发展。

* 罗伯特·J. 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1926—），美国精神病理论家、政治心理学专家。主要著作有《革命的永生》《思想改造与集权主义心理》和《虽死犹生：广岛的幸存者》等。——译者注

〔52〕 Lifton，1993 年；对此也请参考 Wenzel，1995 年，第 121 页及其后页。

〔53〕 Gergen，2000 年，第 150 页。

〔54〕 Straub，2001 年；Joas，1994 年。利夫顿本人也特别指出，形态不断变化着的、新教的自我以非线性化的、片断式的方式不断地再次产生一贯性和连续性。

设,而是认为已有的实证方面的发现在对有关晚期现代的情境化的身份的形式的趋势诊断中趋于一致,也就是说情境化和身份确定之间的相互矛盾的特性得到了统一。[55]

如果将身份定义为能够超越变化着的背景而给予主体一贯性和连续性的事物,那么情境化的身份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contradictio in adjecto)。如果身份定位被理解为对我是谁提供意义的导向能力和行为能力,那么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似乎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不断增加的个性化和加速的逻辑上的消失点:每个含义的实质都随着背景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所有的实践关系中,对决策和行动起指导作用的身份感却并没有消失。因为这样的身份定位的观念当然没有表明,所有的身份定位特征都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更确切地说,可能的情况是,与大多数情况相反,有一些情境和背
373 景是保持同步的和按时间顺序的,因而情境化的身份定位尽管不再能够像定义那样被确定下来,但是却也是可以通过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家族的相似性"相互联系起来。这个概念因而只暗示了,身份确定本身不再是在时间中稳固的了,并且身份特征的重要性、相互关系和延伸都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一个跨情境的统一的和连续的不健全的自我,只有在保证了根据我的理解所提出的以下四个要素时,才能表明对它使用身份确定的概念是正确的:

(1) 首先,情境化的身份定义至少也要允许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个体生活中的不同的意义领域和功能领域之间有着最小的关联,但是这些遵循叙事模式的联系却是产生于所给定的情境化的背景的。[56]

(2) 然后可以假设,主体深受似乎是习惯性的连续性的影响,这种连续性体现了相对的时间上的稳固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布迪厄所说的外表举止,即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偏好和倾向、我们的姿势和表情、我们的审美品位的特征等所反射出来的自我确定产生并保持了我们的身份感觉。这些外表举止等外部特征完全不能摆脱变化,并且也不是不随背景而改变的,我们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总是由不同的情境而决定

---

〔55〕 也请参考 Rosa,2002 年 a。

*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年),出生于奥地利,后加入英国籍。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开创者,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简论》《论确定性》《数学基础评论》《颜色评论》和《文化与价值》等。——译者注

〔56〕 对此请参考 Anderson,1997 年;Kraus,2000 年和 2002 年。

的，当然它们在它们的基本模式上可能只是微小的变化，而且极其罕见的是有目的的改变。因而，体现在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生活关系中，自我感觉基本在它看上去迷失于自反的身份的情境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情境变化之中的地方也能够促成连续性。由此这样的想法自然就显而易见了，即连续性和一贯性在现代的进程中，不断地从自我的核心的问题变成了风格问题：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少地通过所承担的角色的类型和总和、所赞成的信仰和占有的地位来表现自己的特色，而是越来越强 374
烈地通过他们对生活中的意外和沉浮变迁的方式来表现了。但是，一贯性的这种方式更确切地说应该算作“经典的现代”的打上浪漫主义表现风格烙印的那个侧面，而不是极端的“后现代”的[57]：真正的后现代的自我正是通过既感觉不到对统一的风格的内在约束是同步的，也感觉不到是历时的所体现出来的。极端的情境化的身份确定因而可以表现为，例如，一个主体实际上是相信上帝的和内向的、在两性关系中是“柔弱的和女性化的”、在工作中却是沙文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在和平示威游行中是和平主义者、在党派聚会中却是激进的军国主义者和无神论主义者，但是这些联系在一起的矛盾并没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相反，后现代的“我是很多人”的信条的魅力正在于，即便在这样的风格问题中，也能灵活地尝试各种可能性，并且集锦式的、大杂烩式地接受这些可能性。这种内在的多元化的问题是：主体要被迫确定重要性和优先性的时候以及从这些多样性中将会产生相互冲突的行为要求。

（3）关于在变化加速的时代中其他的、令人惊讶的促成连续性的可能的帮助，蒂尔曼·哈贝马斯（Tilmann Habermas）* 在他的研究中指明了爱恋的对象（Geliebte Objekte）与身份形成之间的关系。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个体与之发展出个人的和情感性的关系的对象，似乎承担着“过渡客体”的功能，当身份定位和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完全再现着和象征着连续性和一贯性。在这个意义上，在晚期现代，通过有意识地决定至少是暂时摆脱围绕着我们的“一次性的产品”的占优势地位的偶然性，个人的物品（或者也包括外表举止）可能会为时间稳固的实质的身份定位“保留位置”；它们促成在自我的再组织的时代中的暂时的稳定

〔57〕 有关查尔斯·泰勒所提出的现代的身份确定的浪漫主义表现风格的一面请详细参考 Rosa，1998 年，第 351 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 Gergen，2000 年，第 18 页及其后页，在那里指出，对自我的浪漫的设想对于现代的自我只是暂时的，尽管产生了深远的文化方面的影响。

* 蒂尔曼·哈贝马斯（1956—），德国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爱恋的对象：身份形成的符号和工具》等。——译者注

375 性,并且在发散的环境和情境中提供了没有断层的过渡。[58]

(4) 正如最新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与诸如符号学的互动主义的猜想相反)所指出的,主体也似乎能够通过"先天的"、没有称谓的"核心—自我"而支配这种类型的稳定装置,"核心的自我"使得身份感觉在各种情况下,甚至是在完全情境化的非连续性中也能得以维持。[59]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情境化的身份定位被认为是在哲学上和心理学上相互关联的,并且在晚期现代至少是在经验上产生了这种可能。情境化的身份定位形成了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之间与个性相关的关联,它无疑无法通过这种关联为生活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所有人或者只是大多数人定义社会的现实,但是自我关系的模式却描述了,在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逻辑是与当代社会相符的。

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主体的空间关系、时间关系和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正是由此形成的他的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在晚期现代事实上是持续地变化着的。从空间的视角来看,置于现代性之中的将个人的身份定位从固定的地点——世界从那里开始发展——中的分离过程将再一次更加极端化。自我关系越是强烈地定义并稳固于流动的空间之中,身份定位就会越剧烈地确确实实地失去它的地理上的"固定地点":移动性的"经典现代"的形式允许从固定的"居住地"出发的巨大的移动
376 性并且与此同时也使居住地的顺序变化成为可能;而晚期现代则是游牧民族的居无定所的形式(鲍曼语)的或者地点的多配偶制(贝克语)的,身份确定理论在这两者之间张开了非常大的空隙。[60] 定居在汉堡(Hamburg)、在五个月之后常住在西班牙(Spanien)或埃及(Ägypten)的人,实际上与那些已经无法或者不愿意再说自己到底生活在哪里的人,有着不同的"存在于空间中"的方式。

而且在我们周围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快速变化速率的基础上,在晚期现代中也出现了齐美尔所观察到的自我和他的当地的以及物质的环境

---

〔58〕 哈贝马斯引用了一位医科学生谈到他心爱的自行车时所说的话:"这是我仍然还拥有的最后的世界观"(Habermas,1999 年,第 431 页及其后页,并请参考第 506 页)。万宝龙国际有限公司(Montblanc International GmbH)的总经理 Norbert A. Platt 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奢侈品品牌的吸引力正是在于,它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体现了传统、耐久性、引入深思的和缓慢的重新回归的价值"(Habermas,1999 年,第 457 页及其后页),因而能够在一些领域内拒绝变化的速度。

〔59〕 参考诸如 Glass,1993 年。

〔60〕 Bauman,2000 年,第 13 页;Beck,1997 年,第 127 页及其后页。

产生距离的过程："文化内容的客体化的过程是专业分工所带来的，导致了主体和他所创造的客体之间越来越强烈的陌生感，最终也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亲密行为中。我们周围的家居设施、物品……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仍然还是相对更为质朴和经久耐用。因此产生了个性和生活环境中的物品'长在了一起'，因而即便是平常的一代人在今天也表现为令人称奇的祖父母。"[61]因而，从中可以得出结论，身份确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从空间的环境和环境中的物质结构中撤出来：它不再在这些空间中延伸，并且也不再通过这些而被定义了。已经没有任何出自他的人生贯彻过程中的（时间化的）地点的特性"根本性地"依附在主体身上了，而是相反，主体也不再进入任何一个地点了。[62] 这似乎是泰勒所假设的自我的"萎缩"的过程确确实实到达了一个点，从这个点上出发，所有的关系，无论是空间方面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都是偶然的、可塑的，而且几乎是可以无限 377
制的选择的，但是似乎一切都没有称谓，因为自我完全什么都不是了。[63]

而这正是极端化的"加速社会"的功能性的要求，在这样的社会中，参照群体、交流伙伴、物品、想法和工作等等都是如此快速地变化，以至于它们的内容越来越不重要，而且是可交换的；反过来说就是，主体相对内容越是无关紧要，他就能够越好地适应加速要求和弹性化要求。这样的趋势也已经被齐美尔预言过，他同样也因为这样的观察而在后现代的

〔61〕 Simmel，1900年，第637页；参照Harvey，1990年，第286页。哈维将晚期现代的意义看做是齐美尔所描写的模式的出现："单是在消费前线的刺激的轰炸就产生了感觉过载的问题，齐美尔剖析了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最现代化的城市的问题，指出人们似乎是被围到了相对而言无意义的围栏中了。"

〔62〕 详细内容请参考Rosa，2002年a，第286页及其后页。

〔63〕 Taylor，1994年，第288页及其后页；请参考本书第六章"3"。Werner Helsper也在他对后现代自我的可能的形式的思考中观察到了这种自身的、通过称谓确定的自我的疏远的形式（1997年，第177页）："现代的自我是……*尤其反身式的*，或者说是自我指示的，因为生活形式、价值阐释、文化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的多元化和由于选项的增加而要不断地作出的决定的多元化，都将自我放在与社会关系和主体关系疏远的关系当中……反身式的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为自我带来了与它自身和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讨论环境中享有极大的声望。[64] 斯蒂芬·布罗伊尔因而在维希留的基础上假设,主体和客体在加速的社会只是"偶然的"(或者点状的)发生
378 联系,因此这个世界"永不停歇地受到变故"的袭击,而维希留本人认为,实质和零星情况在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就交换了他们的角色:短暂性将成为必然,而实质变得微不足道。[65] 相应的,永远的革命和与之相伴的流行、风尚、内容和物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失去价值,也必然导致重点的转移:体验或者关系的内容或者说对象本身应该算作(长久的、"深远的"、促成身份定位的)价值的假设,将永远是失败的,并且可以猜想最终是不成立或者不再成立的。[66]

建立在稳定性基础上的自我规划在晚期现代因而显得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也被判定为是失败的,与此同时以弹性化和变化意愿为基础的身份定位形式正在系统地建立起来。与之相反,赞成持续的改变的观念并将之作为根本的自我规划,本身就又会成为生活速度的加快和社会变化加速的推动力量。[67]

正如我接下来要阐明的,通过在这里所呈现的人生实践方面和日常

---

〔64〕 "一个完全一致的人环抱着他的整个生活的风格因而毫无疑问可以用与之一致的内容来展现。因为所有他构造的或者观察的一切都不言而喻地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因而完全没有心理学上的动机,将他从这些构造和观察的物质中在想象中分离出来,并作为'我'的特有的领域的构成而单列出来。只有当这个人的独立性和与我们无关的重要性面临着要选择自由、自身或其他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多数的风格才是分别与它们的内容分开的……由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所有的观察内容都是与风格分离的,因而分离了原始的关系,在那里主体和客体似乎是没有区别地静止在那里,并且世界将根据自身的规则所发展出来的表现可能、对生活的根本的表现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因而一边是这些形式,而另一边是我们的主体,如同两个派别,在这中间完全偶然的关系被触动、协调和不协调所控制。"(Simmel,1900 年,第 642 页及其后页)。有关将齐美尔看做是后现代思想的领跑者方面的内容请参考诸如 Kaern、Philips 和 Cohen,1990 年;Dörr-Backes 和 Nieder,1995 年;或者 Moebius,2002 年。

〔65〕 Breuer,1988 年,第 323 页;Virilio,1998 年 c,第 184 页及其后页;参照 Crogan,2000 年,第 171 页及其后页。

〔66〕 在联系到托夫勒(Toffler)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时,哈维评论道(Harvey,1990 年,第 286 页),"一次性社会"的概念意味着"不只是扔掉所制造的物品……而且也能够丢掉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以及也扔掉了对事情、建筑、地方、人和所接受的做事情和生存的方式的依附"。当 Bill Martin(1998 年,第 5 页)因而抱怨,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意义的时代的时候,因而这样的困难应该是晚期现代的变化速度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67〕 在齐美尔那里也发现了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令人吃惊(Simmel,1900 年,第 675 页):"在精神的中心缺乏确定性导致,在新的刺激、轰动的事物、外在的行为中不断寻求短暂的满足;因而我们陷入了混乱的没有停歇、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我们表现为一会儿像是处在大城市的喧闹中,一会儿像是得了旅行狂躁症,一会儿是疯狂地在竞争中角逐,一会儿是现代特有的对审美品位、风格、思想和关系等领域的不再忠诚。"

生活实践方面的时间的时间化也是主体自身的时间体验，也就是说，主体所体验到的自己处于时间中（也包括处于历史中和处于社会中）的类型和方式，正随着影响深远的道德伦理上的、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结果 379
而发生着变化。当主体的自治要求被确定下来之后，在日常生活的身份确定工作中，需要完成的与日常生活的时间地平线、自身的生命的时间地平线和历史时代的时间地平线的联系是非常棘手的。不仅有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而且尤其也有很多社会学的研究，集中于当代社会的个体的对于身份确定非常重要的时间体验的领域，这些研究发现，在公共领域赢得了日常生活实践和人生实践中的时间统治，和与此同时失去了对自己的生活的自治和控制的感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情境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境中，一方面，如果自治的要求被维护下来的话，个人的生活必须以比以前更强有力的方式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并且积极地展开，因为预先给定的规范人生的导向和标准化的人生历程程序被侵蚀了，而且人生的内容方面的结构和时间方面的结构都是开放的；与此同时，另一方面，这样的长期设计由于一再增加的社会的动态性而变得困难，或者甚至是不可能的了。因而，“越来越有必要将不可计划性、不可预测性、不可决定性纳入计划中，并且作出不计划、不预测、不决定的决定。换言之，过去和未来一样都越来越小，但是必须更为频繁地起草现在”[68]。由于这样的要求就像是计算圆圈的面积一样难以实现，因而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放弃自治要求和逃避到新的或者说“第二”宿命论中，这些诸如伽哈玛在他的实证研究中、斯劳特戴克从哲学的角度都已经观察到了。[69]

有关不受控制地和不可控地“被推向”选择和偶然性的海洋的感觉，体现了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无法进行长期的规划而且也不能发展有约束力的对未来的期望所带来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在这当中不仅反映了对积极主动地构建自己生活的要求的放弃，而且同时也反映了这 380
样的事实，即并不是说当偶然性被回收起来的时候，就一定会赢回自治权力，而是恰恰相反。[70] 不断地放弃对长期的“人生”计划的设计和执行，是作为主体对时间的时间化所作出的反应，这一点在这期间已经得

〔68〕 Hörning, Ahrens, Gehard, 1997 年，第 180 页。

〔69〕 “到处出现的第二宿命论是一种意识，它发现，今天的事物往往与人们所想的大相径庭”（Sloterdijk, 1989 年，第 112 页，参考第 126 页；Garhammer, 1999 年，第 482 页）。

〔70〕 参照 Garhammer, 1999 年，第 482 页。

到充分的实证证明,这些实证研究尽管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但是诸如曼弗雷德·伽哈玛、理查德·桑内特和卡尔海因茨·盖斯勒或者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等人的看法最终也达成了一致。[71]

为了实现长期目标而推迟对需求的满足的意愿的不断降低也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最有说服力的实证指标,因为这样的意愿"在未来的奖励是相对确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人们的掌控之中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72]。这样的条件不仅不再存在,而且正因为如此,年轻人的当代导向明显地增加,这一点在对新的时间的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标准化研究中都有体现。[73]

桑内特以他所开展的叙事性访问为基础,理解了随着时间的推进自
381 我的变化在晚期现代的体验,在他的中心的、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那里借用的漂泊的概念所隐喻的"永恒的内在驱动的""不稳定的生活体验"中显然是非常消极的,这种社会体验与通过自己的行为而获得的"对生活事件的控制"的感觉以及相应的要求是相反的。[74]桑内特所提出的作为"一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行为到另一个行为的漂来漂去的体验的"漂泊[75],我们也可以在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所定义的"巧妙处理时间的游戏者"这个时髦人物形象的决策模式中遇到,因为这个游戏者向经典现代提出了放弃反身控制的、积极主动的生活方式的中心要求;与此同时,他也放弃了对可靠性和本真性的

---

〔71〕 进一步也请参考 Gergen,2000 年,第 20 页及其后页。

〔72〕 Adam,1990 年,第 124 页。

〔73〕 有关定性研究请参考诸如 Urry,2006 年,第 17 页及其后页,厄里也描述了对城市中的休闲空间、工作空间和体验空间的相应的重新构造的观察。有关标准化的研究请参见 Garhammer,1999 年,第 482 页;Robinson/Godbey,1999 年,第 137 页;Brose,2002 年,第 131 页及其后页和 Fuchs-Heinritz,2000 年。但是,框架研究的日期在这里是有矛盾的,因为研究中指明,对未来的自己的生活的设想的范围,在 1999 年比 1991 年有了略微的提高(Fuchs-Heinritz,2000 年,第 30 页)。而在 2002 年的一项对图林根(Thüringen)的各种类型学校的毕业班学生所进行的大范围的问卷调查(样本量 =407)中却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对于你认为在多大的时间范围内是可以进行计划周密地展望的问题中,有超过 40%(40.3%)的学生回答说"未来和今天一样都不再能进行计划了",而只有 4.2% 的学生相信能够对他们未来的整个人生进行展望(Behr/Kottmann/Seiwert,2002 年,第 14 页)。与此同时,78.7% 的被调查者承认,对自己的人生历程只有模糊的设想,在剩下的学生中有更多的人(10.8%)对未来的人生毫无设想,而只有 9.3% 的学生打算一步一步地规划他们接下来的人生(同上书,第 16 页)。

*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主要著作有《公众舆论/舆论学》《自由与新闻》《美国的检察官》和《冷战》等。——译者注

〔74〕 Sennett,1998 年,第 160 页和第 181 页。

〔75〕 同上书,第 31 页。

探寻。尽管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它们对事实的评估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它们在这个判断上达成了一致，即决策和行为的新的情境化和时间化，是与指向个体的人生规划对时间稳定和跨情境的追求并且因此指向稳固的未来的地平线（以及过去的地平线的）的现代的自治思想无法协调一致的。

对于罗伯特·劳尔而言，放弃对未来的理性的规划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性的漂泊，或者更糟糕，是社会性的混乱”，并且他猜想，系统的情境化的当代景致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病理学。[76] 不可能比桑内特的这个判断能得出更有价值的结果了，在他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实证证据指出，“游戏者”的漂泊导致了人格或者个性的瓦解、导致社会关系被腐蚀以及社会信赖被破坏。“在新的资本主义中的时间条件造成了个性和 382
经验之间的冲突。没有上下文的时间中的经验威胁着人们将自己的个性造就成持续的叙述的能力……个性的被摧毁可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没有什么是长期（可以作为新资本主义的指导性的座右铭——本书作者注）的了’从长远来看打乱了每个行为的顺序，瓦解了信任和义务之间的联系，并且埋葬了自尊的重要元素。”[77]

相反，肯尼斯·格根却成功地对新的情境主义给予了高度的乐观的评价，所有桑内特认为是被削弱的地方，在格根看来却是被填充了的：“这样的（接受‘集锦式’的人格的——本书作者注）报酬是实实在在地投身于亲密关系、幸福的孩子、职业的成功、实现社团的目标、个人的受欢迎等。如果一个人避免回头找寻一个真实的、持久的自己，并且只是单纯地去做眼下这个时刻可能做到的，那么上述一切则都是可能的。”但是格根也在这里非常清晰地指出，*漂泊者是要以失去自治权和放弃作为自己的生活的（合）作者的要求为代价的*。在他的最近出版的著作的导论中，在标题为“失去控制”（Out of Control）的段落中描述了在通往“多样化精神”的道路上他自己的体验：“我也与我的最时髦的旨在持续提升、进步、发展和加速的训练做斗争。慢慢地，我学会了愉快地放弃对

---

〔76〕 Lauer，1981 年，第 37 页和第 114 页。在这个论点的含义下并不能排除，晚期现代“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由于它们的叙事式的愿景的失去以及由于它们的未来的地平线和过去的地平线的不断缩小的半周期以及它们的似乎是结构化的差异，会积聚没有方向性的心理能量，这些能量会导致表面上看没有理由的暴力的释放。“身体上的暴力的吸引力产生于，身体暴力缩短了时间、它直接呈现出后果、它从字面意义上说能够出口短气，而不要求长久等待。”（Nassehi，2000 年，第 36 页；也请参考 Reheis，2000 年，第 1 页；进一步请参看 Enzensberg，1994 年，第 33 页；Assheuer，2000 年）

〔77〕 Sennett，1998 年，第 37 页及其后页。

夺取我周围的一切的控制权的渴望。在深思熟虑地游向大海中的某一点,也就是说必须控制波浪达到目标,与顺着大海的不可测的波浪而和谐地漂浮着,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78]毫无疑问不能将这种"视野可以被调整"的形式误解为被动的生活方式:情境化的自我能够依背景的变化而采取有力的努力,以便实现主体的目标和/或者满足社会的要求,但是却放弃实现长期性的、跨情境的"生活目标"。

但是,由此在这一点上我看到的却是,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在人生的
383 实施中失去了它的方向,它不再能被理解为有方向的运动了,而且进步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要被叙事性地重构。生活不再向任何地方运动,它最终只会以很高的速度出现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下,时间的时间化意味着生活的去时间化,并且因此从趋势上来看,会出现对前现代静态—情境化的生活方式的回归[79],尽管生活中的偶然和变迁沉浮在今天也是另一种特性,即所谓的社会内生的、自反性的特征。前现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中确定的"事件"嵌入在非常稳固的、由自然和社会机构所形成的静态的结构中;这些事件通常不是具体的,但是往往能够预期会出现的各种可能(即便对于旱灾、战争和饥荒也是一样);它们的重要性是在惯例中并且/或者通过传统所确定的。相反,在晚期现代,可能的事件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并且它们本身也处于飞快地变动中,因而不再能够通过惯例和传统加以确定,而是在可能性范围增大的不可预测性之中,不再能够识别它们的重要性,而只是任其自己设置而已。

设置优先性和重要性是时间计划和构造的绝对必要的前提;但是只有在一些框架条件和基本方向抽走了游戏的偶然性并且因此这些框架条件和基本方向能够作为秩序因素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个前提才是可能
384 的。存在于情境化的身份确定的特征中的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设置时

---

〔78〕 Gergen,2000 年,第 150 页和第 18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79〕 伽哈玛也在同样的意义下,诊断出"返回情境化的生活方式"的情况(Garhammer,1999 年,第 476 页)。而且 Brose、Wohlrab-Sahr 和 Corsten 在他们的著作中(1993 年,第 323 页)最终确信,他们所研究的"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形式其特征体现为,"人生历史发展的目的论的观点的破裂。'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形式不仅告别了由'外部'安排的目的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地位顺序的有步骤地实现中观察出来,而且也无法从身份特征中读出这种形式的'内化'了的版本和要实现的人生目标,而是'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形式被理解为一个成熟的过程,它直接是以实现完美化的设想为导向的。生活历史发展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连续性和线性化都不再是独立的导向基础了。在被我们重构的人生的发展模式中,在另一种意义上意味着功利主义的行为理论的(人生)目标将是偶然的。"

间稳固的行为的重要性和相应的行为的优先性，而这些重要性和优先性是在“使命”的含义下发展出来的[80]，导致了大量的作者在相互独立的观察中都看到的矛盾的变化，这个矛盾就是，从“时间化的”和与此同时的加速的或者“迅猛的”时间的体验中却产生了去时间化的体验、时间上的静止状态的体验。“如果有人以‘理智的’程度致力于某项使命，他就完全不会将时间体验为一个独立的维度。只有当他被过高要求的时候，他才感觉到约束和压力。而另一个极端是：当一个人意识到不会因为任何事物、想法和其他的人而做任何放弃的时候、当一个人要完全保持‘自己’节奏的时候，或者当一个人能够只是在表面上卷入一些活动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某种时间的静止状态、一种黏滞性，在他看来似乎恒定的事情反复出现，尽管其他的事情绝对在发生着”，哲学家克劳斯·米歇尔·柯达勒(Klaus-Michael Kodalle)*作出了这样的描述。[81]

社会加速的矛盾的对立面就是所感觉到的深层次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停滞，它与现代的加速历史如影随形，同样因为如此，这种停滞在晚期现代的文化的自我感知中赢得了优势地位。快速的停滞状态的隐喻，用来描述与晚期现代的情景化身份确定的形式相互关联的时间体验，从两个方面来看都是恰当的：时间停歇，是因为在流动的空间中社会变化速度的提高，也是因为体验和行为的去背景化和变得片断化而使得记忆痕迹逐渐萎缩，并且因此，正如在第六章“2”对主体的时间体验的讨论中所得出的结论，时间加速流逝的体验变得是有根据的。时间静止不动，是因为在永恒的时间中在变化的背后不再能够识别出任何发展，因此生活在缺乏时间的结构视角的基础上如同没有目标的漂泊穿过不断变化的情境，并且由此：看上去像是永远的相同的回归了。“在1996年(在东德——本书作者注)，认为‘在我的生活中的确不再会期待什么新的东西。反正发生的一切也都是我无法影响的’人的数量翻了一倍

385

〔80〕“‘游戏者’的交流的高度动态的形式的目的在于不断融入新的意义世界，这可能导致游戏者迷失在交流的令人神魂颠倒的游戏中。人们要不断地跟进由外界所提供的无穷无尽的参阅系统，并且完全有可能面临着识别重要性、时刻关注其中重要的事物的巨大困难。‘游戏者’的难题在于：设立与自身相关的界限、放开与事物的纠缠、开发自己的停止规则并且将一些东西规定为结束”(Hörning, Ahrens, Gehard, 1997年，第165页)。

* 克劳斯·米歇尔·柯达勒(1943—)，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政治作为权力和神话》《令人惊讶的疏离》《潘活话：对他的神学的批判》等。——译者注

〔81〕Kodalle, 1999年(导论)，第12页。对此也请参考Robinson和Godbey, 1999年，第47页及其后页；进一步还可以参考Garhammer, 1999年，第482页；Sennett, 1998年，第121页；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参照Rosa, 1999年d。

还多——从14%到32%",这是伽哈玛所引用的米歇尔·海德(Michael Häder)*的调查结果。[82] 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也观察到了同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是,与时间的斗争似乎到达了临界值,因而到目前为止的有关线性时间的理解的优势地位显示出了自己的局限:'对速度的狂热崇拜'被推向顶峰,并且它所点燃的动态性面临着停滞在'快速的静止状态'(维希留语)的危险。"[83]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种时间的静止状态对应于对晚期现代的文化的透彻的体验,这种体验表现在一张非常畅销热卖的音乐唱片的标题上[赫贝特·格勒内梅厄(Herbert Grönemeyer)**的《一切都保留为另一个样子》(*Bleibt alles Anders*)或者Fury in the Slaufhterhouse乐队的《不快》(*Nowhere-fast*)],出现在报纸的大标题上[《一切都没有变样,只是更加快速了》(*Alles bleibt wie es ist, es geht nur immer schneller*)]或者也出现在畅销书中,诸如道格拉斯·库普兰所讲述的萨克斯拉亥玛市(Texlahoma)的加速文化的故事(*Geschichte für eine sich beschleunigende kultur*),这个城市被凝固在永恒的1974年里了。

罗塔·拜耳(Lothar Baier)***也以自我感觉为题目展开详尽的论述,并且同时可能也是最意味深长地指出了这种时间体验和自我体验的病态的决策形式[84]:大量的研究发现抑郁症在现代社会急剧增加,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抑郁症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全世界
386 第二常见的疾病。[85] 这种抑郁状态毫无疑问可以被理解为时间的病理学,并且包含三重含义:

首先,在今天达成共识的是,这种抑郁状态是不断增多的压力体验,

---

* 米歇尔·海德,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Delphi问卷调查》《社会实证调查》。——译者注

〔82〕 Garhammer,1999年,第482页。

〔83〕 Hörning,Ahrens,Gehard,1997年,第60页。

** 赫贝特·格勒内梅厄(1956—),德国音乐人、演员。——译者注

*** 罗塔·拜耳(1942—2004)德国作家、出版人。主要著作有《年限》《没有时间的民族》《被否认的乌托邦》等。——译者注

〔84〕 Baier,2000年,第147页及其后页。

〔85〕 Schulte-Strathaus,1999年,第29页。拜耳从这些实证研究中发现,在法国十个有心理疾病的人当中就有七个表现出病态的时间体验,"在20世纪末高度发达国家中有非常大一部分居民都感觉到被过高要求,这并不都源自于时间方面的挑唆"(2000年,第160页)。有关这个时代的人的其他的"时间疾病"形式,如急忙症或者精神分裂般的体验,即患者报告说,时间对他来说是"停止"的、完全没有时间了、"过去和未来在现在坍塌了、我不再能将它们区分开来"的内容请参见Levine,1999年,第52页及其后页和第69页及其后页(引文出自于这个出处的第71页)。

即并非期望中的时间压力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它也可能是匆忙的变化速率和高度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结果。[86]

其次，在这里所讨论的关联中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抑郁状态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它以感觉时间黏滞、静止的和失去未来的体验为特征。拜耳对自述的抑郁情况做了如下的概括：

> 难以说清楚的似乎是时间体验中的伤害，它导致了抑郁状况的产生，这是一种即便没有卡在其中，但在语言上已经被锁定了的时间体验……这种抑郁的感觉体会到……时间缠绕在一起，好像会引起时间上的窒息：人们已经无法从过去和未来之间穿过。但是，这种感觉只有在从世界的运转中掉了下来的时候，在其中未来不断地变成现在、现在不断地变成过去是不言自明的，这种感觉才会被加强。[87]

拜耳引用了精神病学家尤金·明科夫斯基(Eugène Minkowski)*的相关观点："我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指向未来而组织的。在病态性的放慢速度出现的地方，就是这种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地方；与放缓的程度相对应的在时间上一会儿是现在、一会儿是过去，这将产生病态的影响。"[88]罗伯特·列维尼也从精神病理学的发现中提出了对这种相互关系的假设。他引用了一位抑郁症病人所观察到(令人想起库普兰所讲述的萨克斯拉亥玛市)的现象，即"未来看上去是冷冰冰、昏暗朦胧的，我觉得自己被凝固在时间里。"[89] 387

最后，这种抑郁状态变成了晚期现代的病态，不仅是因为这种现象在晚期现代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它的侵袭这样的历史上的新现象；而且更是因为，它体现了从情境化的身份确定的时间视野中所导出的对快速的静止状态的时间体验的病态的纯粹的形式，并且也证明了这种形式的存在。"这种抑郁状态是失去导向的人们的扶手，而不只是他们的痛苦"，阿兰·埃伦贝格(Alain Ehrenberg)**这样描写道："它是

---

〔86〕 请参考诸如 Nuber，1999 年；以及 Levine，1999 年，第 52 页及其后页和第 69 页及其后页；Ulmer 和 Schwartzburd，1996 年。

〔87〕 Baier，2000 年，第 157 页及其后页。

* 尤金·明科夫斯基(1885—1972)，法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译者注

〔88〕 Baier，2000 年，第 158 页。

〔89〕 Levine，1999 年，第 70 页。

** 阿兰·埃伦贝格(1950—)，法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成就崇拜》《不确定的个性》《心神不安的社会》等。——译者注

人们施展他们的能量的后方。"[90]根据埃伦贝格的诊断,这种能量在生产性地施展方面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其原因是前文中所分析过的理由,即这些能量投入的每种可能的关系都是变化的、暂时的,并且因此并不是构成身份定位的。与动态化的历史在新时代相伴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难题是,在不断变动的文化诊断和讨论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首先被表达为懒惰[91],之后被世俗化为哀伤忧郁[92]、厌倦无聊,再后来又是神经衰弱[93],而到了今天则为抑郁症。"由于精神上的无能,而使人们的能量不能指向一个固定的、持久的和值得称赞的目标上,并且精力充沛地发挥它",这样的心理状态往往可以以似乎是做作的悲伤、单调乏味和(与此同时是内心的没有停息的)空虚、"精神麻痹"为特征的。

诸如此类的体验首先是被理解和接受为个体的(尽管是有时代典型性的)病态或者特别是诗人、艺术家或者哲学家的独特的"敏感的"气质,因为它们在"经典现代"的(自主确定和切实展开的)人生规划的理想观念中找到了强有力的文化上的平衡力量,因而这样的体验在晚期现
388 代被压缩成结构上的难以避免的普通体验。

> 当这种愁绪忧伤属于不同寻常的人们的时候,抑郁症则让这种例外变得民主化了。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必须有可能构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让命运来安排,并且这也是事实。通过个体的提议和开启这些可能性,人们能够活动在所有的直至最私密的领域。而动态化增加了不固定性、加快了稳定性的消解、多样化了所提供的支点,并同时也使人不知所措。穆奇尔*所说的"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是为这种不确定性而保留的,且逐渐接受那个被外界预先设定的身份,并被它所构造。"如同草茎和谷物一样;他们随着上帝、冰雹、火灾、瘟疫和战争可能是比现在更猛烈地摇来摆去,但是是作为整体、以城市的或地域的方式在运动的。"

---

〔90〕 Ehrenberg,1999 年,第 250 页,译文来自 Baier,2000 年,第 159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91〕 参考 Kessel,2001 年,第 20 页及其后页;Schings,1977 年。

〔92〕 Schings,1977 年。

〔93〕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的、有启发的内容请参考 Radkau,1998 年。

*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他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主要著作有《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协会》《三个女人》。——译者注

> 新的震荡是个体的,它来自个体的内部……抑郁症是在一个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并且是自由的社会里的哀愁忧郁,它是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最典范性的疾病。从这个角度来看,抑郁症是人们的主权的不可避免的反面,这个反面不是被错误地对待了,而是根本无法对它采取行动。在抑郁症那里,没有合法的概念,而只能考虑无行为能力这个概念。[94]

但是,无行为能力在这里并不是指(在柯达勒所表达的含义中的)在建立关系和联系上的无能所带来的最终的后果,无行为能力的原因在于,自我中的组成部分不再表现为是直接给定的,而是被发现的,并且在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在自我和世界(又一次是在教育小说和发展小说的含义中的)相互改造和继续构造的过程中,能够或者是必须自主地发展。相反,正如格哈德·舒尔茨所观察到的,在晚期现代,取决于机会的选择的行为类型已不再有什么是预先给定的这样的危险,这样的危险却冠以人们的意愿或人们的选择的名义威胁着产生影响的类型。[95]

389

晚期现代的身份确定的特征也表现为典型性的病态,也就是失去了自我的或者生活在时间中有方向的运动的感觉,并且因而也失去了发展的愿景。"如同本雅明所写到的,当'这种病症完全包含对这个社会的状态的了解',那么这种抑郁症可能是今天的敏感的、测量当今的和未来的偏斜的地震仪。它的麻木给出的是荒芜的静止状态的信息,这种静止的状态正在多姿多彩的激励下、在被新的不透明所锁定的用户界面下打着哈欠。"[96]

---

〔94〕 Ehrenberg,2000 年,第 124 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类似的诊断 Axel Honneth 也在他对(晚期)现代的个体化的矛盾的讨论中作出(2003 年,第 15 页及其后页)。

〔95〕 Schulze,1997 年 b。在这里 Werner Helsper(1997 年,第 177 页及其后页)也发现了令人沮丧的无行为能力可能带来晚期现代的自我的疑问:"从世界的多元化中是如何产生了社会组织的'疏离'的趋势,并且主体寻求在他的自我中的依靠,而这个依靠鉴于在社会强加的多样化的选择可能性的框架中的自我询问而一直是困难的……现代的自我的自我关系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产生于,这种自我关系由于开放的选择地平线而需要保持一直是有行为能力的。由于所被要求的自我关系未被实现,因而自我成了被社会进一步强迫的傀儡。这种自我关系由于不能结清的决策可能性的增多,而走向生活实践中的无决策能力和无行为能力,因而自我也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被外在所确定的了。而反身的自我在付出使用的、感性的体验的成本后,得以扩展,并且带来空虚的感觉和感官上的荒芜这样的后果。"

〔96〕 Baier,2000 年,第 161 页。

有关这样的时间体验的影响范围和伴随它而来的关于前进的语义的改变对讲求实事求是的修辞学的影响,这些都要通过对加速环境下的时间的时间化的过程的集体的层面的分析,也就是说,在对情境化的政治和以它为基础的晚期现代的历史体验的分析中,才能理解,而这些就
390 是下一章的内容。

第十二章　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时间地平线

1. 政治中的时间：时间中的政治

现代的政治项目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的构建集体的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想法，涉及两个基本的、几乎未加深思熟虑的有关社会的时间结构的假设。在这里首先谈第一个假设，它是关于社会是一个在时间中从政治上进行构建的项目的想法。现代的有代表性的表面民主和大众民主是在动态的历史理解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因而特别是制定法规并不是适合每个正在展开的行为的，也似乎不是永远固定的，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可以调节的、持续进行的任务。（与卢曼相反）我因此支持西蒙克*的观点，即对于功能分化和政治控制必须在对现代的理解中一起思考。西蒙克写道，现代社会首先是功能分化的社会，其次是增长的社会，第三方面才是被控制的社会：

> 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控制一直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成功的，也就是实现自我所设置的目标的。大家都知道，情况不是这样。尽管如此，在社会的行为者的那一面也产生了对自己的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实相对的、又是有约束力的要求，即不单单是社会结构的实质上的生产者，也是有意识的构建者：也就是说要对特定的结构的建造、维护或改变有控制力。这样的解释第一次表达了，前现

---

* 乌韦·西蒙克（Uwe Schimank）（1955—），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化理论》《社会学的当代诊断》等。——译者注

代社会在它的多样性和极端性中所表现出来的完全陌生的新时代的控制要求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所提出的政治控制的措施却
391 是独有的。[1]

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与之相联系,正如我将要阐述的,由于时间结构的原因,这些前提条件的实现在"经典现代"的时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晚期现代却一定是成问题的:因为期望在未来和过去是不一样的;能够理解社会在未来的发展;并能够进行政治的—民主的控制或者构建;规范的标准或者目标的预先设定对于政治—民主的构建来说要么是准备好的、要么至少是已确定了集体的、在政治上达成一致的模式,尽管保留了修正的可能。民主政治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中在这里与"时间化的"历史理解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正如特别是科泽勒克在他所出版的《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中通过对历史学学派的研究中所得出来的观点一样。"时间化的"历史理解为政治在历史的时间中分配了高度专业分工的任务,这个事实的最清晰的指示器就是,在经典的现代的两大政治阵营按照时间的方向标,被分为进步的和保守的。我将很快回到这种相关关系上来。

第二个基本的假设是,政治方面的形成决议、找到和执行决策决议的、包含着典型性的—民主的系统的、多样化的和机制化的时间结构,是与社会发展的节奏、速度、期限和顺序兼容的;换言之,这种时间结构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步的,因而政治系统有时间去作出基础的决定,并且能够组织形成决议的民主协商的程序。

但是,能够民主地控制或引导框架条件的发展的可能性,取决于一系列的高度时间敏感的变化过程或者转化过程的成功。正如我已经阐明的,到目前为止的有关新时代—民主的政治模式思考特别涉及,相对于它们的开路先锋和竞争对手,它们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里能够对决定性
392 的需求敏锐、迅速、灵活地作出反应的能力。[2] 这些政治模式的功能性因而关键取决于,集体的兴趣能够准时地并且迅速地被聚集起来同时被表达出来,能够被转化成政治程序,超越党派而被带到寻求决议或者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来,并且通过执行而得到相应的贯彻。与此同时,在这里也产生了控制框架,这个框架一方面表明了足够的机构的和制度化的

---

〔1〕 Schimank,2000 年,第 274 页及其后页。

〔2〕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也请参考 Chesneaux,2000 年。

稳定性，从而能够为社会功能领域（例如经济、科学、教育、法律）的发展保证必不可少的所期望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也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以便能够对变化的需求状况和新的发展作出反应。

动态的元素特别是通过清晰界定的立法阶段的期限——至少要有四到五年，而被纳入考虑。在与往往是要长很多的君主政体的君王的统治时间的对比中，可以明白为什么民主政体直到经典的现代才感知为政治加速的元素。民主的—动态的管理要求，时间期限要足够的长，以给予新的政府尝试和实施它们的政治程序的可能性；时间期限也要足够的短，从而阻止政治上的僵硬或者不可逆转的关系的形成。在这一点上，所假定的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化之间的时间上的咬合格外引人注目。因而，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上的关于多数人民主的边界的争论所清楚呈现的，政治决策的影响在时间上的作用范围，在西方社会的民主体系发挥功能的能力和获得合法性的能力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当政治决策拥有重大的、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影响的时候，决策的基础和决策的合法性在少数派的眼中的可疑性也以同样的程度在减少。[3] 与此同时，多数人规则被接受的前提是，少数派的意见的支持者认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有足够的动态性，从而他们不会失去在下一次选举中自己 393
也成为多数派的希望。

由于在政治决策的结构、执行结构和其余的社会领域中的“原时”之间的这种敏感的时间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加速过程对政治系统的发挥功能的方式和效能都产生影响，并且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在政治上的自我作用的可能性。无论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4] 还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5] 都特别强调了立法方面的从容不迫的方式和执行上的灵活且迅速的行动可能性之间的时间上的差

---

〔3〕 Guggenberger/Offe，1984年。

*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在知识论上，洛克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作出重要贡献。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被广泛视为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他的理论被反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主要著作有《人类理解论》《论宽容》《政府论》等。——译者注

〔4〕 Locke，1977年，第298页及其后页和第301页及其后页（第二篇文章，第155页及其后页和第159页及其后页）。

**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波斯人信札》《罗马衰盛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等。——译者注

〔5〕 Montesquieu，1992年，第214页及其后页（第十一卷，第六章）。

异,并且因此勾勒出后来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6]、约翰·杜威**(John Dewey)[7]或者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8]所观察到的政治上的决策能力在加速的背景下从立法机构转移到了行政机构。[9] 与这种转移相伴而来的,正如绍伊尔曼所注意
394 到的,是形式上的法律被(行政上的)规定所代替,并且导致形式上的法律的实质"被掏空",从而成为本质发生变化的程序上的规定或者框架规则。[10] 作为民主政治的时间方面特有的主要困难,体现在这样的事实当中,即多人参与式和个体协商讨论的决策过程在纳入广泛的民主公开性的情况下,只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具有而且是非常有限的加速

---

*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 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后功利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和《功利主义》等。——译者注

〔6〕 Mill,1971 年,第 89 页及其后页。

**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哲学之改造》《民主与教育》《自由与文化》和《追求确定性》等。——译者注

〔7〕 Dewey,1954 年。

*** 卡尔·施米特(1888—1985)是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对 20 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论专政:从现代主权思维的肇兴到无产者的阶级斗争》《政治神学:主权学说四论》《政治的概念》《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等。——译者注

〔8〕 Schmitt,1950 年。

〔9〕 事实上在速度或者是停滞与运动之间的关系的视角下,也能够看到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三分法:宪法的制度因其简单的立法过程是较为缓慢或者说是较为静态的,由于较大的法律上的障碍,宪法体现为固守的强有力的要素,因而在人们预见到了革命性的彻底变革的可能性的时候,往往在宪法上只是增量上的变化。处于不断提高的社会加速的压力下,宪法也处于变得不合时宜的危险之中。政治系统通过要么是将宪法规定越来越抽象地理解为最小化的程序规范,要么通过使宪法快速地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真实,从而能够对此作出反应(参照 Howard,1990 年,第 17 页及其后页)。绍伊尔曼似乎是倾向于后一个解决方案,关于似乎是"凝固"在时间当中的宪法的这个问题,他写道(Scheuerman,2001 年 a,第 64 页):"我们需要考虑到当代的宪法范例可能不再能够为了适应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而提供适当的修改原始条文的可能性了……一旦我们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不断地迫使立法院改写宪法的规范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没有停歇的步伐,我们至少就会开始想到机构的改革,它诚实地承认了,宪法立法的显赫的力量现在正主要被立法院所占有。"立法院的机制因而可以用来缩短协商的、民主的决策过程,借此艰难的决策,例如有关堕胎的合法性、移民法或者参与战争等,都可以从政治讨论中抽取出来,而转到法庭上(参照 Howard,1990 年,第 17 页及其后页)。我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10〕 Scheuerman,1991 年 a,第 62 页及其后页,和 2001 年 b,第 118 页;关于国际合同法领域请参考 Dicke,2001 年,第 22 页。请进一步参考 Rosa/Scheuerman,2006 年,第三部分的文章。

能力。集体利益被收集起来和被表达出来是而且一直是时间集约型的[11]，因此民主政治在面对具有强大的加速能力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时，会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不同步化的危险中。

发达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显示了自己的制度上的安排，在面对这种危险时，到目前为止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漠不关心，如果我们不把它说成是视而不见的话：正如吉塞拉·瑞舍尔（Gisela Riescher）*的有关总统统治系统的研究所表明的，政治体系的“原时”（例如发言时间、咨询周期、提问时间、选举节奏等）从根本上“自动地”以政府和反对党（在议会政体中）之间的互动逻辑或者说行政院和立法院（在总统整体的系统中）之间的互动逻辑为导向，而且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稳定性。加速和减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美国参议院中的阻挠议事的议员的那种 395
形式）主要是作为“政治”的战术性的手段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争论的对手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表现出来。[12]

在为时间上的进退两难思考机制上的解决方案中的困难[13]，唤起了这样的怀疑，即现代的政治项目最终可能证明是与社会条件不兼容的，正如它在“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的构想中所暗示的到处出现的同时性和身份确定的情境化形式。由于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社会变化的某种最小速度被当做是实现政治现代性的动态的构建想法的条件，这证明，建立在这些项目基础上的政治系统，正如与它们保持一致的稳固的个人身份一样，只是在社会变化的一定的速度界限内才能存在，超出或者低于这个标志着传统现代的特征的变化速度，如同接下来要阐明的理论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系统就会失去协商地—民主地确定所共有的生活形式的基本参数的能力和它的说服能力。

---

〔11〕 正如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1 年 a，第 49 页及其后页；并参考 2004 年，第 39 页及其后页）所指出的，正是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传统——在洛克、孟德斯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麦迪逊（Madison），或是约翰·杜威身上所体现的思想传统——中的这种迟缓是被作为特别的美德的，而不是被当做相对于行政部分较快的决策的立法过程的缺陷：可以这么认为，这种迟缓性保证了立法决定的高质量。

* 吉塞拉·瑞舍尔（1957—），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与政治》《以团体作为家乡》和《政治理论的代表作品》（合著）等。——译者注

〔12〕 Riescher，1994 年。

〔13〕 威廉姆·绍伊尔曼在大量的出版物中追踪了自由民主党的目标设立、进行机构改革的路径，从中发现其目的是“为了将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变成自由民主党的同盟者，而不是敌人”（2001 年 a，第 67 页；参考 2004 年）。据我看来，到目前为止，绍伊尔曼以及他的德国同事艾伯林（Eberling，1996 年）或瑞海斯（Reheis，1998 年）所充分证明的这种必要性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

2. 在现代性中的历史的时间化

上文所确定的第一个时间方面特有的认可,即社会在历史的时间中是正在构造的政治项目,从总体上来看构成了新时代的文化根基。事实上,这甚至也有相关的概念基础:特性上发生了变化的"新的时间"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不再被看做,也不再被期待为在尘世的—历史的时间结束之后——也就是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在耶稣回归和世界终
396 结之后——的超验的神圣时间的开始,而是被世俗化了,并且似乎因而被拖到历史的时间本身当中去了:它成为一个政治方面的造型委托。[14] 正如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尼古拉斯·卢曼也都小心谨慎地分析得出,社会中的时间语义的广泛的变化是与现代的时间化相关联的,而这种变化在1770年到1830年之间到达它的高点。[15]

正如科泽勒克的中心理论所指出的,这样的发展是在对历史的感知和体验中的根本的变化的基础。从现代的起点(时间大概倒推到公元1500年左右)开始,在这样的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个体和集体的站立在时间中的存在的新的体验,越来越强烈地被表现出来并被意识到。在那之前,历史的时间,恰恰如同科泽勒克的著作《历史学》(*Geschichtsschreibung*)所指出的,似乎被体验为静态的时间—空间,在那里发生着形形色色的历史,而且往往会重演,因而历史在普通概念的含义里是可以充当起生活的老师的历史[历史是生活的女教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16],从之前的世世代代的错误中去学习。科泽勒克对前现代和早期现代的对历史的体验方式做了如下的概括:

> 时间作为对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形式上的普遍规定,相对于划时代性的冲击或历史学上的时代都保持中立。一切历史都是编年史,随着时间而变化,阿尔斯特德*这样说。将古代历史从现代历

---

〔14〕 也请参考 Habermas,1985年,第141页及其后页。

〔15〕 Koselleck,1989年,第337页;对此也请参考《历史的基本概念》(第1972页及其后页);以及 Luhmann,1997年,第866页及其后页,特别是第997页;还有四卷本的《社会结构和语义学》(*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1980—1990年)。

〔16〕 参考 Koselleck,1989年,第38页及其后页。

* 约翰·海因里希·阿尔斯特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1588—1638),德国加尔文教派牧师、学者。——译者注

史中分离出来的培根*本人也根据方法、类属和专业领域来处理历史中的时间，却不是根据现代性的或陈旧的这样的时间标准来处理，这一点在他的新科学和他的至理名言“真理是时间的女儿”（veritas filia temporis）中是显而易见的。博丹**可能发现了最贴切的简单明了的说法，它往往切中了历史事件在时间中不断地被重新调整的事实：当帝国老去的时候，历史却永葆青春。叠加式的历史 397
编纂对应的似乎是静态的时间体验，从事件到事件累积而成的新事物被登记了下来……世界还是世界，世界上的一切都还是原样，尽管人们已渐渐地死去，正如墨兰顿***在修昔底德****和路德教派所提供的证据中确定的……但是，这样的视野的前提是，所有历史相互相似或者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只有这样未来才能从历史中学到东西。[17]

与之相反的是，在科泽勒克和其他作者共同完成的《历史的基本概念》中所强调指出的，时代现在用上所有力量开创了新的时间体验轨道，在那里历史成为“集体单数”，因此它不再是静态的，而是被体验为运动的。科泽勒克在经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相互交汇的地方发现了对历史的新的感受的核心。[18] 未来在结构上是与过去不同的，现在这是一条信条，并且毫无疑问它指出了未来的现在在特性上的根本变化，正如我努力阐明的，这些交错在一起的地平线是可预见的，而且是社会变化速度的提高超越了共同生活在历史的时间段中的三代（或者至多四代）这个关键的感知临界值、所带来的完全不可避免的后果，对历史的

---

*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散文作家、法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古典经验论的创始者。主要著作有《学术的进展》《论人类的知识》《各家哲学的批判》。——译者注

** 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法国律师、国会议员和法学教授，因他的主权理论而被视为政治科学之父。他与霍布斯、雅克·博絮等人都是西方专制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主要著作有《国家六论》等。——译者注

*** 菲利普·墨兰顿（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神学家，被誉为“德国导师”，他是德国和欧洲宗教改革中在马丁·路德之外的另一个代表人物。1530 年他和路德共同起草有名的《奥斯堡信条》，并写了一份辩护书，因此扬名全欧洲。——译者注

**** 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 460 年至前 455 年间—约公元前 400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该书记述了公元前 5 世纪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17〕 Koselleck，1989 年，第 312 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18〕 同上书，第 349 页及其后页；2000 年，第 331 页及其后页。

变动的体验因而似乎是逐渐从在代与代之间变动的速度到在一代之内变动的速度的过渡的伴随现象。[19] 科泽勒克也前后一致地指出,在马鞍性过渡时期中的历史的时间化,和因此历史的加速的体验和超越了划时代的门槛的体验,为经验的时间地平线和期望的时间地平线的相遇打下了基础,尽管从对这种感觉的因果关系的理解的角度来看,科泽勒克仍然是自相矛盾的。[20] 通过仔细阅读大量的有关变化的时间体验的历
398 史见证,他确定:

> 有两个时间方面特定的鉴定,它们体现了新的过渡经验:所期待的另一种类型的未来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时间方面的体验节奏的变化,即是加速的、与过去时间的体验节奏不一样。洪堡*在他对公元八世纪的分析中清晰地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在这方面他并不是独自一人:我们这个时代看上去像是出自一个刚刚过去的,而转入一个新的有很大不同的阶段。而这个变化的标准是在越来越短的期限里不断推动向前的历史的时间。因为如果有人只需简短地对比一下事物在今天的状态和它们在 *15* 年前或 *20* 年前的状态的话,他就不能否认,在这当中的差别比在这个世纪伊始的时候双倍长度的时间段中的差别还要大。只允许完全同质化的体验的时间期限的缩短,或者说吞噬了经验的变化的加速,属于用来表现最新的历史的惯用语。[21]

---

〔19〕 相关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三章.2(2)和第五章。

〔20〕 在科泽勒克的两篇分别是《是否存在历史的加速》("Gibt es eine Beschleunigung der Geschichte")(Koselleck,2000 年,第 150—176 页;也可以参考 Rosa/Scheuerman,2006 年)和《时间缩短和加速:有关世俗化的研究》("Zeitverkürzung und Beschleunigung. Eine Studie zur Säkularisation")的论文中(同上书,第 177—202 页),他比在他的之前的作品中更加强烈地认为,历史的加速首先可以解释为现在转向政治方面的期望的世俗化的范畴,它直到工业革命的进行中才是真正的经验饱和的。科泽勒克的假设是,"作为历史的期望范畴的加速已经陈旧了,它从 16 世纪开始就长满了新的期望形式,但是它直到工业革命才可能变成饱和的经验概念"(第 153 页)。18 世纪的加速的体验从实证上来看无论如何是为政治的震荡这个快速的后果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判断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最终是循环的:政治的时间地平线的改变同时是解释前提和待解释的事物。据我看来,科泽勒克的解释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为他的在鞍形时期的历史的加速的感觉的清晰的判断,只寻找了技术加速形式上的实证根据(同上书,第 167 页),而与技术加速分离开来的生活节奏和社会变化的加速的可能性却被忽视了。

* 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洪堡(Friedrich Wilhelm Heinrich 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中部亚洲》、三十卷巨著《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五卷本的《宇宙》等。——译者注

〔21〕 Koselleck,1989 年,第 329 页。

在这些以亨利·亚当斯在20世纪初所撰写的《加速规则》(*Law of Acceleration*)为顶峰的历史的诊断的基础上[22]，科泽勒克将加速理解为关键的和明确的新的历史方面的基本体验，以及作为"加速的历史方面的经验变化和对它的增强的意识方面的处理的指示器"的现代的概念 399
的快速的实施。[23] 加速所带来的影响是，历史现在不再是动态的空间和中性的背景了——曾以它为背景上演着不断变化的故事，而是似乎它自身已经被时间化了。时间"赢得了同样的历史性的特性。历史不再是在时间中发生，而是贯穿时间地展开。时间被动态化为历史的力量本身。新的经验方式无疑为历史的新概念创造了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是历史的集体单数的基础，这可以认为从大约1780年开始，历史中不再有分配给它的客体或者排在它前面的主体"[24]。

但是现在，这样历史体验的变化的根源在于在现代的状态和政治任务的重新概念化。从这里就出现了新时期的历史哲学的说法，它尝试确定所感受到的历史运动的方向和目标，并且将它与政治运动的观念从根本上联系起来：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原则在时间中所塑造而成的政治的委托。作为"第一个真正的历史的时间范畴"的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范畴，构建了对有目标的历史发展的期望的关键概念[25]，而这些进步在文化方面的推动力也是从新时代的乌托邦的时间化中所赢得的：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社会的政治的概念现在不再是从想象中的乌托邦的空间中被提取出来的，而是在投射了未来的空间里以及从历史和政治的空间里提取的。"事实上……现代的时间意识打开了新的地平线，在那里，空想的想法与历史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乌托邦式的能量移入到历史意识中体现了……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从法国大革命那时开始就在现代的民众的政治社会中打上了烙印。打上时代精神的现实 400
性的烙印的政治思想……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活力，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期望过量也被控制于历史经验的保守的平衡力量当中"，尤尔根·哈贝

[22] Adams，1999年，第406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Rosa/Scheuerman，2006年。

[23] Koselleck，1989年，第320页，并请参考第336页及其后页。

[24] 同上书，第321页。

[25] Koselleck，2000年，第163页，也请参考第172页及其后页，以及1989年，第155页及其后页和第200页及其后页。有关历史的时间化的进步的观念的集中化请进一步参考Nowotny，1993年，第17页。

马斯一语中的地这样指出。[26] 科泽勒克从这样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中发现,现在所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和程序都或多或少地时间化了,并且按照时间的运动线路而进行安排,因而运动的压力也恰好产生了时间的束缚概念。没有时间上的运动系数和变化系数,什么也不再能识别出来,也不再能提出论证,并且尤其不再是政治上的正当有效的。[27] 直到从1968年的革命所产生的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政治阵容的形成过程和现代的潮流才被理解为运动。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现代的大型的政治阵营是沿着通过指示着时间方向的进步党派和保守党派的分界线来进行安排布置的,在这里这些政治阵营的特有的运动方式是能够从迅速产生的概念性的新特性和新的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这样,等等)中读取的。[28] 通过被人们所接受的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这些运动因而在结构上是不对称的:即便保守的政治也不能使历史停滞,它只能为小心谨慎的过渡和保护有保留价值的东西而操劳。因此,进步的和保守的往往更确切地说是表现了不同的速度,而并不真正是方向上的不同:进步的政治根据它们的自我理解努力追求所期待的历史发展的加速;相反,保守的政治
401 则是追求它们所期待的历史发展的减速或者暂时的停止。[29]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政治在(经典的)现代的历史体验的背景下,都是社会发展的领路人;它获得了不可回避的塑造委托。这就形成了与政治的现代性的自治的承诺之间不可放弃的关联,根据这种关联,社会规划的塑造才会掌握在作为公民的人们自己的手中。

接下来,我将阐述,由法律学者所指出的后历史是提前了的历史的终结,只能令人信服地被理解为时间化的历史的特殊形态的终结,并且在这里不仅是对历史的时间的体验发生了变化,而且政治的关系和形态

---

〔26〕 Habermas,1985年,第142页;参考 Lübbe,1998年,第277页:"空想的时间化通过文学上所实现的从遥远的空间到遥远的时间的完美转换,从而创造了这样的前提条件,即人们在当下所处的社会状况,同时也被感知为处在有目的的变动中的现代。"

〔27〕 Koselleck,1989年,第341页和第339页。

〔28〕 同上书,第300页及其后页。

〔29〕 参照同上书,第78页:"总体而言,(从法国大革命以来)革命在历史哲学的视角下的概念中发生了改变,它显示了不可逆转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有关以前或以后、延缓或加速都将从运动的方向上划去……"因此,即便革命这个概念本身也被时间化了:它不再体现与之前的状态之间的"转变"或者返回的关系,或者说不断循环出现的状态,而是(体现为革命可能是永恒的形式的)一个从历史上来看不可逆的、有方向的、伴随着政治后果(或者加速着政治后果出现的)社会变化。请进一步参考 Nowotny,1993年,第152页,在这里论述了通过技术的而带来的"进程"和进步的等量齐观。

以及政党的关系和形式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同时也将证明，这个时代的过渡最终也只能在加速理论的视角下准确地加以理解和确定。

3. 似是而非的时间地平线：在晚期现代历史的去时间化

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使得在这一章的前两节中所分析的现代的政治项目的时间的基本框架至少是变得可疑的，如果不是显而易见地失败了的话：无论是目前为止我们对政治在（历史的）时间中的角色的理解，还是在政治中或者在政治和社会的衔接处上的时间模式的经典现代的方案，看上去将它们作为最新一波社会加速浪潮的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

402

最一目了然的是，政治的时间危机暴露在已经被无数次作为主题讨论的处于政治的“原时”和其他社会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发展——的时间结构的不同步化之中，但是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方面的构造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之间的不同步中。美国政治学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概括了这样的转移：

> 政治的时间已经完全脱离了与经济和文化中的主导的时间、节奏和步伐的同步。政治的时间……需要休闲的元素……它拥有政治行动要求先于审议之后又在审议之前发生的需求，正如政治行为的“深思熟虑的”那部分所使人想起的，它需要时间是因为，它往往出现在一系列的竞争的或冲突的但却是合理的思考中。政治的时间受不同的意见的出现并且试图与这些意见谈判的制约。谈判的结果，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保存了时间……因此，“用”在审议中的“时间”却被“节省下来”了。[30]

沃林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同时也指明，到目前为止摆在政治面前的任务是，面对在社会中的所有的非一体化的趋势，保护文化上的时间的统一，并且对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完整性的保护将通过政治讨论的审慎的过程而不是通过决策的过程可以实现。

---

* 谢尔登·沃林（1922—），美国哲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政治与构想》《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伯克利学生的反抗》等。——译者注

〔30〕 Wolin，1997年，第2页；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也请参考 Chesneaux，2000年。

因而,至少是从政治的民主的形式的角度上来看,非同步化的诊断完全能够不仅作为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常用套话[31],而且也用于政治实践本身。有关对后者的证明,在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文中所提到的巴伐利亚州州政府关于去除政治管理的倡议,因为政治管理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回忆一下在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2000 年的州议会大选中,德国自由民主党(FDP)在全州到处都可看到的宣传画上所展示的竞选口号是"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需要速度"(NRW braucht Tempo),这个竞选口号为德国自由民主党额外带来了激动人心的 10% 的投票率,而与此同时克莱门特州长*(根据他
403 自己的"进步的"政治方面的自我理解)被封为"现代化的刹车片",同样,在公众心目中对德国绿党(Grüne)也有同样的看法,这两者都因此几乎丢掉了 1/3 的投票率;或者回忆一下瑞士人的加速倡议,这个提议同样也在 2000 年变成了法律提案,它的观点是已经实施了三年的瑞士的直通式民主的决议程序,对于经济的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来说过于缓慢了,因此会对这两个方面造成损害,因而加速提议致力于废除民主的共同参与的权利。[32]

三个例子都是在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想法,它们一致认为,在民主管理意义上的政治少一些,就意味着更快的速度,并且因此也会消除社会的不同步化。在观察中可以看到,与流行认为的现代性用唯一的线性的、抽象的并且似乎是"空洞的"世界时间代替了大量的自然朴实的原时和节奏并肆无忌惮地将一切混合在一起的观念不同,不同的社会的子系统在它们的时间模式和时间地平线中,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建立了新的原时[33],并且因而能够在不同范围内进行加速。这首先使得系统的社会的不同步性和同一时间的不同时性成为可能,而这些在考虑到系统之间的时间结构的耦合时就会成为显著的

---

〔31〕 在这里有代表性的是 Eberling,1996 年;Chesneaux,2000 年;Scheuerman,2001 年 a;在那里可以发现大量的证据。也请进一步参考 Hennis,2000 年,第 175 页及其后页。

* 沃尔夫冈·克莱门特(Wolfgang Clement)(1940—),德国政治家、律师,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成员。1998 年到 2002 年,任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州长;2002 年到 2005 年任德国经济与劳工部部长。——译者注

〔32〕 "专制代替讨论"(Diktat statt Debatte)是《世界周刊》(*Die Weltwoche*)2000 年 2 月 24 日的封面报道。加速提议的支持者指出,例如基因技术研究的计划经过了三年的咨询时间已经完全落后了,因而最终所作出的决定意味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这项加速提议在 2000 年 4 月 14 日被瑞士选民否决了。

〔33〕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 Nassehi,1993 年,第 323 页及其后页。

问题。[34]　404

这种不同步性并不只是局限于出现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当中，而且也可能出现在所有的社会子系统之中及它们的关系当中，例如在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当中、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之中，并且因此也会出现在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界限上。诸如大卫·哈维等人这样评论："华尔街（Wall Street）所设置的时间地平线简直不能反应灵敏地适应社会的时间和生态方面的再生产系统的时间。毋庸置疑在金融市场所设定的迅速的变化时间对于劳动者（对于他们的工作的稳定性、他们的技能，等等）和社会—生态的再生产的生活世界来说是更加令人紧张的。"[35] 相应地，托马斯·阿斯豪伊尔（Thomas Assheuer）*觉得，这似乎是"自欺欺人地相信人们能够任意地加快社会的速度，而且尽管如此还能使得生活的世界聚合在一起和衷共济"[36]，而有关在晚期现代文化的生活世界在不同代与代之间的瓦解，我已经在第五章详细讨论过了。

但是，即便在经济体系内部，由其自身所产生的加速压力也是巨大的同步化的问题，它的代价往往会转移到外部。在新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陷入危机的背景中，在金融市场的高速运转的世界和实体投资领域，或者说企业和生产发展自身的领域之间的背道而驰尤其引人注目。在生产发展的领域中，诸如对新产品或原材料的测试阶段一再地被缩短，并　405
且在生产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市场导入工作，因而新产品的生产过程是消

〔34〕 根据 Schwinn 的假设，即在新的结构中会形成形式上的合理性的共同作用的新形式，在晚期现代，加速会以这种方式走向明显的结构上的分离（对此也请参考本书第八章"3"）。如果我们展开试探性的联想活动，尝试着从物理学的角度解释这样的加速所产生的作用，就会期望，功能领域的分化原则使得已有的、准自动控制的系统的流程的明显的加速成为可能；但是也会预想，在这里出现的"离心力"随着速度的提高，就会导致对系统边界的不断被侵蚀，并且因而出现后现代的*去差异化*，但是不能将去差异化与*再整合*混淆起来，而确切地说应该是表现为每一个系统联系的分裂和碎片化：因此正如今天人们所猜测的，不再会有统一的指示体系了，而且相应的（讲求纪律的）子系统也不再会有有序的结构，而只有"形形色色的"学校、附件、科研项目、杂志、代表大会等等。在艺术、商业、政治和科学相互混合为新的（完全是创造性的）共生状态和合成状态的地方，从中所产生的程序将既不能进行政治上的，也不能进行经济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设计、控制或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经过很长时间就会显现出各种问题，并且不知道它们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典*。

〔35〕 Harvey，2000 年，第 59 页。瑞海斯的核心论点（Reheis，1998 年）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即伴随着病态性的结果，个体的、社会的和自然的"系统"都是非同步化的。贝尔格曼（Bergmann，1981 年，第 166 页及其后页）也为现代社会诊断出了社会时间的不同步性，以及政治的、心理的、也包括生物—物理的环境时间的不同步性。

* 托马斯·阿斯豪伊尔（1955—），德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主要著作有《民主带来什么》等。——译者注

〔36〕 Assheuer，2000 年，第 38 页。

费者作为受试者共同参与的过程;革新周期(从科学方面或技术方面的发明到投放市场之间的时间)和产品周期(某个特定的模式的生命周期)在一些领域中(例如在娱乐用电器产品中,甚至是在部分的汽车工业领域中)加速得如此剧烈,以至于不仅是消费者,而且甚至经销商都不再能够确定哪些是当下最新的产品了;新的医学物质的数量和序列增加的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医生在开药方的时候都不再能够相信自己的经验,而是要求助于药物行业的最新资讯,等等。[37]

从中产生了这样的假象,即甚至是传统的司法判决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国操作的背景下,对于解决经济关系中的冲突纠纷来说太缓慢了,因而另一种强有力的裁决(以及调停程序和公断程序的)形式应该替代传统的司法判决方式,并且因此产生了中性的"项目式的法律"的结构或者甚至是"新式自发的法律"的构造。[38] 不断增强的加速迫力因而也对全球的和国际法的立法产生影响。正如克劳斯·迪克等人所指出的,在这里传统的法律程序也可能不再能够满足速度的要求,因而使公共会
406 议或者甚至是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一个"立法者"的压力就会增大。[39] 这样的趋势也生动地体现了,出于时间紧缺的原因,执行机构也承担了(准)法律性的职能,因而诸如根据《联合国宪章》(*UN-Charta*)的第七条,联合国安理会在1993年5月代替了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Jugoslawien-Tribunal),它为秘书长在法律基础方面提供支持,因为"常规的"多边协议被认为是过于迟缓的。而所选择的法律程序的确更快的,并且有着更加立竿见影的效果。[40]

但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抵抗加速的,或者说是缺乏加速能力的,因而,我的假设就是,在20世纪末期前后,政治的原时失去了在经典现代作为社会的开路先锋的无可争议的地位(现在似乎是被经济的原时占据了):它的时间地平线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展现了高度矛盾的结构,正如我将要呈现的那样,在政治中的时间陷入了巨大的

---

〔37〕 有关非同步化的现象也请特别参考 Backhaus/Bonus,1998年的文章。

〔38〕 参照 Scheuerman,2001年b,第115页及其后页,以及 Günther,2001年;关于"新式自发的法律"这个概念请参考 Teubner,2000年。在这里可能会在全球化的世界出现法律一元论:哪些判决和哪些法律对于哪些冲突和决策是适用的,看来是越来越不清楚了,因而使得权力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而且通过美国在21世纪初的外交政策使得联合国(UNO)的权力被削弱,与之相关的是导致国际法的有效性和使用领域的消解,而这些可能只是最明显的症状。

〔39〕 Dicke,1988年,第217页及其后页。相反,迪克建议扩大合同惯例法的规则或者说是国际惯例法的规定。请参考 Dicke,2001年,第13页及其后页。

〔40〕 请参考 Dicke,2001年,第15页及其后页。

混乱当中,并且因此也导致了在时间中的政治所扮演角色的经典现代的方案的倒塌。

在晚期现代出现的政治方面的时间的矛盾,产生于它的决定性的时间地平线和时间资源与时间需求之间的关系的双重的分道扬镳(参照图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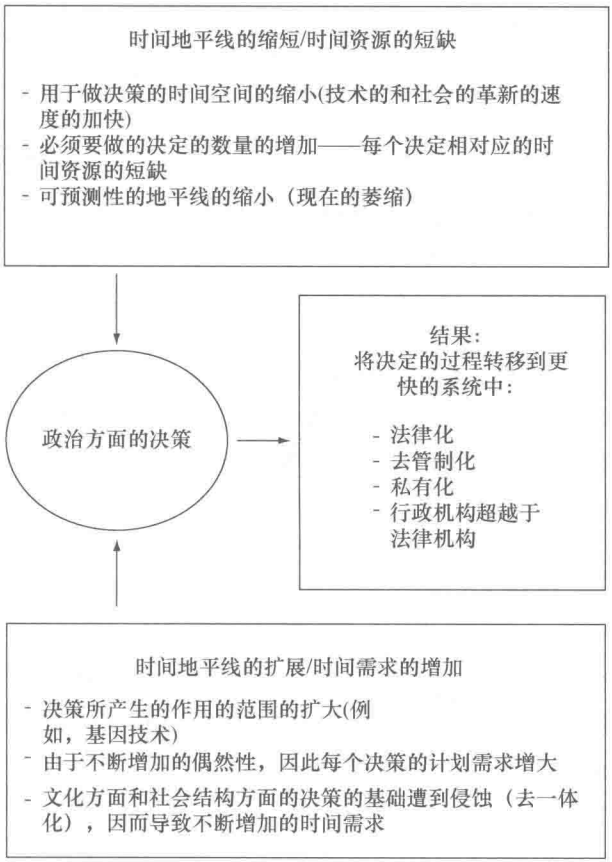


图 12-1　政治的时间的似是而非的情境

408

施加于政治体系之上、迫使快速地产生决定的加速压力,首先是其他社会系统,特别是经济的流通和科学技术的革新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的加速所带来的结果。其他社会系统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使得用于政治上的控制决策或管理的时间资源不断地减少,而且这是出于三重原因。

首先,只要政治希望能够把握控制政治的和技术的发展这样的要求的话,它就必须要么适应相应的社会领域的加快了的革新速度,并且成

为似乎是“发动机式的立法者”——如同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407 所预想的那样;[41]或者是以发展自治的方式进行决策,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撤销有利于中立的政治统治的功能分化的原则。因此,其他的功能系统被迫适应政治系统(较慢的)变化速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被迫的再同步化”。后者是诸如瑞海斯或艾伯林等对加速持怀疑态度的作者,当他们要求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加速的时间政策的时候所看到的解决方案,因而瑞海斯简明却非常确凿地假设:“时间政策必须通过分等级的干涉,停止逐渐产生的过程中的人造的加速,或者说引导减速的实现”;而艾伯林也非常简要地指出:“核心的假设是,当加速成为问题的时候,解决方案在延迟当中……在这里民主就是延迟的钥匙”,因为它能够有意识地缓慢地行使权力。[42] 这些设想是建立在经济的或社会的成本的基础上的,这些成本是由政治所迫使的再同步化造成的,但同时也特别是建立在时间中的政治的角色的现代的规划遭遇到了危机的基础之上的——有关这个问题我马上就要进行详细的讨论,但是这些设想是非常不现实的,特别是在这里谁能够作为这一类的减速政策的政治上的支撑者一直都是不清晰的。目前,所观察到的非同步化在任何情况下都越来越频繁地为政治带来作出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决定的危险,以及在执行决策的时间点上已经被社会现实所赶超了的危险,对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干细胞研究或克隆技术中的问题,或者涉及因特网中的信息传输的法律问题。

其次,由于所呈现出来的“现在的萎缩”,也就是说,因为期望地平线和行为条件在后习俗时代的不断增加的不稳定性,不仅提高了革新的速率,而且也增加了需要进行政治规范的社会领域的数量和范围。这样的事实为诸如贝克等人的观察提供了基础,他们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政治的范围和重要性是在持续提升的:众所周知,从垃圾清除到休假,直至
409 性交,人类生活中不再有哪个领域不是政治讨论的对象了。但是,管理领域的扩张隐含着,立法者或者说政治上的负责者在每个决策上可以支

---

*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决断论为主;并提出了许多国家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及法律与主权的关系。主要著作有《教会的可见性:一个经院学的思考》《论专政:从现代主权思维的肇兴到无产者的阶级斗争》《政治的概念》和《哈姆雷特或者赫库芭:游戏中之时间突入》等。——译者注

[41] Schmitt,1950年;也请参考Scheuerman,2000年,特别是第1891页及其后页。有关国际法的立法的动态化和“发动机化”请参考Dicke,1988年,第200页和第202页及其后页。

[42] Reheis,1998年,第215页;Eberling,1996年,第14页。

配的时间，是随着决策需求的增加，而反比例地减少的。[43]

最后，最终正是这个现在的萎缩的原理导致了，伴随着社会行为的快速变化的背景条件，在可进行理性校验的政治规划框架下的时间的范围的缩短。正如我已经展示出来的，在晚期现代对计划的需求的增长幅度与可计划性的范围缩小的幅度是一样的。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少的事物能够一直有效或者至少是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时间范围内有效；可预见的未来不断地退回到接近现在的位置，因而政治必须转入蒙混过关的模式中，对迫在眉睫的期限作出反应，并且在需要宏大的结构规划的地方只是作出暂时性的决策[44]，因此同样的难题（例如养老金制度改革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再次成为政治议程。因而，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它作为组织性的行为者的角色，而是接受了主要是反应性的共同参与者的身份。[45]

但是，政治中的时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不仅是通过外在的加速压力所引起的，而且也额外地通过内在的不断增加的加速无能，甚至是通过在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中的明显的变得缓慢的趋势而变得更加棘手，正是因为后者，才使得政治的时间地平线在晚期现代变成可以感受到的矛盾性。对应于加速压力的原因，政治方面的决策过程的并非自愿的减速现在看来也有三个原因。 410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政治决策的作用的时间范围的扩大；政治决策的后果往往延伸到越来越遥远的未来。马提亚斯·艾伯林详细地描述了技术发展的例子：

> 传统技术通常为每一个新生代提供了批判性的验证的机会，并且有可能摒弃它们……但是，原子能技术的引入就已经使这一点变得困难多了，因为仅是由于核裂变的瞬间终结而产生的放射性的离解产物就对未来的上百代人来说一直是个危险。而基因技术（本身也是导致传统的饲养过程强有力的加速的技术——本书作者注）也会呈现出无穷无尽，它的错误将能够不断地繁殖下去。这些技术不仅对当下的社会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在我们之后的每一个社

〔43〕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 Scheuerman，2001 年 a，第 57 页及其后页。

〔44〕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 Denninger，1988 年。

〔45〕 也请参考 Kielmansegg，2003 年 a 和 b，在那里讨论了联邦德国的各党派的“拒绝未来”，也就是说，它们显然没有能力去设计和实施对未来的规划，这种现象必然也出现在党派自身的逻辑及党派之间的竞争的逻辑中。

会都发挥作用。[46]

但是,不可逆转的决定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地计划和信息获取,而且因此也会比可逆转的决定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的时间。事实上,在同样的背景条件下,决定发挥作用的时间范围越大,那么达到所给定的从内涵的角度来看的合理化的标准就需要越长的时间。这就非常形象地体现了当今的速度发展所导致的矛盾:我们的决策的影响范围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正如作出这些决策所需要的时间资源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失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晚期现代的条件下未来维持已有的内容层面的(需要大量时间的)合理化标准而使得每一个政治决策所花费的时间增多了,即便是在那些决策的后果的影响范围没有扩大的地方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边界条件的稳定性越是不确定,就需要越多的用于估算偶然性和可选项的信息,因而在这些情况下就需要越多的时间花费以作出
411 合理的决策。[47] 因而,例如设计一套稳固的养老保险体系,就变成了一次艰难的冒险,即便是在人口统计变量,特别是有职业的人群和无职业的人群之间的比例是稳定的或者至少是可以估算的情况下;但是当以下情况不明确的时候,也几乎不可能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设计:(1) 未来的各代的寿命有多长;(2) 他们将工作多长时间;(3) 在哪些时间点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开始工作;(4) 将会开发出什么样类型的私人养老保险;以及 (5) 在已有的设计陷入冲突的时候,有哪些跨国的或者国际化的协议。因而,在国内的和跨国的管辖权和决策空间方面的不断增加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在这里也使得这个难题变得更加尖锐。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最终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以及(民主的)审议的真正的政治程序,也就是说决策和决议的过程,由于晚期现代社会的文化上和社会结构上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因此也越来越耗费时间,我认为这一点是最重大的诊断结果。因为一个社会的可以预见的价值观的共识越少并且政治解释中的合理性原则和合法性原则越不符合传统或者惯例,那么达成一致或者说形成能够得到一致赞同的政治

---

〔46〕 Eberling,1996 年,第 68 页。

〔47〕 正如我已经阐明了的,在评判一个决定的合理性的时候,当然也必须考虑到这个决定在决策的时间花费增加的同时,其机会成本也在提高。由此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在所给定的背景下,政治上的合理只是出于时间方面的原因而降低实质上的合理性的标准。边界条件中的这种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因而是革新变得稠密所带来的不可回避的后果。

意愿就变得愈发困难。而且根据已有的诊断，可以看到晚期现代社会趋向于变得既是更加多元化的，也是更加后惯例化的。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的去一体化的程度同时也是社会的非同步化的结果：正如我已经呈现出来的，晚期现代的不同时性的同时性也遍及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的人口群体中，这些人口群体似乎是“不同步地”根据各自的法律而得以发展的[48]，因而就产生了“时间贫民窟的马赛克拼接”[这一点 412
尤其可以在美国看到，但是目前诸如德国（Deutschland）和土耳其（Türkei）在联邦共和国的发展上也朝向类似的方向]。这样的“贫民窟”能够部分上从加速迫力中（并且因而根本上从现代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中）逃走，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它的继续存在（例如生活在美国的阿米什人）。但是，在加速压力推动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地方，加速压力最终可能会迫使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群体打破他们的界限，因为这些界限构成了公开的速度障碍（而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只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49] 尽管有时间上的所有的联合尝试，但是，从这当中所产生的后现代的去区别化，也几乎不能带来再整合化，相反却导致了原子分裂式的去一体化，因而从贫民窟马赛克拼接当中可能产生一个没有结构的或者五花八门式的联合和时间上的小生境。

尽管这样更确定地说是推测性的场景也清晰地显现了，在生活境况的个体化这个关键词下所讨论的稳固的社会小生境的逐渐消解、社会的从属关系的不稳定性和政治偏好的易变性都使得表达和组织集体的利益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由于越来越不清楚哪些群体、联合会和伙伴对于哪些协调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与之相连的是，对政治公共空间的稳固的领域的组织是发挥良性功能的民主的前提条件，而在这当中所产生的时间方面特有的核心难题已经由约翰·杜威（John Dewey）*用一种引人注意的方式预见到了：“如果一个公共空间根本没有各

〔48〕 文化多元化是“时间多元化”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文化的时间地平线、时间模式和时间实践之间毫无疑问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因而它们不可避免地在公共领域相互冲撞，因为公共领域是受主导文化的时间结构所控制的。相关内容请参考 Marschall，1997 年。

〔49〕 参考 Bauman，2000 年，第 14 页及其后页和第 168 页及其后页，在这里讨论了在晚期现代的社会的去一体化成为了加速要求，或者说成了全球流动的自由流淌的前提条件。对此也请参考本书的第十章。

*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民主与教育》《追求确定性》《我们怎么思维》和《教育哲学》等。——译者注

就其位,我们就会问,如何组织它?如果没有保留一定的依附,联合体就会过于变化多端和动荡,以至于不能允许一个社会轻而易举地确定其位置并且定义其身份",早在 1927 年杜威就发现了这些,而且由此所产生
413 的问题在数字媒体和全球流动的时代下并没有变小。[50]

再同步化的希望和对公共空间的新的形式的稳定性的期望,仍然主要与新的互动媒体的民主潜力有关,也就是涉及诸如因特网讨论的程序和因特网表决的程序。[51] 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尽管这样做使得表决的过程大大加快了,但是利益表述和利益组合以及审议过程却没有加快。[52] 将新媒体调查所得的"个人意见"的总和翻译成为真正的公众的和政治的意见(也就是说合理的意见),在所呈现出来的政治的公共空间的模糊的环境下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的,而且甚至是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53] 这样的翻译转化可能由于它本身需要大量的时间,而越来越频繁地根本就不能再加以尝试了,因而在对有理有据或者可以证明的论点进行讨论辩论的这个位置上,出现的是象征性的或者符号性的政治斗争。后者作为词语能够更快地传播;因而处于斗争中的政治由于越来越短缺的注意力资源而处于危险之中,最终就简化为一个有关更好的市
414 场营销战略的问题了。[54] 由于在多元化社会中民主的决策过程的困难性,决策的压力能够并将被用来使政治系统从漫长的或者不可实现的审议的苛刻要求和达成一致性的过分要求中解脱出来,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也就是说,在卢曼的语境下,将时间维度作为社会维度得以解脱的理由。[55]

但是,这个用六点全面描述的在晚期现代的政治困境,现在完全显

---

〔50〕 Dewey,1954 年,第 140 页及其后页。"政治空间的不断破碎和异质化导致了协调难题……各个政党感觉到,它们不再用于均质化的、稳固的、能够确定共同利益的小生境了。相反,它们必须以各种各样的、差别化的方式,与完全不同的社会情况和个性化组合在一起的利益包看齐,但是由于不同的社会情况和利益关联的内部的矛盾性,因而几乎无法统一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制定的纲领就体现为……无战略目标的了。但是单个的形态的混乱的组合突出了程序中那些强化了选民的碎片化和整合问题的关键点。"(Giegel,1999 年,第 108 页及其后页;参考 Scheuerman,2001 年 a,第 60 页及其后页)

〔51〕 对此请参照诸如 Connolly,2000 年;Barber,1998/1999 年;以及 Buchstein,1997 年。

〔52〕 有关在"举行民意调查的政府"和政治上的民主的观念之间的根本差异请参考 Chesneaux,2000 年,第 409 页,在那里从民主政府对民意调查的不断增加的依赖性中看到了对政治方面的加速的(灾难性的)努力。

〔53〕 关于(聚集的)个人意见与真正的政治的或者公众的意见之间的区别,Hennis 作出了精彩的尝试,请参见 Hennis,2000 年,第 37 页及其后页。

〔54〕 对此也请参考 Weibel,1987 年。

〔55〕 请参考 Luhmann,1968 年;并参照 Bergmann,1983 年,第 483 页。

而易见地导致了决策过程从民主政治的领域转移到社会中的其他的、更快的舞台当中去了（请参考图 *12-1*）：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观察到的重心从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的民主形式转移到行政机构的决策的灵活的机制[56]之中，出现了将政治方面的有待磋商的问题转移到宪法法院的责任（法律化）、经济的自我管理的能力（经济方面的去管制化），或者个体的自我负责的领域（道德伦理的私有化）。在国际的层面上因此会出现，大量的决议往往不再是由合法的专家群体和利益群体共同协商的，或者只是由有限的专家群体和利益群体商量决定的。欧盟的人人皆知的民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也不再是偶然了。

在现有的背景下，政治上的时间危机的最严重的后果却是撤回政治上的构造要求，并且因而与之关联的是出现政治的地位的规划及其功能在历史中的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我已经说明了的，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同样也是根本地拒绝了现代性中的对历史的理解。

所有这些政治方面的发展事实上都明确了，正如我在第七章“2”中所分析得出的结论那样，现代政治的时间已经停止了。由于晚期现代的 415
政治的时间地平线和工作速度落后于在经济中和在社会里的变化，因而晚期现代的政治不再能够发挥社会发展的（一直被认为的在文化方面的）开路先锋的功能，也不再发挥历史的塑造者的功能。在政治确定它的控制要求的地方，也显得不再是能够不断地推动历史的发展的了，而是完全作为“现代化的制动器”，而这正是为什么政治位列于经典现代的加速器的名单中，却又属于晚期现代的制动器的原因（请参考表 *9-1*）。只要在左派和右派政治之间的差别仍然还有意义的话，“进步派别”至少在减速器这个层面上，体现出与它在经典现代完全相反的特性，这是因为进步派出现在经济方面的政治控制、民主协商的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和当地的地方分治主义的保护当中；而与此同时，“保守派别”看上去却遵循着为了加速以放弃真正的政治为代价的策略，只要它能够诸如快速地引入新的技术、拆掉阻碍全球流动的周转的政治障碍、拥有更强大的市场的统治权和作出决策的更快的方式。

在这当中所产生的政治在时间方面的方向索引的丢失，明确地展示了历史感知的形式的变化和与之相关的当前角色的变化。无论是通过

---

〔56〕 请参考 Scheuerman，2001 年 a，第 57 页：“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当立法机构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要求时，它们倾向于放手不管而使悬而未决变成了最终的失败。当今的国会过于频繁地放弃它们的立法责任，而行政机构被看做是能够更好地把握时间要求的。”

延迟从而确定设计理念的尝试,还是通过撤回政治方面的管理的要求从而再度同步化的努力,这两个策略最终都导致政治不再能够主动行动,而只是每次根据不同的情境化的要求作出反应:政治被迫按照比它更快的系统的预先设定进行调整。由此所带来的结构就是,在政治的讨论中放弃政治方面的设计,而后因此可以明确地看到,例如,每个成员国对其基因研究的固有的动态发展的阻碍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未来的局面越发地不再能够被影响和被控制。因此,例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2001年1月有关用于治疗的胚胎克隆的讨论中指出,德国最终不能承担说
416 "不",因为否则的话德国就会在国际的发展中"被甩在了后面",并且也不再能够参与基因技术在"未来的"运用和影响。这恰恰是表明了为了保持未来的可能的设计机会而放弃了现在的政治上的规划,而且因此体现了似乎是"空转的"同步化的形式。[57]

蒙混过关的策略是以紧迫的期限为导向的,这个策略出现在对社会结构进行政治设计的地方。[58] 当政治上的懊恼情绪和选民的不断增加的反复无常成为晚期现代的民主在政治上的标志的时候,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政党政治的构想中,只要政治没有被撤回政治方面的规划要求(但这种要求体现了真正的政治程序)所限制,那些出现在政治的设计理念的风帆下的(程序、改革构想、战略规划)也不再能够实现政治方面的设计要求,而当仔细观察时,它们会露出只是为了适应而作出的绝望的努力的原形。[59] 几乎在所有的发达的民主社会里,选举参与中所出现的不断没落的势头,可能并不是单纯地反映了市民的义务意识的衰落,而是体现了选民的深层次的理性化,这种理性表现在市民在历史的进程中放弃了不断地失去重要性的政治。

政治的重要性的丧失也可以从政治语汇的变化中看到它的失败,这方面的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几乎所有的由科泽勒克所列出的(经典的)现

---

* 格哈特·弗里茨·库尔特·施罗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öder)(1944—),德国政治家,曾于1998—2005年担任德国总理。在成为专职政治家之前,他也是一个成功的律师。——译者注

〔57〕 有关施罗德的论述请参见Rulff,2001年,第8页。

〔58〕 "实用主义式的'混日子'的风格越是明显地表现出来,就越排挤能够成为政治规划的重要的动力源泉的政治形式",Hans-Joachim Giegel(1999年,第109页)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并且因此在晚期现代的规划问题中的相互关系上会形成明显的"恶性循环"。

〔59〕 例如从目前关于施罗德所发起的"改革议程2010"(Refomagenda 2010)的讨论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议程的捍卫者几乎完全引述它的不可缺少的(结构性的)适应的论据,而与此同时,这个议程的批判者则批评,它在这方面是远远不够的。

代的政治词汇再一次被排除出去了。因而，政治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再度同步化的努力非常显而易见地与约束这个强有力的修辞联系在一起，它 417
隐藏在诸如全球化、选址竞争或者现代化压力等概念的背后。“进步”这个概念的语义曾经伴随着所有的早期的现代化的推动力，在21世纪伊始几乎完全消失在约束修辞学的背后了。技术上的和社会的变化不再能够在进步的名义下展开，而是在可能会丧失竞争能力的威胁下进行的。[60] 增长和加速因而不再作为社会发展的预先设定的目标了，同样它们的合法化的基础也发生了相应的移动。这再次体现了已经被确认的由于“现在的萎缩”和“滑溜溜的斜坡”现象而产生的加速迫力相对于加速的乌托邦式的预言的不断加强的优势地位[61]：加快速度的过程在过去曾经被乌托邦式的希望插上翅膀而进入到政治的运行中，而现在却变得独立自主，以至于它被迫为它自身的展开而付出放弃政治和进步的希望的代价。

因而，正如艾玛·阿尔特法特（Elmar Altvater）*所评论的，整个系统将是“短视的”[62]：在历史哲学的设想中或者长期的政治战略的位置上出现了根据情境化的情形的短视的行动。情境化的政治因而与晚期现代的情境化的身份确定的形式有着集合式的联系：情境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不断提升的社会加速的后果，并且它在各处都影响着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体验的变化，这一点可以通过“时间的时间化”这个概念而得到最清晰的理解。“正因为如此，现代的风险社会一直能看到它的风险与时间的关联，因而在风险社会里也出现了似是而非的矛盾情境，即风险社会只是在时间中才能够支配时间，也就是说，它总是与当下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之后的时间又完全表现为完全不同的面貌……随着每个新的当下，世界发生了变化，而且从中可以识别的是，未来只是作为当下的未来出现在前方。这样的未来是未知的。”[63] 这段由纳瑟黑所措辞的政治 418
中的时间的时间化描述与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的所提出的晚期现代的游戏者的人物形象的特征是完全一致的：政治也不断地陷入漂移和（不

〔60〕 关于进步的概念的逐步被侵蚀请参考 Nowotny，1993年，第17页及其后页，第52页及其后页和第151页及其后页。

〔61〕 对此也请参考 Rosa，2002年b。

* 艾玛·阿尔特法特（1938—），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未来的市场》《从经济奇迹到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终结》等。——译者注

〔62〕 Altvater，2002年，第290页，第44行。

〔63〕 Nassehi，1993年，第377页。

受约束的)游戏的逻辑当中了。[64] 而无论如何,尼克拉斯·卢曼同样也在这当中发现了"最重要的当下的问题"。[65]

正如在考虑到个体的自我关系时的时间的时间化表现为人生的去时间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时间的时间化在晚期现代的背景中带来了历史的去时间化的后果。历史不再被看做一个有一定指向的、政治上可加速的(或者是也可以延迟的)、动态的过程了,而是它再次接受了一个几乎是相对于之后发生的和同时发生的历史而言是"静态的"空间的形式。正如吕伯所观察到的,被当做在时间中可以实现的乌托邦的设计,是将自身的历史的状态感受为处于有方向的变化当中的前提[66],如果这个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因此由哈贝马斯所诊断发现的乌托邦的能量的耗尽,不仅导致了与劳动世界相联系的福利国家发展前景的危机[67],而且也从根本上导致了具有历史权威的政治的构造的能量的危机:由科泽勒克和吕伯所确定的决策条件不再存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因此感到诧异的是,晚期现代社会与其说被看做是世界的终结,不如说是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终结[68],而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对此作出加速理
419 论方面的解释。

但是,政治的—历史的时间的时间化也表现在这当中,即在晚期现代的鞍形时间中所产生的运动概念不再意味着运动,而是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形式所撑开的静态的空间: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都失去了它们的动态的力量,并且可能不再会有不可逆转的发展了,而只显示出可逆的相互交替,它们在晚期现代的"永恒的时间"中被同时体验为永恒的和同时的。因而,在这里产生了这样的预测,即随着所谓的作为经典现代的最后的尾迹的新的社会运动详细阐明了现代政治的特殊的运动特性。对于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是不再能够通过前进理论或者历史哲学加以预测的,而现在只

---

〔64〕 这可以解释新型的、"游戏者式的"政治类型的出现,例如加利福尼亚(Kalifornia)的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意大利(Italien)的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或者荷兰(Niederland)的皮姆·福图纳(Pim Fortuyn)。

〔65〕 "未来的视野遮掩了真相,并且因此同时在现在的决定的压力也增加了,因为只有在当下、只有在一个同时存在的世界的背景下,人们才是有决策和行为能力的。而时间也相应地看上去走得更快了。作出决策的组织,尤其是政治体系,在多大范围内能够承受得住决策的压力和因此不断增加的不信任,是最重要的当下的问题。"(Luhmann,1997 年,第 1074 页)

〔66〕 请参考本章注释 26。

〔67〕 Habermas,1985 年。

〔68〕 Jameson,1998 年,第 50 页。

能在时间中，也就是在政治的实施本身当中能够被决定下来。

占主导地位的“永恒性”的时间体验的新的形式毫无疑问表现为不再回到前现代的循环式的时间中去了[69]：不同的世界的状况不再会回到似乎是“自然的节奏”当中去了[诸如波利比阿(Polybio)*所提出的循环模式中的宪法形式]，而是它们相伴的同时存在，并且它们以什么形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顺序和持续多长时间都是要符合现实的情况，因而这些都是根据不可预见的、在时间中的社会内在的发展本身所决定的。

但是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在当今的超级加速的社会中，对完全的偶然性和对历史的发展的完全的开放性的感知，以及对静止状态和所有的发展的终结的体验，很可能同时都占主导地位。在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文章《公元2000年不会出现》(“Das Jahr 2000 findet nicht statt”)中探讨了这两个历史的和社会的趋势——动态化的趋势和停滞的趋势——的内部的亲缘关系，它们作为历史消解的两个相互对立的节奏模式，最终会带来相同的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导致历史和历史意义的消失。第一个模式是所有事实和事件的不可阻止的加速，这样的加 420
速将直至一个点(解除速度点)为止，在这个点上将不再会有期限、因而也不再会有结果，因此在那里会出现如同托马斯·荣格(Thomas Jung)在追随鲍德里亚的理论时所描述的情境：“当事件在现实中内爆的时候，当事实凝结成消息的时候，历史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因而历史的功能只体现在媒体信息的循环往复中。历史将是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历史能够出于自身的缘故而承受事实的离心瓦解’。”[70]

相反，第二个模式产生于历史的放缓和历史逐渐的结晶化(怠惰)，直至历史最终在它自身的“总体”的重力下消亡和僵化：

> 这是我们的现代社会的一个事件、是现代社会的历史的一个难以琢磨的、深不可测的清单：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化和它的社会

---

[69] 有关其他的趋势请参考 Nowotny，1993年，第56页。

* 波利比阿(公元前203—公元前120年)，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剖析希腊城邦制度，提出希腊传统的政体循环理论，认为罗马是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的混合，最早开分权制之先河，是站在希腊政治哲学向罗马政治哲学转换的哲学家。他以40卷的《历史》一书留名传世。——译者注

* 让·鲍德里亚(1929—2007)，法国社会学家及哲学家。他的思想，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著作《物体系》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被归纳为“现实的消失”。主要著作有《物体系》《消费社会》《恶的透明度》《象征交易与死亡》等。——译者注

[70] Jung，1989年，第178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 Baudrillard，1990年。

> 的移动性、它的生产和革命的增加(与早期社会相比今天的社会一切都是革命性的)拥有能够带来惰性的力量,也伴随着它的沉默的力量而拥有的巨大的惯性:即所谓的"总体"……现代社会是社会的冷漠的星球,并且在这样的总体的周围冷却历史和让它变得缓慢,在漠不关心中剥离和消灭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历史不再能够继续进行,它在它的直接的后果中显露了原形,它在效果展示中被耗尽了,它退回了自身并且在现实中内爆。对于历史的终结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原因,因为历史没有时间去达到它的终点。它的效力相互追逐,因而注定会削弱它的意义。最终,当历史触碰到它的无限稠密的总体的时候,它静止下来了,并且逐渐消失了,如同光线和时间……[71]

正如我已经呈现出来的,快速的变化在目标确定或方向确定缺席的情况下被感受为迅速的静止状态。这样的体验如果出现在个体的生活中,就有可能导致个人的抑郁;而作为历史感觉的集体形式,这样的体验
421 会汇入后历史的麻痹瘫痪的体验中。[72]对历史的这样的体验在"集体的单数"的意义下与政治作为社会规划的民主项目的意义完全一样,它们只在社会变化的一定的"速度窗口"之内是可能的。在鞍形时间中,显然突破了这个速度之窗的下限,而在晚期现代则能够达到它的上限。这正是鲍德里亚的判断,鲍德里亚赞同在这方面所发展出来的思考,并且评论道:"一定的缓慢(也就是说,一定的速度,当然不是过快的速度)……(是)必要的,借此能够产生事件的独特的凝聚和晶化,我们将之称为历史。"[73]

在速度界限的另一边,政治的事件再一次接受了情境化的特性。但是(与变得稠密的个体的体验事件一样)由于这些事件失去了它们作为意义重大的历史的发展链条的要素的地位,并且不再能够转变为本雅明所指出的意义上的真正的历史性的体验,因而这些政治事件如同当代的大量的文化(也包括流行文化)的证据所证明的,也完全失去了它们的("更深层次的")重要性。完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历史只是插科打诨的不断重复,当代文化的文献观察到了在甚至是非常喧闹的历史事件中,也出现了它们的主体的和集体的重要性奇特地渐渐消失的一面。

---

〔71〕 Baudrillard,1990 年,第 12 页及其后页。

〔72〕 请参见本书的第一章"2";有关对后历史的诊断的概览请参见 Niethammer,1989 年。

〔73〕 Baudrillard,1990 年,第 8 页。

"有关时间的语义从世纪之交(是指向20世纪过渡)到今天,将一个在其中仍会赢得胜利的领域,开发成一个在那里发生了所有的战役并且不再会有任何事件发生的区域",阿明·纳瑟黑总结了历史的终结的感觉;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Literatur-Nobelpreis)获得者匈牙利(Ungarn)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也证明:"一起都在继续,只是不知怎么地都是虚弱无力的,如果更直白地说的话。"[74] 与诸如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或者马丁·凡·克瑞维尔德等人相似,凯尔泰斯同时也指出,权力的运用和权力过剩所激励的意识形态尽管在现在是存在的,但是不再能够对历史的前后一贯性提出要求,而是接受了纯粹是偶然性的表象。民族主义、战争、反犹太主义、经济危机、将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和新的原教旨主义、工资斗争、国家建立和国家倒塌,甚至是不久前出现的(新)殖民主义:新时代的所有的历史形式、元素和冲突都以混乱的顺序再次回到似乎是新的静态的同时性和情境化的政治的空间中来。 423

道格拉斯·库普兰的小说《X一代》中的英雄遭受了历史中毒的痛苦,而所谓历史中毒就是形象而简要地体现了在静止的历史发展中的快速的变化的辩证—矛盾的同时性。[75] 库普兰的文化方面的中心概念的时间诊断清单,以讽刺的方式发挥着与科泽勒克的出自时间化的历史时代的时间化的运动概念一览表一样的、如同时间化的时间的讽刺漫画的作用:游逛历史的贫民区、时间接种旅游、年代之间界限的模糊、对立法的怀旧、极端短期的怀旧、否定现在等等,这些都是在库普兰的小说的词汇表中所展现的时间化的策略。叙述者"我"也在那里明确地指出,越

---

* 伊姆雷·凯尔泰斯(1929—),匈牙利犹太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著作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无形的命运》《惨败》《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中篇小说集《英国旗》《苦役日记》;散文集《作为一种文化的大屠杀》《被放逐的语言》等。——译者注

〔74〕 Nassehi,1993年,第364页及其后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Kertész,2002年,第70页;也请参考 Baudrillard,1990年,第13页:"我们已经处在政治的和社会的事件不再拥有保护我们的力量的那个关键点上了,政治的和社会的事件如同默片电影的播放,我们对它们既无法从个体的角度也无法从集体的角度负责。在这里,历史结束了,并且是通过下列的方式,即并不是因为存在太少的个性或者权力(权力一直都有,尽管不能将权力与历史混淆),也不是因为存在太少的事件(事件一直都有——在这里要感谢媒体和信息),而是因为历史过于缓慢,从而凝固在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当中。"

〔75〕 参考本书第二章"1",注释56。

南战争(Vietnamkrieg)和由于它所引起的反叛是*真正的历史的最后的*尾迹。[76]

社会学家兼音乐理论家比尔·马丁(Bill Martin)也对此表示赞同,并且确信,1968 年所爆发的运动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过去曾经称之为'历史'的最后的喘息",并且它以激进摇滚的音乐潮流为标志并
423 不是偶然的,因为激进摇滚是依赖于(通过音乐和政治的方式)设计更好的未来的观念的;与此同时,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音乐则是以进步期望的"退潮"及对它的否定为特征的。"昨天的不同寻常的摇滚乐包含着走到某处的理念,而在今天的'非传统的'音乐里却相反,在那里主要回荡着任何地方都不去的主旋律。"因此,从根本上赢得某事物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就变得困难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难使任何事物成为意义重大的或者重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浩瀚无边的文化机器完全用于单纯的消遣娱乐。"[77]平克·弗洛伊德乐队(Pink Floyd)*的前任创意智囊罗杰·沃特斯(Roger Waters)**将这个过程形容为"剥离感觉"的过程,并且把一张名为《娱乐至死》(*Amused to Death*)的大制作的专辑献给这样的过程。[78]

与这样的历史感知捆绑在一起的文化方面的危机体验,出现在提供参照的过去和提供意义的未来同时都丢失的地方。而如果没有过去和未来的话,对具有支撑力的现在的确定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正如尼特哈默尔***和纳瑟黑一致确定的——*后历史*的诊断所发现的问题

---

〔76〕 "好的,显然我在静止中想到,那*曾是*令人讨厌的时间。但是那也是唯一的我曾经拥有的时间;那是在历史只为变得疯狂的印刷机、为市场营销策略而存在,并且作为玩世不恭的宣传攻势的工具而存在之前,*历史中的*真实的时刻。"(Coupland,1991 年,第 212 页)

〔77〕 Martin,1998 年,第 58 页及其后页和第 5 页。

*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英国摇滚乐队,创立于 1965 年。他们最初以迷幻与太空摇滚音乐赢得知名度,而后逐渐发展为前卫摇滚音乐。平克·弗洛伊德以哲学的歌词、音速实验、创新的专辑封面艺术与精致的现场表演闻名。他们名列最成功的摇滚乐队之一,并在全球坐拥超过两亿的唱片销售量。——译者注

** 罗杰·沃特斯(1943—),著名的英国音乐家、歌手、作词家和作曲家,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78〕 Columbia Records,1992 年。有关*后历史*的时间感觉的详细内容也请参见 Rosa,1999 年 c。

*** 路茨·尼特哈默尔(Lutz Niethammer)(1939—),德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生活经历和集体记忆》《后历史:历史终结了吗》《集体性的身份确定》等。——译者注

“不是世界的终结，而是意义的终结”；与此同时，谢诺*也指出，政治的民主的一项中心任务在于在“过去的遗产”“现在的倾向”和“未来的挑战”之间进行协调：而民主的危机和那些调停中的各种问题这两者的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79]

从作为危机时间的现代的文化方面的地平线当中，可以感受到的恰恰不是巨大的变革的时间或者决策的时间，这样的时间似乎是通过重新安排政治行为而以历史政治的方式出现的。[80] 危机更确切地说产生于不再能够作出决定的地方：社会的行为过程和系统的发展相对于政治的 424
控制是独立的，并且后者收回了文化方面的意义基础。最终，它们意味着一种不同步化的形式：在晚期现代社会的结构中，系统的过程对于如影随形的文化方面的意义源泉来说太快了，而文化方面的意义源泉为有助于一体化的政治的现代的项目和对这些项目的历史的理解提供了基础。在对可以想象的历史的终结的渴望中，纳瑟黑认为：“某种程度的不同时性……表明了，从意义上显而易见地努力抢救的是并不可能的社会结构。”[81]

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不同步因而也只是晚期现代的结构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的不同步的症状。世界的终结作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历史与（经典的）现代的地平线仍然有关联：“历史的终结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历史将继续向前，因为在事件之间一直都存在差异，当这些事件的统一发挥着人人皆知的时间的作用的时候。”[82] 因此，对于《X一代》中的主人公而言，核武器（或者与它类似的生态的或者技术）的灾难的可制造性看上去不仅没有失去历史的没有尽头的时间那么可怕，而且这样的灾难似乎还带来了解脱的希望，它承诺了这样的机会：仍然要“为世界的历史”去“找到一个结局”，小说的主角发出了

---

* 让·谢诺（Jean Chesneaux）（1922—2007），法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四卷本的《中国现代史》《越南史》《知识分子的参与（1944—2004）》《中国农民运动（1840—1949）》等。——译者注

〔79〕 Niethammer，1989年，第9页；参考 Nassehi，1993年，第359页及其后页；Chesneaux，2000年，第415页及其后页。对于库普兰的主角而言，历史就像是缓慢下滑的山坡，在那里历史丢失了自己的地图，并且由于到处充斥着选择因而历史也承受着选择麻痹的痛苦（“在大量的选择面前无法决定的倾向”）（Coupland，1991年，第197页）。

〔80〕 参考 Wallis，1970年。

〔81〕 Nassehi，1993年，第367页；类似的内容也请参考 Harvey，1990年，第305页及其后页。

〔82〕 Nassehi，1993年，第366页。

这样的声明。[83]

有关(可以被理解为)世界末日的轻率的预言不仅在库普兰的书中随处可见,而且它也完全是后现代的典型表现。这正是克劳斯·舍尔普(Klaus Scherpe)*所发现的[84],而这些都并不令人意外。所有持有这种"世界即将毁灭"论点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潜滋暗长着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是两个相反的极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正是
425 由于这种方式的"世界的毁灭"的有限的率直和到处出现的同时性,因而它表现为停滞的,好像是*凝固在1974年的一切的永恒当中,"这是在石油危机之后的一年,并且从这一年开始在美国不再会有涨价了"*,一切都如同在《X一代》中故事所发生的中心舞台萨克斯拉亥玛市所表现的那样。[85]

詹明信和哈贝马斯所惋惜的由于"语义"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步而导致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景象的干涸,与此同时也体现在以纳瑟黑为代表的人们所指出的,紧接着现代的功能分化的直接结果就是*系统理论式的开端*。由于纳瑟黑和卢曼只能够定义时间化的一个过程,因而他们不能够精确地指出在经典现代和晚期现代之间的*断层*。[86] 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在*鞍形时间*中所形成的时间化的历史概念从*最初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只是伪装了统一或者说是语义上的虚构。"社会的统一的这个语义",纳瑟黑在讨论彼特·福克斯(Peter Fuchs)**的观点时写道,"(从最初开始——本书作者注)就拥有这样的功能,即通过功能上的分化所产生的社会层面的意义丢失来抵消早期现代的功能危机。*社会统一的语义能够促成团结一致,而在那里它最终失去了社会结构上的统一*"[87]。我在这本书里所描述为"时间的时间化"的不是其他的事物,而正是文化方面的意识对现代的结构性的条件的迟到的适应。

---

〔83〕 Coupland,1991年,第90页。

* 克劳斯·舍尔普(1939—),德国日耳曼学家。编辑出版了"历史进程中的文学"丛书和"文学、文化和世代"丛书。——译者注

〔84〕 Scherpe,1986年,第275页。

〔85〕 Coupland,1991年,第61页。可能应该感谢《世界末日》(*Armageddon*)、《泰坦尼克》(*Titanic*)、《哥斯拉》(*Godzilla*)等电影,在这些影片中往往以美学——充满喜悦的方式表现日常世界的毁灭,而且这样的题材获得了巨大的、不被动摇的欢迎,因为它们展现了仍然存在的为世界的终结找到历史的不同的可能性(Rosa,1999年c,第260页及其后页)。

〔86〕 请特别参考Luhmann,1997年,第1143页及其后页和第997页及其后页。

** 彼特·福克斯(1949—),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谈话和沉默》《社会的可到达性》《现代性的轮廓》等。——译者注

〔87〕 Nassehi,1993年,第320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但是，就我看来，这样的整合仍然存在两个巨大的缺陷：通过生命的时间化和历史的时间化，时间的时间化被简化为只是统一一致的模拟和不合时宜的弥补努力，时间的时间化对由现代的规划所形成和确定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的、历史的和身份确定的构想认识不清。由于来自 426
于卢曼的系统理论从根本上忽视了或者低估了现代性的自治允诺和设计承诺以及现代性作为政治的项目的特性，因此在不失去其可信性的前提下，系统理论只能承受这个缺陷。但是第二个缺陷却既不产生于时间化的较早期形式，也不产生于“时间的时间化”的过渡过程中，因此非常有说服力地重构了在现代之内的断层：系统理论最终有义务对这一类的、影响深远的历史构想的产生作出解释，但是它只是将这里的历史构想简化为不合时宜的虚构或假象，并且它也没有针对为什么这些虚构在20世纪晚期与它们对个体和社会而言显然是非常重大的影响一起被放弃，给出有说服力的足够的理由。

但是，如果从所建议的加速理论的视角看出去，在这里所分析的首先是向着现代过渡的、其次是向着晚期现代过渡的两个时间上特有的断层，不仅能够被更加精确地确定、能够从结构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解释，而且作为后续影响，也能够从中重新构造反映现代的总体特征的增长和加速之间的提升关系。因此，我将在最后一章的总结中尝试将这本书的第四部分所查明的发现，概括为有关加速和停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现代性的理论方面的新定义。[88] 427

〔88〕 同时我也将通过某种方式从“加速理论”的角度尝试赶超卢曼（Luhmann，1997年，第1144页）所提出的现代社会关系的动态性。

第十三章　加速和停滞：尝试对现代性的重新定义

2002 年在图林根州（Nordthüringen）所进行的针对中小学生的书面问卷调查中，对于“在你看来，今天的年轻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一位 17 岁的女中学生回答道：“对未来没有希望，对这个停滞的和同时又是匆忙的社会没有希望，在这里每个人只是为自己着想，而且在这里如果没有帮助的话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1] 这个对日常生活的世界的问题的简洁的判断，与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所分析的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的基本困难令人惊讶地不谋而合：作为行为导向的未来的地平线和生成意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在所形成的不言自明的实际困难的印象下）现在都很成问题，这正如一方面是对快速的变化速率的感知，另一方面是皮下的僵化，这两者同时出现。

现在人们有理由提问，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特有的时间问题到底体现为什么样子。一面是对变化的恐惧而另一面是对僵化的恐惧这样的双面恐惧，反映了在赫拉克里特（Heraklit）* 所认为的一切都是流动的

〔1〕 来自于 Behr/Kottmann/Seiwert 的研究中的数据资料，2002 年。研究团体非常友好地允许我使用他们的调查数据。

* 赫拉克利特（Ηρακλειτος）（公元前 540—公元前 480），古希腊哲学家、爱非斯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写过一部总称为《论自然》的书，内容有“论万物”“论政治”和“论神灵”三部分。但这部书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 130 多个残篇，它们是从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摘录出来的。残篇的语言多形象比喻，内容是深奥的辩证法，读起来十分困难，赫拉克利特因此得到“晦涩哲人”的称号。——译者注

和巴门尼德(Parmenide)*所坚信的不变的存在之间的对偶，那么究竟哪一个主张体现了这个世界的永恒不变的基础条件呢？“当我们关注这个世界的本质时，通过排除事物的增增减减而发现特性上的绝对的固守，因而我们会得出……没有变化的存在的观念。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人们留意世界的实质的表现形式的时候，那么在那些形式中的顽固不变就完全消失了，形式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世界展现了永动机的壮观景象。这是宇宙哲学的、往往是形而上学所阐明的存在的两面性”，乔治·齐美尔这样认为。[2] 但是，当人们从这两个极端的视角去看世界的时候，未来的地平线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变得晦暗：正如保萨尼亚斯 428
(Pausanias)**在公元前二世纪就抱怨过的，恶魔般的力量在未来兴风作浪，因而未来或者是最短暂的而且是不确定的，要么是没有变化的永恒的命运的结果。[3] 这样的视角所代表的论点在最新的判断中被进一步强化，但是，这样的视角是否会被接受，尤其是取决于由教育和繁荣所确定的个体的(和集体的)设计机会。[4]

与本体论的或者至少是人类学的对时间体验和未来体验的阐述相反，我在这本书中尝试着采用一致性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为导向的视角。对此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图景和主体的时间上的生活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内生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速度，而且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的变化速度是不断地提高的。赫拉克里特和巴门尼德所分别描述的时间愿景都从不同的哲学角度赢得了可信性，世界和历史是变化中的静止空间，或者换言之：世界和历史表现为稳固的空间，在那里发生着不断变化的故事。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历史的空间已经与“救世史”的维度重叠在一起了，而“救世史”是从基督的出

---

* 巴门尼德(Παρμενίδης)(约公元前515年—前5世纪中叶以后)，生于爱利亚(位于现在意大利南部沿岸)，是最重要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是用韵文写成的《论自然》，如今只剩下残篇，他认为真实变动不居，世间的一切变化都是幻象，因此人不可凭感官来认识真实。——译者注

〔2〕 Simmel，1900年，第711页。

** 保萨尼亚斯(Παυσανία)(？—公元前336年)，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著有十卷本的《希腊志》，书中内容多为后世考古学发现所引证，因而历史学家J. G. 弗雷泽认为：“如果没有帕萨尼亚斯，这些希腊废墟多半会成为没有线索的迷宫，没有解答的谜团。”——译者注

〔3〕 “因为我知道邪恶的力量喜欢不断地改变着事物，因此我知道未来或强烈或微弱地在事物的开端或者结尾改变着所有事物，并且用迫切的需要驱动着事物的变化，而且未来是以一时的心血来潮推动着事物的变化。”[Pausanias，《希腊志》(*Reisen in Griechenland*)，这段引文出自Frisby，1988年，第11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4〕 有关德国青少年对未来的看法请参考Fuchs-Heinritz，2000年，第41页及其后页。

生开始的、直到最终他的复活所编织成的一个“线性的”时间维度。[5] 最初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对世俗的时间的体验;世俗的时间为外在产生的、不可控制的生活的变化保留了空间,尽管运动和凝固正是非常典型
429 地表现为在世俗时间和超验的—永恒的之间的矛盾。[6]

运动方向和发展视角随着赢得动力的现代的出现而登上了在世俗—尘世的历史空间的舞台。它们在加速的条件下带来了对历史和生命时间的不同的体验,在变动和凝固中,不再能够形成超越时间的、与历史无关的生命的框架和历史的框架,而是形成历史的—社会的基本元素的动态化,因此在变动和凝固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从现在开始就表现为历史的不对称,而且这两者之间不断移动着的平衡将会成为现代的特有的体验。但是,与此同时,作为历史的趋势的加速或者说动态化也令人惊讶地表现为逆向趋势,也就是说,在现代的进程中,正在出现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凝固倾向的表现被强化了,因而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这样的倾向应该被理解为新时代加速的矛盾的补充原则。

在体现了现代的时间体验的加速和停滞的概念中,运动和凝固的永恒的原则本身也表现出了动态性。对于这一章的开头再次引述的有关“匆忙”和“停滞”的谈话,并不能轻易地将这样的谈话简化为超越时间
430 的基本原则,而是表达了时代特有的动态化的时间体验。这两个趋势——正如在本章开头所引用的谈话所表达的,在最近似乎是以放弃以经典现代为特征的未来地平线为代价而开始变得更加极端,并且指向了时代特有的时间体验和世界体验的最新变化,因而正如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首先并且只有在与加速理论的视角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够将发展趋势同时理解为现代的中断和延续。因为现代的历史不仅可以有说服力地重构为加速的历史,而且显然它也确实可以作为加

---

〔5〕 类似的观点当然也可以从欧洲大陆之外的宇宙哲学中找到,诸如在创世以来的远古年代的构想中。

〔6〕 Andreas Gryphius 的抒情诗完全表现了在三十年战争中的这种矛盾所带来的混乱。因而在他的一首名为《一切都空洞无物》的描述性的十四行诗中说道:“你看到的,你在到处看到的,只是地球上的空洞无物。/今天所建造的,明天就会被拆毁;/现在屹立着城市的地方,将会变成草地,/放羊娃在那里与羊群玩耍//现在的繁荣壮丽,也将很快被践踏;/现在的痛击和抵抗,明天也成了灰烬和白骨;/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合金和大理石也不是永恒的。/现在我们幸福地大笑,很快会愤怒地抱怨。//名望显赫一定会如梦一样消逝。/难道因为时间的游戏产生了微不足道的人们?/啊!所有的一切,所有我们作为精美珍贵的而看重的,//都完全是虚无的,是幻影、尘埃和轻风,/是草地上的花朵,人们不再能重新发现!/因此,什么是永恒的,是没有一个人能看到的。”

速历史的驱动力、矛盾和历史阶段的统一。因而，在现在正是这样的时间点，在这里，在第二章所提出的关于加速原则具体的价值何在的问题，可以在社会学的背景下以传统的方式将加速原则当做是现代过程的驱动力，并且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所讨论的时代特有的中断和延续也能够更加清晰地被勾画出来、最终能够浓缩为时间诊断。

在第二章.2(2)，我在讨论范德罗与范雷京的观点的时候尝试阐释，对社会形式和它们的变化的分析往往能够从聚焦于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或者是以自然关系为导向的视角中，或者最终从聚焦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人格类型的视角上找到出发点。根据所采用的不同的视角，能够开发出更有力的以结构、文化、物质或者主体为中心的对现代化的分析。但是，在这里可以发现，在与之相关的将现代化确定为分化的过程、合理化的过程、驯化的过程或者是个体化的过程当中，又不容辞地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体验的时间方面特定的现代的发展维度，却偏离在了视线之外。弥补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漏洞正是本书的主要任务。这本书的论点在第二章被阐述为这样的假设，即加速的根本意义体现在四个发展维度的每个维度当中，而这样的加速已经被全方位地证明了(图 *13-1*)。尽管毫无疑问并不是现代世界的所有的地方和人口群体都处在同等程 431
度的社会加速的变化动力当中，但是，加速逻辑确实确定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进化。

如果有人试图将这项研究的结果转移到第二章.2(2)所开发的现代化的模型当中，就会得到下列图景：我们从社会的自然关系开始，毫无疑问可以看到，技术加速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并且它是与对自然的驯化过程和控制过程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运输、通讯和生产的加速既意味着自然过程本身的提升——例如，我们可以想一想农业领域的剧变，同时也意味着对自然边界的技术上的跨越，并且因此同时体现了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的加速。

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又对占主导地位的身份确定类型和人格类型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正如已经阐明了的，个体化的概念和人生视角的动态化的概念都与生活节奏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直接的关联。

社会变化的加速最终不仅与结构方面而且与文化方面的社会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实际上，结构的和文化的变化(例如正如合理化这个概念所表明的)不仅从实证的角度，而且也是从分析的角度是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因而在这项研究中，对社会变化的特定的时间方面的

分析,首先是能够在社会变化的加速这个总概念下展开的。从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体现了两个尽管相互关联但也可以分解的角度。如果将功能分化看做是现代社会的决定性的结构特征——正如在这项研究的第八章"3"所表明的,那么毫无疑问可以发现,功能分化不仅能够理解为对所产生的加速压力的适应性的反应,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将它作为复杂性的时间化所带来的结果,从而实现了巨大的
432 增加作用和加速作用。在所有系统分化外化的观点中,在不同的子领域(从社会系统的层面来看,例如金融交易、人工制造或经济制造、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等领域的加速)所系统地展开的加速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分化的过程中。但是,由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一如既往地是通过社会中的联合、群体和角色模式的网络来确定的,因此人们从中可以指出,只要现代化并没有带来家庭结构和雇佣结构[7]的变化速度的提高以及社会中的组合和小生境变得越来越短暂和易变,从而使得更加难以从根本上确定在政治上和社会方面意义重大的联合结构的话,就不能证明现代化蕴含着结构变化的加速。伴随着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结构上的发展会产生可能是很成问题的附带结果,即正如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的发展可能会产生社会中的去一体化的危险,与此同时,功能分化又会导致去同步化的难题,这是由于不同的系统以不同的强度在加速。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被我和吕伯所形容为现在的萎缩的,也就是对于固定的知识储备、行为导向和实践形式所持续的时间段的逐渐缩短,被证明是社会加速所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现在的萎缩首先导致体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混合在一起,并且因此形成了历史(和生活)的时间化,而历史(和生活)的时间化在晚期现代又反过来有利于高度动态的同步化,这就是在前面的章节里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文化方面的变化的加速采取了生活方式、流行、休闲实践活动、知识储备、家庭、职业、空间、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联系和导向的相对来说更快的和更加轻易地变化的
433 形式,因而文化变化的加速构成了文化现代化的主要特征。[8]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文化变化的加速隐藏着对现代性在政治方面的自我理解和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个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的非常深远的影响;因而加速不仅表现为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进程的形式上的框架条件,而且它

---

〔7〕 相关内容请参考本书第五章。

〔8〕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也请参考 Offe,1986 年,第 99 页及其后页。

也在很大的程度上确定了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的实质的和在物质维度的方向。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能够被不间断地重新构造为一个社会加速的过程[图 *13-1*，也请参考本书第二章.2(2)的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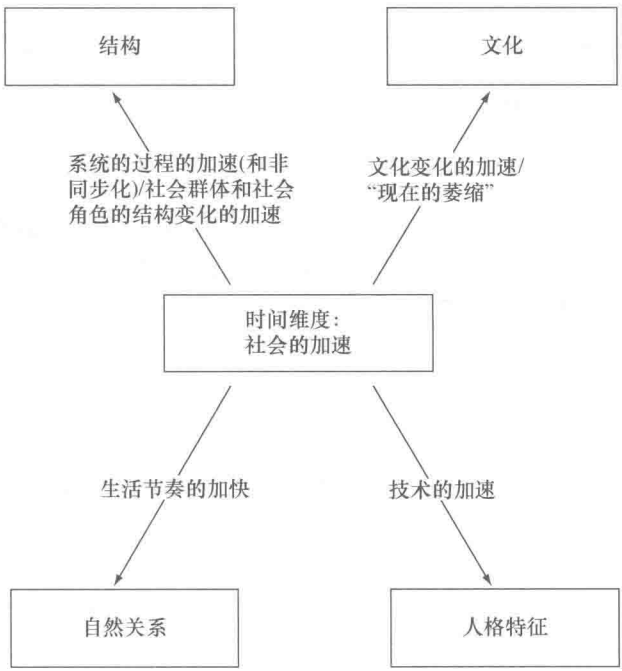


图 13-1　现代化进程 2a

在我看来，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现代化过程的这样的重新设计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形成是富有意义的：首先，这样的重构能够重新审视现代性的似是而非和其中的矛盾；其次，它使得精确地确定在现代和晚期现代之间的界限上的中断和连续的关系成为可能。我先从第一个原因开始。

根据对加速的结构性变化的诊断，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与之互补的结构性的停滞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在系统的运行逻辑的独立化和免疫化当中得以清晰的体现。特别是作为本项研究的中心议题的增长和加速的相互提升表现为不可避免的结构上的强迫，它顽固无情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并且使得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理想成为"零选项"。"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反面完全是以现状的矛盾的偏见和整个社会的无变化性为特征的，这个反面与现代性的基本动机、安排和选择能力

的提高都不再意味着任何事物",克劳斯·奥弗(Claus Offe)*发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选项的增多只是在完全是因为复杂性的提升而导致的被压缩的选择过滤的范围内的,而选项增多引导着处于提升的强迫力之下的系统化的操作。"所有……关于社会情况的不断增长的可选择性的断言听起来是不言自明的,而且也非常流行,这样的主张……提供了
434 不仅是粗糙的,而且也完全是浅薄且片面的现代社会结构的真实的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打算)测试完全相反的观点的承受能力,这个观点在现代社会恰恰是以高度的刚性和固化性为特征的……"[9]奥弗因此得出结论,结构上的刚性是现代性中对偶然性的特殊的处理所带来的结果,它通过特殊化和同时进行的功能上的分化,而产生了强有力
435 的复杂性的提升和因此而来的偶然性的增加,并且随之而来的是系统的处理过滤器变得更加锐化,从而通过更加锐利的处理过滤器来确定并且"解决"政治、经济、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选择越是剧烈地增多和变化,就需要越多地变动"机构的和结构的前提条件,在这些前提条件之上,那些偶然性……从政治的、甚至是想象中的安排的地平线中跑了出来"。

奥弗由此尝试性地推导出了结构上的总和恒定定律:"我们所开拓的选择越多,我们能够选择的有助于作出选择的制度化的支持就越少。"[10]在前面展示了加速的"驱动力"的图 *8-1* 的帮助下,总和恒定原则能够生动地展现运动和固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变换:三个加速领域(技术、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动态性越强,增长与加速的联系的三个外在的原则和(内部的)加速循环就更加稳固和不可动摇。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由实质性的变化所导致的抽象的结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了韦伯已经提出抱怨的"钢铁般坚硬的外壳",而在这样的外壳里面,生活世界的物质的结构、关系网络和联合结构、具体的价值连接和实践形式及行为方向都在变化着。因而疾驰的静止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保留不变,正如没有什么发生着本质的变化。晚期现代的这个矛盾的二元论因此也能够解释这样独一无二的现象,即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的均质化诊断或趋同性诊断的支持者与文化的多元化理解的拥护者各

---

* 克劳斯·奥弗(1940—),德国政治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国家:东方和西方》《变迁的类型:东欧和东德的经验》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机制设计》等。——译者注

〔9〕 Offe,1986 年,第 106 页和第 100 页,强调部分出自原文。

〔10〕 同上书,第 104 页。

自似乎都拥有可信的论点：全球化的社会无论是被感知为趋于一致的、还是被感受为发散的，实际上这是一个结构方向的或物质导向的问题。

"结构的晶体化"显然也对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自我感知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与现代的文化的凝固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里也出现了 436
相反的诊断，即迅速的文化方面的变革实际上隐藏着发展的丧失。由于我在前面的篇章里所分析指出的特殊的加速的原因，在晚期现代对历史的终结和永远的一样的回归[11]的感觉，相对于有关透彻的变革的感知来说，却占有优势地位。因此，社会丢失了它作为可以从政治上塑造的项目的特征；正如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它耗尽了乌托邦式空想的能量和意义源泉。这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的层面也会发现抽象的偶然性处理原则中令人惊讶的稳固性和牢固性，这些特性当然也意味着持续不断的"模式维护"。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能动主义、普遍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都表现为增长和加速之间的提升关系的必要的互补性原则。[12]

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所努力阐述的，从文化方面与结构方面同样都可以没有矛盾地将现代的加速的历史作为互补的、逐渐凝固的历史来讲述，也能从涉及个性的发展或者说自我关系的发展的心理学的角度找到它们的踪迹。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由于充满刺激的"精神紧张的生活"（齐美尔语），常常迫使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加速和变得稠密、向它的相反方向发展，从而被感觉没有精力、存在上的无聊感所包围，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被病态的"凝固的时间"的抑郁的体验所裹挟。无论从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有关从感知为有方向的运动到感觉为失去方向的动态化的过渡的状况，强调了静止状态的印象，尽管是或者恰恰是由于高度的事件动态。

因而，保罗·维西留非常引人注目地提出他对疾驰的静止状态的看 437
法[13]，他认为在这种状态下现代的加速的历史无法停顿地匆匆向前，并且他以技术加速以及最终以社会的自然关系为核心，从它们当中所指向的角度论证了疾驰的静止。根据维西留的观点，运输和传输以及最终的移植的向前发展的速度革命非常矛盾地导致了首先是人体的不断增强

〔11〕 这不仅被尼采、鲍德里亚和本雅明所假设，而且也被诸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Adorno，1947 年，第 198 页）所提出。

〔12〕 请参照诸如 Voß，1990 年；以及 Schulze，1997 年 b，第 79 页。

〔13〕 Virilio，1998 年 a；也请参考本书第一章"2"。

的物理上的不灵活性,并且可能会带来整个物质世界的固定性:凭借自身身体力量的向前运动已经变成了在完全利用外在的变化的速度的情况下的向前运动(例如,骑马向前或者用马车运输),这样的变化限制了自身身体的速度和运动,但是直到在"速学革命"的潮流中所发现的技术速度完全代替了与身体有关的速度制造,运动中的人们,例如坐在汽车飞机以及甚至是火箭中的人们,是被被动地"运输"的,或多或少地像捆扎好了的"包裹",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不动的运动者,人们稳稳当当地坐在"宇宙飞船"中,同时也被越来越多地遮蔽了对向前运动的感官上的体验。[14]

因此,特殊的人类的和动物的运动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功能[15],运动被驱逐到运动项目中去了,而且似乎变成了"娱乐"。我们随着时间的变化似乎必须在"空转"中活动我们的身体(诸如慢跑),以保持身体的机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能证明身体的加速的历史性的超越。因而,将从运输到发送的过渡作为加速的导体,如同我在第四章中所展现的,自
438 身身体在地球表面的运动越来越多地由在电视里或者计算机终端里的世界的"来来去去的变化"所代替了;因而,物理移动通过更加快捷的数字的或者虚拟的传输所代替了,在这个范围内,维西留的关于极地惯性(*inertie polaire*)的可怕的想象赢得了说服力。

但是,正如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的被广泛讨论的研究所指出的[16],伴随着对自然的控制和处理的技术加速,带来了不断增加的系统估算之外的故障和事故的风险,这些将导致通过现代的大型机器技术所生成的对自然的快速加工的过程突然且意料之外地陷入静止状态,而且因此在这里加速的运动也变为瘫痪性的停滞,例如计算机网络的服务器的崩溃或者被迫关闭核动力工厂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因而,事实

---

〔14〕 对此请参考 Virilio,1993 年。这种类型的旅行产生了如同席维尔布什(Schivelbusch,2000 年,第 53 页及其后页和第 116 页及其后页)所进一步指出,立即出自这种旅行本身的单调乏味、无聊,以及无所事事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只能通过"一动不动的忙碌"——例如阅读或者后来的听收音机和看电视,而得以克服。也请参考 Thomas Bourry(2004 年)的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文章,在那里谈论了在飞机上对媒介的使用。格罗内迈尔恰好也讨论了这个问题(Gronemeyer,1996 年)。

〔15〕 从这个角度来看唯一的结果就是,动物在现代的大规模饲养的情况下变得几乎是完全"静止不动"的了。

* 查尔斯·佩罗,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与高风险科技共存》《复杂组织》《下一个灾难:我们的致命弱点变为自然的、工业的和恐怖主义的祸患》等。——译者注

〔16〕 Charles Perrow,《平常的灾难》(*Normale Katastrophen*),1989 年 a。

上，从社会发展的所有的四个角度来看，凝固都被证明是社会加速的固有的互补原则。（图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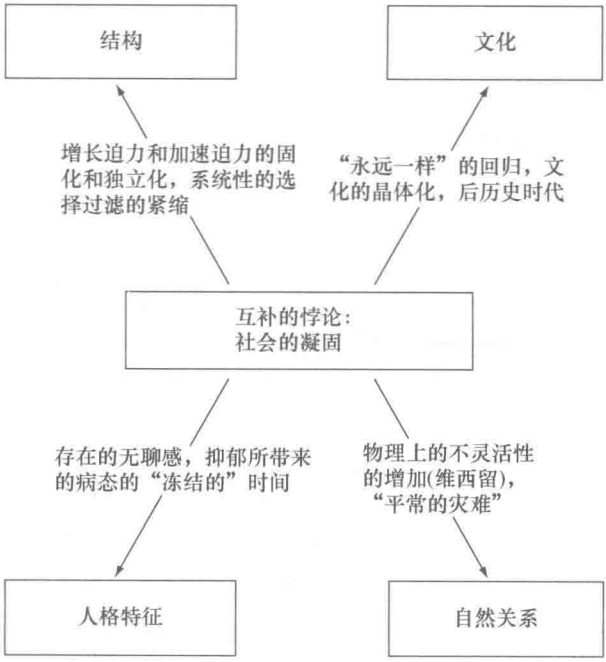


图 13-2：现代化进程 2b

与此同时，在这里也说明了，如同在第二章. 2(2)所介绍的通过分化、合理化、驯化和个人化所描述的现代化的过程的四个矛盾的互补原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加速的后续影响，而且也指出了这些互补原则是如何与所谓的凝固趋势联系在一起的（请参照图 *2-1*）：伴随着社会的（功能）分化的控制丧失的过程和去一体化的过程，如同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意味着加速背景下的去同步化的后果；意义源泉的被侵蚀表现为合理化的反面，它在后历史时代被作为意义的最终消灭的顶峰；如同在讨论这些发现时所指明的，这一切的原因特别在于加速地使传统、知识储备和行为习惯失效，同样也在于组合结构的不断变化；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自然的毁灭（到通过自然对自身的潜在的毁灭）的转变首先展示了对自然的“原时”的轻视所带来的后果，伴随着个体化过程出现了互补的而且矛盾的（在“大众文化”中）自治的丧失，如同我所展现的，有关 439
这方面的文化批判上的担忧的基础也特别体现在加速背景下的“背井离乡”和/或“疏离异化”的体验，这样的体验也表现在诸如不断增强的

(对于"原本"重要的事情)没有时间的感觉,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时间通过技术的加速被节省下来了。[17]

因而,现在有大量的研究证明,在传统的社会学中所定义的现代化
440 的基本过程从时间特定的角度来看,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加速的功能形式和表现形式。只要个体比起集体更为灵活、更为有弹性地适应社会变化,并且在决策中也更加迅速的话,那么个体化既是社会加速的一个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结果;功能分化导致了加速,并且同时也表现为针对加速压力的大有前途的策略,因为它使得成本外移和系统过程的加速成为可能,并且同时也导致了(相互推动的)复杂性的提升和复杂性的时间化。因而,对于合理化的过程来说意味着目标—手段—关系中的效率的提高,而对于驯化过程而言,则表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的提升。但是,社会加速是否形成了现代化的独立的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加速是否只是为通过其他的过程定义现代性打开了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视角,也就是似乎现在只是从现代化的时间维度对它进行了描述,有关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

事实上,我打算捍卫这个论点,即社会加速可以被理解为同时是现代性和现代化不可定的和从趋势上来看占主导地位的基本原则,而且更确切地说有三点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所证明了的,社会加速和作为它的基础的提升逻辑是一致的原则,它不仅将所确定的四个维度联系起来,而且也将现代化过程的不同的阶段联系在了一起。关于这一点我们马上还会详细讨论。第二个原因是,加速原则相对于其他的现代化趋势来说甚至被证明是首要的原则,因为它为解释表现形式上的历史的修正提供了钥匙。因而正如在第八章"1"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的不同的阶段和表现形式可以被理解为统一的加速逻辑的不同表现。与之相关的是同时进行的"经典现代的"不同形式的撤回或者修改:如同我所展示的,在晚期现代,社会过程和社
441 会领域中大量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化(例如工作领域与休闲领域的分离、购物设施与文化设施和运动设施的分离,等等)又将再度去差异化;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社会机构中观察得到,例如国家的、市场的和市民社会的元素的杂交[18],因而在社会诊断的文献中,向着后现代的发展并被罕见地形容为去差别化和杂交的过程,甚至是在科学与宗教、文化

---

〔17〕 关于这种感觉的心理方面的解释请参见本书第六章"2"。

〔18〕 请参考 Evers/Rauch/Stitz,2002 年。

与商业、艺术与技术、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界限也都被渗透了。[19] 正如我尝试着解释的，僵硬的系统间的界限从系统过程的加速的角度来看，被证明是交易的制动器。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也能够证明分化原则本身就是在*表 9-1* 所总结的加速和减速的辩证关系中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在经典现代加快着社会过程，而在晚期现代却越来越成为加速的障碍。但是，即便如此，可观察到的变化更确切地被理解为对分化的修正，而不是实际上的*去差异化*（在*系统代码*层面上的杂交化最终也几乎已经可以从分析上排除了）[20]，因而分化就表现为，根据加速逻辑随着分化过程而形成的形式。

这一点也更加适用于个体化的过程的是：对自我确定的、稳定的身份的发展和对根据自由选择的，但相对来说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指导原则而发展出来的“人生规划”的独立遵循，这些被看做是现代的个体化的相关概念或者核心[21]，因而，晚期现代的、情境化的身份确定的形式的 442
发展趋势，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加速条件下的个体化的*被撤销*；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个体化的被撤销都表现为对个体化的表现形式的巨大的修正。

对合理化的修正或者合理化在趋势上的逆向发展的迹象，最终可能在以下地方随处可见，即在对决策或判断的实质性的合理化是向着将加工期限和实施期限缩得更短的方向发展的地方，例如立法过程、证券市场或者在特定的生产决定的期限；也在用对偶然的机会结构的“情境化的”完全利用代替系统的生活方式的原则的地方；或者甚至是在化学领域放弃对新的有效成分的组合的理论上和推演的推导而直接通过无节制的实践中的尝试发现偶然的创新产品的现象中看到。从对时间合理性的要求漠不关心的视角来看，这些表现事实上都表明了去合理化的形式；相反，从时间敏感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确切地说却是有关对合理化

---

〔19〕 对此请参考 Adorno，1993 年，第 75 页及其后页；进一步请参考 Lash，1996 年；Harvey，1990 年，第 291 页；Jameson，1998 年；Lash/Urry，1987 年，第 285 页及其后页；或者 Welsch，1994 年；而 Schwinn，1999 年，则对此持怀疑态度。

〔20〕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请参考 Luhmann，1997 年，第 1145 页及其后页；以及 Schwinn 对贝克的批判（1999 年）。

〔21〕 Honneth（1994 年，第 20—29 页）建议，（在生活方式的*私有化*和*生活状况*的*个体差异化*之外的）自治化应该被看做是个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层面。个体化因此意味着，个体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更深思熟虑地、更“理性地”自我确定自己的生活历史和身份，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能够使用显著增长的选择的多样性和应变空间。这本书的第十一章“3”所讨论的状况毫无疑问意味着这样的自治潜力的被撤销；对此也请参考 Rosa，2002 年 a，第 271 页及其后页。

过程在加速条件下的修正的。[22]

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地论证了社会加速的独立性和潜在的主导地位是现代化的基础过程,而本项研究的研究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猜想,即无论是个体性的还是集体性的人类的存在的特性,都从根本上具有时间方面和过程性的特征,因此,个体或者社会究竟是什么,完全是由人类的存在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所决定的。如果后者发生了变化,那么人类的存在方式也将直接发生变化,反过来也是
443 一样。[23]

对于人类的分析如此,更何况对于现代性的分析了:通过分化、合理化、驯化[24]和个体化的过程,以及通过以相互矛盾的对立的趋势为特征的结构上和文化上的相互交织成网,似乎能够形成对于现代性而言的"超级稳定的布置",并且因此保证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身份发展的连续性。考虑到这些相互关联,事实上在现代性的特征上并没有任何事物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对于有关中断的诊断的批判者所提出来的"时间遗忘"导致的压缩,实际上直截了当地驳回了对现代的连续性的质疑。这些批判者们无意中所采取的对现代性的"静态的"视角使得他们看不到,只有在加速理论的时间化的视野中才能看到的,即个体和社会由于他们的时间结构的变化而可能(或正在)遭受剧烈的和根本性的变化,尽管现代化原则(其中包括增长趋势和加速趋势)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并且保持未受妨碍的状态。正如我在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中所尝试分析的,在时间维度中加速条件的变化,才使得在现代化过程中时代性的中断进入视野之内,并且能够对其进行解释,而且也正是加速条件的变化导致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从早期现代、经过"经典现代"到晚期现代的过程中遭受了双重的变化。

表 13-1 总结了这样的双重变化过程,并且概览性地展示了这样的双重变化过程中特有的时间化和去时间化的辩证关系的典型性的尖锐化。在这里根本性的假设是,社会的动态性和内生的社会变化的加速,

---

〔22〕 林德因此讨论了对不断增加的不合理化的合理化过程;对此请参考本书第六章"1"。

〔23〕 同样诸如当罗伯特·劳尔(Lauer,1981 年,第 56 页)在提起海德格尔的一段话的时候也强调:"自我是一个过程;时间的维度是根本基础。忽略了时间的维度就是忽略了存在。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人们只将个体简单地分解为特点、特性或态度的组合。"对此请参考海德格尔"存在即时间性"的基本论调(Heidegger,1995 年,第 26 页;以及 1927 年,第三章)。

〔24〕 在这里驯化最终包括了从现代的总体安排中所推导出来的工业化原则、节约原则和商品化原则。

导致了个体的以及集体的时间体验和历史体验的逐渐变化，并且正因为如此，也带来了在个体的自我关系的特性和政治—社会的自我关系的特性上的变革。我因此得出结论，新时代的动态化的过程并不是线性地发 444
挥着影响，而是到达了关键性的转折点，在那里是与代际变化的速度联系在一起的。[25]

系统自我生成的社会变化的速度和在所期望的社会变化的意义下的速度，要快于共同生活在某一个历史时点的社会中的三代人或者最多四代人之间的交换速度，因而经验空间与期望地平线相互交汇在了一起：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与人们从过去中所认识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个门槛似乎最迟是在18世纪晚期的“鞍形时间”中逐渐跨过的，历史的体验与对自身的生活的展望一样都发生了相应的时间化，也就是说，只要在个体和集体拥有计划和规划方面的自治权利的承诺中，历史与生活在未来得以设计的话，那么它们同样都在对于“经典现代”所特有的含义中发生了时间化。社会加速使得身份确定和历史都以特殊的方式运动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个体的自我关系和政治的自我关系的根本性的变化，毫无疑问是历史性的，而且也不会被以下这个确认无疑的暗示所驳倒，即前现代社会并不像在这里所开发的模式乍一看所展示的那样稳定和静态。为了避免误解，在这个地方需要再一次指出，在这里所建议的历史发展的模式绝对不是被迫否定或者忽视偶然的、动态的历史性的根本变革，以及社会的划时代变革的加速阶段，例如随着“十字军东征”或者中世纪盛期开始的城市发展而来的加速阶段。因此在这里要捍卫的论点确切地说就是，意料之外的或者外源的巨大变化，尽管也是快速而强有力的，但是它们本身没有导致期望的地平线的时间化，因而它们或多或少是作为令人惊讶的“历史”出现在对自身而言是静态的历史空间中的，在那里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能够重复发生的。[26] 445

〔25〕 请参考本书的第二章.2(2)和第五章。

〔26〕 认为历史状况会重复发生或者事件会演替出现(例如可以想一想宪法中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规范)的观点自然认为一切都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它并不能带来历史自身的时间化和单数化，而是强化了历史在根本上是静态的印象，因为在不断重复中最终往往就是“相同性的回归”；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 Koselleck，1989 年。

表 13-1 从历史的"时间化"到历史的"疾驰的静止状态":在现代性中时间化和去时间化在加速背景下的辩证关系

446

	前现代和早期现代	"经典"现代	晚期现代
内生性社会变化的速度	结构变化和文化变化的速度比代际更替的速度慢(代际之间的)	结构变化和文化变化的速度接近"代际"的变化速度	结构变化和文化变化的速度比"代际"的变化速度快(代际之内的)
指标:职业结构和家庭结构	"职业结构"和家庭结构(家庭在经济单位的意义上)在代与代之间是稳定的	家庭结构和职业变化速度与代际更替的速度一致,即"建立家庭"和"选择职业"都是个体的、身份构成的记录;代际成为革新的承担者	职业结构和家庭结构以比代际更替更快的速度变化着;因而,职业是一系列活动(工作);人生伴侣也由一系列的"人生阶段伴侣"所代替
时间视角	经验空间与期望地平线是完全一致的(循环的时间)	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地平线相互分离了(线性的时间)	"永恒的时间"和"**时间的时间化**":在行动和事件的实施中决定它们节奏、期限、顺序和时间点
历史视角	静态的历史视角;作为"历史的空间"的历史时间	**历史的时间化**:历史作为可理解的、可塑造的和有方向的过程(进步的观念);政治的在时间上的方向指标(进步的/保守的);政治作为历史的"开路先锋"	在进步的观念和历史哲学的意义下的历史的终结;在快速的变化速度中失去政治的方向指标(情境化的政治):**"历史的去时间化"**
生活视角	"情境化的"生活视角:对(外在确定的)日常问题的处理是建立在"推演性的实质的身份"基础上的;生活中的变化一方面是外生的,另一方面是先验的和文化方面的	**人生的时间化**:可计划的视角和作为发展历史的叙事性的人生历程建立在稳固的、自我确定的"归纳性"的身份和制度化的保障的基础上(人生历程管理)	人生历程的去机制化;放弃了"人生规划"意义下的稳定的身份;"情境化的身份确定和生活方式",**"人生的去时间化"**

似乎不稳定的革新无法在期望的地平线中占有系统性的位置，就连在巨变的阶段之后的新的方向也出现在情境化—静态的时间体验的地平线之前，并处在长期确立的结构的导向中。这样的历史的震荡不能导致时间化，而更可能带来经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的一次性的变化，它们之后又变得稳固并且被调整为准静态性的，因此它们当然必须系统地考虑生活中的不可预测的偶然情况和变化情况。

相反，“经典现代”的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由于它的统一性而呈现出完全没有动态的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并且在不断增强的机制性的保障下面对变化情况是连续性的、可控的，尤其是它转变为一个有方向的并且正因为如此也是在政治上可以规划的过程。[27]

被归入“经典现代”个体人生的时间化相对于历史的时间化来说，首先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延迟，也就是说大概在19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真正发挥广泛的影响。这当中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因素是，对人生和身份形成的导向需要在社会福利国家的结构中可以规划的、有制度保障的时间上延伸的人生历程，也就是说就从人生历程的角度而言，它又是社会的历史规划的产物，而这样的社会是可以从政治上进行设计的 447
项目。而第二个因素出现在以下情形的时间上的差异中，即个体的人生的时间化看上去是更紧密地与真正的一代的变化速度捆绑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历史地平线的确是历史的变化速度的加速超越了共同生活在同一时间的三代（或者是四代）这个关键的门槛而产生的结果。这个观点可能可以从下面的情况中得以强化，在迈向代际之内的变化速度和因而走向晚期现代的时间的时间化这第二个门槛上就不再能观察得到相应的相位差。[28]

在这里有趣的是，在科泽勒克所观察到的（社会）历史的时间化发生的同时，也出现了自然科学的感觉模式的时间化：如同沃尔夫·勒佩

---

〔27〕 但是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完全没有将这个假设与通史的或人种学的要求联系起来；我只是去理解在现代的发展和变化，而并没有去描述“现代以外的”社会的决定性的时间体验和历史体验。因而更确切地说在这里所分析的“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应该被理解为在典型的、模式化的抽象意义下用于比较的目的的，而不是作为严格的历史性的事实描述。有关历史性的描述请参考 Kirchmann，1998年，第30页及其后页。

〔28〕 但是科利（Kohli，1985年，第12页）也将新时代的人生的时间化的开端向后推移到“鞍形时间”当中了；但是，人生的时间化首先只发生在高度文明的小生境中，例如可以从 Karl Philipp Moritz 的《安东·赖斯》（*Anton Reiser*）中看到的，生命的时间化也意味着自传从“编年史式的”到人生视角的或者说“发展史式的”时间化形式的变化，并且是随着社会福利国家的到来才得以广泛扩散的。

尼斯(Wolf Lepenies)*所发现的,正是在大概同样的时间,将自然事物作为类别上的*并列*来看待,被将它看做发展历史中的*后来者*所代替了。[29]

而下列的状况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即在人生的时间化和历史的时间化沿着预先设定的轨道上向前运动的意义上,人生和历史的时间化是由稳固的机制设置所陪伴和支持的,这些机制设置一方面是以法律、民主的民族国家的机制,当然也包括安全组织为代表,另一方面是以社会福利国家、婚姻和经典现代的劳动制度的安排为中心的,它们构成了"人生历程管理"的机制化的物质性的基础条件。

448 但是,自我关系的动态化和社会的动态化并不是保持不变的。它们大约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到达了*代内变化速度*这个关键的门槛,这个在个体的和集体的时间体验中的更新的巨大的突变,和因此在个体的和社会—政治的占主导地位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中的突变,带来了对经典现代的机制设置的侵蚀,并且与此同时仍然不断地对其进行腐蚀,同时经典现代的机制设置也陷于动态化的压力之中(请参考*表 9-1*)。[30]现在,*时间自身*也被时间化了,也就是说,通过时间性所定义的事件和行动的*时间点*、*时间顺序*、*期限*、*节奏*和*速度*的特性不再是根据"元时间的"、预先制度化的计划,而是由*在时间自身当中*决定,并且带来了最重要的历史和人生的"去时间化"的后果,因而历史和人生失去了是*有方向的*、*可计划的*时间进程的特性。因此,在这当中所形成的到处出现的晚期现代的同时性,严格地来看不再是不同时的同时性——这是以时间化的、有方向的和运动的(尽管是非同步的)历史的观念为前提的,而似乎是静态—情境化的、"永恒的"和无序的*历史碎片的同时性*。[31]

正如芭芭拉·亚当和卡门·莱卡迪(Carmen Leccardi)在对我早期的时间化论点的反驳中所指出的[32],我所选择的概念的用法容易引起一些混乱,其原因在于这些术语在最新的时间哲学和时间社会学的讨论

---

* 沃尔夫·勒佩尼斯(1941—),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德国历史上的文化诱惑》《忧郁与社会》和《社会科学与社会变化》等。——译者注

〔29〕 Lepenies,1976年。

〔30〕 根据鲍曼(Bauman,2000年,第3页及其后页)的理解,传统的机制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现代的消解具有在它的位置上设立自我确定的、稳固的、值得信赖的机制的目的;与此同时,"经典"现代的机制在晚期现代的液态化(鲍曼所偏爱的概念是"重的"和"轻的"现代性)不言而喻是以后退的形式设立了机制的稳固性。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也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章"4"。

〔31〕 在这里也显示出,在建筑学中发展出来的(折中主义的)"后现代"的哲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就是变化了的时间体验的表现。

〔32〕 Adam,2003年,第51页及其后页;Leccardi,2003年,第39页及其后页。

中非常缺乏一致性。类似的，与未来变得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样的现象，既可以用“现在的萎缩”（吕伯）也可以用“现在的延伸”（诺沃特尼）这样的概念来表述一样，晚期现代的发展最终变成了无处不在的同时性，它意味着在日常生活的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的时间中的事件和过程的时间方面的特性只有在实行的过程中才能确定，对于同步性这样的现象则既可以用“永恒的时间”（卡斯特斯）这个概念来表示，也可以采用“时间化的时间”（卢曼；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这个概念。这两种情况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由于从一开始事件的顺序、速度、节奏和期限就不再能说明什么，因而出现了一方面是时间的去时间化（它缺乏相应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又是确实的时间的时间化，它们的特性的形成只能在时间中决定了。 449

因此，我建议，在这里所展现的发展从概念上可以最清晰地描述为时间的去时间化、历史的去时间化、人生的去时间化，以及部分上的日常生活的去时间化，在这当中所丢失的似乎是“元时间的”历史规划、人生规划和小时计划，它们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事件和行为的时间上的特性，并且使得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时间可以规划，且表现出方向。

尽管存在术语上的混乱，但是在我看来在这两种情况下的论点是不会引起误解而且是清晰的。值得注意的是，我是在所呈现的社会现象学的或者系统理论的含义下使用“时间化的时间”这个概念，而不是（如同亚当所误解的那样）在柏格森、米德以及尤其是海德格尔等人所提议的不同的重点下使用这个概念的，特别是与根据钟表时间所设立的哲学含义的观念相反。时间的时间化在这里绝对不意味着回归“原始的存在的时间性”，原始的存在的时间性首先产生于死亡的确定性以及由此所出现的现在和过去，并且构建与之相连的真正的未来。[33] 在所诊断发现的晚期现代的形式中，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看，时间的时间化其实是极端的“从时间消逝前逃跑”[34]，并且因此也是从存在的时间性的真正 450

〔33〕 Heidegger，1924 年，第 18 页及其后页。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加速的现象（急促地四处奔跑的现象和没有时间的现象），还是与之相关的空虚和无聊的感觉，实际上都是（现代的）作为逃离对未来的（自身死亡的）时间上不确定的确定性而固定在当下的“非真实的时间”的后果：“将存在看做在当下，但是当下却没有时间，因而时间对于存在来说突然变长了。由于存在事先在关于多少时间这个问题上将时间拉长了，因而时间是空无的；与此同时，经常出现地回到已经发生过的过去也再显得无聊了。”（同上书，第 22 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在我看来，以海德格尔的观念为导向与我对时间化的概念的使用并不是不兼容的进一步请参考 Sandbothe，1997 年和 1998 年。

〔34〕 Heidegger，1924 年，第 20 页。

核心前逃跑,而进入偏于当下的"人工时间",最终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极端的去时间化。[35]

这个第四部分的时间诊断的核心论点是,首先在加速条件下的时间化和去时间化的辩证关系所论证的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体验的变化,导致了在运动和停滞的互补关系中的凝固那一方面在晚期现代的文化上的自我感觉中的优势地位,并且使系统过程的独立化表现为不可逆的。对"历史的终结"的观察所诊断出来的正是现代的时间化的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一种时间体验的终结,在这种时间体验中,无论历史的发展还是人生历史的展开,都同时表现为有方向的并且是可控的;在那里,变化似乎担负着运动系数。在晚期现代,在这种时间体验的位置上出现了不可预测的和没有方向的体验,因而似乎必然也是没有运动的,而且是(跨情境的)不可控的,变化在亨利·亚当斯所假设的"加速法则"中不再能被理解为"进步的发展"。只要现代的前进诺言仍然是
451 个体和集体的自治的承诺,现代性的项目,在这里我将追随尤尔根·哈贝马斯从而指出,是以主体自身能够并且应该承担渐进地规划自己的人生(伦理上的自治)和他们的集体的生活形式(政治上的自治)的责任的观念为中心的[36],因而向晚期现代的时间体验的过渡与这种前进的理念完全相反。由于晚期现代的时间体验与失去自治的感觉有着根本性的联系,因而在控制潜力的失踪和规划机会的被侵蚀当中显露出了失去自治的感觉,并且形成到处漂流、随着情境变化的游戏者个体的体验,而在政治上汇入束缚于事实的修辞学的宿命论和不可避免的结构上的适合。

克劳斯·奥弗在这里得出结论:"社会正处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和合理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中,因而倒退到了沉闷的命中注定和不变性的状态中,这样的状态战胜了现代化进程的原始动机";而彼得·斯劳特戴克则抱怨道,"自我放纵的现代"显然已经没有力量去"拦住它的最终的漂泊了;所澄清的世俗主义带着它的有关自我确定和大型机器技术的双重论点离开了,因而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了全球的荒芜——事物现在按

---

〔35〕 在这里所展现的在当代的时间理论的讨论中即将出现的时间概念的完全的混乱,毫无疑问体现了在社会学中也非常重要的晚期现代的现象,这种现象值得单独研究,并且似乎是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间危机"(Achtner,Kunz 和 Walter,1998 年,第 5 页)的症状。

〔36〕 参考诸如 Habermas,1994 年,第 112 页及其后页。

照它们的意愿运行，而最初的意图不再重要”[37]。斯劳特戴克因而也诊断出“第二宿命论”的出现。

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的加速过程因此转过身来反对最初的推动它、为它提供基础、使它真正运行起来的现代性的项目，通过这样的方式，加速过程表现为现代性项目的可能性的预言：增长和加速发挥着社会性的前提条件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自治承诺在解放的含义下，从各种类型的物质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束缚中实实在在地成立了。因而，正如我已经阐明了的，特别是曾经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现代推动社会加速的进步的幻 452
影和乌托邦式的能量，它们从前在现代性的结构中如此独立，以至于在现在形成的未来的地平线中完全不再需要它们的继续存在了。但是，正是增长和加速的提升的相互关系正在不断激化地从时间结构的角度开始埋葬自治的承诺，而且这就它的那方面而言已经成为逃脱不掉的束缚：我的论证的结果就是，现代性的项目本身被归入经典现代的加速器这个行列，而身处不断增强的侵蚀压力之下，又被归入晚期现代的制动器之列。因而，所谓的重大的预言现在表现为威胁。增长和加速中所蕴含着的最初的幸福的诺言，渐渐褪去了光泽，并且变成了不断危及着个体和集体的自治的不幸。

在下滑的斜坡的社会结构中所形成的加速的强迫力，迫使主体、组织和政府用个体和集体进入反应式的情境化的社会来代替有规划的方式。因而，从维希留的观点来看，由于过程的高度自动化，尽管赛车选手尝试着对过程进行控制，但是他所做的也只是“对他的运动的灾难性可能的充满焦虑的瞭望（原文如此）”[38]。但是，单看这幅图景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它直接暗示了选项的减少。社会加速并不只是单纯地腐蚀自治潜力，而且它也通过自身的不断提升而使得对自治潜力的运用变得困难。尽管所有的不确定性和危险，与日常安排和人生历程相关的时间的时间化对于主体而言，首先却总是意味着他们的决策可能性和支配范围的强有力的增大，这是由于行为和时间可以被更加自由地排序、组合和改动；并且“经典现代”的固定的机制性的安排的液态化，也为政治完全打开了活动余地和规划的可能性。但是，对自治造成危险的也恰恰是通过与 453

---

〔37〕 Offe，1986 年，第 116 页；Sloterdijk，1989 年，第 87 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 Nasehi，1993 年，第 375 页：“在早期现代登场之后，世界和时间都变得可规划了，并且通过历史的合法性能够推动未来的发展；而在高度发展的现代，时间自身、规划的可能性、控制潜力和影响的可能性无论从事物本身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允许的。”

〔38〕 Virilio，1980 年，第 188 页；也请参考 Chesneaux，2000 年，例如第 413 页及其后页。

之相关联的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的变化:实现个体的和/或集体的生活的自我确定的规划的前提是,选择空间在一定的时间段中是稳定的[如果对决定的运用、它的(机会)成本和所产生的影响不具有最小的时间稳定性,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有根据的决定],行为条件是持续选择的,能够与变化的过程和谐共处,并且至少部分上是可以控制变化的过程的,最后有足够的时间用来通过有计划地影响行为空间从而规划生活和社会。

真正的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自我确定的可能性,在这里也取决于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或者说跨情境的偏好或目标观念,它们定义并且衡量了规划、进步和运动。自治在这个意义上等同于对自我确定的计划在一定的时间中的稳定的遵循,并且能够抵抗其他的情境化的条件带来的阻力。当然,并不能排除,这样的计划在时间中会听命于自身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并不允许只是外在引起的或者依赖于情境的情况,也就是说,期限的迫近和实用主义的必要性、保留选择,都不能够阻碍对自我确定的优先顺序的构建和遵守。

机制所保障的稳定性在动态化的压力下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并且身份确定和政治设计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情境化的了,因而所呈现的选择地平线从政治上和伦理上来看都是贫瘠的,特别是由于未来的行为条件和决策条件的不确定性,因此保留选择和连接的可能性就变成了绝对命令,而这个绝对要求相对于实质的联系而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观察。因此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经验中几乎没有与期望相联系的连接力量了,并且因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在个体层面和政治层面的联系,都通过所假想的自主的设计空间变成了宿命论的静止状态的静态空
454 间,并以这样的方式而被撕裂了,在这当中,在片段的快速的变化的背后是永远相同的回归,是同时出现的永恒和瞬间的"永远的时间",是——正如在这一章的开头所引用的那位女生的话——匆匆忙忙和同时的停滞,而在这些规划中隐藏着确确实实的无意义。[39] 这样的进退维谷的困境的全部影响范围体现在真正矛盾的历史情境中,也表现在从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实现有利于对社会的政治上的设计(特别是在逐渐明朗的基因技

[39] 纳瑟黑(Nassehi,1993 年,第 378 页)也评论道:"尼采的有关时间语义学的……最现代的表述方式是:那些在第一眼看来像是重新构成的神秘的圆形的,其实是相同的永远的回归,即现在面临着无法解决的进退两难,因为它的过去不再能作为可以运用的潜力,而它的未来却又无法识别。"

术的形式上和逐渐消失的传统的联系作用上）的前提条件之中，但是实际的规划可能性由于时间结构方面的原因看上去比在前现代时期要少很多。

在经典现代和晚期现代之间的断层可以非常精确地确定为是“加速的历史”中的一个时刻，在那里，加速理论如此大幅度地超越了主体和社会的设计能力和整合能力，从而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体验形式的历史的时间化和生命的时间化，被时间自身的时间化排挤着；并且在那里，现代化的文化方面的项目和结构方面的过程都显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40] 因而正如我的观点所说，这个时刻是与超越了代际门槛紧密联 455
系的，即社会变化的速度朝着代内的变化速度的方向发展，这会侵蚀稳固的个人身份确定中的连续性条件和一贯性条件，并且因此使得形成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偏好变得非常困难。

这样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状态，如同人们所猜想的那样，一定会长期地附着在规范的现代性的项目上，这看上去是很成问题而且是值得痛惜的。因而，对自治理想和对与之相联系的设计要求和控制要求的放弃，事实上是开启了积极地接收时间体验的新模式的可能性和现代化进程的独立，这表现在哲学式的后现代的对加速表示肯定的行为举止上。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从时间结构方面不再能坚持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

〔40〕 这个矛盾暴露了诸如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都市与帝国”（Cosmopolis vs. Empire）[这正是2003年在布拉格（Prag）召开的、由捷克（Tschechisch）科学院所组织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国际大会的主题]之间的固有的对抗。国际化大都市所瞄准的现代性的项目从趋势上来看将会受到帝国（的速度）的阻碍，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的独立的和自我控制的提升关系会被阻碍。在Hardt和Negri（2001年）所假设的对帝国的他治的“后现代的”克服中，有意思的是这并非完全是通过有目的地、合理地重新确立经典现代在政治上和机制上的设计要求，而是通过大众的既是明确的又是无把握的充满活力的—自发的行为而得以实现的。因而，在这里面，政治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如同后现代的主体性的可能的形式一样都是难以想象的（请参考注释42）。由此引人注意的是，自从最近一次伊拉克战争（Iraqkrieg）以来，在“古老的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越来越深的鸿沟可以理解为它们之间的分裂线：在欧洲尽管非常不愿意，但是仍然经历了功能所要求的对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适应；而与此同时，尽管在规划和过程之间的鸿沟陷入了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当中，但是美国仍然非常明确地从意识形态上继续坚持现代性项目的可行性的观念和可设计性的观念，毫无疑问以消除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提升过程为代价会阻碍控制的要求。

从理论的角度的理解和恰当的描述[41]以及从实践的角度进行政治上的设计,都被当做是空想的并且一直都是潜在的极权主义的而被放弃了。在这里所产生的丧失控制因而可以作为从控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加
456 以欢庆,而控制的约束在经典现代只是在巨大的连续性苛求、整合苛求和一贯性的过分要求("身份暴政")下才得以维持。因而不言自明的是,社会的加速并不是破坏了主体性的可能性本身,而是将它从严格的稳定性苛求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的论点。[42]无论是社会的碎片化和不同步性,还是放弃将体验事件整合为构成身份定义的经验整体,如果能够成功地将讽刺的—轻率的关系发展成为生活的不可控的变化,并且放弃对世界的有意义的整体性的设想以及地点、人、实践形式或价值的持续的联系,那么社会的碎片化等都会被充满喜悦地认同。[43]

在我的这项对现代性的独立的加速动力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中,大
457 量的地方都表现出对这种不加批判地对超级加速的肯定的反对,例如这涉及基本的文化再生产的条件、最小的社会同步化的前提条件或者时间

---

〔41〕 沃林(Wolin,1997 年)回答了由他自己所提出来的问题,即为什么政治理论在今天难以对去同步化提出建议,并且将它在它的时间模式中与(缓慢的)审慎的政治联系起来,但是,在政治理论的影响中,历史的时间却又"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发生了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可以说政治理论……是受政治时间统治的。政治理论具有保护功能,这部分地反映在大量的努力,甚至是意向当中,也伴随在规范的永恒性中,但是在政治生活中的深思熟虑也部分地出现在每一条理论当中,并且使政治理论的构造物慢慢地脱离了过程。"有关对在后现代的世界的可理解性和可描述性所提出的疑问请参考 Wagner,1995 年,第 220 页及其后页;以及 Turner,1990 年,第 1 页及其后页。

〔42〕 例如 Peter Weibel(1987 年)对诸如此类的在社会加速讨论的肯定的立场表示支持。在这里引人注意的自然是这个问题,即人们如何思考主体性的真正的后现代的形式。Dieter Henrich 猛烈地反对有关艺术和主体性的终结的假设,他支持这样的论点,即主体性的不断增加的能动性并不一定摧毁艺术,因为一方面在记忆中和在艺术作品中,使得人们能够想起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不同生命阶段的不能相互比较的经验能够被连接为一个整体。"记忆是在生活中每一个聚合的认知方面的实施模式,因而它有能力将不同的人生阶段的不可比较性从总体上进行把握",Henrich(2001 年,第 260 页)这样描述道,而且在不久之后,他又指出,艺术作品的形式发展开拓了所有的关于"在整体的能动性中的人生运动以及在某一个经历过程中的生活分配到其他的体验过程当中、不同阶段的结果和冲突、对重新开始的希望"的主题(第 263 页)。但是,主体性的这些形式与经典现代的时间体验是非常明显地捆绑在一起的:有关将通过艺术所传达的对经历过程的记忆理解为通过不同的生命阶段的发展的人生整体的观念,从根本上是与时间化的生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在体验事件能够转化为经验,并且至少能够在艺术家式的理解中表现为有方向的。考虑到对主体性的"后现代"形式的思考中的各种困难,因此在这里不能排除,主体性最终能够被证明是"存在上的不可能性"(Löw-Beer,1991 年)。

〔43〕 请参考诸如 Rorty,1989 年。

体验的准人类学的实际状况等。我在这里不打算再一一提及它们。产生于经典现代的地平线上的伦理的和政治方面的批判主要带来了这样的问题，继续发生的、不可抑制的动态化为地球的生态系统、为不同步的社会的子系统的“(时间)结构的耦合”的模式、为社会的和代际传承的社会道德的现有条件的保持以及最终为将世界体验为有意义的可能性，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主体性和社会性的时间结构的界限或者说速度界限的确定，似乎需要加速的批判性理论，这样的批判理论在不涉及已经变得有争议的哲学人类学或历史哲学的规范性标准的情况下，能够定义加速条件下的社会病理学。[44] 彼得·斯劳特戴克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努力开发对政治动力学的批判以及对政治上动员的批判，他将这些看做是批判理论的第三版。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最终会宣告破产，因为它误解了现代性的非同寻常的动力力量或者甚至反而对它们不加批判地给予支持。[45] 但是，斯劳 458
特戴克自身的设计也是高度推测性、缺乏系统性和缺乏实证基础的。因而，我打算在接下来对全书的推导过程进行总结的最后的部分，尝试着以所阐述的诊断结果为基础、通过概略的方式展现这种加速的批判理论的大概轮廓，并且同时也对现代的加速历史的真实 历史过程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探测。 459

〔44〕 一项针对时间结构的社会病理学的研究能够帮助消除由 Honneth(1994 年 a)所定义的当下的社会哲学中的批判标准不再能够被证明的困境。

〔45〕 Sloterdijk，1989 年，第 12 页及其后页、第 27 页及其后页和第 52 页及其后页。斯劳特戴克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首先，到目前为止非常有名的批判理论的版本(在这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是站不住脚的了，因为它或者是无法将它的论述对象、现代性中动态的真实理解为动员，或者无法指出它的关键性的差异，这是因为这些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动员所产生的结果……其次，在对当代的诊断中，必须引入一个动态的和动觉的维度，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维度所有关于现代性的讨论都是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同上书，第 27 页及其后页；对此也请参考 Rosa/Scheuerman，2006 年，导论)。

第十四章　结语：疾驰的停滞状态？历史的终结

> 我们的指挥塔不再能够作出回答了。
> 我们该怎么办？
> ［出自在海地（Haiti）举行的有关全球化的影响的讨论的文献资料］

当人们严肃地思考社会的激进的时间上的结构、它的状态的时间性和过程性的时候，事实上之后就理所当然地会谈论社会的加速。社会的时间结构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而按照统一的模式发生变化，而本项研究的结论就是，通过社会加速的概念能够对这些变化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分析，并且在实证上也是卓有成效的。

有关与事件、过程和变化相关的时间段的持续进行的动态化和缩短的感觉，从现代的开端就产生了，似乎是从哈姆雷特的“时间已经脱离了相互之间的关联”的抱怨开始的，这样的感知对于现代化的基本体验而言是根本性的，有关这一点我在第二章已经尝试加以证明了。对现代化的体验，正如对文化历史学的诊断的讨论中所得出的结论那样，是加速的体验的对等物：“现代性就是关于时间的加速”，这是彼得·康纳德所提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式，而在科泽勒克从“鞍形时间”中所发现的证据中恰恰可以证明这个公式，同样在“传统”社会学的理论设计中也可以找到对它的证明。从齐美尔对现代的大都市中持续出现的“紧张的生活的不断加剧”的观察，到韦伯对新教伦理中将浪费时间看做“所有罪恶中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时间纪律的分析，和涂尔干对作为快

速的社会变化的结果的社会反常状况的担心，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抑制的趋势就是使所有存在的和已有的都将被蒸发掉的格言，这些传统社会学的对现代的诊断往往也被重构为对加速的诊断。 460

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社会发展的角度在社会科学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埋没了，其原因主要是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中的“对时间的遗忘”，在那时显然“静态的”社会模型受到偏爱，而且几乎是根据“相对来说静态的”分析模式，沿着结构上的分化、文化上的合理性、人格特征方面的个体化和与自然相关的驯化的维度，对现代化进程进行塑造的。这本书的目标是，在社会加速的系统理论方案的帮助下填补现有的现代性分析中的空白。

在这当中第一个，也是最迫切的任务毫无疑问就是解释，加速体验的物质化表现是什么，也就是说，在社会的过程结构中实现了什么；因而，第一步就是提出关于那些体验的物质性内容的问题。有关加速的讨论和对减速的文化批判方面的呼吁的波浪状的起起伏伏已经指出了，社会加速正如现代化的其他的基本趋势一样，例如个体化或分化，是一阵阵地展开的，并且会遭遇到阻力和相反的潮流，偶尔也会通过实现了新的速度水平而在社会设置中产生性质上的巨大变化。在1880年到1920年年间，大量的意义重大的计算革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这段时间相同的是在1989年左右，那时所发生的数字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后续影响往往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下得以广泛的讨论，这些年代在这里都可以看做强有力的加速阵发的阶段，从而也引起了紧随其后的有关适应速度加快的必然性和过高的社会速度所带来的伤害的讨论。通常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的历史中，技术、组织或文化的加速的浪潮，首先都会遭遇强大的阻力和到处蔓延的怀疑，但是最终还是能够得以贯彻，同时批判声也逐渐地销声匿迹。 461

尽管如此，不仅在小品文中，而且在科学论文中也广泛流行着这样的主张，即在现代性中只是“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了”，这个主张不仅是大而化之的，而且显然也是错误的。因此，我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开发了系统地掌握可实证证明的加速现象的类别性的基础框架，从而能够通过对放缓趋势和凝固力量的相应的分析补充在归纳逻辑方法中所回避了的内容。

我的建议是，在当代的有关加速的讨论中往往毫无区分地混淆在一起的社会加速的三个基本的维度，应该在分析上和实证上都作出富有启

发意义的区别。因而,首先要分析的是技术加速的现象,这意味着以有目的的加速为目标的过程。在这个视角下,现代的加速历史首先表现为运输、通讯和生产的逐渐加速的历史。第二个维度是社会变化的加速,它意味着联合结构、(理论方面、实践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知识储备以及社会的行为导向和与实践方式相关的社会的变化速率的提高。加速在这里首先意味着流行、生活方式的加快变化,但同样也意味着职业关系、家庭结构、政治上和宗教方面的联系等的快速变化。为了对加速的形式进行定义和实证方面的操作,我运用了赫尔曼·吕伯所开发的,同样也是可以从系统理论加以证明的"现在的萎缩"的概念。社会变化的加速说明,由于产生期望的确定性的经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相互重合的状态逐渐结束了,因此持续时间或者稳定性的时间空间也在社会中的不同价值领域、功能领域和行为领域中变得越来越短,尽管这不是以线性的而且完全不是以不变的速度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因而可以被定义为
462 发挥行为导向作用的经验和期望的失效的速度的加快,并且被各个社会领域作为当下的相应的时间空间的缩短。

社会加速的这两种形式与第三种加速形式——生活节奏的加快——不同,第三种形式表现为对(并非必然的)时间资源的紧张的反应,它在一方面显示了时间贫乏和紧张的体验,另一方面又确认了每个时间单位中的行为事件和/或体验事件的数量上的增加。

正如我继续呈现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独特的悖论式的关系:技术加速通过缩短程序的持续时间而释放了时间资源,因而不言自明地会带来生活节奏的放缓,因为从表面上来看有了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现代社会却是以两种加速形式的同时出现为特征的,对此就需要用我所发现的增长和加速之间的特殊的联系来作出额外的解释:只有当(对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从事的沟通的数量、所经过的路程、所完成的行为)在数量上的增加速率超过了与之相关的过程的加速速率的时候,才会在技术加速的同时出现时间资源的短缺。这种加速速率越是落后于所提到的增长速度,时间贫乏就越显著;而前者超越后者越多,那么就会有越多的时间资源被解放出来。

因而,当平均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的计算加速的速率的时候,生活节奏的加快就可以确切地描述整体社会的现象。有关增长和加速之间现代典型的联系的驱动力和模式的问题,是这项研究的第三部分所详细讨论的。但是,在此之前,首先借助于对停滞力量的分类把握,从而更精确地确定了在现代性中加速力量和停滞力量之间的关系。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可以将摆脱动态性或者甚至是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现象分为五个类别：（1）首先是一直存在的并且可能永远存在的自 463
然的减速，即地球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和人类学上的速度界限，也就是过程在它的持续中完全不能继续加速了，或者只有在以巨大的特性上的变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加速。

（2）之后是领土方面、文化方面和结构上的“减速岛”，即某些领域尽管通常是受到现代化过程和与之相连的加速过程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被它们所控制或者（至少是暂时地）到达了与这些过程相反的静止状态，因而在那里似乎表现为“时间停住了”。

（3）接下来在大量的行为领域不断出现了作为加速的未预见到的伴随后果的抑制和放缓，它们可能会导致功能失调以及部分上甚至是病态的后果。对此最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交通堵塞，当然在这个类别中也包括经济的衰退和抑郁症。但是，当在功能系统或者过程循环表现出了不同的加速能力的时候，并非是加速条件下有意产生的放缓也会出现在它们的交界面上，并且由此引起去同步化的问题，这明显地体现在被迫的等待时间上，例如，尽管新的城际快车（ICE）比旧的城际火车（IC-ZUG）早 20 分钟到达换乘站，但是人们还是会在与以前一样的时间登上中转的区间客车。

（4）与上述现象不同的是有意的减速，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个是在个体的或集体的延期清偿或者休养阶段含义下的“功能性的”或者“加速的”减速（例如高级经理人在寺庙的宁静中进行四个星期的冥想），后者是服务于进一步加快速度的目的的（例如，以改善革新能力的方式）；另一种形式是“意识形态的”减速运动，它往往具有原教旨主义的或者反对现代化的特征，并且在更好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名义下实现 464
真正的社会的放缓，或者说加速过程的停止。这种加速观念甚至可能成为 21 世纪的主流的反意识形态。

在“经典现代”的机制性的静止和社会基础的框架条件的保持现状，同样也属于功能性的减速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大量的机制，诸如法律、政治的控制机制、稳定的工业化的工作（时间）管理或者“生命历程管理”，以及与之相连的行为导向在很长时间里不发生变化，从而形成期望的确定性、计划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加速才可能在很多领域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以上这些都是经济、技术、科学和政治—设计的加速沿着稳固的“发展轨道”前进的基础条件。在这里所产生的问题是，通过在晚期现代的似乎是“没有界限的”社会加速对各种机制的侵蚀，是否

不会削弱这些前提条件。

(5) 最后,我将结构上的和文化方面的凝固趋势的现象定义为放缓力量的第五个类别,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原则,而是表现为社会加速的矛盾的反面。它是在社会状态和事件的快速变化的表面感觉没有事件发生和静止状态的体验的基础,这种体验作为现代化的第二个基本体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新时代的动态化感觉,而且往往恰恰是在剧烈的加速阵发中,在个体层面体现为"倦怠"或者"存在上的无聊"的形式,在集体层面则是出现在文化的结晶化或者历史的终结的诊断中,无论如何在各种情况下都反映了重新回到永远都是相同的这种感觉。

由于最后一种放缓的形式与现代的加速过程并不是方向相对的,而似乎是加速过程中从根本上来说所固有的,因而,当其他的四种减速类型(即便在它们甚至都没有表现为对加速有用的地方)可以被理解为残
465 留的或者反应性的的时候,第五种类别却既不是可以加速的过程,也不是对之前的社会加速的反馈过程,因而这项研究的主体假设就是,只有当能够证明不存在与社会加速相对立的相应的放缓趋势的时候,那么才能说明社会加速不是现代的基本趋势。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体现了在运动的力量和停滞的力量之间的平衡上正没有休止地向着前者的方向推移,因而这一点也要为在现代"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这个错误主张的能够拥有相当的可信性这个事实负责。

在完成了这样的确认之后,就结束了对在这里所介绍的加速理论的分类的基础的阐述。而后,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则通过将社会加速的现象分为三个主要的维度,从而致力于分析社会加速的具体的作用形式和实证上的表现方式。因而,我在对技术加速领域的论述中尝试指出,技术加速的影响主要产生于社会的空间—时间—制度的阵发性的变化:运输、通讯和生产的加速不仅改变了空间体验——空间的确缩小了,并且相对于时间来说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和空间时间的使用模式、运动模式和殖民模式的方式,而且也同样改变了社会关系、实践形式和行为导向的性质和数量。简言之:技术加速一直隐藏着改变客体的、社会的和在它们之中的主体的世界的趋势,因为它潜在地改变着我们与事物(与环境的物质结构)、与其他人、与空间和与时间的关系,并且因此也改变了我们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从而变化了我们的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类型和方式。[1] 增长与加速的密切联系意味着,与单个的地方、人或事物的具

[1] 请参考第四章,图 4-2。

体的联系在趋势上的松动，正是不断提高的交换速度和变化速度的结果。 466

速度在数量上的提高向质量上的提高的转变对时间体验所产生的影响，正是对加速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后果的分析结果。在代际更替和基本的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变化过程之间，时间关系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后者的实施的时间高于作为同时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三代人或者至多四代人之间的完全交换的时间段，那么在人们的历史经验和人生经验中，经验空间和期望地平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人们对未来的期望来自于从过去中所认识到的。但是，当社会变化的速度超越了关键的门槛，也就是朝着几乎是“代际的”变化速度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两条时间地平线就分开了，无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历史都被时间化了，这意味着（正如在现代性中所产生的，在稳定性的条件下）在有方向的变化的含义中经历人生和历史。正如已经阐明了的，与这样的变化速度相对应的是，对于稳固的个人身份的设计和可规划的政治的形式的设计，都可以通过在进步的和保守的之间的方向指标来加以理解。

下一个关键的门槛是在社会变化的速度到达了代内的水平这个地方被跨越的。我在这里将家庭关系和职业关系作为指标，这些关系按照晚期现代的发展趋势不再在整个一生中都保持稳定了，而是形成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即在那里人生伴侣不知不觉地被人生阶段伴侣所代替，并且在形成身份定位的职业的位置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工作。而且这种普遍存在的动态性也出现在并非中心的以及边缘的生活领域中：政治方向、汽车品牌、医疗保险和银行、电话号码和日报毫无疑问都同样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而当它们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反而会被怀疑为是一种偶然。如同我在这本书的第四部分所指出的，这导致时间体验的形式的变化，并且因此形成了新的个人身份确定的形式和政治方面的 467
自我关系的新形式，这些都用流动和液态等隐喻加以表达；并且在这当中，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机制遭到侵蚀，因而沿着预先设定的轨道向前发展的体验，就逐渐转变为对伴随着快速的、不可预知的变化速度的不确定的情境的感知。代内的变化速度因而不可避免地向在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整合中的时间方面特有的负荷能力提出了问题：不断增大的代与代之间的鸿沟，在对生活世界和日常实践指导中、在用于代际交换、用于向下传递的文化知识以及用于保持代际团结的经验的不断失效中，所产生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进行详细的研究。不断推进的现在的萎缩因而意味着，在不同代际的人的生活世界中不是出现了一条，而是

增加到了两条甚至更多条将他们的生活分裂开来的年龄断错线,因此,同时生活在一起的不同代际的人们似乎体现了同时代的不同性的症候。

但是,在对加速的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的讨论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判断应该是,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组织而言的快速的变化速率都产生了不断增加的适应压力,它体现为这种广泛流行的感觉,即似乎站在到处都是不仅陡峭的而且甚至是"滑溜溜的斜坡"或者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为了保持自己的位置、为了不失去机会和连接的可能性以及为了满足同步化的要求,就必须往往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跟上环境的变化,在静止的或者暂时离开的阶段之后通过提高了的追赶速度而重新投入竞争。由于行为条件和选择条件本身也产生着多个维度的、持续的变化,因而不再有安宁的位置——在那里发现选择和连接都进入"休养"当中。根据观察者的判断,现代社会的高度的"动力性的能量"或者说声名狼藉的躁动不安似乎到处可见,而它们的根源在于滑动的斜坡这
468 种基本的心理状态。因而,当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将"真实的社会"确定为"没有出于自愿运用过各种可能性,相反却在它们的束缚下冲向外星球"[2],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

生活速度的加速从客体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每个单位时间的行为事件的数量的增加,这首先可以通过直接的加速来实现,正如快餐、快速约会或开车经过的葬礼所表现出来的;其次,可以通过缩短事件之间的中间间歇或空转时间来加速;最后,可以通过以多任务执行的方式压缩事件,也就是说同时开展多个行为以实现速度的加快。它们同时也逐渐带来了行为链的碎片化,因而行为者完全专注于一个事物的时间期限变得越来越短,从另一方面来看,长期以来都是可实现的、可支配的技术的和社会的前提条件也对这样的现象有着重要的贡献。

当时间使用研究从实证角度对这些变化作出了基本的理解的时候,对在这方面的目前已有的数据的分析却非常令人失望地证明,由于相关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调查,特别是纵贯研究,完全偏执地记录了在致力于时间资源的特定的行为方式中的变动(例如关于对业余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分配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些呈现出来的研究结果也清晰地证明了关于加速的假设,并且自然也分辨了阶层特有的显著的差异。更有说服力的是,证据出现在主体的不断增强的时间资源的紧缺的体验方面,这种体验似乎与生活节奏的加快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

---

〔2〕 Adorno,1980 年,第 177 页。

中（尽管可能要去掉日本），居民都抱怨非常大的而且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不断增加的压力和时间贫乏，并且担心不再能够跟得上时代。担心错过和被迫适应是产生这种紧张感觉的两个原因，它们也表现出同样深远 469
的影响，尽管我所发现的证据表明，由于“变得陡峭的滑坡”或者说越来越激烈的滑溜溜的斜坡的症状，使得被迫适应的压力开始超过了担心错过的压力。

在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联系起来的有关主体的时间体验和社会哲学方面的思考中，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开发的那样，我尝试着论证这个论点，即每个时间单位中的体验事件的增多，可能非常剧烈地改变了文化方面的时间感觉和时间处理模式：根据在“电视悖论”这个概念下所总结的判断，这个时代的诸如看电视和玩计算机游戏这样的活动形式，都产生了新形式的而且主体矛盾的短暂—短暂时间感觉模式（也就是说，快速流逝的体验时间和快速消失的记忆痕迹）；因此这也支持了这样的怀疑，即作为晚期现代的特征的去背景化、不断变化、没有关联的但是极富刺激的一个个体验的快速出现阻碍了将体验变成本雅明所说的真正的经验。体验一直是片段式的，它们不再能够相互联系起来，也不再能够与历史或者自身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因而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在两个终点上”狂奔：当在被感觉为是娱乐消遣的（而且往往也是充满紧张的）行为中时间非常快地消逝的时候，同时在回顾时，时间也显得是“缩短”了的，因为几乎没有留下记忆的痕迹（本雅明的观点是，我们借助着照片和纪念品想起过去的片段），因而一方面，一天一天和一年一年“都像乘上了飞机一样”匆匆离去，而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正如实证显示的那样）在回忆时却感觉到，时间的确是从我们的手中溜走的。因而这些思考的结论就是，以短暂—短暂模式为特征的社会被证明既是体验丰富的，也是经验贫乏的社会。

在这项研究的第三部分，我分析关于现代典型的提高逻辑的驱动引擎和现代特有的增长与加速之间的联系的模式的问题。这项研究所要证明的猜想是，社会加速是现代性中独一无二的构成结构和影响文化的 470
基本趋势，这首先蕴含着，社会的加速不能被简化为现代化的其他的基本过程，诸如合理化、分化或者经济化等。而且，事实上这项分析也得出，社会加速是一个自我驱动的过程，而完全不再直接指向外在的驱动引擎。加速过程在三个相互融合的维度中发挥作用，并且产生了几乎不能中断的“反馈循环”：由于技术加速的过程持续不断地推动着空间—时间—制度的形成，并且凭借它变换了主体的社会的、事物的和自我的

关系,它也推动了不言而喻且可独立分解的社会变化的过程。例如,汽车的普及或因特网的建立对在空间中的社会的运动形式和交易形式、对通讯结构、对职业实践、日常行为和休闲活动,甚至也对连接结构的类型和身份确定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技术的革新因此是社会变革的强有力的发条。

因此,一方面这为个体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和机会,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被迫适应和必须跟上变化的脚步的压力;简言之,滑溜溜的斜坡症状变得更加尖锐了,主体处于压力之下和时间贫乏之中。但是,不再能跟得上变化的脚步和因而失去连接的可能性的危险,却直接产生了加快生活节奏、似乎保持奔跑的状态的压力。加速的社会变化因而从它的角度来看是生活节奏加快的强有力的发条,而且只有在这条"弯路"上才能形成在技术加速和个体加速的并不矛盾的相互联系:广泛流行的而且鉴于这里所论述的技术加速和时间资源的节省之间的关系而出现的看上去不合逻辑的成见,认为技术的特别是科技的加速要为我们的时间
471 紧张"负责",在这里找到了对这种成见的间接的证明。

之后,在第七章所展现的加速的循环,最终在个体和组织随着社会变化的速度的加快、通过要求及时的加速而对他们的时间资源的短缺作出反应的地方,得以完成:由于对于个体和组织而言,时间是紧张的,因而他们要求更快的运输连接和计算机、要求更短的服务时间和等候时间,等等。正如我所阐明的,需求技术加速的可能性是针对紧缺的时间资源这个难题的合理的回答策略;但是,在加速的循环的过程中,这个策略也导致同样的问题出现意料之外的加剧,并且推动加速的过程没有休止地向前。因而,在现代的社会,加速变成了一个自我驱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一个似乎是循环的形式中放置了三个形成了相互提升关系的加速领域,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或社会的干涉几乎不再能够打破这样的循环。

往往加剧了时间短缺的提升逻辑和加速逻辑的根本性的连接,在很多领域里表现为一个类指数级的(在选项、生产和变化方面的)数量增长与一个"只是"线性的处理速度加速相对立,而这其中的根源产生于三个新时代的其他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似乎作为"外部的",也就是说逻辑上独立的"引擎"额外地驱动着加速循环。它们涉及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经济引擎、以获得并且完全利用作为竞争优势的时间优势的为基础的操作原则以及概念分化的结构方面的引擎,这些引擎通过复杂性的外部化和时间化,而导致了在所有分化的子系统出现了生产速度和处理

速度的加快；而在现代的伦理道德的文化上的引擎那里，加速似乎变成了平衡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的永远的替代物和策略。在每一个引擎中，增长和加速都以特殊的方式相互驱动着。

目前，生产量的提高和生产过程的加速两个要素汇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常数，它在资本主义 472
经济体系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发展形式中一直得以贯彻，而且因此（在众多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保证了资本主义的核心。通过资本变现的逻辑，加速似乎变成了嵌入在现代社会的物质结构中的实质性的强迫，它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的发展和变化，例如从早期资本主义到福特主义，以及最终的弹性的累积。时间在资本主义中成为金钱，因而加速直接带来利润。由于在生产领域的增长和加速一定不可避免地也在流通速度和消费速度中得以体现，因此经济引擎的动力力量也几乎辐射到所有的社会领域中；但是，经济引擎首先还是应该被理解为主要是推动技术加速的首要的驱动源泉。

如果人们接受卢曼和系统理论的其他支持者所提出的思想，就会理解功能分化原则通常伴随着复杂性的增加和时间化一同出现，也就是不是所有的决定在同一时刻作出，而是有大量的决策被推移到了未来去定夺，因而开放的和可实现的选项的数量增加了，这是导致社会加速的原因；而且首先，由于由此而来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往往将继续增加，其次，由于时间化的系统只允许动态的稳定（也就是说，它要求选项序列的闭合），因此第一眼看上去，似乎经济的引擎并不是加速的独立的根源，而它只是普遍的提升原则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的表现。但是，当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首先资本主义经济是能够独立于功能分化而进行分析的，并且是从功能分化中分离的（反之也是如此）；其次，表现为生产所持续的期限的形式的时间，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与在科学或艺术中不同的角色：一件艺术作品或一个科学事实，是永远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说由于它们的漫长的制造时间，而失去它们在艺术上或者科学上的价值的（当然它们会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的或者科学的典范的变化 473
而变得没有价值，而这是以引入时间之外的维度为条件的）；但是，对于生产者而言，一件商品却会随着它的生产期限的增长而不断地丧失它的经济方面的价值。资本主义和功能分化因而表现为两个逻辑上和分析上独立的加速引擎，尽管它们在实证方面和历史中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这个结构清晰的引擎在“现在的萎缩”的含义下，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变化的加速的主要驱动源泉。它特别通过不可避

免的时间结构方面的耦合和不同的系统的同步化要求发挥了它的加速的作用。

在功能分化的影响中出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即通过处理由提升的结果所带来的问题往往进一步导致了指数级的提升,这也重叠体现在对文化方面的引擎的分析中。正如已经阐明的,加速是对有限的生命时间,或者说在世俗化的文化中的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的瓦解所作出的一个容易理解的回应策略,这个策略意味着最大化地尽情享受世界中所提供的选择和完美地开发自身的设施以及实现与之相关的充实的人生的理想,这些都是成功的人生的典范。如果能够双倍快速地生活,就能够实现双倍多的世界上所提供的可能性,并且因此似乎在一个人生中进行着两个生活;如果有人能够无限地快速,那么他的寿命就接近于世界时间或者世界上的选择性的无限的地平线了,因而这个人就能够在一个单独的世俗的人生中实现大量的生命中的可能性,并且因此就不再需要担心作为选择的终结者的死亡了。作为使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趋于一致的策略的加速成了尘世的永恒的替代物、宗教上对永恒的生命的想象的功能上的等价物,并且也成为对死亡所作出的现代的回应。加速的预言的这些文化上的要素,显现出作为生活节奏加快的首要的外在驱动源泉
474 的原型,正因为如此,生活节奏的加快不能只看做是系统的或者结构化的迫力所带来的结果。

但是,提高对世界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充分利用度"的策略,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加速循环的功能机制中失败了,因为使得加速地尽情享受世界上所提供的可能性成为可能的以及因此增加在一生中被实现的选择的同样的发明和方法,也增加了可以实现的选择的数量和种类,而且是以指数级数的方式,因而充分利用的程度,即实现的与可以实现的世界中的可能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持续下降的;与此同时,加速螺旋却持续不断地向前推动。这就是在技术加速的同时、又出现时间资源紧张的这个矛盾现象的文化的侧面;它完全表现为数学上的唯一性,因而加速至少不应该是解决或者弱化"错过的难题"的长期的策略。

但是,如果没有将新时代的民族国家和它的军事机构纳入观察的话,那么对运行中的现代的加速策略的分析就将一直是不全面的。正如在第九章的分析中所体现出来的,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军事上的围绕着对国家领地的占领、控制和防御而展开的竞争中,也同样存在着加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民主国家的加速程序,它是在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所建立的系统中,完全被相互竞争的民

族国家在政治上的对权力的积累和保持的追求所驱动的。

因此，民族国家和军队都发挥着现代的机构上的“关键加速器”的作用，它们承担着形成和巩固加速动力的必不可少的“接生的”功能。但是，正如进一步所指出的，以民族国家和军队为中心的“经典现代”的社会制度的总体，随着加速力量和制度化的框架条件的特有的辩证式的发展，而表现出广泛的而且影响深远的*功能反转*的特性：也就是说从经 475
典现代的*加速器*，例如最显著的是科层官僚制度和福特主义的劳动（时间）管理，变成了晚期现代的*加速障碍*或者*制动器*，通过从内部所引发的动态性力量的释放，而使这些机制处于变化的压力和被侵蚀的压力之下了。[3] 社会加速的能动性在文化方面、结构上的和自身动力的驱动引擎的相互作用中，从这些机制中独立出来了，并且现在转身对抗它们。

这些现象论证了这样的猜想，即经常被假设的但在社会理论中往往充满争议的在经典的现代和晚期现代之间的断层，只有从加速理论所展现的角度出发才能进行精确的分析并且从实证上进行全面的重构。与之相应的是，通过到达关键的速度界限，从而也产生了在现代性当中的根本转变，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也赢得了新的特性，如果没有这些，在现代化原则（加速、分化、合理化、个体化、驯化）的总体中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社会的时间模式正是我在这本书中所努力阐明的，它一方面与结构上的发展和要求，另一方面与文化方面的行为导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同化着它们；社会的时间模式最终也保证了系统要求与个体的以及集体的行为期望和生命预期的兼容。因而，正如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所提出的主导假设，在晚期现代，加速所带来的时间结构的变化，为在个体的和集体的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自我关系的形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的，但是直到1989年前后的数字革命和政治革命中才到达顶峰的晚期现代的加速阵发，其中可以找到社会加速的三个领域中的清晰的指标，一方面侵蚀“经典”现代中的机制上的基础设置，并重新改变着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时间—制度；但是在另一方 476
面又通过这种方式为个体的和集体的时间体验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为个体的身份确定的结构和政治方面的自我关系的结构带来了基本的变化。在这里所提到的第一方面的变化在当代的有关“现在”的词汇表中往往被归入“全球化”的关键词之下。正如我已经指明的，

---

〔3〕 请参照表*9-1*。

在这当中的新来者并不是各种类型的交易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而是这些交易过程的实施的速度。“经典现代的”固定地点的空间,正逐渐变为晚期现代的动态流动的空间,而且线性的和有序的时间秩序被通过“到处存在的同时性”所定义的“永恒的”以及同时也是彻底“时间化的”时间的新形式所代替。

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现代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和与之联系在一起地出现在1770年到1830年之间的“鞍形时间”中的现在的萎缩,导致了在时间体验中出现了清晰可见的根本性的变革,对此我引用了科泽勒克和科利对在政治的维度中的历史的时间化和在身份确定视角下的人生的时间化的描述,因此转向晚期现代的过渡过程可以被定义为历史和人生的去时间化的相反的过程。当在经典现代历史呈现出有方向的、可以从政治方面规划的运动的特点的时候,在晚期现代却贯穿着没有方向的历史性的变化的感觉,这样的变化不再能从政治上主导或者控制了:政治也失去了它的方向指数;“进步”和“保守”的概念也失去了或者相互交换了它们的含义——进步的政治不再具有加快速度的功能,它对政治方面的控制要求的坚持使得它更确切地成了晚期现代的减速器。我在对现代的政治项目的时间结构的分析中发现,由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和政治方面的规划行为之间的不同步,现代的政治项目可能正走向它的终点。晚期现代的政治在持续进行的现在的萎缩的压力下似乎是情境化
477 的,它对所发生的问题作出反应,却不再能够维护进行历史的规划和社会的规划的要求。

由此所产生的“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因而只是反映了以进步的观念为中心的、有方向的、经典现代的时间化的历史的终结,并且过渡进入到在此之前被看做是不同时的历史形式重新变成永远—同时的变异形式的状态当中(君主制度、民主政体、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倒台、殖民化、去殖民化、法治国家、社会福利国家,等等,都不再表明任何历史的特定的发展阶段了)。同样,可以在“时间化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生命时间中的个体体验上看到同样的情况,即有序的时间秩序同样也表现为偶然的: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持续多长时间、以什么样的节奏和按什么样的顺序,都越来越在行为的执行本身当中才被确定下来(这种状况出现在诸如购物、工作等日常事务中,也同样出现在诸如开始接受教育、进入职业生活、生孩子、结婚等“人生大事”当中)。历史的终结的感觉也对应着从稳固的身份和对人生历程管理的机制上的保障以及根据“人生规划”构造生活,向游戏者般开放的、不再能预测的生活的过渡的感觉,个体或

集体的基调都被感觉为游戏般的、漂泊不定的。

晚期现代的情境化的政治通过这种方式在情境化的身份中找到了它的对应物；两者都在具体的行动背景和决策背景中被证明是完全有导向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但是由于现在的萎缩，这两者都将由社会变化的代际内的速度来确定，因而表现为跨情境的随波逐流：所作出的决定不再能够在未来或者在过去展现出道德上的连接作用或辐射力量，由它所导致的事件无论在个体的体验中还是在集体的体验中都是片段式的，它们完全不再能够凝结为“镶嵌”在（人生）历史中的、叙事性的有连接能力的经验。

最初出现在“经典现代”实现了在代际的变化速度的时候的同样的动态化过程，使得有方向的、向前进的运动和个体及集体的发展的体验 478
成为可能，而现在却产生了失去方向的运动并且由此而来的“疾驰的静止状态”的感觉；这样的动态化的过程既摆脱它在有意识的规划中的僵化的维度，又逃离了变化的维度，并且因此抗拒现代性中的自治要求。从加速和运动向凝固和静止的辩证的剧变，构成了我对现代的加速过程的分析的主题，在由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所迫使产生的“后现代的”政治文化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后现代的政治文化放弃了以现代的项目和伦理道德为特征的身份确定要求和自治要求，它的顶峰出现在体现现代性特征的自治的特有的崩溃[4]，也就是说，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在那里什么都没被保留原来的样子，尽管并没有任何事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样的判断在本项研究的第四部分的结尾提出了两个问题，在这里我打算最后以展望的形式处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的可能的发展的，在这当中似乎不再会有惊叹号出现了，也就是说，加速历史的终结的可能的形式，如果已有的分析是准确的话，会是在所有的实质的诚意和随波逐流的不确定背面在晚期现代继续作为常量向前发展。第二个问题涉及加速理论的批判潜力，而这正是我在这里所努力开发的。加速理论的批判潜力是否能为新时代的动态过程的这样或那样的继续发展的可预期性提供规范的标准，它是否能够超越与个体的和集体的自治承诺有关的现代的道德伦理及项目和加速过程的独立化两者之间的不统一性的发现？如果加速理论的批判潜力不能做到这些，那么如同我在第十三章的结尾所暗示的，它相对于诸如系统理论或“后结构主

〔4〕 Jameson，1998 年，第 51 页及其后页。

义”所提出的时间诊断和社会诊断而言似乎是“无法以牙还牙的”,后者将对身份确定要求和自治要求的放弃,作为从古老的欧洲的幻觉中解脱
479 出来的庆祝并且/或者作为从产生束缚的控制要求、连续性苛求和关联的过分要求中的解放加以欢庆。我将首先分析第二个问题。

事实上,我对这项研究给予这样的希望,即通过它将已有的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的轮廓变得清晰可见,它并不是以对*生产关系*(这是更老旧一些的批判理论的着眼点)、*变化关系*(哈贝马斯)或*承认关系*(霍耐特)的批判为目标,它们的规范性标准和实证的定位点看上去都越来越成问题,而是开始对*时间结构*或*时间关系*进行批判性的诊断。[5] 因为这指明了系统命令似乎“在行为者的背后”变成文化的行为导向和生活导向的地方。

正如在这项研究的进展过程中所阐明的,在没有响应的主体的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构建之中,是不可能有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过程的。但是,在个人化的和道德伦理限制较少的自由的西方现代社会中,将功能方面的必要性(例如增长和加速的要求)转化为文化方面的指导方向的能力的机制仍然是难以理解的。[6] 我的论点是,通向它们的关系的路
480 径在现在不是别的,而正是通过对社会的时间结构的研究。

时间社会学较少地怀疑这样的事实,即不仅是时间测量的方式,而且也包括时间感觉的方式,以及它们各自所形成的时间地平线和时间愿景,都听命于与社会结构相关的历史性的变化。尽管如此,时间往往表现为稳固的、客观的事实;从行为的角度来看,时间肯定无疑的是自然的、不容置疑的给定之物;时间的约束力和顺序模式似乎被作为“第二自然”而不加思考但却深深地铭刻在主体的心性和气质结构当中了,并且也借此控制着日常时间和生命时间的指导原则。时间因而往往既是个人的和私密的:“*我打算如何度过我的时间*”这个问题是“*我打算如何生活*”这个伦理问题的时间方面的措辞;同时又完完全全是社会确定

---

〔5〕 有关批判理论的项目向前发展的实证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前提条件,请参考 Honneth,2000 年,第 88 页及其后页。这当中包括跨学科的着眼点、对社会的畸形现象的诊断性确定,这些都应该涉及社会主体的真实的道德方面的经历,以及可以从实证中发现的“*解放的利益*”。从对时间关系的批判的角度来看,这些条件对我而言似乎是可以满足的。尽管无论是霍耐特(同上书,第 88 页)还是 Helmut Dubiel(2001 年)都认为,由诸如阿多诺(Adorno,1993 年,第 42 页)所要求的对社会中根本的“客观的运动法则”的分析,在今天正是由于社会变化的迅速的速度而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了,但在我看来,这些批判性的分析却恰恰更能说明阻碍理论构建,同样也阻碍政治党派的形成的动态化法则和动态化后果。

〔6〕 对于解开这个谜题的尝试请参考 Rosa,1999 年 a。

的：社会时间的节奏、顺序、延续能力和速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地平线和时间愿景都几乎完全脱离了个体的控制。但是，时间同时也不容置疑地展现了高度的规范性的作用，即协调和管理行为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违背了时间规范将会遭受很大的处罚，在今天，对期限和截止日期以及速度命令的忽视更多地会招致被社会排斥。其中的原因在于，时间展现了结构命令和文化方面的导向之间的联系的本质的形式，并且解释了，如何才能够同时满足个体的道德上的自治和最大化的社会行为的协调这两个条件。因而，对有关时间结构的“沉默的规范力量”的解释，就是批判性的加速理论的首要的而且迫切的目标。

但是，由于现在通过最小限制的道德法典——正如它在晚期现代的社会占优势地位一样，产生了对几乎是无限制的个体的自由的幻想，与此同时，又产生了对越来越复杂的而且失去控制的、独立的互动链条的越来越大的协调需求，和满足从中产生的结构性的命令——例如增长迫力和加速迫力——的要求，因而时间结构也就成了产生和分析社会畸形 481
现象，或者说所形成的病态痛苦的享有特权的地方了。我的观点是，道德伦理上和政治方面不可控的加速趋势，不仅开发了不断增长的规范力量，而且也隐藏着产生“加速病态”的不断增大的潜力。

事实上，在这个点上由霍耐特所提出的“对承认关系的批判”和由我想要开展的“对时间关系的批判”相互联系起来了：当社会排斥作为遭受忽视的体验为主体带来痛苦的时候，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持续进行的动态化就产生了被排斥在外的痛苦，因而毫无疑问，在没被（或者还没有被）排斥在外的人那里就会产生恐惧，因而会对主体的行为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绝对的排除在外的存在（例如通过鉴于所属不同的立场因而拒绝某些法律和价值标准的方式）在前现代的体验，在现代会被往往是当前的、带来恐惧的将被排除在外的可能所替代，并表现为“变得依赖的”形式。各种社会承认的形式（也包括法律维度的可能的例外）几乎都处于不断增加的时间条件之下：爱情关系和朋友关系陷入种种偶然性中，成绩必须不停地更新和改善，如果不想失去它的保障社会的重视的功能的话。这就是经常发现的人所皆知的躁动不安和与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的意识形态相反的现代社会的“必须”的修辞法，与主体有关的根本的原因。

在这样的修辞法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潜滋暗长的、未被人所注意的

产生于时间问题[7]的价值体系的结构改造。这种重组一方面产生于,无论是主体还是组织往往忙于"灭火",或者说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也忙于保留未来的选择和连接的可能性,因而在他们的行为的顺序和
482 他们的偏好等级之间的关系被不断地打乱;另一方面,价值体系的重组也是在结构性不确定的条件下,社会对短期性的奖赏的结果,正如我所尝试指出的,认真观察实证证据可以发现,个体的本益比计算是在高度的主观上和客观上的不稳定率和变化率基础上越来越以短期的期望为导向的。因此这又导致,在一个诸如通过娱乐工业生产出大量的的确是"吸引人的"体验可能性的世界里,在最小的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中就能产生即刻的满足,这会导致人们不再会展开只有在长期稳定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结果并且要求可观的时间和精力的前期投入的行为了,尽管这些行为在主体的(实证可测的)体验中能够实现更高的满意度,并且被评判为"很有价值的",而且也的确是这样感觉的。

在定性的时间研究中证明,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却产生了广泛流行的"不再有时间"处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感觉,尽管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资源,这可以在欧顿·冯·霍瓦特(Ödön von Horváth)*的名言"疏离的体验"的意义来表示:"实际上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只是我很少能接近他。"因而我得出结论,加速的社会的时间结构为主体带来的是,"去希望,他们并不希望的",也就是说,遵循自身的行为线路的驱动,而那却不是他们从时间稳定的视角出发所偏好的。这样的时间—批判的规范化的标准只能由主体自己产生。

社会加速的影响方式也从中为新的、似乎是加速理论式的疏离批判提供了一系列的切入点,这在本项研究的很多地方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多个维度的高度不稳定率和变化率改变了主体与他所生活的地点、与围绕在他周围的物质结构(包括他所穿的衣服、劳动所用的工具)、与他所
483 接触的人、与他活动在其中的机构,以及最后与他自己的感觉和信仰的关系。这些变化或者交换得越快,与它们形成发展内心的信任和似乎是"融入"到它们当中去所得到的奖赏就越少。正如我所展现的,主体对于内容越是漠不关心,他就能够更好地适应晚期现代的加速要求和拥有

---

〔7〕 请参考本书的第六章"2"。

* 欧顿·冯·霍瓦特(1901—1938年),德国作家。主要作品有《舞蹈家的书》《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信仰、爱情和希望》等戏剧;《永远的小市民》《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等小说。——译者注

弹性的要求。但是，在与感觉和生活方式，同样也与熟人和朋友、与日用品和劳动用品以及与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的物理环境变得私密和变得可信赖的过程中消失的地方，至少会形成疏离的感觉，尽管保持有关关系、感情和信仰“深度”（能够根据其状况，叙事性地探测其深度）的想法。因而，当后现代文化的辩护者恰恰在为放弃所有的关于“深度”和“本性”的设想而庆祝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有关放弃赋予深度、方向和重要性的要求、经验，可能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证的判断首先表明，这样的放弃会使得在体验事件中的时间体验和人生体验，不再能够转变为经验，因为这些体验不再保留与稳固的未来地平线和可靠的过去的图景的联系，从而使得主体的行为能力和导向能力都难以经得起检验，而且很可能导致抑郁病症和消沉的愤恨的明显的显现。后者似乎主要也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人生时间的和时间历史的前景的碎片化或者说不一致性所导致的。我在第六章和第十一章对支撑这个解释的实证发现已经作出了详细的讨论。疏离的体验特别会产生前面所定义的“疾驰的静止”状态的感觉。

正如现代的加速历史在这期间所展现出来的，关于对速度界限的人类学上的假设，应该格外地小心对待。完全不能排除在外的是，尽管目前只是可以实证证明的“加速的反常现象”所表现出的过渡现象，并不 484
是晚期现代的速度水平本身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晚期现代的速度与“经典现代”的价值导向不能协调一致的原因，并且因此“经典现代”的价值导向可能会又一次长期消失。但是，只要“加速的病态现象”产生了真实的痛苦体验，无论如何都应该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认真对待它。毫无疑问，在对加速的病态现象的诊断中，都将使各种情况中的速度条件所导致的体验丧失相对于自由、活动性和轻易性的获得之间作出仔细的权衡。

对疏离的批判最终也主要保持在个体和集体的自治要求的叙事性基础上——对疏离的体验的诊断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种体验并不是与丧失自我确定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并不再适用于对已证实的非同步化表现的批判性诊断，但是尽管如此这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社会的子系统的差异很大的加速能力导致了社会的潜在的不同步化，并且正如我所指出的，会危及社会的时间结构的耦合模式（以及因此最终危及社会的耦合模式）。同步化问题以更加剧烈的形式不仅出现在社会的功能领域之内，而且也出现在社会的功能领域之间，尤其是在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和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是政治体系（和教育体系）

的发展之间。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的高速度对民主—审议政治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系统性地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而在加速社会中,民主—审议政治只能在高度的社会动态性基础上,甚至向着放缓它的意见形成和决策过程的方向发展。正如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的,这导致社会加速不仅过度使用社会整合,而且也过度磨损文化的再生产能力,尤其是在那些代际间持续的交换速度过快的地方更是危险的。在此期间,不同步的潜在的灾难性的形式事实上体现在这些地方,即在社会的时间模式已经对自然环境的再生产能力和修复能力提出过高要求的地方、在社会加速可能会带来生态灾难的地方。

但是尽管如此,新时代中被打破的自治承诺仍然是有关加速理论的
485 批判性力量的最强有力的基础。以前的现代的项目和道德伦理所启发和赋予灵感的诺言,由于在晚期现代当中的时间结构的改变,既不能兑现它的个体形式,也不能实现它的政治形式了。但是,这些诺言是继续为批判性的时间诊断提供有说服力的标准的观点的规范的基础,因为与之相关联的主体,或者说晚期现代社会的政治上的行动者的道德信仰本身,被用作对他们的行为的评判标准了。为这些项目的离开辩护的人,到目前为止顺着他们的浑厚的声明,认为有证据表明即便在无法实现自治要求的情况下,主体性和政治的真正的后现代的形式也仍然是可以考虑的。他们对加速的肯定,看起来更确切的是对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保持含蓄的通过速度实现自治的提升的猜测论证。

由此,我提出了在这里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历史将如何继续发展,加速的历史将如何结束?历史是否拥有一个似乎是"自然的"重心,在那上面它能够无休止的移动,或者是否可以想象得到在运动和停滞之间有另外一种新的平衡形式?从现在的这项研究的地平线出发,有四种场景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出现的概率完全不同。

第一种可能性事实上产生于建立加速过程的机制性保护和稳定性的新的形式之中,并且借此实现在更高的速度水平上的新的平衡,"经典的现代"的组织能力和导向能力将重新恢复,从而变得迟缓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和民族的福利国家的安排将被动态的设置所代替,之后现代的项目无论在个体形式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与晚期现代的速度和平相处。改革的期望将以在保持自治要求的前提下力争以适应性强的政治措施为目标。改革期望的乐观的态度建立在这样的设想之上,
486 即由于更高的动态性而被扩大的活动空间和行为空间,能够转化为更好的个体的和政治的设计机会,并且因此使得现代的自治承诺完全成为可

以兑现的。个体、文化和政治的行动能够逐渐地适应晚期现代的变化速度，从而甚至可能在新的基因技术和移植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发展出新的感觉和控制形式。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期望是不现实的，因为从中无法看到，那些改革如何把握审慎民主的政治与经济—技术的发展之间的不同步化的问题，并且在凭借现有的手段进行政治控制是非常不可能的情况下，这些改革究竟如何从政治上处理这些问题。尽管对机制安排的修正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对个体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修改，在晚期现代应该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新产生的形式，由于动态化优先权的瓦解机制的特性而不能长期承受得住新的加速力量：根据在这里所阐述的加速力量和制度化的发展条件之间的辩证的发展逻辑，因而可以期望，所产生的“第二现代”将比第一现代的持续时间更短。

第二种可能性则表现为对现代的项目的最终的放弃，从而能够导致真正的“后现代的”主体形式和（诸如在哈特*和内格里**所期盼的“大众”自发的自我组织意义上的）新类型的（次级）政治的产生，它们放弃了自治的主张和控制的要求，并且正因为如此它们能够肯定社会加速的晚期现代的表现形式。与之相伴的是一定会出现新的感觉方式和对速度进行处理的方式以及个体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新的类型。所呈现出来的同步化问题无疑也将继续存在；加速历史的结局将不可预见。

第二种可能性似乎是现代化过程战胜了原本有牢固基础的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项目，因而在反方向的尝试中产生了第三种可能性，它针对独立了的加速力量贯彻设计的要求。正如我在第十二章中所指出的，这似乎是需要“紧急刹车的把手”，从而阻止各种类型的社会速度超越政治的和个体的控制之外。这样的解决方案需要政治方面速度更快的功能系统的发展自治的决定性的干涉，从而实现未来“被迫的再同步化”或是在根据“经典现代”的设想的人类可以适应的范围内的动态化运动的减速的目标。 487

但是，这样的设想是建立在不可预测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基础

---

* 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1960—），美国政治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主要著作有《狄俄尼索斯的苦力：对国家形式的批判》、《帝国》（与安东尼奥·内格里合著）、《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与安东尼奥·内格里合著）等。——译者注

** 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1933—），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叛乱：选民力量和现代国家》、《帝国》（与米歇尔·哈特合著）、《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与米歇尔·哈特合著）等。——译者注

之上的,从而导致这种被迫的再同步化,但是尤其是因为政治在时间中的角色在现代的规划中的危机,而且同样也是由于谁可能是减速政策的政治方面和制度层面的承担者仍然是不清晰的,因而这样的设想是高度不现实的。因而从根本上来看,第三种可能性不仅意味着撤回功能分化,而且也是完全从现代化进程中离开。它的目标是通过停止增长和加速螺旋而保留经典现代的进步思想,并且似乎将时间化的历史的经验空间保存下来,但是这样的目标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进步的观念和与之相关的现代的项目,正如我所尝试论述的,已经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现代的动态化过程的发生;因而两者都被看做是不可停止的。紧急刹车的把手因而只能被看做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极端的、革命式的脱离历
488 史[8]或被理解为反对进步的革命[9],并且因此最终成为产生于现代、或者说同样也是产生于项目或过程本身的"逃脱的飞跃"。[10]

项目对于过程的胜利因而只局限在在逃离行动中的自治的短暂片刻,而且在这当中最终区分了加速历史的第三种结局和第四种结局的可能性:在深谷中的不可抑制的继续前进,在逻辑上表现为对运动和停滞的自治的最终的瓦解以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现代的、作为完全动员的反面的疾驰的静止的幻想的实现,但是从实证上可能在很久以来却是以或者是生态系统的崩溃或者是在不断增强的加速病态和势力向着有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的压力下的现代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的最终解体为特征的。失去平衡运动与停滞的能力可能会导致,现代社会最终要为核反应灾难或气候灾难的产生、快速扩散的新的疾病或政治的垮台的新形式、不受控制的权力的爆发付出代价,特别是在那些被加速过程和增长过程排除在外的大众展开反对加速社会的自卫行动的地方,现代社会将更要为之付出代价。

---

〔8〕"马克思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可能完全不是这样。因为革命可能是旅行中的人类用于紧急制动的把手。"(Benjamin,1974 年 d,第 1232 页)[对《有关历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1974 年 b)的说明],也请参考 1974 年 b,第 703 页,在那里论述了关于"历史的弥赛亚主义的静止"的观点。

〔9〕"进步的概念是以灾难的观念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进步的'进一步的发展'就是灾难……拯救就是保持小步跃向持续的灾难。"(本雅明,1974 年 a,第 683 页,强调部分出自原文;有关对进步的批判请进一步参考 1974 年 b,第 697 页及其后页)

〔10〕我在这里引用了克劳斯·奥弗的理解,他评论道:"通过这样的幻象,显然没有清除和削弱现代的合理化过程(或者说加速过程——本书作者注),也不是对它的阻力的克服,并且没有将向前发展看做评判更好的可能性的标准,而只是一场革命行动,在那里加速过程的动态性完全陷入了静止。"(Offe,1989 年,第 754 页,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在终结性的灾难和彻底的革命之间的选择在此期间几乎还没有结束，因此人们开始阅读或者书写历史。但是，在各种情况下都涉及一个 489
尤其令人焦虑不安的结局。当然，正是在这样的焦虑中，这个时代富有创造性的社会理论可能会意外地发现加速历史的第五种结局。“如果社会学是广泛深入的和前后一致的，那么它就足以不仅是查明决定性的、悲观的或者道德败坏的情况”，皮埃尔·布迪厄在他的确定当代社会学的任务的论文中这样认为。社会学在能够提供“抵抗社会秩序的固有的趋势的”工具之前不能停下来，布迪厄继续指出，“如果有人提出决定论的观点，那么可以想一想，要制造飞机首先必须认识重力，从而才能克服相应的法则”[11]。但是，今天的挑战在于，要去克服那些使得飞机的发明成为可能的法则。这远非一项简单的任务。 490

〔11〕 Bourdieu，1996 年，第 70 页。

图表目录

（注：页码为本书页码）

图 2-1：现代化进程 1 72
图 3-1：表现为在单位时间中的数量增加的加速 80
图 3-2：上升过程中的加速所带来的指数级的增长 80
图 3-3：在技术加速的时代同等数量的行为所需要的时间 81
图 3-4：“空闲时间”和“时间紧张”是增长速率和加速速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所产生的结果 82
图 4-1：通过运输速度的加速而导致的空间的萎缩 118
图 4-2：技术的加速和世界关系的改变 123
图 6-1：时间体验的佯谬 170
图 7-1：加速的循环 181
图 8-1：加速的外在推动力 190
表 9-1：加速和停滞之间的辩证关系：现代社会的加速器成为晚期现代的“制动器” 245
表 10-1：同时化的形式 259
图 12-1：政治的时间的似是而非的情境 309
图 13-1：现代化进程 2a 331
图 13-2：现代化进程 2b 335
表 13-1：从历史的“时间化”到历史的“疾驰的静止状态”：在现代性中时间化和去时间化在加速背景下的辩证关系 340

参考文献

Achmer, Wolfgang/Stefan Kunz/Thomas Walter (1998), *Dimensionen der Zeit. Die Zeitstrukturen Gottes, der Welt und des Menschen*,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Adam, Barbara (1990), *Time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The Multiplicity of Time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Tutzing Time Ecology Project", in: *Time & Society*, Jg. II, S. 87—146.

—(2003), "Comment on, Social Acceleration, by Hartmut Rosa" [Replik auf Rosa 2003], in: *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 Jg. 10, Heft I, S. 49—52.

Adam, Barbara/Karlheinz A. Geißler/Martin Held (1998) (Hg.), *Die Non-stop-Gesellschafi und ibr Preis*, Stuttgart: Hirzel.

Adams, Henry (1999),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hg. mad eingeleitet yon Ira B. Nad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dorno, Theodor W. (1980),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4, hg. von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3), *Einleitung in die Soziologie*, in: ders.,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Abt. IV, Bd. 15, Frankfurtam Main: Suhrkamp.

Adriaansens, Hans P. M. (1980),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Conceptual Di-lemma*, London u. a.: Routlegde.

Agamben, Giorgio (1993), *Infancy and History: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 London: Verso.

Ahlheit, Peter (1988), "Alltagszeit mad Lebenszeit", in: Rainer Zoll (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371—386.

Ahmadi, Amir (2001), "On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youth for experience. Time and

experience in Paul Valery and Walter Benjamin", in: *Time & Society*, Jg. 10, S. 191—212.

Altvater, Elmar (2002), "Kapitalismus—Zur Bestimmung, Abgrenzung mad Dynamik einer geschichtlichen Formation", in: *Erwägen, Wissen, Ethik* (vormals *Ethik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Heft 3/2002, S. 281—292.

Anders, Günther (1987),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d. 2, München: Beck.

Anderson, Walter Truett (1997), *The Future of the Self. Inventing the Post-modern Person*,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

Appadurai, Arjun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Mike Featherstone (Hg.),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Sonderband von *Tb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 a.: Sage, S. 295—310.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m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rmitage, John (2000), "From Modernism to Hypermodernism and Be-yond: An Interview with Paul Virilio", in: John Armitage (Hg.), *Paul Vi-rilio*, London: Sage, S. 25—56.

Assheuer, Thomas (2000), "Rechte Gewalt und Neue Mitre. Die Sehnsucht des Bürgers nach symbolischer Autorität und seine Gedankenflucht vor dem Rechtsradikalismus", in: *DieZeit* 36 vom 31.8.2000, S. 38.

Assmann, Jan (1992),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Beck.

Auer, Frank von/Karlheinz Geißler/Helmut Schauer (1990) (Hg.), *Aufder Suche nach der gewonnenen Zeit. Beiträge für eine neue gesellschaftliche Zeitgestaltung, Mössingen-Talheim: Talheimer.*

Augé, Marc (1994), Orte undNicht-Orte. Vorüberlegungen zu einer Ethno-logie der Einsamkei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Augustinus, Aurelius (1982), *Bekenntnisse*, eingeleitet und übertragen von Wilhelm Timme, München: dtv.

Backhaus, Klaus/Holger Bonus (1998) (Hg.), *Die Beschleunigungsfalle oder der Triumph der Schildkröte*, 3., 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Schäffer/ Pöschel.

Backhaus, Klaus/Kai Gruner (1998), "Epidemie des Zeitwettbewerbs", in: Klaus Backhaus/Holger Bonus (Hg.), *Die Beschleunigungsfalle oder der Triumph der Schildkröte*, 3-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Schäffer/Pö-schel, S. 107-132.

Baier, Lothar (2000), *Keine Zeit*! 18 *Versuche über die Beschleunigung*, München: Kunstmann.

BaUa, Bálint (1978), *Soziologie der Knappheit*,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Barber, Benjamin (1998/99), "Three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and strong democracy", in: *PoliticalScience Quarterly*, Jg. 113, S. 572—587.

Barth, Ariane (1989), "Ira Reißwolf der Geschwindigkeit", in: *Der Spiegel* Nr. 20/1989, S. 200—220.

Baudelaire, Charles (1976), "Exposition universelle, 1855, Beaux-arts", in: ders., *CEuvres complètes*, Bd. 2, hg. yon Claude Pichois, Paris: GaUimard, S. 575—597.

—(1989), *Der Maler des modernen Lebens*, *in*: *ders.*, *Sämtliche Werke in acht Bänden*, Bd. 5, München und Wien: Hanser.

Baudrillard, Jean (1990), *DasJahr2ooofindet nicht statt*, Berlin: Merve.

Bauman, Zygmunt (I995), Life in Fragments, Oxford: Blackwell.

—(1998), "Schwache Staaten. Globalisierung und die Spaltung der Weltgesellschaft", in: Ulrich Beck (Hg.), *Kinder der Freiheit*, 4. 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15—332.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Baur, Jürgen (1989), *Körper-undBewegungskarrieren: DialektischeAnalysen zur Entwicklung von Körper und Bewegung im Kindes-und Jugendalter*, Schorndorf: Hofmann.

Beck, Ulrich (198o0,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7), *Was ist Globalisierung? Irrtümer des Globalismus*, *Antworten auf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9), *Schöne neue Arbeitswelt. Vision: Weltbürger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Beck, Ulrich/Elisabeth Beck-Gernsheim (1994) (Hg.), *Riskante Freiheiten. Individualisierung in modernen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 Stthr-kamp.

Beck, Ulrich/Anthony Giddens/Scott Lash (1996),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Eine Kontrover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Becket, Gary S. (1993), "Zeit und Haushaltsproduktion", in: ders., *Der öko-nomische Ansatz zur Erklärung menschlichen Verhaltens*, 2. Auflage, Tü-bingen: Mohr-Siebeck, S. 97—166.

Behr, Michael (1999), *Perspektiven eines neuen Arbeitstyps. Wandlungstenden-zen im Verhältnis Person-Organisation*, Jena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Heft 9, Institut für Soziologie, Jena.

Behr, Michael/Andrea Kottmann/Tina Seiwert (2002), Schülerbefragung Nordthüringen Sommer 2002. Zukunftsaussiehten, Berufsorientierungen und Abwanderungsmotivationen, *unveröffentlichter Bericht*, *Jena.*

Beniger, James R. (1986),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Mass./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njamin, Walter (1974*a*), "*Zentralpark*",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 hg. von Rolf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655—690.

—(1974b), "Über den Begriffder Geschichte", in: ders., *Gesammelte Sehrif-ten*, Bd. I, hg. von Roll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691—706.

—(I974c), "Charles Baudelaire.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 hg. 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509—690.

—(1974d),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I, Anmerkungen der Herausgeber, hg. 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Das Paris des Second Empire bei Baudelaire",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ien*, Bd. I, hg. 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2. 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509—604.

—(1982), "Der Flaneur",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V, hg. von Rolf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524—569.

Bennis, Warren G./Philip E. Slater (1968), *The 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u. a.: Harper & Row.

Benthaus-Apel, Friederike (1995), *Zwischen Zeitbindung und Zeitautonomie. Eine empirische Analyse der Zeitverwendung und Zeitstruktur der Werk-tags-und Wochenend-freizeit*,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Benz, Ernst (1977), *Akzeleration der Zeit als geschichtliches und heilsgeschicht-liches Problem*, Abhandlungen der geistes-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Klasse der Mainz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Jg. 1977: 2, Wiesbaden: Steiner.

Berger, Johannes (1986) (Hg.), *Die Moderne-Kontinuität und Zäsuren*, *So-ziale Welt*, Sonderband 4, Göttingen: Schwartz.

Bergmann, Werner (I981), *Die Zeitstrukturen sozialer Systeme. Eine system-theoretische Analyse*,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983), "Das Problem der Zeit in der Soziologie. Ein Literaturüberblick zum Stand der 'zeitsoziologischen' Theorie und Forschung", i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Jg. 35, S. 462—504.

Bering, Dietz (2001), "Kulturelles Gedächmis", in: Nicolas Pethes/Jens Ru-chatz (Hg.), *Gedächmis und Erinnerung. Ein interdisziplinäres Lexikon*, Reinbek: Rowohlt, S. 329—332.

Berman, Marshall (1988),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Bertens, Hans/Joseph Natoli (2002) (Hg.),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Oxford: Blackwell.

Bertholt, Norbert (2002), *Deregulierung und Flexibilisierung des Arbeits-marktes in Zeiten der Globalisierung. Gutachten für den deutschen Bundes-tag*, Enquête-Kommission "Globalisierung der Weltwirtschaft" —AU Stud 14/23, Würzburg 2002.

Bilden, Helga (1997) "Das Individuum—ein dynamisches System vielfälti-ger Teil-Selbste. Zur Pluralität in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in: Hei-ner Keupp/Renate Höfer (Hg.), *Identätsarbeit heute: klassische und aktuelle Perspektiven der Identitäts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227—250.

Birkefeld, Richard/Martina Jung (1994), *Die Stadt, der Lärm und das Licht. Die Veränderung des öffentlichen Raumes durch Motorisierung und Elektri-fizierung*, Seelze: Kallmeyer.

Blumenberg, Hans (1986), *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Böll, Heinrich (1963), "Anekdote zur Senkung der Arbeitsmorah", in: ders., *Romane und Erzählungen*, Bd. 4, 1961—1970, 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S. 267—269.

Bonus, Holger (1998), "Die Langsamkeit der Spielregeln", in: Klaus Back-haus/Holger Bonus (Hg.), *Die Beschleunigungsfalle oder der Triumph der Schildkröte*, 3., 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Schäffer/Pöschel, S. 41—56.

Borneman, John (1993), "Time-space compression and the continental di-vide in German subjectivity", in: *New Formations*, Jg. 21, S. 102—118.

Borscheid, Peter (2004), *Das Tempo-Virus.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Be-schleunigung*,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 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örenfried Soziologie. Zur Demokratie gehört eine Forschung, die Ungerechtigkeiten aufdeckt", in: Joachim Fritz-Vannahme (Hg.), *Wozu heute noch Soziologie?*,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S. 65—70.

Bourry, Thomas (2004), "Wie die Zeit im Flug vergeht. Stillstand und Be-schleunigung beim Reisen in Jetgeschwindigkeit", in: Hartmut Rosa (Hg.), *Fast Forward. Essays zu Zeit und Beschleunigung*, Hamburg: Edi-tion Körber-Stiftung, S. 101—114.

Braun, Andreas (2001), *Tempo, Tempo! Eine Kunst-und Kulturgeschichte der Geschwindigkeit im 19. Jahrhundert*, Werkbund-Archiv 28, Frankfurt am Main: Anabas.

Breuer, Stefan (1988), "Der Nihilismus der Geschwindigkeit. Zum Werk Paul

Virilios", in: *Leviathan* 16, S. 309—330.

Brilling, Oskar/Eduard W. Kleber (1999) (Hg.), *Handwörterbuch Umwelt-bildung*, Hohengehren: Schneider.

Brinkmann, Reinhold (2000), "Die Zeit der Eroica", in: Richard Klein/ Eckehard Kiem/Wolfram Ette (Hg.), *Musik in der Zeit—Zeit in der Musik*, Weilerswist: Velbriick, S. 183—211. //

Brose, Hanns-Georg (2002), "Zeit-Kulturen im Umbruch", in: Günter Alt-net u. a. (Hg.), *Jahrbuch Ökologie* 2002, München: Beck, S. 123—136.

Brose, Hanns-Georg/Monika Wohlrab-Sahr/Michael Corsten (1993), *So-ziale Zeit und Biographie. Über die Gestaltung von Alltagszeit und Lebens-ze/t*, Opladen: Westdeutschet Verlag.

Brown, Alyson (1998), "'Doing time': The extended present of the long-term prisoner", in: *Time & Society*, Jg. 7, S. 93—103.

Browning, Douglas/Wilhelm T. Myers (1998) (Hg.), *Philosophers of Proces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Brüsemeister, Thomas (2000), "Das überflüssige Selbst. Zur Dequalifizie-rung des Charakters im neuen Kapitalismus nach Richard Sennett", in: Uwe Schimank/Ute Volkmann (Hg.), *Soziologische Gegenwartsdiagno-sen*,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S. 307—322.

Buchstein, Hubertus (1997), "Bytes that bite: The internet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onstellations*, Jg. 4, S. 248—263.

Burkart, Günter/Beate Fietze/Martin Kohli (I989), *Liebe, Ehe, Elternschaft. Eine qualitativ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Bedeutungswandel von Paarbezic-hungen und seine demographischen Konsequenzen*, hg. vom Bundesinstitut für Bevölkerungsforschung, Wiesbaden.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Bd. I, Oxford: Blackwell.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Bd. 2, Oxford: Blackwell.

—(1998), *End of Millenniu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Bd. 3, Oxford: Blackwell.

Charles, Bryan (2002), "The numbers.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Tho-mas Bellers (Hg.), *Before & After. Stories from New York*, New York: Mr. Bdler's Neighbourhood Books, S. 25—36.

Cherfas, Jeremy/Roger Lewin (1980) (Hg.), *Not Work Alone: A Cross Cultu-ral View of Activities Superfluous to Survival*, Beverly Hills: Sage.

Chesneaux, Jean (2000), "Speed and democracy: an uneasy dialogue", i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Jg. 39, S. 407—420.

Connolly, William (2000), "Speed, concentric cultures, and cosmopolita-nism", in: *PoliticalTheory*, Jg. zS, S. 596—618.

Conrad, Peter (1999), *Modern Times and Modern Places. How Life and Art were Transformed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Innovation and Radical Chang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Corsten, Michael/Hans-Joachim Giegel/Niki Gudulas/Michael Kauppert/ Hartmut Rosa (2005), *Politische Kultur und 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Jena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Heft 15, Institut for Soziologie, Jena [in Vorbereitung].

Coser, Lewis A. (1974), *Greedy Institutions: Patterns of Undivided Commit-m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Coupland, Douglas (1991), *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Creveld, Martin van (1998), *Die Zukunft des Krieges*, München: Gerling Akademie Verlag.

—(1999),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gan, Patrick (2000), "The tendency, the accident and the untimely. Paul Virilio's engagement with the future", in: John Armitage (Hg.), *Paul Vi-rilio. From Modernism to Hypermodernism and Beyond*, London: Sage, S. 161—176.

Cwerner, Saulo B. (2000), "The chronopolitan ideal: time, belonging and globalization", in: *Time & Society*, Jg. 9, S. 331—346.

De Haan, Gerhard (1996), *Die Zeit in der Pädagogik. Vermittlungen zwi-schen der Fülle der Welt und der Kürze des Lebens*, Weinheim/Baseh Beltz.

Denninger, Erhard (1988), "Der Präventionsstaat", in: *KritischeJustiz*, Jg. 21, S. 1—15.

Deutschmann, Christoph (1989), "Der Clan als Unternehmensmodell der Zukunft?", in: *Leviathan*, Jg. 17, S. 85—107.

—(1999), *Die Verheißung des absoluten Reichtums. Zur religiösen Natur des Kapit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Dewey, John (1954), "The eclipse of the public", in: ders.,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S. 138—142.

Dicke, Klaus (1988), "Völkerrechtspolitik und internationale Rechtsset-zung. Grundlagen—Verfahren—Entwicklungstendenzen", in: *Zeit-schrift für Gesetzgebung*, Jg. 3, S. 193—224.

—(2001), *Globales Recht ohne Weltherrschafi. Der Sicherheitsrat der Vereinten Nationen als WeltTGesetzgeber?*, Forum Politicum Jenense Nr. H, Jena.

Dohrn-van Rossum, Gerhard (1988), "Zeit der Kirche—Zeit der Handler—Zeit der Städte", in: Rainer Zoll (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72—88.

Donges, Juergen B. (1992), *Deregulierung am Arbeitsmarkt und Beschäfti-gung*, Tübingen: Mohr-Siebeck.

Döhl, Volker/Nick Kratzer/Manfred Moldaschl/Dieter Sauer (2001), "Die Auflösung des Unternehmens? —Zur Entgrenzung von Kapital und Ar-beit", in: Ulrich Beck/Wolfgang Bonß (Hg.), *Die Modernisierung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219—232.

Dörr-Backes, Felicitas/Ludwig Nieder (1995) (Hg.), *Georg Simmel zwische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Dörre, Klaus (1997), "Unternehmerische Globalstrategien, neue Manage-mentkonzepte und die Zukunft der industriellen Beziehungen", in: Ulf Kadritzke (Hg.), *Unternehmenskulturen unter Druck: Neue Manage-mentkonzepte zwischen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Berlin: Edition Sigma, S. 15—44.

Dubiel, Helmut (2001), *Kritisch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i. Eine einführende Rekonstruktion van den Anfängen im Horkheimer-Kreis bis Habermas*, 3. Auflage, Weinheim/Miinchen: Juventa.

Durkheim, Emile (1981), *Die elementaren Formen des religiösen Lebe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Über sozialeArbeitsteilung. Studie über die Organisation höherer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Dux, Günter (1989), Die Zeit in der Geschichte: ihre Entwicklungslogik vom Mythos zur Weltzeit, *mit kulturvergleichenden Untersuchungen in Brasi-lien (J. Mensing), Indien (G. Dux, K. Kälble und J. Meßmer) und Deutschland (B. Kies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Eberling, Matthias (1996), Beschleunigung und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u. a.: Peter Lang.*

Eder, Klaus (1995), "*D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sozialer Bewegungen. Zur Be-schleunigung von Wandlungsprozessen in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en*", *in: Hans-Peter Müller/Michael Schmied (Hg.)*, Sozialer Wandel. Modellbildung und theoretische An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267—290.

Ehrenberg, Main (1999), La fatigue d'être soi. Dépression et société, Paris: Odile Jacob.

—(2000), "Die Müdigkeit, man selbst zu sein", in: Carl Hegemann (Hg.), *Endstation. Sehnsucht. Kapitalismus und Depression*, Berlin: Alexander-Verlag, S. 103—139.

Elchardus, Mark/Ignace Glorieux (1992), "The search for the invisible 8 hours: The gendered use of time in a society with a high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women", in: *Time & Society*, Jg. 3, S. 5—28.

Eliade, Mircea (1991),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or, Cosmos and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lias, Norbert (1976),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Über die Zeit. Arbeit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II*,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Ende, Michael (1973), *Momo oder die seltsame Geschichte von den Zeit-Die-ben und von dem Kind, das den Menschen die gestohlene Zeit zurück-brachte. Ein Märchen-Roman*, Stuttgart: Thienemann.

Enzensberger, Hans-Magnus (1994), *Aussichten aufden Bürgerkrie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Erhard, Ludwig (1997), *Wohlstand für alle*, Neuausgabe, München: Econ-Verlag.

Eriksen, Thomas Hylland (2001), *Tyranny of the Moment. Fast and Slow Tim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Sterling, Virginia: Pluto Press.

Erlinghagen, Marcel (2002), "Entwicklung der Arbeitsmarktmobilität und Beschäftigungsstabilität im Üergang von der Industrie-zur Dienstleis-tungsgesellschaft", in: *Mitteilungen der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 Jg. 35, S. 74—89.

Evans-Pritchard, Edward E. (1969),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and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vers, Adalbert/Ulrich Rauch/Uta Stitz (2002), *Vonöffentlichen Einrichtun-gen zu sozialen Unternehmen-hybride Organisationsformen im Bereich so-zialer Dienstleistungen*, Berlin: Edition Sigma.

Flaherty, Michael G. (1999), *A Watched Pot. How We Experience Tim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Flaherty, Michael G./Gary Alan Fine (2001),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Conjugating Geotge Herbert Mead's perspective on time", in: *Time & Society*, Jg. 10, S. 147—161.

Fölling-Albers, Maria (1992), *Schulkinder beute—Auswirkungen veränderter Kindbeit auf Unterricbt und Schulleben*, Weinheim/Basel: Beltz Verlag.

Foucault, Michel (1977),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Recht der Souveränität/Mechanismus der Diszipli", in: ders., *Dispositive der Macbt. Über Sexualität, Wissen und Wabrbeit*, Berlin: Merve, S. 75—95.

—(1989), *Der Gebrauch der Lüste. Sexualität und Wabrbeit*, Bd.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Warum ich Macht untersuche: Die Frage des Subjekts" (Nach-wort), in: Hubert L. Dreyfus/Paul Rabinow (Hg.), *Michel Foucault. Jen-seits von Strukturalismus und Hermeneutik*, Weinheim: Beltz Athenäum, S. 243—261.

Foucault, Michel u. a. (1993), *Technologien des Selbst*, hg. von Luther H. Martin u. a.,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Francis-Smythe, Jan/Ivan Robertson (1999), "Time-relat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ime & Society*, Jg. 8, S. 273—292.

Freyermuth, GundolfS. (2000), "Digitales Tempo. Computer und Internet revolutionieren das Zeitempfinden", in: *c't, magazin für computer tech-nik*, Heft 14, S. 74—81.

Friedell, Egon (1976), *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Seele von der schwarzen Pest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München: Beck.

Frisby, David (1988), *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und Benjamin*, Cambridge, Mass.: MIT-Press.

Fuchs-Heinritz, Werner (2000), "Zukunftsorientierungen und Verhältnis zu den Eltern", in: Deutsche Shell (Hg.), *Jugend* 2000, 13. Shell Jugend-studie, Bd. I,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S. 23—92.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Gaines, Donna (1998), *Teenage Wasteland. Suburbia's Dead End Kids*, mit einem neuen Nachwort,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mm Gehrhard (1992), "Das metaphorische Selbst. Über Subjektivität in der modemen Gesellschaft", in: Jutta Georg-Lauer (Hg.), *Postmoderne undPolitik*, Tübingen: edition diskord, S. 79—96.

Garhammer, Manfred (1997), "Teleheimarbeit und Telecommuting. Ein deutsch-amerikanischer Vergleich über kuhurelle Bedingungen und so-ziale Auswirkungen einer neuen Arbeitsform" (unter Mitarbeit von Nor-bert Mundorf), in: *Zeitschrift für Arbeitswissenschaft*, Jg. 51 (4), S. 232—239.

—(1999), *Wie Europäer ihre Zeit nutzen. Zeitstrukturen undZeitkulturen im Zeichen der Globalisierung*, Berlin: Edition Sigma.

—(2001), *Von Jobhoppern und Jobnomaden—Zeitinstitutionen und Unsicher-heit in der spätmodernen Arbeitswelt*, Jena [Ms.].

—(2002), *Changing job careers and work environments in the EU and their ef-fects on time-pressure and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Vortragsmanuskript für die Konferenz über "Time Pressure, Work-Family Interface,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6. Sitzung, Freitag, 23.3.2002, Toronto.

Gehlen, Arnold (1978), *Einblick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6), *Der Mensch. Seine Natur und seine Stellung in der Welt*, 13. Auflage, Wiesbaden: Aula-Verlag.

—(1994), "Über kulturelle Kristallisation", in: Wolfgang Welsch (Hg.), *Wege aus der Moderne. Schlüsseltexte der Postmoderne-Diskussion*, 2. Auf-lage, Berlin: Akademie, S. 133—143.

Geißler, Karlheinz (1999), *Vom Tempo der Welt. Am Ende der Uhrzeit*, Frei-burg: Herder.

Georg-Lauer, Jutta (1992) (Hg.), *Postmoderne und Politik*, Tübingen: edi-tion diskord.

Gergen, Kenneth (2000),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Gershuny, Jonathan (1990), "The Multinational Longitudinal Time Budget Data Archive", in: *European Foundation fb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Dublin: Foundation.

—(2003), *Changing Times. Work and Leisur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1972 ff.),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8 Bde., h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und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Giddens, Anthony (1986),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a), "Tim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der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 140—165.

—(1987b),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 Auf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b), *Konsequenze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6), *Kritische Theorie der Spätmoderne*, Passagen Heft 5, Wien: Passa-gen.

—(1999), *A Runaway World*, London: Profile.

Giegel, Hans-Joachim (1999), "Strukturveränderungen und Problement-wicldungen in der Demokratie", in: Dirk Berg-Schlosser/Hans-Joachim Giegel (Hg.), *Perspektiven der Demokratie. Probleme und Chancen im Zeitalter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lOO—133.

Giegel, Hans-Joachim/Rosa, Hartmut (2000), "Politische Kultur und 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in: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en nach dem Systemumbruch.*

Diskontinuität, Tradition und Strukturbildung (Pro-jektantrag zum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1811/580 der DFG in Jena/ Halle), Jena, S. 485—521.

Giegel, Hans-Joachim/Hartmut Rosa/Jana Heinz (2001), *Zivilgesellschaft und Lehrstellenkrise in Ostdeutschland.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Bedin-gungen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 angesichts funktionaler Defizite*, Je-na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Heft 8, Institut für Soziologie, Jena.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lass, James M. (1993), *Shattered Selves. Multiple Personal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leick, James (1999), *Faster. The Acceleration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lennie, Paul/Nigel Thrift (I996), "Reworking E. P. Thomspon's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Time & Society*, Jg. 5, S. 275—300.

Glotz, Peter (1998), "Kritik der Entschleunigung", in: Klaus Backhaus/Hol-ger Bonus (Hg.), *Die Beschleunigungsfalle oder der Triumph der Schild-kröte*, 3., 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Schäffer/Pöschel, S. 75—89.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825), Briefe, Frankfurter Ausgabe II, Bd. IO,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93a),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Ein Roman*, in: ders., *Werke in sechs Bänden*, Bd. 3, Frankfurt am Main/Leipzig: Insel, S. 343—565.

—(1993b), *Faust. Eine Tragödie*, erster Teil, in: ders., *Werke in sechs Bänden*, Bd. 3, Frankfurt am Main/Leipzig: Insel, S. 5—135.

Gronemeyer, Marianne (1996), *Das Leben als letzte Gelegenheit. Sicherheitsbedürfnisse und Zeitknappheit*, 2. Auflag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Großklaus, Götz (1997), *Medien-Zeit, Medien-Raum. Zum Wandel der raumzeitlichen Wahrnehmung in der Moderne*, 2. 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Gross, Peter (1994), *Die Multioptions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Grotheer, Michael/Olaf Struck (2003), *Beschäftigungsstabilität: Entwick-lung und Arbeitszufriedenheit. Ergebnisse aus der IAB-Beschäftigtenstich-probe* 1975—1997 *und der BIBB/IAB-Erhebung*, Institut für Soziologie, Univer-sität Jena (unveröffentlicht).

Guggenberger, Bernd/Claus Offe (1984), *An den Grenzen der Mehrheitsde-mokrati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Günther, Klaus (2001), "Rechtspluralismus und universaler Code der Lega-lität: Globalisierung als rechtstheoretisches Problem", in: Lutz Win-gert/Klaus Giinther (Hg.), *Die Öffentlichkeit der Vernunft und die Ver-nunfi der Öffentlichkeit*, Festschrift für

Jürgen Haberma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539—567.

Gurvitch, Georges (1963),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time", in: Edward A. Tiryakian (Hg.), *Sociological Theory, Values, and Sociocul-rural Change*, Glencoe: The Free Press, S. 171—185.

Guy, Jean-Sebastien (2002), *The acceleration of time from Luhmann's theore-ticalp-erspective*, Vortragsmanuskript für Sitzung 3 ("Temporal Structures and the Concept ofAcceleration") der Forschungsgruppe 35 aufdem XV. Weltkongress der Soziologie (ISA) in Brisbane vom 7.-13.7.2002, Mon-treal.

Habermas, Jürgen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Die Krise des Wohlfahrtsstaates und die Erschöpfung utopischer Energien", in: ders.,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V,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141—163.

—(1988),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Zwölf Vorlesung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Faktizität und Gehung.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4. 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1), *Die Zukunfi der menschlichen Natur. Aufdem Wegzur liberalen Eu-gene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Habermas, Tilmann (1999), *Geliebte Objekte. Symbole und Instrumente der Identitätsbild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Hagmann, Peter (z003), "Beethoven—von heute? Eine neue Gesamtauf-nahme der Symphonien",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vom 19.3.2003, 3, S. 10.

Hall, Peter (1988),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ong Waves", in: Michael Young/Tom Schuller (Hg.), *The Rhythms of Socie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S. 37—52.

Hardt, Michael/Antonio Negri (2001), *Empire*, Cambridge, Mass./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ss./Oxford: Blackwell.

—(1999),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0a),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b),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n: ders.,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S. 53—72.

Heidegger, Martin (19Z7),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Verlag.

—(1995), *Der Begriff der Zeit*, Vortrag vor der Marburger Theologenschaft Juli 1924, hg. und mit einem Nachwort versehen von Hartmut Tietjen, 2. Auflage,

Tübingen: Niemeyer Verlag.

Heine, Heinrich (I974), "Lutetia", in: ders., *Sämtliche Schrifien*, Bd. 5; hg. von Klaus Briegleb und Karl-Heinz Stahl, München: Hanser, S. 217—548.

Heintel, Peter (1999), *Innehalten. Gegen die Beschleunigung—für eine andere Zeitkultur*, Freiburg: Herder.

Heintel, Peter/Thomas Macho (1985), *Zeit und Arbeit. Hundert Jahre nach Marx*, Wien: Verlag des Verbandes der wissenschaftlichen Gesellschaften Österreichs.

Heinze, Rolf G./Thomas Olk (1999), "Vom Ehrenamt zum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 Trends des begrifflichen und geseUschaftlichen Strukturwandels", in: Ernst Kistler/Heinz-Herbert Noll/Eckhard Priller (Hg.), *Perspektiven gesellschafilichen Zusammenhalts*, Berlin: Edition Sigma, S. 77-100.

Held, Davi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Jonathan Perraton (t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elsper, Werner (1997), "Das, postmoderne Selbst' —ein neuer Subjekt-und Jugend-Mythos?", in: Heiner Keupp/Renate Höfer (Hg.), *Identi-tätsarbeit heute: klassische und aktuelle Perspektiven der Identitäts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174—216.

Hennis, *Wilhelm* (2000), Regieren im modernen Staat. Politikwissenschafili-che-Abhandlungen, *Bd. I*, *Tübingen: Mohr-Siebeck.*

Henrich, *Dieter* (2001), Versuch über Kunst und Leben. Subjektivität—Welt-verstehen—Kunst, *München/Wien: Hanser.*

Heylighen, *Francis* (2001), "*Technological Acceleration*", *in: http:// pespmcl. vub. ac. be/TECACCEL. html.*

Hildenbrand, *Bruno* (2001), Zum Verhätnis von Tradition und Wandel in Paarbeziehungen, *Vortrag zum* 6. *Symposium des Arbeitskreises "Zwejte Moderne"*, *Freundeskreis Weimar* 1999 *am* 20. 5. 2001, *Weimar* [*Ms.*].

Hochschild, *Arlie Russel* (2000),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Hörning, *Karl H. /Danieta Ahrens/Anette Gerhard* (1997), Zeitpraktiken. Experimentierfelder der Spä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9), "*Do technologies have time? New practices of tim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 *Time & Society*, Jg. 8, S. 293—308.

Hoffmann, Edeltraut/Ultich Walwei (1998), "Normalarbeitsverhältnis: ein Auslaufmoddl? Überlegungen zu einem Erklärungsmodell für den Wan-del der Beschäftigungsformen", in: *Mitteilungen der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 Jg. 31, S. 409—425.

Hofmann, Wilhelm (2004), "Zusammenprall der Zeitkulturen. Lebens-tempo und

Zeitempfinden in Ost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in: Hartmut Rosa (Hg.), Fast Forward. Essays zu Zeit und Beschleunigung, Hamburg: Edition K6rber-Stiftung, S. 57—72.

Holz, Erlend (2000), *Zeitverwendung in Deutschland: Berufi Famile, Frei-zeit*, Schriftenreihe "Spektrum Bundesstatistik", Bd. 13, Wiesbaden: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onneth, Axel (1994a), "Pathologien des Sozialen. Tradition und Aktualität der Sozialphilosophie", in: ders. (Hg.), *Pathologien des Sozialen. Die Auf-gaben der Sozial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S. 9—69.

—(1994b), *Desintegration. Bruchstücke einer soziologischen Zeitdiagnos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9), "Kommunikative Erschließung der Vergangenheit. Zum Zu-sammenhang von Anthropologie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bei Walter Benjamin", in: ders., *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 Sozial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2. Auflage, erweiterte Neu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93—113.

—(2000), "Die soziale Dynamik von Mißachtung. Zur Ortsbestimmung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in: ders., *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88—109.

—(2003), *Organisierte Selbstverwirklichung. Paradoxien der Individualisie-rung*, [Ms.].

Horkheimer, Max/Theodor W. Adorno (1947),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Querido.

Howard, A. E. Dick (1990), *The Roadto Constitutionalism*, Sonderdruck der Konferenz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Making in Central Europe, Budapest.

Hufton, Olwen/Yota Kravaritou (1996), "Gender and the use of time", in: *Time & Society*, Jg. 5, S. 339—398.

Imhof, Arthur E. (1984), "Von der sicheren zur unsicheren Lebenszeit. Ein folgenschwerer Wandel im Verlaufe der Neuzeit", in: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Jg. 71, S. 175—198.

Jahoda, Marie (1988), "‚Time: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 Mi-chael Young/Tom Schuller (Hg.), The Rhythms of Socie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S. 154—172.

Jahoda, Marie/P. E. Lazarsfeld/H. Zeisel (1933), *DieArbeitslosen yon Marienthal, Leipzig: Hirzel.*

James, William (189*O*),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Bd. 1,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Jameson, Fredric (1994), *The Seeds of Time*, New York u. a.: 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

—(1998), *The Cultural Tur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 London/New York: Verso.

Jessop, Bob (2006),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Capital and Global-ization—How they Challenge State Power and Democracy", in: Hart-rout Rosa/William Scheuerman (Hg.), *SocialAcceleration. Conceptions—Causes—Consequences*, London/New York: Verso [im Erscheinen].

Joas, Hans (1992), *Pragmatismus und Gesellschafts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Kreativität und Autonomie. Die soziologische Identitätskonzep-tion und ihre postmoderne Herausforderung", in: Christoph Görg (Hg.), *Gesellschaft im Übergang. Perspektiven kritischer Soziologi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S. 109—119.

Johnson, Allen (1978), "In Search of the Affluent Society", in: *Human Na-ture*, September, S. 50—59.

Jung, Thomas (1989), *Vom Ende der Geschichte. Rekonstruktionen zum Post-histoire in kritischer Absicht*, Münster/New York: Waxmann.

Kaern, Michael/Bernhard S. Philips/Robert S. Cohen (199o) (Hg.), *Georg Sim-mel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Dordrecht: Kluwer.

Kamper, Dietmar/Christoph Wulf (1987) (Hg.), *Die sterbende Zeit. Zwan-zig Di-agnosen*, Darmstadt und Neuwied: Luchterhand.

Kant, Immanuel (1981),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 und* 2, in: ders., *Werk-ausgabe*, Bde. III und IV,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Keane, John (1991),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Kellner, Douglas (1992),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postmod-ern i-dentities", in: Scott Lash/Jonathan Friedman (Hg.), *Modernity and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S. 141—177.

Kemper, Peter (1995), "Weltfernsehen MTV: Ein Clip zielt ins Herz, nicht ins Him",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Magazin*, Heft 823, 49. Woche, 8. 12. 1995, S. 18—24.

Kern, Stephen (1983),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I9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rtész, Imre (2002), *Ich—ein anderer*, 2. Auflage, Reinbek: Rowohlt.

Kessel, Martina (2001), *Langeweile. Zum Umgang mit Zeit und Gefühlen in Deutschland vom späten* 18. *bis zum frühen* 20. *Jahrhundert*, Göttingen: Wallstein.

Keupp, Heiner u. a. (1999), *Identitiütskonstruktionen. Das Patchwork der Identitäten in der Spätmoderne*, Reinbek: Rowohlt.

Kielmansegg, Peter Graf (2003a), "Zukunftsverweigerung", in: FAZ vom 23. 5. 2003, Nr. 119, S. 11.

—(2003b), "Können Demokratien zukunftsverantwortlich handeln?", in: *Merkur* 651, S. 584—594.

Kirchmann, Kay (1998), *Verdichtung, Weltverlust und Zeitdruck. Grundzüge einer Theorie der Interdependenzen von Medien, Zeit und Geschwindigkeit im neuzeitlichen Zivilisationsprozess*,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Klein, Richard/Eckehard Kiem/Wolfram Ette (2000) (Hg.), *Musik in der Zeit. Zeit in der Musik*, Weilerswist: Velbrück.

Kodalle, Klaus-Michael (1999) (Hg.), *Zeit-Verschwendung. Ein Symposion*,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Kohli, Martin (1985), "D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Lebenslaufs. Histori-sche Befunde und theoretische Argumente", in: *Kölner Zeitschrift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Jg. 37, S. 1—29.

—(1986), "Gesellschafiszeit und Lebenszeit. Der Lebenslauf im Struktur-wandel der Moderne", in: Johannes Berger (Hg.), *Die Moderne—Konti-nuitäten und Zäsuren*, Sonderband 4 der Sozialen Welt, Göttingen: Otto Schwartz & Co., S. 183—207.

—(199o), "Lebenslauf und Lebensalter als gesellschaftliche Konstruktionen: Elemente zu einem interkulturellen Vergleich", in: Georg M. Elwert/ Martin Kohli/Harald K. Müller (Hg.), *Im Laufder Zeit. Ethnographische Studien zur gesellschaftlichen Konstruktion von Lebensaltern*, Saarbrücken u. a.: Breitenbach, S. 11—32.

—(1994), "Institutionalisierung und Individualisierung der Erwerbsbiogra-phie", in: Ulrich Beck/Elisabeth Beck-Gernsheim (Hg.), *Riskante Frei-hei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219—244.

Kommission für Zukunftsfragen der Freistaaten Bayern und Sachsen (1996), *Erwerbstätigkeit und Arbeitslosigkeit in Deutschland—Teil* 1: *Ent-wicklung von Erwerbstätigkeit und Arbeitslosigkeit in Deutschland und an-deren frühindustrialisierten Ländern*, Bonn.

—(1997), *Erwerbstätigkeit undArbeitslosigkeit in Deutschland—Teil* 3: *Maß-nahmen zur Verbesserung der Beschäftigungslage*, Bonn.

Koselleck, Reinhart (1989),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Zei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0), *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mit einem Beitrag yon Hans-Georg Gadam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Krappmann, Lothar (1997), "Die Identitätsproblematik nach Erikson aus einer interaktionistischen Sicht", in: Heiner Keupp/Renate Höfer (Hg.), *Identitätsarbeit heute. Klassische und aktuelle Perspektiven der Identitäts-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

mp, S. 66—92.

Kraus, Wolfgang (2000), *Das erzälte Selbst. Die narrative Konstruktion von Identität in der Spätmoderne*, Herbolzheim: Centaurus.

Kraus, Wolfgang (2002), "Falsche Freunde", in: Jürgen Straub/Joachim Renn (Hg.), *Transitorische Identität. Der Prozesscharakter des modernen Selbs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S. 159—186.

Krugman, Herbert E. (1977), "Memory with recall, exposure without per-ception", in: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Jg. 17, S. 7—12.

Kubey, Robert/Mihaly Csikszentmihalyi (1990), *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How Viewing Shapes Everyday Experience*, Hillsdal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Lafargue, Paul (1998), *Das Recht auf Faulheit. Widerlegung des "Rechts auf Arbeit" von* 1848, Grafenau: Trotzdem-Verlag.

Landes, David S.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sh, Scott (1996), "Tradition and the limits of difference", in: Paul Hee-las/Scott Lash/Paul Morris (Hg.), *Detraditionalization: CriticalReflections on Authority and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u. a.: Blackwell, S. 250—274.

Lash, Scott/John 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aslett, Peter (1988), "Social structural time: an attempt at classifying types of social change by their characteristic paces", in: Michael Young/Tom SchuUer (Hg.), *The Rhythms of Socie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S. 17—36.

Lauer, Robert (1981), *Temporal Man. The Meaning and Uses of Social Time*, New York: Praeger.

Leccardi, Carmen (1996), "Rethinking social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Time & Society*, Jg. 5, S. 169—186.

—(2003), "Resisting, Acceleration Society", [Replik auf Rosa 2003], in: *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 Jg. 10, Heft 1, S. 34—41.

Le Goff, Jacques (1977), "Zeit der Kirche und Zeit des Händlers im Mittel-alter", in: Claudia Honegger (Hg.), *Schrift und Materie der 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393—414.

Lepenies, Wolf (1976), *Das Ende der Naturgeschichte. Wandel kultureller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in den Wissenschafien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Hanser.

—(1981), *Melancholie und Gesellschaft*, 2. 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Lestienne, Remy (2000) (Hg.), "Time and Globalization", in: *Time & So-ciety*, Jg. 9, S. 289—346.

Levine, Robert (1999), *Eine Landkarte der Zeit. Wie Kulturen mit Zeit umge-hen*, München: Piper.

Lifton, Robert Jay (1993), *The Protean Self. Human Resilience in an Age of Fragment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Linder, Staffan B. (1970), *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ocke, John (1977), *Zwei Abhandlungen über die Regierung*, hg. und einge-leitet yon Walter Euchn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Löw-Beer, Martin (1991), "Living a life and the problem of existential im-possibility", in: *Inquiry* 34, S. 217—236.

van der Loo, Hans/Willem van Reijen (1997), *Modernisierung. Projekt und Paradox*, 2., aktualisierte Auflage, München: dtv.

van Loon, Joost (2000), "Review article: imminent immanence: the time-politics of speed and the management of decline", in: *Time & Society*, Jg. 9, S. 347—354.

Lübbe, Hermann (1998), "Gegenwartsschrumpfung", in: Klaus Back-haus/Holger Bonus (Hg.), *Die Beschleunigungsfalle oder der Triumph der Schildkröte*, 3., 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Schäffer/Pöschel, S. 129—164.

Luhmann, Niklas (1968), "Die Knappheit der Zeit und die Vordringlichkeit des Befristeten", in: ders., *Politisehe Planung.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von Politik und Verwaltung*, 4. Auflag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4, S. 143—164.

—(1980), "Temporalisierung von Komplexität. Zur Semantik neuzeitlicher Zeitbegriffe", in: *ders.*,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Bd.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235—313.

—(1980—1999), *Gesellschafi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h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4 Bd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0a), "Die Zukunft kann nicht beginnen. Temporalstrukturen der mo-demen Gesellschaft", in: Peter Sloterdijk (Hg.), *Vor derJahrtausend-wende: Berichte zur Lage der Zukunft*, Bd. i,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119—150.

—(1990b), "Gleichzeitigkeit und Synchronisation", in: ders.,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Bd. 5, *Konstruktivistische Perspektiv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S. 95—130.

—(1991), "Weltzeit und Systemgeschichte", in: ders.,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Bd. 2: *Aufsätze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4. Auflage), Opladen: Westdeut-

scher Verlag, S. 103—133.

—(1996), *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6. 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7),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Lutz, Burkhard (1984), *Der kurze Traum immerwährender Prosperitä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86), *Dadpostmoderne Wissen*, Wien: Passagen.

Maclntyre, Alasdair (1987), *Der Verlust der Tugend. Zur moralischen Krise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Mannheim, Karl (1964), "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en", in: ders., *Wis-senssoziologie*, hg. von Kurt H. Wolff, Berlin/Neuwied: Luchterhand, S. 509—565.

Marinetti, Filippo Tomaso (1966), "Gründung und Manifest des Futu-rismus", in: Christa Baumgarth, Die Geschichte des Futurismus, Reinbek: Rowohlt, S. 23—29.

—(1916), "The new religion-morality of speed", in: ders., *Selected Writings*, hg. und übersetzt von R. W. Fli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x I971, S. 94—96.

Marschall, Wolfgang (1997), "Zeitkonflikte in multikultureller Konfronta-tion", in: Peter Rusterholz/Rupert Moser (Hg.), *Zeit. Zeitverstiindnis in Wissenschaft und Lebenswelt*, Bern u. a.: Peter Lang, S. 161—176.

Martin, Bill (1998), *Listening to the Future. The Time of Progressive Rock*, 1968—1978, Chicago/La Salle: Open Court.

Marx, Karl (1951),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 3, Ber-lin: Dietz.

—(1957),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m Zusammenhang ausgewählt und eingeleitet von Benedikt Kautsky, Stuttgart: Kröner.

—(1972),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d. 23, Berlin: Dietz.

—(1983),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d. 42, Berlin: Dietz, S. 15—770.

Marx, Karl/Friedrich Engels (1986),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ies., *Ausgewählte Werke*, Moskau: Progress, S. 34—63.

Marxer, Johanna (2003), *Wegaus Würzburg*, Beitrag zum 4. Deutschen Stu-dienpreis der Körberstiftung Hamburg (unveröffentlichte Kassette ans neun Bänden).

Maurer, Andrea (1992), "Stand und Perspektiven zeit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in: Hansgünter Meyer (Hg.),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und die Transformation großer gesellschaftlicher Systeme*, Berlin: Akademie, S. 590—607.

McLuhan, Marshall (1966),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McNeill, William H. (1982),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rn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Taggart, John/Ellis McTaggart (1993), "Die Irrealität der Zeit", in: Wal-ther Ch. Zimmerli/Mike Sandbothe (Hg.), *Klassiker der rnodernen Zeit-philosophi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S. 67—86.

Mead, George Herbert (1969), *Sozialpsychologie*, hg. von Anselm Strauss, Neuwied: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Mead, Margaret (1970), *Culture and Commit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Gap*,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Michelson, William/David Crouse (2002), *Changing demands on the time-use analysis of family, work, and personal outcomes: implications for trendanaly-sis of time pressure*, www. lifestress. uwaterloo. ca/papers/michelson. pdf.

Mill, John Stuart (1971),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repräsentative Demokratie*, hg. und eingeleitet yon Kurt L. Shell, Paderborn: Schöningh.

Moebius, Stephan (2002), *Simmel lesen. Moderne, dekonstruktive und post-moderne Lektüren der Soziologie Georg Simmels*, Stuttgart: Ibidem.

Moldaschl, Manfred/Dieter Saner (2000), "Internalisierung des Marktes—Zur neuen Dialektik yon Kooperation und Herrschaft", in: Heiner Minssen (Hg.), *Begrenzte Entgrenzungen—Wandlungen von Organisation und Arbeit*, Berlin: Edition Sigma, S. 205—224.

Montesquieu, Charles de (199z), *Vow Geist der Gesetze, übersetzt und hg. von Ernst Forsthoff*, 2. Auflage, Tübingen: Mohr-Siebeck.

Moore, Wilbert E. (1963), *Man, Time, andSociety*, New York/London: John Wiley & Sons.

Moritz, Karl Philipp (1988), *Anton Reiser. EinpsychologischerRoman*, miteinem Nachwort von Max yon Brück, 7. 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Müller, Hans-Peter/Michael Schmid (1995) (Hg.), *Sozialer Wandel. Modell-bildung und theoretische An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Mumford, Lewis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Münkler, Herfried (2002), *Die neuen Kriege*, Reinbek: Rowohlt.

—(2006), *Zeitrhythmen und militärische Gewah. Beschleunigung und Ver-langsamung durch den Krieg und im Kriege* [Ms., erscheint in: Rosa/ Scheuerman 2006].

Musil, Robert (1978),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Roman I, Erstes und Zweites Buch, hg. von AdolfFrisé, Reinbek: Rowohlt.

Myerson, George (2001), *Heidegger, Habermas and the Mobile Phone*, Cambridge: Icon Books.

Nadolny, Sten (1987), *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München: Piper.

Nassehi, Armin (1993), *Die Zeit der 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zu ein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r Zei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0), "Schäger schaffeu ohne Waffen. Die offene Gesellschafi produ-ziert ihre Feinde: Vermutungen über den 'Kampfgegen Nazis'", in: *Die Zeit* 35 vom z4. 8. 2000, S. 36.

Neckel, Sighard (2000), "Identität als Ware. Die Marktwirtschaft im Sozia-letup, in: ders., *Die Macht der Unterscheidung. Essays zur Kultur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S. 37—47.

Negt, Oskar (1988), "Der Kampf um die Arbeitszeit ist ein Kampf um die Lebenszeit", in: Rainer Zoll (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531—543.

Neumann, Enno (1988), "Das Zeitmuster der protestantischen Ethik", in: Rainer Zoll (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160—171.

Niethammer, Lutz (1989), *Posthistoire. Ist die Geschichte zu Ende?*, Reinbek: Rowohlt.

Nietzsche, Friedrich (1986),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Stuttgart: Kröner.

—(1988a),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 und II, in: ders.,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Bd. 2, hg.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München/Berlin/New York: dtv/de Gruyter.

—(1988b),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I-IV", in: ders.,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Bd. 1, hg.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München/Berlin/New York: dtv/de Gruyter, S. 157—510.

—(1988c), "Götzen-Dämmerung 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ert", in: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Bd. 6, hg.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München/Berlin/New York: dtv/deGruyter, S. 55—161.

Nowotny, Helga (1993), *Eigenzeit. Entstehung und Strukturierung eines Zeitgefüh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Time: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Experi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Es ist so. Es könnte auch anders sein. Über das veriinderte Verhältnis von 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Nuber, Ursula (1999), "Stresskrankheit Depression", in: *Psychologie Heute*, Jg. 26, Heft 3, S. 20—25.

Offe, Claus (1986), "Die Utopie der Null-Option. Modernität und Moder-nisierung als politische Gütekriterien", in: Johannes Berger (Hg.), *Die Moderne—Kontinuität*

und Zäsuren, Soziale Welt, Sonderband 4, Göt-tingen u. a.: Otto Schwartz & Co., S. 97—116.

—(1989), "Fessel und Bremse. Moralische und institutionelle Aspekte 'intel-ligenter Selbstbeschränkung'", in: Axel Honneth u. a. (Hg.), *Zwischen-betrachtungen im Prozeß der Aufklärung. Jürgen Habermas zum* 60. *Ge-burtstag*, 2. 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739—774.

Ogren, Kathy J. (1989), *The Jazz Revolution: Twenties America and the Mean-ing of Jaz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paschowski, Horst W. (1995), *Freizeitökonomie: Marketing von Erlebnis-welten*, 2. Auflage,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Osten, Manfred (2003), "Alles veloziferisc", *oder Goethes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2006), "Accelerated Time. A Few Remarks on the Modernity of Goethe", in: Hartmut Rosa/William Scheuerman (Hg.), *SocialAcceleration. Con-ceptions—Causes—Consequences*, London/New York: Verso [ira Erschei-neD].

Parsons, Talcott (1951),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1),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Perrow, Charles (1989), *Normale Katastrophen. Die unvermeidbaren Risiken der Großtechnik*,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Petersen, Jürgen (1991), *Der deutsche Roman der Moderne. Grundlegung—Typolo-gie—Entwicklung*, Stuttgart: Metzler.

Piaget, Jean (1980), *Die Bildung des Zeitbegriffs beim Kinde*, Stuttgart: Klett-Cot-ta.

Piore, Michael J./Charles E Sable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Platt, Norbert A. (1998), "Faszination Beständigkeit", in: Klaus Backhaus/ Holger Bonus (Hg.), *Die Beschleunigungsfalle oder der Triumph der Schildkröte*, 3., 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Schäffer/Pöschel, S. 179—194.

van der Poel, Hugo (1997), "Leisure and the modularization of daily life", in: *Time & Society*, Jg. 6, S. 171—194.

Pöppel, Ernst (1997), *Grenzen des Bewußtseins*, Frankfurt am Main/Leipzig: In-sel.

Postone, Moishe (1996),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Cambrig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iller, Eckhard (1992), "Zeitverwendung in der ehemaligen DDR—Ergeb-nisse von Zeitbudgetuntersuchungen", in: Hansgünter Meyer (Hg.), *So-ziologie in Deutsch-*

land und die Transformation großer gesellschaftlicher Sys-teme, Berlin: Akademie, S. 608—615.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Jg. 6, S. 65—78.

—(1997), "Vorwort" zu: John Robinson/Geoffrey Godbey, *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 2., aktualisierte Auflage 1999,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 XIII—XVI.

Radkau, Joachim (1998), *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 Deutschland zwischen Bismarck und Hitler*, München: Propyläen.

Rammstedt, Otthein (1975), "Alltagsbewußtsein von Zeit", in: *Kölner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Sozialpsychologie*, Jg. 27, S. 47—63.

Reheis, Fritz (1998), *Die Kreativität der Langsamkeit. Neuer Wohlstand durch Entschleunigung*, 2., erweiterte Auflage, Darmstadt: Primus.

—(1999), Stichwort "Entschleunigung", in: Oskar Brilling/Eduard W. Kle-ber (Hg.), *Handwörterbuch Umweltbildung*, Hohengehren: Schneider, S. 53 f.

—(2000), *Zeit lassen als Qualität. Zeitökologische Überlegungen zur 'guten Gesellschaft'*, Vortrag auf dem 30. Kongress der DGS in Köln ("Gute Gesellschaft? Zur Konstruktion sozialer Ordnungen") vom 26. bis 29.09.2000 [Ms.].

Richter, Götz (1991), *Die lineare Zeit. Eine Untersuchung zum Zusammen-hang von Zeitform und Entfremdung*, Edition Philosophie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21, Hamburg: Argument-Verlag.

Riescher, Gisela (1994), *Zeit und Politik. Zur institutionellen Becleutung von Zeitstrukturen in parlamentarischen und präsidentiellen Regierungssyste-men*, Baden-Baden: Nomos.

Riesman, David/Denney Reuel/Nathan Glazer (1977), *Die einsame Masse. Eine Untersuchung der Wandlungen des amerikanischen Charakters*, Rein-bek: Rowohlt.

Rifldn, Jeremy (1987), *Time Wars: The Primary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Rinderspacher, Jürgen (2000), "Ohne Sonntag gibt es nut noch Werktage". *Die soziale und kulturelle Bedeutung des Wochenendes*, Bonn: Dietz.

Robertson, Roland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Robinson, John (2002), *Is there an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life? Some empir-icalevidence*, Vortrag vor dem Research Committee 35 aufdem XV. Welt-kongress der Soziologie in Brisbane am IO.7.2002.

Robinson, John/Geoffrey Godbey (1996), "The great American slowdowm", in: *American Demographics*, Juni I996, S. 42—48.

—(1999), *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 2., aktualisierte Auflag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Ronte, Dieter (1998), "Die Langsamkeit der Ewigkeit", in: Klaus Back-haus/Holger Bonus (Hg.), *Die Beschleunigungsfalle oder der Triumph der Schildkröte*, 3., erweiterte Auflage, Stuttgart: Schäffer/Pöschel, S. 239—262.

Rorty, Richard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utsch: *Kontingenz, Ironie und Solidaritä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9).

Rosa, Hartmut (1998), *Identität und kulturelle Praxi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nach Charles Taylor*, mit einem Vorwort von Axel Honneth,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1999a), "Kapitalismus und Lebensführung. Perspektiven einer ethischen Kritik der liberalen Marktwirtschaft", in: *Deutsche Zeitschriftfür Philoso-phie*, Jg. 47, S. 735—758.

—(1999b), "Bewegung und Beharrung. Überlegungen zu einer sozialen Theorie der Beschleunigung", in: *Leviathan. Zeitschriftfür Sozialwissen-schaft*, Jg. 27, S. 386—414.

—(1999c), "Am Ende der Geschichte: Die, Generation X, zwischen Globalisierung und Desintegration", in: Karsten Fischer (Hg.), *Neustart des WeMaufs? Fiktion und Faszination der Zeitwend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246—263.

—(1999d), "Rasender Stillstand?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im Zeit-alter der Beschleunigung", in: Jürgen Manemann (Hg.), *Befristete Zeit*, Jahrbuch Politische Theologie Bd. 3, MOnster u. a.: LIT Verlag, S. 151—176.

—(2001a), "Temporalstrukturen in der Spätmoderne: Vom Wunsch nach Beschleunigung und der Sehnsucht nach Langsamkeit. Ein Literatur-überblick in gesellschafistheoretischer Absicht", in: *Handlung, Kuhur, Interpretation*, Jg. IO, S. 335—381.

—(2001b), Stichwörter "Vergangenheit", "Gegenwart", "Zukunft", in: Ni-colas Pethes/Jens Ruchatz (Hg.),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 Ein inter-disziplinäres Lexikon*, Reinbek: Rowohlt, S. 210—212, 617—620 und 677 f.

—(2002a), "Zwischen Selbstthematisierungszwang und Artikulationsnot? Situative Identität als Fluchtpunkt von Individualisierung und Be-schleunigung", in: Jürgen Straub/Joachim Renn (Hg.), *Transitarische Iclentität. Der Prozesscharakter des modernen Selbst*,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Campus, S. 267—302.

—(2002b), "Wachstum und Beschleunigung —Angst und Verheißung d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Diskussionsbeitrag zu Altvater 2002], in: *Erwägen Wissen Ethik* (vormals *Ethik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Jg. 13, Heft 3, S. 330—333.

—(2003), "Social acceleration. Ethic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 de-syn-

chronized high-speed society,s, mit Entgegnungen von William Scheuerman, Barbara Adam und Carmen Leccardi, in: *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 Jg. 10, S. 3—52.

—(2004a) (Hg.), *Fast Forward. Essays zu Zeit undBeschleunigung*, Hamburg: Edition Körber-Stiftung.

—(2004b), "Four Levels of Self-Interpretation. A Paradigm for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in: *Philosophy &Social Criticism*, Jg, 30, S. 691-720.

—(2004c), "Wider die Unsichtbarmachung einer Schicksalsmacht. Plä-dover für die Erneuerung der Kapitalismuskritik", in: *Berliner Debatte/ Initial*, Jg. 15, Heft 1, S. 81—90.

—(2004d), "Zeitraffer und Fernsehparadoxon oder: Von der Schwierigkeit, Zeitgewinne zu realisieren", in: ders. (Hg.), *Fast Forward. Essays zu Zeit und Beschleunigung*, Hamburg: Edition Körber-Stiftung, S. 19—28.

Rosa, Hartmut/Scheuerman, William (2006) (Hg.),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ety. Conceptions —Causes —Consequences, London/New York: Verso Jim Erscheinen].

Rousseau, Jean-Jacques (1988), *Julie oder Die neue Héloïse. Briefe zweier Liebenden aus einer kleinen Stadt am Fuße der Alpen*, 2. Auflage, München: Winkler.

Rulff, Dieter (2001), "Schröders Totipotenz", in: *Die Woche* Nr. 5 vom 26. 1. 2001, S. 8.

Rushkoff, Douglas (1994) (Hg.), *The GenX-Reader*, New York/Toronto: Ballantine Books.

Russell, Bertrand (1935), *In Praise of Idlenes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Ryker, Bethany (2002), *Keepin' Time: Breaking the Past and Sounding the Future*, Term-Paper an der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Juni 2002.

Sahlins, M.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New York: Aldine Atherton.

Sandbothe, Mike (1997), "Die Verzeitlichung der Zeit in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in: Antje Gimmler/Mike Sandbothe/Wahher Ch. Zim-merli (Hg.), *Die Wiederentdeckung der Zeit. Reflexionen, Analysen, Kon-zepte*, Darmstadt: Wissenschafdiche Buchgesellschaft, S. 41—62.

—(1998), *Die Verzeitlichung der Zeit. Grundtendenzen in der modernen Zeit-debatte i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tlschaft.

Sandel, Michael (1993), "Die verfahrensrechtliche Republik und das unge-bundene Selbst", in: Axel Honneth (Hg.), *Kommunitarismus. Eine De-batte über die moralischen Grundlagen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S. 18—35.

Schaltenbrand, Georges (1988), "Zeit und Bewußtsein", in: Rainer Zoll (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d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37—58.

Scharf, Günter (1988a), "Zeit und Kapitalismus", in: Rainer Zoll (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d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143—159.

—(1988b), "Wiederaneignung von Arbeitszeit als Lebenszeit", in: Rainer Zoll (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d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509—530.

Scherpe, Klaus R. (1986), "Dramatisierung und Entdramatisierung des Untergangs —zum ästhetischen Bewußtsein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in: Klaus R. Scherpe/Andreas Huyssen (Hg.), *Postmoderne. Zei-chen eines kulturellen Wandds*, Reinbek: Rowohlt, S. 270—301.

Scheuerman, William E. (2000), "The economic state of emergency", in: *Cardozo Law Review*, Jg. 21, S. 1869—1894.

—(200la),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empire of speed", in: *POLITY*, Jg. XXX-IV, Heft I, S. 41—67.

—(2001b), "Global Law in Our High Speed Economy", in: Richard Appel-baum/Volkmar Gessner/William Felstiner (Hg.), *Rules and Networks. The Legal Culture of Glob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Oxford: Hart, S. 108—124.

—(2003), "Speed, states, and social theory: a response to Hartmut Rosa" [Replik auf Rosa 2003], in: *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 Jg. 10, S. 42—48.

—(2004),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Social Acceleration of Time*, Balti-more/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chimank, Uwe (2000), *Theorien gesellschafilicher Differenzierung*, 2. Auf-lage,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Schimank, Uwe/Ute Volkmann (2ooo) (Hg.), *Soziologische Gegenwarts-diagnosen I*,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Schings, Hans-Jürgen (1977), *Melancholie und Aufklärung. Melancholiker und ihre Kritiker in Erfahrungsseelenkunde und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Stuttgart: Metzler.

Schivelbusch, Wolfgang (2000), *Geschichte der Eisenbahnreise. Zur Industri-alisierung yon Raum und Zeit im* 19. *Jahrhundert*, Neu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Schlote, Axel (1996), *Widersprüche sozialer Zeit. Zeitorganisation im Alltag zwischen Herrschaft undFreiheit*,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Schluchter, Wolfgang (1998), *Die Entwicklung des okzidentalen Rationa-lismus. Eine Analyse von Max Webers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Okzi-dent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chmahl, Kurt (1988), "Industrielle Zeitstruktur und technisierte Lebens-weise", in: Rainer Zoll (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344—370.

Schmied, Gerhard (1985), *Soziale Zeit. Umfang*, "Geschwindigkeit", *Evolu-tion*,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Schmitt, Carl (1950), "Der motorisierte Gesetzgeber", in: ders., *Die europä-ische Rechtswissenschaft*, Tübingen: Universitäitsverlag, S. 18—21 und 29—31.

Schneider, Manuel/Karlheinz Geißler (1999) (Hg.), *Flimmernde Zeiten. Vom Tempo der Medien*, Stuttgart/Leipzig: Hirzel.

Schneider, Norbert E/Ruth Limmer/Kerstin Ruckdeschel (2002), *Mobil, flexibel, gebunden. Familie und Beruf in der mobilen Gesellschafi*,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Schöneck, Nadine M. (2004), "Stets ein bisschen getriebe". Die Zeitwahr-nehmung meiner Mitmenschen im Fokus", in: Hartmut Rosa (Hg.), *Fast Forward. Essays zu Zeit und Beschleunigung*, Hamburg: Edition Kör-ber-Stiftung, S. 29—46.

Schor, Juliet B. (1992),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ulte-Strathaus, Regine (1999), "Bei Anruf Rat", in: *Psychologie Heute*, Jg. 26, Heft 3, S. 29.

Schulze, Gerhard (1994), "Das Projekt des schönen Lebens. Zur soziologi-schen Diagnos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en", in: Alfred Bellebaum/ Klaus Barheier (Hg.), *Lebensqualität. Ein Konzept für Praxis und For-sch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S. 13—39.

—(1997a), *Die Erlebnisgesellschafi.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 7-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1997b), "Steigerungstogik und Erlebnisgesellschaft", in: *Politische Bil-dung*, Jg. 30, Heft 2, S. 77—94.

—(2003), *Die beste aller Welten. Wohin bewegtsich die Gesellschaft im 21. Jahrhundert?*, München/Wien: Hanser.

Schumpeter, Joseph A. (1993),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7., erweiterte Auflage, Tübingen/Basel: Francke.

Schwinn, Thomas (1999), "Gibt es eine 'Zweite Moderne', in: *Soziale Welt*, Jg. 50, S. 423—432.

Segre, Sandro (2000), "A Weberian theory of time", in: *Time and Society*, Jg. 9, S. 147—170.

Seiwert, Lothar J. (2000), *Wenn Dues eilig hast, gehe langsam. Das neue Zeitmanagement in einer beschleunigten Welt* (5. Auflage),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Sennett, Richard (1998), *Der flexible Mensch. Die Kultur des neuen Kapita-lismus*, Berlin: Berlin Verlag.

Shakespeare, William (1991),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in: ders., *Complete Works*, hg. yon W. J. Craig, Leicester: Bookmart, S. 870—907.

Shaw, Jenny (1997), "Feeling a list coming one: gender and the pace of life", in: *Time & Society*, Jg. 6, S. 383—396.

Simmel, Georg (1919), "Rodin (mit einer Vorbemerkung iiber Meunier)", in: ders., *Philosophische Kultur*, 2. Auflage, Leipzig: Kröner, S. 168—186.

—(1900/1989), *Philosophie des Geldes*, hg. von David P. Frisby und Klaus C. Köhnk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897/1992), "Die Bedeutung des Geldes für das Tempo des Lebens", in: ders.,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hg. von Otthein Rammsted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215-234.

—(1908/1992),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in: ders., Gesamtausgabe, Bd. 11, hg. von Otthein Rammsted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03/1995), "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m", in: ders., *Aufsätze und-Abhandlungen* 1901—1908, Bd. I, hg. von Rüdiger Kramme u. a., *Ge-samtausgabe*, Bd. 7,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116—131.

Sloterdijk, Peter (1989), Eurotaoismus.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ine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mentek, Martin (1991), *Arbeitszeitflexibilisierung*. Zwischen kapitalistischer Zeitökonomie und sozialer Zeitstruktur, *Hamburg: VSA-Verlag.*

Sorokin, Pitirim A./Robert Merton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Jg. 42, S. 615—629.

Sparn, Walter (1999), "'... Solange es heute beißt', Zeitverknappung und Zeitverschwendung in neuesten Zeiten", in: Klaus-M. Kodalle (Hg.), *Zeit-Verschwend-ung. Ein Symposion*,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 S. 17—27.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1994) (Hg.), *Datenreport* 1994. *Zahlen und Fakten übe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Straub, Jürgen (1993), "Zeit, Erzählung, Interpretation. Zur Konstruktion und Analyse von Erzähltexten in der narrativen Biographieforschung", in: H. Röcklein (Hg.),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psychohistorisehen Biographiefarschung*, Tübingen: edition diskord, S. 143—I83.

—(1998a) (Hg.), *Erzählung, Identität und historisches Bewusstsein. Zur psychologisehen Konstruktion yon Zeit und 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8b), "Personale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 Zur Analyse eines theoreri-schen

Begriffs", in: Aleida Assmann/Heidrun Friese (Hg.), Identitäten, Erinnerung, Geschichte, Identitä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73—104.

—(2001), "Zur Psychologie des 'flexiblen Menschen'. Ein Leitbild für jün-gere-Generationen?", in: Franz Lehner (Hg.), *Erbfall Zukunft.* Vordenken für und Nachkommen, München: Rainer Hampp Verlag, S. 357—368.

Straub, Jürgen/Joachim Renn (2002) (Hg.), *Transitorische Identität. Der Prozesscharakter des modernen Selbs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Straus, Florian/Renate Höfer (I997), "Entwicklungslinien alltälicher Identitätsarbeit", in: Heiner Keupp/Renate Höfer (Hg.), *Identitätsarbeit heute. Klassische und aktueUe Perspektiven der Identitäts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z70—307.

Streeck, Wolfgang/Martin Höpner (2003) (Hg.), *Alle Macht dem Markt? FaUstudien zur Abwicklung der Deutschland AG*,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Sztompka, Pjotr (1993),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Change*, Oxford: BlackweU.

Tabboni, Simonetta (2001), "The idea of social time in Norbert Elias", in: *Time & Society*, Jg. 1o, S. 5—27.

Taylor, Charles (1993), *Multikulturalismus und die Politik der Anerkennung*, hg. yon Amy Gutma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4), *Quellen des Selbst. Die Entstehung der neuzeitlichen Identitä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Teubner, Günther (2000), "Privatregimes: Neo-spontanes Recht und duale Sozialverfassung in der Weltgesellschaft?", in: Dieter Simon/Manfred Weiss (Hg.), *Zur Autonomie des Individuums—Liber amicorum für Spiros Simitis*, Baden-Baden: Nomos, S. 437—453.

Thompson, Edward P. (I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Past & Present*, Jg. 38, S. 56—97 (deutsch: "Zeit, Arbeitsdisziplin und Industriekapitalismus", in: ders., *Plebejische Kultur und moralische Ökonom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S. 34—65).

Thrift, Nigel (1988), "Vivos Voco. Ringing the chang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ime consciousness", in: Michael Young/Tom Schuller (Hg.), *The Rhythms of Socie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S. 53—94.

Tilly, Charle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Blackwell.

Treptow, Rainer (1992), "Schneller und langsamer leben", in: Hans-Uwe Otto/Paul Hirschauer/Hans Thiersch (Hg.), *Zeit-Zeichen sozialerArbeit. Entwürfe einer neuen Praxis*, Neuwied: Luchterhand, S. 7—15.

Tronto, Joan (2006), "Time's Place", in: Hartmut Rosa/William Scheuer man (Hg.), *Social Acceleration. Conceptions—Causes—Consequences*, London/New York: Verso [ira Erscheinen].

Turkle, Sherry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Turner, Bryan S. (1990), "Periodiz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postmodern", in: ders. (Hg.),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 ledge, S. 1—13.

Ulmer, Diane K./Leonard Schwartzburd (1996), "Treatment of Time-Pa-thologies", in: Robert Allen/Stephan Scheidt (Hg.), *Heart and Mind: The Practice of Cardiac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 329—362.

Urry, John (2000a), *Time, complexity and the global, veröffentlicht vom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unter: http://www. comp. lancs. ac. uk/soco57ju. html.

—(2000b),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gde.

—(2006), "‚Speeding up and slowing down", in: Hartmut Rosa/William Scheuerman (Hg.), *Social Acceleration. Conceptions—Causes—Conse-quences*, London/New York: Verso [im Erscheinen].

Verkaaik, Oskar (2001), Rezension von Pascale Peters, The Vulnerable Hours of Leisure (Amsterdam 2000), in: *Time &Society*, Jg. 10, S. 407—410.

Vester, Frederic (1998), *Denken, Lernen, Vergessen*, 25. Auflage, München: dry.

Virilio, Paul (1980), *Geschwindigkeit und Politik. Ein Essay zur Dromologie*, aus dem Französischen von Ronald Vouillé, Berlin: Merve.

—(1993), *Revalutionen der Geschwindigkeit*, Berlin: Merve.

—(1997), *Open Sky*, London/New York: Verso.

—(1998a), *Rasender Stillst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8b), "Military Space", in: James Der Derian (Hg.), *The Virilio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S. 22—28.

—(1998c), "Continental Drift", in: James Der Derian (Hg.), *The Virilio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S. 183—195.

Virilio, Paul/Lotringer, Sylvère (1984), *Der reine Krieg*, Berlin: Merve.

Volkwein, Barbara (2000), "130 beats per minute: Techno", in: Richard Klein/Eckehard Kiem/Wolffam Ette (Hg.), *Musik in der Zeit—Zeit in der Musik*, Weilerswist: Velbrück, S. 399—409.

Voß, Gert Günter (1990), "Wertewandeh Eine Modernisierung der protes-tantischen Ethik?", in: *Zeitschrift für Personalforschung*, Jg. 3, S. 263—275.

—(1998), "Die Entgrenzung von Arbeit und Arbeitskraft. Eine subjektorien-tierte Interpretation des Wandels der Arbeit", in: *Mitteilungen aus der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 Heft 3, S. 473—487.

—(2001), "Neue Verhäihnisse? —Zur wachsenden Bedeutung der Lebens-führung von Arbeitskräften für die Betriebe", in: Burkart Lutz (Hg.), *Entwicklungsperspektiven van Arbeit. Ergebnisse aus dern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333 *der Universität München/ DFG*, Berlin: Akademie, S. 31—45.

Wagner, Peter (1995), *Soziologie der Moderne. Freiheit und Disziplin*,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2002), "Die Problematik der 'Identität' und die Soziologie der Mo-derne", in: Jürgen Straub/Joachim Renn (Hg.), *Transitorische Identität. Der Prozesscharakter des modernen Selbs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S. 303—317.

Wallis, George W. (1970), "Chronopolitics: the impact of time perspectives on the dynamics of change", in: *SocialForces*, Jg. 49, S. 102—108.

Walzer, Michael (1993), "Die kommunitaristische Kritik am Liberalismus", in: Axel Honneth (Hg.), *Kommunitarismus. Eine Debatte über die mora-lischen Grundlagen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S. 157-180.

Waters, Malcolm (1995), *Globaliza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Watts Miller, William (2000), "Durkheimian time", in: *Time & Society*, Jg. 9, S. 5—20.

Weber, Max (1972), *Wirtschafi und Gesellschafi. Grundriß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hg. yon Johannes Winckelmann, S., revidierte Auflage, Tü-bingen: Mohr-Siebeck.

—(1988),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 d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islehre*, hg.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 7. Auflage, Tübingen: Mohr-Siebeck, S. 582—613.

—(1991),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L Eine Aufsatzsammlung*, hg.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 8. Auflage, Gütersloh: GTB Siebenstern.

Weibel, Peter (1987), *Die Beschleunigung der Bilder. In der Chronokratie*, Bern: Benteli.

Welsch, Wolfgang (1994) (Hg.), *Wege aus der Moderne. Schlüsseltexte der Post-moderne-Diskussion*, 2. Auflage, Berlin: Akademie.

Wenzel, Harald (1995), "Gibt es ein postmodernes Selbst? Neuere Theorien und Diagnosen der Identität in fortgeschrittenen Gesellschaften", in: *BerlinerJournal für Sozi-ologie*, Jg. i, S. 113-131.

Weyman, Ansgar (2000), "Sozialer Wandel, Generationsverhälmisse und Techni-kgenerationen", in: Martin Kohli/Marc Szydlik (Hg.), *Generatio-hen in Familie und Gesellschaft*,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S. 36—58.

Willems, Herbert (1999), "Institutionelle Selbstthematisierungen und Identitätsbildungen im Modernisierungsprozess", in: Herbert Willems/ Alois Hahn (Hg.), *Identität und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62-101.

Willems, Herbert/Hahn, Alois (1999) (Hg.), *Identität und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Wolin, Sheldon (1997), "What Time is It?", in: *Theory & Event*, Jg. I, S. 1—4.

Wollen, Peter (2002), "Speed and the cinema", in: *New Left Review* 16, Juli/August 2002, S. 105—114.

Young, Michael/Tom Schuller (1988) (Hg.), *The Rhythms of Socie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Zeiher, Hartmut J./Helga Zeiher (1994), *Orte und Zeiten der Kinder. Sozia-les Leben im Alhag yon Großstadtkindern*, Weinheim/München: Juventa.

Zerubavel, Eviatar (1979), *Patterns of Time in Hospital Life*, Chicago/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1),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Berkeley u.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The Seven Day Circle. The History andMeaning of the Week*, New York/London: The Free Press.

Zimmerli, Walther Ch./Mike Sandbothe (1993) (Hg.), *Klassiker der moder-nen Zeitphilosophi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Zoll, Rainer (1988a) (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b), "Zeiterfahrung und Gesellschaftsform" in: ders. (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72—88.

ZuUey, Jürgen/Barbara Knab (2000), *Unsere Innere Uhr. Natürliche Rhyth-men nutzen undderNon-Stop-Belastungentgehen*, Freiburg u. a.: Herder.

关键词和人名索引

（注：页码为原书页码）

Adam, Barbara, 芭芭拉·亚当 17, 20—23, 27, 31, 33, 64 页及其后页, 97, 147, 258 及其后页, 303, 381, 449 及其后页, 492, 517

Adams, Henry, 亨利·亚当斯 82 页及其后页, 85, 399, 451, 492

Agamben, Giorgio, 吉奥乔·阿甘本 235, 492

Akzelerationszirkel, 加速的循环 55, 120, 135, 158, 175, 198, 243—255, 257, 261, 292, 308, 310, 471 及其后页, 475

Alltagszeit (siehe auch: Epochenzeit, Lebenszeit, Sakralzeit), 日常时间（也请参考时代时间、生命时间、世俗时间）30—33, 35—38, 43 页及其后页, 46, 49, 64 页及其后页, 138, 186 页及其后页, 193, 198, 199—236, 237, 251 页及其后页, 258 页及其后页, 264—267, 290, 336 页及其后页, 341, 366—371, 379 页及其后页, 425 页及其后页, 450, 453, 478, 481, 484; (Fragmentierung der ~)（日常时间的碎片化）202 页及其后页, 211, 224, 308, 346—349, 457, 469, 484

Ancillon,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安西隆 72 页及其后页, 292, 354

Anerkennung, 承认 356, 480; (und Dynamisierung)（和动态化）482

Angst und Verheißung (als Antriebsprinzipien), 恐惧和预告（作为驱动原则）13, 136, 218, 283—286, 482

Anpassungszwang (temporaler; siehe auch: Beschleunigungsversprechen, siehe auch: Beschleunigungszwang), 适应强迫（暂时的；也请参见：加速承诺；也请参见：加速强迫力） 190, 218—221, 249, 264, 280, 378, 469, 471; (politischer)（政治的）407 页及其后页, 417, 452, 456

Arbeitskraftunternehmer, 劳动力企业家 276

Arbeitsmarkt, 劳动力市场 101, 183 页及其后页, 276

Arbeitszeit, 劳动时间 200, 205, 208 页及其后页, 214, 216 页及其后页, 263—279, 305 页及其后页, 367 页及其后页, 469; (als Produktionsfaktor)

(作为生产要素)259—261;(Arbeitszeitregime)(劳动时间管理)129,150,157,268—270,274 页及其后页,278,286,318,328 页及其后页,448,465,476
Augustinus,奥斯古汀 23,493
Authentizität,真实可靠 360,382,388 页及其后页
Automobil,汽车 79 页及其后页,83,121,214 页及其后页,164,246,361,406,438,471
Autonomie,自治 110,381,445;(Begriffsbestimmung)(定义)372,442,454;(individuelle)(个体的)25,180,304,380—383,388,442 页及其后页,452—454,481,486 页及其后页;(kollektive)(集体的)226 页及其后页,255,323 页及其后页,402,452—455,486 页及其后页;(und das Projekt der Moderne)(以及现代化项目)50,255,334,402,451—457,479 页及其后页,485—487,489

Baier,Lothar,罗塔·拜耳 112,152,155,338,386—388,390,493
Baudelaire,Charles,夏尔·波德莱尔 74,87,99,437,493—495
Baudrillard,Jean,让·鲍德里亚 202,420—422,494
Bauman,Zygmunt,齐格蒙·鲍曼 59 页及其后页,62,170,174,176,180,182,203,319,334,343,345 页及其后页,350 页及其后页,361,366,376 页及其后页,413,449,494
Beck,Ulrich,乌尔里希·贝克 47,59,106,180,184,323 页及其后页,327 页及其后页,333,340,51,362,377,409,442,494
Beethoven,Ludwig van,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75,212,504
Benjamin,Walter,瓦尔特·本雅明 74,81,142,173,234—236,238,390,422,437,470,488 页及其后页,492,494 页及其后页,501,506
Bergmann,Werner,维纳·贝尔格曼 19—21,28,97,120,258,294,297,405,415,495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se,商业关系 133,179,182—184,260,336,361,433,462
Beschleunigungsversprechen/Be-schleunigungsverheißung(siehe auch:Beschleunigungszwang,Anpassungszwang),加速承诺/加速预言(也请参见:加速强迫力、适应强迫) 10,14,73,220,272,279—294,309,418,452 页及其后页,474 页及其后页
Beschleunigungszwang,加速强迫力 60,104,136,154,204,217,219 页及其后页,262,272,279,286,293 页及其后页,298,372,406,413,418,434,453,481
Bildungs-und Entwicklungsroman,教育小说和发展小说 360,389
Blumenberg,Hans,汉斯·布鲁姆贝格 35,86,120,249,280 页及其后页,287 页及其后页,496
Bürokratie(siehe auch:Institutionen),科层制度(也请见制度化) 84,128,157,276,312 页及其后页,316,319,324—329,371,476

Castells,Manuel,曼努埃尔·卡斯特斯 57,59,84,166,168—170,176 页

及其后页,179 页及其后页,247,292,321 页及其后页,324 页及其后页,327,335 页及其后页,339,344 页及其后页,348,350,363,366,450,497

Chesneaux,Jean,让·谢诺 52,150,326,393,403,414,424,453,497

Conrad,Peter,彼得·康纳德 39 页及其后页,42,71,75,78 页及其后页,87,193,460,497

Coser,Lewis A.,刘易斯·科塞 304 页及其后页,498

Coupland,Douglas(Generation X),道格拉斯·库普兰(《X 一代》) 42,53,88,386 页及其后页,423—426,498

Creveld,Martin van,马丁·凡·克瑞维尔德 320 页及其后页,325,423,498

Csikszentmihalyi,Mihaly,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 224 页及其后页,228,230,232,509

DDR(Ostdeutschland),民主德国(东德) 35,326,335

Dekontextuierung(von Erlebnissen und Ereignissen),去背景化(体验和行为的) 231—234,341,385,470

Demokratie,民主 150,156,226 页及其后页,328 页及其后页,389;(Zeitmuster)(时间模式)255,391—396,408,416,422;(Langsamkeit)(枯燥)157,326,329,403 页及其后页,409—414,485;(Willensbildung u. Entscheidungsfindung)(意愿形成和作出决定)326,393,395,410—415,485;(als Elementder Beschleunigung)(作为加速的要素)312,329,393;(Krise der ~)(民主的危机)255,328 页及其后页,351,403 页及其后页,415—417,422,424,487

Depression,抑郁 42 页及其后页,84,144,337,386—390,421,437,440,464,484

Desynchronisation,去同步化 44—49,96,104,110,131,133,144 页及其后页,186 页及其后页,191,227,253,308,326,391,395,403—415,425 页及其后页,433,435,439,456—458,464,477,485,487

Dewey,John,约翰·杜威 494 页及其后页,413 页及其后页,498

Dicke,Klaus,克劳斯·迪克 16,395,406 页及其后页,498

Differenzierung(funktionale),差别化(功能的) 27,33 页及其后页,54,94—97,101,105—109,131 页及其后页,144 页及其后页,155,179,221,267,295—310,364,391,404,426 页及其后页,433,435 页及其后页,444,461,472—474,488;(und Entdifferenzierung)(和去差别化)57,110,211,269,276,304,306 页及其后页,328 页及其后页,404 页及其后页,413,441 页及其后页;(als Beschleunigungserfordernis)(作为加速的要求)95 页及其后页,110,296,431—433,439—441

Distribution(beschleunigte),分配(加速的) 127 页及其后页,261 页及其后页,276,337

Disziplinargesellschaft(und Zeitnormen),纪律社会(和时间规范) 30,93,264—267,282 页及其后页,317 页及其后页,345

Domestizierung (der Natur),驯化(自然的) 101, 105—108, 110, 155, 431 页及其后页,439—441, 444, 461, 476

Drift,漂浮 352, 382 页及其后页, 386, 419, 452, 478

Durkheim,Émile,爱弥尔·涂尔干 28 页及其后页,35 页及其后页,60, 89, 94 页及其后页,98, 106, 108, 295, 460, 499, 524

Ehrenberg,Alain,阿兰·埃伦贝格 84, 388 页及其后页,499

Eilkrankheit,急忙病 42,78,83 页及其后页,193,337,386 页及其后页

Eisenbahn,火车 39, 62, 77, 79 页及其后页,91, 124, 140 页及其后页, 146 页及其后页,163—165, 245 页及其后页,248, 317

Elias,Norbert,诺伯特·伊里亚斯 21, 28 页及其后页,61, 80, 104, 142, 357, 500, 522

E-Mail-Kommunikation,电子邮件 14, 80, 116, 119 页及其后页,127, 169, 203, 206—208, 211, 219, 252, 254, 308

Enigma-Charakter der Zeit,时间的谜一般的特性 23, 65

Ennui,倦怠 42, 87, 388, 437, 440, 465

Entfremdung,异化 46, 278, 341, 440, 483—485

Entschleunigung,减速 36, 118, 207, 313;(Begriff)(概念) 139;(Formen)(形式)138—153, 323;(unfreiwillige ~)(非自愿的)59, 144 页及其后页,337, 410;(als Ideologie)(作为意识形态) 81, 84, 135, 146—149, 150, 154, 255, 338, 461, 464 页及其后页;(funktionale Entschlcunigung)(功能性减速)149—152, 338, 461, 464 页及其后页;(Verhältnis zur Beschleunigung)(与加速之间的关系) 16, 52, 59, 124, 153—158, 197, 313, 322 页及其后页,329, 442;(des Krieges)(战争的减速) 320, 322;(in der Politik)(在政治中的)395 页及其后页,401, 409 页及其后页,416, 477, 488

Entschleunigungsinseln (u. Entschleunigungsoasen),减速岛(及减速绿洲) 14, 143, 148 页及其后页,187, 191, 207, 227, 253 页及其后页,276, 337 页及其后页,464

Enzensberger,Hans Magnus,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 234, 320 页及其后页,382, 423, 500

Epochenzeit (historische Zeir;siehe auch:Alltagszeit, Lebenszeit, Geschichtserfahrung),时代时间(历史的时间;也请参见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历史体验) 31 页及其后页,34—37, 39, 42, 46 页及其后页,49 页及其后页,65, 168, 195, 237, 264 页及其后页, 380, 398, 402, 423, 428 页及其后页,430 页及其后页,446, 450

Erfahrung,经验 71, 231 页及其后页, 291, 336, 382 页及其后页,484;(Entwertung det)(及体验)235, 249, 341, 457, 470, 484;(Erfahrungs losigkeit)(经验丧失)232, 234 页及其后页,470, 478

Erfahrungsraurm (und Erwartungshorizont),经验空间(及期望地平线)

14 页及其后页,27, 86, 131, 157, 177, 234 页及其后页,248,360, 398, 433, 445—447, 462, 467, 488
Erhard, Ludwig, 路德维希·艾哈德 10, 500
Erstarrung (kulturelle; strukturelle), 停滞(文化的;结构的) 16, 41 页及其后页,50, 52, 77, 86 页及其后页, 103, 109, 152 页及其后页,155, 156, 167, 170, 385 页及其后页, 420—423, 426, 428, 430, 434—440, 451, 455, 465, 479
Exekutive,行政机构 393;(Übergewicht über Legislative)(比立法机构更重要) 394 页及其后页,407 页及其后页,415
Exklusion (soziale),排斥(社会的) 32 页及其后页,59, 143, 215, 345 页及其后页,350, 363, 481 页及其后页,

Familienstrukturen,家庭结构 34, 58, 60, 96, 113, 133, 179—182, 184, 186, 299 页及其后页,302 页及其后页,397, 358 页及其后页,367, 433, 446, 462, 467
Fernsehkonsum,电视消费 77, 80, 130, 168, 187, 192 页及其后页,201 页及其后页,206 页及其后页,213, 218, 222—227, 253 页及其后页, 293, 298, 322, 438 页及其后页;(Fernsehparadoxon der Zeiterfahrung)(时间感觉的电视悖论) 229—236, 470
Filibuster,阻挠议事 396
Fordismus,福特主义 182, 273 页及其后页,336, 361, 371, 473, 476
Fortbewegung (siehe auch: Transport), 向前运动(也请见:运输) 78, 119, 121 页及其后页,124 页及其后页, 193, 245 页及其后页, 438;(und Raumerfahrung)(以及空间体验)125 页及其后页, 140 页及其后页, 164—166
Fortschritt,前进 10, 73 页及其后页, 86, 150, 157,260, 281, 294, 317, 344, 359 页及其后页,384, 390, 400—402, 418—420, 424, 446, 451 页及其后页,454,478 页及其后页, 488 页及其后页,
Foucault,Michel,米歇尔·福柯 29 页及其后页,266, 317, 350, 500 页及其后页,
Freizeit,业余时间 38, 43, 117—119, 197, 200, 208 页及其后页,211—221, 223—228, 263, 265, 269 页及其后页,275—278, 328, 347, 363, 469, 483 (Freizeitproblem)(业余时间的问题) II,213 页及其后页
Fukuyama, Francis, 弗朗西斯·福山 41, 152, 501
Fußball,足球 323, 341
Futurismus,未来主义 75, 81, 85, 155, 292

Garhammer, Manfred, 曼弗雷德·伽哈玛 17, 19, 21, 33, 53, 57, 101, 135—137, 184, 197, 205 页及其后页,208—212, 214 页及其后页,217, 219, 259 页及其后页,264, 267—270, 273, 275, 278, 306, 366, 380 页及其后页,384—386, 501
Gegenwart,现在 14,26 页及其后页, 32 页及其后页,34 页及其后页,40 页及其后页,49, 78, 131, 186, 235,

247, 297, 300, 357, 360, 381 页及其后页,387, 398, 419, 424, 450 页及其后页,454 页及其后页;(erstreckte)(延伸)51, 348, 450
Gegenwartsschrumpfung, 现在的萎缩 58, 120, 131—134, 136, 176—179, 187 页及其后页,192, 219, 238, 248, 252, 302 页及其后页,364, 408—410, 418, 433, 435, 450, 462 页及其后页,477 页及其后页,
Gehlen ,Arnold,阿尔诺德·盖伦 41, 152, 206, 502
Geißler,Karlheinz,卡尔海因茨·盖斯勒 21, 43, 64 页及其后页,77, 101, 125 页及其后页,128, 137, 197, 206 页及其后页,214, 277, 287, 303, 348, 367 页及其后页, 381, 492 页及其后页,502, 519
Generationenverhältnis,代际关系 143, 178—189, 227, 239, 347 页及其后页,360 页及其后页,364, 377, 398, 445—449, 456, 458, 467 页及其后页;(Generationenbruch)(代际断裂) 186—188, 405, 468, 485
Geschichte,Ende der (siehe auch:Posthistoire),历史、历史的总结(也请见后历史) 41 页及其后页,152, 344, 348, 420—423, 425, 437, 451, 460, 465, 478
Geschichtserfahrung,历史体验 27,39, 86, 88, 91, 169, 188, 235, 281, 288 页及其后页,344 页及其后页,348, 379 页及其后页,390, 392, 396—402, 415 页及其后页,419—427, 429 页及其后页,437, 444—449, 451, 455, 467, 477 页及其后页,488
Geschichtsphilosophie,历史哲学 234 页及其后页,268, 280 页及其后页, 400—402, 418, 420, 446, 458
Geschlechterverhältnis,两性关系 19, 59 页及其后页,214, 217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Zeitstrukturen),社会结构(和时间结构) 29, 32—34, 95, 225 页及其后页,248, 295—310;(und Zeitbewusstsein)(和时间意识)26—28, 30, 32 页及其后页, 134, 235 页及其后页,396 页及其后页, 425 页及其后页,481
Gesetz der Beschleunigung,加速的法则 71, 82 页及其后页,85, 451
Gesetzgebung (Legislative),立法(立法机构) 245, 391, 393—395, 406—408, 410, 415, 443
Giddens,Anthony,安东尼·吉登斯 21 页及其后页,28, 30 页及其后页,47, 60 页及其后页,91, 106, 168 页及其后页,250, 257—259, 265 页及其后页,268, 311, 352, 357 页及其后页, 494, 502
Giegel,Hans-Joachim,汉斯·约阿希姆·吉戈尔 16, 209, 366, 414, 417, 497, 502 页及其后页
Gleichzeitigkeit (als Kennzeichen der Spätmoderne),同时性(作为晚期现代的特征的) 51, 168 页及其后页, 344, 346—348, 396, 412, 423, 426, 449 页及其后页,477;(und Ungleichzeitigkeit)(和非同时性)46, 49, 132, 168, 187, 348, 404, 449, 468
Gleick,James,詹姆斯·格莱克 40, 53, 77, 102, 201, 211, 503
Globalisierung,全球化 48 页及其后页,62, 84 页及其后页,166, 168,

189, 268, 273, 316, 323 页及其后页,333—351, 352 页及其后页,406, 436, 455, 460 页及其后页,477;(Bestimmung)(定义)337, 340;(als Beschleunigung)(作为加速的全球化)48, 339, 477;(als Prozess)(作为过程的全球化)57, 140, 340—42;(als Zustand)(作为状态的全球化)340, 342—349;(als politisches Projekt)(作为政治项目)340, 349—351

Glotz, Peter, 彼得·格罗茨 84, 147, 150, 503

Goethe, Johann Wolfgang,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31, 72 页及其后页,77, 176, 178, 290, 503, 514

Gronemeyer, Marianne, 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 21, 35, 66, 71 页及其后页,86, 102, 120, 146, 164, 280, 286—289, 438, 503

Gryphius, Andreas, 安德雷亚斯·格吕菲乌死 430

Habermas, Jürgen, 尤尔根·哈贝马斯 19, 26, 58, 106, 152, 274, 397, 401, 419, 426, 452, 480, 499, 504, 513 页及其后页

Habitus, 习惯化 374 页及其后页;(und internalisierte Zeitmuster)(和内化了的时间模式) 28, 31, 37 页及其后页,266,481

Harvey, David, 大卫·哈维 39, 42, 47, 57, 60, 62, 71, 75, 79, 82, 84—86, 126, 132, 163, 166, 239, 272, 279, 324, 333 页及其后页,336, 338—340, 344—346,351, 377, 379, 405, 425, 442, 504

Heavy Metal, 重金属 76, 423 页及其后页,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22 页及其后页,31, 66, 443, 450 页及其后页,505,513

Heilserwartung (und Beschleunigung), 救赎的期望(和加速) 281, 284, 287

Heine, Heinrich, 海因里希·海涅 77, 79, 246, 505

Heintel, Peter, 彼得·海恩特尔 81, 84, 280, 292, 505

Heraklit, 赫拉克利特 428 页及其后页

Herrschaft, 统治 350 页及其后页;(und Zeit)(和时间)19, 36, 63, 317 页及其后页;(und Geschwindigkeit)(和消逝)36, 53, 94, 102, 313, 329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62

Honneth, Axel, 阿克塞尔·霍耐特 17, 234, 389, 442, 458, 480, 482, 506, 514, 516, 518, 524

Horváth, Ödön von, 厄登·冯·霍瓦特 483

Identität, 身份定位 16, 25, 57,173 页及其后页,180, 182, 198, 235, 237—240, 247, 352—390, 477;(Bestimmung)(定义)373;(stabile personale)(稳固的、个人的)157, 239, 328 页及其后页,334, 348 页及其后页,355—361, 370, 379, 396, 442, 446, 456, 467, 478;(situative)(情境化的)50, 237, 239 页及其后页,362—390, 396, 418, 443, 446, 454, 478;(substantielle ~ a priori)(实质的、首要的)355—361, 446;372 页及其后页,455, 457;(Dynamisierung der ~)(身份定位的动态性)237—240,

329, 353—355, 357, 362, 364, 445; (Zeithorizonte der ~) (身份定位的时间维度) 49, 237, 352, 358, 380 页及其后页,385 页及其后页
Individualisierung, 个性化 54, 59, 97—101, 105—110, 155, 318, 329, 352, 355, 362, 373, 389, 413, 431 页及其后页,439, 441—444, 461, 476
Instabilität (und Wandel),不稳定性(和变迁) 134 页及其后页,184 页及其后页,189, 192, 225 页及其后页,238 页及其后页,301, 361, 409, 483
Institutionen (Erosion der),制度(的腐蚀) 150—152, 156 页及其后页,176, 328 页及其后页,333 页及其后页,343, 449, 454, 465, 468, 476 页及其后页,487; (alsmoderne Beschleuniger und spätmoderne Bremser) (作为现代的加速器和后现代的制动器)157, 273, 311, 328 页及其后页,475 页及其后页; (als Beharrungskräfte) (作为稳定力量) 150—52, 155—157, 177, 359, 393, 449, 465; (gierige ~) ("贪婪的")304 页及其后页
Internet,互联网 80, 116, 130, 145, 191, 247, 293, 303, 336, 339, 409, 414, 471; (als U-Topie) (作为乌托邦的) 48, 126, 166; (Entstehung) (产生) 317, 322 页及其后页; (Auswirkungen auf Zeiterfahrung) (对时间感觉的影响)79, 168

James, William, 威廉姆·詹姆斯 228 页及其后页,507
Jameson, Fredric,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40, 47, 50, 88, 179, 272, 279, 334, 336, 338, 344 页及其后页,419, 426, 442, 479, 507
Jazz-Musik, 爵士音乐 76, 141 页及其后页
Just-in-time-Produktion, 准时生产 129, 269, 275, 336, 347

Kalender, 日历 37, 265, 269, 277, 358
Kapital (Zirkulationsgeschwindigkeit), 资本(周转速度) 92, 104, 172, 247, 260—262, 276, 473
Kapitalismus, 资本主义 25, 37, 92 页及其后页,104, 106, 108, 151, 200, 282, 292, 316, 325, 379, 441; (als Antriebsmotor der Beschleunigung) (作为加速的驱动引擎) 89—94, 128, 257—279, 309 页及其后页,472 页及其后页; (zwei Richtungen der Analyse) (分析的两个方向)271 页及其后页; (flexibler) (弹性的) 268—279, 325 页及其后页,336, 346, 382 页及其后页,473; (und 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 (功能上的差异)295 页及其后页,473 页及其后页
Kertész, Imre, 伊姆雷·凯尔泰斯 422 页及其后页,508
Klassenunterschiede (und Zeitmuster), 阶级差别(和时间模式) 19, 345 页及其后页
Kloster, 修道院 149, 163, 264, 267, 464
Kohli, Martin, 马丁·科利 17,180 页及其后页,184, 358 页及其后页,363, 366, 448, 477, 497, 508, 524
Kommodifizierung, 商品化 62, 193, 258 页及其后页,444

Konsum (siehe auch: Fernsehkonsum), 消费(也请参见:殿试消费) 25, 66, 80, 139, 148, 200, 218, 274; (beschleunigter) (加速的)128, 204, 261—263, 265, 279, 337, 473
Kontingenz,偶然性 43, 96, 123, 152, 156, 176, 181 页及其后页,184 页及其后页,207, 220, 238, 256, 285 页及其后页,362 页及其后页,368, 380 页及其后页,384, 408, 420, 423, 435—437, 442, 467, 473
Koselleck, Reinhart,莱因哈特·科泽勒克 27, 39, 53, 58, 72, 77, 82, 85 页及其后页,91, 95, 116, 131 页及其后页,135, 161 页及其后页,164, 176 页及其后页, 188, 214, 281, 344, 392, 397—401, 417, 419, 423, 447 页及其后页,460, 477, 502, 509
Krieg, 战争 145, 169, 311, 313—317, 319—322, 325, 351, 423, 430
Kritische Theorie, 批判理论 458 页及其后页,480—486
Kubismus, 立体派 75
Kulturkampf (um Beschleunigung), 文化斗争(和加速) 80—82

Landkarten, 地图 162, 177, 343, 424
Lauer, Robert, 罗伯特·劳尔 19—21, 26, 29, 32, 45, 63, 145, 178, 221, 237, 357, 382, 443, 509
Laufband, 传送带 192; (als Sinnbild des rasenden Stillstandes) (作为飞速的静止状态的象征) 193
Lebenslauf (u. Lebenslaufregime), 人生历程(和人生历程管理) 156 页及其后页,169, 328 页及其后页,344, 358 页及其后页,363, 365 页及其后页,380 页及其后页,446—448, 453, 465, 478
Lebenstempo (Bestimmung), 生活速度(定义) 98 页及其后页,114, 135, 137 页及其后页,195—198, 202, 212 页及其后页; (Beschleunigung des) (生活速度的加速)16, 42, 54, 57, 93, 110, 114, 121 页及其后页, 135—138, 195—240, 256 页及其后页,262 页及其后页,279, 290—294, 347, 432, 463 页及其后页, 471; (subjektives) (主体性的)136 页及其后页,213—236, 469 页及其后页; (und technische Beschleunigung) (以及技术的加速)116—120, 122 页及其后页,137 页及其后页,207 页及其后页, 213 页及其后页, 243—245, 250 页及其后页,256, 261, 291 页及其后页,294, 309, 317 页及其后页, 463; (Strategien der Steigerung) (提高的策略)114, 135 页及其后页, 199—201, 209 页及其后页, 244, 469; (Erhöhung des ~s als Antwort auf den Tod) (提高生活速度作为对死亡的回应)292, 474
Lebenszeit (biografische Zeit; siehe auch: Alltagszeit, Epochenzeit, Weltzeit), 生命时间 (传记时间;也请参见日常时间、时代时间、世界时间) 31, 35—37, 42, 46, 49, 65, 90, 120, 265, 358, 370, 430, 450, 478, 481, 484; (und Weltzeit) (和世界时间)35 页及其后页,249 页及其后页, 287—289, 291, 293 页及其后页, 297, 309, 472, 474
Lepenies, Wolf, 沃尔夫·勒佩尼斯 42, 87, 448, 510

Levine, Robert, 罗伯特·列维尼 19, 21, 42, 53, 63, 78, 80, 84, 114, 137, 146, 163, 190, 1963 页及其后页, 200, 202, 207, 212, 214, 231, 277, 367, 387, 510
Linder, Staffan, 斯戴芬·林德 10, 43 页及其后页, 63, 120, 127, 173, 196, 205, 218, 225, 263, 443, 510; (Linder-Axiom) (林德公理) 44, 199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394 页及其后页, 510
Lübbe, Hermann, 赫尔曼·吕伯 46, 58, 76, 108, 114, 131—133, 143, 151 页及其后页, 174, 178, 185 页及其后页, 193, 249 页及其后页, 281, 401, 419, 433, 450, 462, 510
Luhmann, Niklas, 尼克拉斯·卢曼 21 页及其后页, 28, 95—97, 109 页及其后页, 131, 133 页及其后页, 179 页及其后页, 191, 201, 207, 219, 221 页及其后页, 225 页及其后页, 249, 254, 273, 282 页及其后页, 285, 295, 297—303, 305, 307 页及其后页, 364 页及其后页, 391, 397, 415, 419, 426 页及其后页, 442, 450, 473, 504, 510
Lyotard, Jean-François,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47, 238, 511

Macht, 权力 36 页及其后页, 102, 311, 313—315, 316, 343, 350 页及其后页, 396, 409; (des Nationalstaates) (民族国家的权力) 323—325, 350, 475 页及其后页; (der Ströme, fluide ~) (潮流的权力, 液态化) 350 页及其后页; (Bewegungsmacht) (运动的力量) 102, 313 页及其后页, 317, 322
Mann, Thomas, 托马斯·曼 78, 228 页及其后页
Marinetti, Filippo Tomaso,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 81, 292, 511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72, 89—94, 98, 104, 106, 108, 122, 157, 173, 176, 200, 258—262, 264, 273 页及其后页, 276, 422, 458, 460, 488, 505, 511 页及其后页, 515
Marxismus, 马克思主义 27, 91, 269, 272, 289, 458
Mead, George Herbert, 乔治·赫伯特·米德 23, 450, 500, 512
Mead, Margaret, 玛格丽特·米德 188, 512
Medien (neue), 媒体 (新) 77, 84 页及其后页, 101, 104 页及其后页, 155, 166, 168, 172, 187, 225, 246, 293, 414, 421, 423, 438
Melancholie, 忧郁 87, 388 页及其后页
Militär, 军队 106, 267, 311, 324 页及其后页; (und Beschleunigung) (和加速) 55, 102 页及其后页, 257, 314—323, 475; (maieutische Rolleim Beschleunigungsprozess) (在加速过程中的接生术的角色) 106, 311, 316, 475; (Funktionsinversion) (功能反转) 324 页及其后页, 328 页及其后页, 475 页及其后页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394, 512
Mobilmachung, 动员 315, 321, 458, 489
Moderne (siehe auch: Modernisierung) (Übersicht), 现代 (也请参见: 现代

化)(概览) 446;(klassische ~)(经典现代)24, 48, 328, 426, 455, 476;(frühe und Vor ~)(早期现代和前现代)173, 178, 184, 199, 286, 355 页及其后页,360, 397 页及其后页,445—447;(Spät ~, siehe auch: Postmoderne)(晚期现代,也请参见:后现代)24, 47—50, 426, 455, 476;(Projekt der ~)(现代的项目)16, 50, 106, 151, 155, 255, 334, 391, 396, 402, 425 页及其后页,451—456, 477, 479, 486—489;(Neubestimmung der ~)(现代的新定义)428—459

Modernisierung (siehe auch: Postmoderne, Projekt der Moderne)(Bestimmung),现代化(也请参见:后现代、现代的项目)(定义) 24, 60, 89, 101, 431;(Grundprinzipien)(基本原则)54, 90, 94, 97, 100 页及其后页,105—111, 155, 170 页及其后页,311, 313, 317, 355, 358, 432—443, 444, 461, 471, 476;(als Beschleunigung)(作为加速)51—53, 63, 79, 101, 105, 109—111, 146, 170 页及其后页,181, 215, 432—443, 460;(und Erstarrung)(和停滞)434—436, 439 页及其后页,451—455, 465;(Verselbstständigung)(自主)107, 255, 418, 452 页及其后页,455—457

Montesquieu, Charles de,夏尔·德·孟德斯鸠男爵 394 页及其后页,512

Moralischer Verschleiß (von Maschinen und Gütern),(机器和物品带来的)道德上的耗损 173, 260

Moratorium,延期清偿 464 (in der Politik)(在政治中)149 页及其后页,254

More-More-Muster (der Aktivität),越来越多模式(行为的) 209, 228

Moritz, Karl Philipp,卡尔·菲利普·莫里茨 448, 513

Muddling Through (in der Politik),"蒙混过关"(政治上的) 410, 417

Multikulturalismus,文化多元化主义 19, 46, 412

Multitasking,多任务 114, 122, 136, 187, 199, 203, 210 页及其后页,244, 308, 469

Multitemporalität,多样时间性 277

Münkler, Herfried,赫尔弗里德·默克勒 17, 311, 313, 315 页及其后页,320—322, 513

Musil, Robert,罗伯特·穆齐尔 78, 389, 513

Nadolny, Sten,斯腾·纳多尼 84, 513

Nassehi, Armin,阿明·纳瑟黑 21 页及其后页,28, 97, 133 页及其后页,180, 234, 297, 301 页及其后页,307, 382, 404, 418 页及其后页,422, 424—426, 455, 513

Negri, Antonio,安东尼奥·内格里 271, 336,350, 455, 487, 504

Neurasthenie,神经衰弱 42, 83, 87, 1000, 388

Neuzeit,近代 41, 73, 132, 281, 287—290, 292, 311, 313 页及其后页,357, 396—401, 460

Niethammer, Lutz,路茨·尼特哈默尔 17, 421, 424, 513

Nietzsche,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尼采 27, 73 页及其后页,87, 156, 224, 437, 455, 513 页及其后页

Nowotny, Helga, 海尔格·诺沃特尼 20 页及其后页, 28, 51, 64, 66, 86, 97, 113, 143, 293, 348, 363, 400, 402, 418, 420, 450, 514

Offe, Claus, 克劳斯·奥弗 151 页及其后页, 393, 434—436, 452, 489, 503, 514

Optionen (Steigerung), 选项(增多) 204, 256, 293 页及其后页, 297 页及其后页, 368, 378, 434—436, 442, 472 页及其后页; (Realisierung) (现实化) 290—294, 299, 424, 454, 475; (~erhalt als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der Moderne) (作为现代的绝对命令的获得选项) 191, 220 页及其后页, 254, 285, 454, 468, 482

Parmenides, 巴门尼德 428 页及其后页

Parsons, Talcott, 塔尔科特·帕森斯 25, 33, 105, 150, 492, 514

Perrow, Charles, 查尔斯·佩罗 439, 514

Pink Floyd,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 424

Polarisierung der Alltagzeit, 日常时间的两极化 224, 266

Politik (siehe auch: Demokratie, Staat) (und Geschwindigkeit), 政治(也请参见: 民主、国家)(和速度) 36, 48 页及其后页, 103, 114, 139, 186, 201, 315, 320, 395, 402—427; (Zeitmuster der) (政治的时间模式) 149 页及其后页, 156, 169, 391—396, 399, 402 页及其后页, 407 页及其后页, 410, 419, 456, 485; (Politische Steuerung) (政治控制) 46, 326—328, 351, 402, 404, 407, 415—417, 422, 453 页及其后页, 487; (Ende der) (政治的终结) 41, 49, 328, 334, 349, 351, 410, 415; (situative) (情境的) 50, 391, 410, 418, 423, 446, 477 页及其后页; (progressive und konservative) (进步的和保守的) 327, 329, 392, 401 页及其后页, 416 页及其后页, 420, 446, 467, 477

Polybios, 波利比阿 420

Posthistoire (siehe auch: Geschichte), 后历史(也请参见: 历史) 41, 88, 402, 420, 421, 424, 439 页及其后页

Postmoderne (siehe auch: Spätmoderne, Identität), 后现代(也请参见: 后现代、身份定位) 47, 178, 193, 333, 378, 449, 456 页及其后页, 486 页及其后页; (Bestimmung) (定义) 49 页及其后页, 334, 349; (Charakteristika) (特征) 84, 169, 238, 334, 343—345, 348 页及其后页, 404 页及其后页, 413, 425, 442, 484; (Postmodernisierung) (后现代化) 346, 349, 352

Power-Nap, 能量盹 114, 200

Progressive Rock, 激进摇滚 423 页及其后页

Proust, 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 78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Zeitdisziplin), 新教伦理(和时间纪律) 11 页及其后页, 92—94, 108, 193, 275, 280, 282—284, 287, 460

Quality-Time, 宝贵时光 200

Radkau, Joachim, 约阿西姆·哈得考 42, 81, 83, 87, 100, 149, 176, 388, 515
Rationalisierung, 合理化 94, 100, 105—110, 129, 150, 274—277, 325, 337, 431 页及其后页, 439—441, 443 页及其后页, 452, 461, 489
Raum (Verhältnis zur Zeit/anthropologischer Vorrang), 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人类学上的优先地位) 60—63, 74 页及其后页, 79, 103, 106, 126, 140 页及其后页, 162—166, 171, 342—345; (Raumschrumpfung) (空间的萎缩) 62, 78 页及其后页, 125, 164 页及其后页, 168, 352 页及其后页, 466; (Raumerfahrung) (空间感觉) 60, 77, 125, 162—166, 168, 341, 466; (Bedeutungsverlust des ~es) (空间的重要性的丧失) 166 页及其后页, 270, 341—343, 345; (Raum der Ströme) (流动的空间) 344—346, 350, 376, 385, 396, 477
Raum-Zeit-Regime, 空间—时间—管理 61 161, 163, 170, 174, 335, 340, 342 页及其后页, 345, 352, 362, 466, 471, 477
Ravel, Maurice, 莫里斯·拉威尔 76
Reheis, Fritz, 弗里茨·瑞海斯 21, 45, 47, 66, 84, 102—104, 139 页及其后页, 146 页及其后页, 150, 207, 254 页及其后页, 258, 260, 279, 382, 396, 405, 409, 515
Riescher, Gisela, 吉塞拉·瑞舍尔 395 页及其后页, 516
Robinson, John, 约翰·罗宾逊 44 页及其后页, 57, 66, 121 页及其后页, 130, 135—137, 193, 199 页及其后页, 202, 208—213, 214—220, 222 页及其后页, 228, 277, 306, 381, 385, 515 页及其后页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72, 77, 353 页及其后页, 517
Russell, Bertrand, 伯特兰·罗素 11 页及其后页, 147, 283, 518

Sakralzeit, 世俗时间 35—37, 65 页及其后页, 287
Säkularisierung, 世俗化 93, 281—283, 285, 287, 290, 388, 397, 399, 423, 452
Sattelzeit, 马鞍时期 99, 397—399, 420, 422, 426, 445, 448, 460, 477
Scheuerman, William, 威廉姆·绍伊尔曼 17, 46, 255, 257, 272, 279, 311—314, 316, 318, 322, 325, 327, 394—396, 398 页及其后页, 403, 406 页及其后页, 410, 414 页及其后页, 458, 517—519
Schivelbusch, Wolfgang, 沃尔夫冈·席维尔布什 60, 79 页及其后页, 140—142, 163, 438, 519
Schmitt, Carl, 卡尔·施米特 394, 407, 519
Schröder, Gerhard, 格哈德·施罗德 40, 416 页及其后页, 518,
Schumann, Robert, 罗伯特·舒曼 76
Selbstevidenz-Falle der Zeit, 时间的不言自明的情况 23
Sennett, Richard, 理查德·桑内特 21, 45 页及其后页, 57, 66, 101, 144, 182, 184, 189, 258, 269, 273, 276—278, 306, 319, 336, 366, 369, 381—383, 497, 520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39, 460, 520
Simmel, Georg, 乔治·齐美尔 33, 42, 45, 53, 87, 89, 97—100, 106—108, 114, 142, 172 页及其后页, 195 页及其后页, 202, 234 页及其后页, 262, 353, 377—379, 428, 437, 460, 499, 501, 507, 512, 520 页及其后页
Situative Identität (siehe auch: Identität), 情境化身份定位(也请参见:身份定位)
Situative Politik (siehe auch: Politik), 情境化政治(也请参见:政治)
Slippery-Slope-/Slipping-Slope-Syndrom, 变得陡峭的滑坡/滑溜溜的斜坡的症状 190, 192, 219, 248, 276, 285, 418, 468, 470 页及其后页
Sloterdijk, Peter, 彼得·斯劳特戴克 315, 380, 452, 458, 511, 521
Slow-Food-Bewegung, 慢食行动 148
Sozialer Wandel (siehe auch: Instabilität, Gegenwartsschrumpfung) (Bestimmung), 社会变迁(也请参见:不稳定性、现在的萎缩)(确定) 58, 113 页及其后页, 129—134, 176, 178 页及其后页, 352 页及其后页, 462; (Beschleunigung) (加速) 43, 58, 85, 91, 113 页及其后页, 133; (Definition) (定义) 157 页及其后页, 176—194, 248, 251, 292—294, 471; (und Anomie) (和反常状况) 95; (und 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 (和功能上的差异) 302, 309 页及其后页, 474; (und technische Beschleunigung) (和技术的加速) 129 页及其后页, 161 页及其后页, 170—175, 245—248, 251, 292—294, 471; (und Lebenstempo) (和生活速度) 192—194, 248—250, 252; (und die Konstitution sozialer Wirklichkeit) (和社会现实的结构) 177 页及其后页, 460; (kritische Schwellenwerte) (重要的临界值) 177 页及其后页, 194, 239 页及其后页, 348, 372, 396, 398, 421 页及其后页, 434, 444 页及其后页, 448 页及其后页, 456, 467; (intergenerationales, generationales und intragenerationales Tempo) (代际之内、代际和跨代际的速度) 143, 178—184, 186, 189, 238 页及其后页, 348, 360 页及其后页, 364, 398, 445 页及其后页, 448 页及其后页, 456, 467 页及其后页, 478
Speed-Dating, 快速约会 114, 200, 469
Spieler (Lebensstilfigur), 游戏者(生活方式形象) 15, 235, 306, 352, 368—370, 382, 419, 478,
Staat, 国家 106, 156, 176, 267, 311—329, 447 页及其后页, 475; (als Beschleuniger) (作为加速器) 55, 157, 286, 311—316, 327, 329, 475; (als Beschleunigungshindernis) (作为加速的阻碍) 48, 55, 157, 323—329, 486; (und Globalisierung) (和全球化) 323—325, 333 页及其后页, 349 页及其后页, 413
Staatssozialismus (mangelnde Beschleunigungsfähigkeit), 国家社会主义 (有缺陷的加速能力) 45, 325 页及其后页
Stau (als dysfunktionale Nebenfolge von Beschleunigung), 堵塞(作为加速的功能失调的副产品) 54, 125, 144, 464

Stillstand, rasender, 静止状态,急速的 41, 87, 103, 153, 157, 167, 181, 193, 202, 385 页及其后页, 388, 421, 436—438, 446, 460, 465, 479, 484, 489

Stress (siehe auch: Zeitknappheit), 紧张(压力,也请参见:时间紧张) 11, 14, 42, 44, 117, 136, 192, 198, 200, 202, 213—216, 220, 224, 228, 233, 244, 387, 463, 469—471

Subjektive Zeiterfahrung/subjektives Zeitparadoxon, 主观的时间感觉/主观的时间悖论 27 页及其后页, 228—230, 232, 470

Systemtheorie (siehe auch: Differenzierung; Temporalisierung von Komplexität), 系统理论(也请参见:差异化;复杂性的时间化) 22, 95—97, 106, 131, 133, 179, 203 页及其后页,296 页及其后页,298, 300, 302, 473, 479 页及其后页;(Zeitbegriff)(时间概念) 22, 97;(beschleunigungstheoretische Kritik an der ~)(对系统理论从加速理论角度的批判)97, 426 页及其后页

Techno (-Musik), 铁克诺音乐 76 页及其后页, 154 页及其后页

Technische Beschleunigung (siehe auch: Lebenstempo, Sozialer Wandel, Raumschrumpfung), 技术的加速(也请参见:生活速度、社会变迁、空间的萎缩) 85, 124—129, 161—175, 432, 438, 440;(Bestimmung)(定义)113, 124, 137, 462;(Technologie und ~)(技术和技术的加速)124, 128 页及其后页, 161 页及其后页;(kulturelle Reaktion auf ~)(对技术的加速的文化方面的反应)81 页及其后页,146 页及其后页,161, 461;(und die Veränderung der Weltbezüge)(以及世界联系的变化)171, 189, 245, 466;(und Zeitrationalität)(和时间合理化)206—208, 252;(im Akzelerationszirkel)(在加速循环中)251, 471 页及其后页;(und Wachstum)(和增长)256 页及其后页, 291;(und Kapitalismus)(和资本主义)268, 309 页及其后页,473;(und Staatenkonkurrenz)(和国家间竞争)313, 315;(und Militärwesen)(和军事形式)316 页及其后页,321—323

Taylor, Charles, 查尔斯·泰勒 35, 161, 238, 287, 356 页及其后页, 375, 377 页及其后页,516, 522

Taylorismus, 泰勒主义 129, 273, 318, 371

Temporalisierung (siehe auch: Verzeitlichung) (von Komplexität), 时间化(也请参见:复杂性导致的时间化) 96 页及其后页,191, 204, 293, 295—310, 364, 368, 432, 441, 472 页及其后页

Tod (als Kulturproblem), (作为文化问题的)死亡 287—292, 294, 450 页及其后页,474

Toffler, Alvin, 阿尔文·托夫勒 379

Transport (siehe auch: Fortbewegung), 运输(也请见向前运动) 79, 82, 113, 115, 117, 121 页及其后页, 124—126, 128, 163—171, 244—246, 248, 342, 466;(und Kapitalismus)(和资本主义)261 页及其后页;(und Staatenkonkurrenz)(和国家

间的竞争)313, 319;(Transportrevolution)(运输革命) 102 页及其后页,126, 167, 438
Transmissionsrevolution,传输革命 102 页及其后页,126 页及其后页,167, 438 页及其后页
Transplant(ations)-Revolution,移植—革命 102 页及其后页,142, 167, 438

Uhr,mechanische,钟表,机械的 62, 162 页及其后页,264, 267
Uhrzeit,钟表时间 30, 64 页及其后页,165, 193, 197, 265—269, 277, 345, 366 页及其后页,450
Utopien,乌托邦 41, 152, 400 页及其后页,418 页及其后页,437, 453

Verein zur Verzögerung der Zeit,延迟时间协会 81, 84, 147
Verfassung,宪法 394 页及其后页, 420, 447
Verheißung (siehe auch: Angst),预告(也请参见:恐惧)
Verpassensangst,错过恐惧 13, 218 页及其后页,469
Verzeitlichung (und Entzeitlichung) (Überblick),时间化和去时间化(概览) 446, 451;(der Zeit)(时间的时间化)(概念 307, 365, 418 页及其后页,426 页及其后页,449—451) 34, 50 页及其后页,95, 97, 110, 206, 277, 319, 329, 348, 362—390, 419 页及其后页,423, 426 页及其后页,444—450, 455;(des Lebens)(生命的时间化)97, 318, 329, 348, 355—361, 365, 384, 444—448, 455, 457, 467, 477 页及其后页;(der Geschichte)(历史的时间化) 86, 91, 97, 348, 392, 397, 396—402, 423, 433, 445—448, 455, 467, 477 页及其后页,488;(der Identität)(身份定位的时间化)359, 364;(der Politik)(政治的时间化)401;(der Utopie)(乌托邦的时间化)400 页及其后页;(der Naturwissenschaften)(自然科学的时间化)448
Vordringlichkeit des Befristeten,迫在眉睫的期限 97, 224, 227, 410, 417, 454

Wachstum (und Beschleunigung),增长(和加速) 25, 92, 116—123, 151, 155, 162, 214, 218, 245, 256—310, 311, 315 页及其后页,391, 418, 427, 434, 440, 452 页及其后页, 463, 466, 472 页及其后页,480 页及其后页,488
Wahlverhalten (politisches),选举态度(政治的) 185,347, 394 页及其后页,417;(und Optionenvielfalt)(和选项增多)204, 297 页及其后页,362 页及其后页,424
Weber,Max,马克斯·韦伯 40, 57, 89, 92—94, 98, 106—108, 157, 267, 276 页及其后页,280, 282—284, 294, 312, 325, 436, 460, 519 页及其后页,524
Wegwerfgesellschaft,扔掉的社会 127, 140, 173, 347, 375, 379
Wellnessoasen,健康绿洲 143, 276, 338
Weltzeit (siehe auch: Lebenszeit) (standardisierte),世界时间(也请参见:生命时间)(标准化的) 62, 163, 404

Wendeerfahrung (als Beschleunigungserfahrung),(作为加速的体验的)转变体验 326

Zählzwang (Zahlenobsession),点数强迫行为(点数强迫症) 78, 193

Zeit-Raum-Kompression (siehe auch: Raumschrumpfung),时间—空间的压缩(也请参见:空间的萎缩) 60, 62, 79, 82, 84—86, 132, 164, 246, 340, 342, 394, 396

Zeitbegriff (der Philosophie),时间概念(哲学上的) 20—24, 65, 450 页及其后页;(der Naturwissenschaften)(自然科学上的时间概念)22, 52, 64—66, 97, 112 页及其后页;(der Sozialwissenschaften)(社会科学上的时间概念)20—22, 28 页及其后页, 63 页及其后页,97, 282, 451;(des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时间概念)258 页及其后页,264

Zeitbudgetforschung,时间预算研究 56 页及其后页, 66, 120—122, 135, 193, 195, 198 页及其后页, 203, 207—213, 216, 277, 291, 306, 308, 366, 483;(als anachronistisch)(作为时代错误的)57, 209, 211 页及其后页

Zeitknappheit (siehe auch: Stress),时间紧张(也请参见:压力) 10, 85 页及其后页, 117, 119 页及其后页, 138, 199, 202, 212, 214, 219, 224, 227 页及其后页, 244, 249, 251, 286, 294—297, 299 页及其后页, 407, 471 页及其后页

Zeitlose Zeit (siehe auch: Verzeitlichung der Zeit),永恒的时间(也请参见:时间的时间化) 36,169 页及其后页, 344 页及其后页,348, 350, 353, 365 页及其后页,376, 386, 396, 420, 446, 449 页及其后页,455, 477

Zeitphilosophie,时间哲学 23 页及其后页,449—451

Zeitsouveränität,时间主权 277, 306, 345, 380

Zeitsoziologie,时间社会学 19—26, 57, 166, 258, 295, 481

Zeitstrukturen (und die Vermittlung von Akteurs-und Systemperspektive),时间结构(和行动者视角及系统视角的中介) 25 页及其后页,30, 38, 57, 263, 267, 279—281, 348 页及其后页,352, 480—482

Zinsprinzip 利息原则 259 页及其后页

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什么是时间？时间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旁而立的吗？时间是中性的吗，还是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时间概念、时间体验、时间知觉与传统社会的是一致的吗？

生活节奏的加快到底意味着什么？

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关联或由此延伸出的一系列关键词——比如全球化、后现代、数字化浪潮、信息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们与时间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真的可以从马克·吐温有关忙碌的富翁和悠闲的渔夫的对话中找到生活的哲理和真谛吗？在加速的生活环境中，原地不动是否仍然意味着站在原地呢？

办公自动化、家务劳动自动化、休闲自动化，林林总总的自动化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但是为什么时间匮乏却是当今最大的问题？

飞速向前和抑郁停滞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为什么在今天如此普遍？

……

这本书尝试探寻诸多令人不解的现象中所隐含的逻辑关系，也启发着人们对存在于时间中的人生历程进行思考。

歌德学院（中国）翻译资助计划

“北大出版社社科图书”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上架建议：社会科学

ISBN 978-7-301-26518-5

9 787301 265185 >

定价：76.00元